


中华民国史稿

修订版

张玉法 著

Longtingfang 制校

 聯經出版
Linking Publishing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

我不治史学，但自有记忆以来，身历八十余年不断的内乱外侮（如民国革命时在广州的战乱，民初小学时期中之欧战及北京大学引起五四运动，广东逐桂系之战争，1920年代的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之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成立后之中原大战、剿共战争、九一八日占东北，接着是1932年之上海大战、热河华北事件，继而有卢沟桥抗战；1940年代虽有抗战胜利，而国共之战又兴，终致国民政府溃败迁台，形成目前两岸对峙情形）。我虽从未有政治性的活动，但自然而然的养成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

1983年冬，我任职中央研究院。一日在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会谈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兴趣考虑从事一部叙事客观、分析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之编著工作。我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我的企望如下：

所谓「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年代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蒋廷黻氏在南开大学首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断代观点，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蒋氏以来（至1980年时），中国近代史在台已有十余种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鸦片战争而止于民国肇造，亦有叙至抗日战争前夕的。我这里所指的时期，乃自鸦片战争甚至应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为止的两百年。这段时期中，我国由几乎与外隔绝的情形而开放，外强的侵入，我国的「自强」运动，中日甲午之战，民国之建立，军阀之割据，国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兴起，日本在东北及华北之侵略，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国民政府之迁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至目前两岸对峙之情形。

这是一个有数亿人口、五千余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在短短的一百数十年间，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间，所作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政治、社会思想、观念、体制、生活水平、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学术、艺术……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不纯是我国由文化接触交流而自然的改变，而多是由列强的经济、政治之侵略，强加我国而改的；这些改变的「基本性」和「剧烈性」，几乎使我国为列强所瓜分，幸而有列国间的竞争，救了我们。

这样的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目前还未出现。国人的著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国共两方的偏颇观点。目前大陆五十岁以下的人，对我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的知识和了解，显然是不尽客观的。台湾在国民政府治下，则有另一偏颇。一是台湾受日本管辖五十载，无疑产生极深的影响。例如目前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其基础教育是日本的，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没有认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国民政府迁台之初，因曾挫败于中共，对中共有过度的恐惧和敌视仇恨，更由此而对台独过度敏感，从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着重经济发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台湾因日据所留下的影响；忽略了增强人民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欣赏认同。近年来「本土化」观点的提倡，是脱离我国文化意识的示标。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生活风俗，连妈祖都来自大陆，但因政治而坚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渊源，是可悲的事。

在中研院近史所与同仁的会谈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国近代史」（近两百年中国史），一部国人皆可读的、客观信实而分析深入的书，使国人皆知我国民族历史文化之发展，尤其近百数十年的迅速变迁之因果，希望这有助于我中华民族对自己有较深的认识。

1991年双十节，我将上述构想在《民生报》写了一篇短文，颇获得一些赞同。翌年我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申请一些补助，聘请历史学者刘广京氏（在美）、张玉法氏及陈永发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计划，并聘何炳棣、余英时、黄仁宇先生为顾问。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别成稿三册，总名为：《最近两百年中国史》，内分：

上册，晚清篇，刘广京著；

中册，民国篇（另名《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著；

下册，中共篇（另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陈永发著。

三册各单行出版。

三篇各约六十万言，皆尽客观，不具党见偏颇，然三篇约共二百万言，具学术严肃性，或不易卒读。故我与刘、张、陈三位著者商请合著普及本，以十余万言为度，使凡我国民皆易览阅。

刘、张、陈三位各以五、六年时间精力，成此「划」时代大著，有助于我国民族的自检，助我个人达成数十年的企望，兹谨以此序为刘、张、陈三氏贺并致谢意。

吴大猷谨识

民国八十七年四月

刘序

这一套丛书分起来是三部专书，合起来却是一部互相连贯的中国近、现代史，涵盖十八世纪末的乾、嘉之际，一直到最近几年。这一套丛书所以要从乾、嘉之际说起，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问题，那时代已经有了。略述乾、嘉之际的若干问题，可以为这一套丛书的序幕。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到热河承德行宫觐见乾隆皇帝。他向清廷（主要包括军机大臣和珅）要求于广州之外多开通商口岸，并让英国在北京驻使。这些要求都被拒绝；要到五十年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才有一部分被接受。但是就中国内部的情形而言，这五十年却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马戛尔尼使华的同年，1793，自翰林院派出为贵州学政的洪亮吉（1746-1809）撰写他有名的劄记《意言》，其中有几篇讨论民生吏治问题，观察颇为敏锐。洪亮吉（江苏阳湖人）注意到当时的人口问题，指出康、雍、乾三朝长期太平，结果人口大增，而农田和居屋却增加有限。他说：「治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较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当然，田地和居屋也都有增加，但是新垦地和新建的屋宇比起人口的增加显然不足。「高曾之时隙地未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虑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虑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¹

¹ 本文引用《意言》资料，皆见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1877-79 受经阁重刊本，台北华文影印，1969），《卷施阁文》甲集卷一，页 8-10，19-22。

除了人口遽增外,据洪亮吉的观察,乾隆朝的后半期,大约在1765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地方官的风气大坏。任知府、知县的官很少谈吏治民生的问题。「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其实这些地方官就是有心为民造福,事实上也难于办到。因为地方官除审案外必须收钱粮,而只有世业的胥吏知道地方的田地为谁所有,也只有他们能指挥衙役,迫人交税。实际上赋税所入,「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强横的胥吏且常凌虐没有势力的人,逼人破家。「是其权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这种情形到了乾隆末年则有变本加厉之势。

乾隆晚期宠信和珅,任他掌权。和珅(1750-1799)于1776年入军机处,1780年为户部尚书,1784年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京师有许多大官都拜他为师,自称门生;各省督抚或由他推荐,或向他拉关系,「交关通贿」,或赠送贵重礼物。督抚既要向他纳贿,就不能不向地方官多索款。据洪亮吉1798年翰林朝考时所上的奏章:「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此奏作于《意言》成稿之后五年,似乎情形较五年前尤恶。1796年,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旗帜上书「官逼民反」;系地方胥吏、衙役向教民勒索不止,因而激变。据洪亮吉说:地方官「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²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逝世,嘉庆亲政,捕和珅,列举其罪二十款,赐之死。京官及督抚中和珅党羽罢黜了几人。但是据洪亮吉该年九月的上成亲王书,许多和珅旧人仍在位,有的年初被罢黜而现在又起复。洪亮吉说:尤其是1790年以后,有许多因和珅弄权而造成的冤案,其中少数嘉庆帝曾欲为之平反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而造成冤案的人却未必受罚。那时征剿教匪最紧急的四川省,就有声名最劣、害人最多的前达州知州戴如煌,虽被解任,而「絜家安处川中,反得超然事外」。³

洪亮吉请成亲王代奏的信批评皇帝不够勤劳,而且有「俳优近习的人,蒙惑圣听」。刑部审洪亮吉以「大不敬罪」拟斩立决,奉旨改流放到新疆。但半年之后嘉庆皇帝赦之归里。皇帝自作〈导言纳谏论〉,

² 〈征邪教疏〉,见《卷施阁文》甲集卷十,页1-3。

³ 洪亮吉上成亲王书,见同上,卷十续,页1-10。

置洪氏原书于座右，使诸臣知「朕为可与言之君」。⁴

上文藉洪亮吉的资料，说明本丛书何以以乾、嘉之际的十八世纪末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始。洪亮吉 1799 年上书之前两年内，安徽泾县的包世臣（1775-1855）在湖北、四川任幕职，所看到的地方情形和洪亮吉说的相似。一年之后包氏撰《说储》一书（1801），为中国近代第一部主张变法的著作。包氏与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等不同。他忧心的对象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兵弱威屈，民贫财绝」。

「财匱则威不行，威沮则德不立，非即有横溃四出之患也，而天子已孤立于上矣。」⁵ 包世臣主张废吏胥及幕职，而代之以经过考试、试用之后颇有品级的「级吏」。包氏要废各省的督抚和道台，由藩司主政，臬司主刑。藩、臬及县官的人选由中央指派，但中央政府本身要有新建置，设审官院，鼓励天下人民上书，「不拘现任、故宦、儒生、幕客、农民、吏卒皆许言事」；而上书的人，经过特别考试，可以补授中外官职。原来的考试不废，但罢八股，只试经术与策论。现任的科道等官「归俸三年以上而无一语建白者，罢之」。包氏显然希望官员有思想，有抱负。同时则主张提高所有官员的俸禄，以励廉耻。对于贪污的官吏则一体严惩，甚至要加罪于他们家里的人：「子自成童以上，知而不力谏者，禁锢；兄弟在署者如之；父母不禁止者，夺诰敕。」官僚之间的拉关系要严格禁止：「禁座主、举主、恩师、门生、同年兄弟伯侄之称，犯者俱坐『无耻』夺职，永不叙用。」⁶

在经济方面包氏注重农业生产，主要的方策是多设屯田。当时剿白莲教，乡勇头目里颇多「草莽英雄」，将来解甲时「兵撤于上，将骄于下，元戎无善后之策，郡县无抚恤之能，则杞人之忧于兹方始」。包氏认为现有兵勇四十余万人应挑选力强技精的两万人作战，其余则命之于险要之处建筑堡垒，就地为屯田，以勇目为官，督导屯垦。政府应提供农具及至少半年口粮。一次收成后兵屯便可自给，五年后赋税所得较原来费用必多数倍。包氏认为「劝农」政策应大规模实行。华北等旗民闲散之地，尤应举办。他认为当时可垦之地，包括边地，尚不少，由官来劝农，并依每户正丁（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

⁴ 《洪北江先生遗集》，卷首（年谱），页 32-33；〈碑铭〉，页 24。

⁵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李星、刘长桂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1），页 133-134。

⁶ 《包世臣全集》，页 134-139，178。

数目，重定较轻之田赋数额，屯田则只收秋租，不征夏税——结果可以实现「藏富于民」的理想，也就是《说储》书名揭示之政策。包氏同时主张通商惠工。现行制度之有碍于工商业者，如关卡之税及盐业专利，皆应撤除。盐除在产场收税一次外，任何商人皆许运销，不再征税。本于「劝农抑商」的原则，工商每人应交月税若干。令工匠每人月赋十五文，商人「本银五十两者，人月赋十五文……本银二千两以上，皆人月赋九十文」。此外则废捐纳制度，商人不得购官衔。国家收入虽然表面上有损失，而「生财之大道乃得，一切与民争利之弊政乃绝」。⁷

包氏《说储》乃以「待访录」的形式提出：「苟有用我，……汉唐二宗（似指汉文帝、唐太宗）必复见于今日也。」他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建议是立左右丞相，与审官院合作，起用新人，禁绝贪污，使民间无冤苦而不至于作乱。「夫倡乱执词，必指墨吏。墨吏冤酷，才被（殃及）数人，奸民口舌，遂摇众志。」如果能够通上下之情，尽人才之用，则「下志得达而吏无废事，逆气不萌，而国无卒衅也。……精选院卿，委澄京职，亦即精选京职，使监外郡，……止乱兴治，斯其要枢」。⁸

包世臣《说储》当时没有刊印，但友人有传钞者。年纪比包氏小十七岁的龚自珍（1792-1841）即获知包氏之说。他在〈投包慎伯世臣〉的诗里说：「乾隆狂客发此议，君复掉罄今公卿。」（按：掉罄应即掉罄，谓彼此批评。）⁹后来要到1906年《说储》才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刘师培在1903年撰写的跋文里说包氏的改制学说「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当嘉道之世，中国之局方守其老滥不化，而先生已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¹⁰

本丛书计划出版三部书：《晚清篇》由笔者负责撰写；《民国篇》由张玉法先生撰写；《中共篇》，由陈永发先生撰写。依各篇完成的先后，尽早出版。

我们三人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计划，原由吴大猷先生创意，最

⁷ 同上，页159-160，182-186，188-189。

⁸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页134，142，189-190。

⁹ 《包世臣全集》，附录：〈包慎伯先生年谱〉，页215-217。《龚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出版社版，1975），页462。

¹⁰ 《包慎伯说储》（上海：国粹学报馆，1906）；另见《包世臣全集》，附录，页199。

初计划合作一部三十余万字的书。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给两年的研究助理等费用。但我们嗣后发现撰写大学程度的中国近、现代史，无法写得过于简单，也不宜过于简单；因此多费研究时间，也多费笔墨。稽延时日，要向吴先生及中基会表示歉意与谢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主持人屡踢筵宴，给予鼓励，谨此一并道谢。本丛书各篇文章由该篇著者自负，笔者参与协调及审查工作，亦应分担部分责任。

刘广京

1997年9月

修订版序

《中华民国史稿》一书，是在千呼万唤之下出版的。出版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发行期间，不少朋友和读者来信鼓励，亦有一些朋友和读者来信指正错误，在此谨致万分谢意。

严格说来，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基础研究虽多，粗疏者亦不少，据以写出一部通论性的专著，实有临深履薄之感。所以勉强写出并出版，只是应吴大猷先生和刘广京先生的邀约，亦是应刘国瑞先生的催促。有读者来信说，战争和权力斗争写得太多，人文的活动写得太少，但作者自幼为战争所苦，及长又耳闻目见国家、社会为军人、政客的权力斗争所困，实不能无所感。古今中外的历史各有不同的内涵，就民国史而论，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实左右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虽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也影响军事、政治和外交。

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郑会欣先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台湾淡水工商的叶泉宏先生，以及杨树忠、陈麾东、朱高影等先生，他们对书中一些日期、人名、职衔、史实等方面的错误，分别给予指正，经作者仔细查证后，均加修订，以免以讹传讹。重新阅读全书之后，除更正已知的错误外，其他未作变动。日后读者如有所见，请随时赐正为禱。

本书修订，由洪健荣先生协助处理计算机资料，特此致谢。

张玉法

中央研究院

2000年12月25日

原序

这本书是在吴大猷先生的敦促下和刘广京先生的邀约下撰写成的。1985年8月我接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在交接典礼中，当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先生致词，深感一般国人历史知识浅薄，希望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能写一本简明的、以一般社会大众为对象的中国近代史。我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回应。

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一向只做专题研究，对写通论性的著作很少有人有兴趣；我也觉得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应该把精力放在高深的研究上，不一定要分出时间去做社会教育工作；而且坊间通论性的历史著作已多，国人如果真的自觉于自己的历史知识浅薄，当可随时购阅，若国人不爱读史，多出版一本、两本历史书又有何用？但吴先生仍然希望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能帮助他完成心愿。一次在全院的预算协调会上，吴先生拿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给我，说：「你们所里的同仁把历史写得那么细，没有人看；应该像黄先生这样写历史才好。」我当时有点不愉快，反驳了他一句：「物理、化学也都研究得很细，外行人也不会看。」

时间飞逝，六年所长任期很快届满。交卸不久，看到吴先生在《民生报》上写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找人写一部通俗性的近代史，并说明曾找过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但未获回应。读后，对吴先生深感歉疚，但也不好再回头。其间，吴先生多方接触，曾找过何炳棣先生；何先生谦称主要研究兴趣在明清史，不肯接受；又找到刘广京先生，刘先生谦称主要的研究兴趣在晚清史，但认为在台海两岸学术交流之际，重写一部近代史甚有意义。刘先生希望陈永发先生和我参加，共同撰写。我已经对吴先生做了一次歉疚的事，此时既有机会赎过，不便推辞，乃约同陈永发先生，协助刘广京先生，共同完成吴先生的心愿。吴先生的心愿，除了普及国民历史知识以外，还希望我们写的这部书，

能为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接受。完成吴先生这种心愿，有很高的难度，我们只能尽力为之。

这一部中国近代史，刘广京先生负责写晚清，我负责写民国，陈永发先生负责写中共的历史。吴大猷先生为了协助推动工作，还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十万美金，作为聘请助理、搜集材料之用。撰写工作于1992年8月正式开始，原望两年完成，出版一巨册；嗣以我们三人的进度不同，写作方式亦有差异，决定分全书为三册，以晚清篇、民国篇、中共篇为副题，分别出版，总标题定为《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有如刘广京先生序中所言。嗣以全书卷帙浩繁，吴大猷先生建议各书单独出版，因将《民国篇》改为《中华民国史稿》。

本书所涉史事始于1912年民国建立，止于1995年初稿完成之时。全书以政治、外交、军事史为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史为副，除导论外，共分十章，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中华民国的开国、政权竞逐与外交难题、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体制认同与政治权力之争、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抗日阵营的整合与分裂、从共同抗日到分别抗日、国家走向大分裂、中华民国守住最后一片土、走上与中国大陆竞立之路等问题。本书撰写期间，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承吴大猷先生和联经出版公司刘国瑞先生督导，承刘广京、陈永发、陶英惠、吕芳上四位先生审稿，承吴淑凤、黄明铭、韩静兰三位女士代为搜集资料，并承吴凤莲女士和赵台兴先生代为清稿和校对，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张玉法
1997年9月
于中央研究院

目次

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 吴大猷

刘序 刘广京

修订版序

原序

导论

第一章 中华民国的开国（1912-1916）

第一节 民国创建与立国基础

第二节 新建制与新气象

第二章 政权竞逐与外交难题（1912-1916）

第一节 政权的竞逐

第二节 外交的难题

第三章 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1916-1928）

第一节 此伏彼起的分裂

第二节 社会新生力的波动

第三节 统一大业的成败

第四章 体制认同与政治权力之争（1929-1937）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巩固与开拓

第二节 缺乏共识的建国路线

第三节 国民党的内斗与剿共

第五章 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1931-1937）

第一节 日军侵华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

第二节 抗日风潮激化各种反政府行动

第六章 抗日阵营的整合与分裂（1937-1945）

第一节 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联合与斗争

第二节 抗战阵营中的国共政权及第三势力

第三节 抗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几个政权

第七章 从共同抗日到分别抗日（1937-1945）

第一节 中日战争中的政略和战略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退守与进攻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转化

第八章 国家走向大分裂（1945-1949）

第一节 中国卷入世界两大阵营

第二节 国共纷争的大结局

第九章 中华民国守住最后一片土

第一节 生死存亡的契机

第二节 立身台湾与建设台湾

第三节 「国家安全至上」下的人民

第十章 走上与中国大陆竞立之路（1949-1995）

第一节 台海军事对峙下的国防态势

第二节 两个中国竞争中的外交空间

第三节 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政治格局

征引书目

人名及重要名词索引

导论

导论为本书的开场白，分为民国史的分期、现代化的发展、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国史的重要脉络六方面叙述。

一、民国史的分期

从中国历史的长流来看，清朝——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承续和断裂的脉络相当清楚。清朝是中国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皇朝。中华民国初以近代西方民主国家为模式，中经苏俄党政军制度之引进、德国法西斯制度之引进、以及美国民主精神之灌输，又从近代式的专制过渡到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仿照苏俄的模式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解体前后，开始引进资本主义，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政治仍不开放。

民国的历史，波折甚多，可大别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2-1928年，除孙中山在南京所主持的临时政府（1912年1月-3月）、在广州所建立的军政府（1917年9月-1925年6月）、以及中国国民党建于广州、于北伐期间移于南京的国民政府（1925年7月-1927年及以后）外，法统的中心在北京，可以称为北京政府时期，或称为北洋政府时期。当时北京政府是国际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大部分时间有由国会选出的总统，有由总统任命的内阁；约有一半的时间有民选的国会（虽然选民的数目有限，选举的质量不高）。当时国家建制和施政的大方向是立宪法、开国会，基本上走西方三权分立的路。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重定、和讨论，基本上是内阁制，亦有人主张总统制；基本上是中央集权，亦有人主张地方分权。当时民国初建，许多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意义不了解、对民主政治的尝试不习惯，造成许多纷争。民国的建制不同于清代及其以前，无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皆无绝对的权力；舆论、社会运动者、反对党、甚至拥兵自重的军人，都是制衡力量。传统的统治术，用在民主开放的时代无效。当时中央权弱，政

治和社会上各种势力杂陈。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或拥兵自重的军人常以武力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以胜负为对错的标竿。时人目睹军阀祸国，思以裁军为救国之方，但因权力在军人之手，非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故有国民党一波一波地再革命，以及新兴的共产革命。武力革命之外，亦有人从教育和思想改造做起，但缓不济急。

第二个时期，从 1928-1949 年。此期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竞逐或出没的势力颇多，其影响最大者为国民党之执政、中共之扩张，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之兴亡。国民党在 1926-1928 年的革命中获胜，成为执政党。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七、八年，中原大战、西南异动等事件，几度使国民党陷于分裂，但事件很快平息。九一八事变以后迄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势力进入中国，所建满洲政权、汪精卫政权、蒙疆自治政权等，皆随日本投降而飘逝。惟中共自 1927 年以后武装割据、武力扩张，不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而停止，不因国民党实行宪政而停止，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与日俱增。但此期间的法统所在，为国民党所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此政府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虽受各种势力牵制，未能贯彻，政权的框架俱在，在交通、经济和教育建设上，也获得不少成就。此一时期，国民党所主持的政府，大体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侵华期间的满洲政权、汪精卫政权等，虽曾为日、德等国所承认，为时甚短。此期间国民党主政的中央政府，受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影响，或在南京，或在重庆，或在广州，但一直代表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国民党主政的政府不仅与世界各国维持外交、商务、文化等关系，且曾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反抗日本侵略，并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第三个时期，从 1949 年到现在。此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国都设在台北。一度坚守的舟山、大陈诸岛陆续撤退，四十余年来大陆沿岸外岛仅保有金门、马祖作为台海前线，并作为在中国大陆主权的象征。此期间的中华民国，邦交国逐渐减少，联合国席位于 1971 年丧失，惟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上，仍有成就。在立国态势上，由反攻复国到革新保台，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竞立于世界。1970 年代以来，由于政权的本土化，主政者渐无恢复中华民国固有疆土之想，教育、文化等方面亦落地生根，

其方向有二：（1）摆脱大中国的纠葛，由台湾地区的居民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2）放弃中国国民党主导中国发展的使命，摆脱孙中山、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时代为中国所做的各种政治设计，建立一个以台湾地区为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就，增加了教育投资，也孕育了中产阶级。个人的自信增强，传统的价值衰退，原有的法律和秩序，都受到挑战。

从民国史的三个时期看来，第一个时期基本上是承晚清之旧，效习西洋，可以称为第一共和或第一民国。第二个时期，基本上是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目标付诸实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世界上有其独特性，可以称为第二共和或第二民国。第三个时期在大政方针上，大部为第二时期的延续，但领土仅余数百分之一，人口仅余数十分之一，立国态势截然不同；自 1980 年代末期以来，原有的大中国政治建构逐渐解体，落实台湾的政治和文化逐渐建立，可以称为第三共和或第三民国。

二、现代化的发展

民国史的三个时期，虽然在大政方针和立国态势上有许多不同，国家的发展仍在走向现代化。中华民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从民主化、制度化、工业化、科技化、多元化等方面略作说明。

北京政府时期，国家很少大兵压境的外患，国家层面的人力和物力主要消耗在权力斗争或内战上。在民主化方面，先后两次选举成立参众两院的国会，袁世凯总统、徐世昌总统分别由此两届国会选出，曹锟总统则由三度解散、三度恢复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产生。虽然国会议员选举权受学历、财产等限制，无论国会议员选举、总统选举，品质都不高，这在中国仍是最新的民主尝试。当时省级也有议会，受到的挫折与国会相仿。

在制度化方面，大体仍依照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建制，逐步建立。行政权的运作，或在内阁，或在总统，随国家元首的权力欲望而转移；立法权在国会，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有国会存在，国会不存在的时期由行政部门制定法律。司法权在各级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初等法院的系统自晚清以后即逐步建立，但行政干涉司法之事常有。民国制度虽不断建立，破坏制度的势力则经常出现，例如袁世凯谋恢复

皇帝制度、张勋谋恢复大清皇朝。军阀干政、军阀乱政、军阀掌政为政治常态，使建立中的制度无法彻底执行，常受到有形无形的破坏。另一方面，与政治权力关系较少的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大体尚能维持运作。

在工业化方面，由于关税不能自主，外货充斥国内市场，民族工业不易发展。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因列强忙于支持战争或战后重建，中国市场的外货压力减少，中国产品且能应合国际市场的需要，民族工业得到短时期的发展，但限在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方面。中国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上海尤为工业中心。

科技化随工业化而发展，但国内科学不发达，科技多自国外引进。五四前后，中国科学社提倡科学，并设立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少数工厂开始设立研究单位，改良产品与技术。知识界曾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政府财政困难，很少在科技方面投资，不少归国留学生有志继续研究科学和技术，成就不大。

多元化与单一化、统一化相对，多元化的社会尊重个性(一个人、一个团体的自主性)、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具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北京政府时期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解构、新制度和价值建立时期，但以经济、教育、政治等条件不足，许多新制度和价值的建立徒具表象，或昙花一现，没有实质和持续发展。例如政党、社团的活动，以及言论自由等，都常受禁抑。

在中国国民党主政时期，现代化的推动基本上是由上而下：(1)由党和政府主导国家建设，(2)建国的方向由党决定，交由政府执行。当时内忧外患频仍，1928-1930年间各派军人的冲突，比北京政府时期为激烈；1930年以后军人之间的冲突稍缓，国共之间的冲突又增。加以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国无宁日。1936年以后国共冲突稍缓，日本全面侵略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的革命全面展开。国民党终被中共逐出中国大陆。

在中国国民党主政时期，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环境较北京政府时期为劣，但民心士气较前一时期为高。另一方面，1930年获得关税自主权，1943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因而获得更多的外援和国际支持，亦为国家发展

开创了新机。在民主化方面，1929年国民党开始训政，实行指导式的民主。抗日战争期间所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即为包括各党各派代表的咨议机构。战后行宪，正式选举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并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至于地方政治，战前及抗战期间，县市成立参议会，战后行宪，正式选举省市议会。国民党训政多年，限制其他政党自由活动，而领导抗战又提升政府威信，加上选举期间的种种运作，因而在中央及地方的各项选举中获胜。此期间的人权保障，包括言论、结社等自由，受训政、抗战等影响，情况不佳。行宪以后，宪法列有人权条款，但因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政府得以各种法律、命令，限制人民自由。

在制度化方面，中央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国民政府为委员制（行宪后国民政府改为总统制）。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常随蒋介石的职位而转移。在地方制度上，北京政府时期为省、道、县三级，国民政府废道，旋又于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区。教育制度，仍如北京政府时期，分为大专、中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初等（小学）三级，但党的势力进入各级教育部门，党义被列为教材。在财经上，政府介入银行、工矿、交通等企业。在社会上，政府透过社会团体的组织，对各行各业人民加以动员和控制。

在工业化方面，民营工业受外资、外货影响，发展困难；政府对工矿、交通等企业大量投资，谋主导工业发展。辽宁、江苏、湖北等省是重要工业中心。抗日战争期间，沿海部分工业迁往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带动了内陆的工业发展。但战后工厂复员，工业再度集于沿海各省。交通方面，陇海铁路、粤汉铁路的修筑，全国公路网的兴建，航空事业的拓展，以及电话、电讯事业的扩张，均较北京政府时期为进步。抗日战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正常发展，但战后中国接收了许多日本在华企业，为战后工业重建，奠定基础。

在科技化方面，世界各国科技日益进步，中国为发展经济和学术以及支持对日战争，从事研究或引进新科技。此期的科技成就较北京政府时期为高。研究机构的设立，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高等教育的发展，质与量并重。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生物学等，战前可达

世界水平。

多元化方面，此期有倒退现象，主要原因有二：（1）国民党以孙中山的遗教治国，将孙中山思想奉为南针，此不仅影响中国向世界各国取精用宏，且阻害国人思想之进步。（2）内忧外患频仍，抗日、剿共战争不断，使政府有危机感。尽管如此，由于政府控制的能力有限，抗日战争、战后行宪都需争取国人支持，故大部分时间，都有反对党存在，都有反对派的言论存在，都有自发性的社团和社会运动存在。到 1948-1949 年间，更呈现失控和无秩序的现象。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国家生存的危机感继续存在。在中共欲以武力解放台湾时期，政府以戒严法统治。1980 年代后期，两岸关系渐缓和，政府宣布解严，并大力从事政治改革。此期间的现代化发展，在民主化方面，1950-1970 年代进展甚缓，到 1980 年代，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人民团体自由活动、开放社会运动，在混乱中有些进步。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全面在台湾地区改选，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改为直接民选。但宪法随时修改、监察委员由民选改为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以及酝酿废除国民大会、废除监察院、废除台湾省等，渐已脱离早年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法制。而总统承袭了戒严时期宪法「临时条款」的部分权力，历次修宪且不断扩张总统权力，关心民主的人士引以为忧。

在制度化方面，1950-1970 年代，主要沿用 1950 年代以前所订的法制而加以修订，政治和社会规范较为固定。1980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放弃大陆主权的意图日渐明显，远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气氛日益浓厚，加上民主、自由、独立思想高涨，政改、宪改、教改不断，制度相当不稳定。但也建立了不少新的制度，如公务员的退抚制度、由公保到全民健保的保险制度，以及集会游行法、劳动基准法等制定。

在工业化方面，此一时期的成就最大。台湾是海岛经济，不易自给自足，拓展外贸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早年利用美援发展纺织、塑料、合板等工业，使台湾渐有工业品出口。其后发展钢铁、造船、石化、电子等工业，使台湾进入精密工业时代。而基隆港、高雄港的扩建，台中港、苏澳港的开辟，南北高速公路和东西横贯公路的修筑，铁路的电气化，桃园国际机场的辟建，以及国内外电讯、电话、和资

讯网的全面建立等，不仅将全岛联在一起，且使台湾地区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

在科技化方面，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主导国家科学与科技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新竹科学园区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立、以及各种国际技术合作等，更为科技化建立了良好的条件。1980年代以来，计算机普及，使科技主导了整个生活领域。

多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最近十多年。政治的多元化可以反对党、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的勃兴为例，经济的多元化可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为例，社会的多元化可以提高教育和学术的自主性、以及言论、出版自由为例。在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共识不易形成，任何决策，都会使社会中的某些个体受到伤害，使民主政治「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受到质疑。

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有几个需要特别检讨的主脉，即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之一。晚清革命党人立志推翻满清的动机之一，是满清没有能力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透过军事威胁、不平等条约约束，利用宗教、商品、资本等工具，君临中国。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到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以后，形成一种为国家争生存的力量。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动力。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后，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消失，蒙汉、藏汉、回汉间的矛盾扩大，主政者倡「五族共和」，谋转成中华民族，实际的政策，无论是优待满蒙，还是种族同化，仍是以汉族为中心，边疆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不强。民国时期，国内的民族矛盾大于清代，但为全国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外交压力；西藏、蒙古问题，是因为英、俄的介入而变得复杂。

引起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者，在北京政府时期，第一个是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反日），第二个是1919年因中国代表

在巴黎和会中争取收回山东利权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反日，并反对在和会中支持日本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个是 1925 年因上海日本纱厂枪杀罢工代表而引发的五卅运动（反日、反英）。至于 1926 年因北京学生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军阀起而抗议所发生的三一八惨案、1928 年日本为阻止北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同胞所发生的五三惨案，皆因受到政府的约束，未扩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全面对抗。

前述几次民族运动，对国家的发展影响巨大。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保密，然日本对华野心却因此宣泄于外。时任总统、日行专制的袁世凯假此团结内部，进一步谋称帝；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运动，因此受到袁的分化，部分党人谋暂停革命，一致对外。五四运动，波澜壮阔，不仅带动了全国性的政治觉醒，国人且从文化思想方面反省，谋为国家开启新局。反传统、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从此掀起，因此而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有中国国民党的壮大。五卅运动将五四时期的政治维新、思想启蒙运动转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层面。在广东地区，国共合作掀动省港大罢工，与英国帝国主义展开艰苦的斗争。革命势力，藉国共合作、藉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由南方发展到北方，最后有北伐的成功。

北伐完成以后，国民党主导国家发展。在解决国内民族矛盾上较前积极，但收到的成果不很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则转趋剧烈。1931 年发生沈阳事变，1932 年发生淞沪战役，1933 年发生长城战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日本势力自东三省伸入热河、察哈尔及河北省北部，复于 1935 年进行华北自治运动，1936 年进兵绥远。此期间，主政的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全力在江西及豫鄂皖边区剿共，并应付军阀的动乱，对日本百般隐忍。

在这种情形下，抗日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中共初为转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复为执行共产国际的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运动抗日，更使抗日情绪达到高潮。1936 年，中共的有形势力局促于陕北一隅，国民党认为剿共胜利在望，继续坚持安内政策，引发两广军人异动，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更于西安联合劫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迫其停止剿共，一致对日。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形成，中共的声望也在运动抗日的过程中节节升高。1937年，日本以防共为名，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蒋委员长号召「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共起抗日。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国共两党一时曾有紧密的合作，怀抱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以及新成立的国家社会党，均一致支持抗日。1937至1938年间的全民大团结，在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后国共两党为争夺敌后地盘走上军事斗争之途，而其他民主小党派，也为民主、行宪等问题与国民党从事政治抗争，但各方的抗日情绪均甚高。一些迫于现实与日本合作的人，不少人亦对抗日工作暗中协助。

抗战胜利后，对日的民族主义消褪，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趋于激烈。美国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从中调停，苏俄初亦表示支持国民党。国民党除一度因东北接收问题进行反苏外，基本上对外采取协和政策。中共初以反对党的姿态联合各反对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与军事斗争，并欲假美国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有所抑制，继见美国反共立场坚定，积极扶持国民党，苏俄对中共的扩张乃尽量给予支持。当时中共已决定「一面倒」向苏俄，遂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进行反美斗争。

美国自抗战后期介入中国战场，常以援助国的姿态对中国颐指气使；战后订立中美商约，又恢复不平等条约中的诸多权利；颇引起国人不满意。及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发生，中共乘机煽动，遂形成全国性的反美风潮。国民党对美援有所依恃与期待，不欲反美风潮扩大，群众的反国民党情绪愈益升高。中共于战前利用抗日风潮争取民心、战后利用反美风潮争取民心，国民党为执政党，不让国民纵情排外，因此大失民心。同样利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共在此斗争中壮大，而国民党则在此斗争中日居下风。

1949年以后，中共继续利用民族主义团结人心、巩固政权，譬如投入韩战、越战，以武力处理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以武力保卫西藏等。近二十余年则以民族主义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谋国家统一。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初，宣传中共受苏俄卵翼，不是中国人；继在中共文革前后，以文化复兴相号召。均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近年台独论高涨，无论对有形的中国，抑无形的中国，均加敌视；甚且有人倡用台

湾民族，以与中国民族对立。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对付中共的兼并，与前此中华民国史上以中国民族主义对抗东西方帝国主义者大不相同，兹不多论。

四、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民国史的另一主脉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清朝行中央集权制，晚清由于应付太平军、捻乱，继以办新政，地方督抚权力上升。武昌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无法遏止，宣布退位。

辛亥革命是以分省独立的形式完成。民国建立以后，各省都督拥有实际兵权、财权，因有倡导仿行美国联邦制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仍有不少省份宣布独立，证明地方权重。袁世凯为集权中央，初以副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倡行军民分治，使一省之军事归都督，民政归民政长；继又于北京设将军府，改各省都督为将军，直接由大总统统率。此类设计对地方权力并未能有效抑制，1915-1916年间反帝制运动起，各省乃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无法控制局势中病亡。

袁世凯死后，历届总统对地方军人均无法控制。控制中央政府的军人，初为皖系，继为直系，最后为奉系。在皖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于皖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长官属于直系、奉系或其他派系。同样，在直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于直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长官属于奉系、皖系或其他派系；在奉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于奉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派系属于直系、国民军系或其他派系。其间，国民党在广州组建革命政府，此革命政府初受南方地方军政派系左右，桂军、滇军、粤军、湘军、川军等势力，对广州革命政府时而支持，时而企图加害，直到1925-1926年间始获统合，但对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均为地方割据势力。

在地方权重的北京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互相制衡，或互相消灭。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直皖战争、两次奉直战争，皆为地方对中央的战争；其中护国战争、直皖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使中央政权崩溃。北京政府为了统一南方，数度南征，也曾举行南北议和，皆无结果；最后原被视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广州革命政府进行北伐，统一全国。广州革命政府初受军阀控制，但在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以后，因有黄埔军校的成立，渐能以黄埔军校所训练的军队和干部为中心，掌控两广

军事大局；加上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和运动，到 1925 年五卅运动后，国民党在广州所成立的国民政府，成为国家统一的希望。1926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派兵北伐，1927 年 4 月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到 1928 年 6 月推翻北京政府，成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合法政府。

国民政府进行北伐前，统一了两广各军系，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北伐进行期间，孙传芳和吴佩孚的直系，因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首先被北伐军消灭。其后北伐军北上，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均响应，控制北京政府的奉军不敌，撤回东北。其后继张作霖统率东北军的张学良宣布归顺中央，国家统一。北伐期中曾将参加北伐和响应北伐的军队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所统率的黄埔军编为第一集团军，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所统率的晋绥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所统率的桂军编为第四集团军，其后张学良的部队改为东北边防军。这些军队是在北伐前后的临时编组，大部分地方性甚强，当北伐完成后中央筹谋裁军时，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矛盾浮现。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汪以改组国民党为名在各地发展组织、吸收党员，且与各地军事实力派联合，与蒋介石抗衡。在 1929-1930 年间，初有以李宗仁为中心的反抗，继有李宗仁与冯玉祥的联合反抗，终则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的联合反抗。李、冯、阎、汪联合反抗中央，主战场在河南，称为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期，中央军转败为胜，张学良派兵入关，支持中央，战争结束。

中原大战后地方实力派仍然存在。1931 年立法院长胡汉民（广东人）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被幽禁，广东宣布另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国民政府在团结御侮的口号下结束，但承续广州国民政府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仍处于半独立状态，1936 年广东又曾独立一次。另一方面，日本于占领东三省后，续向内蒙、河北蚕食，并在东四省（包括热河省）、内蒙、河北北部扶植伪政权。此期间，中原大战后一度蛰居的冯玉祥潜赴察哈尔号召旧部抗日，淞沪战役后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在福州组抗日政权，使中央政府穷于应付。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亦使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山东等省有沦为日治的危机。1936 年，驻屯陕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发动兵变，劫持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迫使其放弃剿共，共同抗日，一时使中央与陕西关系紧张。

西安事变后中央改采抗日政策。抗战期间，大敌当前，地方实力派尚能顾全大体，然云南、新疆等地自主性仍强。抗战末期，中央政府渐能控制新疆，云南则仍为政府反对派所据。抗战期间，军队调动频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迁移无常，加上商家、难民转徙于各省，各省渐打破地方藩篱。战后军政派系浮现，地方色彩不浓，中共于消灭国民党的军政派系之后，乃能迅速完成中国的大一统。

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后，蒋介石总统怀抱复国之志，颇有「过客」心态，然未尝不重视台湾建设。在蒋经国总统掌政期间，大力推动政权本土化，亦以台湾人自居。就整个中国而言，台湾的区域性自是加强。另一方面，中共指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地方政权，来自中华民国的人为台湾人，亦加强了台湾的区域性。就中华民国在 1949 年以后的辖区而言，在台北市的中央政府即是中央，省市政府和县市政府是地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反对党兴起以前大体良好；反对党兴起以后，反对党在地方上所获得的政权愈来愈多，逐渐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

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史的再一主脉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清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政治，基本上是家族政治，一个家的成员在获得政权、建立朝代以后，无论国家或政府，都成为这个家族的基业。在政权未被另一家族取代以前，政权即在此家族中传衍。此政权所用的官员，基本上皆为家臣或奴仆。统治家族与家臣、奴仆，构成统治集团。此统治集团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制定法律，建立制度，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一）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避免妨害人民生业，并为人民生业开创良好的环境。（三）使有志者有机会参与国事、服务人群。「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表示一个政权因受人民拥戴而存在，因不受人民拥戴而灭亡。民本政治，以民为本，人民参政的管道虽窄，但施政必考虑人民的利益。当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国家是统治集团所经营的层面，社会是人民的生业和生活层面；社会在理论上均在国家掌控之下，但以传统政治崇尚「与民休息」，

当政府无意或无力干涉时，社会有很大的自主性。

民国建立以后，政治崇尚民主，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24年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时声言，要四万万人民做皇帝。能如是，则可将传统时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颠倒，社会至少取得与国家对等的地位。不过，当时距专制时期未远，让元首与政府官员由统治者变成公仆，让社会力量牵制国家，在制度的改变上需要大工程，在官民心理上更需调适。

北京政府时期，1912-1916年由袁世凯任大总统。在1912-1913年间，由于民国初建，人民的自主心高涨，加上有反对党的存在，社会的自主性相当高。各种政党、社团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纷纷创刊；举办活动和宣传主张都甚少受到限制。1913-1916年间，反对党被镇压，民意机构被关闭，反对派的报刊被关闭，政治上一片肃杀之气，人民噤若寒蝉。

1916-1928年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曾任总统，段祺瑞曾任执政，张作霖曾任大元帅，均主持中央政治，但以军阀割据，国民党在广州另建基地，中央只能统治部分地区；黎元洪、徐世昌且为军人之傀儡，没有独立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活动没有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内外有各种军政派系竞逐，人民和社会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五四时期，政党、社团、报刊等再趋活跃，群众运动此伏彼起，在言论自由的深度与广度上，逾越开国时期。约在同时，由于一次大战期间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压力稍减带来工商业繁荣，使工商阶层也一度成为社会的自主力量。

北伐以后，国民党操持国家政柄，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此一元化集团，尽管统治技术拙劣，力图控制教育和思想，并大力进入财经部门，办理银行及工矿业。当时由于军阀动乱，中共从事武力革命，日本侵略中国，使此统治集团的危机感加深，对人民和社会的控制甚严。国民党部，以及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为政治控制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相号召，三民主义涵盖了民本和民主两方面，在施政的设计下不能采取专制的形式；而国民党主政后在外交上依恃美国，美国每以民主自由的理念加诸友邦，国民党不得不稍予迎合；而到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要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

日，战后复需团结各党各派行宪与抗共，对各党各派的意见亦不得不稍予接纳。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党、自主性的社团、意见不同的报刊，以及关心国事的人群，都有相当的自主空间。国民党治国时期的中上层事务太多，未能全力照顾下层，中共乘机在农村发展势力，并利用城市居民和政治派系的自主活动，迫使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撤至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撤至台湾以后，由大国变成小国，国土仅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仅余不足一千万人（近年始增至二千一百万人）。将一国之建构移于一省，省（市）、县（市）的行政机构以外，有体系完整的中央政府，有军种齐备的五十万军队，国民党党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部分设各地，政府与国家的比重大增。此期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严重，政府对民间人力、物力的动员与编组加强，至少在 1950-1970 年代的三十年，人民与社会几无自主空间可言。1970 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军事对峙的形势缓和，台湾的经济和教育有大幅成长，加上美国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关怀，政府渐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控制逐渐放松。新生的社会力，转而投注于政府和国家，改变了政府的制度和人事，也改变了立国的态势和国家发展的方向。

六、民国史的重要脉络

民国史的演变与发展是多方向的。本书为通论性，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检讨。导论中所述，部分为全书的梗概，部分为书中史事脉络的背景。书中各章节，以政治史为主，理由有三：（1）近代以来，政府主管的事务增多，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增多，在民间社会未能建立以前，政治的良窳和稳定与否，直接间接关系着每个人、每个机关和团体。（2）近代以来，政权的角逐与更替不仅牵涉一个党派或军系的利益，人民大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或投入某党派、或某军系；某党派或某军系政权角逐的过程及成败，都影响到个体。（3）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严重，中国能否有效应付侵略，除自身力量以外，只能诉于外交。因此，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外交的成败，都影响到每个人、每个机关和团体。

在民国历史中，政治史较经济、教育、文化史为重要；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经济、教育、文化皆为政治的工具。就此点而言，与近

代以前相去不远。政治史，基本论述政府与国家的历史层面，惟民国历史原当以民为主，人民和社会的自主性发展，亦兼有所论述。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因系政治史的范围，本书论述较多。至于现代化的发展，在 1949 年以前，因受政权更换、以及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影响，仅有偶然的成就，没有持续的成长。在 1949 年以后的台湾，主要成就在 1970 年代以后。本导论中所述的几个民国史发展的主脉，在本书各章中不难寻觅。

第一章
中华民国的开国
(1912-1916)

第一节 民国创建与立国基础

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结束，中华民国建立。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在覆亡之前的七十年，外受英、法、俄、德、日等国的侵略，内有太平军扰攘、捻匪动乱、以及回民反抗，使清帝国日陷于崩溃。崩溃中的清帝国力图振作，及时改变天朝观念，与各国建立平等外交，以缓和与外国的冲突；并学习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练兵之法，以平定内乱、应付外患。继则引进各国的经济及政教制度，俾能建立富强国家。清朝的改革并不成功，甚至促使革命运动的蔓延。对外开放和教育发展带来的士民觉醒，益使关心国是的人对统治阶层不满。统治阶层承三千年专制之旧，而皇室满族不仅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当时且被占中国民族大多数的汉人视为异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欧洲向外传布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传遍亚洲。满清专制皇朝首当其冲，遂使革命无法避免。

在清朝 268 年的历史中，叛乱与革命此伏彼起。有的企图恢复明朝，有的企图建立新国；绝大部分则为一般民乱。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从孙中山始。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出生在贫苦人家。他的革命思想一部分来自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一部分来自西方。他于 1879-1883 年（光绪 5-9 年，14-18 岁）在夏威夷读书，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于 1883-1884 年（光绪 9-10 年，18-19 岁）、1887-1892 年（光绪 13-18 年，22-26 岁）在香港读书，受英国的影响也很深。这不仅因为当时夏威夷王国倾心美国，而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因为他爱读西书。孙中山在求学和革命期间，透过西书的阅读，和旅游美欧各地，使他能充分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应走的方向。在他主导革命的时代，没有其他革命领袖对西方的认识像他那样广博。另外一方面，

孙中山早年对太平军的反清事迹听自传闻者不少，而他在广州（1886-1887，光绪 12-13 年，21-22 岁）、香港读书期间，又结识了隶属三合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同学郑士良，对他的革命思想当然都有启迪作用。尤其重要的，在他大学毕业前后，清廷及地方官绅已从事自强运动三十多年，孙中山对自强运动的精神与内涵不仅了如指掌，而且很不满意；关于这一点，他在 1894 年（光绪 20 年）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中，表达得很清楚。孙最初想超越自强运动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努力，改采政经改革的路；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构想。李未予理会，孙乃走向网罗群众、推动革命的路。

孙中山欲改善中国现状的思想孕育于大学毕业以前。在香港读大学时，与当地「辅仁文社」的维新分子有所联络；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曾在广州组织兴中会。但改善中国现状，究应走改革的路还是走革命的路，当时并没有决定。1894 年秋天孙中山的改革建言未获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回应，而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节节失败，孙乃到夏威夷组织兴中会，准备推动革命。孙之所以选定夏威夷重新组织兴中会，系因他早年在夏威夷读书，在夏威夷有社会关系，而他的哥哥孙眉是夏威夷的富侨，社会关系更多；另一方面，夏威夷的华侨社会多广东人，更利于孙的活动。

1894 年 11 月 24 日，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香山（Honolulu）组兴中会，截至 1895 年 1 月中旬，约有 30 人参加，其后到 1895 年底，约有 120 人参加（夏威夷地区）。1895 年 1 月中旬，孙中山离檀香山往香港、广州一带联络，在香港联络辅仁文社同仁杨衢云等，组织香港兴中会；在广州联络激进人士程奎光等，组织农学会，以掩护革命行动¹。

革命军计划于 1895 年 10 月 16 日在广州起事，采用青天白日旗，并于 10 月 10 日选杨衢云为总统，国名未定。孙中山负实际革命行动之责，约定各方革命军分道攻城，香港一路约四百人，另有汕头一路，及其他各路人数均不详。因事机不密，香港一路有四十余人被捕，其他各路未积极行动，事遂终止。被捕遇难者中，有设计青天白日旗的

¹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 152-171。

陆皓东²。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赴日，日报指孙为革命党，不以叛乱犯视之。嗣孙经美转英，在英曾为清朝公使馆诱捕，事涉英国法权，引起外交交涉，使孙声名大噪。脱险之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革命理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于此时有了初步构想。另一方面，1895年春中日战争结束，订立马关条约，台湾割日，朝鲜宗主权丧失。各国见中国国势衰弱，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俄国在东北，日本在福建，英国在广东及长江流域，法国在广西及云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广东籍进士康有为及弟子梁启超（举人）等推动政治改革，光绪皇帝实行之，而有所谓戊戌变法，因受慈禧太后压制而失败，光绪皇帝被幽禁。变法失败以后，康赴北美，梁至日本，梁一度欲与孙中山合作革命，格于师命而止。1900年（光绪26年）山东、直隶等省发生义和团排外和八国联军进兵京津之事，孙中山使郑士良联络会党数百人在广东惠州起事。时日本山县内阁采南进政策，拟染指华南，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为此政策的执行者。孙在台湾争取日本援助，日本欲借用中国革命党的力量在广东、福建一带发展势力，一度答应相助。嗣因日本内阁更换，新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儿玉援助中国革命。外援不来，郑士良孤立作战，不久失败。约在同时，革命党人史坚如在广州谋炸广东巡抚德寿，被捕处死³。

孙中山于1900年策动的惠州之役失败，康、梁于是年使唐才常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欲起兵解救光绪皇帝亦失败，但义和团排外和八国联军入侵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此时兴盛起来。当时清廷加强练新军，冀能御侮；中央及各省都派留学生出国，以造就人才。在改革开放的气氛中，关心国是之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受民族主义的激发，不少人走上了体制内改革或体制外革命的路。

体制内的改革运动，除康、梁在海外组织团体（保皇会、政闻社、帝国宪政会）继续推动外，留日学生湖南人杨度（宪政公会）、江苏状元张謇（宪政筹备会）等亦各组团体，从事推动。到1906年（光绪32年），清廷开始作立宪的准备工作，1908年公布宪法大纲，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选咨议局作为省议会的预备，1910年中央成立资

²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215-220。

³ 同上，页220-228。孙中山进入清使馆，有入内找广东同乡、以及受人诱骗等说，详参考J. Y. Wong,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一书。

政院作为国会的预备，1911年建立内阁制度。在各方的压力下，准备召开国会的时间从1916年提早到1913年。1911年10月革命全面爆发，宪法大纲由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但至1912年2月清帝退位，体制内的改革中止⁴。

在1900-1910年代初年的中国，改革与革命是相辅相成的。改革运动与革命运动本来是同时发生、分途发展的，由于改革不断受挫，革命的势力乃不断增加。革命最初由孙中山倡导，响应者多广东人。到1902年以后各省派到海外的留生日多，大多集中在日本东京。各省留学生中的革命势力兴起，由留学生将革命传到国内，革命势力始在各省传布。1902年留日学界有三件事象征革命势力在留学界的萌动：一是湖南留学生杨守仁出版《新湖南》，鼓吹湖南独立；二是浙江学者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提醒国人勿忘自满清手中恢复汉人政权；三是江苏留学生秦毓鎰发起组织青年会，以民族主义和破坏主义相号召。1903年由于俄国拟违约不自中国东北地区撤兵（八国联军时期入据），引起日本的关切（日本自甲午战后，亟谋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展），也引起数百名中国留日学生的关切。这一批热血青年组织学生军，宣言将去东北驱逐俄军，因此举未能得清廷之准可，乃分头回国运动，发展革命势力。湖南留学生黄兴路过武昌（识宋教仁）到长沙联合学界、军界及会党，组织华兴会，被推为会长，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的宋教仁（湖南人）为副会长。浙江留学生龚宝铨（章炳麟之婿）到上海，联络学界蔡元培（浙人）、章炳麟（浙人），陶成章到浙江联络会党，共同组织光复会。时章炳麟因苏报案入狱，推蔡元培为会长。其后光复会人秋瑾（浙人）等在浙江联络会党，徐锡麟（浙人）在安徽渗入警界，李柱中（湖南人）等在南洋联络华侨，活动颇为积极。1904年，华兴会谋在湖南起兵事泄，黄兴、宋教仁等逃往日本东京，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时留东学界革命气氛浓厚，湖北留学生办有《湖北学生界》，湖南留学生办有《湖南游学译编》，浙江留学生办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办有《江苏》，……但彼此之间意见不一，联络不多。1905年孙中山自欧洲联络留学生后到日本，眼见此群雄并起的状态，谋思统一，得

⁴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页224-504。

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之介绍，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决定联合进行，并扩大组织，遂有同盟会之创立⁵。

同盟会系由兴中会、华兴会的领袖联合留东学生组成，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庶务；其后上海的光复会人士也加入组织，但光复会人未能跻入同盟会的领导阶层。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在国内外设立支分部数十个，并于各地组社团、办学校以网罗人才，办报刊、开书报社、组剧团，以宣传革命。同盟会在香港设南方支部，推动华南各省的武装起事；有些起事，则是革命党人个别联络而成的。绝大部分的起事，是利用会党的力量。1906年有萍浏醴之役、1907年有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皆无所成。孙中山集中精力推动革命，来自华兴会的黄兴极力配合，光复会人的合作情况则不佳。另一方面，部分长江流域的同盟会员，也不以孙中山侧重华南边区的起事为然。1907年，光复会人章炳麟、陶成章等自同盟会分裂而去；部分湖北、四川等省的同盟会人士则别组共进会；均谋与同盟会分途发展。其后四、五年，各派革命党人分头运动，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等先后策动了广西镇南关之役（1907）、广东防城之役（1907）、广东钦州之役（1908）、云南河口之役（1908）、广州新军之役（1910）、广州黄花冈之役（1911）等；光复会策动的起兵，先后有徐锡麟、秋瑾的皖浙之役（1907）、熊成基的安庆之役（1908）、以及温生才刺杀广州副都统孚琦事件（1911）；共进会人仅刘英曾在湖北京山起事（1909）⁶。上述革命起事，主要的群众为会党。

历次革命起事，以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冈之役牺牲革命干部最多，是革命运动的一大挫折，但也是革命由边区革命进入中枢革命的一大转折。黄花冈之役失败后，部分在华南地区策动革命（边区革命）的党人意气消沈，华中地区的革命党人决心在长江流域重整旗鼓（中枢革命），于1911年6月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总会。中部同盟会总会的灵魂人物之一是宋教仁，时在上海主《民立报》笔政。中部同盟会在江苏、湖北、四川等省联络军学界及会党。当时改革派所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不断受到挫折；清廷欲收回汉粤川铁路自办向

⁵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页179-192，199-226，252-264，319-338，346-358，384-392。或谓孙中山与黄兴结识是由杨度介绍。

⁶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326-356，419-427，463-488，529-537，671-691。

国外借款，湖北、四川等省掀起很大的反对风潮；而湖北新军中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甚为活跃，参加革命活动的军人，在湖北一万五千新军中居其三分之一；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当时孙中山因被香港、日本、安南、缅甸等地拒绝入境，只能在北美筹款、宣传：来往于日本、香港间的黄兴，一度谋往云南发展，嗣转而支持湖北、四川等地党人在长江中游的革命意图，并自香港派居正等携巨款前往湖北等地联络。在这种情形下，湖北军中党人计划起事⁷。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西南右旗新军工程第八营营房响起枪声，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出兵营，直奔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新军兵营中的革命党人闻风响应，纷纷赶往楚望台与工程营起事士兵会合。之后向湖广总督署进攻。11日晨，督署东侧的黄鹤楼，飘起革命军所使用的九角十八星旗，革命军获得胜利。湖北的革命活动起于1903年2月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李廉方寓所设立机关。吴为湖北云梦人，1897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骑兵，在日本加入兴中会。1902年春回国，任武昌武普通中学教习、营务处帮办。所设机关，联络青年学人、学生或军人，参加者有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曹亚伯、冯特民、时功璧、时功玫、蓝天蔚等。不久，吴禄贞调北京任骑兵监督，在李廉方寓所聚会的活跃分子先后出国留学，机关解体。1904年5月，吕大森、胡瑛、宋教仁、时功璧、曹亚伯等组科学补习所，暗地联络革命。科学补习所仅存在四、五个月即被查封。1906年2月刘静庵、曹亚伯、冯特民、吕大森等组日知会。1906年余诚自日本东京回鄂成立同盟会湖北分会，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成员。在此前后，湖北地区军学界所成立的革命团体三十余个，而以1907年9月自同盟会分出的共进会和1911年1月成立的文学社为最大。共进会的重要成员有张伯祥、居正、焦达峰、孙武等，文学社的重要成员有蒋翊武、詹大悲、胡瑛等；两团体的成员以湖北新军士兵为主。1911年9月14日，两团体的代表决定联合起兵。10月9日，湖北军政当局破获革命机关，逮捕部分革命党人，并获得革命党人名册；为防止军队作乱，下令官兵不得出营。军中革命党人心怀危惧，遂于10月10日晚发难。由于革命党人多属士兵，没有孚众望的领袖，强推

⁷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125-126，365-367，453-461，598-653。

湖北新军最高长官黎元洪协统（相当于旅长）为都督。10月11日革命军占武昌，12日占汉口、汉阳，革命局势暂获稳定⁸。

武昌新军起兵后，湖广总督瑞澂于10月10日深夜逃出督署，登上楚豫军舰，要求驻汉外国领事出兵干涉，未获同意；另一面则向清廷求援。10月12日，清廷派陆军大臣蔺昌南下督师，先攻汉口，战争于10月16日开始。为稳定新军（北洋新军为袁世凯编练），清廷于10月27日拟起用退职已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率冯国璋的第一军、段祺瑞的第二军，会攻武汉。袁未应。嗣清廷许以袁内阁总理大臣，始出山。约在同时，同盟会的领袖黄兴在香港获知武昌起兵消息后于10月28日晚赶抵武昌，当晚赴汉口指挥革命军事。当时革命军在汉口的守军不到六千人，而开抵汉口的清军已达一万五千人。虽然武昌方面派军支持汉口，终以众寡悬殊，革命军不得不于11月1日放弃汉口。汉口保卫战，革命军伤亡六、七千人。11月3日，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名义。黄曾于11月16、17日率兵反攻汉口，失败后退守汉阳。汉阳的守军约二万人，围攻的清军则多达三万人。革命军战至11月27日不支，自汉阳退至武昌。汉阳保卫战，革命军伤亡三千余人。汉口、汉阳保卫战，以及反攻汉口之战，革命军伤亡万余人，作战四十九天。在此四十九天中，由于革命的中心武昌屹立不摇，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在10月22日，江西九江在10月24日、南昌在10月31日，山西太原在10月29日，云南昆明在10月30日，贵州贵阳在11月4日，江苏上海在11月4日、苏州在11月5日、镇江在11月8日、南京于12月2日攻克，浙江杭州在11月4日，广西桂林在11月7日，安徽安庆在11月8日，福建福州和广东广州在11月9日，四川重庆在11月22日、成都在11月27日。直隶、山东、河南、甘肃、绥远、东三省、新疆等地皆有革命军起事，但未成功。开湖北革命风气之先的吴禄贞，武昌革命爆发时任第六镇统制，驻守直隶石家庄，因谋响应革命，于11月7日被暗杀⁹。需要说明的是，在各省响应革命的，包括不同政治立场的革命派、改革派、旧官僚，不同身分的新军、会党、咨议局议

⁸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页65-67，71-115，180；皮明麻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页1；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529-656。

⁹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页277-309，382-400；皮明麻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页121-151。

员、学界、商界，各省大都以宣布独立的方式，响应革命。

当时清朝皇帝溥仪才五岁，其父摄政王载沣无应变能力，满清政权岌岌可危，乃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出身淮军，甲午战前在朝鲜任商务监督十多年，其后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政治、军事、外交经验丰富。1908年光绪皇帝死，临死前，光绪皇帝要求醇亲王载沣（光绪弟）杀袁，以其在1898年出卖改革派；另据溥仪事后的了解，当时传说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帝。及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乃罢袁之官。袁被罢后，住河南彰德。就统筹全局的人才而论，当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关心中国局势的外国人亦相信袁能稳定中国政局。

袁世凯于1911年11月1日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后，发兵进攻武汉，并将革命军逐出汉口、汉阳，使自香港前往督战的黄兴因战败而转往长江下游经营，但袁世凯自始即希望与革命军议和。1911年11月初，袁世凯督师抵达湖北孝感，时革命军已自汉口退守汉阳，袁世凯派人送信给黎元洪，试探和议。黎元洪的回函，则揭露清廷歧视汉官（指袁被罢黜事），要求袁响应革命。嗣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密商议和条件：（1）立即停战，（2）清帝退位，（3）袁世凯为大总统。此条件为滞留北方的革命党要人汪精卫获悉；汪于1910年4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武昌革命爆发后被释放，至是乃草一函派人送交黎元洪。在12月间，清军及革命军即断断续续停战，双方并正式派代表在上海议和¹⁰。表面上袁是以清廷实行虚君共和为让步底线，革命军一方则坚持实行民主共和。革命军方面并以临时大总统之位饵袁，使迫清帝退位。其间，革命军方面拟推出共同领袖，以统一革命阵营，因有黎元洪与黄兴之争，久议不决。嗣孙中山自海外归国，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建号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并召集成立临时参议院。袁迫于情势，决定赞同民主共和，并与革命军议定清帝退位条款：清帝仍住清宫，保留其年号；中华民国每年给予生活费四百万元。

1912年2月12日，年甫六岁的宣统皇帝，依约交出政权，退居

¹⁰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页407-432。

清宫。次日，孙中山在南京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自代。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临时政府设南京，请袁到南京就职。2月20日，南京参议院议定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表征五族共和之意。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拒不南下，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袁就职前，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采内阁制。此后迄于4月1日，袁世凯在北京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孙中山在南京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4月1日，孙中山至参议院行解职礼，次日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北京。时袁世凯任命之国务总理唐绍仪已于3月11日获参议院同意，3月29日唐所提内阁名单除交通总长外，亦均获参议院通过。4月8日，南京参议院休会北迁，南京临时政府告终。4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成立，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行开院礼¹¹。南北统一，中华民国开国完成。

中华民国的开国，尽管在决策形式和国家元首产生方式等方面都是创新的，但由于所承袭的专制积习未改、社会形态依旧、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未除，学者对革命开国的创新意义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从革命结果来看，认为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武昌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法、美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革命领导人的新知识分子反映资产阶级的意愿；民国建立后的各种立法，都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着想。有的学者从革命的目标来看，认为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是为全民的利益而革命，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为全民着想，不是为一个阶级着想，而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足以影响革命建国的方向。有的学者从政权交替的民族成分来看，认为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只是推翻满人的政权；满清应被推翻的理由是满人在中国为少数民族，或谓是异民族。有的学者则根本否认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是革命，认为「不过是一场不彻底的政权交替戏剧」¹²。由学者不同的看法，似可看出中华民国的革命建国，性质复杂而多样，不是任何一个解释所能涵盖。

立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基础

¹¹ 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1-14。

¹² 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页588-599。

中华民国建立在清朝的基础之上，承袭了清朝灭亡时的土地、人民、政治、对外关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清帝退位前，外人称中国为「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此帝国位于北纬 18-53 度，东经 74-134 度。关内十八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主要为汉人所居，外人称之为「中国本部」(The China Proper)；边疆地区，东北主为满人所居，蒙古主为蒙人所居，西藏主为藏人所居，新疆主为回人所居，被称为「藩部」。实际上，在晚清时期，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已建省，而东北三省为统治阶层满人的故居，亦有将东北视为「中国本部」者。中国本部与边疆地区合计总面积为 1108 万 931 平方公里¹³。人口据 1913 年 5 月的统计，共 4 亿 4254 万 8128 人¹⁴。中国东北部、北部、西北部、西部，与俄国为邻，自西南部至东南部依序为英属印度、缅甸，和法属老挝、越南，由东南部至东北部，邻太平洋。近海的岛屿，东南的海南岛属广东省，台湾于 1895 年已割给日本；东北为朝鲜半岛（已于 1910 年成为日本属地），东面海上为日本。

政治制度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方向发展。清朝承中国君主专制之旧，以皇帝为国家元首。中央政制，皇帝以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机关名军机处。地方为省、府（直隶州）、县（散州）三级制。省级行政首长为巡抚或总督，府、县级行政首长为知府、知县。政府官员大体依照一定的规制挑选、委派，官员大多来自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在 1900 年前后，中国约有十五万官员及具有官衔者¹⁵。晚清十年（1901-1911），在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改革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的推动下，中央政制也有许多变动。基于实际需要及改革派的要求，1901 年设外务部，1903 年设商部，1905 年设学部、巡警部。1906 年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合并商部、工部为农工商部，另增邮传部，与外务部、吏部、

¹³ 《支那年鉴》(1911)，页 1 之 1；*The China Year Book*, 1912, P.1-1.

¹⁴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2 年 1-6 月，页 604-605。

¹⁵ S. A. M. Adshead, *The End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94-1924*, pp.2-4.

礼部、学部合计，共十一部，各部置尚书一人。至 1911 年 5 月内阁制度建立，军机大臣改为内阁总理大臣及内阁协理大臣，各部尚书改为大臣¹⁶。在民意机构方面，中央于 1910 年成立资政院，议员一半由皇帝指派，一半由各省咨议局选出。各省咨议局于 1909 年选举成立，选民受财产、学历等限制，全国仅百余万选民。

对外关系方面，在 1875-1911 年间，先后在世界十五个国家中派驻使臣（或兼使），计 1875 年在英国、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1876 年在日本，1878 年在法国、俄国，1881 年在义大利、荷兰、奥国，1885 年在比利时，1887 年在德国，1902 年在古巴，1903 年在墨西哥。另在 1866-1911 年间，中国专使所到的国家除前述者外，尚有瑞典、丹麦、印度等国。前述各国派使来中国者，葡萄牙始于 1517 年（明代），西班牙始于 1575 年（明代），俄国始于 1618 年（明代），荷兰始于 1623 年（明代），英国始于 1792 年，美国始于 1843 年，法国始于 1844 年，比利时始于 1845 年，瑞典、挪威始于 1847 年，德国始于 1861 年，丹麦始于 1865 年，义大利始于 1866 年，奥国始于 1869 年，日本始于 1871 年，秘鲁始于 1874 年，朝鲜（韩国）始于 1902 年，墨西哥始于 1904 年，古巴始于 1905 年。在清亡时，世界各国在中国设公使的国家有葡萄牙、俄国、日斯巴尼亚、荷兰、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挪威、德国、义大利、奥国、日本、巴西、墨西哥等十五国¹⁷。当时全世界独立国家不过四十余，约有一半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在鸦片战后迄清亡以前，中国与外国订的商约有五十余种¹⁸。值得注意的是，自 1842 年以后，外人陆续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获得下述的特权：（1）关税协议：即中国的关税税率须与通商国议定，规定关税的征收，一般不超过 5%，以保障外国货品在中国运销。（2）海关管理权：自 1860 年代初期以后，海关管理权落入由清政府任命之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之手。他们把中国的关税，作为赔款、借款的担保，中国政府只能获得「关余」，因此财源大绌。（3）邮政管理权：中国邮政创于 1867 年，初由海关兼办，故邮权亦落入外人之手。1896 年以后中国虽自办邮政，但外人

¹⁶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页 364。

¹⁷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 2 册附录，页 63-95。

¹⁸ 傅乐成，《近代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 7 集，页 33-34。

仍自有邮政系统，到 1923 年始撤消。(4) 内河及沿海航行权：虽然便利其航业及商业，但侵及中国国防。(5) 铁路建筑权和矿产开采权：有些是在其势力范围以内自建铁路或开发矿产，有些是透过外交压力和借款投资，获得某路的建筑权或某矿的开采权。(6) 设置银行权：在中国设置银行，并发行货币。(7) 电讯管理权：海底电讯及无线电讯多归外人管理。(8) 开设工厂权：1895 年以后获得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权利¹⁹。上述这些权利，到 1930-1940 年代才渐被废除。除了获取上述特权外，1898-1899 年间，外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俄国在东北（1905 年以后东北南部归日本），英国在长江流域，日本在福建，法国在广西、云南。他们不仅在势力范围以内开矿产、修铁路，获取经济利益，有些且与地方军政势力建立关系，到民国初年与地方军阀相结，更妨害国家统一。势力范围未演成瓜分之祸，得力于 1899 年美国所发布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此政策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大体获得列强认可。民国初年数度对外交涉，中国均本「门户开放」原则。

在军事方面，清朝开国之初先后建立八旗制和绿营制。八旗兵有三种，「满洲八旗」建于清兵入关前后，「蒙古八旗」建于蒙古归附以后，「汉军八旗」则多为收编投降的明军。总计二十四旗，以不同颜色为号，每旗一万一千余人，共二十八万人。二十四旗分防全国各地，驻防二十五处。绿营由招募之汉人编成，所用旗为绿色。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统辖，在外绿营由各省总督或巡抚统辖。全国有绿营一千营，每营五百人，共五十万人。八旗兵到清亡时仍驻防各地，但早已腐化，无战斗能力。绿营兵到太平天国之乱时亦已腐败不堪，甲午战后改为巡防营，成为警备队式的地方防军。太平军兴起时，曾国藩在湖南联合乡绅，招募土著，仿绿营之制，编练勇营，号称「湘军」；太平天国后期，李鸿章复在安徽、江苏一带招募士兵，编练勇营，号为「淮军」；湘淮军各六、七万人。湘军于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没落，淮军于平定捻军以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打垮。甲午战后，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士兵由招募而来，重要官佐多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聘德人为教官。新建陆军共七千人，亦以

¹⁹ 何纯武，〈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展开及其前途〉，《光华大学半月刊》5 卷 1 期，页 27-28。

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1899年，北洋大臣荣禄将京畿附近的军队编为武卫军，分中军、前军、左军、右军、后军，共五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京津一带的武卫军多被消灭，仅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的武卫右军，因在山东，得以保全。八国联军之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武卫右军为基础，练成北洋军六镇，每镇一万二千余人，分驻直隶（四镇）、山东（一镇），东三省（一镇）等地。1903年以后，各省亦奉命练新军，预计全国练成三十六镇。到清亡之前，直隶完成六镇的编练。预计中的福建一镇、湖北两镇、江苏三镇、湖南一镇、江西一镇、河南一镇、安徽一镇、四川三镇、浙江一镇、陕西一镇、广东两镇、云南两镇、广西一镇、贵州一镇、山东一镇、山西一镇、甘肃两镇、热河一镇、新疆一镇、奉天一镇、吉林一镇、黑龙江一镇，多未完成编练，但大部已完成协（每镇步队二协）或标（每协两标，每标三营）的编练²⁰。如是，各省新军，除直隶有六、七万人外，各省多则万余人，少则自千余人至数千人不等。

立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经济方面，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工矿业对外相当开放，有华资工厂，有中外合资工厂，有外资工厂。在1895-1913年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工厂和中外合资工厂136家，其中矿业占48.44%，食品占16.62%，纺织占12.13%，电力及自来水占11.16%。就国别言，以英商最多，占外资的48.16%；日商次之，占25.53%；其次德、俄、法、美各约占3-7%²¹。此期的外资工业，以纺织、面粉、榨油，烟、酒等为主，在中国市场与中国货竞争²²。著名的外资矿业有1899年以后德国在山东潍县坊子、淄川张店等地采煤，1905年以后日本在奉天抚顺采煤、在本溪湖采铁等。华资的工矿业，1913年时重要工厂549家，总投资1亿2000多万元。以资本分配而论，水电及公用事业占17.96%，煤矿占12.06%，缫丝占9.63%，棉纺占8.69%，面粉占

²⁰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页3-5，9-11，15-17，38-41，53-56。

²¹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一章第一节，页33。

²² 据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外资工业》附表，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期，页169-229。

7.17%，矿冶占 6.29%²³。著名的华资矿业，有开于 1890 年的湖北大冶铁矿，到 1903 年以后矿权渐为日本所夺；1912 年合并开平煤矿（始建于 1878 年）和滦州煤矿（始建于 1906 年）而成立的开滦煤矿，矿权落于英人之手；创于 1880 年的山东峰县枣庄煤矿，经历官督商办、中德合营，到 1911 年改为官商合办。

交通事业亦为外资所笼罩。1911 年时中国四大轮船公司，有轮船 5 万 5000 吨，太古、怡和属英，占总吨位 37.2%；日清属日，占总吨位 46.6%；招商局属于中国，占总吨位 16.2%²⁴。铁路方面，截至 1911 年止，外人修建的铁路 3,760 公里，占总里程 39%；中国借外债兴建的铁路 5,193 公里，占总里程 54%；中国人出资自建的铁路 666 公里，占总里程 7%²⁵。外人经营的铁路有中东路（俄）、南满路（日）、胶济路（德）、滇越路（法）；中国人经营的京汉路是借英、比之款修筑，津浦路是借英、德之款修筑，沪杭甬路为商款修筑。

农业受外资控制无多，在 1900 年代传统农业有些改良，包括主管机关的设立（1906 年中央设农工商部，1907 年各省设劝业道）、农业教育的兴办、农业的调查与实验、新作物的引进、肥料的讲求和病虫害的防治，但效果不大，单位面积的产量且有下降的趋势²⁶。二十世纪初年的单位面积产量，与十九世纪初年相比，指数相差 22%²⁷。

对外贸易，以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为主要贸易国，华中、华南为主要外贸区，入口货以棉纱、糖、棉毛织品、卷烟为主，出口货以丝、丝织品、棉、豆为主。在 1910-1911 年间，出口 57 亿元，入口 70 亿 200 万元，入超 13 亿 200 万元。是年度的进口值，华中占 50.1%，华南占 29.2%，华北占 10.9%，东北占 9.8%；出口值，华中占 49.9%，华南占 28.1%，华北占 5.2%，东北占 16.7%²⁸。

社会方面，民国建立时的社会领导阶层，约来自九方面：（1）旧士绅：获有中国传统功名者（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自 1905 年以后，由于科举废除，地位日衰。（2）新知识分子：包括国内

²³ 林载爵译、Feuerwerker 着，《中国近百年经济史》，页 46、144。

²⁴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59。

²⁵ 同上，页 190。

²⁶ 张玉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改良〉，《史学评论》第 1 期。

²⁷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一册，页 39。

²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计划研究报告：总论一经济的现代化。

外各级学校的毕业生以及 1905 年以后考选归国留学生而授予新功名的人（法政科举人、工科进士之类）。（3）军人：武昌革命爆发前后在各省策动或响应革命的军官。（4）商人：在晚清新兴企业中产生，不少人富改革或革命思想，在民国建立后趋于保守。（5）政治运动家：包括 1895 年以后的改革派和革命派。（6）教育工作者：1902 年新学制建立后在各地办学之人及教师。（7）新闻从业人员，包括发行人、社长、编辑、记者。（8）官僚：在各级政府工作的人。（9）科技专家：包括工程师、医师等。至于社会群众，较活跃的为学生和工人，次为商人，农民尚不重要。另外，由于女学的兴起，缠足习惯的逐渐废除，妇女就学、就业的人愈来愈多。

社会组织，在民国建立前后也有许多变化，重要现象之一是各种社团和公司的兴起。据 1908 年调查，有工业团体 89 个、商业团体 17 个、工业公司 106 个；据 1911 年调查，有农务总会 19 个、分会 276 个、农业公司 187 个²⁹。

都市化的情形尚不显著，但各区域的情形并不相同。据 1910 年调查，中国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41 个，居民共 1438 万 6000 人³⁰，约占全国人口的 3%。在二十世纪初年，一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福建有 14 个，居民占全省人口 5.08%；浙江有 85 个，居民占全省人口 14.4%³¹。

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出版事业的兴起、以及新思想的流布。新教育制度正式建于 1903 年：三至七岁儿童入蒙养院，其后入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或艺徒学堂，再入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堂或初级实业学堂，是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分为三种，即五年制的中学堂或实业学堂或初级师范。高等教育分为四种，即三年制的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或四年制的分科大学或大学选科、四年或五年制的优级师范学堂或高等实业学堂、以及五年制的通儒院。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多依照程度深浅，灌输新知识，读经讲经的课程很少。1909 年（宣统元年）全国有小学堂 5 万 1628 所，学生 153 万 2746 人；中学堂 460 所，学生 4 万 468 人；大专学堂 111 所，学生 2 万

²⁹ 《支那年鉴》（1911），页 242，246-247，318。

³⁰ 同上，页 8。

³¹ 李国祁，〈清末民初闽浙地区人口流动与都市化的演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 32 集，页 196。

672人；各类初等、中等、高等实业学堂254所，学生1万6649人；各级师范学堂514所，学生2万8572人。另有留日学生五千余人、留美学生八百余人、留欧学生数十人³²。这些国内外的学生，不仅学得新知识，也吸收了新思想。

新兴的出版事业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书局，一类为报纸杂志社。书局著名的有成立于1897年（光绪23年）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02年（光绪28年）的广智书局、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皆在上海。报纸著名的有1872年（同治11年）在上海创刊的《申报》、1893年在上海创刊的《新闻报》、1901年在北京创刊的《顺天时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等，到民国建立时均继续出版。杂志著名的有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东方杂志》、1909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等，民国建立后均继续出版。这些书局、报社、杂志社，不仅传布新知识、新讯息，也传布新思想。

在新教育和新出版品的启迪下，到民国建立时，各种新思想都在中国流布，其影响较大者约有五种：即民族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实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支）。求新求变，为时之所趋，但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保守的含义有二：（1）与进步相对，有比较性，如自由主义较社会主义保守、民族主义较自由主义保守。（2）坚持固有的制度和价值。此处所谓保守，指后者。保守的势力来自中国的传统，由三种因素互相结合而成，即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和儒家正统³³。这三种因素的紧密结合，除了儒家正统在五四时期一度松动以外，到1950年代才整体松动。

³² 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页84-87，97，106-107，112-114，119-120，123-125，128-129，134-143，149，160-162。

³³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页41。

第二节 新建制与新气象

辛亥革命成功，清朝改为中华民国，这不仅是革清朝之命，亦是革中国三千年政统与教统之命。虽然此一革命未能贯彻革命理想，但从制度的建立和社会的改良上来看，颇具有进步和迈向现代化的意义。

国号、国旗、国歌

孙中山倡导革命，目的之一在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政体。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誓词亦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¹。1902年孙中山在河内组兴中会、次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办革命军事学校，誓词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成立，誓词亦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6年孙中山订颁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军政府宣言中正式用了「中华民国」的名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订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对青年联合会讲演时，对「中华民国」一词作了简单的阐释：「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个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²这是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一种理想。

辛亥革命建立新国，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没有引起争论，制定国旗，则经过颇多周折。清朝用黄龙旗，黄龙旗原系黄色的三角旗，旗上绘着飞龙戏珠。后改三角形为长方形。黄色为帝王专用颜色，龙代表至尊无上，黄龙旗代表的是帝王不是国家。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

¹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160，165。

²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1-6月，页8-9。

起事，采用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取代黄龙旗。1906年，同盟会既决定建中华民国，讨论中华民国旗制问题，与会者有提议用五色旗者（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有主张用十八星旗者（仿美国旗制，象征中国本部十八行省），有主张用金瓜斧钺旗者（金瓜、斧钺皆武器，尚武之意），有主张用井字旗者（井田，财富平均）；孙中山则主维护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与日本旗红日白底区别，青天白日之外，改以红色为底色。后来同盟会发动多次武装起兵，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亦有用井字旗、金瓜斧钺旗和白旗者（白色象征涤去污染、光复旧物）。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于1月10日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原为清朝一、二品官之官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并定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因武昌方面坚持用十八星旗，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参议院的决议未予公布。临时政府于4月北迁后，参议院于5月10日讨论国旗统一案，仍定五色旗为国旗。又建议将十八星旗改为十九星旗（以示非十八省之意），置于五色旗左上角四分之一为陆军旗，将青天白日旗置于五色旗左上角四分之一为海军旗，此案到5月14日参议院院会讨论通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6月8日公布，乃告定案。但孙中山对此一决议始终不以为然。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中华革命党，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为国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被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之后，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为国旗。但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的北京政府，仍用五色旗。1923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向全国学生总会评议会讲话，时会场挂有五色旗，孙拒绝向五色旗行礼。1928年北伐统一后，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此国旗式样并载于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³。

清朝原无国歌之制。清亡前夕，于1911年9月颁布「巩金瓯」

³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1-6月，页78-80，500，517，552-553；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页6-28；1923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讲演事，见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页336-344；一般革命党人对旗制的主张，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314-315。

为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巩金瓯，承天帙，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帙，音到，覆盖之意；凫音浮，野鸭，凫得水藻，言喜悦；皞音号，光明之意。校注，胞当为袍。）此歌内容空洞，意为「疆域巩固，承天保佑；同胞有幸，逢太平盛世。上天保佑帝国，真是和乐光明，如天之高远，如海之雄壮」。不久武昌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此歌未流传。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国歌，歌词出自沈恩孚之手：「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到1915年5月，时袁世凯方进行帝制，政事堂礼制馆重新订立新国歌，配以曲调，颁行全国，歌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本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廓八埏，意为土地辽阔向四面八方伸展到荒远的地方。）其中「共和五族开尧天」，袁世凯称帝时，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袁氏帝制失败，歌亦不复通行。1919年12月，教育部组织国歌研究会，重新甄选国歌。几经商酌，经呈报国务会议通过，大总统核准，于1921年7月1日以《尚书大传》中之「卿云歌」为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之教育行政会议，通过以「国民革命歌」代替「卿云歌」为国歌，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北伐完成后，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于1924年对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之训词谱曲改为党歌，1930年决议以党歌暂代国歌，1943年国民政府明令以党歌取代「卿云歌」为国歌，歌词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⁴

政教制度的变革

⁴ 侯坤宏，〈中华民国国歌史料选辑〉，《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期，页249；石融，〈中国的国歌考〉，1988年11月3日《自立早报》11版；周桐，〈续谈国歌一百年〉，1988年10月5日《中国时报》23版；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312。

民国初建时期的中央政制，既非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制，亦非孙中山所创的五权制。大体说来行政权是独立的，或在总统，或在内阁；立法权也是独立的，先后有参议院或参众两院的国会；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均由总统设立，职权并不完全独立。上述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均载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监察机关则是以行政命令设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根本大法是 1911 年 12 月 3 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武昌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 条，嗣又于 1912 年 1 月 2 日加以修订。

此一大纲仿照美国的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直接领导各部，有统治全国之权，统率海陆军之权，经参议院同意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之权，经参议院同意得制定官制、任免国务员及外交专使，得参议院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厅之权，得制定官规及任免一般文武职员。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名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成，每省三人，主要职权为议决临时政府预算、检查临时政府出纳、议决暂行法律等。实际上，临时大总统的进退亦由参议院决定。参议院曾接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辞职，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司法机关由大总统设立，监察权无明文规定，基本上是行政、立法两权制⁵。孙中山在此一法制下，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及清帝退位，孙中山决定以临时大总统之位让袁世凯。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仿照法国第三共和时的内阁制，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临时约法〉于 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参议院）、行政（临时大总统、国务院）、司法（法院）三权分立之制。临时约法制定时，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宪法及建国三程式的理念，但未被接受。孙最后坚持一点：「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临时约法所规定之行政权是：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国务员副署（此为内阁制）。立法权是：参议院议决一切法律及大总统制定的官制、官规，对大总统提出的任命国务员、大使和公使、以及宣战、媾和、

⁵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 2-5，12；贺凌虚，〈民初政府体制的变革〉，《近代中国》82 期，页 140-143。

缔约、大赦等事项实行同意权，议决临时政府预算、决算和全国税法、币制、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及国务员，向国务员提出质询，向政府提出建议，受理人民请愿，咨请政府查办违法官吏。参议员每省五人，选举方法由地方官自定。司法权是：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成，但「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临时约法〉将监察权置于参议院，未另设监察机关⁶。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大体依此制行使中央政权。

〈临时约法〉规定，自该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因此，参议院自南京迁到北京后，即开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采参众两院制，并制定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均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参议员主要代表地区，由各省省议会，蒙古、青海、西藏、华侨选举会，以及中央学会分别选出，共274名。众议员主要代表人口，每八十万人选出议员一名，共596名。选举人资格：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选举区居住满二年以上，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或小学以上毕业。当选资格，众议员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参议员三十岁以上的男子，有小学以上毕业的教育程度。两院共有的职权有：（1）制定宪法。（2）选举大总统。（3）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决算案、税法、度量衡法、币制、公债及其他国库负担契约。（4）弹劾大总统、内阁、国务员案。（5）审查同意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大使和公使，及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大赦令等事项。（6）议员的提案权和对政府提案的审查权。除（1）、（2）两项由两院开联合会行使外，余皆分别议决，需两院皆通过始能成立。两院专有的职权有：向政府建议和质询、请求查办官吏纳贿、受理人民请愿、许可逮捕议员、制定院内法规等⁷。1913年4月8日召开的国会，大体依此类法律产生，并行使职权。

由于临时约法第54条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国会开幕后，其主要任务之一即为制宪。但由于在制宪过程中有先选总统或先定宪法之争，最后决定先选总统，两院合组之宪法会议乃于1913

⁶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12-15；贺凌虚，〈民初政府体制的变革〉，页146-149；临时约法全文，见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1-6月，页324-331。

⁷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24-27；贺凌虚，〈民初政府体制的变革〉，页149-150；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页48-55，并谓中央学会选举参议员，以教育总长为监督，惟中央学会并未组成，故无法选举。

年 10 月 4 日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七条，规定：（1）完全享有公权之中华民国人民，年满四十岁以上、居住国内满十年以上者，得被选为大总统。（2）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之，以选举总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为当选；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之半数为当选。（3）大总统任期五年，得连任一次⁸。1913 年 10 月 6 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系依此法行之。

袁世凯于 1913 年 10 月 10 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之后，由于即将通过的宪法采内阁制，袁不欲接受，乃破坏国会，使制宪停顿。另一方面，则于 1914 年 2 月 18 日召集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改称「中华民国约法」，于 5 月 1 日公布，号称「新约法」。此新约法行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不需副署；不设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国务卿为政事堂的首脑，有类大总统的秘书长⁹。是后迄袁世凯病逝（1916 年 6 月 6 日）前，政府组织及运作系依此约法。〈新约法〉规定由人民选举立法院，但并未选举，袁世凯于 1914 年 6 月 20 日召集参议院，并以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此参议院于 1914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十五条，规定：（1）完全享有公权之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四十岁以上、居住国内满二十年以上者，得被选为大总统。（2）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3）大总统选举会由参议院互选五十人、立法院互选五十人组织之。（4）大总统候选人除现任总统外并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人。（5）以会员四分之三到会、得票满投票人总数三分之二为当选，若皆不足当选票额时，就得票多数之二人决选，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¹⁰。此法实为袁世凯的帝制铺路，但并未实行。

袁氏既决行帝制，有心人士乃发起请愿运动，要求实行帝制。袁初欲先立法再行事，即先定帝制宪法，再行帝制。依照 1914 年 5 月 1 日公布的〈新约法〉：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之、

⁸ 贺凌虚，〈民初政府体制的变革〉，页 152-154；〈大总统选举法〉七条，见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2 年 7-12 月，页 387。

⁹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 32-33；〈中华民国约法〉全文，见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3 年 1-6 月，页 704-710。

¹⁰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 35-37；〈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全文，见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3 年 7-12 月，页 941-942。

由参议院审定之、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而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之（第 59-62 条）。1915 年 9 月 25 日，袁采纳参政院的建议，决定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宪法，解决国体问题。〈国民会议组织法〉原已于 1915 年 3 月 12 日公布，但请愿者迫不及待，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代行立法院之参议院乃迅速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 1915 年 10 月 8 日公布。该法第一条规定：「关于全国国民之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全体之公意决定之。」¹¹ 袁世凯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即是根据此项法规，组织国民代表大会行之。

袁世凯帝制失败、己身病亡以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为总统，1916 年 6 月 29 日下令恢复 1912 年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及 1913 年宪法会议所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¹²，中央政府的建制回复 1912-1913 年之旧。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监察权初属临时参议院，后属国会。1913 年 11 月国会停闭后，袁世凯于 1914 年 3 月 31 日颁布平政院编制令，设置隶属于大总统的平政院，并于其下成立肃政厅，独立行使对在职与非在职官吏的纠弹权。平政院具有法院性质，肃政厅则具有检察厅性质：肃政厅纠弹之事，通常由平政院审理，是否处分、如何处分，由平政院决定后报请大总统核可，或更经大理院判决，判决后亦由大总统核可。此外，肃政厅亦得对政事建言，或对财政事务派人监察。此制于袁世凯逝世后，随〈临时约法〉的恢复而裁撤¹³。

前述的中央政制，大体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有关法规设计下的总统制、内阁制、国会制、选举制、司法制和监察制，另外值得说明的尚有政党制。政党制是晚清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从西方引进的，并无政党法作为规范。1908 年 3 月清政府公布〈结社集会律〉35 条，规定「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为结社，结社关于政治者称政事结社」，政事结社应由首事人于该社成立前将宗旨、名称、社章、办事处、设立年月日、首事人及佐理人之姓名和履历及住址、办事人之姓名及履历和住址、现有入社人数等报官府核准，在京由民政部核

¹¹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 40；〈国民会议组织法〉及〈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见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 年 1-12 月，页 248-251，775-776。

¹²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页 44。

¹³ 贺凌虚，〈民初的监察制度〉，《近代中国》91 期，页 31-65。

准，在外由督抚核准，并咨民政部备查。¹⁴

武昌革命爆发后，政党纷起，未见政府制定法规加以规范，但组织党会者仍循旧例报主管官署核准或立案。据 1912 年 10 月 23 日《民立报》的报导，在内务部立案的党会 85 个。未必所有的党会皆可立案，譬如江亢虎所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获准立案，到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则不准立案¹⁵。中国社会党，因倡无政府主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为政府所不许；其他主张平和、不诉于暴力的政党，除袁世凯于 1914-1916 年酝酿帝制期间外，皆活跃于政坛。

民国开国之初的建制，除中央政制外，地方制度也有许多变化。清代地方行政区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厅、设治局）三级，省与府之间的道为虚设。清代共有 94 道，209 府，84 直隶州，38 直隶厅，142 散州，84 散厅，1386 县，5 设治局。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采省、县二级制，撤道，废府、州、厅，但未能贯彻。1913 年 1 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及〈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对省、县官制有所规定：省行政长官称民政长，省军政最高长官称都督，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凡各府直辖地及直隶州、直隶厅、散州、散厅皆改为县。1914 年 1 月内务部呈准改全国同名之县 127 县。是年 5 月颁行〈道官制〉，规定省下设道，置道尹，为一级行政区，至 1924 年 7 月废道。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1914 年 5 月改称巡按使，1916 年 7 月改称省长；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1914 年 6 月改称将军，1916 年 7 月改称督军，1924 年改称督办，特别行政区长官称都统。迄于 1927 年 4 月止，全国行政区分为京兆、蒙古、西藏三地方，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22 行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四个特别区。22 行省暨京兆、蒙古、西藏三地方系承清朝之旧，绥远特别区于 1913 年 11 月命令设置，1914 年 6 月正式设置；热河特别区设于 1914 年 1 月，察哈尔特别区设于 1914 年 6 月；川边特别区设于 1914 年 4 月，至 1925 年 2 月更名西康特别行政区。兹将民国初年全国地方行政单位，除西藏、蒙古两地方外，列表于下

¹⁴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页 159-162。

¹⁵ 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页 452。

省区	道数	县数	其他县级单位	省区	道数	县数	其他县级单位
京兆地方	0	20		浙江	4	75	
直隶	4	119	1 设治委员	湖北	4	69	
奉天	3	56	2 设治局	湖南	3	75	
吉林	4	39	8 设治局	陕西	3	91	
黑龙江	3	34		甘肃	7	77	
山东	4	107		新疆	8	59	3 设治局
河南	4	108		四川	5	146	
山西	3	105		广东	6	94	
江苏	5	60		广西	6	88	9 土州, 3 土县, 6 土司
安徽	3	60		云南	4	97	
江西	4	81		贵州	3	81	
福建	4	63		总计	94	1804	32

清朝省以下约有 2037 行政单位，民初约有 1930 行政单位，变化无多。

民国初年的地方制度，与清末最大的不同是民意机构由咨议局改为省议会。咨议局为省的咨询机构，省议会则为省的立法和监察机构。临时大总统于 1912 年 9 月 4 日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9 月 25 日公布〈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10 月 2 日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并颁定省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初选在 1912 年 12 月 6 日，覆选在 1913 年 1 月 6 日。省议员的选举人资格与被选举人资格与众议员同：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具有小学毕业以上资格，或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或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有选举权；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1913 年 1 月 10 日，政府明令于 2 月 10 日前召开省议会，并于 4 月 2 日公布省议会暂行法。后以受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影响，到 1914 年 2 月 28 日省议会被解散¹⁷。

¹⁶ 邓春阳、金竹安、刘敬坤，〈北京政府时期全国行政区沿革概况〉，《民国档案》，1990 年第 4 期，1991 年第 1 期、第 2 期。清末于边省尚未有流官之区域，拟设县治而未实行者，先设局筹备其事，日设治局，民国因之。

¹⁷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 7-12 月，页 221-232，290，305；民国 2 年 1-6 月，页

其后，在袁世凯帝制运动失败后，迄于北京政府结束前，省议会曾断断续续召集。

在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其他制度亦有所因革。以教育制度为例，中国教育机构明定教育宗旨，始于 1906 年，当年颁定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贤」。民国建立后，教育宗旨变更，1912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至于学制，在同时公布的学校系统草案中规定：初等小学四年，七岁入学，十一岁毕业，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三年，十一岁入学，十四岁毕业。中学或师范学校或甲种实业学校四年，十四岁入学，十八岁毕业。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专门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此外，初小可以男女同学，高小以上可设女子高小、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此系取法日本学制，小学只有一种，中学各科并重。到 1915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教育纲要，改采德制，分初等小学为二种，一为国民学校，乃义务教育；一为预备学校，专为升学之预备。中学校分为文科、实科。是年 11 月，初小的预备学校取消，恢复单一制，仍名国民学校¹⁸。其后变化亦多，不多叙述。

新政令和新风气

民国建立，在政教制度上有许多变革；由于新政令的发布、和新思潮的激荡，一般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展现了新的气象。可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1）改元、改历和订定新节庆：中国自西周始采用帝王纪年，清代亦复如此。晚清革命党人既以推翻清朝、重建新国为帜，或以干支纪年，或以公历纪年，或以黄帝纪年，而以用黄帝纪年者为多。武昌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在布告、文书和机关报上一律用黄帝纪年法，以 1911 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月日仍用阴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于 1912 年 1 月 2 日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

52，301；民国 3 年 1-6 月，页 383。

¹⁸ 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六章，页 1920-1923。

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此电令有两个意义：一为此后以国号为纪年，不以国家元首名号为纪年；二为以阳历取代阴历。不过，由于中国民间习惯用阴历，而当时中国以农立国，农时节气皆以阴历为本，政府仍允阴历与阳历并存。一般说来，阳历用于机关、学校，阴历用于民间。政府颁定的历书，阳历下附星期，阴历下附节气。除改元、改历外，并订 10 月 10 日为国庆纪念日、1 月 1 日为开国纪念日等¹⁹。

(2) 断发、放足、易服：传统中国受儒家教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影响，不仅妇女留全发，男子亦留全发。满清统治中国后，强令国人遵行满人习惯，男子一概剪发留辫，违者处死，故有清一代，男子多剃发留辫。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为使国人一新耳目，建议光绪皇帝「断发、易服、改元」，未被接受。然革命党人，则以剪去发辫表示与满清决绝，譬如孙中山在 1895 年广州之役失败后，即剪去发辫；黎元洪于武昌革命事起后，被迫剪去发辫。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在所发布的〈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特别指斥满清「入关之初，强汉族蓄尾，不从死者遍天下」，并立即发布禁止蓄辫文。1911 年 11 月上旬，湖北军政府又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近日剪发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实繁有徒。从初十日起，三日之内，由各长官调查，一律去除发辫；否则革除。」又规定各机关职员蓄辫者没收证章，军队士兵不剪发辫者不发月饷；又于各城门口特设检查哨，蓄辫者不得出入。于是士兵携带剪刀，拦阻行人，强行剪发。据当时人的见证：「未及三日，武汉之头颅，为之一新。」除武汉地区外，在武昌革命爆发前后，其他地区亦多有剪发的报导，譬如广东宣布独立时，一日之内即有二十余万人剪发；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白天带着剪刀在各个主要街道上游走，遇到仍然蓄辫的中国男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用以纪念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地区人民，原以为不剪发表示仍为清朝之民，但到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许多人都把辫子剪掉。1912 年 3 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

¹⁹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 229，243-25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 319-320。

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继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于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亦将辫子剪掉。剪掉发辫并不是恢复重新束发于头顶的旧制，而是留短发：年岁大的人头发前半部仍剃光，后半部留至耳门；青壮年则多剃平头。后以西洋发式时髦，许多人每逢立夏，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依例留分头²⁰。

缠足为中国的旧习，约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宋。满人并不缠足，康熙、嘉庆时曾禁止缠足，但无效果。其后西方传教士宣传禁缠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宣传禁缠足，效果亦不多。嗣以女学兴起，禁缠足之事才从女学生开始，逐渐在城市地区普及，然一般妇女缠足者仍多。武昌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9日发布了关于妇女放足的告示，除说明缠足之害以外，特申明「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度维新。男子一律剪发，女子亦宜振兴。况为国民之母，岂可玩忽因循。特此示令放足，其各毋违稟遵」。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亦有令致内务部，说明缠足之害，嘱革除缠足恶习。在这种情形下，不缠足或放足，逐渐成为一种时尚²¹。

中国传统的服式，自周朝以后，褒衣（宽大之衣）博带、宽大松缓，等级森严。清朝建立后，推行满人服制，以长袍马褂为礼服，袖口较狭；晚清又有西服传入。戊戌变法时期，宋恕、康有为等都主张易西服，但终晚清之世，仍以长袍马褂为普遍，着西服者每被视为二毛子或假洋鬼子。民国建立后，一切尚新，服制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孙中山的一生着长袍马褂，亦着西服，但在做临时大总统期间，创行了一种西式服装：单立领，前身门襟九颗扣子，上下左右四个明口袋，袋褶向外露，中腰处有个腰带。这便是最早的中山装。1912年10月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服制〉，规定男用大礼服，昼用西式大擎式，晚用似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常礼服有二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至于一般服式，仍是传统式的改良：男子为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女子为斧口衫、大襟短衫。女子的礼服，主为清朝所流行的旗袍²²。无论男女，均以西服为时尚。

（3）改称谓、废跪拜礼、以人力车代轿、保护并解放贱民：清

²⁰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27-228，235-23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321-322；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56年第4期。

²¹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2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324-325。

²²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38-24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229-230。

雍正年间，始以大人称督抚，乾隆末年施之于钦差大臣，嘉道以降，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光绪以降，内阁中书、知府、直隶州同等，亦皆称大人。又有大老爷名称，乾隆时，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均称大老爷；咸同至光宣间，知县亦称大老爷。又有老爷名称，更为普遍，官员家中，奴婢称其主为老爷，举贡生监等，亦称老爷。武昌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首先禁止喊大人、老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亦以此等称呼不合时宜，于1912年3月2日公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谓「官厅为治事之名称，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此后先生或君的称呼渐流行，不能不说是政令的影响²³。

跪拜礼起自上古席地而坐，历代沿袭之。晚清的改革派，如梁启超等，曾倡言易跪拜为西人之鞠躬。武昌革命爆发以后，湖北军政府改跪拜礼为鞠躬，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亦用鞠躬代替跪拜。1912年3月，内务、教育二部为订祭事会同电告各省：「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礼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与此同时，政府又明令废除社交中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以鞠躬礼为主。后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8月17日公布了民国〈礼制〉：男子寻常相见行脱帽礼，女子寻常相见一鞠躬礼；庆典、祀典、婚礼、丧礼、聘问，男子脱帽三鞠躬，女子不脱帽；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男子用脱帽一鞠躬，女子不脱帽。自礼制公布后，在城市地区，鞠躬礼逐渐流行，跪拜礼逐渐废止，乡村地区的改变则较慢²⁴。

传统中国，官吏或社会上有身分的人常以轿代步，武昌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禁止坐轿，尤其不准坐四人大轿。时革命党人李亚东自汉阳监狱出狱任汉阳知府，乘坐四人抬绿呢大轿，受到士兵的阻拦。

²³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30，256-257。

²⁴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30，252-255。

日后马车、人力车逐渐取代轿子，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²⁵。

维护人民平等的政令，除前述者外，尚有禁止贩卖人口，解放疍户、惰民、丐户、奴隶、倡优等。此类政令，清代即有，但未贯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2日发布〈令内务部禁止贩卖人口文〉，谓「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于3月19日发布〈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令广东都督严禁贩卖猪仔文〉，谓「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又于3月17日发布〈大总统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谓：

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疍（音旦）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享有，毋稍歧异。

其中疍户为闽粤一带的水上人家，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其来源已不可详考，至少宋代即有之。他们属于贱民阶层，其子弟不准读书应试。惰民主要分布在浙江，分布在河南者名丐户，多为历代败兵残将及罪俘之后，其来源亦不可详考，其子弟亦不准读书应试。义民即奴隶，清军入关后，以俘虏方式掠夺大量人口，发配给有功之臣为奴，亦有自动投到权门之下为奴者。优倡主要指兼事卖淫和卖唱的「乐户」，隶卒则指政府雇用的差役，如管牢房的禁卒、验尸的仵作、捕盗的捕快等。这些人当时被视为贱民，南京临时政府令准他们与一般人民平等，这是历来少有的事²⁶。

（4）禁止吸食鸦片，整顿军政人员冶游、聚赌、需索等恶习：吸食鸦片，为晚清国人的恶习，禁之不能止。武昌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虽主禁种禁吸，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仍然派土捐。南京临时政

²⁵ 同上，页230，268。

²⁶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32-233，259-26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327。

府成立后，内务部要求各府州县从严查禁鸦片：种者按亩重罚，贩则全数焚毁，并晓谕人民：「农则改种他物，商则别计营生，吸则尤当实时戒除。」未几，设禁烟总局，以专责成而筹进行，但以人民积习已久，效果不彰。当时社会风气不良，除吸食鸦片之风流行外，许多军政官佐亦染有冶游、聚赌、需索等恶习，湖北军政府曾严谕军人不得如此，违者「按照军法从事，定不姑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则通飭各府县，声言对府县知事严密查察，违者辞退开除，并要求对幕僚随从、科长科员，出具联环保结，送部查考²⁷。此类整饬吏治的政令，效果如何，未见追踪；新政府有此政令，至少令人耳目一新。

(5) 男女社交自由，妇女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始于清末。清朝亡、民国兴，一时更加速了社会变迁。民国建立前后，男女社交渐自由，妇女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离婚、妇女参政为例。关于自由恋爱，1912年6、7月间，上海《申报》形容上海「骨肉成亲」、「师生为偶」；形容湖北「女权日昌，淫奔之风亦日炽」。关于自由离婚，1913年9月《大公报》评论：「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诉请离婚者，实繁有徒，此皆前此所未有。」关于女子参政，1913年1月《大公报》评论：「有所谓女子北伐军、女子敢死军，有所谓女子同盟会、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不特自古所未见，抑亦环球所罕闻。」1912年2月1日上海《申报》载有〈今昔女子观〉一文，中云：

昔日女子缠足多，今日女子多天足。

昔日女子能文者少，今日女子入学堂者多。

昔日女子多柔顺之气，今日女子多英爽之气。

昔日女子谨守闺中羞不见客，今日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

昔日女子主中馈惟酒食是议，今日女子结队成军，颇有铁血主义。

走出闺阁的女子除了入学堂、进工厂、结成军队外，还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如演剧助饷、劝捐等。1912年春，有十名女代议士坐在广东省临时省议会议席上；同年秋，湖北省议会特设女子旁听席，常有

²⁷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29-230。

女子参加旁听。还有一些女子参加各种政党活动；自由党、社会党等，均有女子参加。不过，有些报纸对男女社交自由、妇女活跃于社会各角落，颇不谓然。1912年3月上海《时报》的评论，引述反对妇女参政的意见，谓妇女的生理、心理皆与男子异，不宜参政。政治人物中，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原支持女子参政，章炳麟、王宠惠、宋教仁等均反对，同盟会政纲中的「男女平权」一条，到改为国民党时，为吸收保守势力，即加删除。至于男女社交自由，1912年6月《申报》评为「男女往来，禽居而兽爱」。9月该报评论妇女「借入学以放浪形骸，托择交以脱略行检」。据1913年5月《大公报》报导，广东军政府曾「决计规定章程，禁止青年男女在途中偕行」²⁸。

在新制度、新风俗兴起的过程中，反对的声音是难免的。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有一篇〈滑稽余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变革颇不满意，却描绘出革命的气象：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²⁹

文中所谓「兴」，有的兴于晚清，未必兴于民国创建之时；文中所谓「灭」，民国创建之时未必全灭，可能残延至若干年后。但开国时的新气象，当时的人确有很深的感受。

前面分条论述改良政风、改善风俗的政令，以及社会新气象，有些是对清代历史的承继，如禁止缠足、禁止贩卖人口、解放贱民，清初已有，改元、改历、断发、易服、禁鸦片，均发议于晚清，而为民国政府所欲实行者；如以人力车代轿、妇女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皆起于晚清，至民国成立后，益引起人民注意者。有些则纯然是民国政府的新政，如订定新节庆、改良称谓、废跪拜礼等。新政的效果、新气象的延续性，虽然未尽理想，而风气、风俗亦非一纸命令所能完全改

²⁸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页270-271；严昌洪，〈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56年第4期。

²⁹ 引见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1956年第4期。

易，但民国的建立，确不同于历史上之朝代循环，就前述新制度、新气象而论，有量变亦有质变。

第二章
政权竞逐与外交难题
(1912-1916)

第一节 政权的竞逐

临时政府成立与政党势力的兴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响应，随之而来的是新政权的建立问题。11月7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征询组织政府之意见。未待各省回复，黎即于11月9日电独立各省，请速派代表至鄂会议，俾组织临时政府。另一方面，11月13日上海都督陈其美亦分电各省，请派代表至沪，筹组临时政府。次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以孙中山首倡革命，临时总统之选举，应留待孙中山返国后举行。11月15日，各省代表七人在上海集会，定名为「各省代表团」，亦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1月20日，黎元洪有电至沪，请各省代表赴鄂，湖北军政府代表居正、陶凤集于11月23日至沪，代黎说明一切，次日代表团遂决定赴鄂开会，惟各省代表各留一人在上海，作为通讯机关¹。

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12月2日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总统制，并决定如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响应革命，即选为临时大总统（时袁已有代表至湖北传达和平谈判之意）。湖北局势不稳，汉口于11月2日被清军攻陷，汉阳于11月27日被清军攻陷；而长江下游局势则日渐稳定，除上海已独立外，南京于12月2日为革命军攻克。12月4日，沪督陈其美有电至鄂，请各省代表于七日内至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不待在鄂开会代表回复，当日由留沪代表选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8日，黎元洪电嘱撤销大元帅、副元帅之选举，并谓在鄂各省代表已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12月14日各省代表陆续自鄂抵南京，原决定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来电表示

¹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与党争〉，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5集，页85-87。

反对，认为临时大总统人选不必仓卒决定（有等待袁世凯反正之意）。嗣代表团知袁世凯之议和代表已抵汉口，且暗示袁有赞同共和之意，乃于 16 日决议缓举大总统。另一方面，浙督汤寿潜亦致电留沪代表，不承认选举大元帅之案，黄兴乃辞职，推荐黎元洪。16 日在南京之代表团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议大元帅暂住武昌，由副元帅主持一切。19 日黄兴电辞，20 日黎元洪亦致电不愿接受。屡经协调，23 日黎元洪致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任黄兴代行其职务，黄兴仍不至南京就职。12 月 25 日，孙中山归国抵沪，29 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31 日代表团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增加临时副总统职。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²，中华民国正式开国。1 月 3 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清政府与革命军在上海所举行的和议（始于 1911 年 12 月 18 日）达成初步协议：（1）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2）订立条款优待清帝及满蒙回藏。是日，孙电袁世凯，声明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请袁早定大计。孙就职后，袁于 1 月 2 日有电致上海和会，否认所订条件；并电覆孙中山，谓国体尚待公决，未敢预闻临时政府之事。孙有电覆袁，重申相让之意。1 月 3 日，孙依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授予的职权，任命各部总长、次长，并电各省派参议员组织参议院³。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每省三人）组成，于 1912 年 1 月 28 日正式开院。选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二人皆同盟会员。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部分功能在统合独立各省，透过北伐或议和，促使清帝退位。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在袁的策划安排下退位，孙中山依照议和的约定，于 2 月 13 日向参议院辞职，并荐袁自代。但附有条件：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袁需到南京受职。2 月 14 日，参议院选袁为临时大总统，通过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北京。孙中山以参议院违背其辞职条件，2 月 15 日将临时政府地点决议文退回参议院复议，参议院乃又决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2 月 18 日南京临时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九人北上迎袁，袁托词不南下。29 日北京发

²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与党争〉，页 89-96。

³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页 1445-1450；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 1-2。

生兵变，迎袁专使不再坚请袁南下，副总统黎元洪通电全国并致参议院，主将临时政府地点设北京，参议院于3月6日同意。3月10日，袁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11日，由参议院制定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此约法采内阁制⁴。4月1日孙中山解职，4月8日参议院休会北迁，南京临时政府结束。

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授予的职权，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18日，复通令全国各省区重新选派参议员到北京。南京参议院于3月10日同意唐绍仪的任命案，3月29日通过唐绍仪所提阁员名单。4月29日参议院正式在北京复会，5月1日选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吴隶统一共和党，汤属共和建设讨论会。北京参议院有议员126人，成立之初，参议院内外政党甚多，重要者有五：（1）中国同盟会：原为革命组织，1912年3月3日在南京改为公开政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干事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等。（2）统一党：1912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以章炳麟、张謇为中心，与同盟会对立。（3）统一共和党：1912年4月11日成立于南京，以吴景濂、谷钟秀等为中心，较接近同盟会。（4）民社：1912年1月16日成立于武昌，设总部于上海，拥护黎元洪，与同盟会对立。（5）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4月13日成立于上海，为旧立宪派的结合，以汤化龙为中心。各党为扩张在临时参议院中的议席，并希望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获胜，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以后，即大力扩充党势。首先，民社与统一党等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结合为共和党，并在北京设本部。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等为理事，但统一党中的章炳麟一派，于5月17日自共和党独立而出。共和党在参议院中有四十余席。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在北京合组国民党，选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等为理事。议席由同盟会时期的四十余席增至六十席。1912年9月27日，共和建设讨论会联合其他小政团组民主党，选汤化龙为干事长，梁启超为幕后主持人。民主党在参议院中有二十余议席⁵。北京临时参议院的主要活动是制定法规、通过内阁人事任命、并监督施政。

⁴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与党争〉，页107-113。

⁵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页42-78，80-113。

民国初年的内阁，以第一届唐绍仪内阁最有规制。唐绍仪组阁系新就职的袁世凯临时大总统在北京提名、尚未卸任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咨请参议院同意；内阁官制大纲则由孙在南京令法制局草拟、提参议院讨论。3月13日参议院通过唐组阁案，并将袁原拟的内阁官制，由12部改为10部：外交、内务、财政（原名理财）、教育、陆军、海军、司法、农林、工商（原「工业兼矿务」及「商业兼管渔业」）、交通（原「交通管铁路水路航业」及「邮电」），各部设总长。3月29日，唐至南京参议院报告施政，并提出阁员名单求同意。结果除交通总长外，余均同意。30日由袁正式发表。4月21日唐返抵北京，23日国务院正式成立。5月1日在北京重组的参议院选出正、副议长，5月13日唐绍仪率各部总长到参议院报告施政。施政方针较重要者有实行军民分治、节减军费、筹借外债、司法独立、废除厘卡、奖励人民开垦东北及西北之土地等。新内阁最大的问题为财政困难。由于借款不易，财长对银行团的要求多一一认可，引起议院内外对内阁的批评。最使唐难堪的是袁世凯对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内阁副署不以为然。6月15日袁世凯委直隶民选都督王芝祥赴南京解散军队，唐拒绝副署，袁仍照发命令，破坏内阁体制，唐于当日即挂冠求去。唐与袁有数十年的友谊，因维护约法而使友谊中断，此种政治家的高尚风度，殊不多见⁶。

民主政治的受挫与强人政治的出现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代唐职。时各派人物对新内阁的组成提出不同意见：一派主张政党内阁，即内阁由一党组成，此为同盟会及部分共和党人的意见。一派主张超然内阁，认为内阁应由名流组成，此为康有为及大部共和党人的意见。一派主张成立混合内阁，即网罗各方人才，组织内阁，此为时论中之意见。一派主张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即总理无党籍，阁员包罗各方人才，此为袁世凯将就现状之构想。袁欲以无党籍的陆征祥为总理，其他阁员尽量不更动。袁意既决，将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求同意案提出于参议院，反对者虽多，因陆声名不错，仍于6月29日获通过。但7月18日陆到参议

⁶ 罗志渊，〈论施政五十天的唐内阁〉，《政治学报》1期。

院报告施政并提国务员名单征求同意时，因语多轻松，未谈政治，致所提国务员名单全被否决。陆以此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7月21日总统府宴请参议员疏通，另一方面则由军警张贴不满言论。7月23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陆出席参议院提新拟国务员名单，26日表决时，除工商总长外，余皆通过。由于陆连续请假，8月20日袁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代国务总理职。时政争激烈，同盟会于8月25日扩大为国民党，袁世凯先后邀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共商国事。9月25日，袁世凯宣布与孙中山、黄兴协商产生之内政大纲，并经参议院同意，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国民党所以赞同赵秉钧组阁，因赵曾列名同盟会，又为孙、黄协调政见时所首肯。赵阁既成，黄兴乘势拉各国务员入国民党，以组成政党内阁。时为袁世凯与国民党合作鼎盛时期，各国务员除陆、海二总长因军人不能入党为无党籍外，多挂名国民党。袁世凯借此争取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则借此扩充党势。旧官僚及一般旧派人物见袁世凯采亲国民党路线，乃投入国民党，或同情国民党，使国民党在1912~1913年间的国会选举中大获胜利⁷。

1912~1913年间的国会选举是依照1912年8月10日所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规办理。国会定为两院制，众议员依照人口多寡比例选出，参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当时全国人口约4亿1000万人，合格选民约4300万人。众议员的选举，蒙古、西藏、青海等区由王公、世爵、世职选举，采直接选举制；海外华侨因散居各地，可以委托他人代理投票。其余均以初选、覆选方式进行。众议员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初选、1913年1月10日覆选。参议员除蒙古、西藏、青海于1913年1月20日选举外，其余于1913年2月10日选举。各省区选举，党派竞争激烈，如浙江省为共和党与国民党竞争之地，众议员38席，国民党得28席；参议员10席，国民党得5席。福建省为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三党竞争之地，众议员24席，国民党得15席，共和党得5席，民主党得4席；参议员10席，国民党得7席。全国选举总结果，众议员596席，国民党269席，共和党120席，统一党18席，民主党16席，另有跨党及党籍未定者173席；参议员274席，国民党123席，共和党

⁷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内阁〉，《复兴岗学报》14期，页11-16。

55席，统一党6席，民主党8席，跨党及党籍未定者82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各约占45%，另有跨党及党籍未定者可资拉拢运用。两院议员的教育背景：受新式教育者各约占65%强，有传统功名者各约占34%强。两院议员的职业背景：官僚约居三分之一，次为议员出身，再次为教育界、自由职业及社团职员。两院议员的平均年龄约36岁⁸。

袁世凯于1913年1月10日发布国会召集令，限当选之议员于三个月以内齐集北京。至选举结果揭晓后，袁、赵当权派与国民党的关系突然陷入紧张状态。国民党素主内阁制，同年3月国民党领袖黄兴、宋教仁等乘议员北上之便，召集同党议员在上海商大政方针，宋教仁发布〈国民党大政见〉一文，主张采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选；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渐进于委任制。如果国民党的主张得以实现，袁、赵可能丧失政治权力。袁、赵为削弱国民党的影响力，于3月20日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另并遣人收买国民党籍议员，使自国民党分出，而有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等小党出现。另一方面，自始欲拥护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以对抗国民党的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在选举受挫之后，亟谋联合结为大党；在梁启超等的运作下，于1913年5月29日成立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于是国民、进步两党的的议员人数呈势均力敌状态。当时的选举与政党分合，受金钱与暴力的影响颇大。梁启超指国民党的选举胜利是由于金钱与暴力；邹鲁则认为国民党之分裂与进步党之搏成，皆为金钱作用⁹。另有暴力作用，如宋教仁之被暗杀。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5月1日，两院正副议长选出：参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皆国民党籍，众院议长汤化龙为民主党籍、副议长陈国祥为共和党籍。进步党成立后，汤、陈皆隶进步党籍。此后，国民、进步两党势力在国会中互有消长。在国民党的强力运作下，两院内部各种选举，国民党常获胜。如1913年6、7月间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60席中，国民党得28席，进步党得19席；1913年10月全院委会委员长选举，两院皆为国民党议员所得。国会开幕后，院会质询及议案讨论争执最烈者先后有宋教仁被暗杀案、大借款案、中俄协

⁸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期，页107-123。

⁹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与党争〉，页154-158，169-175。

约案、国民党起兵案等。宋案发生在国会召集之前，国民党议员到北京，即以宋案为讨论主题。4月25日宋案调查报告公布，证实暗杀由赵秉钧策划，袁世凯亦知情，国会内外乃对袁、赵展开抨击，赵以此于5月1日称病辞职。另一方面，4月26日，政府未经国会认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镑善后大借款，在国会内外亦引起轩然大波。进步党曾为大借款辩护，但仍认为应弹劾失职官员，财政总长周学熙以此去职，国务总理赵秉钧辞职亦与此有关。中俄协约订于1913年5月20日，承认俄国在外蒙有特殊权利，中国不在外蒙殖民驻兵。此案涉及变更国土，在进步党的运作下，在众院获通过；但在国民党的运作下，在参院被否决。至于国民党起兵案，国民党议员指为由袁世凯违法失职激成，故促袁退位；而进步党议员则指国民党叛乱，主张征讨。双方的提案皆未获通过，但袁世凯自始即派兵征讨¹⁰。

此次国民党起兵，史称二次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结束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表面的理由为宋案、大借款等案，分析起来尚有更深层的原因：（1）辛亥革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各省革命军纷纷被遣散，官兵不仅未获得革命利益，而且生活发生问题。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湖北等省被遣散的革命军将士即有二次革命的呼声。（2）南北统一后，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二人与革命皆无渊源，使革命派很难心服。尤值注意者，第一届内阁（唐绍仪）的十个阁员有四个老革命党员，第二届内阁（陆征祥）只剩下一个，第三届内阁（赵秉钧）则一个也没有。如是的权力分配，如何能安顿老革命党之心？（3）孙中山于让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后、黄兴于辞去南京留守后，均集中全力推展实业建设和社会革命，宋教仁在农林总长卸职后则继续以政党政治的方法推展政治革命，但到宋被暗杀、孙黄的建设事业落空，革命的理想化为泡影，遂不得不再起革命¹¹。

实际上，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让袁以后，革命党中的激烈派即继续与袁对抗。当袁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北京发生兵变，袁借口不南下就职。同盟会内部出现三种意见：一为以「援助」袁世凯为名，由孙中山率兵北征；二为以迎袁为名，由黄兴率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

¹⁰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期；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内阁〉，《复兴岗学报》14期；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期。

¹¹ 张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集》。

军队；三为以保卫北京治安为由，将南方的军队调驻北方。前二意见受到宋教仁的反对，后一意见为袁世凯拒绝。为对付袁世凯，同盟会人复运动直隶咨议局，使选原在南京任革命军军长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内阁总理唐绍仪依法请袁世凯任命，袁加以拒绝。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革命党人周浩于1912年3月28日在上海创《民权报》，由戴季陶任主笔，与温和派宋教仁所主持的《民立报》对立。1912年4月，《民权报》上即出现〈胆大妄为的袁世凯〉，〈袁世凯的罪状〉、〈讨袁世凯〉一类的激烈文字。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以〈杀〉为题写文，声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当时同盟会内的激烈派私下讨论二次革命，受到温和派《民立报》的非议。上海为激烈派活动的一个中心，湖北武昌则为另一中心，张振武所领导的将校团尤多激烈分子。黎元洪密电袁世凯指控张振武谋反，张于1912年8月16日在北京被捕处死。当时孙中山、黄兴态度温和，尚往北京调和时局，《民权报》颇不以为然。1913年3、4月间，宋教仁被暗杀，事涉袁世凯政府，孙中山决心再起革命，黄兴尚主张法律解决，黄受到《民权报》的批评。事实证明，宋案由法律追诉，陷于胶着，连原来较为温和的《民立报》也于1913年6月6日著文，批评宋案「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而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受到袁世凯的分化与收买，能给予袁世凯的制衡亦有限¹²。

尽管革命阵营中有些人不愿与袁世凯妥协，而袁世凯对反对派也并无诚心容忍，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决定再起革命，主要仍是宋案、大借款等案激起的。国会及一般舆论为此类案件争论不休，各省都督的立场亦壁垒分明。大概说来，指摘政府的言论，以国民党籍的四省都督最为凌厉，此四督为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其他都督除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朱瑞一度持调解之态度外，大多支持袁政府，甚至指斥「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到1913年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李烈钧、柏文蔚、

¹² 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页3，5，20，30，46，58-59，62-63，70，99，146-147，188-189。

胡汉民之职，革命战争乃不可避免。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起兵，被推为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各省的革命战争主持人如下：江苏的南京和上海由黄兴、陈其美分别负责，安徽由柏文蔚负责，广东由陈炯明负责，福建由许崇智负责，湖南由谭延闿负责，四川由熊克武负责，江西由李烈钧负责。各省宣布独立的日期：江西于7月12日，江苏南京于7月15日、上海于7月16日，安徽芜湖于7月15日、省城于7月17日，广东于7月18日，福建于7月20日，湖南于7月25日，四川于8月4日，湖北、河南等省亦有规模较小的独立军。但因二次革命之目标未足以号召全国，各省独立军很快便溃败。安徽、福建只支持到8月初旬，上海、湖南、广东支持到8月中旬，江西支持到8月下旬，南京支持到9月初旬，四川独立较晚，也只支持到9月中旬。整个革命起兵过程，先后两个月即告结束。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亡命日本¹³。

在部分国民党人以军事抗袁的同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谋速订宪法以制袁。依照临时约法，制宪大权操诸国会。在国会开幕前后，各方对制宪发表意见者甚多，就宪法起草机关而论，有由国会起草与另设机关起草之争；就宪法内容论，有内阁制和总统制以及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之争；就制宪时机论，有先定宪法后选总统与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之争。民主党的梁启超主张专设起草宪法机关，十八省都督及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均赞同，但到国会开幕，在国民党的运作下，决定以国会为起草机关。至于选举总统之先后，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原主先举总统，到合并为进步党后，梁启超见政局不稳，转促使进步党赞同国民党先订宪法的主张。至于宪法内容，国民党与进步党皆主内阁制，但国民党主地方分权，进步党主中央集权。1913年6月30日及7月2日，参众两院各选出宪法起草委员30人，共60人，组宪法起草委员会，其中国民党籍28人，进步党籍19人，政友会5人，共和党7人，超然社1人。7月12日，宪草委员会开成立会，是日国民党已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此后，由于部分宪草委员南下参加革命，国民、进步两党对宪法内容又有争论，起草工作并不顺利。袁世凯于8月19日将其御用的「宪法研究会」所拟宪法草案大纲提出

¹³ 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对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期上册。

于宪草委员会，但被拒绝。在此前后，国会内外即掀起先选总统之议，拥袁派并于9月18日成立公民党以资推动，进步党转而附和。国民党籍议员眼见各路讨袁军先后失败，欲据宪草委员会及国会孤军奋斗，遂赞同先选总统，以安袁世凯之心。宪草委员会乃起草大总统选举法，由两院联合之宪法会议通过。10月6日选举大总统，经第三次投票，袁世凯始以较多票当选。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继续干涉制宪，基本要求除大总统的紧急处分权外，为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均无需国会同意。部分国民党人见袁日事抓权扩权，又惧袁以二次革命为由整肃国民党，乃于10月21日结合进步党人成立民宪党，专心制宪。10月24日袁派法制局委员八人到宪草委员会陈述意见被拒，次日遂通电副总统、各省都督及民政长等，指摘宪草之不当及国民党之误国。其后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等，发电响应者七、八十通。宪草委员会见形势危迫，匆匆将宪草定案，于11月3日移送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即以国民党倡乱（掀动二次革命）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此后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袁世凯于1914年1月10日下令停止国会议员职务¹⁴。

帝制的酝酿与反帝制运动的胜利

1913年11月国会停闭后，政党政治中止。此后到1915年12月，为袁世凯一人造法扩权时期。1913年12月15日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停止国会议员职务，另设约法会议为造法机关。1914年2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修改临时约法，称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1日公布。依照此约法，大总统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外交大使，无需立法机构同意。5月26日依照修订后的约法设参议院，又命令由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是年12月参议院修订大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1915年8月以后，帝制运动公开进行，首先由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制造舆论，然后再由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人民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国

¹⁴ 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期；李守孔，〈民初之国会与党争〉，页192-208。

体，最后国民代表大会于 12 月 11 日一致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并透过参议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¹⁵。袁世凯扩权及称帝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来自袁的法律顾问、原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时任霍蒲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Frank J. Goodnow）。早在国会制宪之际，古德诺即为袁草一宪稿，主张总统可连任、总统任免文武官员无需国会同意；并认为总统有提议修改国家根本大法之权，有向国会提出宪草之权，且于国会讨论宪草时有派代表出席发言之权。前述国会制宪时，袁世凯要求提宪草于国会，并要求修改临时约法等，似皆古德诺认为可行之事。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定案之宪法草案采内阁制，并规定总统对宪法之制定及增修皆不得过问，古德诺颇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宜有坚强的行政部门，曾草一意见书给袁。其后袁修订临时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大体即依古德诺的理念。1915 年 8 月 3 日，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与君主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但君主政体对于中国较共和为宜¹⁶。8 月 26 日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以和之。帝制运动遂热烈展开。

袁世凯不断扩权及进行帝制，破坏了国人追求共和的理想，也未顾及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原则，反对的势力因此愈来愈大，最后不惜兵戎相见。最早与袁世凯兵戎相见的是国民党。国民党自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领袖多亡命日本，有人心灰意冷，有人互相诟谮，孙中山在田桐（湖北人）等人的协助下，自 1913 年 9 月起，即对流亡日本的党员重行登记，并将之重新纳入组织。另派陈其美（浙江人）等人去大连，图在东北建立革命组织。为了整合在东京的革命势力，孙于 1913 年 12 月 1 日成立「浩然庐」，招收学生约 80 人，给予军事教育；于 1914 年 2 月 9 日创办政法学校，招收学生三百余人，传授政法知识；于 1914 年 5 月 10 日创办《民国杂志》，以宣传革命讨袁。是年 7 月 8 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到会者约三百人。孙中山任总理。孙为了使此一革命组织成为纪律严整、荣辱与共的团体，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要求党员对党魁绝对服从，故誓约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字样。另一办法是许给党员特

¹⁵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页 111-112。

¹⁶ 鄧玉汝，〈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7 辑，页 125-144。

殊权利，党章中规定党员有三类，革命时期之内，首义党员（革命起兵前入党者）悉隶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革命起兵后入党者）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革命成功后入党者）得隶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非党员，非至宪法颁布，不得享公民资格。孙中山另告诉党员：「本部办事人员，一遇革命得手，则全数入内地，分往各省担任职务。」又谓：「第三次（革命）成功，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另在筹饷办法中规定：出资至万元者授一等勋章，享经营矿山及各种实业优先权，并由政府任为公民代表，参与政事，组织国会；出资至千元者授二等勋章，得享公民权，并有经营矿山及各种实业的优先权；出资至百元者授三等勋章，可享有公民权¹⁷。此一势利观念，引起黄兴等人之不满而拒绝入党；孙中山则鉴于二次革命党员不遵号令、一般人反应不积极，决意以铁的纪律作要求，厚的利益作引诱，再起革命。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任命陈其美（浙江人）为总务部长、居正（湖北人）为党务部长、许崇智（广东人）为军事部长、张人杰（浙江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广东人）为政治部长。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间，有十八个省支部先后在东京成立，又迄于1916年4月间，南洋（37）、美洲（3）、澳洲（2）、欧洲（1）、非洲（1）等地共有44个支部成立。海外支部主要的活动在筹款，本部及各省支部的主要活动是派人回国策动革命。就筹款而论，中华革命党时期共筹得日洋175万元、英洋112万元。除向日人借款120万日洋外，美洲筹款居第一位，南洋地区次之。筹得之款多用于在各省运动军队、支持起事。至于派人回国策动革命，除1915年11月10日陈其美布置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获成功外，以是年12月在上海袭击肇和军舰，和1916年5月在山东潍县和高密一带的革命军事声势最大。肇和之役由陈其美策划，潍县和高密之役由居正指挥¹⁸，但在整个反帝制战争中，并非主流。

反帝制战争亦如辛亥革命，是采分省独立的方式完成的。促成各

¹⁷ 李云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过程及其组织精神〉，《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罗若湘，〈中华革命党与讨袁之役〉，《近代中国》22期；王玮琦，〈中华革命党之研究〉，页26，31-34，37-38，83-84。

¹⁸ 前引李云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过程及其组织精神〉；前引罗若湘，〈中华革命党与讨袁之役〉；王玮琦，〈中华革命党之研究〉，页47-52，96-101。

省独立的因素很多，国民党的第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的第三次革命，扩大并加深了军事反袁运动，此其一。原欲辅助袁世凯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的进步党，在袁世凯破坏国会、走向专制之后，为避免有纵容帝制之嫌，不得不在袁公然从事帝制后，与袁划清界线，再为共和奋斗，此其二。各省军政首长及军官，不少人于 1912 年曾以拥袁赞同共和以逼清帝退位，今若拥袁称帝对清廷（尚在清宫）及国人皆无以自解，此其三。袁任正式大总统后，改都督为将军，设将军府统辖之，剥夺了各省都督的军权，又划一税收，剥夺了各省都督的财权，各省军政长官对袁世凯不愿继续效忠，此其四。

反帝制运动的进行，孙中山从运动下层做起，梁启超从运动上层做起，至于各省军政首长及军官，大多是依政治局势而转向的。从戊戌时期开始，梁启超大部分时间是依恃当权者从事政治改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梁在东京与之通函联络，主张用开明专制，此为梁在清末宣扬立宪时之理念。袁为对抗国民党，乘机对梁拉拢，自 1912 年 10 月梁归国，月赠三千元生活费，并资助其办报办党。1913 年 9 月-1915 年夏间，梁先后任司法总长（1913 年 9 月）、币制局总裁（1914 年 2 月）、参议院参政（1914 年 5 月）、总统府政治顾问（1915 年 2 月）等职。1915 年年初梁发现杨度、袁克定（袁世凯子）等已开始丑诋共和，到这年 6 月梁曾联合江苏将军（都督改）冯国璋访袁探袁意旨，袁表示不愿帝制自为。及至 8 月，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和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先后发表、筹安会宣布成立，梁乃于 9 月 3 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帝制。在此前后，梁启超在天津与蔡锷、戴戡等密商大计，决定利用蔡、戴在云贵的旧关系，发动讨袁。蔡锷，湖南人，于辛亥革命后任滇督，1913 年 10 月入京任经界局督办；继为滇督的唐继尧原为滇军师长。戴戡，贵州人，曾任贵州民政长，其职为龙建章取代。梁、蔡、戴等既决定讨袁，乃分头联络。蔡电唐继尧征询对变更国体的意见，唐覆电表示「决难承办」，蔡、戴、梁遂决定南下联唐。蔡锷、戴戡于 1915 年 12 月 2 日自天津启程，绕道日本、香港、海防，于 12 月 19 日至云南昆明。梁启超于袁承受帝位后的第四日（12 月 16 日）自天津南下，于 12 月 18 日至

上海¹⁹。

蔡锷和梁启超都想劝使云南将军唐继尧起兵，而孙中山亦派吕志伊、李烈钧等至滇运动军队。唐继尧于1914-1915年间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原采镇压态度，并捕杀多人。但到1915年9月以后，由于军中反对帝制者渐多，唐始倾向于讨袁，至12月17日李烈钧自南洋抵昆明，19日蔡锷、戴戡自海防抵昆明，反袁声势益振。唐继尧原定于12月23日派兵出发，拟先控制四川，再宣布独立，并于21日将此事电梁。梁在上海委江苏将军冯国璋之秘书长胡嗣瑗于22日在南京代发一电，促云南速宣布独立。云南收电后，误以冯国璋已赞同起兵，乃于12月23日由唐继尧、蔡锷等领衔致袁一电，请袁发誓拥护共和，并将杨度等12人即日明正典刑，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逾时未见回复，乃宣布独立，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征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广西，护国之役遂正式开始²⁰。

护国军宣布独立后，袁一面电云南疑12月23日之电有人捏造，一面即遣第三师（师长曹錕）入四川、第六师（师长马继曾）入湘西，粤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取道广西入云南，对护国军采取包围形势。在此种情形下，各省的态度对大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贵州与云南关系最密切，云南独立后，贵州各界谋响应，戴戡自云南率兵一营前往贵阳，贵州遂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推原贵州将军刘显世为都督，即日委任戴戡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军攻四川。袁世凯迫于形势，于2月23日申明缓就帝位。广西与云贵相邻，1916年1月18日，梁启超函劝广西将军陆荣廷起兵，陆对梁仰慕已久，即派人迎梁入桂，梁于3月4日偕汤叡等自上海出发，乘轮经香港至西贡偷渡上岸，汤叡于14日先抵广西南宁，陆荣廷知梁已在途中，乃于3月15日宣布独立。陆之宣布独立系迫于形势：陆非袁嫡系，受袁冷遇怀疑。护国军起，袁派龙觐光入桂，又命陆率兵入黔，实欲让龙代陆之位。在这种情形下，陆只请饷械不出兵，于3月7日被改任为贵州宣抚使。约在同时，陆长子裕勋在自北京往广西省旅途中被袁遣人

¹⁹ 张朋园，〈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期；胡平生，〈梁启超之讨袁护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2期。

²⁰ 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中华学报》2卷1期。

毒杀于汉口。加以梁启超从中劝说，广西乃宣布独立。广西的独立，是以陆荣廷、梁启超等的名义，但梁至4月4日始至南宁。袁受此刺激，加上江苏将军冯国璋于3月20日劝袁撤消帝制，乃于3月23日宣布撤消帝制。与广西邻近的广东，为中华革命党人活跃之地，梁启超的学生徐勤亦以护国军名义在广东起兵。广东将军龙济光首鼠两端，一面向陆荣廷求和，一面暗中向袁世凯求援。4月6日龙被迫宣布独立，心仍不甘。4月12日在广州海珠与广西代表汤勰、谭学衡、以及广东讨袁军将领徐勤等开会，因意见不合，龙枪杀汤、谭，徐勤自后窗遁。事后经梁启超与龙济光谈判，龙讨袁之志始坚。其后，陆荣廷、梁启超统兵入粤，屯驻肇庆，并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²¹。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是护国战争中第一个省区联合的组织。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谋讨袁时，曾议定俟云贵两广独立，即组临时政府，拥黎元洪为大总统。1916年3月梁启超由沪赴桂过香港时，与云南籍政界人士李根源（曾任国会议员）等商议此事，曾将此临时政府定名为「军务院」，嗣以广东问题纷扰，军务院计划暂搁置。至4月下旬，龙济光、陆荣廷拟推岑春煊为粤桂滇黔四省都司令，梁怕引起滇、黔不满，乃主设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副之。但虑及交通，主张由岑在广东摄抚军长职。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5月5日梁到广州，说服龙济光使赞成设立军务院。军务院于5月8日正式在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刘显世、龙济光、陆荣廷、吕公望（浙督，4月22日浙江独立，吕于5月5日被推为都督）等为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军务院宣布袁世凯叛国，并依法推戴黎元洪为大总统。军务院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排挤于外，孙中山颇不满意，但为与反袁势力结合，于5月8日嘱党人停止使用青天白日旗，采用云、贵、桂、浙等省所使用的五色旗，以免引起护国军方面的怀疑。其间陕西于5月9日宣布独立，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为都督；四川于5月22日宣布独立，四川将军陈宦为都督；湖南于5月29日宣布独立，湖南将军汤芑铭为都督。梁启超于5月20日自广东抵上海，与自始反对帝制、5月17日召开南京会议劝袁

²¹ 前引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前引胡平生，〈梁启超之讨袁护国〉。

退位的冯国璋商讨国事。5月30日梁闻其父于3月14日在香港病逝，遂在沪居丧。6月6日袁世凯病逝，梁于6月7日分电冯国璋、段祺瑞（国务总理）及独立各省，促其速奉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6月8日复致电黎元洪，请其委段祺瑞组阁。此后数日，梁拟订善后办法电告独立各省，主张恢复旧约法、恢复旧国会，6月10日后以唐继尧的名义电黎元洪，提出上述要求。6月22日，段祺瑞有电致各省，表示新约法不能废，梁电告段氏，黎之继为大总统、段之组阁，皆本旧约法，非本新约法。至是，黎元洪始于6月29日下令恢复旧约法、续行召集旧国会，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6日，下令各省军事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7月14日，唐继尧等宣告撤消军务院²²。因帝制而引起的政争告一段落。

²² 前引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前引张朋园，〈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前引胡平生，〈梁启超之讨袁护国〉。

第二节 外交的难题

民国建立之初的外交难题，主要发生在六方面：一是国际承认问题，二是善后大借款交涉，三是中俄蒙古交涉，四是中英西藏交涉，五是中日东北、山东及二十一条交涉，六是帝制运动所引发的外交问题。

国际承认问题

中华民国成立后，外交上的第一个难题是国际承认问题。国际承认问题涉及各国对华态度及在华利益，一般说来，美国倾向于早日承认，以安定中国政局，并免各国借机敲索；日本主张延迟承认，以谋在中国获得更大利益，并要求各国采取一致行动；英国则相信袁世凯上台可维护中国安定，至于承认时机仍与各国协同一致。

武昌革命爆发后，清廷向日本请求援助。尽管驻武汉的五国领事于1911年10月18日宣布严守中立，日本的泰平公司仍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于10月23日与清廷陆军部订约售予武器、弹药等共二百七十多万元。当时日本西园寺内阁主张维护清政府，赞同实行君主立宪；陆军省欲乘机在满蒙发展，并争取到俄国的合作；民间志士在长江流域赞助革命党，企图在南方获得利益；日本海军则在长江下游巡弋，时图干涉。10月下旬，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提议将中国三分，企图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而保留华北仍由清室统治。嗣出任清内阁总理的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对外发表意见，坚持实行君宪制；以致英国、美国都一度附和日本，维护君宪制。但到12月18日南北正式议和后，袁倾向于支持共和，以换取革命军方面给予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英国即积极向此方向努力，美国亦予支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争取国际支持，于1月

5日发表对外宣言，主要声明三点：（1）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2）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承认偿还之。（3）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照旧尊重之。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1月17日致电英、美、法诸国，请求承认民国政府，三国均无反应。日、德、俄三国，在承认民国一事上，则与英、美、法协调一致¹。

1912年2月21日，日本照会各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应采一致行动，并要求中国新政府对外债及外人在华利益给予保障，以之为各国承认新政府之先决条件。此后，日因欲在东三省获特殊利益，俄因欲在外蒙古获特殊利益，英因欲在西藏获特殊利益，对承认问题均持观望态度。德、法、荷等国亦然。美国对承认新政府颇为积极。2月29日参众两院通过决议，电贺中华民国成立。5月6日，美国国务院电驻华公使嘉乐恒（Calhoun），询其对承认新政府之意见，美使覆电主张迅速承认，以安定中国内政。7月20日美国电询各国关于承认民国之意见，各国皆认为时机未至，此事美国只好暂时搁置。此期间，日俄于7月8日订第三次密约，双方协调分割东三省及内蒙。稍后，俄、英为各别巩固在华特殊势力，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与自由行动，英国承认俄国在北满、外蒙、新疆的势力范围。1913年1月10日外蒙与西藏订约，互相承认为独立国。1913年3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就职。威尔逊乃富有道德主义色彩之人物，面对1月2日参众两院通过的「立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决议案，又接到驻华使领人员的多次建议，决心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以阻止列强在中国乘机渔利；于4月1日决定在4月8日中国国会开幕之日承认中华民国。虽然日、英、俄、法、义、奥等国表示反对，美国终于5月2日承认中华民国；墨西哥于当日跟进。有趣的是，巴西、秘鲁获悉美国4月1日的决定，为追随美国，阴错阳差，先后于4月8日、9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美国的承认对当时因宋案、大借款案备受抨击的袁世凯政府是一大精神支持，因此到处悬挂五色国

¹ 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一）〉，《近代中国》77期，页199-207；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期，页419-431；吕士朋，〈民国二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经纬〉，《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

旗及美国国旗，大肆庆祝。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当日，日、荷、葡承认中华民国，次日，英、俄、法、德、义、比、瑞典、丹麦、西班牙跟进。日本承认中华民国的前一日，迫袁签订〈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此为日本于辛亥革命后，于阻止中国实行共和、制造中国南北分裂失败后，在满蒙地区所获得的新权益²。

善后大借款交涉

武昌革命爆发后，在北京的清政府和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均欲向外国借款，由于各国宣布中立，两政府对对方的借款企图又加干扰，致皆无成。另一方面，各国为利益均沾，亦抵制任何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声明借款必须得到有关列强之一致同意。此益增加借款困难。2月14日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迄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前，南北两政府对借款之事不再互相杯葛；南京临时政府得袁世凯同意，于2月28日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得二百万两。3月9日，四国银行团又借给北京临时政府110万两，并决定4、5、6月份续借款给中国。4月30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三千五百万两的借款计划，因银行团借款条件苛刻，未能成功。四国银行团要求中国政府每月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核准，始能开支，为唐氏拒绝。财政总长熊希龄续与交涉，四国则继续对交涉中的借款先行垫付。5月17日给三百万两，6月12日和18日各给三百万两。时日、俄两国新加入四国银行团，成为六国银行团（6月中旬），日、俄提出借款不得用于满蒙等条件。日、俄两国原无巨款借给中国，四国邀请日、俄加入，一方面表示借款不由四国垄断，另一方面也想利用日、俄向中国施压。日、俄两国并不关怀中国的需要，只想在混乱的局势中渔利，因此借款的条件更为苛刻，包括监视并管理中国借款用途、中国盐税由外人管理等。熊希龄对此条件加以拒绝，并辞财政总长职。7月11日袁世凯当面告诉日本公使伊集院：「六国团体假援助中国之名，垄断利益，干涉内政。」7月

² 前引吕士朋，〈民国二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经纬〉：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页435；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页772-778；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页32-33，39。

12日周学熙接任财长，继续交涉，仍难打开僵局。六国银行团欲以停止垫款及阻止私人财团贷款给中国，以迫使中国就范；中国方面则对六国安排外人总办盐务、监理财政，表示难以接受³。

美国政府对银行团的作为颇为不满，美国公使嘉乐恒(Calhoun)原认美国留在银行团内可减少列强对中国的侵害，实际上所产生的作用不大。1913年3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就职，威尔逊一向不赞成对外大量投资，又鉴于列强利用银行团谋占中国利权，乃于3月18日宣布退出银行团，谓借款条件侵犯中国行政独立。新任国务卿白里安(Bryan)同时指出：以特种税作担保，以外国人管理中国税收，实违反美国的外交原则。美国宣布退出银行团之后的两天，袁世凯政府刺杀了反对党的领袖、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袁世凯既欲与反对党诉于武力，对借款案乃转趋积极。一方面于3月25日透过驻美公使对威尔逊总统的公正、高洁而宽大的方针表示谢意；另一方面即于4月初透过英使朱尔典(Jordan)向五国银行团表示，愿意接受各国聘请外人管理盐务、监督财政的计划；财长周学熙向银行团表示，只要将利率由5.5%降至5%，则中国政府可不经国会同意，立即签订借款合同。时由于美国退出，五国态度亦软化，4月26日，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镑(约二亿五千万元)遂在北京签字。内容是：借款期限四十七年，利率五厘，九折发行，八四折实收(中国可得款约二千一百万镑)；以盐税作担保，监督盐税收入(于财政部设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置华总办、洋会办各一人；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置华经理、洋协理各一人；审计处设稽核外债室，置华洋稽核)，监督借款用途(借款只能用于清还债款、赎回各省借款、赔款、裁军、行政费、整顿盐政)；担保品有关税、盐税、以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税项。实际上，借款大约有半数(一千零五十三万镑)充作偿还从前借款。两百万镑用于整理盐务行政。中国政府能够动用于行政费用和裁减军队费用大约只有八百五十万镑，其中裁减军队费用为三百万镑，1913年4月-9月的行政费用为五百五十万镑⁴。

³ 前引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二)〉，《近代中国》78期，页164-167；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页28-47。

⁴ 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二)〉，页168；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页47-53；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页55-69；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三章，页782-789。五国银行团是：英汇丰、德德华、法东方汇理，俄道

中俄蒙古交涉

蒙古在中国北疆，为蒙古人所居之地。明太祖平定中国，将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驱返蒙古。元朝王室之子孙于大漠南北各自形成小部落、各自立其首长。清时蒙古被征服，臣于清；但清仍尊其政教制度，并未直接统治。十九世纪末叶以后，俄国在西伯利亚活动增强，与蒙古往来日密，1907年且与日本订立密约，日、俄互相承认在内、外蒙古有特殊利益，而当时日、俄已分别以南满和北满为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形下，清廷乃开始加强对满蒙的经营。1907年清廷于满洲地区正式建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并鼓励关内人民大量移入；同时发布开垦蒙古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遂拟订计划，乘俄国势力在蒙古尚弱之际，自奉天省向蒙古东部开垦。另一方面，到1910年3月以后，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外蒙设兵备处、巡防营、宪政筹备处、垦务局等机关，逐渐使中国行政制度推行于蒙古，并有改蒙古为行省之议。中国积极经营蒙古，引起蒙古人的紧张，对中国内地来的人益加仇视，对亲内地的内蒙人产生不满，亲俄之念日盛。时日本已派人到蒙古秘密活动，煽动各邦叛离清国，俄国对蒙古的经营乃转趋积极。1911年7月，外蒙派代表团赴俄，请求其协助外蒙独立。俄国为顾及中国及列强反应，初仅支持外蒙自治。嗣后俄国为协助外蒙对抗中国垦殖，于是年10月援助外蒙一万五千枝来福枪、七千五百万发子弹。外蒙原有独立愿望，到1911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外蒙既得俄国援助，乃于1911年11月30日限蒙古办事大臣三多于三日内离境，并于12月2日宣布独立，称「大蒙古帝国」。外蒙地区人民并非皆赞同独立，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率兵反抗，直到1912年9月全军覆灭为止⁵。

外蒙及西藏乘国内革命高潮之际进行独立运动，使南北两政府对民族问题提高警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1月28日，孙中山致电蒙古

胜、日横滨正金；中国方面的签字代表为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

⁵ 罗应荣，〈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1905年-1917年）〉，《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报》2期，页41-46；陈春生，〈苏俄对外蒙古独立之关系〉，《东方杂志》复刊10卷11期，页50-53。

王公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人，向他们解释推翻清廷的目的是「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自由」，提醒他们「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希望他们「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嘱建五族共和体制。13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并照会各国公使；该条件明白规定满蒙回藏各族与汉人平等，各族信仰自由，五族共同缔造中华民国。同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强调「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第三条）。8月10日，时南北已统一，临时政府已迁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国会组织法，对蒙藏等地议员名额有明确规定。8月19日临时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与内地一体对待，不以藩属待遇；蒙古王公原有之世爵、封号、特权一律照旧，俸饷从优支給。其后，临时政府任命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对内蒙各旗参加叛乱的官兵，规定「但能释兵来归，……决不苛求」。通过这些措施，安抚了内蒙人心。1912年10月和1913年1月，内蒙东四盟和西二盟先后在长春和归绥召开王公会议，通过声明，赞同共和，反对外蒙独立。至于外蒙，袁世凯于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面派在京蒙古王公至外蒙劝令取消独立，一面于3月25日，直接电劝外蒙取消独立。在被外蒙活佛拒绝之后，袁复致电表明立场：外蒙无权脱离中国宗主，中华民国继承前清一切权利，由本总统执行之；清政府未允许外蒙独立，中华民国当亦不认许之。袁并谓：中国官兵皆谓本总统丧地辱权，彼等忍无可忍，不辞战伐。其后内阁会议亦电劝外蒙支持五族共和，勿独立以触五族之怒，并以朝鲜自中国独立不久即为日本所并为例，促请外蒙注意。但外蒙的态度一直未能转缓。如前所述，北京政府只好采取措施，先安抚内蒙⁶。

外蒙态度所以如是强硬，其后台为俄国。但俄国为顾及与中国的关系和列强的反应，此时尚未支持外蒙成为独立国，其策略是想以支持蒙古自治的名义，排除中国在外蒙的势力，以便于俄国控制。1911年12月31日，俄国代办谢金向清外务部提出中国在外蒙不驻兵、不

⁶ 前引罗应荣，〈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1905年-1917年）〉，页46-49；前引陈春生，〈苏俄对外蒙古独立之关系〉，页54；汪朝光，〈略论民国初年的中俄外蒙交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页169。

殖民、外蒙自治，被清政府拒绝。1912年6月，俄驻华公使郭索维慈（Korostovets）再向中国提出三项原则，作为中俄协商蒙事的准则：（1）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2）中国不得向外蒙移民，（3）外蒙古如取消独立，应允蒙古人自治。中国对俄国的要求未予理会。此后俄国一面与外蒙加强联系，一面在外交上争取各国的谅解。1912年7月8日与日本订立第三次密约，将内蒙划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蒙古有特殊权益，日本承认俄国在西蒙古有特殊权益（东西蒙古以北京的经度116°27'为界）。是年九月，俄驻华公使郭索维慈至库伦与外蒙谈判，外蒙提出俄蒙协约草案，声明外蒙「欲脱离中国之羁绊，自组独立国家」，并「保持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外蒙欲联合整个蒙古地区的蒙人建立民族国家，自然影响俄国权益，俄国不予接受，仅欲以协助外蒙自治为名实际控制外蒙。11月3日，俄蒙协约成立，约中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并协助蒙古编练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及华人移植蒙地之各权利。」另附「商务专条」十七条，规定俄人得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迁徙，俄商免纳进出口各税，俄人得在蒙古租买地段、建造局厂或开垦耕地等。俄国将此条约通知中、日、英等国。日本与俄有密约，英国则正与俄谈判互相承认在西藏及外蒙的特殊权益，对俄蒙协约皆予默认，中国则绝难接受。临时政府令驻俄公使刘镜人向俄国政府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俄国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民间方面，各地成立救蒙会、抵制团等，从事抵制俄货、不为俄人服务等运动。俄蒙协约成立后，外交总长梁如浩辞职，由继任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与俄使谈判。谈判自11月起，历时半年，至1913年5月20日订立中俄协约，其内容为：（1）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中国不更动外蒙原有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队及警察之权，并许其有拒绝非蒙古人移民境内之权；（3）俄国除领事馆卫队外，不派兵到外蒙古、不殖民外蒙古。此约虽在7月8日为众院通过，但于7月11日被参院否决。此期间外蒙已于1913年1月12日与西藏订约，互相承认独立，遇有内忧外患时永久互相援助；俄国则乘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之机，于7月13日将中俄协约全部取消，要求中国承认俄蒙协约、承认蒙古自治、承认中俄在蒙古地区的利益由中俄共商。陆

征祥与俄使磋商无成，辞职；到 9 月 11 日以后，新任外长孙宝琦续与俄使磋商。至 11 月 5 日，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五款：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能在外蒙驻兵殖民；中国承认 1912 年俄蒙所订之商务专条。至于外蒙自治区的范围，规定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处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范围为限（时国会已为袁世凯破坏，行政不受监督）。此期间，俄国先后贷款给外蒙五百万卢布，并派财政顾问管理外蒙财政，但外蒙要求承认其为独立国，并合并内蒙，则为俄国所拒；日本对外蒙独立亦予抵制。为了解决中、俄、蒙之间的问题，三方面于 1914 年 9 月 15 日在恰克图谈判，至 1915 年 6 月 7 日签订中俄蒙恰克图条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受中国册封尊号，改用民国历法。中俄蒙协约签订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6 月 9 日，哲布尊丹巴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⁷。

中英西藏交涉

清朝于 1720 年（康熙 19 年）收西藏为藩属，初未注意经营；所派驻西藏的办事大臣，类多庸愚贪鄙，专横倨傲，藏民备受苛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势力进入新疆，南向西藏发展；英国势力早已进入印度（1858 年正式合并印度），北向西藏发展。1903 年 7 月 7 日印度政务司英人荣赫鹏（Younghusband）自印度率军入侵西藏，次年 9 月 7 日藏人与议和，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藏人事务不许外国干涉。时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清廷无暇多顾，俄国则于 9 月 23 日向中国外务部抗议英藏订约事。清廷于 9 月 26 日命津海关道唐绍仪赴藏查办，又于 11 月 4 日命唐为议约全权大臣，与英国商议西藏事宜。1905 年 3 月 2 日，唐与英代表在印度加尔各答会议，屡

⁷ 前引罗应荣，〈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1905-1917 年）〉，页 49-55；前引陈春生，〈苏俄对外蒙古独立之关系〉，页 54-56；前引汪朝光，〈略论民国初年的中俄外蒙交涉〉，页 170-174。

生波折，时开时停，至 1906 年 4 月 27 日双方签订藏印续约，英国允许不干涉西藏内政，中国答应不准他国干涉西藏内政。1907 年 8 月 31 日俄国与英国签订藏事协定，各不干涉西藏内政，承认中国之宗主权⁸。另一方面，清廷自 1903 年以后亦加强对西藏之经营。1905 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加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引起藏民不满，冲突时起，赵于 1909 年 7 月派兵自巴塘进攻西藏，达赖喇嘛于 1910 年 3 月逃印度，并向英国求援，清廷下令剥夺达赖喇嘛封号。在赵氏经营下，在 1905-1911 年间，先后实行改土归流的地方有巴安府、盐井县、三坝厅、理化厅、定乡县、稻城县、贡噶岭县、河贡县、同普县、白玉州、边北道等⁹。另一方面，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要求英国赞助其独立。英国仅支持其自治，达赖又向俄国求援，俄亦尊重英国的立场¹⁰。

1911 年 10 月武昌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乘机四处抢劫，藏军攻川军，迄 1912 年 5 月，连陷日喀则、江孜，并封锁川藏通道，驻拉萨川军弹尽援绝。8 月，经尼泊尔调停，川军缴械，经印度返国。达赖于 1912 年 1 月自印返抵西藏。此期间由于西藏不断内侵，而英国对西藏亦给予武装支持，除给予西藏三百万镑借款自印度购入军火外，到 1912 年 5 月已在各地派有驻军约五千人。中国朝野对西藏的离心亟谋对策。4 月 1 日，伍廷芳、黄兴等在上海组蒙藏交通公司，拟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民间团体名义，开发蒙藏。4 月 21 日，袁世凯宣布蒙、藏、新疆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与内地各省平等，并谓中华民国是实行五族共和。6 月初藏军侵陷巴塘、里塘，达赖明白宣布西藏独立；袁世凯乃下令川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出师藏东。英国于 6 月 29 日向中国提出抗议，反对袁在 4 月 21 日宣布的将西藏视为与内地一样，并抗议华官在西藏剥夺西藏的内政权力。袁世凯政府向英国提议改订中英间有关西藏之条约，声明西藏永为中国领土；英国可在西藏从事商务，但不得过问政治。8 月，尹昌衡率军自打箭炉（康定）西进，英国则以保护商民为名，宣言将派兵三千由江孜进驻拉萨。8 月 17 日，英使朱尔典向中国提出节略：（1）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有上邦之权，但不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2）中国不得视

⁸ 参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有关日期的记载。

⁹ 冯明珠，〈中英西姆拉会议〉，《思与言》16 卷 3 期，页 243。

¹⁰ 于子桥、施乐伯，〈外力与中华民国之创建〉，《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

西藏地位与内地各省平等。(3) 英国不同意中国在西藏无限期驻兵。9月7日,朱尔典再向中国提出警告:若征藏军继续前进,英国将以实力协助西藏独立。中国乃接受英国的要求,令征藏军停止西进,并于10月28日宣布恢复达赖的封号。12月23日,外交部对英国8月17日的节略提出书面回复,重申中国对西藏享有充分主权,中国无意改变西藏现状。另一方面,英国希望俄国允诺英国派军进驻拉萨,未获俄国同意;俄国且于1913年1月促使蒙藏订约,使互相承认独立。两月以后,西藏派使赴俄联络;此事使中、英两国皆陷入紧张状态。但因为俄国在蒙古、新疆一带的发展,需与英国取得协调,终不能不承认英国在西藏有优先权。中国既怕西藏附俄,又怕西藏附英,自1912年9月以后,袁政府对西藏尽量安抚,尤其拉拢尚服从中国政府的班禅喇嘛¹¹。中英藏之间的问题不能不靠谈判解决,中国方面之所以迟疑,是不欲承认西藏与中国有对等的地位。

1913年7月,英国派麦克马洪(A. H. McMahon)为代表,西藏派噶布夏札(Lonchen Shatra)为代表,准备与中国会谈。是月30日,英使通知中国,声明中国再不派代表,英国将与西藏单独订约。8月3日,中国遂任命陈贻范为代表。是年10月13日,三方面的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Simla)开第一次会,麦克马洪为主席,西藏代表提出六点要求,包括西藏独立、划定中藏疆界等。西藏所开疆界北面包括青海全部,新疆、甘肃一部,东面界线到达云南西部和川西的里塘、巴塘、打箭炉(康定)等地。10月18日,中国代表依照8月17日英国向中国提出的节略,提出八点说明,包括西藏应承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把西藏改为行省,但西藏外交、军事、政治均需听中国政府指令。至于中藏疆界,依照傅嵩林所绘西藏图,北界止于当拉岭(青藏交界),东界止于江达(川西)。由于英国并不支持西藏独立,西姆拉会议的主要争执点在中藏疆界。11月18日的第二次会议,双方无法打开僵局。1914年1月12日,在德里举行第三次会议,麦克马洪于2月17日提出界务折中方案,仿照俄国将蒙古划为外蒙、内蒙,将西藏划为外藏、内藏。至于内外藏的界线,其后多所折冲,最后以日后青海省及西康省之康定以东属中国;西康省东部康定至昌都

¹¹ 何烈,〈民初中英西藏交涉〉,《史原》1期,页52-60;前引冯明珠,〈中英西姆拉会议〉,页42-48;陈云腾,〈民国以来之西藏交涉〉(1977年6月台大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页57-71。

及怒江以东属内藏；怒江以西之西康省及日后之西藏地方属外藏。中国初欲将内藏西界推至江达，继欲退至怒江，再继欲退至金沙江边之巴塘，均不可得。另一方面，藏军于 1914 年 1、2 月间，分兵数路，越过怒江，向恩达、类伍齐、察木多等处进犯，为中国守军击退。当时中国代表陈贻范深深了解英、藏欲将青、康、藏自中国割裂而去，非口舌可争，希望政府在军事上予以支持。但因袁政府忙于权力斗争，在外交上依靠英国支持，在川藏边境采取守势。3 月 11 日英国向中国提出调停约稿，3 月底会议再移至西姆拉。交涉到 4 月 27 日，英国迫使中国代表在草约上签字。草约要点如下：

- (1) 中、英共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及西藏之自治权。
- (2) 中国对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
- (3) 西藏边界照附图。

另有声明文件乙纸，声明订约各方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达赖喇嘛由中国给予封号，外藏不得派代表于中国议院¹²。

草约签字后，外交部于 1914 年 4 月 28 日嘱令陈贻范取消，并表示愿与英国续商。肃政使夏寿康等以陈贻范擅自变更国土，提案弹劾，嗣经外交部回护，未受处罚。另一方面，中英交涉的重心则移至北京，由外交部直接与英公使谈判。至 7 月 3 日正式破裂，条约由英、藏代表签字，陈贻范奉召返国。7 月 14 日，中国政府表示愿续就西藏问题与英谈判，9 月并表明让步的条件：将察木多（昌都）划入内藏，将巴塘、里塘划入四川。到 1915 年 4、5 月间又拟订交涉原则，并将察多木让出，但英国坚不让步。5 月 25 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日本取得南满、山东等地权益；6 月 7 日，中俄蒙条约签字，俄国获得外蒙权益；英国与中国之间的交涉却无进展。问题的主要症结为中藏边界问题：北界英国主张以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之青海为外藏的一部分，中国主张此区归内藏；东界英国主张巴塘、里塘为内藏的一部分，中国主张此区归四川。中国外交部于是年八月就中藏边界致一节略给英使，未获回答。时以欧战方酣，西藏问题的外交谈判暂被搁置。1917 年，国内发生护法战争，川军与北军冲突；藏军乘机内犯，连陷多城。嗣经英人调解停战，川军驻于盐井、巴安、义敦、瞻化、甘孜一线，

¹² 前引何烈，〈民初中英西藏交涉〉，页 60-68；前引冯明珠，〈中英西姆拉会议〉，页 48-58。

藏军驻于类伍齐、恩达、昌都、德格、石渠一线。此一对峙界线，到1949年以后成为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的边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英藏西姆拉会议进行之际，英国与西藏代表依据麦克马洪线，将西藏与印度边界达成协议，使康藏损失不丹以东与印度阿萨密省相接的七万平方公里土地。此事到1960年代引发中共与印度的边界战争¹³。

中日东北、山东及二十一条交涉

武昌革命爆发后，日本曾欲以获取东北为条件，援助清廷，嗣以各国相约中立乃止。民国建立后，日本欲援俄国中东路之例，将满韩交界之中日贸易，减税三分之一；到1913年5月29日，中国与日本订立合同加以认定。时国民党与袁政府对抗激烈，日本政府表面上维持中立的立场，实则透过民间活动，支持国民党在南方发动反袁，俾日本有机割裂满蒙。日人川岛浪速等积极运动满蒙独立，三井物产社员森恪则建议日本以两个师团武器及二千万日元现款援助国民党抗袁，作为国民党二次革命成功后让渡东三省的条件。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南京、江西等地都有日人助战，而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许崇智、廖仲恺等均系搭乘日本军舰或轮船逃离国境。由于日人明目张胆援助革命军，8月3日在兖州、8月11日在汉口、9月1日在南京都发生反日事件；9月1日有三位参与革命军的日人在南京被射杀，尤使日本振振有词。中国政府曾为此惩凶、谢罪、赔偿，日本并乘机要求延长旅大租借年限为99年，并满蒙五路的修筑权。此后中国就满蒙五路的修筑权，与日本谈判，到1913年10月5日合约换文成立，规定下列各路需由中国借日款修筑：（1）四平街经郑家屯至洮南府，（2）洮南府至承德府，（3）开源至海龙府，（4）海龙府至吉林省城，（5）洮南府至长春。日本获此权利，于次日承认中华民国。五路当中，仅四平街至洮南府一线的修筑，先后于1915年12月、1918年2月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1919年9月复向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借款。其余四路，虽曾于1918年9月与兴业银行签订借款

¹³ 前引何烈，〈民初中英西藏交涉〉，页68-69；前引冯明珠，〈中英西姆拉会议〉，页60-61；前引陈云腾，〈民国以来之西藏交涉〉，页79，90；前引于子桥、施乐伯，〈外力与中华民国之创建〉；冯明珠，〈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上）〉，《近代中国》58期，页237-250。

预借款合同，却不曾借款¹⁴。

中日山东交涉，系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攻击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所引起。1898年德租胶澳，划山东为势力范围。1914年7月欧战爆发，日本拟对德宣战，俾有机侵占德人在山东的利权，中国于8月6日宣布中立。8月12日，江汉关监督关士源电请政府收回青岛，在华德商亦倡议将胶澳交还中国，以杜日本借口。德国驻华使馆初表反对。8月15日，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胶澳租借地无条件交付日本。此时德使馆亦拟将胶澳交给中国，但英、日表示反对，德国外交部也不赞成。中国政府向英国提议，允由中国派兵会攻青岛，英、日亦不赞同。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8月25日，日本要求中国划山东境黄河以南为中立以外地区，俾日本可以行军。8月31日并要求中国撤走胶济铁路守备兵及潍县一带驻军。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岸龙口附近登陆。9月3日，中国援引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声明「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各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9月4日，德使馆向中国政府抗议，指责中国划定战区偏袒日、英。9月9日，德使馆声明中国应为青岛德国生命财产之损失担负责任。中国表示划定战区为不得已，期盼德国谅解。日军自龙口南下后，一路骚扰，随意征用民房，以不当价格强买物品，强奸妇女。9月26日日军占据潍县车站，侵及中立区。中国政府先后于9月27日及30日提出抗议，日使于10月2日答谓：日军进军之目的在占有青岛（按日本海军已于9月27日封锁青岛港），而胶济铁路为青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月3日开始，日军自潍县沿胶济路向西推进，6日夜占领济南车站，完成胶济铁路的占领。其间，德国政府于10月4日拟将胶济铁路完全交给中国，中国征求日本的意见，但为日本所拒绝。11月7日，英日联军陷青岛，并于11月16日正式接收。此期间，胶济路员及青岛海关亦渐易以日人。中国方谋使日本自胶济铁路撤兵，至1915年1月18日，日本即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¹⁵。

¹⁴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页115-119；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三）〉，《近代中国》79期，页226-231；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期，页438-442。

¹⁵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页123-131；前引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页443-447；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四）〉，《近代中国》80期，页185-188；〈从辛亥革

日本向中国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是对前此在中国已获权益要求肯定，以及未获权益的进一步扩张。1895年甲午战后，日本势力进入朝鲜，1898年获福建为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后，日本势力进入南满。1907至1912年间透过三次日俄密约，日本势力进入东蒙。1911至1913年间，湖北汉冶萍公司三次向日本借款3530万日元（该公司总资金1522万6000元），使该公司产权受日本控制。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日军进占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此时，英、法、美、俄诸国困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欲乘机在中国扩张，遂于1915年1月18日由日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总统亲递二十一条要求。此一要求，酝酿于1914年8月日本出兵山东前夕，日本朝野各方面不断对促进日本在华利益有所讨论，最激烈的建议是黑龙会的内田良平向政务局局长小池所提出者，除占有南满、东蒙、山东、福建的利权外，并控制中国军事、财政、教育和外交。二十一条要求，可以说是容纳多方意见，为集大成之作。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谋垄断山东利权；第二号七条谋垄断在南满及东蒙利权；第三号二条谋垄断汉冶萍公司利权；第四号一条谋控制沿海所有港湾、岛屿；第五号七条除谋垄断福建利权外，并谋控制中国政治、财政、军警，且在中国扩张布教权和教育权。为了诱使袁世凯接受要求，日本答应保障袁之地位及安全，并取缔中国革命党；如袁不答应要求，声言将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袁世凯接到二十一条要求后，为探索日本真意和列强默契程度，故意延迟交涉。谈判于2月2日开始，一直交涉到4月下旬，中国所争持的除第五号以外，为第二号中的东蒙利权，认为内蒙屏障京师，不能给予日本特殊利权。此期间，日本在南满、山东、天津等地增兵，以为要挟。袁世凯政府希望国际上对日本能有所抵制，但英、日有同盟关系，日、法有协约关系，日、俄有密约关系，皆抱事不关己的态度；美国对第五号表示不满，则使日本有所顾忌。另一方面，中国各地排日运动热烈展开，陆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向日本表示强硬态度。日使日置益遂于5月7日向中国提最后修正案，允将第五号中福建之项以外各项容「日后协商」，其余限于5月9日下午二时前答覆，袁不得已于5月9日应允。但应允各条系以

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五），《近代中国》81期，页139-140；张水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对德外交政策（上）〉，《近代中国》39期，页212-215。

不同的方式处理：第一、二、三号有关山东、南满、东蒙及汉冶萍公司者，以条约的方式处理；第四号由总统声明的方式处理；余由换文的方式处理。总统声明于 5 月 13 日发表，条约则于 5 月 25 日签署¹⁶。

帝制运动所引发的外交问题

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大部分条款以后的一、二个月，帝制之说开始宣腾。可能的原因有二：（1）感于外患严重，亟谋集大权于一身，以应付危局。5 月 14 日袁曾密令全国各机关：「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¹⁷（2）日本新获得许多利权，对袁世凯必支持；二十一条谈判时，日本已以保护袁世凯身家、压制革命党，以诱袁答允条件。袁既答允日本要求，进行帝制，在外交上应可获日本支持。事实上，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都曾怂恿袁称帝，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于 1915 年 9 月初向报界发表谈话，谓中国「未达到可由共和制以申展国运之程度，……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此语对袁之帝制运动甚有鼓舞作用。另一方面，英、美等国亦以帝制属中国内政，应顺其自然发展。英、美的态度可以理解，日本表示支持帝制则是一种阴谋，因为日本政府早就暗地支持反袁活动；陆军方面且以为中国必以帝制致大乱，日本可于帝制将成时声明干涉¹⁸。种种资料显示，日本一面援助各种反袁活动，俾从反袁势力方面获取利权；一面在袁的帝制运动势成骑虎之际设法阻止，使袁在混乱中为挽救危局许给日本更多利权。

日本援助反袁运动，可从几方面略作说明：（1）中华革命党于 1915 年 12 月初旬在上海所发动的肇和军舰起事，贿赂军舰之款，由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提供三百万元，日本海军后备役官兵且参与军事行动。另一支中华革命党人于 1916 年 5 月在山东潍县等地起兵，青岛日军守备司令部成为革命军的根据地，日人萱野长知且实际参与指挥。后

¹⁶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页 133-159；前引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页 447-456；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五）、（六）、（七）、（八）〉，《近代中国》81 期、页 144，82 期、页 202-208，83 期、页 194-198，84 期、页 229-233。

¹⁷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页 174。

¹⁸ 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3 辑，页 166，172，174，181。

来革命军对济南、高密等地的进攻，均有大批日人参与。另外，日人久原房之助给予中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共八十万元的援助。(2) 云南护国军起事前夕，蔡锷由天津赴日本，由日本转台湾，由台湾转海防，然后入滇，均由日人安排与接济。梁启超由上海经香港至海防偷渡赴桂，亦由日人安排与接济；而梁启超由桂赴粤晤龙济光，亦由日人斡旋。护国军领袖之一岑春煊于 1916 年 2、3 月间赴日，借得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3) 1915 年夏天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纠合蒙古人巴布札布及以肃亲王善耆为主的宗社党，谋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肃亲王获大仓喜巴郎贷款一百万元。到 1916 年 3 月川岛等谋以大连为根据地加以策动，日本参谋本部且派土并市之进往奉天各地策动响应。另一方面，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则支持张作霖驱逐奉天将军段芝贵，谋利用张作霖在东北发展日本势力¹⁹。

日本决议干涉帝制运动，系在帝制运动箭在弦上之时。1915 年 10 月 4 日，袁世凯告美使芮恩施(Reinsch)，国体将由国民投票决定。10 月 8 日，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0 月 19 日，参议院决定以「君主立宪」四字进行国体投票。10 月 25 日各省开始选举国民代表，28 日选出之代表开始国体投票。12 月 11 日参议院汇查国民代表决定国体票数 1993 票，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国体，并推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接受帝位。日本于 10 月 14 日阁议决定干涉袁帝制运动：次日商请英国共同劝告袁世凯推迟实行帝制，至 21 日获英国同意。25 日，英使朱尔典(Jordan)、日代办小幡酉吉分访梁士诒(原任总统府秘书长，时任税务处督办)，表示劝告从缓之意。26 日，日邀请美、俄、法三国共同劝袁。到 10 月 28 日，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齐(Krupensky)、日代办小幡正式访外长陆征祥，劝告展缓变更国体。11 月 3 日、5 日，法、义二国公使亦分别访陆征祥，表示劝缓之意。惟美国于 11 月 4 日向英、日二国表示：中国变更国体纯为内政问题，任何干预均属侵犯中国主权而非正当。各国反对帝制实由日本主导，德国为争取外援，拟抢先承认中国帝制。美国基于不干涉内政的理由，不反对中国帝制；美使芮恩施且于 1916 年 1 月 21 日电国务院，主张即行承认中国帝制政府。法国对德国的动向甚为敏感，乃联合英，俄

¹⁹ 同上，页 193-194，198-199，206-212。

二国于 1915 年 11、12 月间，谋促使中国对德、奥绝交，并参加欧战。因为中国参加欧战，与日、英、俄、法等国同为参战国家，可避免德国与中国接近，亦可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12 月 6 日，日本拒绝英、法、俄三国的提议。日本拒绝的表面理由是中国参战会引起国内不安，革命党会乘机扰乱治安；实质的理由则是中国如为参战国，日本即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不便在中国扩张势力，而中国在战后复可参加和会，收回山东利权。英、法、俄三国顾及日本态度，未便强邀中国参战。到 1915 年 12 月 15 日，英、俄、法、义四国对中国的帝制运动表示了较为中立的静观态度。此后，英、法、俄、义四国为怕中国与德国接近，对袁政府的态度缓和；袁政府为争取国际同情，亦力谋与英、法、俄、义四国合作，变相参加欧战。梁士诒、叶恭绰等于 1916 年 1 月筹办惠民公司，于 5 月开始，招募华工，赴欧担任英、法军的后勤工作。是年 8 月，奥、德二国先后抗议中国违反中立，要求停止派遣华工赴欧，中国不允²⁰。另一方面日本则对进行帝制的袁政府，实行强力的破坏政策。

19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告知日本，拟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向大正天皇赠勋。1916 年 1 月 16 日，日本照会中国加以拒绝。1 月 19 日日本阁议决定严重警告中国政府，要求推迟实行帝制，否则实力干涉。21 日日本外相石井将阁议告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谓日本不承认中国帝制，应予推迟实行；如不见听，即自由行动，派兵驻中国要地，承认云南为交战团体，宣告中国政府妨害东亚和平。同日，中国外交部通告各国公使，袁世凯暂缓登极。但日本并不以袁世凯取消帝制为满足，2 月中、下旬，北京、东京两地分别有日侨上书和民间团体要求，尽速迫袁退位，到 3 月 7 日，日本阁议又决定推翻袁世凯政府，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民间援助反袁军。实际上，如前所述，日本援助反袁军早已开始，日政府且居暗中协助的角色。3 月 7 日的阁议既决定倒袁，日本更明目张胆地协助山东和南满的反袁势力。4 月 11 日，驻日公使陆宗舆请日本援助袁世凯，日本于 4 月 17 日表示：如袁世凯下野，可在日本居住，并可予以保护。

²⁰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 198-208；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九）〉，《近代中国》85 期，页 190-192；前引张水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对德外交政策（上）〉，页 215-217；前引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页 184-187，197-198。

日本旋又公开倡议拒付北京盐税余款（此为北京政府收入之大宗），以财政问题扼杀袁政府。到是年5月，袁政府再以利益饵日本，由梁士诒向日本表示，中日合办交通银行、汉冶萍公司、招商局，给予日本华南铁路（南昌到杭州）敷设权；曹汝霖向日本表示，中国可接受二十一条第五号中的财政顾问、军事顾问、武器统一等要求。但此时袁氏政权旦夕可亡，日本已准备与黎元洪、段祺瑞新政权建立关系，日本干涉帝制的活动乃告结束²¹。

²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14-233；白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十）〉，《近代中国》86期，页182-183；前引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页205-209。

第三章
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
(1916-1928)

第一节 此伏彼起的分裂

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己身病亡以后，军政各派争权夺利，初则造成清室复辟，民国中断；继则造成南北分裂，各立政府。南北两政府或战或和，而内部政争亦不已。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中国始大体暂告统一。

府院之争与清室复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副总统黎元洪于次日继大总统位。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下令于8月1日恢复国会。新政府初时颇有新气象：7月6日下令废除将军、巡按使，将各省将军改称督理军务长官，简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7月8日下令废止〈报刊条例〉，允许新闻自由；同时废除旧公文程式，实行新公文程式¹。在权力分配方面，护国军中的实力派多任督军，阁员人选则多原进步党人及原国民党人。恢复后的国会，原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原国民党改组为宪政商榷会，原进步党改组为宪法研究会。

黎元洪出身新军协统（旅长），非袁世凯嫡系，能任副总统，并继任大总统，系出于风云际会。段祺瑞出身新军统制（师长），又为袁世凯嫡系，段在黎下任国务总理，并不尊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尤为跋扈；于是府院之间，龃龉时生。国务院「发一令而总统不知其意，用一人而总统不知其来历，总统偶问一、二语，院秘书长辄以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不必多开口为答」。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以此辞职，8月1日由丁世峰继任。丁为缓和府院冲突，制定了〈府院办事手续〉。时原进步党人孙洪伊出任内务总长，孙思想较激进，政见与

¹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45-54。

宪政商榷会接近，认为各省事务为内务总长的职权，不容徐树铮插手。1916年6、7、8月间，广东发生李烈钧部与龙济光部冲突。李出身旧国民党，护国战争期间率领滇军两师在广东作战。龙济光原为广东将军，讨袁战争后期虽响应护国军宣布独立，然立场不定，仍迫害参与护国人士。袁死黎继以后，龙济光的将军之职及兼巡按使之职先后于6月30日、7月6日被免除，李烈钧部与龙济光部的冲突并未停止。直到8月17日，李烈钧在各方调解下，始通电离开广东（后转上海）。在李、龙冲突期间，孙洪伊主调停，徐树铮则要求黎元洪下令讨李。黎元洪及国会中之商榷系（原国民党）袒孙，段祺瑞及研究系（原进步党）袒徐。徐复要求黎元洪免孙之职，黎拒绝。结果孙、徐皆去职（11月20日），国务院秘书长由张国淦代理，孙则恢复国会议员资格。孙复任议员后，利用国会抵制段祺瑞，段派军警指孙阴谋不法，搜查孙宅，迫孙逃往南京（江苏督军冯国璋驻地，冯属直系）。1917年2月，段唆使安徽督军张勋逼黎元洪撤换秘书长，结果丁世峰辞职，改由夏寿康继任。丁世峰辞秘书长职后，恢复国会议员资格，亦利用国会与段斗争²。

府院冲突，日益激化，到1917年5、6月间，又因对德参战案引发政潮。原来自1914年7月欧战发生后，中国曾宣布局外中立。至1917年2月，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政策，对来往商船可以随意攻击，中立各国咸表愤慨。美国首先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劝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立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对美国的劝告极为动心，欲乘此向日本借款购械组参战军，以扩充皖系势力。日本在大战爆发之初，原反对中国参战。此时既已在山东战败德军，继承德国在山东利权，又因二十一条之签订，使在华利益获得保障，乃支持中国参战，俾扩张对中国的影响力。段祺瑞第一步采取的措施为实行对德绝交。黎元洪对此事态度慎重，段以辞职相要挟，始将绝交案交付国会讨论，参众两院分别于3月10、11日通过。3月14日，黎元洪宣布对德绝交。其后，段祺瑞一面于4月25日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为参战案造势，一面于5月7日向众院提参战案。此期间，孙中山受德国运动，

²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57-59；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史学汇刊》7期，页69-70；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5期，页257-260。李、龙冲突事，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46-258有关记载。龙解除广东将军及兼巡按使兼职事，见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表》，页417。

并虑段氏假参战之名与日本相结，出版《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主张中国「维持严正之中立」，又致书参众两院请反对参战案，认为中国参战将引起国民盲目排外；参战若与土耳其作战（土耳其与德、奥同盟），且必引起国内回教徒叛离。当时国会中研究系之议员及部分商榷系之议员虽赞同参战，总统黎元洪及另一部分商榷系之议员则反对参战。5月10日众院全院委员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为了造势，发动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千余人在众院外麇集，公民代表威胁议长：「今日必须通过宣战案，方许出去。」并有公民团人士以砖瓦乱掷议员。段祺瑞虽下令将公民团驱散，参战案讨论不得不中止。5月11日，阁员纷纷辞职，段祺瑞则继续促请众院讨论参战案。5月19日，众院通过改组内阁案，段则唆使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向督军团表示，临时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遂于5月23日免段祺瑞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代国务总理，并于28日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但李未就职³。

段祺瑞被免职后，各省督军、省长纷起声援。5月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与中央脱离关系。接着，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山西等省督军、省长，均先后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督军团的首领安徽督军张勋未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初以「十三省区联合会」的名义，要求黎元洪辞职，继乃表示愿任调停之责。黎氏乃于6月1日令张勋赴京共商国事。「十三省区联合会」系各省督军为商讨国事而组合，始于袁氏帝制末期。江苏将军冯国璋于1916年5月15日邀集未独立各省代表二十余人，讨论袁氏去留问题，无结果而散。鉴于当时反袁势力迫袁退位，参与会议的各省代表有将大政归还清室之议，但未为清室接受。袁死后，安徽督军张勋于6月9日召集北方七省代表在徐州集会，决定组「七省攻守同盟」，相约遇事筹商，对国家前途，采取同一态度，众推张勋为领袖，是为督军团的由来。9月21日张勋复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表面为反对商榷会系阁员、反对国会，实则相机推动拥戴宣统复辟。其后1917年1月9日第三次徐

³ 前引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页260-263；前引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页70-76；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59-68。

州会议，1917年5月23日第四次徐州会议，讨论方向略同。张勋既奉黎元洪之命调停时局，乃于6月7日率兵五千北上，8日抵天津，致电黎氏，提出解散国会、段祺瑞复职等，为调停之条件。黎不得已，允其所请。兼代国务总理伍廷芳以解散国会事属违宪，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黎乃于6月12日命步军统领江朝宗代国务总理，副署解散国会令，并于次日发布。6月14日，张勋偕同尚未就职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及戊戌变法主导人物康有为由津至京，各省督军先后通电取消独立。6月24日，李经羲就国务总理职⁴。看来张勋调解时局成功，实则私下积极部署拥宣统复辟。

康有为是复辟的文臣，张勋是复辟的武将，二人皆在民国建立后怀念旧主。康有为到京后，连日进谒清宫，并拉拢遗老，安排一切。6月30日晚12时，张勋在北京私宅约集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等说明复辟计划，嘱开城放定武军入，王等不敢反对。计既定，乃各易朝服，于7月1日晨3时，由张勋率同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等数十人同入清宫，奏请宣统复位，并通告复辟，将民国6年（1917）7月1日改为宣统9年5月13日（阴历）。在为宣统皇帝准备好的一连串上谕中，仍定国家为大清帝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任命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北京各地，复悬挂龙旗。7月1日晨7时，张勋命梁鼎芬等入总统府，请黎总统「奉还大政」，黎严词拒绝。7月2日，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一方面电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一方面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另并通电各省出师讨伐张勋。时段祺瑞在天津，得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第三师师长曹锟及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之助，组讨逆军，自称讨逆军总司令，誓师马厂，进攻北京。及得黎令，段即通电就国务总理职，在津设立办公处⁵。

值得注意的是，段祺瑞不待恢复国务总理之职，即通电讨张勋，似段与张之间矛盾颇深。张为督军团之长，一向支持段。第二、三、

⁴ 前引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页73，76-79；第三、第四次徐州会议，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页278，301。

⁵ 白蕉，〈宣统复辟〉，《人文月刊》6卷7期，页3-18。

四次徐州会议，段均派有代表参加；段对张勋率督军团酝酿复辟之事，自有所知。段所以未予制止，据一般了解，是段及其左右「欲借手各地督军代表会，推倒总统，解散国会」；假张勋之手以复辟驱黎，再以拥护共和之名打倒张勋，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力。张对段似亦有所防备，虽曾向黎表示，以解散国会、复段之职为调停时局之条件，但黎解散国会后，张即忙着复辟部署，未再进行段复职之事。更奇怪的是：张勋一手导演的清帝封官封爵，竟无段祺瑞之名。无论段是否准备在张勋复辟后再讨张、抑张在复辟措施中忽视段之地位，段一闻张勋复辟即起而讨张，乃是事实。在张勋酝酿复辟前后，另一个矛盾是张勋与日本的关系。张勋阴谋复辟之初，曾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时日本正支持善耆及巴布札布的满蒙独立运动，乃与张约定，一俟巴布札布率蒙军打到张家口，张勋即率兵以防御京师为名北上，拥清帝复辟。1916年9月，巴布札布战死，日本与张勋互相利用的机会消失，乃转而集全力支持段祺瑞。段被免职到达天津后，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的亲信西原龟三坐镇天津，协助段祺瑞。7月1-6日间，段先后以山西省官钱局纸币、开滦煤矿股票作抵押，向日本贷款三百万元。西原直至段内阁正式成立后，才于8月3日回到东京。复辟酝酿中的再一个矛盾是张勋与徐世昌的关系。徐欲寻求日本支持，于复辟事成后任辅政王，张勋闻讯对徐之夺权阴谋有所防范，日本亦不真心支持复辟，徐寻求日本支持之事乃止。复辟运动的内外矛盾重重，督军团大体是利用张勋驱黎，对复辟未必真心支持。至于各政团，研究系、交通系皆支持段，孙中山及商榷系更反对复辟，故复辟之事一起，即四面楚歌，报纸出现一片反对声。段祺瑞派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錕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7月5日，西路讨逆军由京汉路集中卢沟桥，东路讨逆军由京津路进逼黄村，南苑的飞机也向丰台的张勋部队和北京的紫禁城投弹。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告代行大总统职。至7月12日，京城内外的张勋部队全部瓦解，张勋避居荷兰使馆，康有为避居美国使馆，复辟结束⁶。7月14日，段祺瑞到京视事，并亲赴日本使馆迎黎元洪，黎回私宅后，即通电辞职。8月1日，代总统冯国璋抵京办公。

⁶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69-87；白蕉，〈宣统复辟〉，《人文月刊》6卷6期，页26-29；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四节〈清室复辟〉，页115-118，132-138。

广州护法政府之成立及南北和战

在府院之争及复辟前后，孙中山在上海密切注意时局。段祺瑞要求解散国会不成遭免职后，倪嗣冲于5月29日通电脱离中央。孙中山于6月6日、8日先后通电西南各省讨逆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与黎有旧）派舰欲接黎元洪南下号召讨逆，黎不允；程璧光于6月9日抵上海与孙中山商大计。6月13日国会解散，孙中山于14日派胡汉民南下广州联络粤督陈炳焜及省长朱庆澜，使出面护法。孙得德国之资助（时孙反对参战），交程璧光三十万元，作为海军护法经费。7月1日复辟事起，孙一面电请黎元洪及国会议员南下，一面电桂、粤、湘、滇、黔、川六省，主张另建临时政府。适广东省长朱庆澜及省议会赞同护法，孙乃于7月8日离沪赴粤。7月19日孙至广州时，复辟虽已平，但因国会未复，孙继续宣扬护法，并促议员南下。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上海宣布拥护约法，要求恢复国会、惩办祸首。7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宣布独立，率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加入护法军。当时中国只有三支舰队，第一舰队驻上海，为主力，拥有海圻、海筹、海容（以上为二千吨以上的巡洋舰）、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福安、豫昌等舰，约万余吨。第二舰队主要由炮艇组成，主要在长江中游巡弋。因此海军绝大部分都投入护法军。8月5日，海军护法舰队全部抵黄埔，以海珠为海军总司令部⁷。

护法运动，以被解散的国会为基本筹码。到1917年8月中旬，两院议员到广州者达一百五十余人。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选林森为议长、吴景濂为副议长。31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⁸。讽刺的是，护法政府，并不依临时约法建立新政府。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为大元帅；9月2日选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选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张开儒（原任

⁷ 前引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页80-87；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49-50。

⁸ 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页14-16。

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赞同护法）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9月11日，孙中山特任林葆懌为海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章炳麟为秘书长。9月20日，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⁹。当时广州护法政府虽然成立，在对外关系上与北京政府仍然一致。1917年7月15日段祺瑞正式组阁后，8月13日内阁决议对德、奥宣战，因已无国会反对，次日大总统即布告对德、奥宣战。广州护法政府于9月18日将对德、奥宣战案提非常国会，非常国会于9月22日认可，军政府于9月26日对德、奥宣战¹⁰。

南北两政府对外虽取一致态度，彼此争执殊甚；且南北两政府的内部，亦难整合。广州护法政府，唐绍仪、伍廷芳、程璧光等皆不就总长职，廖仲恺代财政（唐绍仪）、居正代内务（孙洪伊）、林森代交通（胡汉民）、徐谦代秘书长（章炳麟）。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始终承认冯国璋代理总统之合法地位，不受元帅新职。国会议员虽多属宪政商榷会（旧国民党人），立场亦不一致。宪政商榷会当时分为三派：政学会派结合西南军人，主与北方和平相处；民友社派支持孙中山，主与北方对抗；益友社派人数最多，依违两者之间。国会中另有新新俱乐部派，为新补之议员，态度略同益友社。孙中山排除万难，布置护法军事，兵分三路：一路为滇黔军，自护国之役时即在四川；一路为援闽军，由广东省长朱庆澜之警卫军二十营组成，交陈炯明统带（陈于1918年8月攻取闽南潭州，孙中山已于5月离粤）；一路为援湘军，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总司令（于1917年11月18日克长沙）。此期间，两广军政大权在桂系首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之手，陆仍听命于北京政府。广东省长朱庆澜以倾向孙中山而易以李耀汉（1917年8月31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因有支持护法之嫌而易以莫荣新（1917年10月2日），二人皆由北京政府任命。莫荣新任粤督后，对护法活动百般阻挠。孙中山派员招募军队，莫指为土匪而加以逮捕或杀害。孙中山欲以海军讨伐莫荣新，海军总长程璧光不敢对桂系开衅。1918年1月3日晚，孙登同安、豫章两舰，向督军署开炮，时陈炯明所部援闽军尚在省垣（至1月12日始誓师援闽），慑于桂系兵力，不敢响应。孙炮轰督军署后，莫暂表收敛，曾亲至大元

⁹ 同上，页16-18。

¹⁰ 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5期，页267。

帅府谢罪，并月拨五万元为大元帅府经费。其后故态复萌，2月26日，暗杀海军总长程璧光；5月11日，拘囚陆军总长张开儒、枪杀代理陆军次长崔文藻。另一方面，自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始，陆荣廷、唐继尧等即不赞同孙中山以武力与北方对抗，酝酿发起西南各省联合会议，谋与北方议和。1918年1月20日联合会议在广东督军署开会，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莫荣新等邀孙中山开会，拟将大元帅制改为多总裁制，孙不赞同。4月10日，罗家衡等在国会非常会议提出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元帅制改为多总裁制，至5月4日获通过。孙中山当日通电辞职。5月20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

7月5日，七总裁制之军政府宣告成立。8月15日、24日，陆荣廷、唐继尧先后通电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8月21日岑就职。孙中山被排挤后，于5月21日乘船离粤，26日经汕头时赴陈炯明所部攻闽前线巡视。6月20日抵日本京都，6月23日自神户启程返国，25日抵上海¹¹。

孙中山自1917年9月1日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至1918年5月21日因军政府改组离粤，先后仅八个多月，困难重重，但在护法军事方面，则仍有所开展。有所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段祺瑞于1917年7月讨平复辟后，以旧国会中反对势力太大，欲重新选举新国会，其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今国家新造，应仿照辛亥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复位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尽管孙中山于10月3日通电指斥重开参议院、另选国会，违反约法，到11月10日，由各省（西南各省未派）选派参议员所组之临时参议院照常开幕。至1918年2月临时参议院将国会组织法等修正公布，预定新国会于8月选举成立，追随孙中山护法的国会议员只好继续在广州开会。其二、孙中山既南下护法，段祺瑞于对德宣战后得日本所助之饷械甚充，乃欲藉武力统一南北，其用兵计划，由四川攻云贵，由湖南攻两广。段以湖南督军谭延闿倾向护法，于1917年8月6日以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湘督，改任谭为湖南省长。

¹¹ 李守孔，〈国父护法与广州军政府之成立〉，《中华学报》4卷2期，页192-202；前引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页91-98。

时川军刘存厚击败在川黔军，黔军首领、四川督军戴戡被击毙。滇军来援，亦被击退。段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日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在这种情形下，西南诸省不得不力谋自保。1917年9月1日，广州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9月18日谭延闿部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宣布赞同护法。10月3日，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在南宁开军事会议，组织援湘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孙中山于10月21日加以任命。时傅良佐派军南下，于10月下旬连克宝庆、衡山，但10月23日，江苏督军李纯（直系），承大总统冯国璋（直系首领）之意，通电主和。11月14日，傅良佐的前敌将领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亦通电主和。援湘军乘机北上，于11月17日克衡阳，18日克长沙。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所带北洋军，在川亦备受川、滇、黔等军攻击（至12月3日，重庆为滇黔护法军收复）；广州军政府的援闽军（陈炯明）复整装待发。段祺瑞以武力统一政策失败，于11月15日辞职¹²。

冯国璋的谋和不过是对皖系主战的抵制；另一方面，拥段的军人仍积极作武力平南的部署。1917年12月3日，直督曹錕、鲁督张怀芝，暨奉、黑、陕、晋、豫、闽、浙诸省，以及热、察、绥特别区和上海护军使代表，在天津开会，指斥主和派是北洋系的汉奸，并决定对西南开战。冯国璋在此压力下，12月16日发布命令，派曹錕为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分别率师入湖北、江西（18日任段祺瑞为参战事务处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1918年1月30日，又命曹錕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进兵湖南。护法军方面，1917年12月1日，湖北驻荆州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宣告自主，12月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宣告自主，12月21日郭坚在陕西凤翔宣告独立，1918年1月4日王天纵在河南宣告自主，并与石星川、黎天才、郭坚共组联军，与西南各省相呼应。另一方面，滇黔军于1917年12月3日攻克重庆。援湘军知南北调和渺茫，遂于1918年1月23日进攻岳州，并于1月27日占领。此期间，段派军人复鼓吹以武力解决西南问题。冯国璋见情势恶劣，拟往南京与苏督李纯等会商，于1月26日带幕僚及部队一旅乘津浦路南下，但至蚌埠即为皖督倪嗣

¹² 前引李守孔，〈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页98-102；前引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页268-273；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106-112。

冲截回。2月7日，北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自天津南下，设总司令部于汉口。但经江苏溯江西上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受苏督李纯的影响，于2月14日在湖北广济武穴镇通电主和。川省督军刘存厚，在滇军压力下，亦已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为增加作战声势，徐树铮奉段祺瑞命，召奉军入关。3月12日，张作霖、徐树铮二人联名宣布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自兼总司令、徐为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权。3月25日奉军两师开至滦州（同日，驻秦皇岛之奉军并劫去政府由日本运到新购之步枪二万七千余枝）。在此前后，曹锟部将吴佩孚于3月17日克岳州，次日曹锟联合十九省区督军、都统等电请段祺瑞组阁，冯乃于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吴佩孚的攻势颇为凌厉，3月26日陷长沙（护法军方面，陈炯明的援闽军于4月10日攻至粤闽边境潮州等地）。但张怀芝在湖南东部作战并不顺利，不愿孤军深入；曹锟与冯国璋有约，作战以湘省为限，而长沙为吴佩孚克复后，湘督之职不给吴，而于3月27日授予张敬尧（皖系），颇为曹、吴所不满。4月5日，曹锟电冯国璋，请免去两湖宣抚使之职；4月13日，吴佩孚以疲劳为由，要求将部队调回岳州。段祺瑞为鼓舞士气，于4月中旬往武汉犒师，4月24日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促曹锟、张怀芝及鄂督王占元（直系）等继续作战，归途并安抚赣督陈光远（直系）、苏督李纯（直系），但段此次南巡作用不大。吴佩孚于4月20日克衡山、23日占衡阳后，即屯兵不前；曹锟于5月29日称病自岳州回天津；张怀芝于6月8日自江西回济南。8月7日、21日、26日，吴佩孚连电攻击段祺瑞的亲日政策，呼吁息争御侮。曹、吴的主和行动，自是出于冯国璋的授意，吴所以攻击段亲日，乃因段利用参战之名，向日本大肆借款，总计两亿元以上。对西南用兵，至少用去二千五百万元¹³。

吴佩孚通电息争御侮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失败。1918年6、7月间，北京政府已部署新国会的选举，新国会嗣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冯国璋因代总统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无意恋栈，不再竞争选举。9月4日，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职，

¹³ 前引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页273-27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344-395；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113-127。

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¹⁴。在北方，冯、段之间的主和、主战之争告一段落。徐世昌有意续与南方议和。此时的南方，军政府已于5月改组，主战的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之职，于6月抵上海。改组后的军政府，由岑春煊主导，谋与北方议和。于是南北局势暂趋缓和。是年11月，南北双方同意派代表举行和会，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1919年2月20日，会议在上海正式开始，唐绍仪要求：前总统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的解散国会命令无效、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军政府一切命令有效、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下一次国会选举时为止，其他方面讨论的议题有陕西停战及中日借款购械等问题，北京政府无法接受。嗣以五四运动发生，徐世昌于5月21日下令停止和会。此后南北双方虽表示要恢复会议，事实上未恢复¹⁵。

皖系军人操持下的北方政局

袁世凯死后，北方军人先后出现五个派系：（1）皖系：首领段祺瑞，安徽合肥人，袁世凯的旧部。袁世凯做总统时期段曾任陆军总长。黎元洪、冯国璋做总统时期，曾三任国务总理，藉对德参战之名，练有参战军六万余人。1920年以前，皖系地盘在陕西、内外蒙古、北京，津浦路沿线之直隶、山东、安徽，以及浙江等地。在外交上依附日本；对南方反对势力，主张以武力解决。（2）直系：先后任直系领袖者为冯国璋和曹锟，皆直隶人，皆为袁世凯的旧部。袁世凯当总统时期，冯国璋任江苏将军，袁死后被选为副总统。张勋复辟后代行总统职权，至1918年10月辞职，次年病逝，曹锟继为直系领袖。曹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为第三师师长，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得任直隶督军，兼直鲁豫巡阅使，其第三师师长之职由吴佩孚接任。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直系势力大张，有兵力约25万人。其势力在沿京汉线的直隶、河南、湖北，以及自湖北沿长江以下的江西和江苏。在外交上依附英、美；对南方之反对势力，主张以谈判方法解决。（3）奉系：首领张作霖，奉天海城人，马贼出身。袁世凯谋称帝时期，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嗣署奉天将军。袁死后，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吉林、黑龙江二省渐为张

¹⁴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352-404。

¹⁵ 王树槐，〈国会问题与南北和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1编，民初政治（三），页158-163。

所控制。1924 年有兵力 17 万人。其后在关内发展势力，控有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至 1925 年 9 月，兵力增至 35 万人。奉系在外交上依附日本。皖系势盛时，支持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直系势盛时，则与广东军政府联合，谋夹击直系。(4) 冯系：首领冯玉祥，安徽人，原属直系，1924 年直奉战争时倒戈，自组国民军，与广东的革命势力接近。嗣后其部队驻北京附近、察哈尔、绥远、河南、陕西，1925 年 9 月有兵力 5 万人。在外交上接近苏俄。(5) 阎系：首领阎锡山，山西人。民国建立后，一直为山西军政首长。原无明显派系，袁盛时附袁，皖盛时附皖，直盛时附直。1924 年直系败后，与冯系相结，应付直奉联军，当时有兵力 8 万人。至 1927 年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有兵力二十余万人¹⁶。

上述各军系，最初操持北京政局的是皖系。皖系除军事势力外，在财政上靠交通系，在国会方面靠安福系。军事方面，中国于 1917 年 8 月 14 日宣布参加欧战后，段祺瑞于 12 月 18 日任参战事务处督办。1918 年 11 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时欧战已结束。1919 年 4 月，参战事务处参谋长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条陈，藉筹防蒙边为名，编练西北边防军五旅。徐于 6 月 13 日任西北筹边使，6 月 24 日起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是年 7 月 20 日，参战事务处改为边防事务处，段祺瑞改任边防事务处督办。在财政方面，皖系受新旧交通系的支持。旧交通系始于梁士诒，梁于清末曾任铁路总局局长，民初袁世凯当政时先后任交通银行总理、税务处督办。交通系之骨干尚有曾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周自齐、兼代交通总长朱启钤、交通次长叶恭绰等。嗣梁士诒因参加帝制运动下台，交通方面的机构落入曹汝霖之手。曹曾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周围的一些人被视为新交通系，重要干部有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驻日公使章宗祥、京汉铁路局局长曾毓隽、京绥铁路局局长丁士源等。皖系当政后，新旧交通系均依附皖系。政治方面，段祺瑞于 1917 年 11 月成立临时参议院、筹划重新选举国会时，约集一部分接近皖系的议员在安福胡同经常聚会，并由徐树铮出面组安福俱乐部。新国会选举时，俱乐部人各回本省替皖系助选，当选的亲皖系议员被视为安福系。新当选的议员，安福系占 70%

¹⁶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 184-187。

以上，其他分属新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研究系以梁启超为中心，因组织宪法研究会而得名。此新选举的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1918年8月两院议长、副议长选举，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旧交通系的梁士诒、朱启钤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安福国会因代总统冯国璋代理期满，于9月4日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段祺瑞原欲支持曹锟，俾曹支持其武力统一政策，徐世昌与旧交通系则拟推举广州军政府方面的人，以利南北统一，结果未能选出¹⁷。

徐世昌虽为安福国会选出，就任总统后，在政策和人事上皆有一套布局。徐初以自己的亲信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派朱启钤为总代表与广州军政府议和（议和无成就）。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因五四运动风潮辞职，国务总理由龚心湛代理，到9月24日，由靳云鹏出任。靳云鹏与徐树铮为段祺瑞的左右手，但靳不参加徐所主持的安福系，力图与直、奉两系和好，以争取对内阁的支持。徐世昌乘机拉拢，使与钱能训组己未俱乐部（己未为1919年），结合了百余议员，俾与徐树铮对抗。徐树铮在段祺瑞的庇护下，初于1918年6月为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关内奉军司令部（徐任副司令）杀死直系主和派干将陆建章，引起直系的侧目；继于1919年6月任西北筹边使，经营蒙疆，势力及于东北呼伦贝尔，更引起奉系的反感。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后，直督曹锟继为直系首领，在吴佩孚的协助下，积极巩固直系（直、苏、鄂、赣、豫），结合奉系（奉、吉、黑），并与奉、粤结三角同盟，在中央则利用徐世昌、靳云鹏抵制徐树铮。吴佩孚自1918年8月以后，到1920年2月间，不断要求自衡阳撤防北归，嗣广东方面给予开拔费60万元，吴佩孚乃在北京参陆办公处的勉强同意下，于5月20日正式撤防。吴于5月31日到汉口，6月7日到郑州，不断发电指斥徐树铮及安福系祸国殃民，并表示即日挥戈北指。另一方面，吴佩孚撤防后，在湖南南部的湘军立即北进，湘人亦起而驱逐湘督张敬尧。6月11日张逃出长沙，其第七师残部后为鄂督王占元收编。6月中旬，段祺瑞将徐树铮自库伦调回，部署对直、奉用兵。6月22日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在保定会谈，签署致北京政府

¹⁷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130-152；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1977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页75-77。

最后通牒，包括撤销边防军、惩办徐树铮、解散安福系等。7月4日，徐世昌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次日，段祺瑞则令徐树铮照常办公。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阁员及军政首要百余人开会，决定请大总统褫夺曹、吴等人官职，并于9日迫徐世昌盖印，发表讨伐曹、吴通电。7月9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设总司令部，命第三师陈文运部开赴京津线廊房，第一师曲同丰部及第九、十三、十五师开赴京汉线长辛店、卢沟桥、琉璃河一线。直系方面，曹锟于7月9日在天津成立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决定分兵两路应敌：派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为西路总指挥，占据高碑店；派第四混成旅旅长曹瑛及奉军旅长李景林为东路正、副总指挥，占据杨村。7月10日，段祺瑞下令总攻击，于是直皖战争爆发¹⁸。

直皖战争，皖系调用四万军队，直系、奉系各调用二万军队。西路为主战场，沿京汉线；东路沿京津线，徐树铮于7月11日亲至廊房指挥。战争一开始，皖军占优势。至7月17日，吴佩孚率军绕道包围涿州，京汉线皖军大败。7月20日，京津线皖军亦败。另一方面，7月上旬自宜昌、沙市调驻汉口，拟攻直系后路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于7月16日为鄂督王占元邀宴扣留，因此不能发生作用。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边防督办职，并亲自提出惩办徐树铮、解散其所统军队、解散安福国会等，作为议和条件。段初表示不离北京，任凭处置，继移住天津租界。7月23、24日，直、奉两军陆续进入北京，段祺瑞的边防军和徐树铮的西北军被遣散。靳云鹏于直皖战争前夕一度辞职后，8月9日又出而组阁。8月20日，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使。直皖战争期间，英、美等国为直系助威，日本、义大利等国同情皖系，但均未直接参战¹⁹。

直系军人操持下的北方政局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军人共同操持北京政治；1920年8月9日，由靳云鹏组阁。靳云鹏内阁，排挤了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已于五四运动中垮台），交通、财政两长皆入直系之手；地盘方面，直系齐

¹⁸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153-157，177-198。

¹⁹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199-207。

變元任苏督、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此种布局颇引起奉系张作霖、旧交通系梁士诒的不满，于是梁士诒乃联合奉系、皖系和广州军政府以制直系，首先于1921年12月17日逼使靳云鹏辞职，嗣在张作霖的推荐下，到12月24日由梁士诒组阁。梁内阁组成后，撤消对皖系要人的通缉（因直皖战败），起用新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輿，并紧缩吴佩孚的军饷。时以华盛顿会议日本答应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梁士诒答应向日本借款赎回此路。1922年1月，吴佩孚发电向梁阁索饷、抨击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并联合苏、赣、鄂、鲁、豫、陕等六省直系督军及省长电请徐世昌罢梁。1月25日梁请假出京，在位仅三十天。为共同对抗直系，1921年12月22日皖系要人徐树铮抵广州联络。1922年1月18日，徐由戴季陶、蒋介石陪同赴桂林谒孙中山，商军事合作。是年2月12日，张作霖派李梦庚到桂林，与孙中山洽联合出兵事；孙中山派伍朝枢赴奉天报聘。于是孙、段、张反直三角同盟形成²⁰。

直、奉对抗之势形成前后，直鲁豫巡阅使曹錕初不欲诉于战争，于1922年2月6日在保定召开会议，决定与张作霖协商，曾先后派王承斌出关商谈三次；张作霖提出梁士诒销假复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等条件。3月11日曹錕再于保定召开会议，决定一战，乃全权委吴佩孚备战。4月19日，张作霖通电主张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属于皖系的浙督卢永祥、皖督张文生、闽督李厚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立即通电响应。另一方面，直系将领则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谓「张作霖不死，大盗不止」。到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此次直奉战争，号称孙、段、张三角同盟共抗直系，但孙、段均未发生实质作用。孙中山曾在广州组北伐军，出师韶关，但前面受阻于湘军，后方陈炯明不予支持，迫孙不得不返回广州（陈于直奉战争结束后月余叛离孙中山）。驻沪海军表示支持直系，牵制了属于皖系的浙督卢永祥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直系冯玉祥部自陕西入河南，遏阻了原欲响应奉系的豫督赵倜。奉军只好独力作战。此次战争，直军参战者约八万人，总部设于保定，吴佩孚任总司令，兵分中、东、西三路：中路由霸县攻信安，东路由大城攻白津桥，西路由琉璃河、良乡攻长辛店。奉军参

²⁰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页229-230；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10-214。

战者约十万人，总部设在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在津浦线，由杨柳青攻信安、霸县；西路在京汉线，由长辛店南下攻固安、永清。战数日，奉军败。5月5日，吴佩孚占丰台，东路奉军自军粮城撤退，西路奉军多被缴械，战斗停止。5月10日，徐世昌下令将张作霖免职查办，并撤消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之职。6月3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6月17日，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在秦皇岛英舰上签订和约，以山海关为界划分驻兵范围，并让出热、察两特别区。此次战争，日本方面一度考虑援张，因顾及英、美方面借机援吴，作罢²¹。

直奉战后，徐世昌命将张作霖免职查办之日，滞留北方的旧国会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分别向吴佩孚、曹锟进言，要求恢复旧国会。此事酝酿在直奉战争前夕，目的在驱逐由安福国会选出之徐世昌（徐不与直系合作），并使孙中山（与段、张结盟）在广州的护法政府失去凭依。5月14日，吴佩孚通电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之意见，直系各军政首长多赞同恢复旧国会、黎元洪复总统位；皖系各军政首长暨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则反对；奉系新败，未表示意见。5月24日，部分旧国会议员在天津成立筹备处，6月1日宣布即日行使职权，并呼吁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次日，徐世昌辞职出京，将总统职务交国务院摄行。同日，曹锟、吴佩孚等电请黎元洪复职。6月11日，黎元洪由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广州军政府停顿。8月1日，恢复之旧国会在北京开会。到1923年2月，孙中山再于广州建军政府时，旧国会议员即不再前往。当时南北两政府复处于对立状态，黎元洪主和平统一，于1923年3月间欲以孙为全国铁道督办未果，5月间张绍曾内阁承曹、吴之意，欲下令讨伐广东，亦为黎拒绝。当时国会内部有拥黎、拥曹两大派，拥曹派主驱黎选曹为总统，拥黎派主先制宪后选总统。6月6日，张内阁以总统借拨制宪经费案违法，辞职。6月7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等唆使军警官佐五百余人向总统府索饷（内阁已辞）。6月8日，北京天安门前有公民团等散发诋毁黎元洪之传单。6

²¹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页230-234；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14-215。

月9日，冯玉祥、王怀庆等迫黎交出政权。6月10日、11日，冯玉祥、王怀庆部军官连日向黎索饷，并有公民团包围黎宅。6月12日，冯、王辞职。黎在此逼迫下，于13日离北京走天津，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截黎于天津车站，迫将总统印玺交出、迫通电向国会辞职、迫通电由国务院摄政，然后放行。14日阁员高凌霨等摄总统职。15日，部分国会议员在皖、奉、粤各方运动下，离京赴沪，至7月14日有二百余人在上海开会。留京开会和赴沪开会之议员，皆有金钱运动其间。10月5日的总统选举，贿款每人五千元至一万元不等，曹锟以480票当选。10月10日，曹锟赴北京就大总统职²²。

在直系夺取中央统治权之际，反直的阵线逐渐部署完成。1922年9月，段祺瑞派徐树铮携款南下福建，与孙中山派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合作，将由皖系转为直系的闽督李厚基自福州驱逐，推原属皖系的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为福建军总司令、国民党人林森为省长。1923年6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曹锟贿选总统期间，浙督卢永祥供段一百万元收买国会议员，自北京至上海的旅费三百元，每月生活费三百元。约在同时，段祺瑞、孙中山与张作霖合资，在上海办国闻通讯社，从事反直宣传。曹锟当选总统后，段祺瑞于10月8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抨击曹锟。孙中山于10月9日下令讨伐曹锟、通缉选曹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进行。10月13日，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姜登选、卢永祥的代表邓汉祥等在上海联合通电讨曹。此期间，孙中山的信使汪精卫、段祺瑞的信使吴光新等，均来往于孙、段、张之间。在孙、段、张联盟日紧之际，吴佩孚一度欲联段制张，段不为所动。1924年3月13日段祺瑞六十岁生日，拥直、反直各派，皆争相表示祝贺。最后仍然是孙、段、张联合反直。1924年8月，直系的苏督齐燮元谋与闽督孙传芳夹击浙督卢永祥。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浙督卢永祥通电讨伐曹锟。4日，张作霖通电助卢，并宣言讨伐曹、吴。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声讨曹、吴。战事发生后，孙中山令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谭延闿转入江西，程潜率军入湖南，己则于9月12日赴韶关督师，10月中旬复在云南、四川方面有所布置。时以英国支持东

²² 参考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629-754有关各日记载。

江陈炯明及广州商团在后方掣肘，孙中山一度电令蒋介石放弃广州，率黄埔学生赴韶关合力北伐，但蒋终于10月15日将商团击溃。孙之北伐军曾克江西崇义（10月5日），余无多进展。江浙战场方面，部分浙军入江苏作战，部分浙军应付闽督孙传芳的攻击。孙传芳于9月17日入浙后，卢永祥于次日逃上海，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会合，至10月13日兵败走日本，后转往奉天²³。此次反直战争的主战场是直隶、热河间长城内外奉军与直军的战争。

奉军自1922年被直军战败之后，整军经武，在军事上大加改革。1922年7月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由孙烈臣任总监，张作相、姜登选任副总监，张学良为参谋长。成立东北陆军讲武堂，以郭松龄（陆军大学毕业）等为教官。将军队编为三师二十七混成旅。另并扩充海、空军，海军有舰21艘，空军有飞机三百余架。对兵工厂也加以扩建，以杨宇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总监、韩麟春（制炮专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厂长，日产子弹40万发、月产一三式步枪一千枝、年产十二、十五、七十五生炮三百门²⁴。江浙战争爆发后，奉军于1924年9月15日分六军出动：总司令张作霖在锦州设大本营，第一、三两军攻山海关，第一军军长为姜登选，第三军军长为张学良；第二军由锦州攻朝阳，军长李景林；第六军由开鲁攻赤峰，军长许兰洲；第四、五两军为预备队，军长分别为张作相、吴俊升。以上六军共约12万人，另空军由张学良指挥，海军由沈鸿烈指挥。曹锟察知奉军来势汹汹，急召吴佩孚自洛阳赴京，摄行陆海军大元帅，主持对奉军事。吴佩孚于9月18日在北京组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主力初分为三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防山海关；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防朝阳；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攻开鲁。以上三军约十万人。嗣以山海关战事激烈，曹锟于9月27日组第四军，以曹瑛为总司令，但其部多未及参加作战。另渤海舰队重要舰艇七、八艘由温树德指挥，空军有飞机七十多架，由航空司令敖景文指挥。战争发生后，奉军第二军于9月22日占朝阳，此路王怀庆的直军处于劣势。奉军第六军于10月6日占赤峰，直军第三军屯兵于古北口一带，

²³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页754-831有关各日记载；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17-225。

²⁴ 卞直甫，〈论张作霖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丛刊》（沈阳），1991年第2期，页98-103。

逗留不进。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战事则非常激烈。10月9日，奉军突破九门口，进入关内；复于10月14日占领石门寨，对山海关和秦皇岛构成威胁。10月16日，吴佩孚、温树德率海军攻葫芦岛，为奉军飞机所败，此后直军反攻九门口、石门寨亦不利，至23日北京发生兵变。北京兵变，主要势力为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居中联络、策动者则为皖系首领段祺瑞、以及亲国民党的教育总长黄郛；黄郛的背后为孙中山，助段祺瑞者为日本。日本曾以一百万日元由三井银行透过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交段祺瑞作为策反冯玉祥之用。战争初起，冯军至古北口时，段遣贾德耀送函给冯，表示不赞同内战，尤望冯能对贿选政府有所自处。黄郛与冯玉祥建立关系在1922年以后，时冯以陆军检阅使名义驻军南苑，在1923-1924年间，时请黄至其军中讲演。冯、黄均不满直系所为，在此次战争爆发前后，即密谋倒直，并联合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编入冯的第三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9月23日调兼京师警备副司令）孙岳等。9月29日，段祺瑞致函黄郛，请劝冯早日发动。奉军占石门寨后，黄郛于10月18日自北京电冯发动，同日段祺瑞代表宋子扬到滦平晤冯玉祥。19日冯在滦平召集部属开会，决定改所部为国民军，由胡景翼（时驻喜峰口）截断京奉路直军联系，冯则率部兼程返北京。22日夜冯军至北京，孙岳开城门相迎。23日，囚曹锟，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领衔主张停战，史称「首都革命」。24日，曹锟被迫宣布停战并免吴佩孚本兼各职。同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第二、三军军长，与吴佩孚展开作战。另决定推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段未至京前由黄郛组摄政内阁，代行总统职权。另并于10月26日，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领衔，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吴佩孚在山海关得知消息，乃将前线指挥权交张福来，己则率部赶抵天津附近，对抗国民军。前线奉军乘势攻下秦皇岛，截断山海关直军退路，山海关一带的直军大部被俘。吴佩孚在天津、北京间的杨村、廊房一带，未能阻挡国民军的攻势。此时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0月25日占领石家庄，使吴无法由京汉路向南撤退（河南）；山东督军郑士琦于11月1日宣告独立，拆毁黄河大桥上的铁轨，使吴无法由津浦路向南撤退。长江苏、赣、鄂

三督虽为直系势力，此时远水救不得近火。吴佩孚不得已，乃于 11 月 3 日率六千名士兵乘兵舰三艘及商船十余艘，由塘沽浮海南下。后经南京、汉口，复屯兵河南洛阳。此次战争，英、美同情直系，日本同情奉系、皖系，各分别给予金钱和武器的援助²⁵。苏俄此时虽援助孙中山，并不支持孙北伐。

国民军系与奉系操持下的北方政局

奉、皖、粤（或张、段、孙）联合讨直，1922 年为第一次，失败；1924 年为第二次，成功。但成功之后，新的权力斗争又开始。曹锟被囚后，于 10 月 31 日任命黄郛代国务总理，11 月 3 日通告辞职，移居南海之延庆楼，并将大总统印送交国务院，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摄阁先后只三周，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冯玉祥完成另一项「首都革命」，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清帝溥仪出宫。此事由冯玉祥提议，黄郛于 11 月 4 日在国务会议中提出，清室优待条款改为：（1）宣统皇帝即日废除皇帝尊号，（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家用五十万元，（3）即日移出宫禁。次日将此决议由京师警卫司令鹿钟麟、直隶籍老革命党人李煜瀛等通知清室，溥仪当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下午三时溥仪及妻妾、太监、宫女等移居乃父载沣之醇王府。是年 11 月 29 日，溥仪由醇王府逃至日本使馆，1925 年 2 月 20 日再由日使馆逃至天津。1931 年 11 月 10 日由日人陪同至东北组满洲国²⁶。

黄郛摄阁期间所完成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将曹锟辞职后的国家最高权力，象征性地转移到段祺瑞身上。1924 年 11 月 9 日、10 日，冯玉祥、张作霖和卢永祥先后到天津晤段祺瑞，对大局及人事有初步商讨。张欲派兵南下，扫除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冯主和平，反对张派兵南下；段以 11 月 10 日直系将领齐燮元（苏督）、萧耀南（鄂督）、孙传芳（闽督）等已通电拥段，不复赞成「武力统一」，遂决定对东南不用兵。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国民军沿京汉线向河南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摄阁已于 11 月 7 日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理（督军改）、

²⁵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 225-228；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 825-838 有关各日记载；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页 247-256；沈云龙，〈黄郛摄阁的前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页 10-23。

²⁶ 沈云龙，〈黄郛摄阁的前后〉，《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页 23-30。

孙岳为河南省长，在张作霖要求下，自国民军手中收回热河。11月15日，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具名，通电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2日，段赴北京，24日就临时执政职，摄政内阁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受邀北上的孙中山并不反对，惟关于善后问题，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并于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先召开有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等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关于此点，已于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中予以表明。段为应合孙之主张，于赴京前一日发表就职通电，说明拟于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三个月内召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但段祺瑞善后会议的构想与孙中山的预备会议并不相同，预备会议是以民众团体为主要成员，善后会议是以反曹、吴各军首领及其代表为主要成员。且孙中山11月17日在上海的谈话中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于就职通电中主张「外崇国信」。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乘船抵天津，12月31日扶病入京，善后会议条例则在12月24日公布，孙要求兼纳人民团体代表而不可得。1925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依据孙中山的意旨，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善后会议于2月1日召开，4月20日结束。其间奉系曾藉口抵制会议的召开，争得张宗昌督鲁、姜登选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会议通过的条例有〈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善后会议期间，段祺瑞于4月13日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条例〉。此期间，尚在实行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揭幕，到会代表二百余人。段祺瑞对这些运动穷于应付。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段政府虽然给予哀荣，但对国民党的社会运动机关不得不予以压制。到4月30日即派军警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全国联合会等五机关封闭²⁷。

1924年10月曹、吴政权结束后，三角同盟加上国民军为四大军政势力。段祺瑞为稳定北方局势，首先摆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影响，依照他的构想，以召开善后会议、组织临时参议院等办法，重建政治秩序。其次在1925年上半年，也应付了两件因外交事件而引起的抗争：一为金佛郎案，一为五卅惨案。金佛郎案发生在1922年7月直

²⁷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30-250；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页278-279，282-290，292-296；李庆西，《段祺瑞与临时执政府时期的政局》，页85-96。

系当政时，中国偿付庚子赔款，向照银行汇率，一次大战后，法国发行纸佛郎，仅值战前金佛郎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 1922 年中国因参战展缓交付赔款五年期满，法国要求比照战前金佛郎之汇率付款，中国需多付八千三百余万两，虽法国愿将此项庚款退回，作为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之用，仍引起中国国会内外的反对，事情遂成悬案。段祺瑞任执政后，为促成关税会议早日召开，于 1925 年 4 月 21 日公布中法金佛郎协定，舆论大哗，北京学生起而游行，为警察制止，金佛郎案遂得实行。五卅惨案是在 1924-1925 年间一连串的工运中发生的；工运的激化，部分与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策动有关。1925 年 5 月 29 日，青岛工人因向日本纱厂要求加薪引起罢工游行，被军警击毙八人、伤二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未引起全国声援。但是年 5 月 15 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因领导工运被日本纱厂工头击伤致死（或谓顾为中共党员），国共两党即于 5 月 30 日在上海组成二万多人的游行。此次游行，为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轻重伤二十余人；消息传出，震惊中外。此事引起外交交涉，直到 11 月始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抚恤费七万五千元；其他各地因响应五卅惨案所举行的游行示威，造成更多死伤，多不了了之。至于 10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初为法国迫使中国接受金佛郎案的诱饵，五卅惨案发生后，又作为平抚中国民气的安慰剂；在开会期间，中国民间要求关税自主，政府要求开征 2.5% 的附加税，皆无结果。接着于 1926 年 1 月 12 日举行的法权调查会议，中国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亦无结果²⁸。

在段祺瑞任执政的一年零四个月中，由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带动的反帝运动日益升高，段因坚持「外崇国信」，与帝国主义国家取协和态度，故声望日落。另外一方面，由于段本身无实力，折冲于各派军阀之间，而军阀动辄以武力相向，使段祺瑞透过会议协商和建立制度以谋稳定政局的计划落空。善后会议以后，段从几方面执行善后会议的决定：在国民代表会议方面，段于 5 月 3 日特派许世英筹备国民代表会议事宜，7 月 1 日复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定于 8 月 16 日至 31 日初选、9 月 1-20 日覆选，嗣以各军阀间剑拔弩张，国民代表会议始终未能成立。另一方面，段祺瑞于 1925 年 5 月 16 日任命

²⁸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 250-269；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 111-123。

王士珍为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10月15日，两委员会如期召开，但由于各派军人不合作，军事和财政问题皆无从整理。依照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其职权虽在制定宪法，起草宪法则须另设国宪起草委员会。5月16日，段祺瑞派林长民办理国宪起草委员会事宜。8月3日，委员会举行开幕式，至12月11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国民代表会议未能集会，宪法亦无从制定。段祺瑞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及善后会议有关决议办事，置临时约法及旧国会于不顾，引起旧国会议员的反弹。1924年12月，未参加贿选曹锟的一批议员，拟召开「非常会议」，在天津法租界设立筹备处，不断通电抨击段氏，主张拥护临时约法、否定国民代表会议。到1925年4月24日善后会议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预计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重建法统，段祺瑞乃毅然下令取消旧法统（旧国会、临时约法、曹锟宪法），对未参加贿选的议员则组织建设会议，使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段已于4月13日公布临时参议院条例，于7月30日组织临时参议院，主要目的在容纳善后会议委员，并无实质意义²⁹。

段祺瑞无法建立有效制度、恢复政治秩序，一方面因为民间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另一方面则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或分别对段的诸多施政有所抵制。段出身军人，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深，不能利用民间的力量作为政治资本，只能俯仰在军阀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段任执政的一年零四个月中间，初欲在各省区增加皖系的势力，但受到奉系的箝制。由于奉系的势力深入长江下游，引起直系孙传芳（浙督）的反击；另由于奉系在直隶与热、察地区与国民军争地盘，又引起国民军对奉系的反击；最后因为国民军引俄国及南方的国民政府为援，又激起另一派直系吴佩孚与奉系联合共同打击国民军。段祺瑞在一波一波的战争中，初则维系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以牵制奉系，继则谋制国民军以结交奉系，终则为国民军所逐，于1926年4月结束执政政府。其间经过，略述于下。

初冯玉祥倒戈时，直系的直督王承斌亦随冯倒戈，响应奉系。及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抵天津，迫王去职，段祺瑞乘机建立皖系地盘，

²⁹ 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97-111。

11月28日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督办（督理改），12月3日任命卢永祥为直隶督办，当时山东督办郑士琦亦为皖系中人。国民军系的胡景翼在黄郛摄政内阁时已被任命为河南督办。张作霖虽自国民军手中收回热河，但对段祺瑞的地盘布局不满意，因欲假道津浦路向南发展，遂要求段祺瑞免除江苏督办（直系）齐燮元职。12月11日，段下令免齐燮元职，由省长韩国钧兼督办，以李景林署直隶督办，并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由奉军张宗昌部护送南下。时浙江督办孙传芳反对奉军南下，齐燮元据淞沪护军使署，与孙传芳合组江浙联军。卢永祥发兵攻齐，孙传芳并未参战。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同入南京。1月16日，段任命卢永祥为江苏督办，17日任命张宗昌为苏鲁皖剿匪总司令。张发兵往上海，于29日抵沪，齐燮元兵败逃日。浙卢危惧，奉、浙二军于2月3日签和平协议，张退驻徐州，但奉系郑谦得任江苏省长。奉系于获得直隶督办、江苏省长之后，进一步要求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4月24日，善后会议闭幕之日，段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调郑士琦为安徽督办，王揖唐专任安徽省长，同日并任命奉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郑士琦调督安徽后，张宗昌阻止郑士琦带兵赴皖督任，郑不敢就职，奉系复策动安徽军人将王揖唐逼走。段在奉系侵逼下，于6月18日，仍任命皖系吴炳湘为安徽省长兼督办，但张作霖不死心。时上海因发生五卅惨案民气汹汹，奉军于6月13日进驻上海。江苏督办卢永祥感于难以施展，要求辞职。8月3日，段以省长郑谦兼任督办。奉系对此一地盘部署仍不满意，在奉系要求下，段祺瑞于8月29日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³⁰。

在奉系以东三省和热河为基地、沿津浦路向南发展的过程中，直、鲁、皖、苏、沪五省市地盘均为所夺，皖系的地盘经营落空。另一方面，国民军系则沿京汉路转陇海路，并沿京绥路，向西北发展。1924年11月12日，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以河南督办的身分率军由直隶沿京汉路入河南。河南为吴佩孚发迹之地，吴自直奉战败，于1924年11月3日率六千部队自大沽浮海南下后，于11月12日入长江、11月14日过南京、11月17日抵汉口，拟在武昌组护宪军政府，但

³⁰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69-275；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147-155。

不受长江中下游直系各督的支持，吴于 11 月 19 日率兵抵郑州，旋退驻洛阳³¹。胡景翼既率兵至河南，吴于 12 月 1 日由洛阳移郑州，拒之于黄河以北。是日，段祺瑞密令陕西督军刘镇华派兵自陕入豫驱吴。12 月 5 日刘部憨玉琨占郑州，吴佩孚辗转退至岳州。河南形成胡、憨对峙。1925 年 2 月 22 日两军开战，3 月 8 日，胡军占洛阳，憨玉琨西遁，河南尽为胡景翼所有。1925 年 4 月 10 日胡景翼病死，河南督办一职由其师长岳维峻出任。在国民二军巩固河南地盘同时，国民一军的冯玉祥已沿京绥路向西北发展。段祺瑞于 1924 年 12 月 18 日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于 1925 年 1 月 4 日任命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以张家口为本部（4 月 21 日，经鲍罗廷介绍，冯玉祥开始接受苏联军事顾问与军械），留鹿钟麟任京师警备司令。4 月下旬，国民二军的岳维峻正式就任河南督办，5 月下旬，任河南省长的孙岳率国民三军自洛阳西入潼关进入陕西，败陕西督办吴新田（皖系）。8 月 29 日，段祺瑞以孙岳为陕西督办，以冯玉祥为甘肃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冯命刘郁芬率兵入甘代行其职务。于是河南、陕西、甘肃与察哈尔、绥远联为一气³²。

国民军系向西北发展，对长江流域的直系地盘影响不大，奉系向长江下游发展，却引起了直系的对抗。1925 年 10 月 10 日，浙江督办孙传芳以秋操为名，调动军队准备驱逐苏、沪奉军，15 日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奉军知不能敌，邢士廉部于 10 月 14 日自上海撤退，江苏督办杨宇霆偕省长郑谦于 10 月 18 日自南京北上，安徽督办姜登选于 10 月 23 日自蚌埠北撤，所有撤退奉军初集中于徐州，到 11 月 7 日又由徐州北撤。另一方面，孙传芳于 10 月 16 日占上海，11 月 7 日占徐州，嗣决定不再北上（可能的考虑是广东的革命军入闽），于 11 月 21 日通电返南京，11 月 25 日被任命为江苏督办。奉军方面，鲁督张宗昌在徐州以北布防，直督李景林防守保定、大名，姜登选防守天津、沧州，郭松龄驻军滦州、山海关一带。在孙传芳向奉军施压的同时，孙传芳（苏督）、萧耀南（鄂督）、岳维峻（豫督，国民军）、孙岳（陕督，国民军）等于 10 月 20 日推吴佩孚为十

³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 册，页 838-844 有关各日记载。

³² 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 155-159；冯接受苏联顾问与军械事，见《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第一章，页 302；胡、憨战争，同上，页 312-313。

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吴尚在岳州），谋使吴自武汉沿京汉路北上进奉。吴佩孚表面上统率直系及国民军系的第二、第三军，但岳维峻不希望吴军北上河南，遂径自派兵进攻山东、直隶的奉军。国民一军的冯玉祥佯示中立，实则与奉系将领郭松龄接洽，共同倒张作霖。11月23日，郭松龄自滦州回师奉天，改所部为国民军，准备以武力驱张下野。郭军于12月5日占锦州，12月13日占营口，12月21日推展到新民屯，逼近沈阳，但由于日军助战，张作霖的吉、黑援军亦至，12月23日巨流河（京奉线站名，在新民屯东）一战失败，郭氏夫妇逃新民屯被捕，次日枪决。另一方面，冯玉祥部自12月4日起在天津附近与奉军李景林部激战，12月24日，国民军占天津，李景林避入租界，残部退往山东，接受鲁督张宗昌的庇护。次日，段祺瑞以国民军系的孙岳为直隶督办。突在此时，号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决定与奉系修好，并与奉系联合，共同进攻国民军³³。

吴佩孚由联国民军讨奉，到联奉讨国民军，其决定似在1925年12月24-31日之间，有那些因素使他的策略如此急转直下？分析起来约有三点原因：（1）在国民军攻击直、鲁两地奉军期间，李景林、张宗昌竭力与吴氏联络，谓宁可使直、鲁地盘给直系，不愿使直、鲁落入国民军之手。（2）冯玉祥策动奉系郭松龄倒戈，触动吴佩孚的旧痛，1924年直奉战争，即因冯玉祥倒戈而败。（3）徐树铮自1925年1月以执政专使的身分考察欧美、日本政治，于12月11日自日本返抵上海，并与浙督孙传芳等筹议，主张东北、东南联为一气，在外交上与英、美、日妥协，共抗赤俄。徐树铮于12月23、24日赴京见段祺瑞，对此政策有所陈述。时冯玉祥与俄国及国民政府亲善，颇恨徐，即乘徐离京时，于12月30日在廊房将之捕杀，假口陆建章子陆承武为父报仇（陆建章为徐树铮所杀）。无论如何，吴佩孚于12月31日通电息争，停止讨奉。1926年1月4日，在天津租界的李景林由海道赴济南，将退到山东的残部改编，与张宗昌军联合，称为直鲁联军，谋攻击在直隶的孙岳的国民三军。1月19日，张学良率奉军攻占山海关（由郭松龄残部魏益三驻守，时称国民军第四军）。1月26日，吴佩孚命寇英杰率五混成旅进入河南，在信阳与岳维峻所部国民二军开

³³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275-279；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159-165。

战。直奉联军的主要目标自为国民一军的冯玉祥。冯玉祥见所驻关内主要地盘直隶、河南陷入直奉联军的包围，为减少敌人攻击，早在 1926 年 1 月 1 日即电段执政请开去本兼各职。1 月 4 日，冯以职权交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将所占地盘，划为五区：（1）京畿附近以鹿钟麟为总司令，（2）口北及察区以张之江为总司令，（3）绥区以李鸣钟为总司令，（4）热河以宋哲元为总司令，（5）甘肃以刘郁芬为总司令。1 月 9 日，段祺瑞派冯玉祥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实业，并任命张之江为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甘肃督办、李云龙为陕西督办、刘郁芬为绥远都统。冯玉祥的退缩政策，并未能缓和直奉联军对国民军的进攻。河南方面，吴佩孚的直军于 1926 年 3 月 2 日攻占郑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西退洛阳，后部属溃散，岳只身西走陕甘。直隶方面，3 月初奉军舰队攻大沽，国民军以水雷封锁港口。时在华日、美、英等国皆同情直奉而敌视国民军，日舰且炮轰大沽，国共两党则运动北京学生支持国民军，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临时执政段祺瑞初俯仰于奉系与国民军系之间，国民军系因驻军京畿，对段影响力尤大。但至直奉联军组成后，直、奉分别对段表示强烈不满，且表示决绝之意；而直奉联军进攻国民军，国民军又节节败退；段乃转而支持直奉，打击国民军。在 1926 年 3 月 18 日北京学生的反帝游行中，于国务院前滋事，执政府卫队对滋事学生盲目射击，造成 47 人死亡、132 人受伤、40 人失踪。3 月下旬，由京奉路西进的奉军，和由津浦路北进的直鲁联军已占领天津，4 月初并开始围攻北京。4 月 9 日，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发动政变，派兵包围执政府，宣布段祺瑞罪状，并恢复曹锟的自由，谋与吴佩孚修好。4 月 11 日，段祺瑞避居东交民巷。奉军及直鲁联军怕吴佩孚与国民军修好，急攻北京。4 月 15 日，鹿钟麟率国民军自北京撤退，扼守南口³⁴。执政府结束。

执政府结束后，皖系的势力已完全覆灭。北京政府主要由奉系掌握。国民军退往西北，直系的孙传芳在长江下游各省，直系的吴佩孚在长江中游暨河南一带，奉系的张作霖在东北、直隶及山东一带，这便是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北方军阀势力的分布大势。

³⁴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 274-298；李庆西，《段祺瑞与民初政局》，页 166-167。三一八事件另参考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15 年 1-12 月，页 205-222，伤亡人数，各方报导不一。

第二节 社会新生力的波动

军阀政治偏重于权力争夺和资源掠夺，从历史的长流看来，浮浅而不实。民国建立后，政界有志之士力谋建立新制度、厘订新方策，俾将国家厝于盘石之地，但军人政客争权夺利，使各种制度、各种方策均无法有效落实。内政上从袁世凯图谋帝制到清室复辟，外交上从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到巴黎和会中帝国主义国家分赃，都使谋国之士及社会各阶层失望到极点；一批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抗议，也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救国运动。在论述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先论述此有助北伐统一的社会新生力。

国际强权政治与国际新潮的刺激

中国的次殖民地地位，在民国建立后并没有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透过出兵山东，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利权；透过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和中日订立军事协议，谋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协约国站在一边，反抗侵略国家，但在巴黎和会中，仍为列强宰割的对象。此一弱肉强食的现象，为中国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所不能忍，从而怪罪政府，认为军阀祸国，官僚无能。在这种情形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热潮迅速在中国发酵。

促使国人觉醒的新动力是国际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传入的国际思潮，主要有二：（1）1917年10月俄国革命成功，有两个象征性的意义：一为群众的力量崛起，平民走上政治舞台；一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厌恶资本主义的人有了新的选择。在俄国革命成功前后，芬兰、德国、奥国、匈牙利、巴伐利亚等国都有社会主义风潮，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国际派人来中国运动，更给一批憧憬社会

主义的人带来鼓舞¹。(2) 1917 年美国总统一威尔逊倡导民族自觉，要求列强保障弱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带向高潮。到 1920 年代初期列宁的反帝思想进入中国后，更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为反帝行动；此一反帝行动，不仅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而且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语)。当时亚洲民族需要自求解放者颇多，如美国控制菲律宾、英国控制印度、法国控制越南、日本控制朝鲜、列强控制中国。朝鲜于 1919 年 3 月 1 日发生反日运动，中国于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以反日为中心的反帝运动，在性质上都是以群众为主轴的民族自觉运动。

新教育与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中国自 1902 年(光绪 28 年)建立新式教育制度，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并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清末民初，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学风保守。一般学生，以修习功课为主，对社会的关怀不多。留日学生于 1903 年发动反俄运动，于 1918 年发动反日运动，对国内产生不少影响。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学生大量投入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投入政治和社会运动与其所受的新式教育有关，而学生运动能造成广大的社会回响则与参与的学生众多有关。民国初年的学生人数，以 1916 年和 1925 年两年度为例，表列于下²，说明学生是社会上人数日益增长的人群：

	1916 年		1925 年	
	校数	学生数	校数	学生数
小学	120,097	3,843,454	177,751	6,601,802
中学	653	75,595	687	129,978
师范	195	24,959	385	43,846
职业	525	30,089	1,006	——
大专	86	17,241	105	36,321

注：列入 1925 年栏的小学资料为 1922 年之数

¹ 参考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 257-258。

²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 136, 141-142, 146, 155, 162-163。

1916 年的学生总数为 3,991,338 人，1925 年的学生总数至少为 6,811,947 人（职业学校学生数缺）。另外尚有留学生，1916 年官费留学生的人数为 1,397 人，1921-1925 年自费留学生的人数为 638 人³。

各级学校的教师，尤其是志于改革的大学教授，是学生行动的指导者，所以学生与教师可以作为知识阶层的代表。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可以列为下层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和大学生可以列为上层知识分子。两层知识分子的人数，据 1923 年的数字，可如下表⁴：

类别	数目
下层知识分子	
小学教员	265,816
中学生	182,804
小计	448,620
上层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	5,613
中学教师	17,611
大学生	34,880
小计	58,104
总计	506,724

上表所列 50 万余在校的知识分子，是传布各种新思想和掀动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

学校原为单纯清高的知识殿堂，五四前后逐渐卷入政治，约有下列的因素：（1）课程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接近，师生容易受政治和社会的感染。（2）传统时期读书人被称为「士」，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遇事常挺身而出。（3）民国建立以后，特别在五四前后，报纸、杂志的创刊甚多，有些教师和学生自办刊物，有些教师和学生于报刊发表意见，直接对在校的师生发生影响。（4）民国建立，学术、言论获得自由，外国许多思想、学说传入中国，知识界吸收激进思想，对现实容易产生不满。（5）在校知识分子既关心政治和

³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 171，173。

⁴ Chang Yu-Fa, "Societ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90s-1980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 期，页 191。

社会，政界有心人士借力使力，在学生与教师群中活动，并操纵其间。上述五项因素，较有数字可据的是第五项，即政党运动学生，并吸收学生入党。举例而言，1925年的国民党党员，山东有2,500名，学生占40%；河南有3,600名，学生占70%；陕西有2,200名，学生占90%；湖南有5,444名，学生占50%⁵，其它各省不备举。1925-1926年广东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5年11月134名，学生占42.7%；1926年6月752名，学生占40%⁶。据《申报》报导，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前，上海、汉口等市，以及湖北、湖南、福建等省学运，皆受中共控制⁷。

企业发展与工商阶层的觉醒

民国初年承晚清鼓励民族工商业之旧，制定「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颁布「商人条例」等法令，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列强集中精力生产军火，其国内一般工业品减少，对中国输入品也减少。以面粉而论，1914年入超七百多万两，1915年转为出超，到1920年出超达一千七百余万两，因而促使民族资本新设面粉厂的增加，面粉厂由1916年的67家增至1918年的86家。以洋纱而论，1913年进口2,630,000担，若以1913年进口洋纱数量指数为100，1914-1916年减少为95.3，1917-1919年减少为59.2，1920-1922年减少为48.7。以洋布而论，1913年进口洋布十亿万码，若以1913年进口总值指数为100，1914-1916年减少为69.3，1917-1919年减少为58.7。因而促使民族资本新设纺织厂的增加，纺织厂由1911年的22家增至1919年的54家，又增至1921年的109家。其他行业不备举。1913-1918年间，英国对中国的输入由96,000,000两减至49,000,000两，法国由5,200,000两减至1,500,000两，德国由2,800,000两减至零。在这种情形下，外贸的赤字从1913年的1亿6600万两减至1919年的1600万两。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忙于重建，日货受到五四运动及其后数年的抵制，民族工业继续发展。据农商部统计，1919-1923年民族资本新设公司757家，平均每年151.4家，其中1921

⁵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页273。

⁶ 同上，页293。

⁷ 同上，页378。

年新设者 182 家。其后五卅运动继续抵制外货，民族资本工业持续发展，据农商部统计，1924-1927 年民族资本新设的公司有 372 家，平均每年有 93 家。各行各业的工厂，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各省，以 1919 年的统计为例，江苏 155 家，直隶 45 家，浙江 42 家，广东 33 家，山东 31 家，福建 20 家，奉天、湖北各 19 家，其他各省都在 5 家以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银行的设立也大量增加，1911 年时银行 7 家，其后历年新设者 1912 年 5 家，1913 年 3 家，1914 年 1 家，1915 年 3 家，1916 年 2 家，1917 年 5 家，1918 年 10 家，1919 年 11 家，1920 年 13 家，1921 年 23 家，1922 年 18 家，1923 年 15 家，1924 年 8 家，1925 年（6 月底止）5 家。诸多银行中，1915 年设于北京的盐业银行，1917 年设于北京的金城银行，1919 年设于北京的大陆银行，1921 年设于上海的中南银行（业务与北三行往来多），称为「北四行」；1907 年设于杭州后移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1923 年设于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1915 年设于上海的商业储蓄银行，称为「南三行」。此七行财力最雄厚。中国各银行的资本总计，1916 年三千七百多万元，1920 年五千一百多万元，1925 年一亿五千八百多万元⁸。

以上所举工厂、公司、银行的家数，尽管不知统计的标准为何，皆属较大的公司行号。实际上，当时的工商业，仍以小商人为主。据估计，在 1920 年代，中国的商人阶层约有一千万人。对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为大商人。大商人如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1853-1926）于南通建立大生纱厂，在 1914-1921 年间纱锭增长了一倍；如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公会的董事虞洽卿（1868-1945）曾向三北（1917）、宁绍（1917）、鸿安（1918）等轮船公司投资两百万两；如穆湘玥（1876-1942）于 1915-1920 年间建立多家纱厂，并主持绵纱交易所；又如荣宗敬（1873-1938）和荣德生（1875-1952）兄弟于 1914-1920 年间开设八家面粉厂，又通过建立申新纱厂，将企业扩大到纺织界⁹。他如 1915 年创立盐业银行的吴鼎昌、1915 年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1917 年创立金城银行的周作民、1919 年创立大陆银行的谈荔孙、1919 年创立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等¹⁰，不备

⁸ 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页 180-182，193-198，210；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pp.583-584.

⁹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页 805，808。

¹⁰ 胡光煦，《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页 156-158，169-170。

举。

商人支持辛亥革命，支持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支持联省自治运动，也办教育和救济事业。他们关心国是之心愈来愈强。1920年时，天津有丝商在商会演说，呼吁商人应该担负为国家造福的责任。1921年时，上海的全国商会也有人演讲，谓商人知道国家的状况，商人知道国家的需要，商人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奉献给国家；并谓只有商人、教育家、工业家、银行家有余力为国家做事，赢取人民的尊敬。在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的时候，江浙商人即与致力于北伐的蒋介石联络，协助其清除共党、打倒军阀的大业¹¹。

社会新力与社会运动的起伏

如前所述，在民国建立以后，新教育有稳定性的成长。据估计，在五四前夕，全国受过新式小学教育的人约近千万；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在十万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数万之多。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工商业也有显著地成长。据1918年统计，全国商会一千余，国内商会会员16万2000人，华侨商会会员2万1000多人；不在商会之内的商人更多。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的人数也大量增加，据1913年的统计，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在60万左右；加上海员、铁路等工人，中国产业工人已有一百多万人。到1919年时，产业工人增加到二百万左右¹²。

受新式教育者、工商业者、产业工人等，皆为社会新生力。他们多集中在城市地区。中国的城市，在二十世纪初年有稳定性的发展，如上海的人口，1910年100万，1920年240万；青岛的人口，1911年5万，1921年8万；天津的人口，1900年32万，1921年83万；北京的人口，1912年72万，1921年86万¹³。1930年时，中国有100-150万人口的城市三个：北平、天津、汉口；80-1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广州；60-80万人口的城市三个：南京、长沙、重庆；40-60万人口的城市五个：福州、苏州、杭州、南昌、温州；20-40万人口

¹¹ Chang Yu-Fa, "Societ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90s-1980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期, 页198-499。

¹² 彭明, 《「五四」研究》, 页40; 张玉法, 《中国现代史》, 页261。

¹³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 页803。

的城市七个：青岛、济南、厦门、宁波、镇江、汕头、威海卫¹⁴。

集居于城市地区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和工人阶层，对国家事务了解较多、关心较深，常以罢课、罢市、罢工、游行等方式表达，称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依发动目标而论，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反政府运动，通常由知识阶层发动，获得工商阶层、工人阶层、甚至农民阶层的响应，规模较大、延伸的地域较广。一类是各机关或各阶层内部发生问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利益受到损害，单独起而运动，如学校内部因行政、人事等问题而发生的学潮，工人因争待遇或要求改良工作环境而罢工，商人、农民的抗捐、抗税等。此处仅就各阶层联合或单独所从事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政府运动，作一概述。

学生运动，发生于1915-1920之间者以反日为主。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媾和，监禁于西伯利亚之德国战俘十余万人将获释放，日本假释放德俘威胁东亚和平为由，秘密要求与中国订立军事协议，俾日军有机在中国自由行动，进而控制中国政治。留日学生闻之，于4月28日集会抗争，并决定罢课归国。当时留日学生约3,548人，归国者2,506人。归国学生成立救国团，于天津、上海等地运动排拒日货。秋后因学校开学，大部学生返日，运动停止，但仍有学生筹组全国学生救国会，为学生组织全国化之发端¹⁵。1919年5月，北京学生闻中国代表未能在巴黎和会中自日本手中收回山东利权，于5月4日集合三千余人作示威运动，要求罢黜亲日派官员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輿，被捕三十余人。5月19日，北京各校宣告罢课，学生分组赴街头讲演。6月3日，讲演学生被捕千人，拘于北京大学，至6月7日始释放。此期间，全国各地学生、商人、工人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响应北京学生，并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10日，政府免曹、章、陆职，7月2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终止罢课。自五四运动发生迄于是年12月底，除与响应五四运动直接相关者不计外，据白蕉的研究，全国各地的学运与学潮11次（关怀国是者称学运，因教育或学校内部问题而起者称学潮），其中与抵制日货有关者8次，国庆游行演说2次，校内学潮1次。为收回山东、

¹⁴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55.

¹⁵ 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期，页117-136。

或抵制日货而发起的学生运动延续到 1920 年，是年学生运动 9 次，与抵制日货有关者 3 次，与收回山东利权有关者 2 次，教育或学校内部问题之学潮 4 次¹⁶。值得说明的是，抵制日货，确有效果。以 1919 年为例，日本日清汽船会社往来沪汉间所载之货量，4 月份为 5,552 吨，5 月份降为 2,157 吨，6 月份为 37 吨，7 月份为 87 吨，8 月份为 99 吨¹⁷，可见一斑。

1921-1926 年之间的学潮，大部分为教育或学校本身问题所引起。1921 年发生学运与学潮 12 次，向教育部或省署争取教育经费者 3 次，争自由者 1 次，与学校内部问题有关者 8 次。1922 年发生学运与学潮 74 次，除一次系支持工人运动外，其余 73 次皆与学校内部问题有关。1923 年发生学运与学潮 5 次，除一次系支持工人运动外，其余 4 次皆与教育或学校问题有关。1924 年发生学运与学潮 27 次，除一次为向俄国示威外，其余 26 次皆与学校问题有关。1925 年除五卅运动外，发生学运与学潮 48 次，除一次为纪念五七国耻（1915 年日本向中国提出廿一条要求最后通牒之日）、一次为向举行中的关税会议示威、一次为反对房捐、一次为反对发行军需券外，其余 44 次皆与学校内部问题有关。五卅运动的发生，系日本在上海设立的内外纱厂发生工人因要求改良待遇被杀事件，学生起而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开枪伤毙学生四、五十人，引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广州、厦门、香港等地学生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各地示威群众亦受到中国军警和外国军警的枪杀。香港海员以此罢工年余，为英国带来巨大损失。1926 年发生的学运与学潮 8 次，除 6 次有关学校内部问题外，是年 4 月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两次争自由、反军阀运动¹⁸，已开启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河。

1920 年前后数年的社会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主流。与学生运动相比，工人运动的规模较小，而商人和农民更是居于辅助性的角色。大概说来，商人习惯于个别的与官方接触以解决问题或获得利益，但群众运动如涉及抵制外货则支持，对纯粹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也支持；

¹⁶ 白蕉，〈学运与学潮的历史观〉，《人文月刊》4 卷 3 期。据吕芳上研究，1919-1921 年间，全国各地因抵制外货所发生的冲突事件 16 次，见所著《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页 50-52。

¹⁷ 马寅初，〈如何提倡中国之工商业〉，《上海商会月报》5 卷 7 期，述评，页 6。

¹⁸ 白蕉，〈学运与学潮的历史观〉，《人文月刊》4 卷 3 期、4 期。据吕芳上研究，1919-1922 年间，全国各地发生迎拒校长的学潮 66 次，见所著《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页 76-88。

如涉及罢工或鼓动罢工则迟疑踌躇。以五四运动为例，由于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几个主要董事顾馨一、王一亭等与日本金融和贸易界有生意关系，开始时相当审慎。6月9日总商会正式宣布反罢市，但一般商人们响应学生的罢市号召，于商店门前张贴布告：「本店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此期间，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反应比较积极，曾于5月6日向大总统通电抗议凡尔赛和约，对学生运动极表支持，谓「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要求「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5月10日，商业公团联合会并通电指责总商会的亲日立场。再以五卅运动为例，五卅运动发生时，上海总商会会长为虞洽卿，上海商人通过各种组织支持罢工者，但据学者研究，支持罢工系起于对群众运动的畏怯¹⁹。

农民参与社会运动，在当时也是辅助性的。以五四运动为例，在5月中旬，山东各县农会、江苏省农会、河南省农会，都有电报致北京，要求政府力争，吉林省农会更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群众示威运动。6月中旬，在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硖石镇，有包括农民在内的万余群众召开国民大会，公决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者戒；而当时上海及附近发动拒买日货运动，农民也起而响应²⁰。另外一方面，农人与工人的身分有时是互换的，譬如1925年在100个大连码头工人中，即有69个是农民，而1926年在天津附近的86个盐工中，51个是农民²¹。因此，工人运动也有农民的成分。

工人运动有时是配合一般群众运动，但也有许多为争取工人自身利益的运动。如前所述，争取工人自身利益的运动，有时受到学生的支持。较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战结束以后。欧战期间，中国派往法国的留学生有数千人之多，派往欧洲的华工达十余万人，他们在欧洲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具有工界学界联合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欧战结束后很快带回中国，在五四运动中产生力量²²。1919年5月2日，济南已有三千余工人召开收回青岛大会，但未获他方面的响应。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各地工人起而声援。5月11日，北京

¹⁹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页821-822，852-853。

²⁰ 胡元利，〈五四爱国运动中农界的表现〉，《党史研究》（北京），1986年第1期，页69-76。

²¹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ur Forc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D. Cowan,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p.111.

²²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p.35-40.

工人举行大规模地集会声援。6月5日，上海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有五、六千工人罢工。其后数日，上海电车工人，海员、铁路工人，以及火柴、电机、炼铜、印刷等工人，相继罢工。到6月10日，罢工的人数达六、七万人，罢工的单位五十多个²³。在五四前后，各地工会纷纷组织起来。1921年时，自法国回国的有中华工团，在上海组织的有驻沪参战工会。据1927年的资料，上海的工会组织有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上海机械工会、上海工商友谊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上海华洋汽船劳动会、中华电气工会、上海中国印刷工会、浦东纺织工会、制丝女工会等；汉口的工会有汉冶萍总工会、扬子江俱乐部（扬子江机器厂）、粤汉铁路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等；长沙的工会有粤汉铁道总工会、粤汉路长沙工会、造币厂工人俱乐部、第一纱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人力车工会、砂船工会、长沙理发工会等。各地工会的兴起，自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此后数年间，推动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工代表会议，参加者有十二个城市工人代表一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会一百多个、工人二十万人。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工代表会议，结果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到是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又有上海总工会、河南总工会、全国铁道总工会（郑州）的成立²⁴。当时国民党已经实行联俄容共，中共的劳工运动可视为国民党的劳工运动。对联俄容共后的国民党来说，农民与劳工为重要的革命力量，这在北伐战争中可以显露出来，惟大部分农工运动是由中共控制。

前述社会运动系以职业分，而且以男性为主；此期间妇女也愈来愈成为社会的新生力量。1919-1923年间，重要的妇女团体有19个，多半以倡导女权为宗旨，具体的要求是宪法列入女权保障条文，要求经济独立、教育平等、禁止公娼、同工同酬、制定保护女工法等。国民党联俄容共后，为推动革命，着意动员妇女，1924-1928年5月间与国民革命有关的妇女团体60个。妇女除组织团体外，也走向街头。1919年5月7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协和女子师范大学、培德女

²³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页369。

²⁴ 伊藤武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页178-190；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页373。

校等十多所女子学校的四十多位代表集会，致电驻巴黎公使，并通告全国女界，力争保全领土。「六三」大逮捕的次日，北京十五所女校的千名学生集会新华门，抗议政府拘捕学生，并强烈要求拒签和约、罢斥卖国贼。1921年3月粤省议会讨论选举法时，数千名青年妇女集会请愿，要求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度造成流血冲突。1924年3月8日，青年妇女第一次举办国际妇女节活动，广州有数千名妇女集会，并整队游行，她们的口号是：「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境地解放出来，同等教育、同等工作，革除多妻制度、童养媳制度、娼妓制度，禁止蓄婢纳妾，建立儿童保护法，保护劳动育儿妇和孕妇。」据统计，1924年时参加国民党的女党员二千多人，到1927年3月已超过一万三千余人。在北伐过程中，在1927年夏，曾有女子军开往鄂西作战²⁵。

新思潮与新政党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失败，1917年满清皇朝企图复辟失败，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失坠，中央和地方由派系不同的军人控制。政治上争权夺利，帝国主义国家乘之，民无所依，国几不国。社会新生力在社会各角落跃升。自1900年代以后陆续自国外传入或在中国酝酿的新思潮，有愈来愈多的人企图纳入行动纲领，于是各种党派竞起。在诸多思潮中，影响较大者为社会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兹先言社会主义思潮。

社会主义有三大派：无政府主义较为激进，基尔特社会主义较为温和，马克思主义居中。191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先后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引介与阐释，其间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引进列宁主义。李大钊、陈独秀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瞿秋白、毛泽东受列宁主义影响较大。李大钊，直隶省人，北京大学教授，为最早信仰并宣扬马克思主义者。1916年在〈青春〉、1918年在〈今〉等文中表达了唯物辩证的宇宙观；1920年在〈史观〉、〈唯物史观在现在史学上的价值〉等文中阐释唯物

²⁵ 吕芳上，〈娜拉出走以后——五四到北伐青年妇女的活动〉，《近代中国》双月刊，第93期（1992年12月）。

史观；1922年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中，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趋势和意义。其间，于1918年冬在北京大学组「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到1925年6月任中共北方区党务委员会领导人²⁶。陈独秀，安徽省人，北京大学教授，先后主编《新青年》及《向导》，1921-1927年间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陈早年醉心于西方民主政治，1920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1920年9月在〈谈政治〉一文中介绍阶级斗争，并宣言要以阶级斗争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以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²⁷。继陈独秀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江苏省人，1920年9月受北京《晨报》委托，赴俄国考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0年冬至1922年春先后出版《饿乡记程》、《赤都心史》二书，记载了他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历程。瞿秋白是第一个深入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他认为：「一切变易起于永久的内部矛盾、内部的斗争。」同时认为：「自然界、社会关系及思想都连环不断的否定。」在推动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注重动员工人，列宁主义则兼重农民。瞿秋白继承了列宁主义，他在1923年9月撰写〈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提出「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的理想；1927年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时又提出「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需与农民联盟」²⁸。在中共的重要干部中，毛泽东于1926-1927年间对两湖农民问题作了调查分析，当时中共尚与国民党合作推动国民革命，毛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7年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江西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更强调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²⁹。其他刘师复、吴敬恒等人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张东荪等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多论。

三民主义于1900年代后期由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党人在日本宣扬，1910年代一度沉寂，到1920年代，由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再起，三民主义再度成为时代思潮，19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

²⁶ 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页345-357；邵重生，〈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页6-7。

²⁷ 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页310-312；李兴华，《中国近代思想史》，页489-492。

²⁸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页623-645；郑学稼，〈瞿秋白的一生〉，周阳山、杨肃献编，《社会主义》，页399，402，403，405。

²⁹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页65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196，198。

国民党势力所以能够再起，约有三方面的原因：（1）从 1916 年袁世凯政权结束之后，孙为扩充党势，实行「大党主义」，逐渐对党员的要求放松。1919 年 10 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已经没有中华革命党时期党员必须附从领袖、以及将党员划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规定³⁰，使讲求自由、平等的新一代年轻人容易接受。（2）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在 1918-1920 年间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阔的阐扬，1915-1919 年间孙居上海潜心著述，1919 年在上海创刊《建设》月刊专门宣传三民主义，加上 1916 年在上海创刊的《民国日报》以及 1923 年在广州创刊的《民国日报》等对一般革命理论的宣传³¹，使三民主义跃升为 1920 年代以后的重要思潮。（3）1919 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中崛起一批关心国是的青年，分别投向不同的政党，大部分为「老革命家」孙中山所吸引。五四运动发生时，孙在上海，深知参加运动的青年充满爱国的情绪，立即召集在上海的干部同志叶楚傖、邵力子等，要他们分头指导，尽力扶护。孙曾联络广东军政府的六位总裁（孙为广东军政府七总裁之一）致电北京当局，对滥捕学生予以申斥，孙并经常接见爱国青年予以鼓励。1919 年 6 月 16 日，全国二十一地区学生代表五十多人在上海集会，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旋即接见学生联合会代表，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³²。由于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国民党乃吸收不少学生加入，例如 1922 年北方青年学生大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乃在北京组设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党的秘密进行机关，使北方原已萎缩的党务复活。1923 年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评议会在广州召开，公开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孙中山出席大会发表演说，肯定学生的力量，并告诉学生代表，国民党素重群众革命。1924 年国民党改组，设立青年、妇女、农民、工人、实业、海外各部³³，正是重视群众革命的表现。

在 1920 年前后，孙中山所宣扬的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主张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提出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在民权主义方面，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为政权，使民权行使超越代议政治，而有更多的途径；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为治权，

³⁰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页 19-20。

³¹ 同上，页 5-7，43-49，67-68。

³²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页 24-29。

³³ 同上，页 394，409。

使治权行使超越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更趋分散。在政府和治权的运作上，孙中山主张权能区分，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互相制衡，互相尊重；并主张均权制度，将中央权与地方权加以划分，不偏于中央集权，亦不偏于地方分权。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都市地区）、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农村地区）的办法³⁴。

国家主义为中国青年党标榜之主义。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由曾琦发起。1924年，青年党党务移国内。青年党的基本主张，在1924年10月宣布于外者共有四点：（1）主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和共产主义。（2）主张全民革命，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建设全民政治，反对一阶级专政之独裁政治。（3）主张对内不妥协、对外不亲善。（4）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³⁵。所谓国贼，指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依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等³⁶。

自由主义于1900年代由严复、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们不一定是自由主义者。在1910年代严复思想转趋保守，梁启超则卷入实际政治。到1920年代，梁启超进入学术文化界，发言立论，颇富自由主义的色彩。第一、他反对暴力、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因此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抱敌视的态度。第二、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主张用缓进改革的办法³⁷。1910年代和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应为蔡元培和胡适。蔡元培的表现主要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即本此理念办学。关于教育独立，蔡主张教育应完全脱离各派教会及各派政党的影响而完全独立，不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关于学术自由，蔡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对各派学说应兼容并包³⁸。胡适的自由主义较蔡元培为宽阔，在政治方面他追求好人政府、立宪政府和保障人权，在方法上他希望点点滴滴的改造。他提倡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五四前后的最大贡

³⁴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480-481，457-459，520-524；蒋永敬，《孙中山》，页135-138，见王寿南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50）。

³⁵ 见《醒狮周报》第1册正刊前页广告。

³⁶ 《醒狮周报》第二号（1924年10月18日），第一版。

³⁷ 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页372-374。

³⁸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269-270。

献是与陈独秀等人共同推动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普及全国。平民大众的觉醒，部分是受白话文的影响。

第三节 统一大业的成败

晚清的中国，帝国主义压迫日甚，清政府无力应付外患；入民国后，国家长期陷于分裂，帝国主义之外，军阀争斗不已，民不聊生。政治改革派，如梁启超，仰军阀、官僚之鼻息，很难有所作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周旋于军阀、官僚、政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苦无执政的机会。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开始向往社会主义、唾弃资本主义，并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习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开始动员工农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到 1921 年一批走俄共激进路线的青年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势力不大。一般人仍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身上。当时国民党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推翻满清、反抗袁世凯专制政权以及领导护法运动等方面皆有贡献。惟在各省区、各行业的社会基础不足，加上一般党员名利心重、妥协性强，使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无法贯彻。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和中共都需要寻找共同革命的盟友。终有国共合作，推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统一大业，但在北伐统一的过程中，国共又分裂，一直使统一大业未能完成。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

孙中山于 1919 年 10 月将反袁时期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大量吸收在五四运动中崛起的爱国青年。他对破坏民国临时约法、解散民选国会的北京军人政府已经绝望，乃转注意力经营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根据地，初建于 1917 年 9 月倡导护法运动时，1918 年 5 月以后广州护法政府受西南军人控制，孙中山移居上海。1920 年孙中山得广东军人陈炯明之助回广东，1922 年陈炯明叛变，孙再移居上海。1923 年孙得滇桂军之助，再回广东。孙中山

在国内借助军阀之力，在国外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国家之力，曾先后派朱和中到德国、马素到美国、廖仲恺到日本，进行外交活动¹，但无所成。此期间，受俄国革命影响，一批倾心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已开始在国内外组合。1920年8、9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七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推陈独秀为首。是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联络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十余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3人，代表党员57人。中共成立之初，除组织研究团体外，便是从事工人运动，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刊《劳动者》周刊，1921年1月在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而从1921年初开始，唐山的工会、津浦机车厂的工人俱乐部等，都由李大钊派人组织起来。至于研究团体，此期间天津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外方面，在1922年6月，留法学生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邓小平、周恩来、任卓宣等十余人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²。这批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不仅与北京政府处在对立的地位，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亦无联系。唯一的援助与指导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

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方各国。列宁为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被压迫民族，应组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指明「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暂时合作，甚至同它结盟，但不要和它混为一体」。在此前后，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指示，陆续派维经斯基(G. N. Voitinsky, 第三国际远东局书记)、马林(Maring, 原名 Sneevliet) 等来中国活动，企图在中国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他们在中国选择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对象，是看来较开明的军事将领吴佩孚、陈炯明和推动革命的孙中山。吴佩孚是五四以后北方的实力派，属于直系，反对皖系段祺瑞及其所依附的日本帝国主义，并

¹ 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页61。

²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374-377；周子信，〈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页18-19。少年共产党，或谓名少年共产团。

标榜保护劳工。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10月9日访问了李大钊的同学，时任吴佩孚的政务处处长白坚武。陈炯明为广东实力派的军人，五四以后以标榜社会主义著称。1920年4月29日，苏俄政府曾派路博将军携列宁亲笔函到漳州访问陈炯明。同年底，维经斯基在广州和陈独秀一起访问过陈炯明。1921年12月马林到南方访问孙中山时，也曾和陈炯明长谈。孙中山同情俄国革命，1918年7月有电致列宁，祝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政府的成立。1920年11月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尽管共产国际主动联络此三大政治势力，中共最初只与陈炯明、吴佩孚有些联络，对孙中山尚无动于衷。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决议指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1922年中共召开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后³，共产国际始促使中共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及中共在陈炯明、吴佩孚、孙中山三个政治势力中，最后决定与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起因于陈、吴态度的变化。1920年12月陈炯明以广东省省长的身分邀请陈独秀到广东省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8月又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1924年加入中共）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许其在海丰试办农会、试行减租运动。嗣以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反叛孙中山，中共乃离弃陈炯明，支持孙中山。在陈炯明叛离孙中山以后，李大钊透过白坚武于1922年9、10月间两度到洛阳访吴，欲发展铁路工会。吴佩孚拟借机利用中共策动铁路工人夺取铁路管理权，乃允李派六位同志分赴京绥、京汉、京奉、津浦、正太、陇海六条路线做密查员，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嗣以工运影响吴佩孚的经济、政治利益，到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在汉口镇镇压京汉路工人罢工，乃使中共与吴的关系破裂。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离弃陈炯明和吴佩孚前后，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继续与孙中山联络。马林于1921年7月在上海列席中共一大，并在此前后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张邀请马林去桂林访问孙中山。8月2日陈独秀自广州到上海，在陈的同意下，马林由中共党员张太雷（任翻译）陪同南下，经广州访廖仲恺，于1921年12月23日抵桂林会见孙中

³ 前引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页51-53。

山。马林发现国民党人对苏俄态度友好，且允许在其党内宣传共产主义；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系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组成，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并非资产阶级政党。马林要求孙中山与中共联合，并与苏俄结盟，孙虽对其军事、经济援助有兴趣，但虑引起列强干涉，允在北伐胜利后再与结盟，对于与中共联合问题，孙中山仅允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此前后，马林认定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将此意见传达给共产国际总部。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曾与讨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1922年1月初马林自桂林返广州，2月3日离广州北上，3月7日抵上海，3月19日离沪北上，22日抵达北京，又于3月29日离京返沪。马林自广州北上以后，即正式向中共建议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未为中共接受。当时中共只愿意联合孙中山，不赞同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A. S. Dalin）到达广州，次日向孙中山建议建立国共民主联合战线，为孙所拒。4月底，达林列席中共中央在广州所召开的干部会议，建议中共在保持政治独立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与会者大多数仍反对加入国民党，只赞同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形势，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是民族革命运动，中共应「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于是年7月、8月两度作出指示，要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另一方面，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二大，虽决定和所有的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合作，建立联合战线，但拒绝了马林和达林的建议，仍不赞成加入国民党⁴。

1922年8月12日左右，马林自莫斯科抵达北京，旋即前往上海，再次向中共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仍遭拒绝。在马林建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

⁴ 前引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页54-58；初晓，〈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速宁师范学报》，1983年第3期，页55-57；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4期，页26-27；陈文等，〈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4期，页16。

中大多数人终于同意马林的看法：国民党是几个革命阶级的松懈的政治联盟，不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但会议只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适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于8月13日抵上海，李大钊于8月23日奉中共中央委派赴沪拜会孙中山，表示对孙中山的支持。9月初，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以个人资格在上海正式加入国民党。嗣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也先后加入国民党。9月，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马林再次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工作报告。共产国际四大及执委会决议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此期间，孙中山于1922年9-12月先后召集三次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陈独秀亦应邀参加，开始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此次改组的基本精神，孙中山定名为「联俄容共」，马林曾到会讲话。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质、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1月26日孙中山与来华的苏俄副外长越飞（Adolf A. Joffe）发表共同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马林于2月初回到北京，继续对不赞同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进行说服工作。6月12日，中共在广州召开三中全会，终于正式通过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中共三大以后，大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决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同月，孙中山应苏俄之邀，派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俄援助问题。9月，苏俄政府应孙中山之邀，派鲍罗廷（Michael M. Borodin）为驻广州常设代表，并指导国民党党务。10月6日，鲍罗廷抵广州，18日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8日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度来华，在上海负责与

中共中央联系。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⁵。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5人，中共党员占22人。中共党人李大钊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参加党章、宣言、宣传三个委员会。谭平山、毛泽东参加了党章委员会。部分国民党人对此次国民党改组颇感疑虑，早在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即联名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报告，认为「陈独秀等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一大开会之际，复有国民党员茅祖权等提案，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谓「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但共产党员李大钊认为，中共为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共党员不能因为个人加入国民党，便脱离国际组织。最后大会决议同意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决议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并决议组织国民政府。大会选举24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共产党员；17名候补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祖涵）、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于方舟、沈定一为共产党员。一大闭幕次日，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部。其中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伯渠（祖涵）、秘书彭湃，以及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皆为共产党员。工人部长廖仲恺、妇女部长曾醒，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中央党部中，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较占优势。为贯彻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于一大以后，将反对容共的国民党员冯自由、马素、谢持等人开除党籍⁶。

此次国民党改组，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发展都有帮助。国民党在俄国协助下于1924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该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官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皆共产党

⁵ 前引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页59-65；前引初晓，〈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页57-60；前引陈文等，〈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页16-18；前引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页28-29。

⁶ 前引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页65-66；前引陈文等，〈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页18-19；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1页，71。

员。此期间，国民党各地执行部和省党部也陆续成立。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2月25日成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三部的秘书毛泽东、恽代英、邵力子以及干事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王荷波、向警予等皆共产党员。北京执行部成立于1924年4月20日，组织部长李大钊、青年部长于树德、妇女部长褚松云等皆共产党员。汉口执行部成立于1924年4月，组织部长林伯渠（祖涵）、干事李立三、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等，皆共产党员。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4月1日，委员何叔衡、李维汉、李达等皆共产党员。湖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4月，委员董必武、刘昌群等皆共产党员。江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3月，以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优势。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前统计，正式成立党部的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河南、察哈尔、内蒙古、绥远、热河等省区，筹备中的有广西、福建、奉天、浙江、吉林、四川、甘肃、安徽等省区，已成立特别市党部的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等市，共有国民党党员20万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多。农工运动自1925年以后迄北伐时不断升高，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都相继组织农会，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更直接开启了北伐的机运⁷。

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

统一战线组成后，国共之间有联合亦有斗争。就联合来说，国共两党都相当被动；就斗争来说，有时是国民党主动，有时是共产党主动。联合的一般原则，国民党只希望共产党在国民党的主义、组织和行动下行事，不希望共产党扩展自身的势力。共产党愿意在国民党的旗号下行事，是希望共产党能随国民党的势力扩展到全国。1923年6月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我们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并决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⁸ 1924年1月国民党正式施行「联俄容共」后，有三方面的事

⁷ 前引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页66-68；前引陈文等，〈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页19-20；前引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页71-72。

⁸ 引见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影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辑，页321；前

大体是联合的：一为农工运动，此事大体由共产党主导；二为反帝国主义运动，此事由两党共同推动；三为接受党魁孙中山的遗嘱，此事大体由国民党主导。。

关于农工运动，1924年5月，国民党工人部透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电请政府保护工人，并成立工团军，以保护工人从事自由行动。随之有各种工团军、工人纠察队之组成。1924年7月，国民党又透过广东省长下令给各县长，要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并要求各县长对中央执行委员或各属地方党部委员前来照章组织农民协会或农团军时，应竭力协助进行。到1925年5月，广东省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共达21万人；同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54万人。北伐前夕，湖南有11万组织起来的工人、40万参加农会的农民。在北伐进入高潮的1926年11月，全国加入工会的工人有280万；到1927年初，全国农会的会员达九百万以上⁹。

反帝国主义是国民党联俄容共后高举出来的口号。1924年10月，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推倒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人，于应邀北上商谈国是时，途经上海，曾经宣布：「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的言论，大大鼓舞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将反帝废约的宣传推到高潮。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在回忆中指出，当时「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主义，学生很受感动。……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以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事实上，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即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愤怒地谴责了英国巡捕悍然枪杀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和工人；实际由共党主导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则与主张缩小抗争的上海总商会展开斗争¹⁰。

孙中山的遗嘱，系由邹鲁自北京带回广州。1925年5月国民党

引初晓，〈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页59。

⁹ 雷兴长，〈1905-1927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活动试析〉，《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页100。

¹⁰ 曹力铁，〈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页269-273。

一届三中全会在广州开会，即全体一致通过，并发表宣言：「吾人今日唯一之责任，则在完全接受我总理之遗嘱。」此一决议，到 1926 年 1 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二全大会时，加以认可¹¹。孙中山遗嘱的内容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¹²

国民党联俄容共后，国共之间的斗争比联合为多。斗争的一般原则，共产党在 1925 年 1 月的四全大会中决定：「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形成左、中、右三派，党的方针是要扩大国民党左派、批评中派的动摇、共同反对右派。」是年 10 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决定：「我党现在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们反对国民党右派，联络国民党左派、与左派建立密切联系，并从各方面去帮助左派打击右派。」¹³ 蒋介石在回忆中指出：共产党「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汪、胡之间相互猜疑与冲突」，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分化作用¹⁴。

汪精卫（兆铭）、廖仲恺及其他亲共的国民党员，积极争取共产党效力国民革命；胡汉民、戴季陶及其他反共的国民党员，则竭力防止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反共的国民党员除胡汉民、戴季陶外，尚有冯自由、马素、邓泽如、林直勉、谢持、林森、邹鲁、张继等人。早在孙中山酝酿改组时，冯自由、马素、邓泽如、林直勉等即表示反对，不许共产党跨党；到改组后半年，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又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谓「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但这些反对意见，均为孙中山排除。孙中山逝世后，谢持、林森、张继、邹鲁等于 1925 年 11 月在北京西山开会，要求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俄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之共产党员，并于上

¹¹ 李云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学报》4 卷 1 期，页 27-28。

¹²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页 2131。

¹³ 前引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影响〉，页 321。

¹⁴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页 38。

海另立国民党中央¹⁵。前此在右派国民党人防共、逐共的风潮中，共产党结合左派国民党人首先使戴季陶离粤赴沪，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又遣胡汉民赴俄，一些反共的中央执监委员林森、邹鲁等无法见容于广州，先后离粤北上，乃有西山会议的召开。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处理西山会议问题，共产党人及左派国民党人以维护党纪、党统为由，主张严惩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员，蒋介石等则坚持从宽处理，结果除二、三人开除党籍外，余仅作形式上的警告或严重警告。到1927年国民党清共，西山会议派获得合法地位；1928年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时，就正式撤消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¹⁶。

国民党容共到清共期间，国共双方面的斗争除前述者外，重要的有：（1）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2）中山舰事件，（3）整理党务案，（4）北伐案，（5）新旧三民主义之争，（6）土地政策之争。

（1）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军校学生所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为共产党渗透控制，宣扬共产主义。部分学生乃组孙文主义学会与之对抗。1925年8月廖案发生，青年军人联合会藉廖案大肆攻击胡汉民、戴季陶、邹鲁等人，并公然倡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共产革命，孙文主义学会乃起而驳斥，青年军人联合会复扩大组织为革命青年联合会，声言「联合革命青年，肃清反革命派，以实现民族解放」。约在同时，上海、北京等地亦出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嗣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势力结合，遂使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孙文主义学会更加仇视。校长蒋介石为消弭冲突，于1926年4月7日下令取消校内小组织。到4月16日、21日，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孙文主义学会虽先后宣布解散，但双方的斗争并未停止¹⁷。

（2）中山舰事件：1926年1月，第二次东征完成，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由潮汕回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全大会，提出北伐的主张，未获通过。2月24日，蒋再度建议早定北伐大计，仍未被接受。3月

¹⁵ 前引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页73。

¹⁶ 前引李云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页23，30-31。

¹⁷ 前引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影响〉，页326-332。

18 日，蒋介石在军校开会，力主北伐，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Kissanka）则在会议中指出北伐必败。蒋介石为此，两度访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提议撤换季山嘉，谓革命之权不可落入外人之手。汪将此事告诉季山嘉，并暗示蒋应即离粤。时蒋介石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于 3 月 20 日凌晨以自己的座舰中山号连夜升火待发，怀疑有阴谋，乃宣布戒严，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之中共分子，派兵收回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收缴被共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3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令俄国顾问季山嘉等回俄，李之龙应即查办，与苏俄继续合作。会后汪精卫称病隐匿，5 月 11 日秘密离粤赴法。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莫斯科当局和中共方面对此事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斯大林（Stalin）则主张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维持合作关系¹⁸。汪精卫离粤后，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张人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自是党权、政权、军权暂趋一致。

（3）整理党务案：1926 年 4 月 3 日，蒋介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整军肃党克期北伐案」。5 月 15 日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会中就此案加以讨论，其决定是：①共产党应改善对国民党的言论态度，尤其对总理和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或怀疑。②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全部名册，应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管。③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由共产党员充任。④凡隶属国民党籍者，未经许可，不得别有组织和行动，并不得有党务会议。全会又通过宣言，声明实行北伐。当时共产党实行退缩政策，蒋介石的提案遂得以顺利通过¹⁹。

（4）北伐案：孙中山自 1917 年 9 月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即伺机北伐，但在 1918 年 5 月因军政府改组离粤赴沪前，仅一度扩展护法势力到湖南。其后于 1920 年藉粤军陈炯明之力回广东，到 1922 年初，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一度欲北伐，进攻直系，因陈炯明掣肘而止。其后孙为陈所迫赴沪，到 1923 年得滇桂

¹⁸ 蒋永敬，〈准备北伐中掀起的黄埔怒潮〉，《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 卷 10 期，页 27-28；前引李云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页 36。

¹⁹ 前引蒋永敬，〈准备北伐中掀起的黄埔怒潮〉，页 28；前引李云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页 34，36。

军之助再回广东。1924年秋，一度又欲联合皖段、奉张讨伐直系，因广州商团叛乱而止。当时国民党初实行联俄容共，广东内部尚不统一，东江有陈炯明，海南岛有邓本殷，皆割据一方，苏俄和中共都不赞同北伐，但苏俄军事顾问加伦（Galen）曾于1925年9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曾于1926年1月，提出主张，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可以移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1926年1月，广东已完成统一，蒋介石在二全大会中提及「现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行将厉兵秣马，出定中原」。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统一两广委员会，蒋介石提出「早定北伐大计，应援西北国民军案」（冯玉祥的国民军亲苏亲国民党，受直奉联军的攻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于2月21-24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等，决定「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为当时直奉联军已在北方驱逐亲近国民党的国民军，并准备进攻广东，中共亦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以救国民军之危」。但当时来中国视察的苏俄使团布勃诺夫（Alexandre Bubnov）等却不赞同急着北伐；3月初该使团到上海时，陈独秀亦未能说服布勃诺夫²⁰。蒋介石感于革命大权旁落，自3月20日的中山舰事变起，即以行动镇压国民党中的中共、俄共势力，此后在国民党内委曲求全的中俄共党不再反对北伐，可能的原因亦与蒋介石谋北伐之目的相似：当时蒋欲摆脱被中俄共党势力困于一隅，而中俄共党于三二〇事件后赞同北伐亦希望摆脱被反共的蒋介石困于一隅。因此是年5月中旬，北伐案乃在二届二中全会中通过。

（5）新旧三民主义之争：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为在策略上应合中俄共所要建立统一战线，虽实行扶助农工政策，并未改变其素所抱持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自晚清革命时期即倡三民主义，惟其内容要到1924年1月一全大会期间孙中山公开有系统地讲演三民主义时，才算固定。孙中山在联俄容共之始，详细说明三民主义的内涵，主要在表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免同志发生革命理论上的争执。但中共党人并不就孙中山所讲演的三民主义加以发挥，却从有利于中共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上加以发挥。譬如恽代英编黄埔军校教材《国民革命》，简单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帝」，民权主义解释

²⁰ 参考曾庆榴，〈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理论与教学》，1986年第6期，页25-27。

为「反军阀」，民生主义解释为「打倒地主、资本家与土豪劣绅」。²¹又譬如指三民主义加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为新三民主义，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就是拥护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不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就是假三民主义。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决定取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宋庆龄在1926年1月的二全大会上即指责西山会议派背叛新三民主义，要求党人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²²。实际上，在国民党的文献中，并无新三民主义之名，亦无联共之名。当时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研究较为深刻的是戴季陶。戴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因不满中共假国民党之名搞活动，于1924年6月28日去沪。孙中山逝世后，戴一度回广州，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及〈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两文，从理论上打击中共。1925年6月再返上海，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驳斥中共的宣传品〈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树立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正统地位。前述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行动，颇受戴季陶思想的影响²³。

（6）土地政策之争：三民主义的土地政策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但要用和平的方法达成。平均地权的方法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照价征税，亦可照价收买。国家可将公有地和照价收买之地，配售给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中共的土地政策采急进办法。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但实际的做法仍较为缓和。1921年9月在浙江萧山等地、1922年6、7月间在广东海丰等地，只组织农民协会，从事减租减息的斗争；1922年7月的二大和1923年6月的三大，都只强调「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1923年7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但陈独秀认为，中国农村自耕农居多数，中国农民受地主压迫不大，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因此没有立即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1923-1924年中共加入国民党后，虽然有时提出较急进的口号（如1925年10月10日在〈中

²¹ 前引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影响〉，页322。

²² 朱汉国，〈宋庆龄为捍卫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学术月刊》，1986年第9期，页70。

²³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397-398。

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号召实行耕地农有，就是「谁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但中共实际的做法仍然从减租减息做起。1926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减原租25%（二五减租首次提出），借贷利率不超过二分。此一纲领，到是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中被接纳。其后随着北伐军的北进，中共在湘、鄂、赣地区推动减租减息政策，到1927年3、4月间更开始推行耕地农有政策。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北伐时期推动土地革命，对土地革命有兴趣的毛泽东在湖南积极活动，由于两湖地区左派国民党人势盛，是年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决议准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财产，于是湘、鄂、赣地区展开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4月12日，蒋介石在京沪一带开始清除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在两湖地区军人、富农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土地政策加以收缩，并限制农民协会的活动。到6月，湘、鄂、赣三省被杀的工农群众万余人。当时陈独秀和鲍罗廷都主张在土地问题上退却，以维持统一战线，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携共产国际训令，要中共立即动员二万共产党员、五万革命工农，组织军队，并将此训令告诉汪精卫。此时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取代了陈独秀之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宣言，重申「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汪精卫见国民党面临共产革命的威胁，乃于7月15日宣布分共²⁴。汪精卫的分共在方式上与蒋介石的清党不同。蒋介石系将党内的共产党员加以逮捕或杀害，汪精卫则让党内的共产党员和平离开。

国民政府的成立与两广的统一

国民政府一词，首见于1906年同盟会本部所发布的军政府宣言。军政府宣言，将革命的性质界定为国民革命，以别于过去的英雄革命。所谓国民革命，是指「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国民革命即平民革命，「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但是建立国民政府的理想，在民国建

²⁴ 杨勤为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页16-21；郭德宏、梁尚贤，〈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页178-189。

立后，迟迟不能实现。孙中山曾于 1912 年在南京建「临时政府」，1917 年在广州建「军政府」，1921 年在广州建「非常政府」，1923 年在广州建「陆海军大元帅府」，皆未以「国民政府」为名。1924 年 1 月，孙中山于一全大会中提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会中决定组织国民政府²⁵。但以当时东江有陈炯明的反抗势力，广州在滇桂军的环伺之下、又受商团势力的牵制，而孙中山尚在进行与北方皖系、奉系军人联合，谋推倒主持北京政府的直系。组织国民政府的事，至平定商团势力、打倒直系势力以后，因孙中山病逝，国民党欲将独裁制的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始付诸实施。其间经过，颇为复杂。国民党一全大会实行联俄容共后，引起英国的敌视，广州商人亦因工运关系对国民党疑虑。1924 年 8 月，受香港英政府支持的广州商团突进口长短枪五千枝，大元帅府下令扣押，引起大元帅府与商团间的紧张。屡经折冲，大元帅府于 10 月 10 日将枪枝发还，商团气焰升高，且与东江陈炯明相呼应。10 月 15 日，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会合许崇智的粤军、吴铁城的警卫军等，将商团包围缴械，广州局势初定。嗣孙中山与皖、奉联合倒直的战争亦有结果，冯玉祥于 10 月 23 日在北京发动「首都革命」，推倒直系政权，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于 11 月 13 日自广州启程北上，大元帅一职由胡汉民代理。1925 年 1 月，大元帅府下令东征陈炯明，由滇军杨希闵任左翼，桂军刘震寰任中路，粤军许崇智及黄埔军蒋介石任右翼。粤军及黄埔军一路于 2 月下旬克海丰、陆丰，3 月初旬克潮州、汕头，负责进攻惠州的滇、桂军则无所进展。时孙中山在北京病笃，随侍在京的中央委员虑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发生问题，召集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合议制。代行大元帅胡汉民以中央执行委员既有此议，乃主张正式组织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孙中山逝世后，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图控制广州，6 月 3 日以后并占据广州市内各机关，胡汉民断然调军驱逐。到 6 月 13 日，自东江回师的黄埔军及粤军、来自北江的谭延闿的湘军和朱培德的滇军、来自西江的梁鸿楷的粤军以及省河南岸的李福林的福军，联合进击广州，杨、刘败走香港。6 月 14 日，胡汉民召集中央政治委员开会，当即决定组织国民政府。7 月 1 日，国民

²⁵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 7-16。

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设委员 16 人，以汪精卫为主席。7 月 3 日在国民政府下成立军事委员会，亦以汪为主席²⁶。

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发生于 6 月 23 日的沙基惨案对英交涉。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各界于 6 月 23 日发动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受到沙面英军的射击，死伤数百人。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广东方面单独与英交涉无结果，当时段祺瑞执政府尚与广东方面维持和好关系，乃将沙基惨案移北京外交部对英交涉。另一方面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人，为对英抗议，即大规模地罢工，使香港百业陷于停顿。英国与国民政府间一度于 1926 年 7 月恢复交涉，但无结果。到 10 月 10 日国民政府（时已在北伐途中）才取消罢工²⁷。

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是 1925 年 8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廖仲恺被刺所引起的党内分裂。当时国民党的权力在左派汪精卫之手，共党气势颇盛，引起右派人士不满；廖仲恺为联俄容共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不满者乃集矢于廖。事发之后，鲍罗廷及汪精卫乘机打击右派国民党人，派胡汉民赴俄协商有关问题，派林森、邹鲁北上宣传。但林森、邹鲁等北上之后，即联络右派国民党人，于 1925 年 11 月召开西山会议，决议取消共党加入国民党者的党籍，并另选中央委员，成立委员会，于 12 月在上海办公。1926 年 1 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举行二全大会，对参与西山会议的人加以处分。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则于 1926 年 3 月另开二全大会，决议分共（即使中共党员脱离国民党组织）²⁸。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外与英国冲突，内部有国共两党及国民党左右两派冲突，军队指挥系统则能逐渐统一。负责军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于 1925 年 7 月 26 日建议将驻在广东的各省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8 月 26 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整编军队：以蒋介石的党军为第一军，谭延闿的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为第三军，许崇智的粤军为第四军。9 月，许崇智辞职，所部粤军分为四、五两军，以李济琛统第四军、李福林统第五军。当时陈炯明的势力尚在东江；广东南部迄于海南岛一带有邓本殷的势力，

²⁶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 31-34，38-43，45-50，95；前引蒋永敬，〈准备北伐中掀起的黄埔怒潮〉，页 24-26。

²⁷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 149-167。

²⁸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 396-399。

北江一带有熊克武的川军，与之呼应。9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以第一、四两军为主力，作第二次东征。10月15日克惠州，11月6日抵汕头，陈炯明逃香港，东江平。另一方面，熊克武于9月20日到广州时被扣，其川军于10月3日为第二、三军所败，退往湘境。国民政府复于11月1日任命朱培德为南路总指挥，进攻邓本殷，到1926年2月，邓部悉被缴械，广东统一。此期间，国民政府于1926年1月，将广东地区零星的湘军、豫军、赣军、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程潜任军长；而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于1926年1月易为何应钦。在广东统一前后，广西亦逐渐统一。两广原为桂系陆荣廷的势力范围，1920年陈炯明自闽南回粤，将广东桂系势力驱逐。1921年陈炯明率军入桂，得桂军刘震寰之助，逐走陆荣廷。1922年陈炯明叛变，驻桂粤军回粤，陆荣廷号召旧部再起，号自治军。1923年孙中山得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等协助逐陈炯明回粤东，广西自治军的一支李宗仁及其部属白崇禧、黄绍竑等与孙中山取得联络，1924年以南宁为根据地，将陆荣廷的势力逐走，其部队乃奉广州大元帅府号令。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滇督唐继尧欲假道广西与驻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为一气，以扩大地盘。广东方面于6月间将杨、刘军解决，广西方面于7月将唐继尧的滇军逐退。1926年2月，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欲将广西的政治、军事、财政等均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李宗仁于3月13日通电赞成，国民政府即将李宗仁的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年6月2日，湖南南部唐生智的湘军，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²⁹。国民革命军编成之初，饷械俱不理想，武器方面，大都是老式步枪；机关枪不多，很少大炮，子弹平均每枝枪不到20发。俄国援助一些军火，数量不多，但颇重要。军饷方面，士兵每月6元、官佐12元，伙食零用都在内³⁰。但由于建立党代表制度，使军队有中心思想，知道为何而战，因此士气高昂。

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国共分途

²⁹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246-264，276-280，304-318；前引蒋永敬，〈准备北伐中掀起的黄埔怒潮〉，页26-27。

³⁰ 葛定华，〈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页76。

1926年3月两广完成统一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北伐，适湖南局势发生变化，乃启开北伐之门。缘1926年3月17日，湘军师长兼湖南督办唐生智占领长沙，逐湖南省长赵恒惕。唐原即倾向国民政府，逐赵之后，吴佩孚（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任赵部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进攻唐生智。5月1日唐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国民政府请援。另外，直奉联军攻南口甚急，地处西北的国民军亦屡向国民政府请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主张北伐援湘。此时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自经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后，急谋另辟发展空间，隶属第四军、共产党人叶挺的独立团乃于5月20日自广州北上，于6月5日到达湖南攸县，第四军的第十、十二师亦于7月3日到达攸县。其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案既已在5月中旬的二届二中全会中通过，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持北伐军事。7月9日，蒋在广州开北伐誓师大会，宣言「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北伐军分左、中、右三路：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右路军，由东江潮汕北攻福建、浙江；以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为中路，由北江出大庾岭，进攻江西；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为左路，由北江出韶关，进攻湖南，并以第八军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当时北方的军阀分为五大系统：一是直系吴佩孚，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正与奉系合作，向南口的国民军进攻，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为其势力范围，总兵力约二十余万人。二为直系旁支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据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总兵力近20万人，遥尊吴佩孚，复与奉系修好，以保境安民为职。三为奉系张作霖，据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及热河、察哈尔两地方，总兵力约三十余万人，方与吴佩孚合攻南口，向国民军进逼。四为国民军系的冯玉祥，此时冯玉祥为减少直奉联军的敌意，辞职赴俄，其部将鹿钟麟守南口，察哈尔、绥远两地方及陕西、甘肃二省为其势力范围，与山西阎锡山修好，较亲近国民政府³¹。五为阎锡山，在山

³¹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上）〉，《东方杂志》25卷15号）页21-29；前引曾庆榴，〈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页28-29；前引葛定华，〈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页76-77；王正华，〈国民

西省，与国民军系接近。

由于唐生智在湖南启开北伐大门，分兵湖南、江西、福建三路的北伐军，一开始是在左翼的湖南主攻，此路湖南、湖北、河南为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唐生智的第八军于7月11日占领长沙，叶开鑫退守岳州。蒋介石于8月12日入长沙，决定以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监视江西（如前所述，江西、江苏，并右路军何应钦的前敌福建、浙江，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以唐生智的第八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及李济琛（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留守，坐镇广州）的第四军自长沙沿粤汉路向武汉的方向进攻。此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及以国民党名义活动的共产党，积极在战地及敌后展开党务工作，而军事方面，对敌军将领的策反亦分头进行，故军事进展相当顺利，但苦战亦多。南战场方面，到8月22日革命军占领岳州。吴佩孚一面令刘玉春守汀泗桥，己则于8月25日自南口返抵汉口。革命军与吴军在汀泗桥反复冲杀，几进几退，到8月30日汀泗桥为革命军攻克，吴佩孚退守武汉。吴佩孚以靳云鹗部守汉阳，刘玉春部守武昌，己则在汉口坐镇。革命军方面，由李宗仁督队攻武昌，唐生智等部攻汉阳，第七军另一部攻汉口；中以武昌攻城战事最烈，总司令蒋介石及参谋长白崇禧均往督战。革命军于9月6日占汉阳，7日占汉口，吴佩孚退驻孝感、信阳；武昌尚未攻克。在革命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前，长江下游的孙传芳高倡保境安民，按兵不动，迨汉阳、汉口被革命军攻下，孙见情势危急，遂向江西、福建增兵，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方面，亦开始采取攻势，以配合左翼湖北战场。留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铭枢师等续攻武昌（至10月10日始攻克），李宗仁率第七军由武汉地区向长江下游移动，蒋介石率一部分由第一军编成之总预备队由湖南入江西，指挥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作战。9月3日攻击开始，目标指向九江、南昌，另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司令向福建前敌周荫人部进攻。孙传芳将军队分为五方面：第一方面军邓如琢，第二方面军郑俊彦，第三方面军卢香亭，第五方面军陈调元，均在江西战场；第四方面军周荫人在福建战场。革命军于11月4日占九江，蒋介石于11月8日入南昌，孙军

大溃。福建战场方面，何应钦于 11 月 11 日、13 日在永定大败周荫人部，于 12 月 18 日入福州，即布置攻击浙江。北战场方面，国民军在 1926 年 8 月 15 日在南口为直奉联军所败，向西北撤退。在此前后，国民军与国民党和俄国的联系加强。8 月 25 日冯玉祥在游俄归国途中宣布率全军加入国民党。9 月 17 日冯抵绥远五原，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并誓师投入革命战争。其作战计划为绕道甘肃入陕西，沿陇海路东出潼关，在河南与自武汉北上的北伐军会师。时陕西刘镇华之镇嵩军围困西安已五月余，守将杨虎城表示愿坚守以待国民军。西安城中饿毙人民甚多，至 11 月 28 日始为冯军解围，刘镇华逃潼关³²。

在革命军占领两湖及闽赣之后，北方各派军阀谋求联合，首先孙传芳与张作霖的奉系联合，组织安国军。1926 年 12 月 1 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及张宗昌为副司令，并与坐困河南的吴佩孚联络，促吴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孙传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吴佩孚虑奉系侵夺其河南地盘，不受张作霖指使；孙传芳却与张宗昌、褚玉璞组直鲁联军，引张、褚率军南下。1927 年 2 月 24 日，张宗昌部毕庶澄军抵上海，褚玉璞军则在南京、镇江布防。革命军方面，由于东路何应钦军尚迟滞福建，蒋介石派白崇禧为东路前敌总指挥，由赣入浙，2 月 19 日占杭州。长江方面，由于汉口英租界及九江英租界先后于 1 月 4 日、7 日为革命军收回，英国调派重兵保护上海租界，各国继之，引起上海市民公愤。主要在中共党人策划下，上海于 2 月 19 日开始大罢工。3 月 14 日，北军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归顺国民政府。3 月 19 日，白崇禧率军攻至上海近郊。3 月 21 日，在中共党人周恩来指挥下，上海工人暴动，攻击警察局和兵营，建立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3 月 22 日，革命军占上海，毕庶澄避入租界，临时政府取消。

另一方面，自江西沿长江北岸东下的第二、第七军为江左军，由李宗仁指挥；自江西沿长江南岸东下的第三、第六军为江右军，由程潜指挥；由上海沿沪宁路西上的东路军，由何应钦指挥；联合向南京进攻。至 3 月 24 日，革命军入南京，褚玉璞北遁。入南京之程潜军，

³²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上）〉，《东方杂志》25 卷 15 号，页 29-32；〈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中）〉，25 卷 16 号，页 25-31，37-38；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 351-357。

袭击外人机关及住宅。长江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引起外交纠纷，年余始获解决；程潜军为此被蒋介石缴械。蒋介石指挥各军占领南昌、上海、南京等地前后，留在广州的中央党政机构于 1926 年 12 月，在蒋介石的不断要求下，迁至武汉，并于 13 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后，在鲍罗廷、共党及左派国民党人的策划下，在两湖及江西地区扩大农民运动及排外运动，引起社会不安。是年 12 月底，另一批中央委员张人杰、谭延闿等到南昌晤蒋介石，于 1927 年 1 月 3 日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暂驻南昌，此事引起武汉与南昌的对立。时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既不能与南昌国民党中央协和，复在两湖、江西、上海、南京等地采取单独行动。原即主张分共的西山会议派，自上海派桂崇基赴南昌，敦促早日清党。是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乘舰抵上海，邀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等草拟实行清党之步骤与方法。吴敬恒等乃于 4 月 2 日提出检举书，检举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背叛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当即议决令各地军事当局，将共党首要各人分别看押监视。汪精卫于 4 月 1 日自海外赶抵上海（汪于 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后赴法，至是年 10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迎汪复职），谋缓和国共冲突，并与共党首领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劝告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汪精卫赴武汉前，曾与上海各中央委员约定 4 月 15 日在南京开二届四中全会，彼负责劝导武汉各委员东下协议合作方法，但 4 月 12 日，蒋介石即在他所控制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区展开清党，共产党人被逐或被捕杀者颇多。4 月 15 日，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及武汉方面其他委员未至，蒋介石遂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并于 4 月 18 日开始办公。4 月 23 日，武汉方面发动群众游行示威，谴责蒋介石叛党、叛军、叛政，武汉国民党中央遂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职拿办³³。宁汉遂告分裂。

宁汉分裂后，4 月 24 日在南京召开的海陆军会议宣言一致完成北伐，于是北伐战争继续进行。革命军总司令部于 5 月 9 日订立三路进攻计划，正面之敌为张宗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三路进攻的任务

³³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中）〉，《东方杂志》25 卷 16 号，页 31-37；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页 361-364；前引葛定华，〈1924~1927 年的国民革命〉，页 77-79；桂崇基，〈清党运动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2 期，页 129-130。

是：（1）何应钦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由镇江、常熟渡江北进，正面之敌为孙传芳部。（2）蒋介石自任第二路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由南京渡江，沿津浦路北进，正面之敌为张宗昌部。（3）李宗仁任第三路总指挥，一支由芜湖斜截津浦路攻浦口，一支北上六安、合肥，攻陇海路。5月13日下令总攻击，首由第三路斜截浦口，于15日与直鲁联军接战，第二路则乘机强渡长江，占领浦口。孙传芳于18日下令总退却。22日第一路在镇江、常熟间渡江北进，24日占扬州。第二、三路于21日占蚌埠，6月2日占徐州；6月12日第一路迫进郟城。武汉方面，正面之敌为奉军。因与南京、上海方面有冲突，无暇北进，初采防守态势，并计划东征。以河南靳云鹗负阻止奉军南下之责，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潼关东征，侧攻郑州。靳云鹗原为吴佩孚部，但反对与奉系联合。当1927年初赞同与奉系联合之吴佩孚部将寇英杰引奉军南下时，靳即与革命军接触。1927年3月底，郑州、开封相继为奉军所占。4月，靳云鹗派代表赴武汉请援，武汉方面乃接受苏俄指示，为扩大两湖革命基地，并与冯玉祥会师以打开国际通路，放弃容易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东征，派唐生智、张发奎部入河南。6月1日，唐部占郑州，张部入开封。另一方面，冯玉祥部于5月初自陕西东进，26日下洛阳，6月1日与唐生智部在郑州会师。吴佩孚在部众纷纷他去的情形下，即自南阳潜奔四川，依附杨森（初住白帝城，后移居万县。日本曾于吴败走时，欲以款械相助，为吴所拒）。至是，武汉方面大体自奉军手中获陇海路河南段，南京方面大体自直鲁联军手中获陇海路江苏段，亦即在1927年6月初，北伐军已进至陇海线。而山西省的阎锡山，于6月6日通电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所部12万人，分向大同及娘子关两路出动。在宁汉双方北伐之初，汉方为减低与宁方的对立，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主导下，缓和了过激的土地政策及工运，譬如4月下旬下令禁止工农运动的越轨言行、5月8日下令禁止工农团体集会游行等。5月17日，夏斗寅部在湖北宜昌起兵反共，到5月下旬攻打武汉受挫；5月21日，又有许克祥部在湖南长沙起兵反共。到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决定武汉之军全部回师，镇压内部，而将北方军事委冯玉祥。冯此时倾向反共，

令其代表在南京与蒋介石有所接洽，到6月19日，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徐州开会，决定共同北伐（时张作霖已于6月18日在北京任大元帅，组军政府，准备全力应付革命军）。此次北伐分兵三路：（1）东路由赣榆、郯城北进，由白崇禧指挥；（2）中路正面作战，由李宗仁指挥；（3）西路正面作战，由冯玉祥部孙良诚指挥。6月23日开始总攻击，中路军于6月24日占韩庄，27日克滕县；东路军于27日占临沂，另一支于28日占日照；西路军于7月14日占彰德。嗣以日军出兵胶济路，革命军迅速攻下济南之计划受阻。此次北伐，北方受阻于日军，西方受武汉东征军的威胁。在6、7月间，武汉东征军张发奎部已达九江，唐生智、程潜部已抵黄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乃不得不紧急班师，以巩固南京。除冯玉祥部外，仅留少许兵力守临城、枣庄，余悉回南京。武汉方面的东征是左派国民党人的虚张声势，被拥戴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有见于反共势力的高涨和来自长江下游的经济封锁，则不断谋求与南京国民政府协合一致，初与陈独秀商定国共合作办法，限制农工运动；继则于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执会，决定实行分共。是后自8月1日南昌暴动始，中共走上武装暴动之路。另一方面，宁汉统一的商谈则逐渐落实。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8月22日武汉代表汪精卫等、南京代表李宗仁等在九江商议合作办法。9月11日，汉、沪（西山会议派）、宁三方面主要负责人汪精卫、邹鲁、李宗仁等在上海商议统一问题；次日，三方面推出代表组「特别委员会」综理党务。特别委员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于9月20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但汪精卫以提议召开四中全会被拒，远走九江，嘱唐生智东征，旋又联络广东的张发奎，与唐生智建反南京联盟。11月初，唐生智的东征军为李宗仁的第三路军所败，唐逃日本。张发奎于12月中旬平定广州中共暴动后，表示效忠国民政府，汪乃于12月17日乘轮赴法。其间，四中全会于12月10日在上海开预备会议，通过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宁宣布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2日四中全会召开，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主中枢。当宁汉忙于协商合作之际，留守在临沂、枣庄的革命军，敌不过直鲁联军的反击，陆续撤退到长

江南岸³⁴。

宁汉合作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前后，国民革命军先应付了直鲁联军的攻击，次则贯彻了北伐大业；共产党此时已无力应付军阀和帝国主义国家，只能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后方，以零星暴动的方式，企图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基地。因此，自1927年8月以后，迄于1928年6月北伐军事结束以前，国共的势力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分途发展。兹先述国民革命军应付直鲁联军之反击和贯彻北伐大业。

南京方面的北伐，因武汉方面东征而班师之后，直鲁联军即开始反击，分兵两路南下。8月17日，西路军由津浦路南下抵浦口；约在同时，东路军抵扬州。8月25日夜，直鲁联军在南京城东北燕子矶等地渡长江，初时占领栖霞山，继又袭据龙潭，第一波渡江的兵力约二万人，其后陆续渡江。27日，国民革命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向渡江的直鲁联军反击，至31日国民革命军将渡江的直鲁联军击溃。直鲁联军先后渡江者约七万人，由孙传芳亲自指挥；国民革命军先后投入战场者近十万人。

战争期间，英、日海军曾助孙传芳，但未发生效力。国民政府既将渡江的直鲁联军击溃，于9月4日再申北伐令，于是各路国民革命军向敌人展开攻击。阎锡山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方面，于10月初旬，北路出大同进至张家口，中路越山西东北部山岭地区进至直隶涿州，南路出娘子关进至石家庄，前敌均为奉军。嗣以孤立无援，至11月6日，下令总撤退，仅傅作义部依阎之约，在涿州苦守三个月，以待北伐军，嗣以北伐军未至，至1928年1月6日经调解和平撤军。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方面，何应钦于11月中旬克复蚌埠，12月16日克复徐州，与直鲁联军相峙于台儿庄、韩庄一带；东路军则与直鲁联军相峙于海州。此期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自河南中部向山东、直隶发展，东北进抵山东曹县，前敌为直鲁联军；向北进抵河南彰德，前敌为奉军。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首先将革

³⁴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下）〉，《东方杂志》25卷17号，页41-51，53；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410-411；廖盖隆，〈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1期，页31-32；萧牲，〈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和策略〉，《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页46-47；前引葛定华，〈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页79-80。吴佩孚拒绝日援事，见杨森，〈吴玉帅与我〉，《中外杂志》7卷4期。

命军编为四个集团军，并分配战斗任务：蒋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所辖第一军团由津浦路正面进军，总指挥刘峙；第二军团由海州攻山东东部，并与第一军团会攻泰安，总指挥陈调元；第三军团由徐州西北丰、沛两县攻济宁，总指挥贺耀组；第四军团由徐州西面的砀山和河南东部的商邱北进，总指挥方振武；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所辖第一方面军由河南东部进攻曹县、济宁，与第一集团军联络，总指挥孙良诚；第二方面军由京汉路北进，总指挥孙连仲；第三方面军进兵路线初与第一方面军同，后移石家庄，向河间、南苑前进，总指挥韩复榘；第八方面军，由豫北攻大名（直隶南境）趋德州（山东北境），总指挥刘镇华；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在彰德前敌，兼北路军总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所属第一军团任北路，由京绥路攻直隶，总指挥商震；第二军团任南路，出石家庄，总指挥徐永昌；第三军团任中路，出灵丘（山西东北，在平型关外），总指挥杨爱源。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驻武汉，自湖北赴河南参加前线各军（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统率。

此期间，以张作霖为中心的安国军，分为七个方面军团：第一方面军团守济宁，总司令孙传芳；第二方面军团守鲁南，总司令张宗昌；第七方面军团守大名，总司令褚玉璞；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防娘子关（即石家庄一线）、平型关（即灵丘一线）及京汉路；第五方面军团防山西北部，总司令张作相；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作为后备部队。

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4月9日在徐州下总攻击令。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于10日占郟城，即进行侧攻泰安。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攻下台儿庄，包围峰县，续攻临城，于4月18日攻下滕县，5月1日占领济南。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于4月16日占领济宁。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在彰德前线陷于苦斗，而第三集团军在安国军压力下，未能出山西一步。此时，原已暗助鲁督张宗昌的日本，突然出兵直接干涉，福田彦之助于4月25日率第六师团抵青岛，即沿胶济路布防，济南商埠地区亦驻日兵。5月1日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的方振武，于5月2日访日军斋藤旅团长，声明维持秩序，保护外侨，由中国负

责，请日兵撤除警备。5月3日，日军向革命军开衅，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让，以免革命军在此被日军所困，妨碍北伐大业。5月6日，革命军退出济南城，绕道长清等处，渡黄河继续北伐。5月9日，张作霖以五三济南事件为借口，通电主和，革命军则继续进兵，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于5月13日占德州。另一方面，第三集团军亦有所开展，南路于5月11日占石家庄、正定，中路冲出平型关至灵邱、出龙泉关至阜平，北路出雁门关抵大同附近、出偏关占归绥。蒋总司令于5月19日由徐州至郑州，晤冯玉祥、白崇禧，复于5月30日赴石家庄晤阎锡山（其第三集团军的中路于5月26日下保定，北路于5月30日下张家口），决定调整作战任务，留第一集团军在山东监视日军，由第二集团军任津浦路正面攻击，调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北上任京汉路正面作战，两路向北京夹攻。嗣为外交关系，避免在北京作战，遣人劝张作霖率兵出关，俾和平接收北京。张作霖盱衡局势，于6月3日乘京奉路车出关，次日清晨于皇姑屯为日军预埋之炸药炸毙。张学良在北京得讯，急指挥奉军退往滦州，并将奉军陆续撤出关外。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8日，第三集团军入北京，次日和平接收天津。继统奉军的张学良，于7月1日电国民革命军，表示赞同和平统一。7月19日，热河的奉军首领汤玉麟首先归顺国民政府。此期间，在东北地区拥有重要经济利益的日本，两度向张学良发出警告，劝勿归顺国民政府，张不为所动。9月，张宗昌、褚玉璞的军队在唐山、滦州一带为白崇禧消灭³⁵。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27年7月到1928年下半年，当国民政府自南京进行北伐、完成统一之际，自国民党中被清理而出的中共，则于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南，企图重建自己的势力。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后，中共中央于7月中下旬，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并在湘、粤、赣、鄂四省策动农民暴动；8月1日的南昌暴动，即为四省暴动的一部分。南昌暴动，由周恩来领导，主要力量来自原国民革命军中由中共党人所带领的部队，包括由张发奎的第四军扩编成的第十一军第二

³⁵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下）〉，《东方杂志》25卷17号，页51-66。

十四师（师长叶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另有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参加。中共在南昌暴动，被国民革命军包围攻击，仅维持四日，部众由朱德率领，辗转至湖南南部，最后在砦市与毛泽东部会合，转往井冈山。部分余众转往广东东江，为陈济棠的粤军击溃。南昌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武汉开会，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陈未必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的决策而已），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并决定在「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地区进行暴动。湖南秋收暴动由毛泽东领导，主要武力为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并会合各地工农武力，于9月9日同时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起事，失败之后，余众由毛泽东率领，转往井冈山。南昌暴动前夕，张发奎惧其部全部响应南昌暴动，一面将其部队中的中共党人清除，一面带领部队南下广州。张发奎占据了李济琛的地盘，桂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谋攻广州；张发奎派兵前往迎击，广州空虚，共产党人乃于12月11日在广州暴动。此次暴动，由张太雷指挥，主要兵力为张发奎第四军的一个教导团，该团团长为共产党人叶剑英，其他的兵力有工人赤卫队，响应者有警卫团等。曾攻占公安局，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发奎班师定乱，张太雷被击毙，或云被暗杀，余众于12月15日退往花县，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由叶镛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从事游击战争。从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之间，中共在全国各地计划或付诸实施的暴动百余次，重要的如1927年10月间唐生智的东征军自安庆失败后撤，中共党员及工人曾谋占武汉，排除唐生智在武汉的领导，后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制止。又如是年10月18日，共党在北京东面的玉田县乘奉军忙于应付国民革命军之际起事，一度占领县城，旋失败。一连串的暴动失败，折损中共的士气和实力，而在国民党的严厉制压下，罢工已不容易，暴动更为困难。中共于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指斥这些暴动为「左倾盲动主义」。决定将活动中心转向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³⁶。此期间，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对城市的控制加强，中共不得不改变城

³⁶ 前引葛定华，〈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页82-83；金再及，〈试论八七会议到「六大」的工作转变〉，《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页171-186；桂崇基，〈清党运动的历史意义〉，页130；李樾、于吉楠，〈回顾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页20-26。

市暴动的策略，计划在较为荒僻的农村地带建立根据地。

第四章
体制认同与政治权力之争
(1929-1937)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巩固与开拓

中国国民党在兴中会、同盟会时期，由知识分子领导，初以会党为主要革命群众，其后与新军建立关系。武昌革命爆发，各省宣布独立，主要靠新军。民国建立之初，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为扩充党势，大量吸收官僚、军人。中华革命党时期，统治阶层反袁者多与进步党接近，中华革命党网罗群众的革命，收功无多。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周旋于军阀、官僚，政客之间，对农、工、商阶层，甚至知识青年，疏于联络。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到1924年实行联俄容共政策，逐渐重视知识青年及农、工阶层，但与商人的距离较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矛盾愈来愈深，主持黄埔军校、以练兵整军起家的蒋介石将革命力量的凝聚放在军事上，农、工、商、学等阶层皆为军事和政治的附庸。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从成立始，其权力皆在军人、官僚、政客和职业革命家之手。

国民政府的建制与权力结构

国民政府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而成立。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所依据的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以委员组织之，推定一人为主席。设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公布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由主席及主管部部长署名；不属于各部者，由常务委员署名，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之。军事、外交、财政各部，部长由委员兼任。此期间主席为汪精卫。1927年3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抵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次修正，废除主席，设常务委员。设财政、外交、交通、司法、教育、劳工、农政、实业、卫生部，每部部长得以国民政府委员兼任。公布法令及其他文书，至少须有委员三人之署名。1928年2月国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次修正，恢复主席制，由常务委员中推定。公布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由主席及常务委员二人以上之署名，其与各部有关者，并由各该主管部部长联署。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工商等部，及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政院、法制院、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此期间主席为谭延闿。1928年10月，时国民政府已在南京，国府组织法第三次修正，主席总揽全国治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1930年11月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四次修正，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会议改称国务会议。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由立法院院长副署；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由主管院院长副署。1931年6月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次修正，主席代表国民政府，五院对国民政府负责。此期间主席为蒋介石。1931年12月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六次修正，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五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其后1932年3月、1932年12月、1934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法又作第七、八、九次修正，与主席之职权无关。此期间主席为林森¹。

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历次修正，多与主席权的升降有关。至于国民政府委员的结构，历次略有不同，兹表列1928-1937年间历次委员背景资料如下²：

时间	人数	平均年龄	籍贯	教育程度	党员背景	出身
1928.2-10	52	46岁	分布十七省，南部地方较多	大专以上占85%，留日者占50%	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占65%，其后入党者占35%	曾在北京政府任职者占48%，任职于广州国民政府者占58%，展于各军系者占48%
1930.11-1931.6	18	46岁	分布九省，广东、浙江、东北合占61%	大专以上占89%，留学日本者占33%	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占67%，其后入党者占33%	曾任职于北京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者均在50%以上，属于各军系者占39%
1931.6-12	42	48岁	分布十七省，	大专以上占86%，	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占48%，	曾在北京政府任职者占57%，曾任职广州国民

¹ 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1997年6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页452-454。

² 同上，页182-185，261-263，286-289，335-338，386-388。

			中部地方超过南部地方	留学日本者占 26%	其后入党者占 52%	政府者占 38%，属于各军系者占 38%
1931.12-1935.12	47	51岁	分布十七省，中部地方最多	大专以上占 81%，留学日本者占 38%	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占 72%，其后入党者占 28%	曾任职北京政府者占 51%，曾任职广州国民政府者占 40%，属于各军系者占 32%
1936-1937.7	41	56岁	分布十八省，中部地方最多	大专以上占 80%，留学日本者占 41%	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占 76%，其后入党者占 24%	曾任职北京政府者占 54%，曾任职广州国民政府者占 27%，属于各军系者占 24%

上列历届国民政府委员，除重复任职者不计外，共九十六人，主要来自下列各类：（1）党国领袖：如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蒋介石等。（2）重要军事将领：如何应钦、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刘湘、龙云、韩复榘等。（3）担任党国重要职务者：如陈果夫、叶楚伦等。（4）同盟会时期老党员：如黄复生、熊克武等。（5）其他社会有名望人士：如唐绍仪、马良等³。如果从国民政府委员的人事结构来分析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应属于职业革命家、官僚与军人的结合。

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各级政府均受各级党部的指导监督。中国国民党于中央、省（市）和县（市）皆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市）、县（市）政府，应随时将施政方针函致同级执行委员会，转送监察委员会稽核。监察委员会稽核结果，如认为与该党政纲政策不合者，得附具意见，函由执行委员会转请同级政府修改，如有疑义并可要求解释。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于同级政府之施政，如发现有违背该党政纲政策者，得提出弹劾案于同级执行委员会，呈报上级执行委员会转请同级政府办理。为了减少党部与县（市）、省（市）政府之间的冲突，同级党部不能弹劾同级政府，必透过上级政府，由上级政府处分下级政府。中央级因无上级党部和上级政府可以呈报，于国民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设政治委员会，作居间联系机构。依据〈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党于政府建国大计及对内对外政策有所发动，必须以政治委员会的连锁以达于政府；即政治委员会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党负责，国民政府在执行政治方案上对政治委员会

³ 前引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页 345。

负责⁴。

政治委员会成立于1924年7月，1926年7月改称政治会议，1927年9月由于党务纠纷，政治会议一度停顿，1928年3月恢复，到1935年11月又改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或政治会议早期组织的情形不多论。1928年3月规定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9月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为政治会议委员，10月再规定除中央执监委员外，国民政府委员亦为政治会议委员，中执会并得推其他有特殊资格之人参加，但名额不得超过当然委员的半数。其后委员减少。1935年11月五全大会后，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委员中推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委员十九至二十五人。政治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并置法制、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分任审议及设计事宜。政治委员会或政治会议的首脑，自1924年7月成立到1932年11月四中全会前由委员互推主席。第四届中执会成立之初，采常务委员制，常务委员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至1932年12月四届三中全会后改由中常委九人兼充，会议主席由中常委轮流。1936年五全大会后，采主席制，主席、副主席由中执会推定。政治委员会负责国政大计，每遇国家发生重大外交及国防问题时，常增设特殊机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设外交委员会，1933年长城战役发生后设国防委员会。1935年11月，废外交、国防委员会；如前所述，另成立包括外交、国防的九个专门委员会。1937年8月，中常会为应付抗战需要，决定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取代政治委员会⁵。

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党政军合一。党中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有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有军事委员会。中央领导阶层人员，或为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或兼为二、三、四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职务愈多，权力愈大。

地方政府的建制与地方自治

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地方制度，分省（市）、行政督察（专员）区、

⁴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页190-194。

⁵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页194-198。

县（市）三级。省府的组织，自 1925 年 7 月所颁布的省府组织法，即采委员合议制。依照 1931 年 3 月 23 日修正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省政府设委员七至九人，由行政院提请国民政府简任。其中主席一人，由国民政府指定。省主席以下置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各厅长由行政院就省府委员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与省平行的行政单位为院辖市：（1）首都，（2）人口在百万以上，（3）在政治、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至抗战前夕，直属于行政院之特别市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西安、重庆及威海卫行政区。市以下的行政单位依次为区、坊、闾、邻。行政督察专员区为省与县之间的特殊组织。1932 年由「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倡行，1932 年 8 月行政院公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其后在 1936 年 10 月加以修正。依据修正后的该条例，行政院为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及增进行政效率，得令各省划分行政督察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辅助机关。行政督察专员由行政院长或内政部长提请国民政府简派，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指导暨统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县（市）级行政，依据 1928 年 9 月公布的县组织法，采县长制，县长由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二至三人，经省政府决议任用。县长以下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四局。县（市）以下的行政单位依次为区、村（里）、闾、邻。1934 年 12 月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为减少机关费用，通令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县政府废局改科。与县平行的行政单位为省辖市，下列之市列为省辖市：（1）省政府所在地；（2）人口在三十万以上；（3）人口在二十万以上而其所收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收入占各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执政的国民党对地方首长的人选颇为重视，如 1930 年 3 月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注重县长人选案〉，规定：（1）县长人选，考试院应于最短期间实行考试，严格拔取真才，分发各省任用。（2）县长到任，最初三个月为试用，后六个月为署理，再后为实授，任期三年⁶。

在地方行政单位中，省（市）不是自治单位。但 1928 年公布、1930 年修正的市组织法，均有市参议会的规定。有的特别市选举成立市参议会，而有的省亦单独选举成立省参议会。1933 年 3 月，政府公

⁶ 同上，页 214-21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页 930-937，939。

布市议会组织法及市参议员选举法。当时地方不靖，地方官对地方自治不热心，全国依市参议会组织法而成立市参议会者，在战前只北平一市。北平市早于 1928 年冬即着手筹备自治，城郊共划 15 区，1933 年 3 月 15 日起开始区坊自治职员民选，同月 23 日办理完竣。同月 26 日举行市参议员选举，选出参议员 37 人。8 月 1 日市参议会成立。省参议会在战前只有广东省选举成立，选举于 1934 年 6 月开始办理，议员有由各县市选出者，有由各界团体选出者，有由华侨选出者。8 月 15 日省参议会成立。省（市）级以下的县（市），依 1928 年公布、1929 年修正的县组织法，均有设置县参议会的规定，战前各省并未举办县（市）参议会的选举，广东省曾举办，如前述广东省参议会选举成立一样，系依据西南政务委员会所颁布的自治法规。西南政务委员会为一半独立的机构，1932 年 1 月 5 日广州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撤消后，于党设西南执行部、于政设西南政务委员会、于军设西南分会，实则仍为半独立状态。广东省依据 1933 年底西南政务委员会颁布的县市自治法规，选举县参议会，至 1935 年底，全省 94 县均有自治组织，包括县参议会、区民代表大会、乡（镇）民会议、里民会议和邻民会议。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鉴于地方自治不易推行，于 1934 年 2 月通过办法，将地方自治分扶植时期、开始时期、完成时期三阶段进行，是年 8 月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时期县市参议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县市参议会议员由县市长聘任。战前依此办法而产生的县市参议会，有贵州、甘肃、察哈尔、云南等省⁷。

其后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地方自治并未依原颁办法循序实行。政府于 1939 年 9 月 19 日公布办法、实行新县制，以取代 1929 年修正的县组织法。新县制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县的经济建设和地方治安的功能，而战前的组织法则着重训练人民行使政权。新县制规定，县的基层组织为「甲」，由六至十五户组成，甲长由甲内各户的户长选举。甲以上为保，每保六至十五甲，保长由甲长选举产生。保以上为乡或镇，乡镇以上为区，区以上为县。乡镇和区皆有人民代表会议⁸。就自治的精神而论，与战前的县制相若。

⁷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页 207-214。

⁸ William L. Tung,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Modern China*, p.193.

发展实业与控制工商

国民政府在权力结构上不仅党政军一体，政府也从事发展实业，并控制主要工商企业。依据 1928 年 6 月公布的行政院组织法，掌实业的部会有农矿部、工商部、交通部、铁道部，另有建设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1930 年 11 月行政院组织法修正，将农矿、工商二部合并为实业部。第一任实业部长由孔祥熙担任，到 1932 年 1 月易为陈公博，到 1935 年 12 月又易为吴鼎昌。1935 年 12 月进入行政院工作、与实业有关者，除吴鼎昌外，尚有秘书长翁文灏、铁道部长张嘉璈等。1935 年时除行政院有铁道、实业、交通三部外，国民政府有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附设有资源委员会，其中实业部、铁道部和资源委员会在实业发展上尤扮演重要角色。资源委员会设于 1935 年 4 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人力和物力资源之调查、统计和研究，拟定各种国防资源建设计划和战时动员计划，并经办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气等五种国防工矿事业。实业部在陈公博任部长时期曾提出四年计划（1933-1936），内容分为工矿计划和农林计划两部分，工矿计划包括煤矿、钢铁、铜业、石油、陕西油页岩、三酸、机械、自动车、制糖、造纸、磁业等项。铁道部于战前颇重长江以南铁路之修筑，浙赣、粤汉、杭甬、苏嘉、同蒲、江南、淮南等铁路均通车。1937 年 3 月铁道部长张嘉璈曾订有计划，预计至 1941 年修筑十四条铁路，以连接长江以南各省会及工矿区，并应合军事需要，惜因抗战爆发，计划多未付诸实施⁹。

尽管国民政府在从事实业建设上并不顺利，但由于重视实业建设，使 1927-1937 年间的实业有令人满意的发展。农业生产以稻谷和棉花为指标，稻谷的产量 1931 年为 974,369 千担，此后大体直线上升，1936 年的产量为 1,034,125 千担，共增长 6.1%。棉花的产量 1931 年为 7,513 千担，此后大体直线上升，1936 年的产量为 17,357 千担，共增长 131%。工矿交通方面成长更为显著，其情形可如下表¹⁰：

⁹ 吕玲玲，〈国民政府工业政策之探讨（1928-1937）〉（1994 年 6 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页 52-55，62-63，75，172。

¹⁰ 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页 251-255。

	1927	1936	单位	年增长
煤	14.2	26.2	产量百万公吨	7.0%
电力	772	1,724	发电百万千瓦	9.4%
水泥	498	1,243	产量千公吨	9.6%
棉布	8,999	35,448	产量千疋	16.5%
铁路	13,040	21,036	铁路公里数	800 公里
公路	18,000	69,000	公路公里数	5,100 公里

注：铁路 21,036 公里，为 1937 年之数

1926-1936 年，中国经济成长率为 8.3%，如将东三省除外，成长率也有 6.4%。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大企业家兴起，此在第三章「社会新生力的波动」一节中已有所论述。时当北京政府时期，企业家享有较多的自由，对政治的影响力日增。国民党在联俄容共后与商人的关系不睦，1924 年时，拥有万余人的广州商团企图破坏国民党在广州的势力，商人并表示不欲支付国民党北伐的开支。1927 年北伐军抵上海后，由于中共在上海掀动大罢工，上海的商人一度借款支持国民党清党。国民党开始与商人接触，并任命银行家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目的在利用钱永铭的影响力向上海商界找财源，并无意使商人参政。北伐期间，国民党为了筹措财源，不惜绑架上海商人，向其敲索。北伐完成后连年内战，政府仰赖上海商人购买公债，使商人获得 20% 的利润，而当时银行的利率只有 8.6%。1935 年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控制了 66-70% 的银行业；1936 年政府强制实行打折扣偿还公债。由于政府大力经办工商企业，不再给商人特权，部分银行家乃选择走入政府。如前所述，出身中国银行的吴鼎昌于 1935 年与私人企业断绝关系，转任实业部长，1937 年又转任贵州省长。另一位出身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 1935 年被迫离开中国银行，接任铁道部长，一直做到 1942 年。出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1937 年以后全力投入公职，于 1938-1941 年间任财政部外贸委员会主委。银行业者得跻身公职，起因于他们能对政府提供资金，解决财政赤字。与银行业者比较，一般工商业者甚少有机会转入公职。无论为官或继续经营工商金融企业，他们都被置于政府的卵翼之下。另一方面，自 1935 年以后，官办企

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甚为活跃。中国银行在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 15 个左右的纺织厂，并介入烟叶、面粉、稻米加工和外贸等企业。在吴鼎昌于 1936-1937 年任实业部长期间，组办了 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股份公司、上海中心渔市场等¹¹。

发展教育与培植人才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在教育制度上是承袭北京政府时期而有所损益。最大的不同为意识形态的灌入，本党化教育的精神，使学生加强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国民党的效忠。学制方面，初等教育，除幼稚园外，小学六年，七至十二岁，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中等教育六年，十三至十八岁，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三类，初级三年、高级三年；高等教育，大学四至五年，专科二至三年，其上为研究院。各级学校及学生人数，以 1931 年和 1936 年为例，表列如下：

	1931		1936	
	校数	学生数	校数	学生数
小学	19,835	1,496,278	39,034	5,101,770
中学	1,893	401,772	1,956	482,522
师范	867	94,683	814	87,902
职业	266	40,393	494	56,822
大专	103	44,167	108	41,922

当时实科教育有理、农、工、医等类，文科教育有文、法、商、教育等类，文科类的系、科、组，较实科稍多。大专学校毕业生，1931 年 7,034 人，1936 年 9,514 人，1927-1936 年共毕业 65,200 人¹²。

国民政府除发展各级教育外，亦派学生出国留学。留学有公费、私费两种，公费有美国庚款、英国庚款、日本庚款、比国庚款公费生和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东、贵州、陕西、甘肃

¹¹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页 847-848，856-860，868-871，874-875；P.M. Coble, Jr. 著、蔡静仪译，《金权与政权——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页 13-17，40-41。

¹²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 187-188，208，216-217，223-224，229-231，238，244。

等省所派公费生等¹³。兹将 1929-1935 年间历年所派公，自费生人数，表列于下¹⁴：

年度	公费生	自费生	总计
1929	89	1,568	1,657
1930	81	948	1,029
1931	39	411	450
1932	37	539	576
1933	101	520	621
1934	141	718	859
1935	104	929	1,033

历年留学国别人数的比，以 1929 年为例，日本占 61.7%，美国占 16.4%，法国占 10%，其他各国占 11.9%。留学生学习实科、文科的百分比，1935 年分别为 51%和 49%¹⁵。

拓展外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北京政府时期，设立大使馆的国家有苏俄，设立公使馆或兼公使馆的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巴西、秘鲁、智利、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瑞士、瑞典，共 22 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接收了北京政府时期的驻外使馆，并作调整。1930 年 2 月，国民政府颁布〈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把使馆定为大使馆、公使馆和代办使馆三级。其后迄于 1949 年以前，建立或升格为大使馆的国家或地区，除已设的苏俄以外，增加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义大利、比利时、捷克、法国、希腊、荷兰、挪威、波兰、瑞典、埃及、印度、伊朗、缅甸、大韩民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澳大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罗马教廷，共 31 个。设立公使馆或兼公使馆的国家除已设的葡萄牙、古巴、巴拿马、奥地利、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士外，增加了卢森堡、罗马尼亚、阿富

¹³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页 456-489。

¹⁴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 253。

¹⁵ 同上，页 254-256。

汗、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宏都拉斯、委内瑞拉，共 18 个。除此之外，国民政府继北京政府设立了驻国联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由驻瑞士公使兼任处长¹⁶。

除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建立关系外，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还完成几项重要工作：（1）收回租界及租借地：除在北伐期间于 1927 年 2 月 19、20 日与英国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外，于 1929 年 8 月 31 日与比利时签订收回天津比租界协定。同年 10 月 31 日中英两方互换收回镇江英租界照会，1930 年 4 月 18 日中英签订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议。（2）改订新约与关税自主：1928 年 6、7 月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本平等互惠原则重订新约，此后一年间，与各国所改订的新约以通商条约和关税自主条约为主，与比利时、义大利、丹麦、葡萄牙、捷克等国家订立通商条约，与美国、德国、挪威、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订立关税自主条约。1929 年 2 月 1 日，中国关税实行新税则。（3）收回法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 19 国中，除德、奥、俄三国的领事裁判权已于北京政府时期于订立中德协约、中奥通商条约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时废除以外，比利时、义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挪威、日本、瑞典九国，因与国民政府另订新约而丧失。墨西哥于 1929 年 11 月声明自动放弃。战前未获解决者仅秘鲁、瑞士、英国、美国、法国、巴西六国¹⁷。

知识分子的离心与向心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依附国民政府者以外，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为自由主义分子，寄望于国民政府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从事政治改革。一派为左派，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同情中国共产党。一般说来，左派与国民政府是离心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向心的。此处专谈自由主义派。1910-193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为蔡元培和胡适。蔡元培的表现主要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1917 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即本此理念办学。1927 年国民政府于北

¹⁶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页 324-325。

¹⁷ 高殿均，《中国外交史》，页 68，70-73。

伐进行期间迁南京，蔡希望教育能独立于政府之外，创大学院制度，将全国划为若干大学区，区内之教育由大学管理。嗣因国民政府内部党化教育派抢夺教育权，终以教育部取代大学院。1928年蔡主持中央研究院，希望维护学术自由。其后国民党一党训政，剥夺人民的各种自由，蔡于1932年12月17日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导致其得力助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被暗杀¹⁸。胡适的自由主义较蔡元培为宽阔，在政治方面他追求好人政府、立宪政府和保障人权，在方法上他希望点点滴滴地改造。1929年3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于会中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内称「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胡适对此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判刑的提案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提出抗议，嗣此案并未在三中全会中通过。此期间，国民政府于4月间下令保障人权：「凡在中华民国法律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命令中只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而不提政府机关，而当时政府机关与党部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非常严重，胡适于是年5月在《新月》中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加以指责，并提出由人民监督并限制国民党党权。胡适的文章使蔡元培「不胜佩服」，罗隆基等人更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加以声援。有关文章嗣后结为《人权论集》一书，胡适在为此书作序时，充分表露了他点点滴滴改造的心志：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但即使这样，当时的国民党亦不能容忍。1929年6月《新月》被查禁，10月教育部长蒋梦麟对胡适提出警告。约在同时，国民党开始撰文批判胡适，批判的文章嗣后结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在这种情形下，胡适于1930年5月15日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自上海转往北京¹⁹。1932年以后，北京学界有《独立评论》的创刊，胡适等假《独立评论》对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蒋廷黻等则较支持政府的作法。蒋廷黻、胡适等后皆为政府网罗重用。1931年以后，日本侵略

¹⁸ 陈哲夫，〈蔡元培先生的政治思想评析〉，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页235-236。

¹⁹ 刘健清、刘庆楚、邓丽兰，《蒋介石与胡适》，页13-17；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页264-265。

中国日亟，救亡的呼声斲丧了自由思想的发展。由于团结御侮的需要，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推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以武力与国民党抗衡的中共，虽然以反对法西斯主义为号，在其治区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要求更为严苛。自由主义派左右于国共两党之间，殊少发展余地。至 1940 年代后期，部分为国民党所吸收，部分则投向中共一方。

第二节 缺乏共识的建国路线

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依据孙中山所订的建国程式，结束军政、实施训政。但国人缺乏共识，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常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其他民主小党派和自由人士也各有主张，共产党则另有建国路线。因此 1928-1937 的十年间，国家虽有各种建设计划，由于内外交逼，力量分散，不仅预定中的六年训政未能依计划完成，许多物质建设，也多功亏一篑。

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建国方向

1924 年 4 月 12 日，孙中山手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式分为三期，一为军政时期，二为训政时期，三为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五院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全国有

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¹。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中央决定奉行其遗教。是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此可谓为一党训政的开始。不过，其后国民政府平定广东、收服广西，以及在北伐过程中，先后平定十余省份，虽然各级政府都是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掌理政务，国民党并没有依照建国大纲，「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直到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于1928年10月通过〈训政纲领〉，国民党三全大会于1929年3月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于1929年6月通过〈训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之内涵及期限始正式确立。训政的内涵，依照〈训政纲领〉，主要有三：（1）训政期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2）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3）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另依据〈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训政的内涵，主要有二：（1）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2）中华民国人民须一律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至于训政期限，依据〈训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时期为六年，至1935年完成²。

执行训政措施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10月10日正式组成。蒋介石为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长，戴季陶（传贤）为考试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长；改组派的汪精卫等并不在其中。1930年4月，改组派的人士结合对裁军不满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三人皆国府委员）等召开扩大会议，反抗中央，并指斥

¹ 引见胡兴梅，〈建国大纲与我国政治发展〉（1985年6月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页210-212。

² 周弘然，〈北伐训政时期的民主运动〉，《幼狮学志》2卷4期，页10-11；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东方杂志》44卷2号，页7-9；栗国成，〈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民主建设〉，《近代中国》19期，页121-127。

南京国民政府「不能遵从总理之遗教，训政虽号称开始，约法迄未颁布；遂致训政其名，个人独裁其实」。扩大会议标榜民主，并起草约法。蒋介石为平息积怨，于1930年10月3日在开封军次电呈中央，要求确定召集国民会议议案，并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蒋的主持下，通过于1931年5月5日召集国民会议；此事引起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胡认为：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已通过孙中山的遗教为训政时期内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无需另订约法。实际上，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已说明训政时期行约法之治，而反蒋的汪精卫又指蒋不制定约法为独裁，蒋自有制定约法的理由。论者认为胡以孙中山的遗教为根本法，立法院可借解释遗教，使其权凌驾中央政治会议之上；若制定约法，立法原则需中政会通过，立法院即降到中政会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自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政治权力采分权制，1925年在广州设立的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1927年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设常委五人，不设主席。1928年2月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于五至七人的常委中推定一人为主席；是年10月改组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正式名称是「主席委员」。由于约法的制定与否涉及到中央的权力分配，胡汉民乃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于私邸邀宴全体中委，席间一言不合，即将胡汉民幽禁。3月2日，蒋在国府总理纪念周上斥胡曲解遗教，越位失言，淆惑人心。同日，中常委开会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代表五百余人，来自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及各大学和自由职业团体，以及中国国民党，会议通过了〈全国国民敬谨接受中国国民党总理遗教案〉，也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除对中华民国之领土、主权、国旗、国体、国都，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以及训政时期之地方自治和政权、治权之行使等有所规定外，对宪法草案之议订、国民大会之召开等，均有原则性的规定³。

1932年12月，时以日本侵逼、共党骚乱，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决定两点：（1）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

³ 前引栗国成，〈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民主建设〉，页128-130；谢刚，〈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理论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6期，页34-37；前引周弘然，〈北伐训政时期的民主运动〉，页14。

会，议决宪法。(2)立法院应起草宪法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但以国家多故，上述两点均未能按照预定的进度进行。1933年1月，孙科任立法院院长，遵照中央决议，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宪法起草工作。同年6月初稿拟成后，登报征求各方意见。其后五易其稿，到1936年5月2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5月5日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此一草案的内容要点：(1)明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构成分子，一律平等。(2)关于人民权利、自由，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3)规定各县市由县市民直接行使政权，中央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五种治权则由中央分别行使。(4)中央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五院之上，另置总统为国家元首。(5)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宪草中规定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五院为治权机关。但国民大会只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立法权委于立法院，监察权委于监察院；立法、监察、宣战、媾和、条约、预算、决算、大赦、戒严等事，皆由治权机关决行，使国民大会不能发挥三权制国家国会的功能。在宪草公布前后，政府积极部署国民大会选举，俾将宪草交国民大会议定。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政府乃令立法院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规定于1936年7月1日实施选举。嗣以地方不靖，代表无法按时选出。到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修改选举法，定于是年8月15日公告选举结果，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嗣以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投入抗日战争，选举工作更难以推展。截至1938年2月底，各省选举代表1200名中，选出者874名，未选出者326名；其中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山东五省市的代表，全未选出。国民大会的召集，乃不得不延期⁴。

北伐以后，从训政到宪政的设计，都有政治权力集中的现象，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来自国民党的革命性格，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倾向于集权；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义大利、德国等强国，实行法西斯主义，使部分国人，特别是国民党中的当权派，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强国，值得引介。法西斯主义是俄国十

⁴ 〈国民政府筹备宪政经过报告〉，《近代中国》4期，页156-169；熊伯履，〈五五宪草之认识及展望〉，《河南大学学术丛刊》1期。

月革命后首先在西欧出现的政治思潮，目的在抵制共产主义、镇压工人运动。自义大利的墨索里尼组织黑衫党鼓吹法西斯主义后，欧美和日本等地相继出现法西斯的组织与活动。法西斯主义在实行极权统治方面，与共产主义无异，但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则强调社会精英、种族和国家的角色。法西斯主义不相信理性，重视人性中的感情冲动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否定人生而平等，认为政府应由少数有能力的人控制；否定民族与国家平等，认为优等的民族应统治劣等民族，强国应役使弱国，因此也罔顾国际法律与秩序。在 1931 年 5 月 5 日开幕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曾对法西斯主义加以推崇，但并未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深义；他认为在当时世界的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皆不可取，法西斯主义以国家为至高无上的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的任何牺牲，可以施行有效能的统治、解除民众痛苦、完成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国民党内的复兴社及其中国文化学会、中央俱乐部（CC）及其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皆从事宣扬法西斯主义。据研究，在 1932-1936 年间，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局有拔提书店、文化书店、前途书局、正中书局、新生命书店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有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文化建设等。它们宣传的重点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绝对服从领袖、牺牲个人自由。复兴社在宣言中说：「法西斯蒂是我们的对症良药，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法西斯独裁不仅是领袖独裁，各级行政组织都受到党或军的控制。在经济上政府对粮食、棉花、蚕丝、煤炭等主要工农产品实行计划性的强制生产和收购⁵；在教育文化思想方面也以三民主义为依据，加以规划和控制⁶。

第三党与改组派的想法与做法

当国民党于北伐结束以后集中权力、建立训政模式从事建国工作时，全国上下及党内党外出现相当多的反对言论和行动。影响最大的异议来自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为中心。他们于 1927 年 9 月宁汉合作后，未能在南京国民政府获得权力，乃企图另建势力。1928 年 5 月，

⁵ 刘健清，〈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泛起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建立〉，《南开学报》，1983 年第 5 期。对法西斯主义的介定，参考 William Ebenstein, *Today's Isms*, pp.111-124.

⁶ 刘世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学报》4 卷 1 期，页 45-46。

陈公博发表第一篇宣传国民党改组的文章。此期间，陈公博、顾孟余等先后创刊《革命评论》和《前进》等刊物，发表宣传改组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腐败堕落的种种现象，主张恢复 1924 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是年 12 月，他们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要人物除汪、陈、顾外，有王乐平、朱霁青、王法勤等。他们主张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但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党的职员只有委派、没有选举；党的决议只见少数有力者包办，未见多数党员发言；他们认为国民党已变成蒋介石的御用党。他们透过写文章、发通电、制造舆论，抨击蒋介石独裁。改组派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他们认为国民党容共只是一时的政策，共产党却于 1926 年 10 月将容共改为联共，并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谓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按三大政策是 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共党加以宣传，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受共党控制，部分受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以为此政策来自国民党中央，遂以讹传讹）。改组派认为中国土地问题不严重，反对阶级斗争，更反对共产党采取暴力，到处杀人放火；改组派认为第三国际与帝国主义都妨害国民革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改组派都有些改良主义的主张，重要的有：（1）实行党的民主化和民众化；（2）恢复民众组织，但工运和农运由国民党控制；（3）组织农村合作事业；（4）健全农民协会组织；（5）执行 25% 的减租；（6）建立工会和地方合作事业；（7）促进工人的红利制；（8）建立商会组织，奖励商人投资；（9）奖励私人资本，建设国家资本；（10）属于中央的财政，地方不得把持；（11）加强军队政治训练；（12）裁减军备，以救国家财政；（13）取消政治分会（国民党中央的党政联系机构为政治委员会，1928 年北伐期间曾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处设政治分会，负责地方党政联系。嗣以谋求统一事权，舆论对政治分会亦多指摘，乃于 1928 年 8 月二届五中全会时决议取消，1929 年 3 月的三全大会作正式之决议）。改组派的改良主义，多来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并无特殊之处；改组派批评共产党的地方，共产党正在各地受到压制与围剿，亦无暇反驳。真正在政治上造成影响的，还是改组派利用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在全国各省市和海外建

立了地方基层组织，以及对蒋介石的批评与反抗。改组派第一次大反抗是 1929 年 3 月利用蒋介石指派和圈定国民党三全代表，发动一场反独裁、争民主的反蒋政治运动和军事反抗。当时规定三全代表一半由各省市选举、一半由党中央圈定和指派，汪精卫等认为如是该派人士必遭排挤，乃发表宣言，指斥三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是「以个人之私意，蹂躏党员与民众之公意」；各地改组派分子亦纷纷对蒋的独裁做法展开攻击。蒋为反击改组派，于三全大会通过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另因桂系结合改组派以军事反抗中央，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均永远开除党籍。桂系失败后，改组派继续联合实力派作倒蒋活动，而以 1930 年的中原大战以及大战期间反蒋各派在北平所召开的扩大会议声势最大。是年 2 月，改组派要员王乐平被暗杀；是年 10 月，中原大战结束，扩大会议被驱散。1931 年 1 月，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改组派。是年 5 月，因蒋、胡约法之争，改组派人士复结合两广实力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在共同抗日的口号下，透过谈判，宁粤统一，汪蒋合作。此后一段时间，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改组派至是不存⁷。此后，改组派人士对国民党的训政建国，虽时生意见，已没有组织的力量。

改组派是与国民党当权派较接近的左派，第三党则是与共产党较接近的国民党左派，它的创始人是邓演达和谭平山。早在 1926 年 11、12 月间，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及左派国民党人受到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人不满之际，左派国民党人邓演达代表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会议中，曾建议舍弃国民党，另组第三党。1927 年 4 月蒋在京、沪一带实行清党后，邓演达正式提出组织第三党问题。是年 7 月 15 日武汉分共以后，一批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自共产党游离而出的人，企图寻找第三条道路。是年 11 月，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宣言，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欲以革命的手段中止南京、武汉两政权，由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指导革命的机构，以实现三民主义。同月，中共中央以谭平山主

⁷ 张圻福，〈国民党改组派探析〉，《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5 年第 6 期，页 71-77；郭文亮，〈国民党改组派性质新探〉，《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 年第 1 期，页 39-43。

张与邓演达等组第三党而取消共产党，开除谭平山党籍。是年底，谭平山由澳门到上海，知被开除党籍，乃积极筹组第三党，最后定名为中华革命党，系恢复中国国民党讨袁时期的名称。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推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职务由谭平山代理。大会宣言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在劳动阶级的领导下，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先后创办《突击》、《灯塔》等周刊，宣扬反帝、反封建主张，揭露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行为，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各大学吸收党员。到1930年春，有党员千余人。第三党成立后，共产党指其在反帝运动和群众运动中犹豫和妥协，国民党指其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中的改组派则指第三党夺取他们的群众。1930年5月，邓演达自海外经香港抵上海，对党的名称和理论重新斟酌，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仍应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开成立大会，推邓演达为总干事。会后发表政治主张，宣言以平民群众建立平民政权，先建立平民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士兵会等，由群众组织选举代表组织国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对外进行反帝斗争，争取民族平等；对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土地国有。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为宣传机关，有不少文章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专制，批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暴动是「盲动乱动」，对国家主义派和改组派也有很多指摘。其直接行动包括网罗支持者，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邓演达做过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他于1930年11月在上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支持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他也联络一些对国民党中央不满和与他有旧的军人，包括前广东省主席、1931年夏间任江西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的陈铭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以及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他又在上海办干部训练班，调训各地的干部。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时被捕，宋庆龄等营救无效，到11月29日被杀，年三十六岁。邓遇害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黄琪翔、章伯钧等负责⁸。

⁸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5-95；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617-624；王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各中间党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速宁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0年3月，页110。

邓演达死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有分裂和解体的现象，中华农民劳动党、中华农工党等皆系由其分出。1932年8月，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各省市联合办事处，设法整合党务。其后即逐渐响应中共的号召，投入各种反蒋抗日或逼蒋抗日的运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担任京沪警戒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黄琪翔与十九路军关系密切。十九路军是由北伐初期陈铭枢的第十一师演变而来。时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其副师长，蔡廷锴为其团长，黄琪翔为第十二师团长。此时十九路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以义勇军名义参战。十九路军于3月2日被迫撤出上海后，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南京国民政府卖国，主张建立农工平民民主革命政权，立即对日宣战。1933年春，日军进攻察哈尔，冯玉祥、方振武等受共产党抗日宣传的影响，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章伯钧等在北平动员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和青年参加了同盟军的抗日工作。1932年、1933年两次抗日战争，都是国民政府不欲扩大的，因此先后都在很短的时期内结束。一二八之役结束后，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调福建剿共，蒋光鼐任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许多干部和党员都进入十九路军及福建各级机构工作，并为十九路军举办各种训练班。他们在闽西实行计口授田，由政府没收土地，计口分给耕种的农民，以对抗中共的阶级斗争。1933年1月17日，中共宣言在下述三条件下，愿与全国各军共同抗日：（1）停止进攻苏维埃地区，（2）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及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其影响，即拟与中共合组反蒋抗日同盟军，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参与联络。到是年10月26日，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当时中共尚走左倾路线，并无意与十九路军真正合作，所关心的只是闽西划界等问题而已。此期间，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等先后在香港、福州开会，决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是年11月20日约集各党各派、各省市及华侨代表百余人开会，推李济琛、黄琪翔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的国旗。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改十九路军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会后发表宣言，对外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消党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张大半来自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参加这次事变的，尚有蔡廷锴的改造社、陈铭枢的社会民主党和神州国光社（神州国光社的成员有王礼锡、胡秋原等）、国家主义派的翁照垣等。为集中力量，陈铭枢等于11月24日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要求取消上述各党社，临时行动委员会表示支持。11月27日，福建人民政府派代表在龙岩与中共代表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划定闽西边界，恢复双方之间的交通往来；但有关军事合作，则未达成协议。到1934年1月底，闽变失败，首事诸人多逃香港，生产人民党在香港存在一个时期后即解体，临时行动委员会又逐渐恢复活动。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救国；其后，临时行动委员会决定改组，并和中共联系，共同推动抗日救国工作。是年11月10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改组大会，将党名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并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政策。会中选黄琪翔为总书记，实际由章伯钧主持。解放行动委员会办有《政治通讯半月刊》、《草原月刊》等，宣传主张。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各地利用学生运动，宣扬反蒋抗日，解放行动委员会皆予以支持；1936年上半年发生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解放行动委员会也参与策动。是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逼蒋抗日」的指示，解放行动委员会又响应中共的号召，派人去西安联络杨虎城和张学良。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抗日之后，中共决定联蒋抗日，解放行动委员会亦响应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⁹。从第三党活动的历史看来，在九一八事变前以反蒋为主，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抗日为主；基本政纲，从土地革命，到平民政权，都与国民党的建国方向不同。

一般民主党派的想与做法

一般民主党派，在1928至1937年间，其较有建国或建设理想者，可以青年党、国家社会党、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为代表。青

⁹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106-116，154-167，181-191；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719-729；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页45-53，128-165。

年党系 1923 年 12 月 2 日由曾琦创于巴黎，标榜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内涵，据 1923 年 10、11 月间李填解释，是要恢复或表现国家人格、振起或团结国民精神、发展或丰富国民生计。青年党的「对外政策是仗着全民自家的力量，以期完成独立的自决，而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的解决」；「对内政策为团结全民共有的志愿，以求真正的自治，而不赞成任何阶级的专制」。青年党成立之初，即标榜反共，并反对国民党容共，基本理由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乃背道而驰。据 1925 年 8 月陈启天分析：国家主义以国家为前提，共产主义以阶级为前提；国家主义主张物心并重，共产主义主张唯物史观；国家主义主张本国政治革命，共产主义主张世界经济革命。是年 10 月，青年党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其宗旨为：「本国家主义的精神，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时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青年党将 1919 年五四时期「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标举出来，目的在对抗英、日帝国主义，以及依附英、日帝国主义的军阀。1926 年 8 月青年党一大发表宣言，强调全民政治，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阶级专政，认为「只有全民政治，才能实现全国国民政治机会的均等、经济生活的均等」。1927 年元旦，青年党发表宣言，认为国民党以一党的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国旗，是叛国举动。但到是年 4 月，国民党实行清党，青年党对之大加赞扬，认为国民党的真正朋友是国家主义派而非共产党。1929 年 8 月，青年党正式公开党名，将其标举的国家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鼎足而三，并扬言「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青年党的政策大纲，仍标榜全民政治，内容包括：拥护五族共和、反对一党专政、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及自由、以职业代表制及地方代表制选举两院国会、民选总统、责任内阁、司法独立、考试用人、男女平等、蒙藏自治、保护侨民等。由于青年党受张学良的欢迎，在北平教育界获得部分行政权（1930 年中原大战时，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派兵进入北平）。由于青年党出版《东方公论》等刊物宣传党义，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压迫言论自由，河北国民党地方党部人员曾向国民党中央检举，认为国民党的敌人，重要者一为共产党，一为国家主义派；共产党猖獗于南方，国家主义派滋长

于华北。自是，国民党对青年党的活动，即依反革命治罪法，严密查缉。青年党抨击国民党如故，如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青年党指参与国民会议选举的团体，皆国民党指定，国民党以外的政党均未参加选举，因此呼吁打倒国民党的党治，否认国民党御用的国民会议。大体说来，从 1923 年成立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青年党的主要活动为宣传主张、建立理论、充实组织、培养人才、发动民众；批评的重点集中在国民党的党治与独裁上。九一八事变以后，宣传及活动的重点在抗日，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反对国民党迫害抗日民众。青年党曾发动民众组织义勇军赴东北抗日，更直接投入 1932 年的上海一二八战役。与其他联共抗日的党派不同的是：青年党主张国民党应切实有效剿共，并继续与俄绝交；与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不同的是：国民党主张先安内后攘外，青年党主张安内攘外并重。在诸多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党派中，与共产党、改组派、第三党比较，青年党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是希望在国民党的宪政架构之下参政的。另一方面，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反共政策，虽是独行其是，与国民党的党义并无违背。到 1935 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后，两党的关系好转。青年党的反共态度一直未变，当 1936 年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再度联俄容共、一致抗日时，青年党仍主张灭共拒俄，要求严厉制裁共产党的一切出版、集会、结社等活动¹⁰。

中国国家社会党于 1932 年 4 月 16 日成立于北平，主要负责人为张君勱、张东荪，其重要成员多旧研究系分子。5 月 20 日创刊《再生》为机关刊物，发表宣言及有关文件。宣言中以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方案。绝对的民族主义，目的在对抗国际化的阶级斗争；修正的民主主义，将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在于确认私有财产、确立公有财产，使全国经济在国家制度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经营。1932 年 6、7 月间，张君勱发表国家社会党的理论与主张，一方面标明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谓马克思主义要求分配平均，国家社会主义则以造产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强调各国无产者联合，国家社会主义则以民族生存为第一要义。另一方

¹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页 15-196；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 624-636，662-675，739-744。

面，则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以党治国大加批评，谓国民党以一党把持政权，剥夺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类似俄国与义大利之制度。1935年7月14日国社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进一步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提出批评，谓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一夕丧失东三省，一周抛弃热河；谓国民党一党专政，国为党所私有，党外人士有国而不能爱，苟有言论即目为反动，苟有活动即诬为不轨。呼吁举国一致对外，由各党派合作，再授予政府以大权¹¹。当时国社党成立不久，初时的目的不过要求抗日与参政。不久国民党准备行宪、抗日，国社党活动的空间加大，国民党对国社党的活动虽时加限制，双方亦寻求合作的途径。

职业教育派始于1917年5月黄炎培在上海所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初期的目的在于提倡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1926年2月，职教社在苏州召开专家会议，明确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联络，以期合作」。1929年，职教社又提出「富教合一」的主张，即通过组织农民自治和普及文化知识，以解决农民生计，使农民富强。嗣后，职教社对国民党一党训政，大加批评，如1932年2月14日，黄炎培等以中国国难救济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禁止各级党部干涉人民集会结社，限期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宪。当时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职教社亦不满意，认为「把三民主义当作圣经看待，不许人批评，不容人讨论，硬强迫麻醉一般青年去信仰、去服膺」，与理想中教育应有的精神冲突。职教社对时局的最大反应还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要求，黄炎培等不仅要求政府立即抗日，并从事各种抗日宣传、支持各种抗日运动¹²。

乡建派是指以梁漱溟为中心的一些从事乡村建设活动者。19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有数百个，实验区千余个，遍及全国十九个省市的几十个县和成千上万的农村；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官民合办的，非梁漱溟的活动所能概括。但当时从事乡村建设运动，除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外，影响最大的当为梁漱溟。梁于1924年以

¹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页2-3，8-40。

¹²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692-702；前引王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各中间党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页110-111。

后在山东曹州提倡乡村自治。1927年12月赴广州，1928年春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乡治讲习所，认为「要想消灭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1929年受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之邀，办理河南村治学院。是年10月韩调山东省主席，梁又往山东，于1931年6月在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他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进行乡村建设、恢复法制礼俗、维持社会秩序。他所推动的乡村建设是以乡农学校为核心，并办理乡村合作社、乡村自卫，欲透过复兴农业，以发展工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直办到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沦陷始停止。他在各县所办的乡农学校，培养了不少地方干部。与梁漱溟的乡建派齐名的，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此派始于192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初期的活动是在城市推广识字活动，从1930年起，在河北定县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并开办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训练县级干部。此外，陶行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7年3月在南京创立试验乡村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以小学为中心，推行职业教育，改造乡村生活，对乡村建设运动影响亦大。这些乡村建设的努力，可以说都是协助国民政府解决农村问题，论者谓为是「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¹³。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想法不来自国民党中央，国民党对之仍有疑虑。

共产党另有建国路线

在1928-1937年国民党从事训政建国时期，改组派从内部争，第三党从外部争，而连年军事动乱，影响国民党的建国进程颇大。青年党、国社党、职教派、乡建派与国民党的建国方向不同，但因不搞武力斗争，对国民党的训政建国影响不大。对国民党训政建国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的建国路线。共产党的建国路线，吸引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大众；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带来了连年的战争，从1927年，一直到1936年才暂时停止。

中共的建国路线，最初是仿照苏俄的苏维埃政权，即是以工农兵

¹³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684-692；前引王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各中间党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页111；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555-561。

代表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函中，提到「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指明「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提醒工人阶级要「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192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就在各地建立苏维埃。1927年11月，彭湃领导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为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同年12月中共在广州建立苏维埃，为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城市苏维埃到1930年长沙暴动时又尝试一次，即告完全失败。此期间中共在农村地区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根据地的政权有些不用苏维埃的名称，但政权的性质则略同苏维埃。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在赣南遂川县），先向赣南进军，后向闽西进军，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即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其他各地的共产党人，也在农村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如徐向前、张国焘领导开辟的鄂豫皖苏区，贺龙、萧克、周逸群领导建立的湘鄂西苏区，方志敏领导建立的赣东北苏区，邓小平、张逸云领导建立的广西左右江苏区等。1930年5月，中共决定召开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1931年11月7日，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当时各地苏区已有新的发展，到会代表610人，代表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琼崖苏区等。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闭会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外交部、教育部、粮食部、内务部、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邮电交通部、人民经济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局、工农检查部、最高法院等。苏维埃分中央、省、县、区、乡五级，为各该行政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苏维埃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区的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族，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权

利选派代表参加政权，也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大致是：在中央苏区设置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省，和瑞金、西江、长胜、太雷四个中央直属县；其它苏区设置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等省。上述各省县，在中央苏区范围内的，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省，与中央苏区毗邻，与中央苏区保持联络；而琼崖、湘鄂西、鄂豫皖、陕甘等苏区，因与中央苏区相隔甚远，有较大的独立性¹⁴。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共整合各苏区势力的一次努力。1927年国民党分共，共产党在南昌、两湖、广州等地暴动失败以后，党员和党军流窜各地，建立了不少的地区政权，而以毛泽东、朱德等所创建的根据地最有规模。此一根据地，初期只辖江西和福建两个苏维埃省和瑞金一个直属县。1930年10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扩大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扩大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9月6日，成立了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是年12月，成立了闽赣省苏维埃政府。1934年7月，又建立赣南省。从1933年7月到1934年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辖区最广的时候，首府初在瑞金县叶坪，后在沙州坝。所辖江西省，首府在宁都七里坪；闽赣省，首府初在黎川县湖坊，1934年5月搬至建宁县；粤赣省，首府在会昌县斌坝；福建省，首府在汀州城内；湘赣省，首府在永新县禾川镇；湘鄂赣省，首府在万载县仙源；闽浙赣省，首府在横峰县葛源；赣南省，首府在雩都县城¹⁵。其他苏区的情形不备载。

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有其特征，其土地政策尤引起国人瞩目。中共的土地政策所以引起国人瞩目，主要因为过于激烈。在1920-1930年代，受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在浙江试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国民党、试图夺取政权的第三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以及一般学者发表时论，对土地政策都有坐而言或起而行的表现。从一般学者的言论来看：1928年1月高一涵发表〈平均地权的土地法〉一文，主张由国家

¹⁴ 黄少群，〈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述略〉，《历史教学》，1986年6月，页36-40；姜爱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页80-86；尹世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江西人大工作》（南昌），1991年10月，页7-9；易豪精，〈试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页166-180。

¹⁵ 雷正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页12-15。

出钱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分给缺乏田地及无地可耕的农民。1929年前后，马寅初发表〈平均地权〉等文，主张改良租佃制度，实行永佃权。吴景超于1934-1935年间发表〈何时耕者有其田〉等文，主张政府用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债券本息由佃方分期偿还。1934年殷震复出版《中国土地新方案》一书，主张规定私有土地限额，限额以外的土地收归国有，原地主凭国家发给的田租券，每年向政府机关领取地租二十年；收归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阎锡山在山西于1935年9月提出「土地村公有制」，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土地斗争。陕北共产党展开土地革命斗争，阎锡山为防止山西农民受其影响，于1935年8、9月间在晋西二十一个县召开防共会议时，提出「土地村公有制」的办法：由村公所发行无利息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然后分给村民耕种。农民于十八岁领地，五十八岁还地，除照缴田赋外，另纳田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用以偿还公债。这套办法，并未能实行。成立于1930年8月的第三党，主张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限额以外的私人土地和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将所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土地不得私行买卖。1933年第三党参加闽变前后，曾在福建实行计口授田。改组派、青年党、国社党对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具体的计划¹⁶。

中共的土地政策先后有许多变化。1927年八七会议时，中共中央提出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对小地主（拥有五十亩以下者）土地不没收的政策。是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或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1928年7月，中共六大决议：「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1930年9月中共公布〈土地暂行法〉。依照土地暂行法：（1）凡属地主的土地，一律无偿没收；祠堂、庙宇、教会、官产等占有的土地，一律无偿没收；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者的土地，一

¹⁶ 鲁振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种土地主张评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6期，页7-13。

律没收。(2) 没收的土地，一律归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地少及无地的农民使用；禁止一切土地的买卖、租佃、典押。(3) 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土地分配的办法，或一切土地平均分配，或只就没收的土地分配，原耕农民不动；土地分配的标准，或按人口分配，或按劳动分配；均由各乡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按实际情形决定。(4) 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可不分土地，采社会救济的办法。(5) 红军士兵已分有土地者照旧，尚未分配土地者俟全国苏维埃成立时再决定分配土地。(6) 雇农参加集体农场工作，不分土地。此一土地暂行法，对自耕农土地是否没收，对富农、中农、贫农土地分配的标准是否相同，对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等，没有厘清。到 1931 年 12 月，又颁布〈正式土地法〉，明确规定：对中等农民阶层的土地不没收；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农、雇农分好田（因为富农反革命，中农是革命同情者，贫农是革命主力军之一部分，雇农是无产阶级的基础），加入红军的农民、苦力，雇农、游击队员，优先分配土地；土地分配后可以租借、可以买卖、家人可以继承。依照此类规定，中共所行的土地政策，不是废止私有财产制度的土地国有政策，而是树立新的平均分配的农民土地私有制的政策。在土地政策的推行下，中共所建立的海陆丰、湘赣、湘鄂赣、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广西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的革命斗争¹⁷，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

中共的革命和所提出并试行的建国路线，增加了中国建国方向的争议性：中共内部，又有托洛斯基派，提出了与中共当权派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方略，同样活跃在中国舞台，益使中国的建国路线趋于复杂。托洛斯基原为苏俄共产党中的反对派，他反对斯大林与其他阶级结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他也反对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自行搞无产阶级革命。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些人即信奉托洛斯基主义。1927 年 4 月国民党清党后，托洛斯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中国政策。1928 年托洛斯基被开除党籍，并流放到阿拉木图；一些在俄国的托派中国学生隐蔽身分，于当年秋天建立了托

¹⁷ 鲁振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种土地主张评述〉，页 13-16；漆琪生，〈中国赤区的土地政策〉，《新中华杂志》2 卷 10 期，页 13-22。

派秘密组织。回到中国的托派学生区芳、梁干乔等，则于当年冬天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该组织有百余人，在上海、华东和华南一带活动，出版刊物《我们的话》。1930年1月，自俄国回国的托派学生刘仁静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该组织不足百人，出版刊物《十月》。最受人瞩目的托派是1929年被中共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托洛斯基宣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工农红军运动，只是中国共产党解体 and 消散的一种形式。彭述之完全赞同托洛斯基的观点，主张取消中共的民主革命，被称为取消派。陈独秀于国民党清共后，对中共的革命前途感到悲观，为了不愿单独承担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失败的责任，把中共与国民党联合进行民主革命的政策错误归咎于国际共党的整个政策错误。1929年8-10月间，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信，想用托洛斯基主义改变中共的路线和政策，要求取消中共与其他阶级联合进行民主革命。陈独秀的要求，受到中共中央的拒绝和批评，陈乃于1929年9月，在中共党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等托派分子的党籍。是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纠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要求党员聚集在「共产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下，依照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组织新的政党；同时成立「无产者社」，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出版《无产者》月刊，宣传批评共产党、推翻国民党。1931年5月1日，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会议，仍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通过的政纲，强调「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托派人士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政治上总的策略口号。他们主张在普遍、直接、平等选举的基础上，召开国民会议，通过议会讲坛，宣传工人阶级主张，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争取民族独立等纲领。1931-1932年间，国民党特务对托派进行三次搜捕，到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遂使中国托派组织陷于瘫痪。1936年初，剩余的托派分子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势力仍然不振。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陈

独秀、彭述之等被释，陈不再参加托派活动，彭在托派中主张支持国民党抗战，受到反对。抗战胜利后，托派欲重整旗鼓，但人数愈来愈少，到 1949 年中共占据大陆后，始完全消散¹⁸。

¹⁸ 刘沛汉，〈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速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 年第 2 期，页 64-70；详参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一书。

第三节 国民党的内斗与剿共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致力于国家统一工作，企图消除割据于一方的军阀。这些军阀，虽然都受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但在1927年以前，帝国主义国家尚未明目张胆地大量出兵阻挠国民党的统一工作。自1927年春夏之交，北伐军进至山东，日本谋出兵阻挠，到1928年5月北伐军又进至山东，日本正式出兵阻挠，国民党在消除内忧的过程中又碰到外患。但在北伐军隐忍应付之下，外患一时没有扩大，北伐终于在1928年6月完成。其后的三年多，迄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虽然对外交涉时生，并未影响全局；影响全局的，仍然是此伏彼起的内战。至于内战的原因，部分为政治权力之争，部分乃国家体制之争。

北伐后国民党内部的军事纷乱

北伐后国民党内部的军事纷乱，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党联俄容共期间的国民党左派，在宁汉统一之后，特别在北伐完成之后，未能在新建立的统一政权中分配到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政治权力，乃以民主号召，结合失意政客、军人，起而反对南京政府。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军成立的过程中，蒋介石的第一军，以及由第一军发展而成的第一集团军，被视为中央嫡系，其他由第七军发展而成的第四集团军、由国民军组合而成的第二集团军、由晋绥军组合而成的第三集团军，自认或被视为旁支；在北伐结束以后的裁军中，各军都不愿被削弱；加上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1928年8月14日开幕）决定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以谋军政统一，各军将领乃先后起而反抗南京政府。北伐结束后，全国有陆军220万人，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85%，二届五中全会决议军费支出不得超出国家总收入的50%，在这种情形

下，非裁军不可。关于裁军，早在 1928 年 7 月，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在北平即有所磋商，并同意整军。1929 年 1 月 1-25 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决定将全国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及编留的中央直辖部队（北伐战争末期收编的直鲁军等）。六个编遣区除四个集团军外，为东三省和西南各省（川、康、滇、黔），每一区不超过十一个师。中央既有第一集团军，复有编留的中央直辖部队，又保留东三省和西南各省两个编遣区，被认为不公平。至于宁汉统一后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为首，在宁汉统一后自认未获得应有的权力。1928 年 5 月由陈公博主编出版《革命评论》周刊，正式鼓吹国民党改组，被称为改组派。同年底，复有「改组同志会」的成立，参加者除汪、陈外，有顾孟余、何香凝等人。他们鼓吹的主要方向是「党内民主」。1929 年 3 月 15-27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全大会。国民党中央为压制左派势力，事先对于左派实际控制的地方党部有所防范，因此第三届代表多由中央党部指派或圈定。据汪精卫等指证，出席代表由选举产生者只 80 人，由圈定或指派产生者达 303 人，包办的程度达 79%。改组派乃多方抵制三全大会，并利用各方军人对编遣问题的不满，兴兵反抗，号召护党救国」。三全结束之时，李宗仁的桂系已兴兵，故大会决定警告汪精卫、停止顾孟余党籍三年、开除陈公博等党籍。与改组派唱和的西山会议派，亦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压抑；两派人士在三全大会的中执委、中监委选举中，仅汪精卫、邓泽如当选¹。

因国军编遣及三全大会所引起的内战，于 1929 年 2 月由桂系军人发动。桂系为广西将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琛等所结集的军政集团。李、白统第四集团军，有三十万众；黄统第八路军，有十二万众；驻地主要在两湖、两广。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琛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省主席。1929 年 2 月 21 日，武汉政治分会为排除亲中央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议决以何键代鲁为湖南省主席，理由是鲁「把持税收，剿共不力」。嗣即派兵占领长沙，鲁涤平率兵退走江西。事情发生后，国民政府欲和平解决，派何键为湖南省代主席；然桂系对亲中央的军队继续攻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乃于 3 月 26 日下令讨伐，免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本兼各职，

¹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 878-888，896-898，第九章，页 1524-1526。

并派刘峙统第一军、朱培德统第三军西征。西征军于4月5日占领武汉。5月中旬，潜返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企图进攻广东，适改组派的汪精卫自欧返国，进行反抗中央的护党救国运动，李宗仁乃改称桂军为护党救国军，由白崇禧率领进攻广州。李部于5月21日在广州附近为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等部所败，蒋介石进一步派军入桂，李、白、黄诸人走香港，国民政府以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²。

桂系起兵反抗中央时，私下与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有所联络。冯初不动声色，表面仍拥护中央；中央令所部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自南阳向武汉方面进攻桂军。但在桂军失败前，冯军即因山东接防问题与中央决裂。缘北伐完成后，第二集团军的驻地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河南等省；冯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所部约四十万人。1929年4月16日，日军退出济南。4月24日，中央命冯部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收济南至潍县地区。时潍县以东尚有直属中央的方振武部、新降中央的刘珍年部以及张宗昌的旧部。嗣蒋介石发现冯与桂系私通，乃不准孙良诚接防潍县以东。青岛、烟台等重要港口仍由中央控制。冯玉祥对此措置不满，电令孙良诚辞山东省主席职；孙良诚乃于4月27日率部赴河南。孙走后，方振武部进驻济南，山东由中央直接控制，派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5月16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联名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电文中对党务、外交、用人等方面多所指摘，并要求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面对此一局势，一面运动冯玉祥部属反冯，一面希望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向冯施压。阎锡山表示希望和平统一，愿与冯共同出洋，将军队交由中央编遣。但中央欲阎在西北作党国柱石，只表示赞同冯出国。恰好此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部韩复榘不愿从冯之命将军队西撤陕西，乃联合石友三于5月22日通电拥护中央。是日，阎锡山再电劝冯下野出洋。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嗣即养病华山，6月25日至太原依阎锡山。冯通电下野后，其部属将领要求收回河南地盘，并维系第二集团军原编制的军饷。中央协调无效，到10月9日、10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人，在冯的授意下，复通电攻击中央，并推阎锡山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嗣在改组派的运动之

²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888-890，第九章，页1527-153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页434-472有关记载。

下，仍称护党救国军。中央处此情况，于10月28日一面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面发兵讨伐冯玉祥。讨冯军由蒋介石调派中央嫡系部队，配合唐生智的第五路军，自河南郑州沿陇海路西进，但12月1日进至河南西境陕县时，唐生智受改组派运动，与石友三以及冯部宋哲元等通电反蒋。唐生智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宁汉合作以后，据两湖反抗中央，后失败下野出洋。桂系叛变后，唐返国自请効命，于1929年3月29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统辖第四集团军驻平、津部队。唐未直接参加讨桂战争，却被倚为讨冯战争的主力。到1929年11、12月间，除中央嫡系部队不计外，统辖地方部队之人物中，张学良表示对中央効忠，阎锡山初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尚未叛离，而第二集团军系统、第四集团军系统，并四川等省区部队，一片反抗中央之声³。唐生智于此时参加反抗中央阵营，对其他各派反抗中央的风潮，无异火上加油。

1929年10月冯部复叛是改组派运动的结果。在此次冯部未发动反叛以前，改组派已于9月运动张发奎、俞作柏在广西叛变。俞作柏原为李宗仁、黄绍竑的部下，于桂系叛变时支持中央。李、黄失败后得被任命为广西省主席。因受改组派运动，旋即对中央树反抗之旗。张发奎的第四师于讨桂战争时驻湖北宜昌，中央于发现冯玉祥下野、而冯部仍不稳时，将张发奎调海州，防备陇海路东段。张发奎虑为中央各个击破，在改组派的运动下，于9月18日在湖北枝江通电反抗中央，并将军队开往广西，准备与俞作柏合流，进攻广东。9月27日，俞作柏通电称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派陈济棠率第八路军自广东攻广西，俞作柏不敌，于10月14日退往广西边境左江流域，与中共的军队合流。10月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改组派的运动下返回广西，收拾旧部，到1929年11月中旬，与抵达广西的张发奎部联合，仍称护党救国军，合力图粤。李宗仁任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张发奎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中央派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陈济棠的第八路军等迎敌。张、李军挫败，全线动摇后撤。11月19日，第八路军等克梧州。12月初，石友三（安徽省主席）、唐生智叛乱事起，何应钦调武汉行营，应付河南、安徽方

³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891-893，第九章，页1536-154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页448-470、499-533有关记载。

面的战事，讨桂战争暂告终止。石友三于5月22日随同韩复榘叛冯后，于10月21日受任为安徽省主席。11月中旬张、李军合流图粤时，中央派石友三率部南下增援，并命于12月初集中浦口待船南运；而石友三即于12月2日在浦口叛变，大掠后北去滁州，自称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唐生智于冯玉祥叛变时，因其个人深恶冯玉祥，在河南负主攻冯军之责，及冯军败退入陕西，即于12月1日联合五十七名将领发表通电，要求中央速息内争，一致对外（时值俄国进兵中东路），随后又通电反蒋拥汪。12月5日唐生智在郑州宣布独立，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争两湖地盘为目标。石、唐叛变后，中央全力应付唐生智，派刘峙率第二路军自武汉沿平汉路北上。唐军于1930年1月4日败于驻马店，1月6日唐通电下野。唐失败后，石友三表示归诚，国民政府于1930年1月23日任石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受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节制⁴。

1930年1月各地反抗军先后平息后，统率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在各方运动下，亦开始对中央表示不满。阎锡山在山西，素抱保境安民政策，于北伐战争末期，因响应北伐军，自山西出兵绥远、察哈尔、直隶（河北），而掩有其地。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时，有兵力二十四万。1929年3月桂系（第四集团军）反抗中央时，阎不动声色，静观其变；1929年5月冯系（第二集团军）反抗中央时，阎高唱和平，表示愿与冯氏共同下野，所部交中央编遣。中央对阎百般笼络，是年10月冯部再叛时，任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阎虽就职，并不出兵讨叛。其间，张发奎叛、俞作柏叛、张发奎联合李宗仁等再叛、石友三叛、唐生智叛，阎在表面上都站在中央一边；一度至郑州督师，迫唐生智下野。但自郑州回太原后，态度大变，决心反抗中央，可能的原因有二：（1）1929年8月中央召开编遣实施会议，中央提议中央直属部队与一、二、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已叛）各缩编为九个师。阎氏认为第二集团军与中央关系不睦，有被解决的可能，第四集团军已叛离而去，中央直属部队与第一集团军兵力超过第三集团军远甚，而中央对第三集团军讨逆动员等经费亦未如数发给，诸事皆令阎耿耿于怀。（2）冯玉祥对中央不满，不断劝诱阎锡山反对中央，而桂系、改组派、西

⁴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894-895，第九章，页1541-1545；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页494-540有关记载。

山会议派等反政府势力，亦不断对阎加强联络。在 1930 年 1 月反中央各军次第救平后，第二、四集团军不存，阎锡山处于孤危，乃联合反对派孤注一掷。1930 年 2 月 10 日，阎致电蒋主席，反对武力统一，约蒋共同下野，以息党国纷争。2 月 21 日，桂系将领表示拥阎。3 月 14、15 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第二集团军）、商震（第三集团军）等 57 人先后通电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 月 1 日，阎、冯、李通电就职。叛军主分四路进攻中央军：李宗仁（原第四集团军）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攻广东、湖南；鹿钟麟（原第二集团军）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以郑州为中心，一路由平汉路攻武汉，一路由陇海路攻徐州；徐永昌（原第三集团军）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自河北省分袭鲁西、皖北及津浦路北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攻鲁西、皖北。1930 年 4 月 11 日，蒋主席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1929 年 12 月 24 日就任）指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军队对抗李宗仁，是为南战场。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于鲁西对抗徐永昌的晋军南下；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担任陇海路作战；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担任平汉路作战。是为北战场。南战场方面，李宗仁部一度于 6 月初旬连陷长沙、岳阳，但至 7 月初旬即被逐回广西。北战场方面，晋军（第三集团军）一度于 6 月 25 日占济南，但济南至 8 月 15 日又为中央军右翼军（十九路军指挥蒋光鼐）克复。石友三见晋军在山东作战不利，即与中央私通，退往黄河北岸。9 月 18 日，东北军张学良宣布拥护中央，派第一军军长于学忠等率部入关，于 9 月 27 日占北平，并沿平汉路南下，石友三投降。10 月 6 日，陇海、平汉两路讨伐军会师郑州。此后，第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城率军西进。10 月 24 日，杨被任为陕西省主席。杨部于 10 月 25 日克潼关，29 日克西安。11 月 1 日，杨虎城部进驻西安。11 月 4 日，冯通电下野。此次被称为中原大战的全国性内战，双方各动员七、八十万人，叛军伤亡十五万人，中央军伤亡亦逾九万人，而战地人民流离失所、业产破坏，损失更无法估计⁵。

⁵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 899-903，第九章，页 1545-155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 册，页 545-643 有关记载。关于中原大战及相关问题，可参阅山西文史数据编辑部编《中原大战内幕》一书。

在中原大战期间，反抗中央政府各派，包括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各军系，互相联合，决定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于7月13日在北平举行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他们否认受少数人控制的三全大会，宣言「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7月25日，扩大会议并发表政治主张，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国家基本大法。9月1日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参加）、唐绍仪（未就职）、谢持为委员。次日又推汪精卫等起草约法。9月18日张学良派兵入关，扩大会议迁石家庄，继又迁太原。10月18日通过〈国民会议条例〉，10月27日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但以反抗军失败，汪精卫于11月1日离太原转往平、津，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电张学良，宣布下野，扩大会议结束⁶。

扩大会议派是反中央各派军政势力的临时结合，相当松散。就政治派系而论，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的政治立场（反共、亲共）原是对立的；就军事派系而论，石友三反复无常不说，李宗仁的桂军远在广西，势孤力弱，无法与阎、冯军夹击南京政府；冯军在河南、陕西，阎军在山东、河北、山西，可以形成一方势力，但国民政府如能促使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阻止扩大会议派在北平开会，进而与中央军夹击阎、冯军，则阎、冯军处于危境。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政府和扩大会议派均极力拉拢张学良，信使往还，不绝于途，均以权位、地盘饵张。国民政府于6月21日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3月10日阎锡山辞此职获准），事后并许以华北五省三市（五省：察、绥、冀、晋、鲁，三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全权及予东北军系以四个部长的位置（四个部长的位置，因受部分国府委员反对，未能完全实现，仅前奉天省长刘尚清做了内政部长）。9月1日扩大会议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愿以各部长之半数由张决定人选。张学良初则电劝双方息争，对扩大会议派所给予的「国府委员」职表示「从未与闻」，对国民政府所给予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亦迟不就任（至10月9日始就任）。继则表示中央军克济南后，始进军平、津；同时

⁶ 孙彩霞，〈反蒋扩大会议述评〉，《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页29-32；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903-906。

希望晋军和平撤退，免动干戈。8月15日中央军克济南后，张学良于9月2日召集部属开会，与会人员对是否派兵入关，意见并不一致。嗣张学良仍以于学忠、王树常统第一、二军入关，并要求中央拨给军费五百万元。在东北军入关前后，扩大会议派曾运动苏俄出兵东北，以牵制东北军后路；苏俄伯力电台，曾以广播警告东北军，但并未真正出兵。东北军入关后，晋军即撤离平、津地区，阎锡山等初自北平转往石家庄，继撤往太原。东北军继续对晋军施压，冯部在河南亦为中央军所败。阎、冯等乃不得不宣布下野。阎、冯等下野后，蒋主席命张学良负责华北军事善后事宜，所有阎军、冯军及石友三的部队，均归张学良节制整编⁷。

1929-1930年间的国军编遣，加上其他政治因素，引起国民党系各军连年内战。中原大战期间，编遣工作完全停顿。战争结束后，全国军队280师共300万人，军费仍占岁入85%。193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议取消「国军编遣委员会」，对陆军整编工作交由「陆军整理委员会」负责⁸。

中原大战虽然结束、扩大会议派的势力虽然星散，但扩大会议派的政治要求尚为热心政治者所冀望。1930年9月19日张学良的东北军既开始入关，并希望和平接收平、津；扩大会议派在撤离北平前，乃向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等主张。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接纳反对派的意见，于10月3日自郑州前线电国民政府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提早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等问题；立法院长胡汉民则本三全大会的决议，认为总理遗教即为根本大法，无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11月12日，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中胡汉民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李煜瀛、吴敬恒等则赞成，终通过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并通过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但胡汉民仍反对制定约法。1931年2月28日，蒋主席约胡汉民等晚宴疏通不成，3月1日胡辞去一切党政职务，被幽禁于南京东郊汤山。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并选林森为立法

⁷ 刘心皇辑注，《张学良进关秘录》，页37-257有关电报；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页116-131；方正，俞兴茂，纪红民，《张学良与东北军》，页179-194；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451-459有关记载；张玉法、沈松桥，《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页35。

⁸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六章，页907-908。

院长。正当国民党中央筹开国民会议、起草训政约法草案之际，4月30日，留在广州的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等致电中央有所责难；5月3日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逐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以自代。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5月12日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5月27日，陈济棠等与旧扩大会议派汪精卫、李宗仁、唐绍仪等据广东独立，另立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广东独立后，组织北伐军，进攻湖南，并派邹鲁赴北方联络阎、冯。驻守河北省的石友三部乘机兴起，与广东方面遥相呼应。后石友三部为张学良等部击溃，石于8月8日宣布下野，残部由韩复榘（山东省主席）的第三路军收编。嗣九一八事变发生，一致对外的呼声响彻云霄，经张继、蔡元培等奔走协商，宁、粤双方于10月27日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广东方面在恢复胡汉民自由（10月14日胡自南京抵上海）和以十九路军担任京沪路卫戍职责（11月11日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条件下，自动取消独立。蒋介石为谋各方和衷共济，于12月15日辞职回乡（嗣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继任，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至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蒋始于1月29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到3月6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⁹。

中共的武装割据、武装流窜与国军的围剿

中共自1921年7月成立后，以工运为发展势力的手段，1924年1月加入国民党后，工运之外，兼重农运。1927年7月国民党全面清党以后，中共实行武装暴动，且以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为手段，以争取贫农支持。暴动初以城市为中心，如1927年8月的南昌暴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但自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平江、浏阳、醴陵一带所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转入江西井冈山以后，农村武装割据即逐渐成为中共暴动的主要形态。从1927年8月迄于1929年12月，两年多中，中共在各地策动的重要暴动近30次，遍及江西、湖南、广东、湖北、福建、江苏、四川、安徽、广西、河南、陕西等11省。1930年7月，中共在总书记李立三的带领下，于江西和湖南

⁹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页487-510；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234-235；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455-481有关记载。

各地暴动，彭德怀部先后陷岳州、长沙，毛泽东、朱德部一度逼近南昌。8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部共军七路围攻长沙，失败之后，主力依从毛泽东的主张袭据赣南乡区，其余共军亦分据湖北、江西、福建、安徽等省边区，各地共军总人数不过12万人。国民政府于1930年10月以后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苏、四川、安徽、河南、陕西九省边区分设14个督办或司令，负责剿共，并集中兵力对赣南地区进行围剿¹⁰。

如前所述，共军主力自1930年8月谋攻长沙失败后，即移往赣南，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初由毛泽东任主席，旋易为项英。军委会下设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辖四个军团，朱德的第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或称第一方面军）在赣南，贺龙的第二军团（或称第二方面军）在鄂西，徐向前的第四军团（或称第四方面军）在豫鄂皖边区。国民政府于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即拟对赣南及豫鄂皖边区等地的共军加以围剿。对赣南地区的围剿共有五次，第一次围剿的部署始于1930年12月初。是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决定设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江西省主席暨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第六（朱绍良）、第九、第十九（蒋光鼐）路军，向赣南共区围剿。在赣南对抗围剿的共军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下辖朱德的第一军团（下有林彪的第四军）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共军反围剿的战略在10月底即已决定：「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国军第九路军于11月中旬进至吉安、永丰、乐安、南丰一线，到12月中旬，十九路军进至吉安、赣县间，第六路军进至靠近福建边境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一线。国军的战略是由第九路军主攻，第六、第十九路军辅之，将共军围歼于包围圈之内的东固、东韶一带。当时红军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在东固、龙冈、东韶一带布置诱敌深入之阵。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等于1930年12月19日占东固，29日占龙冈，次日共军反扑，国军大溃，张辉瓒师长被俘遇害。1931年1月2日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进抵东韶，受共军围攻，部队损失惨重，师长谭道源率残部突围走宜黄。以收复宁都为主要目的的第一

¹⁰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355-1374, 1421-1422；中国大陆研究社编印，《中共祸国史实年表》（一），页49。

次围剿，就此终止。国军此次出动 12 万兵力，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对其敌情和战区的地形不了解。谭道源在这次战役后说：「到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¹¹

在第一次围剿赣南共军的同时，蒋介石于 1930 年 11 月以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指挥下，部署对鄂豫皖边区大别山地区的红军进行围剿。迄 1931 年 1 月因战事失利而结束，当地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¹²。

第一次围剿赣南共军失败后，1931 年 2 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南昌行营主任，布置第二次围剿。调动兵力二十余万人，包括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战线自江西吉安向东延伸到福建的建宁，全长八百里，自 4 月 1 日开始进攻，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战法。共军建制、兵力略同前，主力集中在广昌、宁都、东固一线，战法是「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由西向东横扫」。集中在兴国一带的十九路军，兵力最强，共军取守势；于 4 月 7 日攻占富田的第五路军兵力较弱，共军取攻势。5 月 12 日，第五路军自富田向东固进兵，16 日与共军接战，第二十八师首遭击溃，师长公秉藩被俘。自宜黄、乐安南下的二十六路军，于 5 月中旬在东韶一带受到共军的袭击，即分别转移阵地。于 4 月 10 日攻占广昌的第六路军，为共军攻击的另一对象。5 月下旬共军对广昌展开攻击，国军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战死，广昌再陷。共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自江西的东固打起，由西向东横扫，一路经东韶、广昌直到建宁（6 月 1 日攻占）、黎川（6 月 6 日攻占）¹³。

在第二次围剿赣南共军期间，鄂豫皖边区的共军于 1931 年 3 至 5 月间受到第二次围剿，国军仍然失败¹⁴。

第二次围剿赣南共军失败后，蒋介石于 1931 年 6 月 21 日亲莅南昌，部署第三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

¹¹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 1422-1429；索世晖、郭德宏、冯都，〈中央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3 年第 6 期，页 119-123；冯都，〈第一次反围剿十个问题考辨〉，《争鸣》（南昌），1985 年第 1 期，页 50-53。

¹² 阎景堂，〈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页 88。

¹³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 1430-1439；向阳，〈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江西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页 63-66。

¹⁴ 前引阎景堂，〈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页 88。

总司令，辖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的第四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军和陈诚的第二路军；以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和上官云相的第三路军；总兵力约 30 万，于 7 月 1 日开始进攻，采长驱直入战略，企图将共军压迫至赣江东岸而歼灭之。共军编制、兵力略同前，其对策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国军第一军团在兴国一带、第二军团在乐安一带、第三路军在永丰一带；第三军团及第二路军在建昌、南丰一带；第四军团及第一路军在临川一带。主力由南丰、永丰方面向南进攻，于 7 月 5 日克黎川、7 月 13 日克广昌、7 月 19 日克宁都；共军兵溃西移，集中于兴国附近。国军追击，并以飞机助战，但以地形不熟，到 8 月初旬，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在莲塘受挫，毛炳文的第八师在黄陂受挫。时因蒋、胡约法之争于是年 5 月 28 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李宗仁等自广东派兵北上，蒋介石令陈铭枢的右翼集团军增防粤湘赣边境；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蒋复自江西战场调兵北上增防华北，到 9 月 20 日第三次围剿乃不得不结束，各线军队于 9 月初开始分别撤退：第一路军退向临川，第二路军退向吉安，第一军团退向赣县，第二军团退向宁都，第三军团退向南丰、建昌。共军则乘机扩张战果，将赣南、闽西根据地打成一片，拥有 21 个县城，共有人口 250 万人¹⁵。

在对赣南共军第三次围剿结束之后，国军曾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对鄂豫皖边区的共军作第三次围剿，经四次战役，国军均败。此一地区红军主力发展到四万五千人，根据地人口约 350 万人。红四军团总司令为徐向前，军委书记为张国焘¹⁶。

国军对赣南地区共军的第三次围剿，因广东异动、军事中挫以及九一八事变而结束。接着到 1932 年 1 月 28 日又发生淞沪战役，国民政府除在鄂豫皖边区进行剿共外，把江西剿共的事委朱绍良，任朱为驻赣绥靖主任。当时国民政府为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订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1932 年 3 月，淞沪战役经国际联盟斡旋停战后，国民政府于是年 5 月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

¹⁵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 1439-1447；钟山、云新，〈第三次反围剿始末〉，《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82 年增刊，页 1-10。

¹⁶ 前引阎景堂，〈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页 88-1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页 208。

总司令，部署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进攻。是年9月，贺龙的红二军团首先因不敌国军的攻击，退出了湘鄂西根据地；于是年11月辗转移往陕南、鄂西。是年10月，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军团也因不敌国军的攻击，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于是年11月经河南内乡、浙川，移往陕南、川北。此后蒋介石即将兵力调集江西，对赣南共军作第四次围剿。早在是年4月19日，蒋介石即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副司令，对赣南的共军从事剿办。何于5月1日到南昌主持剿共军事，兵分九路：第一路余汉谋负责赣南，第二路陈诚负责赣西南，第三路李敬扬负责闽南，第四路蔡廷锴负责闽西，第五路白崇禧负责湘桂边，第六路朱绍良负责南丰，第七路谭道源负责赣西北，第八路赵观涛负责赣东北，第九路孙连仲负责宜黄。初只包围监视。未作大规模的进攻。到12月下旬，决定分三路进剿：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自抚州南攻广昌；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自闽西西攻连城、长汀、瑞金；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自粤北北攻兴国、雩都、会昌。但余汉谋借口赣南粮荒，表示进兵困难；蔡廷锴热心抗日，甫自上海调福建，亦按兵不动；主要由中路进攻。1933年2月，蒋介石设南昌行营，自兼剿匪总司令，决定以陈诚的中路主攻。当时中路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吴奇伟）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赵观涛）在金溪一带。此时中共在赣南的中央苏区指挥系统已有改变，中共中央已于1933年初自上海迁瑞金，工农红军总司令仍为朱德，政委由毛泽东易为周恩来，下有林彪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等四个军团和其他直属部队。第四次围剿战争，国军采「分进合击」战法，由北向南，齐头并进；红军采「大兵团伏击围歼战」。共军于1933年1月5日攻占金溪，第三纵队兵败。2月中旬共军攻南丰不克，主力移往东韶地区。2月下旬国军两师在此遇到伏兵，受创颇甚。3月下旬，国军又一师在此受到重创。此期间，日军于1933年1月自东北进攻热河，3月陷承德，长城各口发生战争，各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军于4月29日攻下金溪之后，决定暂时结束围剿；共军则乘机扩张战果，将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¹⁷。

¹⁷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447-1458；韩荣璋、萧裕声、杜魏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始末〉，《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页39-48；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

第四次围剿在日军进迫华北时结束。国民政府本「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面由主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在华北应付危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来往于南京、南昌间（5月21日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继续部署赣、粤、闽、湘、鄂剿共军事。1933年5月1日，以陈济棠为南路总司令，扼守赣南；何键为西路总司令，扼守湘赣鄂边境；刘峙为北路总司令（到9月19日易为蒋鼎文），为攻击主力。北路军分兵三路：第一路军在宜黄、乐安，第二路军在金溪、崇仁，第三路军在建昌、黎川（黎川至9月28日始占领）。此次为第五次围剿，与前此最大的不同有二：其一、本曾国藩「用兵不如用民」之理，着眼于群众之争取、民力之发挥；严密地方组织，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其二、采步步为营、以守为攻战法，逐次修碉堡、修道路接近敌阵，并对敌区进行经济封锁。由于是步步为营，不是立即进攻，部署颇需时日，从5月到10月才完成。此期间，华北的中日冲突于5月31日订立塘沽协议后虽然减缓，由于冯玉祥等反对与日本谈判、在察哈尔组抗日同盟军，又使日军有所借口。8、9月间，抗日同盟军渐落幕，蔡廷锴等又于10、11月以抗日为号召，在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颇影响剿共军事的进展。5月至10月间，在江西地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只有零星接触，包括国军以飞机轰炸敌区。在国军筑碉堡、修道路、组训民众准备进攻苏区时，共军于8月初电苏俄军事委员会请示战略方针。8月下旬，苏俄派李德（原名Chey，真名Otto Braun，德国人，1932-1939年间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自闽省进入苏区。李德改组共军，以师为建制单位。林彪、彭德怀等各统三师，陈毅统江西军区的地方武力。中央苏区的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李德并指示在阵地要点、要线及支撑点上加强构工，以备国军藉碉堡群之掩护接近共军工事支撑点时，行短距离之突击。10、11月间，国军第三路军自建昌分向黎川、南丰修筑碉堡，11月20日占领宜黄、南丰间之神岗，12月2日占领黎川、南丰间之钟贤。时以闽变发生，北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改为东路军第二路军入闽讨伐；东路军总司令为顾祝同。1934年1月

底闽变平定后，顾祝同改任北路军总司令。闽变前后，福建抗日势力与江西苏维埃之间有所接触，曾于 10 月 16 日秘密签订反日反蒋协议，11 月 27 日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但中共未与福建抗日势力联合行动，只单独应付国军围剿。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共内部对此事有所争论。闽变平定后，顾祝同之北路军继续攻击中央苏区，4 月 28 日克广昌，5 月 16 日克建宁，10 月 6 日克石城，10 月 10 日克兴国，10 月 26 日克宁都，11 月 10 日克瑞金。共军主力于 10 月初突围西走¹⁸。

中央苏区共军主力于 1934 年 10 月突围西走后，中央苏区由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负责留守。项英为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他们选择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游击区，但因受到国军的清剿，项英、陈毅等于 1935 年 3 月转移到赣粤边区的油山，其后即以此为中心，从事两年多的游击战争。除赣粤边游击区外，尚有以永定县乡区为中心的闽西游击区、和以瑞金到长汀间乡区为主的闽赣边游击区，都不断受到国军的清剿。直到 1937 年国共联合抗日为止¹⁹。值得一提的是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于 1935 年 2 月 23 日在由瑞金赴汕头途中被国军逮捕，后处死。

中央苏区中共主力突围计划始于 1934 年 5 月广昌战役失败以后。从 5-9 月，共军兵工厂、被服厂赶制弹药、衣服，并向农民征谷 60 万担。一切后勤准备妥当后，突围部队及人员作任务编组：前卫部队由林彪的第一军团及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担任，参谋长刘伯承同行；后卫由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担任；萧劲光的第七军团掩护左侧（嗣留置赣边，改由第八军团任左翼）；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掩护右侧；中间除叶剑英指挥的红军大学一个团在前外，依序为红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党团人员，再后为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被服等单位。当时红军总司令为朱德、军委会主席为周恩来、中

¹⁸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 1458-147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256-412 有关记载；曾景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研究〉，《江西党史研究》（南昌），1988 年第 4 期，页 2-9；郭恒钰，〈评介「李德回忆录」〉，《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5 辑，页 166-168。

¹⁹ 余伯流，〈中央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述略〉，《江西社会科学》（南昌），1985 年第 4 期，页 104-109，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 1479-1480。

中央委员会主席为秦邦宪、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毛泽东。全部人员八万五千人，其中军队约七万人。10月14日，共军主力自雩都、瑞金一线秘密向西南移动，自信丰、南康间入湖南，由于国军西路军（何键为总指挥）在湘南桂东（郴县）堵截，南路军（陈济棠为总指挥）在粤湘边境堵截，北路军（此时陈诚为总指挥）在后方追击，共军于11月3日经汝城、11月12日经宜章，向临武、蓝山方向转移，达于湘桂黔边境。11月13日蒋介石以西路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14日追剿军总司令部在衡阳成立），同时电令黔省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在黔湘边境堵截、命桂省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在桂湘边境堵截。11月26日，共军主力自广西北境的兴安、全州之间转往临近桂黔边界的湘境新宁、城步，并于12月14日攻占贵州东南边境的黎平。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于12月2日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由全州向新宁追击；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由全州向城步追击；薛岳兵团于12月22日进入黎平以北的天柱。此为国民政府中央军入黔之始。时红军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在湘西永顺至桃源一带，薛岳等军主要阻止红军主力的第一方面军与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经过两个月的流窜，经常走在山中羊肠小道，又如搬家式的带着被服、粮草，以及印刷、医疗等设备，且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因足茧需坐担架，因此行动迟缓；在国军堵截、追击下，到黎平时，八万五千人只剩下三万人²⁰。

中共中央于占领黎平后的第二天，于12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进行方针。或主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方面军会合，或主入川北与在剑阁一带的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为军委会主席），或主入云南建立基地。最后决定到贵州西北遵义、桐梓一带休息整补，伺机在黔川滇边境建立基地。12月18日，共军主力向西北转移，22日占台江，28日占施秉、瓮安，1935年1月5日占遵义，1月10日占桐梓，黔军不能敌。薛岳兵团自天柱、青溪一带向西追击，于12月30日克施秉。共军主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6-8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攻击中央委员会主席秦邦宪在「西进途中，搬家逃跑，行

²⁰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476-148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12-42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北京，1990）上册，页425。

动迟缓，招致共军重大损失」；毛泽东批评「在反五次围剿时所采取的短促突击、单纯防御的错误战术，断送了中央苏区」。会中检讨中央委员会主席秦邦宪、军委主席周恩来、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错误路线，最后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协助军委主席周恩来处理军事事务（是后至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由张闻天继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任）。1月15日，共军主力开始向西北移动，拟进入四川，在泸州、宜宾间渡长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度进入四川南端的古蔺、叙永。2月2日，蒋委员长重新调整剿共部队之部署，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在湘西围剿萧克、贺龙部，并封锁黔东；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主力集结滇、黔边境，以围剿朱德、毛泽东的共军主力。进入古蔺、叙永一带之共军主力因山高地险，复受川军及中央军防堵，无法北上，折回原地，于2月28日再占桐梓，29日再占遵义。3月中旬，共军主力一度又入川南，再折返黔北。3月下旬，共军主力向西南移动，3月31日至息峰，4月11日占广顺，4月13日占紫云，4月19日占兴仁，4月23日自兴义入云南。4月27日经曲靖于29日占寻甸，5月3日自元谋以北过金沙江入西康境。蒋委员长于3月23日由重庆飞贵阳，5月10日由贵阳飞昆明，一路督剿。共军主力入西康后，5月15日占会理，5月23日占勉宁，6月5日占泸定，次日占康定，6月11日抵宝兴。另一方面，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为与共军主力会合，在川北一带活动频繁。2月8日，主力集南江、广元一带，3月8日袭阆中，4月2日占剑阁，4月13日占梓潼，5月16日向西进至茂县，至6月16日与共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会于接近西康边境的懋功。当时张国焘、徐向前所部约六万人，朱德、毛泽东所部约二万人，一说朱、毛部仅万人²¹。

朱德、毛泽东的第一方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于6月24日北进至两河口。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毛泽东主张共军主力向北发展，以便背靠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俄援助；张国焘则主张共军主力南下，在川康边境建立基地，相机进取成都平原。经朱德居间协调，第一、第四方面军

²¹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490-149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22-480。

各留一部在懋功，以掩护建立川陕甘边区基地，主力仍向北移动。7月10日，红军主力抵毛儿盖休息。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毛泽东仍主北进，张国焘仍主南下，最后决定分两路北上：右路由毛泽东、徐向前率领，统彭德怀、林彪的第一、第三军团及部分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统率第四方面军及部分第一方面军的军队。8月23日毛泽东的右路军自毛儿盖北上，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由卓克基北上。8月28日，右路军在上包座、下包座附近受到国军胡宗南部的突击，损失惨重。张国焘获悉，与毛泽东相商，拟率军南下。毛泽东则于9月2日留下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悄然率领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将所部组成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林彪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其他军政编制如故。9月10日，自求吉寺渡白龙江入甘肃，9月25日经岷县附近，于9月27日占通渭。10月21日通过环县附近进入陕西保安附近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会合。陕北红军原有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部。刘志丹、高岗部自1933年前后即在陕北神木、榆林至延安一带活跃，刘部编为二十六军、高部编为二十七军。至1934年秋，流窜于豫皖边境的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因受国军围剿自豫西入陕西南部的雒南、商县一带。经中央军及陕军围剿，复于1935年7、8月间自雒南突围至陕甘边境的凤县（陕境）、两当（甘境），复北走崇信，至9月24日（亦作9月5日、15日、18日）在延安附近与刘志丹、高岗部会合，合组红军第十五军团，约七千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10月1日曾在延安、甘泉间消灭东北军的第一百十师，师长何立中战死。10月下旬，国民政府于西安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委员长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下辖三路军：第一路军为中央军朱绍良，第二路军为东北军于学忠，第三路军为西北军杨虎城。毛泽东、徐海东、刘志丹部活动于陕西省东北的延长、延川、清涧、安定一带。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安定旧名望窑堡，讹为瓦窑堡）开会，正式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陕北共军约五万人，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朱德。直属苏维埃政府的红军为林彪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及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朱德辖贺龙的第二

军团、徐向前的第四军团、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萧克的第六军团和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第四、五、九军团原在川康边境；第二、六军团自湘西经黔、滇、康各省，至1936年6月30日抵川康边境的甘孜，与朱德的第四、五、九军团会合；10月9日，一同窜至甘肃会宁、海原，与陕北根据地相接。此期间，陕北共军曾于1936年2、3月间由刘志丹组「红军抗日先锋队」，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自延川等地攻晋西，为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部击败；刘死，共军撤回陕北。6月1日，蒋委员长设晋陕甘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于太原，以陈诚为总指挥，对西窜之共军展开追击，6月23日克瓦窑堡。时日军在绥远滋事，两广又因抗日等问题宣布独立，国民政府多方应付，但仍在各个战场对共军施压。如前所述，到1936年10月9日，在川康边境会合的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五、九军团）北窜至甘肃会宁，与原来的红一方面军会合²²。兹将第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合的经过，再作一简述。

1934年10月共军主力自江西苏区西移以后，先后计划与活跃在湘西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的贺龙和第六军团的萧克）、以及活跃在川北的第四方面军（即第四军团，由徐向前、张国焘领导）会合；第二、四方面军亦希望与自江西西移的共军主力会合。先说第二方面军的贺龙与萧克。贺、萧军在湘西，于1934年11月7日占永顺，12月7日攻阮陵，接近贵州东境；时红一方面军正自贵州东境北上，国军力阻红一、二方面军会合，贺、萧军乃复北窜，于12月17日占桃源，1935年3月初与国军战于大庸、永顺，5月初进到慈利、石门，6月初西北走，一度攻湖北宣恩，复于11月初折回湖南桑植，11月28日占辰溪，一度与贺龙部分散的萧克部，复于12月初自新化与贺龙部会于溆浦，进占武冈，12月底窜至芷江。1936年1月进至黔东的江口、石阡、印江、平越，2月经贵阳城外占毕节、威宁，3、4月间先后占云南的宣威、平彝、寻甸，经昆明附近至中甸，5月22日入西康巴安，6月30日在甘孜与朱德统率的第五、九军团，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统率的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团）会合。张国焘、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团）系在鄂豫皖边区受国军围剿窜出，于1935年

²²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497-150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36-510有关记载。

3月自陕南到川北苍溪，4、5月间经绵阳、安县进至茂县，至6月16日与毛泽东、朱德的一方面军会于川康边境的懋功。如前所述，即同军北上，经两河口、卓克基至毛儿盖。此期间，毛泽东与张国焘对行军方向发生歧见。8月下旬，毛泽东率第一方面军自巴西北上，张国焘、徐向前则率第四方面军南下，至10月初抵毛儿盖、卓克基一带。时朱德所率之第五、第九军团，在张国焘指挥下北进受阻，折回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10月12日占川康边境的靖化，10月18日、11月14日占康川边境的丹巴、芦山。1936年2、3月间因受国军截堵，复北走懋功、瞻化。至6月30日与贺龙、萧克部会于甘孜。7月9日经川康边境的巴丹趋绥靖（靖化），7月18日经松冈进抵阿坝，29日抵毛儿盖，8月4日抵包座，8月8日抵甘肃岷县，8月13日占漳县。此后月余在西兰公路以南临洮、成县、通渭等县与国军交战，互有胜负。另一方面，陕北红军林彪的第一军团、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等自6月2日即由靖边、定边一带三路入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谋接应朱德、张国焘、贺龙等部；8、9月间自宁甘边境的豫旺堡南下，至10月9日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部在会宁会合。会合之共军主要集于会宁、通渭、固原、海原、靖远之间；到10月22日，贺龙、萧克部亦在海原与红军主力会合。但张国焘等与陕北红军主力会合后，对毛泽东操纵的陕北中共中央不满意，乃向中央建议，组西路军，谋在甘肃、宁夏发展。10月下旬，张国焘、徐向前的第四军团（第四方面军）暨贺龙的第二军团，并配合一部第一军团兵力，自靖远西上；来自陕北的红军主力则退回陕北。时值日本侵略华北，事态严重。红军主力在陕北，在地理位置上与华北较近，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更为振振有词。11月20日，西路军占古浪，一度又向永昌发展，但因得不到毛泽东的援助，渐为追击的国军击溃。张国焘于12月初率部抵达陕北保安，仍与毛泽东意见不合（到1938年脱离中共，归向国民政府）。另一方面，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剿共军事亦渐停止²³。

²³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八章，页1507-150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12-652有关记载。

第五章
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
(1931-1937)

1931 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为转移世界视线，出兵上海；1933 年日本进兵热河、冀东，热河沦陷，冀东经中日订约成为不设防地区。其后日本又进行华北自治运动，图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当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剿共，定「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对日本的得寸进尺，百端容忍，引起国人普遍不满；加上中共从事抗日宣传，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激起一连串的反政府的抗日风潮。最激烈的一次反政府抗日事件是 1936 年 12 月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在西安劫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暨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逼蒋抗日。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到 1936 年 12 月蒋介石决定抗日以前，全国各地反政府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此促使日本进一步全面侵略中国，亦促使中国朝野上下全面起而抗日。

第一节 日军侵华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

国民政府于 1930 年 11 月荡平了一连串的军事叛乱、12 月开始对武装割据的共军进行长达六年的围剿与追击之后，日本眼看中国统一在即、对外态度转强（例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关东军的主导下，开启了鲸吞满蒙、割裂华北、全面侵略中国的道路。此一被定名为「大陆政策」的侵略道路，起源甚早，而大规模地推行则始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沈阳事变。沈阳事变是日本执行大陆政策的重要进程，可从三方面说明：

（一）**积极经营满蒙**：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膨胀，初以朝鲜和满蒙为主要出路。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鲜由受中国保护转而受日本保护（1910 年吞并）；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满洲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12 年透过日俄密约，日本势力及于蒙古东部热河等地。此后日本致力于满蒙独立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日增。除于日俄战后在大连设立的关东都督府（1919 年改为关

东厅)、关东军(1918年前称守备队)司令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创于1906年)以外,更广泛地在满洲各种经济行业投资。在沈阳事变前夕,外国在满洲的投资总计约24亿元,其中日本17亿5000万元,占70%;苏俄排名第二,为5亿9000万元;英、美、法三国,各约占二、三千万元。日本在满洲的投资,运输业(满铁为主)为5亿3000万元,农、矿、林业为2亿8000万元,工业和商业各为一亿多元,金融业二亿多元¹。因此,1927年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其中心内容即是把中国东北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二) **中日民族冲突:** 中日民族冲突肇因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和外交压迫。远者不论,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1919年日本拒绝将青岛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都在中国造成一连串的排日运动。北伐完成后,中日谋求邦交协和。1929年5月济案解决,日本自山东撤兵;7月日本承认国民政府,国府一再下令禁止排日运动;1930年10月,日本废去「支那」名称,改以「中华民国」称中国。但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的中日民族冲突则日益扩大。1924年以后,张作霖插足北京政治,颇为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所不满。吉田希望张作霖专心经营东三省,不要涉足关内事务;日人在沈阳所办的《盛京时报》宣扬此旨,张作霖禁止购阅。1927年在北京称大元帅后,张作霖眼中更无日本,次年张作霖出关被炸,与此不无关系。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在东北长大,耳闻目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上日本的杀父之仇,使他的反日之心益烈。他愿意和平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以及在官邸枪杀亲日派要员杨宇霆(1929年1月10日),都是表明张学良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东北以后,国民党在东北各地设立支部,插青天白日国旗;筑铁路与满铁的铁路并行,使满铁的营运出现赤字;筑葫芦岛港,与大连竞争,并要求收回旅顺、大连;限制日人租买土地、排斥日货、取缔日人旅行内地。影响所及,日人在东三省的商店、学校等常受到骚扰,日本学生上下学、日人单身到乡区旅行,人身均不安全。在这种情形下,以保障日本在东北利益为职志的日本关东军自然不能坐视²。另一方面,

¹ 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页17;梁敬錚,《九一八事变史述》,页9。

² 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页33,60-62,125-126;陈鹏仁译,《日本侵华内幕》,页17-19,31-34。

由日人组织的满洲青年联盟于 1931 年 3 月组织「全满日人自主同盟」，公然鼓吹满蒙独立，先后发布《满蒙问题真相》、《火山巅跳舞》、《满蒙三题》诸书刊，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又遣游说团赴日本国内请愿、运动；日本国内各右翼团体，亦纷纷作「膺惩暴支」之宣传与运动。在中日民族冲突激化之下，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万宝山在长春北 28 公里，当地中韩人民杂居。1931 年 4 月，当地韩农因凿渠灌溉田地，与华农发生冲突，日警为保护韩农，一度与保护华农之华警冲突，交涉期间，仁川地区韩人杀华侨以报复，华侨死伤近五百人。到沈阳事变发生，双方的交涉没有结果。中村震太郎为日本陆军上尉，哈尔滨日领给予农事考察护照，于 1931 年 8 月在洮南地方因护照与身分不符，为中国军队拘留，在逃跑时被击毙。直到沈阳事变发生时，中日双方尚在互商解决办法³。

（三）中共煽动与日本反赤的激荡：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于 1928 年五三惨案后开始向东北积极发展，其后在 1928-1929 年间，中共满洲地方委员会和日人（在大连）所组之满洲青年联盟，在大连、间岛一带各作煽动中日民族对立之工作。1928 年 11 月 5 日，中共满洲地方委员会发表东三省独立宣言，唤起全满工农兵学商各界排除日货、保护路权、收回旅大、逐出日本军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国民党卖国外交。满洲青年联盟则先后于 1928 年 6 月、1929 年 11 月、1930 年 9 月三次集会，宣扬满洲为日本食料生存线、国防资源地，有武力夺取之必要。共产国际除在言论上激化中日民族冲突外，更于 1930 年 10 月在间岛地区两度引发暴动。间岛为图们江中韩交界之地，有韩人四十万，中国人二十万，日人二千，韩共、中共均活跃其间，韩共且听中共指使。另一方面，1931 年国民党东三省各省市支分部成立后，下级党部为中共所渗透，亦高唱收回国权，激化中日冲突⁴。当时日本为高度资本主义国家，日共在日本国内甚为活跃；日本于 1928 年 6 月修正 1925 年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变更国体之罪可处死刑，目的即在镇压共党活动。许多企业家、青年军人、右翼学者，都有日本被赤化的危机感，而在他们看来，满洲和中国亦在赤化中。日本青

³ 梁敬鎔，《九一八事变史述》，页 52-53，138-139。

⁴ 梁敬鎔，《九一八事变史述》，页 11-13，225。

年军人在右翼学者的煽动下，乃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⁵。日本进兵中国，借反赤的名义，这对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颇有吸引力。它们希望日本能进兵苏俄，并镇压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的基本原因可如上述，至于时机，则当年长江大水灾、两广独立、江西剿共，均使国民政府穷于应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指使南满铁路守卫队，将沈阳城外柳条湖之南满铁路炸毁，指为中国人所为，不待请求日本总领事馆的同意，即发兵五百人进攻沈阳城北之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在北平就医，事前感于日人不断挑起事端，并了解中央决策，曾于9月6日向其部属发出命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在这种情形下，当日军进攻北大营之际，在沈阳城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北大营守军旅长王以哲，均下令不准抵抗。19日上午5时，日军占领北大营，当日并占领沈阳、安东、营口、长春、凤凰城、本溪湖。关东军发动沈阳事变，是一种预谋，关东军不仅预定在占领沈阳后占领整个满洲，对全满洲的行政、财政、金融、关税、盐务、邮政等都已有周详的接收计划。因此日本于占领沈阳后，即于东北各地攻城掠地。9月20日占抚顺、昌图、盖平，9月21日占吉林省城。9月23日，中国东北边防公署及辽宁省府移锦州。9月28日，日本任熙洽为吉林省长。但另一方面，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则对来犯的日军加以抵抗。11月17日，国府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省主席，次日张学良令所有黑省及附近军队均归马占山节制。19日日军陷齐齐哈尔，马占山沿齐克路退至克山。12月底，日军沿京奉线出动，1932年1月2日陷锦州，辽宁省府移河北省滦州。1月7日，日本任张景惠为黑龙江省省长，与马占山取得谅解。1月15日，马占山在哈尔滨与张景惠等商组东北行政委员会。2月5日，日军占哈尔滨。2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成立。3月9日，马占山任满洲国军政部长（满洲国于3月9日成立，见下文）。时吉林自卫军李杜等仍在吉林、黑龙江一带抗日。到4月12日，马占山复在黑河通电抗日，并宣布日本制造满洲国真相。此后，东北各地抗日军虽甚活跃，

⁵ 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页6，11。

仍无法挽回东北局势。1932年12月，日军追击抗日军苏炳文部而进入满洲里。1933年1月，日军进占绥芬河。到1933年2、3月间占热河，整个东北领土，完全归于关东军支配下⁶。

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的指示是：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即使勒令缴械，暂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据荣臻报告，在勒令士兵不得擅动之后，「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目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犹能服从长官命令，不还一弹」⁷。不抵抗的原因，当时广东独立，宁、粤纷争，政府不欲对外引起事端，此其一；攘外必先安内，共军尚据华中要地，伺机扩张，此其二；长江大水，数千万灾民待赈，此其三；张学良卧病北平协和医院，蒋介石督师江西，东北边防事务乏人主持，此其四。在这种情形下，在沈阳事变发生的次日（19日），即由外交部向日使重光葵提出紧急抗议，要求日军停止一切行动，并电出席国联代表，向国际联盟报告。21日，中国出席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理事会对东北事变采取行动，制止事变扩大，回复东北原状。同日，蒋介石自南昌回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应付危局。次日，国联理事会决议：（1）通知中日两国，勿使事态扩大；（2）与中日代表协商，两国立即撤兵；（3）将决议通知美国（美国非会员国）。24日，国民政府书告全国同胞，谓「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于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并谓「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中国将沈阳事变诉于国联，国联的态度颇为积极，到10月24日，复通过决议七条，要求日本立即开始撤退军队，并于11月16日前撤毕；日本则置诸不理，要求中日直接谈判。11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试图与日本直接交涉，由于各方面的反对，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宁、粤分裂中的国民党，于11月中旬分别在宁、粤两地召开四中全会，宁方四中全会于11月20日通过请蒋介石迅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蒋亦于先一日在会中表示：「决心北上効命党国。」但粤方四中全会倒蒋气氛浓厚，非逼蒋下野不可。12月15日，

⁶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78-177有关记载；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页90-91-95，133，147-150。

⁷ 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页217，221。

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职。1932年1月1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孙科扬言死守锦州，但1月3日锦州即为日军占领。1月25日孙科辞职。1月29日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继续应付危局。另一方面，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声明日本在满洲所造成之现状不予承认。1月14日，国联成立调查团来中国，由英人李顿（Lord Lytton）为团长。3月14日，李顿一行抵上海，4月19日自北平赴沈阳。9月4日调查报告书在北平签字，10月2日发表。调查报告书否认沈阳事变系日军自卫行为，确认满洲国为日本军人之产物，不予承认，但国联经讨论对报告书予以认可后，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日本则于1933年2月退出国联⁸。此后中日之间的冲突，只能在中日之间以战争或和平的方法解决。

中国在谋求东北问题和平解决无效、使东三省陆续丧失的过程中，除东北义勇军实地抗日外，中共为转移国民党的「安内」策略，大力宣传抗日，而一般青年学生及第三势力基于民族义愤，亦鼓动抗日。中国的激烈抗日运动，引起日本的反弹。1932年1月2日，福州日本领事及舰长撕毁抗日标语，与学生冲突：日领事要求取缔抗日运动，否则自由行动。1月4日福州日本军舰水兵登陆示威。1月20日上海日人暴动，焚毁三友实业社。1月22日，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向上海市政府要求立即解散抗日救国会及其他反日团体，否则将采适当手段。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造成为期三个月的「一二八之役」。5月5日上海中日停战后，学生运动暂时减低抗日色彩，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内战、反国民党以及驱逐校长等方面⁹。可能的原因有二：（1）国民政府的镇压，（2）一二八战争的教训。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一方面在警告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主要则为减少世人对日军侵占东北和制造满洲国的注意。关东军于9月18日制造沈阳事变后，接着占领东北各地，到9月下旬即开始进行建立满洲国。关东军司令部于9月22日找到罗振玉，罗于9月30日在天津见溥仪，劝赴东北。11月1日，溥仪得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之助，秘密自天津往大沽。13日自大沽乘日舰到营

⁸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79-244有关记载；梁敬錚，《九一八事变史述》，页10，108-109，359-398；陈鹏仁，《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页136，233。

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85-178有关记载；梁敬錚，《九一八事变史述》，页115-119。

口。1932年2月19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令张景惠等成立满洲国筹备委员会。3月9日，满洲国成立于长春，溥仪为临时执政（1943年3月改称皇帝），以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蒙古自治领为国土，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为国旗，年号大同。当国联李顿调查团抵中国调查时，满洲国已成立。调查报告书认满洲国为日本制造，满洲国外交部则出版《满洲国民之总意》一册，列举1313个团体、10万4721人姓名，以及3313封函件，投递国联，意在证明满洲国系民族自决之国家。日本占领东北、建立满洲国以后，美、英等国与日本的关系陷入紧张；俄国为了自保，则于1935年3月23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¹⁰。

日军据有东北后，为分散中国及国联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并对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施压，于1932年1月在上海扩大冲突事端；先有1月18日日僧五人闹事，为三友实业社工人所殴，继有1月20日上海日人焚毁三友实业社工厂。21日，日领事为焚厂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道歉，并要求取缔抗日团体、缉拿殴辱日僧凶手。28日下午2时，吴铁城答应日方要求，但夜11时半日军即以保侨为名向闸北进犯，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奋起抵抗，「一二八之役」爆发。2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并向国联报告；同日，国民党中央于国民政府内设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等为委员。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洛阳办公（至12月1日始正式回京）。31日，英、美抗议日军在沪行动，谓侵犯各国权益。2月2日，美、英、法、义向中、日调停沪战，要求双方军队后撤，划定中立区，但为日军拒绝。2月7日，日本海陆空军会攻吴淞。2月13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谈话，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16日，甫于前二日编组完成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增援上海，以十九路军的名义投入抗日战争。在各国调停下，上海守军于3月2、3日先后自闸北、吴淞后撤，日军进占南翔，宣布保侨目的已达，可实行停战。3月6日，国民党中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接受国联中日停战决议案，但日军仍继续进兵。3月14日，中、日代表并英、美、法、义四国大使在上海商停战。此期间，国联一面派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沈阳事变，一面敦促上海中

¹⁰ 梁敬錡，《九一八事变史述》，页229，262-26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87，105，106，139，145；《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页51，75，110-111，118。

日停战、日本撤兵。到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战协议签字，日军撤退至1月28日前原地¹¹。

淞沪停战时，满洲国的建立已经完成。日军以整合及巩固满洲国为名，又开始图谋热河及华北。早在1931年12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即曾宣称：日本不能控制平、津地区将无法安心；日本控制了黄河以南的中国领土平、津才能安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的第一目标是热河，初拟用和平方法；当满洲国成立时，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但为汤所拒。1932年7月18日，关东军借口其特务人员石本权四郎在热河失踪（为中国守军逮捕），进兵热河。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长发出指示：「如果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7月21日电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加派大军援热。8月1日，张学良向行政院请款200万元。8月6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且向中央要素巨款，自请辞职；并电劝张氏一同去职，以谢国人。8月8日，张学良电中央辞职。8月1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北平绥靖公署，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蒋介石兼分会委员长。8月20日，蒋介石电张学良代分会委员长（9月1日，北平军分会正式成立）。8月30日，宋子文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期间，由于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活跃，国联调查团尚在中国，关东军对热河并未大量用兵。9月4日，李顿调查团离开中国；12月5日，东北主要抗日军马占山、苏炳文等自海拉尔退往俄境；日军即开始在山海关及热河挑衅。12月8日，日军铁甲车向山海关发炮；12月27日，日军在热河东北边境集结，汤玉麟告急¹²。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1月3日陷之，国军死伤千余人。1月4日，外交部向日本抗议，并诉之国联。国联对日本虽表不满，但无切实办法。1月8日，日军自辽西走廊进犯热河朝阳、阜新。1月10日，日军在长城之线进攻山海关北之九门口，1月12日陷之。国民政府在热河及长城决心自卫，以于学忠、商震、宋哲元三个军团防冀东，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三个军团守热河，傅作义军

¹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129-155有关记载。

¹²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174-218有关记载；张雅丽，〈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页96；胡德坤，〈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页59。

团驻守察东，杨杰军团驻守北平。2月18日，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东北军总指挥）自北平至承德，宋表示决不放弃承德。2月23日日军对热河下总攻击令，2月24日北路日军陷开鲁，2月25日中路日军陷朝阳，3月1日南路日军陷凌源。3月3日，北路日军陷赤峰，南路日军陷平泉，迫近承德，汤玉麟遁走。3月4日，日军128人入承德，并自凌源南下，陷河北境之冷口（长城缺口，在山海关与喜峰口间）。3月7日，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准张辞职，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此期间，国军与日军在冷口（商震部）、喜峰口（冯治安部）、古北口（王以哲等部）、南天门（黄杰部）等地苦战。何应钦重新部署，以徐庭瑶、关麟征、黄杰之中央军驻密云，守古北口；宋哲元、刘汝明、赵登禹之西北军援喜峰口，守罗文峪；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之东北军守滦河以东及冷口、界岭口。3月29日，汪精卫复任行政院长，续行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在抵抗方面，节节失败。4月17日，滦河以东全部沦陷，何柱国、商震等部退滦河以西。5月6日，日军要求国军自滦河以西撤退，否则进攻；中国让步。5月17日，何柱国军退至塘沽，王以哲军退至宝坻，宋哲元军退至蓟县。日军北路军于5月19日陷密云，5月21日陷怀柔；日军东路军于5月19日陷丰润、蓟县，5月21日陷香河，5月24日陷宁河。此次日军进兵，原在使热河纳入满洲国；而进兵长城诸口及冀东，目的在迫使河北自动归顺。1933年3、4月间，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板垣在河北地区收买旧军人张敬尧、孙殿英等作反蒋内应，俾进一步控制河北省。但日本天皇仅准关东军出兵热河，不准犯河北省（天皇对沈阳事变时关东军独断颇为不满），于4月20日下诏令所有日军退出滦东。5月8日东京参谋本部有令：所有侵入河北之日军，在保持长城各口有利态势之下，退回长城以北，从事于绥靖满洲国内部之本务。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已自4月19日派黄郛等与日本作外交接触，使和平解决华北问题成为可能。黄郛曾于4月19日、5月7日、5月12日、5月14日等日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会谈。为应付华北问题，国民党中央于5月3日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黄郛于5月17日抵北平后，于5月22、23等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代办中山详一、陆军武官永津佐比重等商

华北停战问题。嗣谈判获致协议，即于5月30、31日由国军代表熊斌（参谋本部厅长）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关东军副参谋长）会于塘沽，并于31日签停战协议。停战协议的内容是：（1）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之线以西以南地区。（2）此线以北以东、长城线以南地区之治安，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此一协定，使中国丧失冀东十九县及两设治区之完全治权，中国方面满意之处是未涉及满洲国承认或割让东北四省字样¹³。

塘沽协议签字前后，日本对中国始终采取分治政策。此一政策于1932年8月27日由斋藤内阁初拟，其方法为利用中国各省与中央对立，施以诱惑与离间，促其反蒋与亲日。到1933年10月21日，斋藤内阁提出更积极的方法：先使中国与满洲并列，同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对华北（日本指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五省）则欲使其成为日苏作战时之缓冲区域。其后，冈田内阁于1934年12月7日提出具体目标，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之统治；至1935年10月，广田外相又有所谓中日满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禁止排日三原则的提出¹⁴。大概说来，在塘沽协议后的一年间，中日之间在华北地区的交涉，除冯玉祥在察省发动抗日（见下文）外，主要为华北各地的剿匪治安问题、华北与满洲国之间的通车和通邮问题、以及日满进兵察东和推动内蒙自治问题。至于与整个中国有关的交涉，则为日本欲独霸中国问题，以及广田三原则的禁止排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问题。

华北各地的剿匪治安问题主要有三：（1）1933年9、10月间，滦东股匪张魁元在抚宁、昌黎等地骚扰，日本关东军派参谋到北平与黄郛、何应钦商剿匪问题，嗣河北省保安队开往剿办，至11月5日张魁元北遁。（2）1933年12月25日，前被收编之股匪刘桂堂受日本指使，在察哈尔赤峰叛变，称「东亚协和军」。1934年1月窜扰河北通州、沧州、河间、大名，1月下旬以后窜扰河南涉县、归德等地，至3、4月间窜扰鲁南，至4月下旬暂告平息。（3）1934年1月，前被收编之股匪孙殿英部在绥远叛变，受到宁夏、山西、绥远地区国军

¹³ 梁敬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4-2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219-270有关记载。

¹⁴ 梁敬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92-93。

的围剿，至是年3月失败，其部被改编¹⁵。

满洲国成立及日本占领热河后之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交涉，始于1933年11月7日，负责谈判者，中方为黄郛，日方为冈村宁次，其他方面的接触亦多。至1934年6月28日，关内外通车问题达成协议，并于7月1日正式施行。通邮问题涉及全国，1934年9月，交通部正式派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与日方谈判，黄郛及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参与谈判，至12月14日达成协议，并于1935年1月10日正式实施¹⁶。

日满军进犯察东和推动内蒙古自治，为满洲国成立及侵占热河后继续蚕食内蒙的一种活动。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已将东蒙（热河及满洲地区的盟旗）的哲里木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所规划的辽北省及其以东嫩江、吉林一带）、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二盟在热河省）并入满洲国。至是内蒙仅余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北部）、乌兰察部盟（绥远北部）、伊克昭盟（绥远南部）、察哈尔部（察哈尔南部）及归化城土默特（绥远中部）各旗，而日人图并西蒙（察哈尔、绥远等地的盟旗）各盟之心益炽。关东军于1933年2、3月间攻热河时，使内蒙独立运动领袖、土默特旗人李守信攻下察东多伦等地，并在多伦设察东自治特别区，李守信为长官。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普（简称德王）为图自保，于1933年7月邀西蒙各盟盟长、副盟长在绥远百灵庙开会，向国民政府要求自治。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赵丕廉等于10月抵百灵庙，与各盟王公会商，制定自治法案，并于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成立内蒙古自治委员会，规定各盟旗事务，除外交、军事外，悉由自主，但需受国民政府自治指导长官之指导，德王被任命为秘书长。日人见中国谋控察、绥，进图察、绥之心益急。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自张家口前往多伦，经张北县城一度为二十九军宋哲元（察省主席）部所阻，日本乘机要求察东划界及中国军队退出长城线以西以南，史称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1月，热河丰宁县与察哈尔沽源县发生界务纠纷，日方强指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属热河，宋军不得已撤至长城以南，2月2日宋并与日方在沽源以东之大滩开会，将此处日方坚

¹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303-364有关记载。

¹⁶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309-426有关记载。

持之热河界线勉强承认。1935年6月，日本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自多伦赴张家口，一度为宋哲元部所阻。日本乘机要挟，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并要求二十九军军长道歉。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6月19日，国民政府免宋哲元察省主席职，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代察省主席。6月23日，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在北平就第二次张北事件进行谈判。日方要求：（1）宋军撤至张家口、龙门所、延庆、昌平一线；（2）察省排日机关，包括国民党部、宪兵队及特务组织「蓝衣社」之类，应予解散；（3）停止向察省移民。至26日，中国接受日方条件，是为「秦土协议」¹⁷。

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后，进一步谋将华北五省特殊化，首要的目标为察哈尔、河北两省。1935年6月26日所订的「秦土协议」使察哈尔特殊化，在此以前的16日，即6月10日，中国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已有默契，使河北特殊化。此即所谓「何梅协定」，其实是一项默契，其由来如下：1935年5月29日，梅津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提出要求，谓天津日界内两报社社长胡恩溥、白逾桓被蓝衣社暗杀；热河孙永勤受遵化县长援助，肆行骚扰；均与中国官厅有关，系排日举动。梅津之代表提出三点要求：（1）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省府移保定；（2）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3）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蓝衣社、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以及河北各级党部。否则采取自卫行动。酒井、高桥与何应钦直接接触共有四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何应钦于6月4日覆酒井、高桥：（1）遵化县长援助孙永勤事，已命于学忠调查；（2）天津两报社社长暗杀事件，已严令缉凶；（3）蒋孝先、曾扩情已免职；（4）撤换于学忠、张廷谔事，已电请中央办理；（5）党部之撤退，非本人权限；（6）否认「蓝衣社」之存在。此期间，河北省政府已于6月1日自天津迁保定。到6月6日，国民政府派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以河北民政厅长张厚琬暂代主席；派王克敏为天津市长，未到前由商震兼代。6月9日，酒井、高桥第三次见何应钦，催即答应全

¹⁷ 梁敬錡，《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69-7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82-485。日人所指蓝衣社，即中华民族复兴社，中有特务处。

部条件，何允于一、二日内答复。是日，何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次日汪应允，何即口头答应5月29日日方之要求，并致函梅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当日，何令河北之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南调，同时国民党中央下令结束河北省党部、北平及天津市党部。此次何梅交涉，中国对日本的要求，皆一一照办，并没有签字之文件。国民政府所以特别忍让，乃因自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政府已定对日长期抗战计划，当时德国顾问曾有「欲建第一流陆军，至少须具有三、四年国内外之安定环境」，故蒋委员长于江西剿共告一段落后，即全力谋国外环境之安谧。日本所以在1935年急于宰制华北，因当时苏俄在远东之实力，已超过日本，关东军亟于获得华北五省之资源，充作日本对苏作战之供应¹⁸。

秦土协议、何梅默契是日本割裂华北五省的第一步骤。在此前后，日本对中国一般政策约有四个方向：

其一、压制中国排日风潮：1935年1月20日，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谓中国排日风潮未息，日本期望中国觉醒，共同担负东亚和平之责。1月29日，日使有吉明谒汪精卫，谈中日关系调整，要求彻底取缔排日运动。2月21日，中国代表王宠惠（时任国际法庭法官）在日与陆相林銑十郎等会谈，林谓中日提携，中国需停止排日言行。6月7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外交次长唐有壬要求严格取缔中国全土之排日运动。实际上，排日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激起的，所以1935年2月1日，蒋委员长发表谈话，谓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应共同改正。2月18日，黄郛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上海会谈，要求双方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2月27日，王宠惠自日回国前发表谈话，谓中日关系应以和平方法使其密切，外交应为和平对等外交，国民亦应互相融合。到6月10日何梅默契达成之日，国民政府下令睦邻敦交，对于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但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6月27日又有秦土协定，中国之排日情绪绝非一纸命令所可压制。秦土协议之次日，天津日本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分别发表声明：

¹⁸ 梁敬錡，《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39-5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72-478有关记载。

冀察事件结束，希望中国对于全国排日风潮之禁绝，更作进一步之努力¹⁹。

其二、中日经济提携，中国与日本共存共荣：中日经济提携自1935年2月以后逐渐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课题。2月15日，日本驻沪商务官横竹与外相广田商中日经济提携问题。2月18日，黄郛在上海与土肥原会谈，要求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3月2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载广田对华方针为：如中国愿与日本共存共荣，日本将予以一切可能之财政经济援助。7月4日，土肥原在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等商开发华北五省交通及矿山问题²⁰。

其三、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事务：日本以强势姿态并吞东北、侵略华北，中国无力抵抗，乃积极与欧美各国建立关系，引起日本不断抗议。1933年6月5日，宋子文在美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五千万美元；7月1日，中英庚款会通过铁道部完成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四百七十万镑；7月18日，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宋子文、顾维钧出席，并邀请美国参加。日本对此类国际援华事件，深表不满。7月22日，南京日领事须磨声称不满中国与国联之技术合作；7月24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指斥列国援助中国，认破坏东亚和平。其后，日本又对美国援助中国发展空军及航空事业表示不满。8月4日，东京报纸谓中美有航空密约。9月5日，青年飞行家孙桐岗自济南出发，作全国飞行；9月11日，海军航空处长陈文麟驾自制飞机「江鹤」号，自厦门飞南京，作全国飞行；9月21日，「救国」号飞机在杭州行命名礼；10月4日，孙桐岗、陈文麟两飞行家会于郑州；11月12日，「黄埔」一号飞机在南京举行命名典礼。日本对欧美贷款给中国、以技术援助中国、并协助中国发展空军及航空事业，提出严重警告。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声明：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国如利用他国排斥日本，惟有加以排击；各国如对中国采共同行动，虽仅为财政援助，或技术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对；各国最近对华售卖军用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育顾问，或作政治借款，迹近扰乱东亚和平，日本不得不加反对。对于天羽声明，英、美舆论于4月18日提出抨击；次日，苏

¹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34，436，438，443，444，446，476，478，486。

²⁰ 同上，页442，443，448，488。

俄、义大利、德国、法国报纸亦加抨击。4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不承认某一国家在任何地方独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中国有提倡国际合作之义务，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中日间之真正永久和平，须建设于善意与互相谅解之基础上，并应纠正现有不平之事态。4月23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对蔑视此种事实、离间中日关系、毁损东亚大局和平，如列国之对华援助，不得不排击之。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再发表声明：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国格，不容任何国家稍予损害；中国与他国或国联之关系，不容任何国家稍加干涉；动摇门户开放之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中国对内努力肃清匪患及生产建设工作，不容他国干涉；对外致力国际安全保障及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之维护，端赖有关系国家之合作。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未再作独霸中国之声明，但对各国援助中国，仍设法阻止，如1935年3月3日，英政府邀美、日、法三国，商以财政援助中国问题。到3月6日，日外务省表示不赞同国际对华借款，并于3月19日命驻英大使田明设法阻止²¹。

其四、与中国共同防俄：最早于1935年2月18日土肥原在上海与黄郛会谈时提出²²，下文再讨论。

上述日本四种对华政策，实欲将中国纳入日本势力圈，共同对抗苏俄和西方。苏俄和西方各国见到这种态势，乃主动或被动介入中国。另一方面，苏俄惧日本北进，在远东置独立军区，布置乌苏里江、贝加尔湖方面之国防；英国惧日本南进，在印度、荷印、澳洲一带，高张经济壁垒，打击日本纱布之贸易；美国惧日本危及菲律宾及西太平洋，赶造华盛顿公约下所许可之舰只。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主政人士，乃不得不暂时放弃以武力侵略中国，而改用经济和外交的方法。193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商得海陆两省同意，决定向中国提出三项要求：（1）彻底取缔排日，抛弃依赖欧美的政策；（2）正式承认满洲国，否则应作事实默认；（3）日本、满洲国与中国共同防止来自外蒙之赤化。此即所谓「广田三原则」，于是年10月7日正式向中国提出。广田弘毅于1933年9月接任外相，1936年3月转任首相。1937年3月下野，同年6月复任外相，至1938年5月去职。所谓「广田三原

²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272-453有关记载。

²²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443。

则」，系广田在 1933-1936 年间对中国的外交策略²³，如前所述，至少自 1933 年年初以后，即为日本对中国的一贯要求。中国方面，对于排日，虽已不断取缔，但无效果；放弃与欧美交往，更不可能。对满洲国则无可如何，虽未承认，事实上已默认。至于共同防赤问题，应为国民政府所欢迎，但由于苏俄及中共大力推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不得不设法先消灭或收编中共，再与日本交涉。而中共接受收编，则以抗日为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广田三原则的实现，有其局限性；日本则以所谓和平的方法进行华北自治运动，为进一步并吞中国领土的张本。

华北自治运动，在 1935 年 4 月已由关东军决定（至 10 月 4 日，日本外、陆、海三省又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其后即从五方面，积极进行：

其一、在察哈尔、河北制造借口，向中国施压，于 1935 年 6 月间透过何梅默契、秦土协议，使国军及国民党的组织自河北、察哈尔撤退，前已论述，兹不多论。

其二、策动暴动，制造亲日政权：1935 年 6 月 27 日，吴佩孚旧部白坚武在日人鼓动下，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言组织「华北国」，纠合中日暴徒三百余人，夜袭丰台车站，于 28 日凌晨冲至永定门，炮击北平，为守军万福麟部击败，白坚武遁回天津租界。到 10 月 6 日，白坚武又在天津组「华北自治救国军」，准备暴动，天津戒严。10 月 20 日，河北香河县民武宜亭等人受日人煽惑，组织「国民自救会」，号召「反蒋倒党」，围困县城，声言自治。22 日，得日本宪兵之助，占领县城，组织自治政府。嗣经河北省主席商震向日方提出交涉，武宜亭离去（至 11 月 13 日，由保安队入城）。其他小型暴动尚多，如 11 月 5 日，河北宝坻奸民受日人煽动为乱，11 月 12 日河北密云奸民受日人煽动为乱，兹不多举。

其三、拉拢商民合作，开发华北经济：1935 年 9 月 1 日，天津商会决议组织「东亚通惠贸易公司」，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高凌爵亦发起组织「救济华北经济协会」。10 月 20 日，日人策动之「东亚经济协会」在天津举行成立大会。此期间，日本首相冈田及外相、藏相亦于

²³ 梁敬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 89-90；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498，513。

10月1日协议，决定对华北经济开发协力迈进。

其四、发动自治请愿，向国民政府施压：1935年10月28日，天津有人组织自治请愿团，在北宁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市长程克劝告解散。11月19日，天津有人以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等名义，电请国民党开放政权，并主张实行自治。12月1日，天津市自治界代表刘孟扬等及天津市商会分别通电，主张河北省保境安民，自治自救。12月15日，有人以「北平各自治区民众代表」的名义向何应钦请愿，要求自卫、自治、自决。

其五、利用外交压力，使地方官就范：推动华北自治，除利用中国亲日分子外，即为日本官方直接介入。1935年9月24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小册，声言与国民党当局决不两立，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11月7日，南京日领事须磨等访外交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是日，多田骏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在天津会议，讨论华北自治问题。其后，土肥原连日往来平津，促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其自治方案要点为：（1）以「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为自治政权名称；（2）领域为五省二市；（3）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4）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5）脱离法币制度，另用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6）保留南京宗主权。11月11日，土肥原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以前表示态度，否则，关东军准备自山海关、古北口进兵。如宋哲元不允自治，日本尚有拥满洲国执政溥仪入关主持华北自治之计划。宋哲元不为所动。日本恫吓未生效果，怀疑中国除取得英、美谅解外，或尚有苏俄之外援，乃于11月18日召开外、陆、海三大臣会议，决定不于此时迫令华北自治，自治运动之推行应于11月底终止。土肥原等得此训令后，改变策略：（1）缩小自治范围，专注冀、察两省；（2）阻南京大员北上，孤立宋哲元；（3）收买流民，纷作自治请愿。到11月20日，土肥原迫使宋哲元表白态度不成后，乃改向蓟密区兼代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试探。11月24日，殷汝耕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其后到12月，中国自组「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的华北自治运动告一段落；但日本表示：希望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联合反共。

其六、反对中国实行币制改革，避免华北纳入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于 1933 年废两改元，但仍确定银本位政策。1934 年推行此政策，大量收买白银，以免中国白银外流，影响中国币制基础。1935 年 3 月，中国准备管制白银及实行新币制，并聘请英人李滋罗斯（Leith Loss）为顾问。11 月 3 日正式施行，禁止白银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日本以中国金融权力中央化以后，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故反对中国实行法币政策。11 月 8 日，日本大使馆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币制改革，表示将以实力制止华北现银运出。次日，日外相广田亦训令日本驻华大使，对中国币制政策不能合作。在日本压力下，宋哲元、韩复榘（山东省主席）于 11 月 13 日拒绝现银南运，财政部只好在北平设存银保管委员会分会²⁴。

在日本于东北建立满洲国、并将华北特殊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在北平先后设立两个中央机构，应付华北危局：一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一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系 1932 年 8 月 15 日由北平绥靖公署改设（主任为张学良），委员长由蒋介石兼，8 月 20 日起委由张学良代理。1933 年 3 月 12 日，张辞职，由何应钦代理。至 1935 年 11 月 1 日，日本为排除中央在华北的势力，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11 月 26 日，行政院决议裁撤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另设冀察绥靖主任，由宋哲元任之。日本对此一措施极为不满。12 月 3 日，何应钦抵北平，日本不表欢迎；宋哲元亦不愿就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何乃与宋等商议，决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不派委员，以减低日本之敌视。事经国民政府同意。12 月 11 日，国民政府任命十七名委员，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十七名委员，皆出身东北军、西北军及北洋旧官僚，无人来自中央。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 1933 年 5 月 3 日决议设立，以黄郛为委员长。6 月 16 日决议北平政整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及北平、青岛二市，次日委员会正式成立。到 1935 年 6 月 18 日，

²⁴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484-537 有关记载；梁敬鎔，《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 103-118。

黄郛倦勤，以王克敏代委员长。到 8 月 29 日，在日人压力下撤销²⁵。

国民政府继东北之后，在华北对日本节节让步。外交上的折冲，抱持四方面的原则：（1）东北问题暂置不问；（2）以外交平等的原则，促废除不平等条约；（3）以平等互惠的原则，促中日经济提携；（4）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议；但无多结果。日本仍是用自治之名，或其他方式，割裂华北。1935 年 11 月 20 日，在华北自治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蒋答谓：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蒋并于先一日表白对日外交态度：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作最大努力。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 10 月 13 日自开封飞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应付华北自治问题，并于 11 月 8 日派参谋次长熊斌自南京飞北平，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表达中央对华北局势之立场。蒋委员长坚定的态度，使日本未以军事行动迫令华北自治，改采孤立华北、使与中央疏远的政策。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象征政府再对日本作最大让步。在这种情形下，对时局反应最敏感的教育文化界，或基于民族情感，或更受有关党派的抗日煽动，于 1935 年 11 月 24 日殷汝耕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之日，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以及蒋廷黻、胡适、傅斯年等教授领衔，发表宣言，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举动，要求政府以全力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完整²⁶。在此前后，北平及各地学生抗日运动时伏时起，以反对华北自治为主要要求，但均受到国民政府的压制²⁷。

1936 年一年中，日本继续作割裂华北的试探，并巩固在内蒙古的势力。以苏俄为假想敌的关东军，企图把满洲（东路）、内外蒙古（中路）、新疆（西路）连成一线，筑起一道防苏屏障²⁸。中国方面，则以 1935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应付日本。日本的

²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183-532 有关记载；梁敬鎔，《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 117-118。

²⁶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496，515，523，528，529，531 有关记载。

²⁷ 同上，页 536-554 有关记载；梁敬鎔，《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 119-127。

²⁸ 胡德坤，〈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武汉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页 60。

政策是不牵动中日国交及世界大局，尽量蚕食华北，并将之作为地方事件来处理。中国将计就计，在与日本不全面决裂、以有机会安内和推动建设的原则下，最初亦尽量将在华北发生的中日交涉，经由冀察政务委员会，作地区性的处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员，无中央大员介入其间，而冀察二省二市（北平、天津）的行政首长，亦大部分时间在二十九军将领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1至4月间，先后设立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委员会²⁹，俨然为一半独立的地方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直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一个月才撤销。在此一年零七个多月中，冀察政务委员会，一直以让步的方式，换取中日和平，要到政府联苏容共、共同抗日的布局初定、决心不再对日让步以后，中日的全面冲突乃不可避免。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华北地区与日本交涉实为中日关系的一环。这一年七个多月期间中日关系的大势：在日本来说，虽然内阁屡变，大体仍本广田三原则；中国方面，初时妥协，最后坚定，则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有关。1936年6月11日日本外务省决定的对华政策仍为：（1）停止排日运动，（2）华北特殊化，（3）中日经济提携。到9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与外交部长张群，就华北五省自治、共同防共、取缔排日、中日经济合作等问题开始谈判，中国方面则要求取消塘沽协议、上海协议、九一八以来所有其它被迫让步之条件，并取消冀东伪组织。迄于1936年11月10日，先后七次会谈，皆无结果。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希望苏俄对中共推动的迫蒋抗日行为有所干涉，谓「如蒋有危险，中国或被迫与日本共同抗俄」。日本虑国民政府与苏俄、中共相结抗日，亦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压力。1937年1月7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撰文论中日问题，认为日本应先消释中国对日本之猜疑，并对中国建设予以同情及实际裨助。但自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与中共和苏俄的关系日渐接近，使日本军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迫不及待。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于2月1日组阁的林銑十郎到5月31日亦辞职。6月1日，原来主张消除中国嫌疑的近卫文麿奉命组阁，以广田弘毅为外相。广田虽正式宣布放弃对华三原则，仍继续迫使华北自治，

²⁹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121-127。

并攫取华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苏俄于3月25日将蒋经国放回（4月18日在杭州与父蒋介石见面），国共之间亦已开始合作抗日谈判，使国民政府联合中共及苏俄抗日已有可能，乃逐渐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日本华北驻屯军于1936年及1937年上半年，不断在平津一带演习，目的在逼迫冀察当局就范。但是到了1936年12月以后，中央政府对日态度转强，不支持冀察当局继续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政策。日军乃蓄意制造军事冲突，使事态扩大，中日全面战争遂不可避免³⁰。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从中国妥协、日本得寸进尺，到中国寸土不让、日本诉于大规模战争，反应在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可分六方面论述：

（一）**冀东与察北问题**：所谓冀东问题，即取消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谓察北问题，即要求日伪军归还察北六县（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的行政权。「秦土协定」后，二十九军撤出察北，另由察省政府组保安队驻防。嗣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复与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私立协议，允许内蒙亲日军保安队进驻察北六县。驻防察省的张自忠否认「张松协议」的合法性，日本于12月8日令内蒙亲日军李守信等派兵强占，至12月下旬六县悉被占领。察省张家口以北原有十一县，五县已划归绥远，另六县为亲日内蒙军强占。至1936年1月初，有偷入大沽私运日货之商贩数人为军警追捕（2日），逃入日商洋行后复为军警带走；又有日兵在北平朝阳门殴伤中国守城警官（5日），日方反诬中国守军向日兵射击。1936年1月14日到2月7日间，宋哲元应邀赴津与多田等谈判，宋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及收回察北六县行政权问题一并提出，日本则要求华北自治及共同防共，谈判无共同焦点。至于大沽事件，由二十九军及河北省府通令以后不得再有侮辱日人行为，而朝阳门事件则不了了之³¹。

（二）**共同防共问题**：1936年2月以后，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将华北事务划归天津驻屯军承担，关东军的权限被限制在长城以北。另一方面，土肥原于2月返日任师团长，松室孝良被任命为天津驻屯军部

³⁰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595，623-624，626-627，634，636，641，654，667，670，672，682，686，688，693-694，700有关记载。

³¹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131-13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543，546，548，551有关记载。

附，接替土肥原的交涉任务。由于共军于2月下旬由陕北渡河进扰山西，河北情势紧张，日人遂以共同防共为主题，要求宋哲元与之订防共协议。1936年3月及以后的谈判，已由冀东、察北问题，转移到共同防共问题。为了避免日本借题发挥，宋哲元于3月8日发表告冀察民众书，将河北全省划为十个保安区，并将尚有共党潜伏的尧山、任县、巨鹿、内邱四县划为尧山区，派张荫梧为尧山县长兼行政督察专员，指挥民团，肃清共党。但日本华北当局不以宋哲元独力防共为然。3月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与天津市长萧振瀛等谈冀察共同防共问题。3月29日，宋哲元应邀赴天津会谈。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谓日方可协助华北防共，宋谓二十九军自力防共有余，不需日方军事协助；宋并希望日方先答应取消冀东自治政府，并归还察北政权。但在日本压力下，宋与多田于3月30日订立华北中日共同防共协议，其要点为：（1）防共委员会隶属冀察政务委员会。（2）共军未侵入冀察边区时，一切防共任务，由该委员会主持，日方只从旁协助。（3）如共军侵入冀察边区时，冀察境内华军应开赴边区防剿，平津由小部华军与大部日军共同维持治安。协议订立后，华北中日当局时就共同防共问题磋商，如4月15日，萧振瀛与永见、松室谈防共事；8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与宋哲元谈防共事³²。

（三）日本增兵华北与胁迫宋哲元宣布自主：日本在华北方面的事务，由华北驻屯军独力负责。1936年5月1日，日本以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1935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为旅团长）为华北驻屯军司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原有二千二百人，自4月13日陆续增兵换防，迄6月22日以后，常驻者达八千四百余人。田代皖一郎于5月19日到天津，携有参谋本部的「改造华北新方案」，此新方案的基本内容是使华北出现类似满洲国的政权。此后，田代即依此新方案向宋哲元施压。宋则于5月30日发表谈话：「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做去。」此后日本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1936年6月26、27日，丰台附近发生中国军马遁入日本军营事件，日方要求二十九军撤出丰台，二十九军以换防方式结束争端。9月18日，丰台二十九军演习，日军乘马突入演习行列，引发

³²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138-145；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569，578，616。

冲突，日军即将丰台各重要地点占领，二十九军撤出丰台。其他零星冲突，宋皆以忍让结案。尽管如此，日本华北驻屯军仍私下逼迫宋哲元成立自治政府，于9月23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人为顾问。宋在部将坚决支持下，反对设立自治政府。为应付田代，乃任用一、二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0月16日任命齐燮元为驻会办事委员（已于7月10日聘为委员），19日冀察绥靖公署（设于1936年1月14日）任命石友三为冀北边区保安司令。齐系北洋军直系将领，北伐后居天津日租界，华北驻屯军当局与之有联络。石于1931年7月叛变失败，逃大连依附日人，1935年10月曾组华北军团部，支持日人华北自治运动。在柔性的抗拒下，宋哲元使日本的华北自治无法如愿，但由于对日让步，并接近亲日分子，颇为舆论所不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减缓。但到国民政府联苏容共的策略日渐体现，日本再度对宋哲元施压。到1937年5月11日，宋受不了压力，一度躲至山东乐陵原籍。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始于7月11日赶返天津³³。

（四）**华北经济开发问题**：有关中日经济合作、共同开发华北之事，1935年9月21日周作民等曾成立「河北经济协会」（天津）、10月20日高凌爵等曾成立「东亚经济协会」（天津），加以推动，但无成果。到12月20日，日人十河信二等组「兴中公司」（大连），始渐落实。1936年2月，十河至天津与多田骏等商议开发华北矿业、修筑铁路等问题，十河并于2月26日与宋哲元就华北经济开发问题有所协商。当时宋力谋解决冀东及察北问题，对经济开发问题表示冷淡。1936年6月，川樾茂任驻华大使，以「中日经济提携」为中日交涉主题，力促冀察当局与日本谈判经济开发问题，冀察当局乃不得不重视此问题。与军事、政治问题比较，经济问题较为温和，宋哲元初颇让步。7、8月间，同意与日本合办天津电气事业，并同意与日本合办津石铁路（天津至石家庄）；10月间与日本签订「中日通航协议」，并同意与日本合办龙烟铁矿（察南宣化一带龙关、烟筒山等处）。宋于9月27日向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提出有关中日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之报告，行政院各部对宋的报告加以研究后，认所提开发计划，均系中央

³³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145-154，190；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586，598，605，625，627，631，634，690。

政府统制之事业，非地方行政机关所能擅专，乃于 12 月 4 日下令纠正。宋接到行政院的训令后，乃自动中止或改变已经开始筹办的项目，或以「先行详细研究」为借口，或以「冀东伪组织彻底取消」为实行条件。除天津电业公司因系地方性，且已于 8 月 20 日成立外，只有依据「中日通航协议」所成立的惠通公司于 11 月 17 日在天津开幕。中日通航，有四条航线：即天津到大连、北平到锦州、天津到承德、天津到张北。尽管如此，宋哲元因与日方定有华北开发「四原则、八要项」，亦无法获得国人的谅解³⁴。

（五）**华北之中央化**：在日本割裂华北的过程中，中央与华北地方行政首长均努力使华北不脱离中央。1933 年日军入侵华北以及以后推行华北自治运动期间，中央与地方的一贯立场是：小的妥协不断，大的方向不变。中央化的方式主要有二：一为在制度的安排上，如前述中央政府于北平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及使法币政策在华北切实推行等。另外一种方式是人事的，中央政府尽量使华北各机构的人事任命，不受日本干涉。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时期，中央化的方式，可从人事和政令两方面分析。在人事方面，使华北地方大员兼为中央政府的一员，或在形式上由中央使华北军政各方面接受中央的命令或勋赏。如 1936 年 1 月 9 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内蒙的云王为国民政府委员、1 月 16 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在太原就职、6 月 6 日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到北平代表蒋委员长向各军授旗、1937 年 3 月 9 日行政院决议嘉奖绥远抗日将领阎锡山和傅作义等。另一方面，华北地方首长则不断以言行表示拥护中央政府或效忠蒋委员长。如 1936 年 7 月 25 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函复蒋委员长，表示服从拥护；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后，阎锡山于 12 月 14 日电覆张学良加以指责，并于 12 月 15 日通知北平各国使馆，继续反共，服从中央；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更于 12 月 16 日电劝张学良送蒋委员长回京。西安事变结束后，宋哲元、韩复榘和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到南京谒蒋委员长。嗣以护送蒋委员长回京的张学良被判刑幽禁，杨虎城等在西安不满，任意调动军队，阎锡山、宋哲元等于 1937 年 1 月 9 日电杨劝服从中央。3 月 29 日，杨虎城，于学忠到杭州谒

³⁴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 155-162；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545，566，581，608，616，628，632，643-644，650。

蒋委员长。在政令方面，如 1936 年 12 月 5 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其与日本所订的中日经济发展协议后，宋即对已经决定的津石铁路、龙烟铁矿等案加以拖延。1937 年 6 月 19 日中央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宋即于 6 月 24 日命冀、察、平、津四省市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³⁵。

从前述中日对华北问题的交涉、以及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措施看来，日本欲以华北为对抗苏俄的基地，并未有效建立，亦可能只是侵华的借口而已。至于日本在内蒙古的活动，可从内蒙自治运动、内蒙独立运动以及绥远抗日事件中窥其梗概。初，国民政府于 1928 年先后接受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建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改为行省，分由奉系、冯系、阎系军人任省长，积极设县、驻军、抽税、开垦，引起当地盟旗王公的不满。1930 年 5 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制定〈蒙古盟旗组织办法〉，以保障盟旗合法地位。1932 年满洲国成立，1933 年将热河并入，东三省及热河各盟旗如布特哈部、呼伦贝尔部、伊克多安旗、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等，均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在此前后，日本亦向察哈尔渗透。1932 年 4 月 8 日，日本曾派特务田中九逼使察哈尔之锡林格勒盟归属满洲国，盟长索王于 1932 年冬派副盟长德王赴南京说明受逼情形，蒋委员长派桂永清赴内蒙成立中央军校内蒙分校以为抵制。嗣以日军攻占热河、入侵河北，冯玉祥在察省自力抗日，在内蒙设军校之事陷于停顿。1933 年 6 月，日军嗾使热河亲日军李守信部攻占察哈尔多伦，直接对锡林格勒盟构成威胁，锡盟乃决心联络其他内蒙王公，成立自卫组织。适中央政校毕业生内蒙人朝克巴图尔等奉准入内蒙游说王公成立抗日组织，内蒙王公原有反抗察、绥省政府的倾向，而日本特务及汉奸又有诱使内蒙脱离中国之意，诸种思想结合，遂有内蒙自治的想法。此一想法由朝克巴图尔提出，得到德王等的同意，于 9 月下旬发出蒙文通知，请各盟旗派代表于 10 月 9 日在绥远百灵庙召开会议，讨论自治问题。会议从 10 月 9-24 日共 16 天，出席代表一百二、三十人，由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任主席。会中禁用汉语。云王演说谓：「近年来汉人移民屯垦，已使蒙民无立足之地，欲图自救，非

³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552，554，592，611，650，655，656，663，667，677，679，683，696-697。

实行自治不可。」德王演说谓：「外蒙已陷于俄，东蒙又灭于日，非自治自救，绝无出路。」会中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决定于归绥正北、百灵以东之四子部落旗设内蒙自治政府，推云王为委员长、德王为政务厅长。由于会议的实际主导者是毕业于中央军政两校的蒙籍青年（约 30 人），自治的架构仍是在国民政府之下，自治的根据是〈建国大纲〉第四条：「扶助国内弱小民族，使其自决自治。」自治政府与国民党的关系是：由自治政府设立国民党部，以三民主义领导蒙人。自治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受内政部及蒙藏委员会指导。自治政府曾派人赴北平欢迎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黄、赵于 11 月 11 日抵百灵庙，受到云王、德王等的欢迎。由于自治会议有关决定要取消察、绥省政府，黄、赵不同意，经协调后变更自治办法，由黄、赵带回，交国民党中央研商。1934 年 2 月 28 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蒙古自治办法，规定设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行政院，经费由中央拨给；各盟公署改称盟政府，旗公署改称旗政府；察哈尔部改称盟。嗣国民政府发表云王、索王、德王等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云王为委员长，德王为秘书长。4 月 23 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克昭盟盟长）为副委员长，德王为秘书长³⁶。蒙政会仅管盟旗，设县之地则由省府管辖。

蒙政会设于绥远，与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的权力冲突。傅乃设法分化蒙政会，将服从绥远省政府、不与蒙政会合作的王公，分别给予司令、顾问等职，并给予军火、金钱。另一方面，在察哈尔的锡林格勒盟、察哈尔东八旗、乌兰察布盟的委员，则受到日本多伦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锡盟特务机关长田中九的胁迫，不许参加蒙政会。到 1935 年 10 月 9 日蒙政会第三次委员会开会，重要王公中，只德王一人出席。日本对德王亦软硬兼施，德王则假蒙政会与日本建立关系，并争取援助。1935 年 12 月下旬，德王飞往满洲国见溥仪，传言德王即将宣布内蒙独立。中央虑德王若率蒙政会独立牵动太广，对德王极力拉拢。1936 年 1 月，任蒙政会委员长云王为国府委员，以锡盟盟长

³⁶ 赵尺子，〈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国边政》36 期，页 11-19；内蒙古大学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 3 辑，页 216-261，但谓热、察、绥建省，系 1928 年 7 月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的建议；〈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3 辑。

索王为蒙政会委员长，德王（锡盟副盟长）升为副委员长。但阎系军政人士（阎锡山、赵丕廉）不欲以察省锡盟为主力的蒙政会牵动绥省事务，建议政府将察省蒙政和绥省蒙政分开。国民政府于 1936 年 1 月 25 日和 2 月 25 日先后公布办法，将蒙政会分为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蒙会）和察哈尔省境内蒙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察蒙会）。绥蒙会于 2 月 23 日成立；察蒙会初未成立。另一方面，德王与日本关系日深，于 2 月 10 日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以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蒙古旗。4 月 24 日，召集锡、乌等盟代表在索王府（乌珠穆沁右旗）开会，通过「蒙古军政府组织法」；选云王为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秘书长。5 月 12 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嗣改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以热河入察之亲日军李守信为第一军军长。但德王并未取消百灵庙的蒙政会，5 月 3-6 日尚在百灵庙主持蒙政会开会。百灵庙仍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用中华民国年号；在嘉卜寺则挂上述四色旗，用成吉思汗纪元 731 年为始年。6 月 15 日，蒙政会委员长索王病逝；6 月 28 日，德王宣布成立军政府。国民政府仍欲羁縻德王，于 7 月 21 日宣布设立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德王为委员长。此后德王即以察蒙会的名义通电讨傅作义，并命李守信、王英部（王英部为为日人所组的伪军，名「大汉义军」）进驻百灵庙。9 月 2 日，德王在百灵庙召集李守信、王英等会议，谋犯归绥³⁷。

11 月 5 日，德王电责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破坏蒙古自治。11 月 8 日，傅电驳德王，并责其受外人利用。11 月 13 日，王英部自察边商都犯绥边红格尔图，日本飞机并到平地泉投弹。16 日傅作义到平地泉督师，18 日大败王英部。22 日李守信部自察边犯绥边兴和，被击退；23 日，傅作义部袭德王在绥北之根据地百灵庙，24 日克复。11 月 28 日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等通电拥护中央。12 月 3 日，日伪军自察北反攻百灵庙，失败。此后到 1937 年 1 月 18 日，德王自称蒙古政府主席³⁸。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

³⁷ 赵尺子，〈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页 1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547，554，557，561，565，582，584，597，601，609，620-621；陈绍武，〈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关系〉，《内蒙古文史数据》第 1 辑，页 28-44；〈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3 辑。

³⁸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 册，页 640-669 有关记载；〈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

领察、绥，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在察省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德王为首）。1937年10月29日在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11月22日，日本复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德王为总务委员长，以统合内蒙古各自治政府。到1938年3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是年7月19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扩大组织，设六部。1939年9月1日，合并内蒙各自治政府，于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为主席。政府旗帜为自上而下七个横条：黄、蓝、白、赤、黄、蓝、白，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³⁹。

资料》第13辑。

³⁹ 陈绍武，〈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关系〉，《内蒙古文史数据》第1辑，144-45；〈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

第二节 抗日风潮激化各种反政府行动

抗日风潮激化反政府行动，是指有些党派及民间势力，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人士借口政府不抗日，反抗国民政府，所作的游行示威和军事行动。可以分成几方面说明：

其一、中共以抗日为名，反对国民政府剿共，并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国民政府：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在江西等地围剿共军，1931-1932年间，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共中央即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士兵，反对日本侵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日本进兵华北，中共即于1月到3月间不断宣布，愿与全国抗日军队订停战协议，共同抗日。是年5月，冯玉祥在察省组军抗日，中共苏维埃政府于6月28日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到1934年中共在国军第五次围剿的压力下，决定突破重围，于7月15日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虽然所谓「北上抗日」并非作战计划，只是政治口号，却可争取国人同情。1934年9月，粤军陈济棠表示愿与红军停战议和，中共即派人与之秘密达成协议，使共军顺利突围西走。共军到贵州时，高唱「不打抗日红军」、「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等口号向国军宣传，也编出民谣向民间宣传：「我打草鞋送红军，北上抗日打敌人。」共军的「北上抗日」初时只是政治口号，到1935年6月毛儿盖会议时，决定向陕甘边区发展而不向黄河以西发展，则是抗日战略的考虑，认为只有接近抗日前线，才能激发抗日火花。故共军到陕北后，曾将军队易名为红军抗日先锋队，欲越过山西去河北或绥远抗日，但为国军所阻。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的抗日宣传，到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负责剿共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已秘密与中共订立停战协定¹。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¹ 王健英，〈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页8-18。

逼出西安事变。为了鼓动抗日风潮，1936年3月中共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刘任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是年4月，北方局派李葆华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在北平建立了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及西郊五个区委，在各大学及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²。各级共党组织扩大抗日宣传及运动，使原已宣传抗日的学运更为蓬勃。

其二、学商工界以抗日问题向政府施压或抗争：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在报端披露的第二天，全国抗日救国会在上海沪江大学成立，参加学校三十余，推出五十人赴南京请愿。是日，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主持抗日大会，决议呈请中央政府，集中全国军队，立刻出兵东三省，逐日兵出境。同时，上海市铅印业，矿炭业等三十余工商团体，也发表宣言，呼吁努力御侮。另外，河北省各县市商会，汉口、南京、长沙、广州、南昌、杭州等地工商团体，也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奋起抗日³。9月26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五千余人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一致对外。9月27日，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发起民众抗日大会，并决定分批赴南京请愿。是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要求张学良抗日。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暨京沪大学学生三千余人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请愿，并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9月29、30日，上海各大学学生数千人连日到南京请愿抗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连日接见、安抚学生代表。时国民政府虑中日冲突扩大，又虑一般群众受中共、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及其他反政府人士利用，尽量压制各地反日运动。10月10日，广州警察因抵制日货问题与学生、民众冲突，开枪射击，死伤约百人。10月19日，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学生数百人到南京请愿，被捕四人；同时中央大学抗日会主席杨德尧亦被捕。此期间，中共职业学生乘机煽动，运动扩大。到11月下旬，由于国联两次促日本自东三省撤兵皆遭拒绝，日本更发兵向辽西进攻，国民政府无抵抗的决心，工商学界再起请愿。11月26日京沪各大中学生万余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亦到，要求签署出兵日期。12月3日，北平地区的学生千余人受到中共的煽动，组织南下示威团，宣言：「倘政府……不能以武力驱逐

² 李良志、高向远，〈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关于白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页18，22。

³ 陈麟辉，〈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日本出境，……要打倒它。」12月5日，北京大学联合中央大学学生在南京示威，高呼「打倒卖国政府」、「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等口号，受到军警的镇压，三十余人受伤、一百八十余人被捕。国民政府于12月5日明令禁止学生至京请愿，但各地军警、校长无法对学生作有效之约束。12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对示威学生讲演，盼勿受共党利用，仍无法安抚。12月9日，南京学生总罢课。上海各大专学校学生九千余人以北平、南京学生代表在沪被便衣队毆捕，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压迫抗日运动」，捣毁上海市国民党市党部、包围市政府，要求惩处公安局局长陈希曾、市党部委员陶百川；这些要求，市长张群均接受照办。12月10日，上海学生在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审讯昨日毆捕学生之人犯；杭州学生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太原学生包围省政府，要求派专车赴京请愿；北平、济南，安徽学生到京，进行联合请愿。12月11日，南京学生举行抗日总游行，高呼「打倒国民党」口号。14、15、17日，各地前往南京的学生连日请愿。15日北平学生在南京示威，捣毁外交部，在中央党部毆打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考试院长蔡元培，学生11人被捕。17日，北平、上海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再闹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17日的示威受到军警严厉镇压，死伤百余人，死者包括共青团员杨桐恒。12月18日，北平、上海等地在京学生，由军警强制离京；太原各校学生三千余人示威，造成二十多学生受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中，集中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有四、五千人，他们于9月21日成立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10月17日发动千余学生请愿，高举「打倒不抵抗主义」、「请政府出兵收复东三省」等口号。11月10日东北流亡学生的南下请愿团在南京请愿，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接见其代表，劝他们「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事实上，东北流亡学生领袖中，共产党员颇多；运动抗日为共产党的政策。1932年1月，黑龙江留平同学抗日救国会改组，在当选的执行委员19人中，至少有9人系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吉林留平同学抗日救国会改组，至少有四个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被选入执委会；辽宁留平同学抗日救国会改组，中共党团员王一夫等被选入执委会。另一方面，部分黑龙江省留平学生且回到

东北，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组成四百余人的游击队，进行抗日斗争⁴。

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抗日运动屡次被压制以后，政府颇忧虑抗日学运扩大会加深中日冲突、影响安内及国家建设，对学生的活动监视甚严。1935年3月，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流亡至北平）、清华大学等皆先后遭军警搜查，不少学生因共党嫌疑被逮捕或杀害。北大之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之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是年11月1日，北平清华、燕京等十校大中学生向国民党提出请愿，指斥非法逮捕杀害学生，要求言论及集会结社自由。11月18日，北京22校大中学生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初时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华北自治。及11月24日，北平教育界二十余教授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12月2日，又有国立平津各院校教职员作同一课题的联合宣言；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游行请愿，参加者有清华、燕京等十五校（没有北大）八百余人，要求的项目凡六：（1）反对自治运动，（2）公布中日交涉内容，（3）不得任意捕人，（4）保障领土主权，（5）停止一切内战，（6）言论集会出版自由。游行学生集新华门，但因受到军警拦阻、逮捕，无法尽集，向何应钦递请愿书亦不果，使学生甚为气愤。这次北平学生的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各地学生起而响应。12月11日，杭州学生游行，12日广州及武汉学生游行。12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消息，学生疑为自治之变相，12月14日上海学生游行，12月16日北平学生约八千人集合天桥，作大规模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东伪组织，由于受到军警堵截，受伤三百余人、被捕14人、失踪二十余人。其后多日，全国各地学生亦起而响应。12月16日济南学生游行，12月17日武汉学生游行，12月18日，南京、长沙、天津、西安学生游行，12月19日，南京、上海、保定学生游行，12月20日，武汉、上海学生游行。对学生游行，中共于12月20日发布告全国学生民众书，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则以劝告、学校提前放假、军警阻止、戒严等方法，力求平息。12月21日北平各校提前放假，22日河北各校提前放假。21日天津学生欲南下请愿受阻，23日上海学生欲赴南京请愿受阻。12月26日，

⁴ 邵鹏文、郝英达〈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页8-1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85-175有关记载。

以学生纷纷请愿，京沪宣布戒严。12月29日，滞留开封车站及徐州之河南学生经12月26日就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电劝返校（蒋于12月23日决定明年1月15日会见各省市中学以上校长、学生代表，宣告政府外交方针及交换维护国家之意见）。1936年1月15日，蒋介石与各地中等以上校长及大学生代表三百余人谈话，交换意见，并说明政府对日方针，学生运动渐息。北平学生联合会，曾组宣传抗日救国团，于1936年1月初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但以左、右两派学生发生冲突，左派除宣传抗日外，并宣传倒蒋；只主宣传抗日的右派学生愤而退出，左派学生则为警探截回。左派学生返平后，于2月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为中共运动青年的秘密组织⁵。

除1935年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反华北自治运动以外，1936年「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抗日活动亦甚积极。1935年7月，东北军陆续自河北调到陕西、甘肃境；1936年初，东北大学工学院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迁至西安。中共为了策动西北地区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月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里面成立西北特别支部，又于1936年4月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西北特别支部联络社会各阶层，于是年3月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策动下，于是年10月4日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10月10日，东救与西救联合开会，攻击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2月9日，西北特别支部以西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邀请「西救」和「东救」召开一二九纪念会，并游行宣扬抗日。时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在临潼，游行队伍复往临潼请愿，张学良前来阻止，游行队伍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学良答应游行队伍：「在一礼拜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东救、西救与学联即召开座谈会，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所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解决后，东救复与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2月27、28日连日召开座谈会，决议分电蒋、张，促其积极进行抗日工作。其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国共商谈合作抗日，中央军于2月8日进驻西

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页536-554有关记载；梁敬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页119-127；蒋于12月23日的决定，见国史馆编《先总统蒋公年谱初稿》（油印本）（五），民国24年，页32。

安，东救被查封，西救办事机关亦遭到搜查⁶。

其三、冯玉祥在察省单独采取抗日行动：冯玉祥在察省单独采取抗日行动，是1933年2月下旬日军进兵热河、5月中旬进陷河北滦东、政府未作有效抵抗、仍以议和之途解决问题而引起的。冯自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初居山西汾阳，曾于汾阳办军事学校，不少共产党人入校为学员。九一八事变后抗日风潮起，时冯尚有国民政府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衔，曾赴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提议抗日；一二八事变后，冯出席在徐州召开之军事会议，又提议抗日；均未达成愿望。冯于1932年3月往泰山居住，谋拉拢旧部、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抗日，韩不赞同。1932年9月，冯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冯于1932年10月9日移居张家口，并向政府提出十二项抗日主张。1933年2月，宋哲元奉命率部赴长城一线拒敌，冯乃号召旧部赴察待命。冯所能号召的力量约有五种：（1）由汾阳军校学员改编的二十九军教导团，自汾阳调张家口，改编为师，由佟麟阁指挥。（2）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共产党员，在察省召集旧部，与冯合作。（3）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所部原驻晋南襄城，为了北上抗日，于1933年4月前后经山西介休县到河北邯郸，至是亦赶往察哈尔。（4）原西北军将领高树勋部。（5）察省地方部队及自热河退出的抗日义勇军。另外，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电冯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抗日团体亦纷电支持。政府方面，认为抗日御侮应在整个国策之下进行，促冯入京共策进行；冯则坚持「对日寇拚命抵抗，用全力早日收复失地」。5月初，政府以内忧不止，决派黄郛以谈判方法与进兵滦东的日军折冲，到22日停战谈判已有成议，并将于塘沽签立协议，冯乃于23、24日召集部属，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冯于26日通电各方宣布就职，以佟麟阁统率第一军，吉鸿昌统率第二军，方振武统率抗日救国军，孙良诚统率骑兵挺进军，共约一万二千人。如并杂牌军计算，约有十二万人。据估计，抗日同盟军中的共产党员约三百余名，除吉鸿昌外，包括第五师师长宣侠父、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干部学校校长张克侠等。1933年6、7月间，中共并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前线委员会，加以

⁶ 盛雪芬、车树实，〈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民众救亡会〉，《沈阳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页51-56；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页124。

支持。冯玉祥的抗日行动于6月中旬开始，计划第一步收复察东，第二步收复热河，第三步收复东三省，而日伪军于6月上旬即已对抗日同盟军展开攻击，连陷宝昌、康保，张北告急。6月24日，冯玉祥以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令其收复察东，吉等收复康保、宝昌，并陷沽源。冯再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令其向多伦进攻；方振武于7月12日收复多伦。国民政府中主张抗日的委员程潜、李烈钧等，并各地民众，极为兴奋。7月27日，冯玉祥复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各省当局及各地民众团体先后捐款支持，达四十多万元⁷。

在国民政府看来，冯玉祥擅自掀起抗日战争、随意撤换察省官员，又与两广呼应抨击政府，实属抗命。但其抗日行动受到舆论支持，又不便断然处置，乃尽量设法劝告、调停，或加以抵制，最后始以武力施压。第一位重要的调停人为宋哲元。宋对冯在察省的作为不赞同，因系其旧部又不便对冯用兵，只好电辞察省主席，中央则请宋设法调停。6月12日，宋派代表谒冯，传达中央意旨：冯取消同盟军名义，入京任全国林垦督办，将所部交宋哲元统编。冯于16日一度答应，但到21日冯部方振武等发表贯彻抗日主张通电，措词激烈，冯又改变态度，谓「不愿以抗日旗帜易高官」。调停既陷僵局，政府准备以武力干涉。21日当日，北平军分会以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指挥；7月8日，令庞向察省进兵。另一方面，中央亦令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参与调停。嗣以12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的抗日志气升高，调停难获协议。但同盟军陷多伦后，日本关东军声言要对同盟军「膺惩」，中央惧事态扩大，乃陆续派兵对冯施压。到7月底，中央派往察哈尔的军队达二十多万人，与同盟军间的战事一触即发。冯玉祥通电全国，说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7月28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联名通电，指冯「擅立各种军政名目」、「滥收散军土匪」、「引用共匪头目」，而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于8月3日发表谈话，亦指冯「现任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军事委员诸职，自不能脱离中央，自立名号，收编杂军，形成割据」。8月4日，北平军分会命宋哲元「接收察省政权，处理一切军事」。冯

⁷ 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王寿南等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9），页357-366；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失败〉，《历史教学》，1983年第2期，页14-17。

可能不愿与宋哲元为难，而日伪军两万万余人已向察省开动，乃于8月5日声明：「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政权归诸政府，复土交诸国人。」此后复回泰山居住。但参与同盟军的中共有关人员，为了转移国人视线，不愿结束抗日。中共前线委员会决定将受中共掌握的同盟军撤到张北，总数约一万五千人。8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北通电继续抗日，方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9月中旬攻占热河丰宁县，9月20日占领冀东怀柔县。北平军分会为避免日军借口寻衅，遂令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剿办。到10月中旬，方、吉等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离开部队，余部由国民政府收编。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捕处死⁸。

其四、十九路军以抗日为名在福建建立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发展而来。第十师于1926年占武汉后扩编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师长有蔡廷锴等，均为李济琛的旧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第十一军驻济南扩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下辖三个师。后奉调入赣剿共，1931年冬调驻京沪一带，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一二八战役停战后，十九路军于5月22日调福建参加第四次围剿中共的战争。1932年6月十九路军至福建，7月蒋光鼐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嗣蒋改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即向闽西共军根据地龙岩、漳平、连城、永定等县进攻。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侵入华北，蔡廷锴于1月5日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北上抗日。屡经请命，蒋介石允其抽调部分官兵，以「援热先锋队」名义北上。嗣热河、长城及滦东战役失败，中日议和；但在「塘沽协议」签字的第二天，蒋光鼐、蔡廷锴等即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反对「塘沽协定」。适陈铭枢自欧归国，拟借此机会作政治活动，在港与李济琛商议，原欲联络闽、粤、桂三省，共同反抗国民政府，因粤省陈济棠、桂省李宗仁不答应，计划失败，只好在福建另谋发展。1933年7月初，江西共军新成立的东方军由彭德怀指挥东征入闽，十九路军在抵抗中造成许多损失。8月间，蒋光鼐派人到延平附近会见彭德怀，表示愿依照中共于1月17

⁸ 前引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页366-373；前引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失败〉，页16-19。

日发表的宣言(愿意和国民党中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军队订立停战协议),与共军进行停战谈判。10月26日,停战协议成立,一方面恢复与共区之间的贸易,一方面即赞助抗日团体作抗日宣传活动。11月17日,李济琛到福州,召集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及各党各派代表开会,到者一百三十余人,决定组织人民政府。11月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到会者有二十多省市和地区的代表和华侨代表百余人,另有十九路军官兵和机关团体代表和群众数万人。黄琪翔为总主席,决定由黄等十七人组织的主席团负责组织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以李济琛为主席,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元年⁹。

福建人民政府的重要成员来自各党各派,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琛属桂系,政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陈铭枢组有社会民主党,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陈友仁为改组派,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蒋光鼐、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蔡廷锴属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军中有「改造社」),第六军军长翁照垣属青年党,最高法院院长徐谦、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余心清属冯系,政府委员黄琪翔、土地委员会主席章伯钧属第三党(第三党此时由黄琪翔领导,而第三党在邓演达领导时期即与陈铭枢关系密切)。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安排中央、地方官员及军事将领外,最重要的是谋各党各派之联合,并提出政纲。12月11日,由陈铭枢主导,宣告解散一切组织,组织生产人民党,陈任总书记。惟党派的界线,非一纸宣告所能化除。人民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否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政策是联共抗日反蒋。政纲尚包括实行土地国有、计口授田¹⁰。

1933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福建人民政府,将在江西剿共的国军抽调一部分,向福建进攻,兵分五路:以顾祝同为第一路总指挥,蒋鼎文为第二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陈诚为第三路总指挥,张治中为第四路总指挥,卫立煌为第五路总指挥。此时福建人民政府希望苏区的共军移闽北,支持十九路军,但中共中央限于阶级偏见,亦或自顾不暇,未予理会。1934年1月3日,中央军分路入闽北,1月6日陷延平,1月15日占福州。人民政府于1月12日开始向漳州撤退,同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福建省主席。1月21日,中央

⁹ 方庆秋,〈福建事变述论〉,《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页103-105。

¹⁰ 方庆秋,〈福建事变述论〉,页105-107。

军占泉州、漳州，十九路军失败、人民政府垮台。1月28日，十九路军奉命改编为第七路军¹¹。

其五、两广以抗日为名另组国民政府：两广自1931年胡汉民被软禁、一度脱离国民政府之后，设有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形同半独立状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主其事者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陈曾派兵对闽变的势力施压，使闽变早日瓦解；同时曾与中共订互不侵犯协议，使红军得以顺利自江西苏区向西南转移。国民党中央为了统一御侮，于1935年12月7日调整人事，以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为副主席；以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为副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任行政院长。陈济棠为增加广东声势，不欲胡汉民赴南京就职。1936年1月5日，胡于瑞士养病半年后，自欧返国，蒋派人迎于香港，陈则派人迎于新加坡。胡到广州后，以体弱多病为由，未即北上。1936年5月12日，胡以脑溢血逝世。5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居正、孙科等八代表抵广州致祭，并传达中央主张，希望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俾合作救亡。中央的要求引起两广的不安与反抗。粤军主力集中在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于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集会，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为由，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6月5日，两广军队进入湖南永州。6月7日，蒋介石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谓「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又谓「任何军事行动，必于整个命令之下，协同动作，方克有济」¹²。

两广事变发生时，日本正谋并吞华北，西北剿共战争正在进行，政府为免授人以内战口实，决定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广问题，但仍临以兵威。6月10日，中央军进抵衡阳，以稳住湖南（主席为何键）。6月11日，蒋介石电劝陈济棠，撤退入湘军队，主张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共决大计。陈济棠仍于6月22日组织军事委员会及抗日救国军，并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军队大举进入湖南、江西南部。两广并未得到其他省区的奥援，蒋介石

¹¹ 同上，页108-110。

¹² 施家顺，《两广事变之研究》，页47-55。

石则策动陈济棠的部属，使不支持陈的举动。7月2日广东空军七架飞离广州，归顺中央；7月6日，（广东）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辞职赴港；7月8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由大庾飞南京，参加二中全会。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及第一集团军（广东）、第四集团军（广西）番号，免陈济棠本兼各职，改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并议决设置国防会议，作抗日准备，任命陈济棠参与国防会议，请其到南京共商大计。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就任广东绥靖主任。7月17日，余汉谋电陈济棠，限二十四小时离粤；7月18日，广东全部空军62架向中央投诚。陈迫于形势，解职赴港¹³。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方面中央亦有安排。李宗仁、白崇禧于7月24日电中央，定于8月1日就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之职。不料中央于7月25日发布新的人事命令，免去李、白广西正、副绥靖主任之职，另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李、白以中央命令违反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拒绝接受，并邀请各抗日党派、抗日团体代表，到南宁会商大计，前往者有第三党代表章伯钧等。此期间，国民政府与广西之间一面进行协商，一面进行军事对抗。8月14、15、16日，广西空军有七架投归中央。8月19日，桂军发出总攻击令，着各军向桂东边界集中。9月2日，中央代表居正、程潜、朱培德到南宁，与广西方面达成协议。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仍任浙江省主席。9月10日，李、白表示接受任命，并于16日宣誓就职¹⁴。一场以抗日为名的纠纷，告一段落。

其六、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推动抗日劫持统帅：北伐以后，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名义，统率其父张作霖所留下来的部队。张学良之东北军于1930年中原大战时进入关内，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完全撤入关内。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海陆空军副司令，1931年12月16日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8月20日改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3月12日辞职，赴欧游历

¹³ 施家顺，《两广事变之研究》，页56-70。

¹⁴ 同上，页71-84。

九个月。1934年1月回国，3月1日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3月1日改任武昌行营主任。1935年日本进行华北自治运动，逼使国民政府势力退出华北。适共军主力自江西、贵州、四川等省进向川、陕、甘边区，东北军自河北开赴陕西；于学忠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驻节西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为杨虎城。杨为陕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隶张云山部。1915年起兵反袁，后入陕西靖国军，与孙中山有所联络。1925年任国民三军（孙岳）第三师师长。次年在西安受陕军刘镇华部攻击，坚守八个月。1927年任国民联军第十军军长，是冬转战至安徽太和，与中共有所往来。1929年任第二集团军（冯玉祥）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驻山东临沂；是年第二集团军叛变后，归附中央。1930年中原大战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并任陕西省主席，1931年改任陕西绥靖主任。其后以剿共之故，中央军及东北军大量进入陕西。1935年9月，中共主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基地后，蒋介石决定于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10月2日，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杨虎城任西安绥靖主任如故¹⁵。

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之际，全国抗日的呼声正高，在抗日名义下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实力派如广西的李宗仁等都与张学良时有联络。而局促于陕甘宁边区一隅的中共正在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指挥下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中共拉拢的对象。在西北军方面，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1936年春，更派王炳南赴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王炳南并做了杨虎城的高级参谋。在东北军方面，张学良至迟在1935年12月，即与共产党人有所往来；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洛川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了初步交谈。2月25日，李克农又至洛川，与王以哲达成停战谅解。3月5日，张学良驾飞机赴洛川，与李克农商谈抗日问题，达成局部停战协定。3月10日，共军解除对甘泉东北军的包围。3月23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拒绝执行。4月9日，张学良在延安（时

¹⁵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344-348；米哲沉，《杨虎城传》，页215-218

名肤施，为东北军驻地）与周恩来谈联合抗日问题，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当共军、西北军、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5年4月秘密建立完成之后，蒋介石到5月11日还电令张学良以陕、甘、宁的兵力，拟定清剿共军计划。张学良则于5月12日在延安与周恩来谈判抗日反蒋问题。此后，张学良一面伺机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即作抗日准备、抗日宣传。为了与中共共同抗日，约在此时，张学良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事为共产国际所拒绝。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近郊王曲镇办军官训练团，宣达抗日使命；7月末，在西安发起抗日同志会，自任主席。此时张学良有与中共进行西北大联合以打通苏俄的计划，但得不到苏俄的支持，归于失败。苏俄希望中共联蒋抗日。8月29日，闻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以宣扬抗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勃然大怒，派兵截回被捕人员，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省党部逮捕东大学生，系不信任张学良之举。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召见张学良，宣布剿共计划，张学良再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申斥。10月29日，张学良飞往洛阳，继续劝蒋抗日，复遭申斥。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要求抗日，再被严词拒绝。12月4日，蒋介石自洛阳至陕西，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向蒋谏诤，12月7日，张学良再向蒋建议抗日，均遭拒绝。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1）服从中央的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前线，与共军决战；（2）如张、杨不愿剿共，则东北军调至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与共军决战。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离开西安，12月8日决定，劝谏不听，只有兵谏。12月9日，西安数千名大、中、小学生纪念「一二·九」周年游行示威，并动身前往临潼蒋介石住处请愿，张学良亲往劝阻，并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12月10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报告学生请愿情形，并以停止剿共为请，又为蒋申斥。12月11日，张学良赴华清池参加晚宴，再度对蒋苦谏，但毫无结果，而蒋即决定将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张学良赶回西安，与杨虎城商量，即刻采取了兵谏行动¹⁶。

¹⁶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203，349-351；王荣，〈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2期，页12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页36，47-50，60-62，93-94，110-111，165-167，172，283。

兵谏行动，张学良的警卫营和一〇五师负责逮捕在临潼的蒋介石，杨虎城部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来的高级官员。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许，张学良的第二警卫营长孙铭久率部攻入蒋介石驻节之处，大部分卫士被枪击毙。蒋闻讯走避后山，到上午九时为孙铭久寻获，即专车送往西安杨虎城的司令部。另一方面，杨虎城部亦已攻入西安宾馆，逮捕了蒋的随行人员军政部副部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以及新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党史委员会主委邵元冲，则于越窗逃走时，被击重伤殒命。张学良、杨虎城于劫持蒋介石后，当日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另一方面，即请中共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给陕北中共中委会发电，邀请中共派代表至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同时，张、杨即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部，另成立抗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¹⁷。

西安事变发生后，左翼团体如全国救亡协会、北平学联等都积极响应张、杨的行动与主张，北大教授傅斯年、胡适等则于报端著文，直斥张学良为叛逆。至于各省实力派的军人，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等附和张、杨的抗日主张外，其他多不以张、杨的莽撞为然，如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深虑将「移对外战争为内战」；四川省主席刘湘指张学良之举，「将使救国之初心，得亡国之恶果」；在北平应付日本侵略华北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则以为联共抗日则日本必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不过，各省的实力派，都主张用政治的方法解决西安事变，反对对西安用兵。受邀赴西安共商国事的中共当局，有两派意见：周恩来主张以蒋为人质，迫南京政府抗日；毛泽东主张将蒋带到保安受审，朱德甚至主张杀蒋。最后决定电询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意见。第三国际为了联蒋抗日，至迟在1934年国民政府对江西共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即开始谋求与国民政府改善关系。1934年10月，蒋介石且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赴苏俄

¹⁷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203-208。

联络。1935年10月9日，在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第七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抗日需要武器为名，向苏俄驻华大使提出，希望能从苏俄获得军事装备，嗣于11月19日获得苏俄的同意。12月9日和12日，蒋介石进一步向苏俄大使提出，希望苏俄政府能帮助说服中共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表示只要共军服从中央，可保持其原有编制参加抗日。国民政府与苏俄有了密切接触后，苏俄对国民政府极友善，1936年两广独立事件，苏俄报纸即对两广的分裂行为多所批评。苏俄为了自保，且打算如中共不能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即舍弃中共，专支持国民政府。在这种情形下，西安事变一发生，不仅苏俄的报纸对张学良大加指斥，苏俄外交官员且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保持密切联系。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晚收到张学良劫持蒋介石的有关报告，遂即通知共产国际书记处。12月14日，苏俄《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中国分裂。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或云莫斯科给中共的电报系经上海宋庆龄之手（宋为国民党要员，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转到保安。可以确定的是：中共中央于12月20日始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内容是：（1）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2）中共应尽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西安事变前，中共早已开始进行；为谋求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共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由周恩来率领，于12月15日离开保安，辗转于12月17日抵西安。是日，中共中央已获知苏俄报刊对西安事变的评论，20日又获知共产国际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遂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当时苏俄与中共既都想藉蒋介石的领导，进行抗日战争，乃促使张学良放蒋；其他重要国家，像英国、法国、义大利、日本等，都是极力反共的，反对张学良「受苏俄指使」、反对张学良「与共党同流合污」。除反共以外，日本与英国等其他反共国家目的并不相同。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极力制止南京与西安间达成妥协，造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英国等则认为南京与西安间如不能和平解决，必引发大规模内战，影响各国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设法促使张学良放蒋，日本则借

助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西安事变发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通知在德养伤的汪精卫，汪即返国，汪行前与希特勒晤谈，希望中国与日本、德国结成反共同盟，时德、日甫于上月签反共协议），希望南京对与共产党结合的西安当局采断然措施¹⁸。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于12月12日当晚七时开会，国民党中央于当晚十一时开中常会，决议：（1）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2）军事委员会由常委冯玉祥等负责召集；（3）何应钦负责调配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4）免去张学良全部现任职务。当时党政要员中分为两派：何应钦、戴季陶等认为，政府不可能与中共妥协，否则必遭日本反对；孔祥熙、冯玉祥、孙科（立法院长）、于右任、陈立夫、宋美龄等则主张与张学良合作解决问题。但为了向张学良施压，仍决定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英国驻华大使休根森建议派张学良在东北时的顾问英人端纳赴西安一探究竟，何应钦曾阻止端纳前往，坚持武力讨伐，为宋美龄所喝斥。12月14日，端纳至西安见张、杨，要求释放蒋，谓若不释放，等于替日本效力。蒋自被囚后，坚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随时准备牺牲。及端纳到后，并读到夫人的信，知南京情势复杂。此时张学良已将蒋迁至西北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公馆，不断坦诚向蒋表达心意，意在抗日，别无所求。蒋虽不谈判，心中不能无所打算。12月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进行讨伐，中央陆军官校教导总队且由桂永清率领，自动离南京向潼关进发。此时被扣押的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蒋鼎文被释回南京，带来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要求停止对陕西方面的轰炸。与此同时，端纳自洛阳电蒋夫人，谓西安欢迎宋子文等前往西安磋商。12月20日，宋抵西安，知张学良与中共都计划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即返南京。12月22日，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蒋鼎文等同往西安。12月23日，蒋夫人、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正式会谈，讨论释蒋条件。在此之前，张学良与周恩来、端纳、宋子文、蒋夫人之间已有接触，放蒋是大家的共识，只是条件问题。正式谈判之日，张、杨坚持彼等于12月12日提出的八项主张（见上文），周恩来则提出六项主张：

¹⁸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211-217，248-249；华飙等，《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6期，页28-31；何步兰，《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页12-1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页297-298，322，326，329。

(1) 西安、南京双方实行军事停战；(2) 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分子，容纳抗日人士；(3) 释放政治犯；(4) 结束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5) 召开各党派、各团体参加的抗日救国会议；(6) 与世界上一切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最后照周恩来所提条件原则通过，其中第四项改为：剿共立即停止，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国共可以公开合作，红军更改编制，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蒋介石的态度：初时拒绝任何谈判，要求释放或杀掉；继则表示未回南京以前，任何一项要求都不能同意，到最后谈判圆满结束，蒋仍拒绝作书面签字，但答应将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12月24日，周恩来见蒋，表示共产党愿支持蒋作国家领袖，共同抗日。蒋表示不会再打内战，等他回南京后，再请周恩来到南京详细商谈¹⁹。

放蒋的条件只达成口头协议，杨虎城不赞同。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军官们更反对，传言要将张学良和蒋介石一同杀掉。张学良苦苦安抚反对者的情绪，没有结果，最后在周恩来的协调下，由蒋夫人和宋子文在一份简单的文件上签字，端纳为见证人。文件的基本内涵是「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12月25日下午，杨虎城见到蒋夫人和宋子文签署的文件后，同意放蒋。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自己立刻送蒋回南京，并给杨一手令，表示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受杨虎城指挥。张学良陪蒋飞离西安时，仅杨虎城一人送行。资料显示：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动机约有三点：(1) 保障蒋能安全离开西安，(2) 为西安事变承担全部责任，(3) 使蒋答应的事不能反悔²⁰。

¹⁹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 236-257；王荣，〈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习与探索》，1985 年第 2 期，页 124。

²⁰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页 256-261。

第六章
抗日阵营的整合与分裂
(1937-1945)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鲸吞蚕食，1932 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并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1933 年占热河，并进兵河北；1935 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扶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 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此期间，执政的国民党呼吁国人共赴国难，以武力另建政权的共产党企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到 1937 年 9 月，国共在表面上开始合作抗日。此后，国民党一面抗日，一面建国；共产党一面抗日，一面扩充自身的力量；双方冲突日甚。共同抗日的人民，或支持国民党，或支持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民主小党派，谋求在国共两大党之间另谋出路，但殊少发展空间。此均影响抗日阵营的整合。另一方面，日本在占领区建傀儡政权，亦吸收了一些原来抗日的力量。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结束，傀儡政权结束，整个中国的政局，又陷入国共全面对抗。

第一节 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联合与斗争

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以转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是中共的谋略。国民党欲消灭中共不成，嗣因抗日局势危迫，乃以改编共军为条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共同抗日。中共的谋略，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要求中国社会各界，暂时放弃阶级间的敌视与斗争，共同合作抗日。此一构想，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初时合作的对象较狭，以剿共各军为主，到 1935 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中作成决议，合作的范围才普及于全民族各种阶级成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演变，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1931-1935：中共抗日反蒋，国民党安内攘外；（2）1935-1937：中共逼蒋抗日，国民党剿共不成，接纳共同抗日意见；（3）1937-1941：中共联蒋抗日，国民党接受各党派共赴国难，惟彼此之间仍有摩擦；（4）1941-

1945：国共分头抗日，彼此冲突升高。以下分期说明：

第一个时期，1931年9月18日至1935年8月1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大力从事抗日宣传。1931年9月20日，中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宣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1932年4月15日，中共对日宣战，声称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17日，中共发表宣言，愿在下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三个条件为：（1）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武装人民。1934年4月20日，中共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抗日领导机构。

此期间中共虽宣扬抗日，惟因其领导人阶级意识强烈，合作的对象有限。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等在东北抗日，一二八事变后蔡廷锴等在上海抗日，都被中共指为「狡猾」行为。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是年11月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都不受中共信任。当时中共的政策虽为「抗日反蒋」，实际上侧重反蒋。而且把政治上的中间势力都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甚至被当作革命的对象。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人权派、职业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一概被列为「反革命的在野派」。中间势力虽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大多数都坚持反共。至于执政的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和中共两面夹击，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决定「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中国抗日的条件不足，无法与日本的现代化军队作战。此期国民党应付日本侵略的办法初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继则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欲以长期抗战，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¹。

第二个时期，1935年8月1日至1937年9月23日

¹ 洪万辰、胡华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页13-14；庄明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学历史》，1985年第4期，页2-3；方敏，〈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页115-116；王维礼，〈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页51-53。

1935年7月23日至8月20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在会中建议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8月1日，陈绍禹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中除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外，特别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与之亲密携手。」更特别提出：「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11月28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仿照八一宣言的内容，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25日中共在瓦窖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照张浩（林育英）自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带回的文件，决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的决议，基本上是既反日又反蒋。当时仅决定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而已。到1936年2月，代表第三国际意见的陈绍禹发表小册《新形势与新政策》，申明只要蒋能真正抗日，中共愿在抗日战线上与他携手。但当时毛泽东仍指蒋为汉奸，表示「不愿与汉奸讲统一」。是月，毛泽东以东进抗日为名，率兵自陕北入山西，为国军所阻。5月5日，毛发表回师宣言，却不再骂蒋、反蒋、讨蒋，希望国共双方先在陕甘晋停战，双方互派代表，商抗日救国具体办法。8月15日，第三国际对中共发出指示：希望一切以抗日为重，不要把蒋与日本等观，并建议中共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9月，中共决定「逼蒋抗日」，并放弃苏维埃政权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所谓「逼蒋抗日」，主要是联络国民党党内人士及国军，以及中间派人士，对蒋施压力。早在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代表即与国军中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等会晤，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时，毛泽东又亲笔致函杨虎城，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另一方面，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九一八时自北大营撤退者），就红军与其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签署抗日救国协议。在

此前后，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由朱理治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另一个由张闻天领导、由贾拓夫等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分别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另一方面，1936年4月，潘汉年、云广英先后以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代表身分与广西李宗仁建立联系；9月，阎锡山提出「迎共抗日」的口号，请中共代表薄一波到山西帮助工作；10月，冯雪峰代表中共与四川刘湘订立了〈抗日救国军事协议〉。在此前后，中共先后与李济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孙科（立法院长）、马占山（军事委员会委员）、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建立秘密关系，并与傅作义（绥远省主席）、高桂滋等取得谅解。至于中间党派，在1935年12月9日发生在北平的学生抗日大游行延续十九个月的过程中，多已淡化反共主张，标榜抗日。1936年5、6月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宣扬「促成各党派一致抗敌的联合阵线」。此时，李济琛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认为「联共为统一救国之关键」，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则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实现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分别给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院长）、宋庆龄等七十人，以及李济琛、李宗仁（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军事委员会委员）、蒋光鼐（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十九路军军长）、于学忠（甘肃省主席）等人去信，呼吁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国民党改弦更张。同时，毛泽东还致函蒋介石，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中共影响下，劝蒋放弃剿共政策，共同抗日；蒋拒不纳谏，张、杨乃于是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变，将蒋扣留（见上文第五章第二节）。至是，国民党不得不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

国民党的政策原来是先安内、后攘外，但在剿共的过程中，日本节节进逼，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事端，之后即占有东三省，于1932年建满洲国。1933年占热河，进兵长城诸口，占领冀东二十余县。然后一面在冀东各地进行走私，一面在华北各地大量投资。投资的结果，使日本在华北的矿业投资到1936年底已超过英国在华北的矿业投资；走私的结果，使1936年3月天津、秦皇岛、烟台、龙

口四处的海关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0%。1936 年，日本开始在华北另建币制系统，并迫使国民党的势力退出河北、察哈尔，以华北五省自治为名，拟使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五省脱离中国。日本的走私，影响各国在华商务，英、美等国都向日本提出抗议，并支持中国从事币制改革，贷款给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同时德国亦售予中国许多重武器。在这种情形下，加上中共之呼吁、第三势力之唱和、学生之运动、各地军人之蠢动、反日分子之铤而走险（如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刺杀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乃开始转趋强硬；当务之急是希望能早日改编中共的武力，以完成国家统一，并与俄国加强联系，共同抗日，以免其继续扶植中共。关于与苏俄联系，1935 年 12 月，蒋介石派陈立夫赴俄。俄虑引起轴心国家疑惧，不便与陈直接交涉。陈复奉命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至 1937 年 8 月 21 日，由外长王宠惠与鲍大使签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关于改编中共，1936 年春，蒋介石令驻苏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绍禹接触；陈以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在国内，以在国内谈判为好，乃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接触。在潘汉年回国前后，国共之间在国内已经有不少沟通管道：一是蒋介石命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经曾养甫（铁道部次长）、谌小岑（铁道部劳资科长）联系；谌透过经左恭（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中央局派张子华于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两次在上海与谌会晤，谌要张转报中共中央，希望派正式代表谈判联合御侮问题。张与董健吾（周继武）同去陕北，5 月初返沪，带回陕北与国民党通讯的电讯密码。董健吾系受宋庆龄之托，以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名义去陕北，携回中共的谈判条件：（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寇；（4）释放政治犯；（5）改革内政及经济。谌又透过吕振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络，北方局派周小舟至南京与曾养甫谈判。1936 年 5 月，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授谈判四条件：（1）欢迎共军参加对日作战，（2）共军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共方之政治意见可透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构表达，（4）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理想。是年 7 月潘汉年回国，曾在上海与陈立夫会谈。

是年9月，陈立夫收到潘汉年面交的周恩来函，要求「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蒋介石即嘱陈继续与中共联系。是年10月中旬两广事件（始于6月）平息，国民党增兵围剿红军，谈判的条件改变；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向潘汉年提出：（1）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区改为行政区；（2）红军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叙用，党与政府干部可按才分配南京各机关服务；（3）取消反政府之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4）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些条件，中共自难接受。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派代表共商国事，中共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周恩来原于12月15日与毛泽东等联名，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意见，但17日到西安后，发觉各地来电对张学良劫持统帅的行为并不支持，而12月20日共产国际的来电，更表明张学良的行动损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乃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张学良所提八大条件为基础，达成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协议。12月25日，蒋由张学良陪同回南京。1937年1月，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等接洽，要求国民党迅速落实在西安所达成的各项协议。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方针。此后，国共双方即就共同抗日的实质问题展开会谈。193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西安行营主任）等在西安进行第一次会谈。中共提议将共军改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领导人员不变，苏区改为边区行政区，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中央任命；国民党则要求变更红军领导人员、控制苏区政府；双方未达成协议。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两党第二次会谈。周恩来重申前议，蒋未坚持，盼续谈两党合作共同纲领。6月上旬，周恩来携两党合作抗日共同纲领到庐山，与蒋进行两党第三次会谈。蒋提议由两党派人组「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周不答应；蒋复提议设置政训处指挥红军、不准红军设总指挥部、毛泽东及朱德出国留学，周亦不答应。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周恩来携事先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赴庐山，与蒋进行国共间的第四次谈判。15日将宣言交蒋，17日正式谈判。蒋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

位，对红军改编问题和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则未答复。

8月1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速赴南京商讨国防大计。8月9日，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作第五次谈判。不数日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蒋介石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作出让步（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俄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2日，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此期间，国共续作谈判。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所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提出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10月，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随后，中共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出版《新华日报》，在西安、南京、武汉、重庆等处设立党和军的办事处。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被邀为参政员。国民政府收编中共抗日、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表面看来，已经完成²。

第三个时期，1937年9月23日至1941年1月12日

国共双方在全国抗日的情势与压力之下在形式上获得合作之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布置抗日军事，共产党之活动空间较前扩大。中共在合法的存在下，伺机发展；国民党则因中共不遵约束，与国军争夺地

²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个时期（1935年8月～1937年9月）的有关论述，除参考洪万辰，胡华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页14-20，庄明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意义〉页3-6，方敏，〈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页57-60外，另见赵三军、邓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红军长征〉，《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页93-95；李良志，〈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页68-71；韩荣璋、张日新，〈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页3-8；石仲泉，〈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页16-19；张兆本，〈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页31-32；程中原，〈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瞭望》，1990年第35期，页18-21；郑德荣，〈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吉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页2-11；张梅玲，〈简论一九三六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学术界》，1987年第6期，页74-78；朱仁鹗，〈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页2-5；高峻，〈试论抗战前夕国共关系中的三大关键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页124-126；吴景平，〈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页55，63；宋玮明，〈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页86-90；李天民，〈抗战时期中共诡谲的统一战线策略〉，《近代中国》53期，页28-30；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2期，页16-21；杨荣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页22。

盘，不得不多方应付。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基本上是循着中共「既联合又斗争」的路线发展。在联合方面，有许多表现：（1）陕西共军所编的八路军编入第二战区，受山西阎锡山指挥；江南共军所编的新四军编入第三战区，受顾祝同指挥；一部分共军参加了山西的平型关之役和忻口之役。（2）1937年12月10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武汉。1938年2月，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曾对是年3、4月间的台儿庄战役，提出战术上的建议。台儿庄战役，共军并未直接参战，中共的《新华日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两周以来，我军在台儿庄、峰县一带浴血肉搏，前仆后继，确为我战史上未有之壮烈。」台儿庄大战以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说，周恩来将此演说的内容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将持久战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转陈给蒋委员长，成为日后抗日作战的重要方针。（3）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与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人士陈诚（武汉卫戍司令）、邵力子（中央宣传部长）、张治中（湖南省主席）、冯玉祥（军委会副委员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等时有联系，与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知名之士如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勱、左舜生等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与文艺界、新闻界、工界、青年、妇女界都有广泛的接触。（4）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7月国民参政会召开，国民政府邀请毛泽东等七人为国民参政员，除毛泽东请假外，余均出席。（5）1937年9月-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费六十一万四千元，1938年10月以后增至一百万元；新四军在建军之始，亦获第三战区补给步枪五百枝、子弹十万发、军服一千套、款项一笔。（6）1938年10月22日武汉沦陷前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前线飞抵武汉参加军事会议，并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要求增发军费、弹药，获得允准。（7）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于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共军参谋长）等应邀出席，会中决定加强抗日游击战争，在衡山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叶剑英率同志三十余人参加班务，蒋介石兼班主任，白崇禧、陈诚任副班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训练班于1939年2月开

学，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月。(8)中共接受国军个别将领的请求，派人前往协助工作，如1938年秋派薛子正到滇军龙云部属一八〇师工作，薛先后任一八〇师秘书及参谋长；随后，薛又被派到卢汉部工作，任卢汉的随行参谋。1938年春中共派张友渔到河南第一战区（程潜）政治部任委员，后转至石友三部任政治部长。(9)在阎锡山的允许下，中共党人薄一波等在山西成立牺牲同盟会及决死队，在晋西、晋西北、晋西南等地，配合八路军作战。在第五战区及湖北省府的允许下，中共党人陶铸等于1938年12月成立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并成立两支抗日武装。在国军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廖磊的合作下，中共党人方毅等组成鄂东抗日挺进队，后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部分。在豫南，中共党人朱大鹏等联合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组抗日武装挺进队，隶属第五战区³。

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国民党一直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来。1938年2月，当时国民党正从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蒋介石在武汉会见周恩来，表示愿与各党派溶成一体。周恩来说：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同年12月，蒋介石在桂林、重庆先后会见周恩来、陈绍禹，表示共产党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再约见周恩来重申前议，但为周拒绝。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五中全会乃有限制异党活动的讨论，结果原则通过。其后，国民党在各地即从事限共、反共活动⁴。当时共产党正在各地发展势力，国共间的冲突遂日渐增多。

在中共领导阶层中，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绍禹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倾向维护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偏重中共势力的发展，周恩来则支持毛泽东的政策。1937年8月，中共政治局在洛川开会，毛泽东于会中提出先击败日本，再击败国民党，「让一切败北」；张国焘则提出让中国人胜利，让日本人败北。张因与毛

³ 孙学筠，〈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协同作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页80，84-86；杨荣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页24-25；萧学信，〈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页41；石仲泉，〈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页21-23。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在衡山设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另参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页426，438。

⁴ 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页76。

不合，于次年4月出走武汉，投奔国民党。1937年9月，毛泽东发出指示：「保持八路军军中政委制度、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特别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年12月，陈绍禹发表〈目前抗战的形势与任务〉，强调「以巩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加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扩大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1938年7月12日，由陈绍禹领衔的六十八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毛泽东迫于形势，在是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中虽然表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会中决定取消长江局（在武汉），接着便把陈绍禹的长江局书记职务取消。1939年1月16日，中共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委由周恩来负责。陈绍禹为国际派，坚守第三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最初对他莫可奈何，但到1942年苏俄与德国陷入苦战，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终于使陈绍禹、秦邦宪等国际派接受其领导⁵。国共间的冲突，以及中共内部的冲突，起于基本理念之不同。中共的国际派，以中国各党派、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为优先，如是可以有效地保卫苏俄。中共的毛派则以己身的生存发展为优先，有时联国民党以抗日，有时与日伪妥协，专对付国民党。国民党谋吸收中共不成，仍然维持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对日本，另一条战线对中共；至于两条战线孰轻孰重，要看在何一时机、何者对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影响大小为考虑。因此，国民党有时联共抗日，有时与日暂时妥协，专对付中共。国共两方的斗争方略，有些地方相似。惟中共势力起初较弱，国民党制裁中共擅自扩张、不听命令时，中共则指控国民党不抗日、专搞内部摩擦；国际友人及第三势力亦认为大敌当前，国民党应让中共放手去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抗日战场有统一调度的必要，不容任何部队自由行动；而中共在抗日阵营中俨如国中之国，常在敌后与国军或国军游击队争地盘，使国民党难以忍耐。因此国共冲突日多，中

⁵ 金达凯，〈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53期，页31-33；《周恩来年谱》，页419-431。

共的统一战线逐渐崩解。

国共冲突，有些是文的，有些是武的。文的方面，有些是人事上的，如共军改编为十八集团军之后，军事委员会派李秉中为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但中共不予接受，李只好返南京覆命⁶。又如中共在所占领的地区，先后设陕甘宁、晋冀察、苏鲁豫、豫鄂皖等边区，自由设立机构、委任官吏。据 1941 年 3 月的资料，在中共管辖之下者，陕西省有 20 县，委行政专员 3 人、县长 20 人、市长 1 人；山西省有 61 县，委行政专员 2 人、县长 61 人；甘肃省有 9 县，委行政专员 2 人、县长 9 人；河北省有 97 县，委行政专员 15 人、县长 97 人；察哈尔省有 7 县，绥远省有 5 县，共委县长 12 人；山东省有 69 县，委行政专员 6 人、行政主任 4 人、联防主任 4 人、县长 69 人；江苏省有 12 县，委联防主任 1 人、县长 12 人；安徽省有 14 县，河南省有 1 县，湖北省有 1 县，宁夏省有 1 县，共委县长 17 人。以上共 314 县，由中共委任的行政人员 357 人。这些都不是国民党愿意容忍的。

有些冲突是文化思想方面的。中共自办鲁迅学院、抗日大学，也办中小学，更大量出版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书刊。1938 年 4 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一封公函中指出：根据最近审查书籍刊物总报告内所制「各党派书籍刊物出版比较表」计一百三十余种刊物，内共党占一百一十二种，国民党仅占二十余种。陈因此认为：国民党如不急起直追，奖励国民党同志刊行书籍，纠正思想，恐全国文化思想及主义，均将发生动摇。

有些冲突是组织上的，如据 1941 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报告，中共有正式党员三十万人，潜伏在各地各机关的中共党员和重要外围分子，统计有一万五千五百余人。1940 年 5 月，毛泽东对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指示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防止共党组织秘密扩张，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至迟在 1941 年已开始破坏各地共党的秘密组织，此后迄 1942 年 11 月，江西省先后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赣西特委、湘赣边区特委、南方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委等组织，逮捕首要 29 人、次要 62 人、武装人员及党员 240 人，先后自首者五千余人。河南省亦在豫北破获共

⁶ 曹伯一，〈抗战中期中共策略路线之剖析〉，《近代中国》2 期，页 45。

党秘密组织，首要人员被逮捕，自首者千余人。

有些冲突是财政金融方面的。中共在占领区内，自发钞票，边区银行、农民银行、光华商店发行者尤多，更自课捐税，多达三十余种。

有些冲突是社会运动方面的。中共以全国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青年记者协会等社会团体，进行壮大自己的社会运动⁷。

前述的中共势力扩张，有些受到国民党的裁制，有些已为国民党觉察，均是国民党耿耿于怀、不愿容忍的。

武装的冲突，对抗日阵营的整合影响尤大。国民政府原将改编的十八集团军隶第二战区，担任山西防务。但共军自 1937 年 11 月即成立「晋冀察军区」，视河北为其发展之地。1938 年 7 月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次年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入冀时，共军即表反对；1939 年 5 月以后，进入河北省之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袭击与河北省府随行之朱怀冰部，鹿钟麟被迫于 1940 年 3 月移驻河南林县，后移驻山西晋城。在冀南抗日的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在 1940 年 1 月亦受到共军的攻击，石不得已于 2 月末移入鲁境。另一方面，河北抗日民军张荫梧部，自 1938 年 12 月以后亦屡受共军攻击，至 1940 年 1 月被共军并吞殆尽。共军在敌后河北发展，排拒国民党的势力，初以「驱鹿打石」为口号，及鹿走，国民党调庞炳勋为河北省主席，中共复以「驱鹿拒庞拥朱（德）」为口号。如前所述，到 1941 年 3 月，中共在河北省 97 县委有县长。山东方面，共军一二九师自 1938 年 12 月间即进入山东，以临清、馆陶一带为临时基地徐图发展。1939 年起不断攻击山东省政府在各县所组之保安队，迄 1940 年 8 月上旬为止，袭击行署、专署、县府等行政机关四十余次，攻击保安队及国军七十余次。入鲁抗日之国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于 1940 年 5 月称，既须时刻御日军，「又须日夜防共」。是年 8 月，共军且向山东省府所在地的鲁村进攻。如前所述，到 1941 年 3 月，中共已在山东省 69 县委有县长。

山西方面，省主席阎锡山于 1936 年秋所组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渐为中共渗透利用，到 1937 年 11 月太原沦陷后，中共组决死队、自

⁷ 蒋永敬，〈抗战时期中共问题〉，《近代中国》4 期，页 187-190；彭承福，〈周恩来在重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 年第 2 期，页 9。

卫队、游击队等，自称「新军」，将原阎锡山所统之晋绥军称为「旧军」，彼此对立。在这种情形下，1939年3月，阎锡山将「新军」改为教导军，自兼总司令，并将中共操纵下之第三、五、六区各县政权，逐渐收回。是年12月，「新军」叛变，阎派兵进剿，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国共军之间均有冲突。此后，「新军」除被平者外，多正式投靠共军。

江苏方面，新四军初编时约万人，到1940年发展成十万多人。新四军原在长江下游两岸进行游击战争，到1940年7月，渡江北上，在泰兴附近与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发生冲突。是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将新四军调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开赴黄河以北对敌作战。新四军不听，10月更联合自山东南下之十八集团军在泰兴东北之黄桥向韩德勤部猛攻。是月19日，国民政府重申前令，并限定11月底以前扫数开往，嗣又限令到1941年1月底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原以金坛、丹徒、句容、溧阳一带为基地的新四军不仅不遵令北移，且进图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1941年1月6日行经泾县南与国军第四十师发生冲突。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下令制裁该军，至1月12日将该军击败，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但到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继续发展其势力。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改编全军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

中共史家将1939-1940年间国共军在河北、山西的冲突叫第一次反共高潮，将1941年的新四军事件叫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指出这段时间，国军调往敌后与共军搞摩擦的部队190万人、制造的摩擦事件二千九百余起。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各地共军扰乱袭击国军而发生的战斗次数，共达395次⁸。此处且不论共军攻国军、国军攻共军，孰为有理；国军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共军在敌后扩充地盘，自不为国民政府所乐见，故国民政府亦派兵至敌后发展。由派往敌后的国军陷入两面作战、而在敌后的共军亦

⁸ 曹伯一，〈抗战中期中共策略路线之剖析〉，页52-59；蔡国裕，〈抗战期间中共的阴谋与活动〉，《近代中国》72期，页70-77；金达凯，〈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53期，页43-46；项迺光，〈中共对抗抗日战争之利用及其势力之发展〉，《近代中国》78期，页56-58；逢知先、冯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17期，页14-17；前引朱仁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基本策略〉，页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78-180。

陷入两面作战来看，更由共军时向日军宣达国军调动的情报、部分敌后国军为应付共军攻击不能不暂与日军妥协来看，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实已破坏了抗日阵营的整合。

抗日阵营中的国共裂隙，双方不断谋求补救。国民政府方面唯一的办法是要求中共遵命，中共不遵命的地方只好默认；中共方面则是先造成事实，再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不承认则仍独行其事。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在重庆签呈蒋委员长，谓十八集团军已由四万五千人扩充为十二万人，请准由原来的三师改编为三军，并增拨经费至一百万元；蒋委员长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研拟方案。1939年6月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函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解决中共边区及河北问题的意见书。关于边区问题：（1）依照原定之18县（陕西12县、甘肃5县、宁夏1县）划为陕甘宁边区；（2）沿黄河之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五县，并神木、府谷各一部分，划为十八集团军之警备区。关于河北问题：（1）承认十八集团军为河北作战之主力，负冀察战区指挥作战之责；（2）十八集团军应扩大为三个军。6月10日，蒋委员长接见周恩来及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提出六点指示，要求中共不自居于国家体制之外，并谓中共所造成之事实，无法承认。1940年1月4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复接见叶剑英，对共军违命扩充的部队与非法建立的军区，表示应予纠正或制止。国民政府既不让步，共军仍继续发展，如前所述，此后半年在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省，国共间的武装冲突日甚一日。1940年6月，由国民政府主动，国共再度商谈。周恩来提出：（1）将十八集团军警备区之五县并入陕甘宁边区，共23县。（2）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扩编至七个支队。7月16日，蒋委员长提示：（1）陕甘宁边区定为18县，改为陕北行政区。（2）将冀察战区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分任副司令长官。（3）十八集团军编为三军六师五补充团，新四军编为两师。（4）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命一个月内开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然中共并不遵依蒋委员长提示，在8月的覆电中，更要求改组冀察两省政府，两省政府主席由中共保荐。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重新布达蒋委员长7月16日的提示，令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

以北对敌作战，并斥责共军「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境以相侵」。11月9日，中共覆电，仅同意将江南正规部队北移。12月8日，何应钦再电斥共军「弃置当面之敌寇，惟务地盘之扩充」。次日，蒋委员长亲下手令，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限期北移，但共军并不遵命，仍伺机攻击国军；如前所述，乃有裁制新四军事件之发生⁹。

第四个时期，1941年1月12日至1945年8月14日

抗战后期的统一战线，周恩来代表中共驻重庆，除经常代表中共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外，主要的工作有三点：（1）联络第三势力、结合各界力量，以为政治资本：由于周恩来的劝说，1941年3月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六个小党派在重庆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揭橥继续抗战、实行民主自由的主张。此外，周恩来还联合企业界人士组民主建国会（最后于1945年12月组成）、联合科学界人士组九三学社（最后于1946年5月组成）。（2）建立大后方武装基地：中共不仅在敌后大力发展势力，亦在抗战大后方建立武装基地，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在云、贵、川三省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指示，于1944年前后派人到四川黔江、彭水等地建立了几个军事基地。（3）从事国际宣传：周恩来在重庆，积极主动与英、美等国进行外交联络，广泛接触英、美驻华使节，和美国总统代表、助理，以及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等军政要员，经常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战绩，提供国民政府制造摩擦的材料，并批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伺机扩大内战。周恩来也广泛接触外国记者，争取舆论的同情，因此不少外人同情中共¹⁰。至于延安与重庆的关系，则是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忽热忽冷。

1941年1月，国民政府对新四军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使中共的扩张行动转趋审慎。接着俄德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1942年10月德军已围攻斯大林格勒，苏俄为了稳固后方，重申中苏友好，希望中国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

⁹ 蔡国裕，〈抗战期间中共的阴谋与活动〉，页77-83；前引曹伯一，〈抗战中期中共策略路线之剖析〉，页46，50，62。

¹⁰ 彭承福，〈周恩来在重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页8-12。

国对日宣战后，形成中、美并肩作战的形势，国民政府的地位较前巩固。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决定放弃对中国的平等条约，尤使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初于1941年10月13日派林彪到西安晋见蒋委员长，表达国共「精诚合作」的意愿，并表示愿「依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1942年11月26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强调只要中共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1937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所宣达的政策甚为赞扬，表示将继续「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蒋委员长之抗战纲领，暨国民政府之各种基本法令」，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执行1937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中所提出的四项诺言，协助抗战。毛泽东并向国民党中央派往延安赈灾的郑延卓表示：中国无资本家可言，不能谈社会主义；应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年12月底，俄军将德军逐出斯大林格勒，1943年2月又开始肃清高加索地区的德军，苏俄局势趋于稳定，中共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乃转趋强硬。这年5月22日莫斯科宣布解散第三国际后，毛泽东不直接受苏俄控制，在中国的行动更为自由。一方面，第十八集团军于山东攻击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部，重建的新四军在江苏进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另一方面，周恩来、林彪于1943年3月28日晋见参谋总长何应钦，希望将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抗日战后实施宪政，并以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表示愿派代表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5月4-11日，国民政府代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世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中共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在西安举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的意见为：（1）十八集团军及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扩编为四军十二师；（2）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实施抗战建国纲领、遵行中央法令；（3）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止查扣书刊。是后会谈移重庆举行。6月5日，国民政府提出的意见是：（1）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共军编为四军十师；（2）陕北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3）中共重申遵

行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项诺言。此后到是年 8 月，中共又提新的要求。国共谈判的分歧点是：（1）国民政府仅允共军编为四军十师，中共要求承认共军十六军四十七师，至少要有五军十六师的番号。（2）国民政府允将陕北行政区直隶行政院，其他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区，由各省管辖；中共强调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基地，均应给予自治权。中共态度此时益趋强硬，约有下列的原因：（1）1944 时中共已拥有 47 万军队、220 万民兵，并在敌后建立了十五个根据地，管辖八千八百万人口。（2）1944 年 4 月 17 日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一号作战」，为时九个月，谋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使国军损失惨重。（3）部分由于国民政府在 1942-1943 年间协助使新疆的盛世才摆脱苏俄控制、归顺中央，苏俄开始攻击国民政府不愿抗日、破坏统一战线，建议美国与中共合作迫使国民政府取消封锁共区，并迫使国民党与中共组联合政府。（4）1944 年由于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统帅权之争，使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关系转坏。

1944 年 9 月，美国派赫尔利 (Hurley) 为特使，至中国调整中国战区之统一指挥问题，中共与国民党均欲以赫尔利为调人，促进双方谈判。11 月 7 日，赫氏赴延安，带去国民政府谈判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个军队。」11 月 9 日，毛泽东让周恩来陪赫氏带回重庆的意见是：「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国民政府不接受中共「联合政府」的提议，在 11 月 21 日提出的对案中，应允在中共将其军队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前提下，国民政府给予中共参加军事委员会的资格。12 月 8 日，周恩来函赫尔利表示，国民政府拒绝中共之「最低限度之提案」，无法继续商谈。但 12 月 24 日，周恩来又提出「撤退封锁边区及攻击新四军与江南共军之军队」等项，作为继续会谈之条件。嗣在赫尔利的催促下，中共于 1945 年 1 月 24 日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周恩来此次赴重庆，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俾商组联合政府。2 月 3 日，国民政府提出对案：（1）国民政府拟邀请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2）政治协商会议之任务为研究结束训政之时期、建立宪政政府之方法，并制定军事统一之方案。是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宣布将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制

定宪法，实施宪政。3月9日，周恩来声明：蒋委员长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会谈已告破裂。此时赫尔利对调解工作趋于冷漠，国民政府于6、7月间派宋子文赴苏俄完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中共之谈判地位下跌¹¹。不久，日本投降，中共对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束，进入国共全面斗争的新阶段。

¹¹ 关中，〈战时国共商谈〉，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页262-304；梁敬鎔，〈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同上，页310-326。

第二节 抗战阵营中的国共政权及第三势力

抗战阵营，就党派而论，是由国共两党及其政权，以及第三势力组合而成，兹分述其情形如下。

国民党及其政权

国民党是执政党，抗战时期的政权性质，基本上是战时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中心最初是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8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常务委员九人由主席指定。〈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作为咨询机构，国防参议会议员，由主席指定或聘任。1939年1月，国防最高会议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改为委员长（由合议制改为独裁制），其紧急处分权仍旧；国防参议会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可直接或间接指挥国家军政机构，执行其决策。1941年2月更正式建立行政三联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置中央设计局，负责设计，设总裁一人，由委员长兼任；同月成立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负责考核；党政军各机构，负责执行；依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程式，执行公务。在国防最高会议时期，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同决定国家最高军政事务；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时期，废中央政治委员会。至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始决定撤消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¹。

抗日战争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虽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并可直接指挥党、政、军，但党仍为一切大政方针的发动机关。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由中央执行委员

¹ 马起华，〈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近代中国》35期，页7-14。

会负责党、政、军务之决策及党务之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则负责监督。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战时施政的准则；决议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党的领导中心由合议制的主席制改为独裁制的总裁制，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吸收党员之预备。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五全系于1935年11月在南京召开），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指挥党、政、军；并根据「整理党务」的决议案，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中共党、政、军务活动，若不依政府法令规定，即予以取缔或制裁。

1939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于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未能实行），并通过由总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1940年7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决议于中央党部设立妇女部，以促进妇女运动的发展；决议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审核。1941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于行政院设贸易部（按贸易部未设）及粮食部，并决定实行经济统制，各省田赋由中央接管。其后五届九中全会、五届十中全会、五届十一中全会、五届十二中全会分别于1941年12月、1942年11月、1943年9月、1944年5月在重庆召开，其中于1943年9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使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大会通过〈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的建议²。凡此可以看出，党在国家重要人事及政策方面，仍为极重要的决策机关。国民党在1945年5月召开六大时，有党员692万人³。层级组织遍国内外，兹表列其数目如下⁴：

² 萧效钦，《中国国民党史》，页263-264，275-278，281-282，286-289，292，295，298-300，303，305-306。

³ 陈瑞云，〈抗日战争中国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3期，页90。

⁴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827。

	大后方十 六省市	战地二 十省市	边疆 地区	铁路 公路	海外	归国侨胞
县党部	1,092	859				
市党部	17	4				
总支部					14	
特别党部	11					
旗党部			72			
直属支部					90	
区党部	1,556	2,186	14	196		18
支部					47	
区分部	42,538	16,739	356	1,845		
分部					99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发展，最值注意者为依据 1938 年 4 月临全会决议所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系国民党为训练青年而设，在党的系统之下，由总裁蒋介石任团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于 1938 年 7 月 9 日正式成立，干事会书记长在 1940 年 11 月以前为陈诚，其间朱家骅代理一段时期，1940 年 11 月以后为张治中；监察会书记长为王世杰。除中央团部外，有支团、区团、分团、区队、分队的层级组织。组织的成长可如下表：

年代	支团数	区团数	分团数	区队数	分队数
1938	5	8	40	36	104
1944	25	24	920	10,322	40,836

团员人数，1943 年 8 月时为 39 万 3,190 人，到 1946 年 6 月增至 133 万 8,507 人。三青团的主要活动为文化宣传、社会服务；在从事战地服务和发起青年从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⁵。但由于内部派系倾轧（如复兴社与 CC 派），党团不和，加以中共党人从中运动，造成党内外动荡亦多。到 1947 年 9 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团合并于党⁶。

⁵ 蒋永敬，〈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抗战建国〉，《近代中国》92 期，页 51-65。

⁶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可参考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由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治权由国民政府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行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职权颇为膨胀。至于依据抗战建国纲领所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则为全国最高的咨议机构。国民政府自 1925 年成立以后即采委员制，但由于组织法不断修改，主席的职权有时低、有时高。1928 年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发布政令由国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1931 年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发布政令由主席及相关院长、部长署名；1943 年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复规定国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发布命令由主席及相关院长署名。1931-1943 年间的国府主席为林森，1943 年以后为蒋介石。五院制建于 1928 年，实以行政院为国家大政的中心。1937 年抗日战争发生时，行政院原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教育、交通、海军、实业、铁道九部，另有卫生署及蒙藏、侨务、赈务、建设、经济五委员会。1938 年 1 月修订的行政院组织法，将海军部、铁道部和卫生署裁并；实业部与建设委员会并为经济部。赈务委员会于是年 4 月改名赈济委员会，至 1945 年 1 月撤销，另成立善后救济总署。其间，1940 年 7 月成立农林部，10 月将中央党部社会部移归行政院，同年卫生署自内政部独立而出。1941 年 7 月设粮食部，1942 年 6 月设地政署，1943 年 1 月将司法院之司法行政部移归行政院。1943 年修订的行政院组织法，加以追认。1944 年 12 月又设兵役部。行政院长一职，1935 年 12 月至 1938 年 1 月由蒋介石任，1938 年 1 月至 1939 年 11 月由孔祥熙任，1939 年 11 月至 1945 年 5 月复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成立于 1932 年，蒋介石任委员长。1937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军委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率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军统一指挥。此一职权与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之职权重叠，惟二者皆为蒋一人。军委会组织时有变更，常设的有军令、军训、政治三部，至 1946 年 5 月军委会改为国防部。

国民参政会系为配合抗战之需要而成立的咨议机构，起源于国防参议会。抗日战争开始后，于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选聘各在

(1938-1949))，(1996 年 6 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另参考朱高影，〈三民主义青年团之研究 (1938-1947)〉(1992 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页 90-197。

野党领袖以及若干有独立政治主张的人士共二十四人为成员。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会决定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举行，这届参政员共200人，其中男190人，女10人；平均年龄五十岁；职业以教育界59人、政界54人、党务37人为最多。国民参政会到1947年5月结束，共历四届，举行了十三次大会。国民参政员，第一届由遴选产生，第二、三、四届，部分由省市临时参议会选举，部分由遴选产生。国民参政会对政府施政有提案权、审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和预算权，略具有国会的功能。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令下的地方行政，系对原有的训政办法加以调整。1940年开始实行新县制，明定县和乡为自治单位，县设参议会，乡设乡民代表会，县长由政府委派，县参议会则由乡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乡长亦由乡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乡以下行保甲制，保长由保民大会选举，保民大会每户出席一人；甲长由户长会议选举⁷。

抗战时期的施政准则为〈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系由国民党临时全会通过，经国民参政会认可。总则的内容包括：（1）确定三民主义暨孙中山的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2）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在外交方面，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在军事方面，训练全国壮丁，实施民众武力。在政治方面，组织民意机关（即国民参政会），以县为单位，训练民众自卫能力，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在经济方面，以国防、民生为目的，实行计划经济。在民众运动方面，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教育方面，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之需要⁸。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所实行的战时体制，除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党政制度以外，最具体的是在军事一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1934年10月共军主力自江西出走以后，决定为国家整编60个师，预计到1938年完成。每师1万4483人，60个师共86万8980人，

⁷ 前引马起华，〈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页14-35；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页199-206；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页100-106。

⁸ 〈抗战时期「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之经过〉，《近代中国》72期，页4-13。

假想敌为日本。据当时的了解，日本常备兵仅 17 个师团（一师团约当中国一师），约 25 万人，战时可增至 40 万人。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以加倍的兵力对付日本。1935 年下半年，开始整编十个师，接着又整编十个师，到 1936 年底完成。1937 年上半年、下半年各预计整编十个师，但下半年的计划尚未提出，七七抗战爆发，整编计划中止⁹。当时全国陆军部队 200 万人，步兵共 183 个师，60 个独立旅，43 个独立团，大多未整编。部队随伤亡随补充，到 1941 年 8 月止，伤亡人数共达 240 万人，部队总人数则增至 500 万人。军事委员会于 1937 年 8 月 20 日组统帅部（对外仍称军委会，对内称大本营），以委员长为元帅，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至 1938 年 1 月，参谋总长易为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各战区、各行营、各绥靖公署、各路军及各军。战区十二：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后由程潜接任；第二战区：晋、察、绥，司令长官阎锡山，副朱德；第三战区：苏南（江南）及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副顾祝同；第四战区：闽、粤，司令长官何应钦，副余汉谋；第五战区：苏北（江北）及鲁省，司令长官李宗仁，副韩复榘；第六战区：津浦路北段，司令长官冯玉祥；第七战区：南京及附近，司令长官刘湘（第七战区后移广东）；第八战区：绥、宁、甘、青，司令长官蒋介石兼，朱绍良代；第九战区：湖北、湖南两省，重点在武汉及附近，司令长官陈诚；第十战区：西安及其附近，司令长官蒋鼎文；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行营有五，皆设于战前：南昌行营主任熊式辉，广州何应钦，武汉何成濬，重庆顾祝同，西安贺耀组（后易蒋鼎文）。绥靖公署有十，亦皆设于战前：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川康刘湘，川康黔边区徐源泉，滇黔龙云，甘肃贺耀组，豫鄂皖刘峙，江苏于学忠，广东余汉谋，广西李宗仁，冀察宋哲元。各路军于战前先后设者十余，军的番号七十余，不备举。另外，1937 年 8 月至 1941 年 8 月，编成 39 个集团军，1938 年 6 月至 1938 年 9 月编成 38 个军团；许多军团隶属集团军，而军团所辖之军，又多与集团军重复，编制颇为混乱。前述战区、行营、绥靖公署、集团军，军团、各路军及军的变化甚多，兹不备述。另外，抗战期间，又设有

⁹ 刘凤翰，〈整编陆军抗日御侮〉，《近代中国》47 期，页 152-171。

闽绥靖公署，以陈仪为主任；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以谷正伦为主任。又设有昆明行营，以龙云为主任。设置之任务，不尽相同¹⁰。

抗战时期的兵源，系征募制并行，初于各省设兵役管区司令部，1941年全国有109个师管区。抗战八年期间，各省征募兵额一千四百余万人，四川占18.36%，河南占13.51%，湖南占11.18%，其他百分比的高低依次为江西、广西、陕西、广东、湖北、贵州、安徽，浙江、福建、甘肃、云南、山西、江苏、山东、西康、宁夏、青海、绥远。历年征募兵人数：1937年100万8,310人，1938年165万8,915人，1939年197万5,510人，1940年190万8,839人，1941年166万7,830人，1942年171万1,832人，1943年166万6,918人，1944年151万2,352人，1945年93万9,227人¹¹。征募之新兵，初由各部队自行教育，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下设有补充兵监，负责拟定各期兵员补充计划及其教育要领。1938年军训部成立，补充兵监裁撤，各地成立补训处，各师复有补充兵团的编制。新兵训练的内容为射击、掷手榴弹、冲锋和白刃战、行军能力、新式兵器。除新兵训练外，另有军官及干部训练。军官教育有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两种，养成教育设有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分为两个阶段，入伍生教育一年半，学生教育二年。召集教育，系召集在职军官，给予深造；抗战期间，共召集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万7,577人，行伍军官8万4,235人。由于战争伤亡重大，部队不断膨胀，抗战期间国军中下级干部（包括军官），甚嫌不足。据估计，1937年时，中下级干部80%出身军校，但到1943年时，出身军校的已降至27%。为提高干部素质，1940年春各战区奉令成立干部训练团，每军或师成立干部训练班。另外，步兵学校也曾于各地办巡回教育班，以加强干部教育¹²。

除党、政、军方面的部署以外，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全大会期间，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中统的组织，到1942年扩大为三组、三处、五室、四会，调查员人

¹⁰ 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

¹¹ 容鉴光，〈抗战时期的兵役制度〉，《近代中国》60期，页245-263。

¹² 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

数约三千人，另有通讯员约十万人。军统的组织有八处、四室、四会¹³。军统于1943年5月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美所），由戴笠任主任，美人梅乐斯任副主任，在中美所任职的美国人约二千人。该所下设军事、情报、气象、行动、交通、心理、经理、医务、总务等九个组和一个总办公室、一个总工程师处。该所在福建设立东南办事处，管辖上海、定海、漳州、闽侯四个情报站，并在福建漳州和建瓯、浙江瑞安、广东梅县、江西修水、安徽临泉、湖南南岳、贵州息峰、绥远陕坝等地办理特务训练班¹⁴。

国民党除动员人力、物力外，也注意到社会的精神层面。1934年2月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抗战期间继续推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使民族道德重振、国民生活革新。具体的内容是：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行之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切行动，都要合乎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抗战期间从事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童婴保育、金钱捐助、物品征募等工作，颇能鼓舞民心士气。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复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标举三个口号：（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此外则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救国之道德，以完成建设三民主义国家为建国之信仰。在精神改造方面，要求改正醉生梦死的生活、养成奋发蓬勃的朝气、革除苟且偷生的习性、打破自私自利的企图、纠正纷歧错杂的思想。在实施的项目上，有取缔一切不当娱乐、鼓励国民毁家纾难、取缔有碍抗战之论争及非法活动等¹⁵。

在精神动员方面，新生活运动偏重于生活层面，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则较偏重政治层面。进入1940年代，一方面由于抗日的工作愈来愈艰苦，另一方面由于抗日阵营的整合愈来愈困难，国民党进一步从文化道统上，建构领导国家的地位。1943年3月，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国民政府并下令全国各机关、团体、大中学校及军队官兵「一律通读」。该书以四维八德为中国立国之根本、三民主义为中国固有文化之精髓、国民党是中国民族复兴

¹³ 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页93；陈楚军、俞兴茂，《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页11。

¹⁴ 萧效钦，《中国国民党史》，页300-301。

¹⁵ 李长贵，〈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近代中国》35期，页72-87。

的唯一希望，强调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谓「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同时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是抄袭、附会苏俄思想，「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并且抨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割据」¹⁶。该书出版后，各方评论不一。就国民党而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建立统治国家的基础，是鼓舞民气、结合民力的一种方式，不仅用以抗日，且用以反共。

中共及其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及其政权，亦可从党、政、军、特及文教、社会方面加以说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运作，本于 1928 年六大会所修订的党章。依据该党章，党为中共最高的权力机构，权力的来源系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为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下辖各部及有关委员会。决定政治事务者为政治局。中共六大会系于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重要的政治决议案是：（1）驱逐帝国主义者，（2）推翻土地私有制度。大会通过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 36 人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候补 13 人），选向、周、项、张、瞿、蔡（10 月 4 日由李取代）等人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召开一中全会，以向忠发为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1929 年 6 月召开二中全会，通过消灭反对派（指托派）在党内活动，至 11 月 15 日开除陈独秀（托派）党籍。1930 年 9 月召开三中全会（在庐山），决议停止进行城市武装暴动。是年 10 月 3 日，政治局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任常委。1931 年 1 月召开四中全会（在上海），开除李立三等中委，改选陈绍禹、张闻天等为中委，政治局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任军事部长，张闻天任农民部长，秦邦宪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嗣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任常委。1931 年 6 月向忠发被国民政府逮捕处死，政治局主席易为陈绍禹。嗣陈绍禹赴俄，是年 9 月以秦邦

¹⁶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页 816-818。

宪为政治局主席。是年 11 月，置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其后由于干部多人被国民政府逮捕，中共中央于 1933 年 1 月正式自上海迁瑞金，以政治局常务委员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1934 年 1 月召开五中全会（瑞金），毛泽东、朱德未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35 年 1 月中共于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军事指挥总责，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及常委。2 月 5 日前后，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由张闻天继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任。是年 10 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中央职务有所调整，但张闻天仍负党内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组织。1936 年 12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937 年 8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1937 年 10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陈绍禹返回延安，改组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陈绍禹、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等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仍为军委主席。1938 年 10 月，召开六中全会（在延安），在发展路线上，陈绍禹与毛泽东发生争论，陈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毛则主张「独立自主」，最后毛胜利。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肯定毛泽东路线之正确。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召开七全大会，通过政治决议，继续推动「联合政府」，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 44 人为中央委员。6 月 19 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通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13 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¹⁷。除中央组织外，中共在各省也发展组织。据 1938 年 9 月的资料，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以南的 13 个省，包括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先后建立了省执行委员会或省工作委员会。除军中

¹⁷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页 2-3，99-100，第三编，页 130-131，149，160，166-167；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册，页 33，38，43，45，48，118，141，159，163-164，182-183，374-377，435-437，第 3 册，页 13，18，98，247，257-258；蔡国裕，《中共党史》第 1 册，页 235-240，282-2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页 142-146，190，200-201，213-214，272-274，294，331，378，607-610。

党员不计外，全国党员有六万七千多人¹⁸。

中共的政治组织，在江西时期，于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抗战期间，政治组织以实行于陕甘宁边区者为主。此一边区，系1927年以后，谢子长、刘志丹等加以经营，1932年底成立红二十六军，到1935年9月与自鄂豫皖根据地突围而来的红二十五军会合，成立十五军团。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陕甘宁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任为秦邦宪，下设七部一局，辖陕西省、陕甘省及关中、神府、三边特区。1936年5月，中共陕甘宁代表大会改陕甘宁苏区为陕甘宁边区。1937年9月，中共以实行三民主义、接受蒋委员长领导为条件，正式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设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任命林伯渠（祖涵）、张国焘为正、副主席，比照省级单位，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辖18县，计陕西16县，甘肃1县，宁夏1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其后不断扩张，1937年12月，增至23县；1941年11月，增至29县；1946年增至32县。陕甘宁边区共选举三次参议会，第一次在1939年1月，第二次在1941年11月，第三次在1946年4月，皆选林伯渠（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直到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始取消¹⁹。除边区政府的选举外，尚有县级及乡级的选举，共举行三次，第一次在1937年5月至11月，第二次在1941年1月至11月，第三次在1945年3月至1946年3月。当地由于地广人稀、文化落后，采取十多种不同的选举方式，选举的方式主要的有：（1）开会选举：按自然村开选民大会，当场投票、开票、宣布选举结果。（2）背箱子选举：在聚落分散、不便召开选民大会的地方，由选委会派人背着加锁的箱子，挨户投票。县与乡的参议会选出后，即由县与乡的参议会选出县长和乡长。惟联合数县的专员区，和联合数乡的区，没有参议会的选举，专员和区长皆由上级机关委任。无论边区、县、乡的选举，凡年满十八岁以上，只要没有卖国行为或经判

¹⁸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61。

¹⁹ 王自成、胡新民，〈陕甘宁边区历史简述〉，《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页122-126。

决有罪被剥夺公权，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²⁰。

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选举，与苏维埃时期的选举有许多不同：其一、在选举资格上，在苏维埃时期，地主、富农、资本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边区政府时期，则无此限制。其二、苏维埃时期的选举分中央、省、县、区、乡（市）五级，每级皆有苏维埃大会，选举其政府；边区政府的选举只分边区、县、乡（市）三级，边区相当于省。其三、苏维埃时期，乡（市）苏维埃大会选出区苏维埃代表，区苏维埃大会选出县苏维埃代表，余类推；边区各级参议会，皆直接由民选。其四、在苏维埃时期以及边区政府初期，被选入政权机关的人民代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到1940年3月毛泽东为了统战的需要，提出三三制的构想，即在选出人员的分配上，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汉奸和反共分子则不能参加政权。此一构想，在1941年5、6月间的乡级选举中，即加实行。全区选出的三万多乡级参议员中，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强。共产党员超出此数的地区，则由党员申请退出，由落选的非党员递补²¹。

中共的行政区，除陕甘宁边区外，尚有不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于抗战时期自我发展出来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要的有：（1）晋察冀边区：成立于1938年1月，设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在冀晋边境的阜平，平型关东南），1943年1月成立边区参议会。（2）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于1941年，辖行署4、专署26、县198。（3）山东根据地：自1938年以后陆续建立了鲁中、滨海、鲁南、胶东、渤海五个独立区，设有19个专署、96个县政权。（4）晋绥边区：于1939年以后发展而成，1942年选举参议会，并设专署及县。（5）华中根据地：1938年以后陆续建立了苏北、淮北、鄂豫皖、苏中、淮南、皖中、苏南、浙东八个区，设行署7、专署20以上、县政权147。另外，1938年以后活动于广东东部的东江纵队、1939年以后活动于海南岛五指山的琼崖游击纵队等，亦皆建立各级政权²²。

²⁰ 任学岭，〈浅谈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延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页53。

²¹ 李云峰，〈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及其特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页90-91；王志民，〈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页75-77。

²²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页331-381。

中共的军队，抗战开始时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共军主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为十八集团军；散处于长江南北的共军则改编为新四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〇师，以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九班，士兵约七、八十人。总计不过一万二千人。共军改编后，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由山西向绥远、河北、河南、山东发展。1937年11月一一五师的一部分成立晋察冀军区，到1940年冬发展至五万人。吕正操（原为东北军五十三军的团长）号召东北军旧部，成立冀中军区，至1940年冬发展到二万八千人。1938年冬一二〇师的一部分成立冀东军区，一度发展至万人，后被日军扫荡瓦解。1938年一二九师的一部分成立冀南军区，兵力发展到一万八千人。1937年冬一二九师的一部分成立晋冀豫军区，至1940年冬发展到一万六千人。1938年一二九师的一部分在山东成立山东纵队，到1940年发展至七万人。加上陕甘宁边区的共军，在1940年底约40万人，1945年春约60万人。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其发展情形亦如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1月初编时，不过一万二千人，在苏南以茅山（句容县东南）为中心，在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到1940年发展到十万人，遍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七省。1941年1月初，新四军以抗命被国军围歼近万人，尚余九万人，中共重新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将此九万人整编为七个师，第一师在苏中，第二师在淮南，第三师在苏北，第四师在淮北，第五师在鄂赣湘皖，第六师在苏南，第七师在皖中。到1945年春，发展到26万人。另外，广东的东江纵队和海南岛的琼崖游击队，到1945年春也发展到二万余人²³。

中共的特务组织初名政治保卫局，到1938年11月以后，改为中央社会部，康生任部长。中央社会部直隶中央政治局，各地之中央局、

²³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217-223，第4册，页15-23，151-160，221-22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47-148。

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特委、地委、县委，均陆续设社会部，区委设社会干事，支部设社会委员。中央社会部除部长外，设有五室一处。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又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康生副之，以布置敌后之情报特务工作为中心。中共军中之特务工作设在政治部内，政治部内之锄奸部和敌工部，皆为特务组织。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报机构，在1942年以前设保安处，县设保安科，区设保安助理员，乡设锄奸主任、锄奸小组等。据1939年1月统计，陕甘宁边区有七百个以上锄奸委员会、约九千个锄奸小组，包含十多万锄奸组员。1942年以后，保安处改为公安局，县亦设公安局或公安分局，区设治安员或公安员，乡设治安委员或治安委员会，重要集镇或交通要道设派出所²⁴。

在文教方面，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自办的文教机构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自然科学学院、青年干部训练班等²⁵。

在社会方面，自1939年冬起，中共在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将原租额减少25%，名「二五减租」；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为一分，不得超过一分半²⁶。

为了严整政治和社会秩序，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是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整风运动的本质是思想斗争和反奸斗争，把不满分子当作国特或托派加以惩处。整风开始时，中共强调民主，号召大胆讲话，要求「议论纷纷，言者无罪」，为的是发现不满分子，然后即加以迫害整肃。迄于1944年底，有四万多名共产党员受到杀害，或谓全部遇害人数达十万人或数十万人²⁷。

抗战阵营中的第三势力

²⁴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250-252。

²⁵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59，171。

²⁶ 同上，页170。

²⁷ 同上，页198-203；郭华伦，《中共史论》第四册，页264-284。

抗战阵营中的第三势力，没有政权，没有军队，没有特务，虽然大部分加入党派，党的组织也很松散。他们有些较接近国民党，被指为右派；有些较接近共产党，被指为左派。但他们自认站在中间，无论与那一党派接近，都是为了抗日或民主的理由。抗战时期第三势力的活动约可分为两期，1937-1941年为第一期，较活跃的有八个党派，即青年党、国社党、村治派、职教派、救国会派、中华民族行动解放委员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致公党。当时的主要课题是抗日与反共。1941-1945年为第二期，前述最后两个党派与国民党渊源较深，或仍保独立，或另谋发展；其余三党三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至抗战结束前后，又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九三学社等组合。当时的主要课题是联合政府和党派会议问题。在第一个时期，各党派除主张积极抗日、并在国民党的建国程式下推动宪政外，与国民党接近的政党希望共产党放弃地盘、放弃军队、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真正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与共产党接近的党派则希望只要抗日就好，谁也不领导谁，国民党更不应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在第二个时期，各党派除主张积极抗日外，多不主张照国民党的建国程式行宪，而附和共产党所提，先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再研究行宪方式。战后国民政府举行多党派的政治协商、并引他党人士入阁，即由此而来。

1937 至 1941 年的第三势力

此处仅述八大党派的活动情形：（1）青年党：1937年7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在庐山召开党派及名流谈话会，青年党有代表参加。1937年8月，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被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7月，增聘余家菊、陈启天、常乃惠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青年党在成都办有《新中国日报》、「国魂书店」及《国论》杂志。左舜生曾于抗战初起时，组上海教育界抗敌后援会，率青年党同仁从事宣传、募捐、救济等工作。青年党反共态度较强，但李璜等曾主张与中共接近。（2）国家社会党：1937年7月张君勱应邀参加庐山谈话会。1938年8月，张君勱、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梁实秋、陆鼎揆等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该党机关报《再生》

杂志，于抗战时移重庆出版。1938年12月，张君勱曾为文鼓吹军权统一，要求共产党取消特别区、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3) 中华民族行动解放委员会（解委）：1937年10月，章伯钧等自香港回到南京。1938年3月在汉口法租界召开第三届全国干部会议，到者三十余人，推章伯钧为总联络人。8月，章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谋求解散解委，无结果；共产党周恩来等则与解委加强联络。解委于1938年2月、4月先后在武汉创刊《抗战行动》旬刊及《前进日报》为机关报（1945年2月又在重庆创《中华论坛》半月刊），其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反对抗战高于一切，认为实现民主才能发挥抗战力量。新四军事件发生，解委重要领导人彭泽民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抗议。1941年3月，解委被中共评估为「与我党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解委于1937-1938年在河北、山西等地组有抗日游击队，多为日本消灭；解委在武汉时期，也曾组织「黎明剧团」，从事抗日宣传。(4) 村治派：1937年7月受邀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梁漱溟、晏阳初，先后受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村治派原欲以乡村建设对抗中共的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抗战期间，则与中共颇接近。1938年梁漱溟曾在河南集合自山东撤退之乡建人员，加以整训，由政府派回山东从事抗日游击工作。1939年晏阳初、梁漱溟等在重庆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继续其乡建工作。(5) 职教派：1937年7月黄炎培受邀参加庐山谈话会，次年受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教社人员于抗战开始时协助上海工厂内迁，动员车辆数百为前线运送粮秣弹药，并办职业补习学校，训练无线电、护士等人才，参与抗战实际工作。职教社于1938年9月、1939年7月先后迁桂林、重庆，并先后于广西、四川、云南、湖南、贵州、香港、西康等地设办事处。1940年4月，黄炎培在重庆成立「国讯同志会」，但国民党未予承认。职教社原以《国讯》为宣传机关，到1943年7月办国讯书店，1945年1月又办《民主周刊》。职教社的重要参与人有黄炎培、江问渔、钱永铭、卢作孚等。职教派虽与中共多所往来，支持抗战不分国军、共军，但由于坚持抗战第一，并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政府，被中共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6) 救国会派：1937年7月31日，救国会七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被

释。8月3日应邀去南京向政府表达其对抗战的意见，沈钧儒受聘为国防参议员。1938年7月，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王造时、张申府受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时期，救国会成员于各地参加抗战工作，又曾以上海救亡协会、中国抗敌总救亡会、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十七人座谈会、蚁社、中国青年救国团等名义从事活动。救国会派的宣传刊物有《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创于上海）、《全民周刊》（1937年11月创于武汉）、《全民抗战》（1938年7月创于武汉，是年10月移重庆）、《国民公论》（1938年9月创于汉口，先后移重庆、桂林）、《救亡日报》（1938年9月创于武汉）、《大众日报》（1938年创于武汉）等。另于全国各地办有生活书店五十多家。救国会派并在各地办生产合作社，分布于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及大后方，总计达三千家。救国会派除章乃器曾于抗战初起时著文，号召只谈抗战、不谈政治主张以外，一般均宣传抗战需要民主，与中共的方略接近。新四军事件发生后，沈钧儒等不仅著文批评国民党破坏抗战，且在国民参政会中与中共籍的参政员联合，退席抗议。故1941年3月救国会派被中共评估为「与我党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到1942年7月产生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时，救国会派的六位参政员，皆未被国民政府遴选。

(7)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重要成员多出身军官，抗战开始即为国民政府网罗任用。1937年8、9月间，蔡廷锴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议官，李济琛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官，蒋光鼐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官。李、蔡、蒋等为促进政治统一，于10月宣布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但这些重要成员仍笃信民主对于抗战的重要性。后来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等在桂林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陈铭枢则在重庆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8) 致公党：为美洲及南洋华侨所组，抗战开始后，除部分华侨回国投入战场外，主要的抗日活动为宣传、慰劳及捐款。在宣传方面，有《华侨日报》、《华星日报》、《星槟日报》等。在慰劳方面，如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行五十余人，先后到了四川、陕西、湖北、江西、云南、贵州、浙江、福建、甘肃、青海、绥远等省慰劳视察，对陕甘宁边区有良好印象。在捐款方面，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南洋各地组织了68个筹赈分

会，从抗战爆发到 1942 年新加坡沦陷为止，南侨总会捐款金额达国币 26 亿元²⁸。抗战八年，美国华侨共捐款 2 亿美元，其中致公党领导人司徒美堂等领导的募款活动，共捐得五千四百多万美元²⁹。

1941 至 1945 年的第三势力

1937 至 1941 年间的中间小党派，个别行动多，联合行动少，但促成联合的因素，不断在增强：（1）1938 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会内各重要党派几乎皆有代表，中间党派与中共在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方面，有较一致的看法，易于采取联合行动。（2）中共中央为争取中间派，于 1940 年 12 月 2 日发出指示，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负责进行有关各党派及地方士绅、各派文人的统战工作，并规定要把各党各派、地方实力派及各种友军，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由于中共的诱导，一方面为了自身发展壮大需要，乃逐步走向结合之路。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于 1939 年 9 月 19 日正式公布，中共于 9 月 26 日发出号召：「我们号召全国人民积极的起来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正确的决议，展开实施民主政治的全国的运动。」这是中间党派与中共联合的重要起点。依照一届四次参政会决议所组织的宪政期成会于 1939 年 9 月 20 日在重庆召开，参加者有张君勱（国社）、张澜（无党派）、史良（救国）、黄炎培（职教）、左舜生（青年）、李璜（青年）、董必武（共产）、罗隆基（救国）、章伯钧（解委）等 25 人。是年 10 月 1 日，张澜、沈钧儒（救国）、张申府（救国）、章伯钧、李璜、左舜生、张君勱等 25 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迄于 1940 年 3 月共集会八次。在 1939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第四次座谈会上，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在 11 月 30 日的筹备会中，推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张申府等 25 人为常委。在各党派联合推进宪政运动的过程中，1939 年 9、1 卜 12 月，黄炎培、

²⁸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 220-288。救国会另参考姜平、高华，〈救国会派在八年抗战中的抗日民主运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 年第 4 期，页 72-77；彭泽民、宋庆龄等为新四军事件抗议事，见刘显才，〈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 1 期，页 98-99。

²⁹ 彭秀珍，〈试述抗战时期我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与贡献〉，《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 年第 2 期，页 33。

梁漱溟（乡建）、章伯钧、沈钧儒、张澜等在重庆集会，商组统一建国同志会。到11月23日正式成立，选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为常务干事，黄炎培为主席，基本信约为宪政、民主和反对内战。在宪政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1月决定于1940年11月召开国大，以安定人心。在此前后，国民党已设法排除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当时救国会派最活跃，且与中共最接近，自1940年5月后，即传言救国会派将在重庆暴动，因此国民党对救国会派的活动特别留意。迄1941年2月下旬，各地生活书店分店五十多家先后被关闭，生活书店重庆总店亦遭查封，书店负责人邹韬奋以此辞去国民参政员，离重庆往香港。另一方面，到1940年9月，国民党以交通不便、国大召开困难，将原拟于11月召开的国大延期。1940年12月下旬，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发表之后，各党派人士频频聚会，希望能「联合同心，进而推动（国共）两党团结抗敌」，并「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1941年1月，发生新四军事件，不仅使中共有危机感，各中间党派亦不愿见日本大敌当前、国共操戈。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与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等聚谈；在此前后，中共党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祖涵）、邓颖超等广泛与各中间党派接触。中共表示支持中间党派联合起来，「莫被各个击破」。在中共支持下，各中间党派在前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当时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行动解放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到1942年初又有沈钧儒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加入，形成三党三派的政治集团，但各仍保有原来的党派。政团同盟的基本纲领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标举「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纠正国共两党党政军不分的弊病，表达了中立的立场³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限制结社，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

³⁰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07-328；李仲英，〈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哲社版》，1981年第5期，页77-78。

时，国民党仅怀疑成员之一的「救国会」是中共的外围，虽不高兴，尚能默许。主要原因有二：（1）当时各党派团结抗日的阵线结成未久，国共间的冲突不大，中间党派的偏左立场未显。（2）党名「统一建国」很合当时的需要，而信约中又特别标明「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³¹。到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国民党曾事先设法阻挠，不欲其实现，主要的原因有二：（1）新四军事件后，国共裂痕扩大，中间党派大多同情中共。（2）党名「民主政团同盟」，有与国民党对抗之势。由于国民党不允许结党，成立大会乃采秘密方式。成立之后，并未立即在重庆公开，决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公开政团同盟的组织及纲领主张，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和支持。1941年3月29日，梁漱溟离重庆赴桂林，于5月20日飞香港，与在港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共等方面的人士接洽，最后决定由职教派、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乡建派、中共以及四川实力派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云南实力派龙云（省主席）等共同出资，在香港登记，创办《光明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创刊，到10月10日以刊登广告的方式，正式宣告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渝成立，并刊登了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另一方面，张君勱、左舜生、黄炎培等于10月9日在重庆接受蒋介石邀宴时，将组织政团同盟事面告蒋介石。此事引起国民党与中间党派之间的紧张，黄炎培将主席的位置让给无党无派的张澜。11月16日，政团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在重庆举行公开组织的茶话会，国民党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中共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等都参加。国民党人参加的目的应是观察而不是祝贺，因为国民党认定民主政团同盟为颠覆政府的集团，立法院院长孙科更在香港宣称：民盟是中共的第五纵队。另一方面，中共则对民盟的组织大为支持。10月28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民主政团同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民主政团同盟在云南的活动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支持；昆明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所在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甚多，黄炎培、罗隆基等都先后去云南活动。到1943年5月，民主政团同盟即在昆明成立支部，

³¹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18。

吴晗、闻一多等都先后入盟。民主政团同盟在广西的活动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琛的支持，到 1942 年 7 月间即在桂林组成以梁漱溟为中心的核心小组（1941 年香港沦陷，梁漱溟等自香港至桂林）。民主政团同盟在四川的活动受到四川实力派刘文辉（刘为二十四军军长，到 1944 年 4 月任川康边防总指挥）的支持，张澜并亲自吸收刘文辉等入盟³²。

在民主政团同盟发展的过程中，1943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在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大（原已决定延期），聘黄炎培、梁漱溟、王造时、周恩来、董必武等 54 人为宪政实施协进会委员。1943 年 10 月 5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虽指国民党筹备宪政为骗人的幌子，但中共中央仍决定推动此一宪政运动，「以期吸收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1943 年 11 月 23 日，职教派的黄炎培联合共产党人张志让等筹办《宪政月刊》，到 1944 年 1 月 1 日正式创刊。《宪政月刊》社与职教社原有的国讯社于 1944 年 1 月至 9 月间，共举行了九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者来自各党各派，中共党人董必武等在座谈会上不仅就宪政问题发表意见，而且还赞扬中共占领区内「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新气象」。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一文，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并重选国大代表；认为国民党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应该看看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结果，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名之为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下，必须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1944 年 5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要求在野党合法存在、民主宪政不可向战后推宕。此期间，成都有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成立，昆明有宪政研究会的成立，均发表主张，要求立即实现民主。1944 年 9 月，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对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称为一号作战）正进行反击，战场连连失利，9 月 15 日中共籍参政员林伯渠（祖涵）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振奋全国人心的主张，受到各中间党派的支持。

³²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 328-340；李茂盛、宋捷燕，〈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转变〉，《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 年第 1 期，页 69；江峡、曾成贵，〈论抗战时期我党对中间派的态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 年第 2 期，页 46。

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受推为民盟主席的张澜，代表民盟发表谈话，赞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主张联合政权。」10月10日民盟正式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改组后的民主同盟，取消三党三派的限制，每人皆以个人名义加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勱、张东荪、潘光旦等13人为中央常委，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君勱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10月广东省支部在梅县成立，李章达为代理主任委员；11月四川省支部在成都成立，李璜为主任委员；同月，云南省支部在昆明成立，罗隆基为主任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等为执行委员；1945年春，华北总支部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为主任委员；是年2月，西北总支部筹委会在西安成立，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民盟的迅速发展，对国民党构成压力。从民盟发展的历史看来，民盟不仅在抗战和民主问题上，与中共的想法和做法较为一致，而且许多言行都与中共站在一边。民盟重要成员之一的沈钧儒，1942年曾担任43家书店和出版社的常年法律顾问，当时国民党特务时有抓捕《新华日报》送报生等事，沈即代表《新华日报》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华北的民主政团同盟人士，曾于1943年6月与八路军订立〈抗日建国同盟互助协定〉，标举「协助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并建立「三三制政治的新中国」³³。国民党指民盟为中共的同路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共于1944年9月正式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前，民盟与中共在表面上仍在国民参政会内外支持国民党的宪政布局，只是对国民党不能立即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表示不满，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到中共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中共和民盟即脱离国民党的宪政布局，另以中共主导的「联

³³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43-360；前引李仲英，〈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页80；前引刘显才，〈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页99-102；前引李茂盛、宋捷燕，〈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转变〉，页70；郑会欣，〈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页86-88。

合政府」方式，以民主为课题，抵制国民党的宪政措施。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由延安赴重庆，临行发表声明，谓此行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如何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1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嘱联合各党派，召开党派会议，以抵制国民党所推动的国民大会。当晚，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的王世杰、孙科、邵力子等，以及民盟的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等会谈，周恩来提出「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即获得在场人士的赞同。2月2日，周恩来、王世杰将共同起草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草案，分别交给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谓「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并谓可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3月2日，王若飞邀请民盟人士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在沈钧儒住所会谈，要求支持中共的主张，当即得到认可。3月10日，民盟发表主张，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此后中共和民盟发动一连串的运动，呼吁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中全会，会中主张组织临时联合政府，发布民主政纲：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再组织正式联合政府。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中全会，拒绝中共联合政府的要求，坚持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于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将于7月7日召开、预备讨论国民大会召集事项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为了打开国共僵局，民盟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褚辅成，以及学者傅斯年等六参政员于7月1日在王若飞陪同下飞延安访问，并于2、3、4日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作三次正式商谈，最后达成两点协议：（1）停止国民大会进行，（2）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并建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召集，代表人数国民党、中共、民盟各占三分之一，讨论的主题为民主改革紧急措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施政纲领和召集国民大会。7月5日，六参政员返重庆，7日参加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并将上述协议要点提交蒋介石。会后，

民盟于7月28日再次声明，要求举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反对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事实上，为缓和抗争，有关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中没有决定³⁴。到抗战胜利后，国共进一步谈判，乃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³⁴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87-397。

第三节 抗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几个政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陆续侵占中国的土地，陆续成立傀儡政权，以实行以华制华政策。1932年3月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溥仪为首。1935年11月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成立，殷汝耕为首。其后日本进兵内蒙，使内蒙王公离心离德。1936年5月蒙古军政府在察哈尔嘉卜寺成立，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秘书长。是年7月，国民政府设立察境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以德王为委员长，加以羁縻，然德王仍反抗中央，1937年1月自称蒙古政府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察绥、华北、华中大部地区。1937年9月，日本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杜运宇为首。是年10月，日本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为首；在察省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德王为首；在绥省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云王为首。是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王克敏为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取消。1938年3月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为首，同年9月移南京，并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谋使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合流。1939年9月，日本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为主席。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上述诸傀儡政权中，以溥仪的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重要，此处仅介绍这两个政权。

溥仪的满洲国政权

满洲国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所建的第一个「新国家」。日本欲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计划，至迟在1931年7月10日即由日本特务转告时居天津的溥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沈阳事变，为日本在东北建立「新国家」的第一个步骤。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

天，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商谈以溥仪组织傀儡政权问题，并告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第四天，即9月22日，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等在沈阳开会，继续讨论此问题。接着即陆续在东北各地建立小政权。在辽宁方面，袁金铠于1931年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名辽宁省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8日宣布脱离与张学良的关系而独立。12月16日，臧士毅出任奉天省长。在吉林方面，日军于9月26日建立吉林长官公署，由熙洽为长官。黑龙江方面，张景惠于9月27日在哈尔滨成立治安维持会，到1932年1月1日宣布与张学良断绝关系，就任黑龙江省长；而在洮南、索伦一带的张海鹏，早于1931年11月1日即叛离张学良。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到天津会晤溥仪，谓「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溥仪对建立新国家没有兴趣，坚持要恢复大清皇朝；土肥原说「没有问题」。11月11日，溥仪随土肥原离开天津、前往大连。1932年2月17日，张景惠、熙洽等在沈阳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决定建满洲国，以长春为首都，推溥仪为执政，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为国旗；五色代表满、汉，蒙、日本、朝鲜五族。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次日与日本订约：（1）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委诸日本管理，经费由满洲国负担。（2）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委诸日本管理。（3）日人得充满洲国官吏，其保荐、解职由关东军司令决定。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为皇帝¹。

满洲国在形式上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制，依据1943年的资料，于皇帝之下置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国务院下置军事、民生、文教、外交、司法、兴农、经济、交通八部。地方行政区划，1932年置十省，1934年增加四省，1937至1941年间又增加五省，共十九省，省以下置县。实际上，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日本在满洲国有所谓「四头政治」，关东厅管政治，关东军司令部管军事，各地领事馆管外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管经济；关东军司令部尤为权力的中心，设有第四课，专门负责满洲国政府内部的操纵和控制。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关

¹ 姜念东，《伪满洲国史》，页84-148；刘庭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设置殖民统治伪政权机构简况〉，《历史教学》，1983年第10期，页57-58。

东军不过万余人，到 1941 年 7、8 月间增加到百万人，其后关东军支持各地作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仍有七十万人。满洲国自身的军队，在 1934-1941 年间不过八万人左右，其中日本的军官和职员由一千八百人增到八千人。日本不仅控制满洲国的军队，亦控制满洲国的政府。满洲国政府的官员共约六百人，日人占一半以上。而自 1939 年起，日本又在满洲国皇宫设置日本神道的社坛，供溥仪皇帝每天朝拜。日本视满洲国为「日本国国土的延长」、「大陆的日本国」，不仅对满洲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严密控制，并大量向满洲移民。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迄于 1936 年 7 月间，共有武装移民五次，据统计，移民共 2,900 户 7,296 人。嗣又订立移民计划，自 1937 年起，每五年一期，每期十万户。实际情形，第一期移民为 8 万 5,086 户，第二期移民为 2 万 1,800 余户²。

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随日本投降而结束。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8 月 17 日溥仪在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安排下，宣布退位。溥仪后为苏军俘虏，被囚于伯力³。

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满洲国是日本以溥仪复辟的名义制造出来的，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则是国民政府中的主和派，在日本引诱下，自国民政府分出，企图取代国民政府的地位。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早在 1937 年 9 月下旬、中日上海战争正在进行期间，即到达上海，谋在华中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以诱使国民政府议和。初时找到唐绍仪，但 9 月 30 日唐为国民党特务暗杀；又找到吴佩孚，吴不答应（后为日本害死）⁴。后来日本找到梁鸿志，但梁没有号召力。日本继续向国民政府诱和，引起了汪精卫的兴趣。汪精卫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原是主张抗日的，1932 年汪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行政院长，由于上海一二八之役及 1933 年长城战役中国伤亡惨重，才使汪态度转变，主张以谈判的方法应付日本，抵抗亦是为了谈判，故有「一面抵抗，一面

²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页 159-160, 164, 169, 180-184, 189-190, 340-345, 438；前引刘庭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设置殖民统治伪政权机构简况〉，页 59。

³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页 655-656。

⁴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37。

交涉」之论。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议，承认日军可留驻上海；1933年的塘沽协议，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此后，汪对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广田三原则也愿接受，并促使中日互换大使⁵。1935年汪在暗杀事件中受伤，不久赴欧休养，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才回国。回国之后，汪的联日防共想法没有变，国内由于日本侵逼日甚，全民抗日的浪潮高涨，到西安事变结束后，联共抗日成为不得不走的路。在这种情形下，联日防共和联共抗日的理念不同，就使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路线之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失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认为中国的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主张老老实实与日本讲和。八一三上海战役爆发后迄于日本进攻南京期间，日本于11月5日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1）承认满洲国及内蒙独立，（2）扩大华北「何梅协议」所规定之华北不驻兵区和淞沪停战协议所规定之非武装区，（3）中日经济提携，（4）中日共同防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之状态，并主张谈判秘密进行。汪精卫于12月3日在汉口公开发表谈话，赞同陶德曼居中调停，以实现中日和平。12月13日日本攻下南京后，向中国提出更苛刻的条件，除前述者以外，要求中日满订合作协议，中国需偿付日本赔款，并要求于1938年1月15日以前答复。届期，负责决策的蒋介石未答复，日本近卫内阁即于1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此一声明进一步鼓励了汪精卫的和平尝试，汪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经沪赴日本联络。董道宁先于1月17日在沪与日本南满铁道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会谈，继于2月赴日本，提出以汪代蒋、由汪与日本谈判和平、迫蒋下台等主张，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会谈。汪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3月至上海，与日方人员有所接触，旋与董道宁同回武汉，报告情形。高复于7月至香港，与日方人员保持接触，汪另派梅思平参与谈判。10月11日、25日日军先后攻下广州、武汉，蒋声明抗战到底，汪则继续推动和平。

⁵ 闻少华，《汪精卫传》，页176；沈德海，〈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罪恶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页53。

11月3日，近卫再发表对华声明，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并欢迎新生的国民政府参加；汪急派高宗武、梅思平等在上海与影佐、今井等会谈，到11月20日双方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内容为：（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日经济合作，（4）赔偿日侨损失。汪于促使蒋介石与日本和谈不成之后，于12月18日偕少数随员秘密自重庆飞昆明，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协助，于12月19日飞抵河内。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为对华政策三原则。汪精卫于12月29日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艳电），要求「国民政府立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汪之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其后于2、3月间，蒋介石曾派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等赴河内劝汪回渝或赴欧旅行，并派人于3月21日暗杀汪，误中其秘书曾仲鸣，汪计划不变⁶。

1939年2月，高宗武由上海到河内，与汪商组中央政府事，并提出与日本商定的办法：取消北平王克敏的临时政府（王克敏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改北平为北京）和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使汪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南京组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亲善协议，互派使节。汪原则答应。3月18日，日本决定支持汪组织中央政府。其后，影佐等自上海赴河内迎汪，5月6日抵上海，5月31日陪同汪等赴东京，与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等商议组织政府具体办法。6月18日汪回国，先往北平会晤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再到上海会晤维新政府首领梁鸿志，谈取消两政府事。内蒙为日本防共防俄地区，该地傀儡政权，日本不允汪合并。8月9日，汪精卫在广州广播，呼吁重庆军政当局与日本议和，改采反共策略。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庆到1945年始开六大），发表宣言、政纲，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并废总裁制，由汪精卫任党主席。六全大会后，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与日人影佐等会商筹组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先召开中

⁶ 章克昌，〈试论汪精卫通敌卖国之原因〉，《江西农业大学学报：哲社专辑》，1986年，页47-50；夏盛元，〈论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绍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页13-14；罗正楷，〈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页41-43；前引沈德海，〈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罪恶活动〉，页54；闻少华，《汪精卫传》，页141-165。

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政府建立事宜；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委员会（后改联合自治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另一方面，自1939年11月1日开始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与日本代表影佐等会商新政府成立后与日本的实质关系。12月30日，〈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签字。明确规定中国承认满洲国；取消维新、临时两政府；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等地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驻兵权及运用交通设备；各级政府聘用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这些条款被称为「汪日密约」。1940年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和平劝告，要蒋与日本停战言和。3月12日，汪精卫发布〈和平宣言〉，再劝重庆政府与日本议和。均未得到蒋的回答。另一方面，高宗武、陶希圣于1940年1月3日携〈汪日密约〉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并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密约，引起舆论的一片谴责。汪精卫则于1月24日至26日在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议，讨论政府组织问题，通过有关规章，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村、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三十余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以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等十余人为中央政府委员。3月30日，汪以国民政府还都名义，在南京正式组织国民政府，标榜实行三民主义，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惟于旗上挂一三角黄布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新政府的人事：

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海军部部长

陈公博：立法院院长、政治训练部部长

周佛海：警政部部长、财政部部长

梁鸿志：监察院院长

温宗尧：司法院院长

王揖唐：考试院院长

江亢虎：考试院副院长、铨叙部部长

褚民谊：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部长

陈群：内政部部长
林柏生：宣传部部长
鲍文樾：军政部部长
梅思平：工商部部长
赵正平：教育部部长
李圣五：司法行政部部长
丁默村：社会部部长
王克敏：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其他农矿、铁道、交通、审计、军事训练等部部长以及边疆、赋务、水利、考选等委员会委员长不备举。

此一国民政府，于 1940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间，在党务方面，共开中央常务委员会 103 次、中央政治委员会 148 次；在政务方面，共开行政院会议 261 次，最高国防会议 72 次，先后制定和修订各种法规 88 项⁷。

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统治基础，代日本统治占领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数省，故日本允许汪代为统治的地区，主要为以南京为中心的数省，东四省地区属于满洲国不必说，华北五省（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内蒙察绥地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各均为半独立状态，日本对华「分而治之」的原则极明显。其二、利用汪精卫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向重庆国民政府招降，汪一再表示，只要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他的政权随时可以取消。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对重庆的国民政府没有敌意，而汪精卫联日防共，更使国共关系日益恶化中的重庆国民政府，对汪政权减少敌意。汪政权是两面性的，暗地里与重庆国民政府有所联络，并予重庆方面在日本占领区工作人员给予掩护；另一方面，则不断从日本手中收回中国主权。日本对汪政权的两面性并非不知，不过是互相利用。日本有时压抑汪政权，是为了诱使重庆国民政府讲和；有时扶助汪政权扩张其势力，是希望汪政权能稳住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基地；有时受国际影响，英、美国家对重庆国民

⁷ 前引沈德海，〈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罪恶活动〉，页 54-56；前引夏盛元，〈论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页 14-15；闻少华，〈汪精卫传〉，页 139-140，169-180，190-260，338。

政府在外交上作让步，日本对汪政权在外交上亦让步。此处先检讨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

汪政权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体说来，1940至1942年为第一阶段，日本除利用汪政权统治占领区外，仅把汪政权作为向重庆诱和的工具，并未重视汪政权在整个东亚战争中的地位。1943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需要巩固大陆基地，且需动员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因此允许汪政权对华北及内蒙有较高的控制权，并废除日本与中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允许汪政权参加大东亚战争。在第一阶段，汪政权于1940年3月成立之初，日本希望汪能诱使重庆国民政府议和，但无成就。另一方面，汪从几方面向日本示好：（1）成立亲善团体：1940年5月在北平成立「中国东亚联盟协会」，9月在广州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1941年2月正式在南京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总会由汪精卫兼会长。1941年11月，汪又成立「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并提出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为四大纲领⁸。（2）接受日语课程：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致函汪精卫，要求教育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谓此举为对日本亲善的重要标志，汪精卫即予接受。（3）加入德日防共协议：1941年11月25日，汪政权宣布加入德日防共协议。此期间，日本于1940年11月30日与汪政权订立「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政权⁹。在第二阶段中，由于日本对汪政权依恃较多，汪政权与日本在关系上可以争取互利。所谓互利，日本受美、英等国对重庆国民政府改订平等新约的刺激，自动废除自清末以来的不平等条款；而日本由于战争的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则多方榨取。关于日本放弃不平等条款，日本于获悉美、英两国决定于1943年1月11日同重庆国民政府签订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平等新约以后，提早于是年1月9日与汪政权订约，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并于是年10月30日与汪政权签订〈中日同盟条约〉，废除1940年11月所签订的基本关系条约。关于榨取沦陷区经济，日本于1942年7月成立「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将中国东三省规

⁸ 闻少华，《汪精卫传》，页280-283，287，297。

⁹ 前引夏盛元，〈论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页15，17；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411。

划为制铁工业和化学工业区，将华北规划为植棉区，将华中规划为轻工业区。为了配合日本对粮食和棉花的统制，汪政权于 1943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¹⁰。其间，汪政权不断对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表示支持。1942 年 12 月 25 日，汪精卫在东京广播，声言「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1943 年 1 月 9 日，汪政权宣布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日决定设立最高国防会议，由汪精卫任主席，周佛海为秘书长¹¹。汪政权虽对英、美宣战，但日本仅需汪政权供应物资，不需汪派兵出国作战，以免汪政权与日本争得平等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彼此并未宣战。

汪政权的内部，可从几方面略作说明：（1）中央及地方制度和人事：汪政权的中央政制，基本上是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各部会时有增减。省府委员制到 1943 年 1 月以后改为省长制。1944 年 11 月 10 日汪精卫死，陈公博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任行政院院长，梁鸿志任立法院院长，顾忠琛任监察院院长。王荫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为上海市市长，林柏生为安徽省省长，丁默村为浙江省省长，褚民谊为广东省省长等。汪政权在领土统一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于 1943 年 2 月使华北政务委员会废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于 1944 年 1 月将江苏的淮北地区，并安徽数县的苏淮特区，划为淮海省；汪亦欲收回蒙疆自治政府，但无成就¹²。（2）「奉行三民主义」：汪精卫以奉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实际上则依现实需要，将三民主义加以曲解，譬如解释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国固有的和平思想，不排除；将民权主义解释为全体自由，非个人自由；将民生主义解释为阶级合作；更认为三民主义就是大亚洲主义¹³。（3）新民运动和新国民运动：1937 年 12 月北平临时政府成立后，组织「新民会」，鼓吹中、日、满大联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1941 年 11 月，汪政权发起「新国民运动」，要求国民「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并于 1942 年 6 月正式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¹⁴。（4）清乡剿共：

¹⁰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399，413-417，432。

¹¹ 同上，页 403-404，407-408；闻少华，《汪精卫传》，页 339。

¹²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408，422-425，448-449，454。

¹³ 闻少华，《汪精卫传》，页 224。

¹⁴ 同上，页 125，267，296；武锦莲，〈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

汪政权以反共为基本政策之一，主要的原因有三：其一、日本反共，重庆国民政府在汪政权建立时亦已开始反共，对汪政权来说，反共最能善邻友好。其二、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由共党脱离而出的，汪精卫是由亲共而反共的，故都倾向反共。其三、汪政权的中心地区，有中共新四军在乡区活跃，必须实行清乡，才能维护治安。汪政权的反共清乡，主要是配合日本整顿占领区治安的政策。此政策于 1941 年 1 月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汪精卫于 3 月 24 日即成立清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清乡以新四军为主要对象，由日军与汪政权的军队共同进行。1941-1942 年夏在苏州、常熟、无锡、武进等地区进行清乡，1942 年夏至 1943 年春在松江、吴县、嘉兴、昆山，平湖、海宁等地区进行清乡，1943 年春至 1944 年初在镇江、武进、南通、海门等地区进行清乡，1944 年初至 1945 年夏在广东、湖北、安徽等省进行清乡。其间清乡委员会于 1943 年 5 月 20 日裁撤，改在行政院设清乡事务局；陈公博于 1944 年 12 月曾透过重庆军统局负责人戴笠，要求重庆方面采取配合措施，共同根绝赤祸¹⁵。

除前述者以外，汪政权的军队构成和转变，值得特别叙述。汪政权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收编投降国军及游击队而来，绝大部分于战后又改编为国军，论者谓系「曲线救国」，即敌不过攻击时，投降以保有实力；有机会时，再回归国军阵营。汪政权的军事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40 年春至 1941 年底为第一期：主要的部队来自三方面：其一、在江南溃散的一部国军，由维新政府绥靖部部长任援道改编，到 1940 年 4 月名为苏浙皖绥靖军，1941 年 1 月改为第一方面军，任援道为总司令，驻南京、杭州、蚌埠等地。其二、国军西北军将领张岚峰，于 1938 年 9 月在河南为日本招降，1941 年 7 月交给汪政权，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张任军长，驻商邱等地。其三、1941 年 2 月汪招降泰州国军游击将领李长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李任总司令，驻泰州、江都、靖江地区。其四、1941 年 3 月重庆国民政府江苏省保安旅旅长杨仲华投降汪政权，1942 年 1 月改编为第二集团军，

年第 3 期，页 107-109。

¹⁵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163，320-327；闻少华，《汪精卫传》，页 261-274。

杨任总司令，驻东台。其五、1941年4月汪政权收降重庆国民政府鲁苏战区的部分国军和游击队，编为三个师，十九师师长蔡鑫元驻泰兴，二十二师师长刘相图驻宝应，二十八师师长潘干丞驻高邮。其六、1939年国军苏州、青浦等地游击队降日，1941年5月为汪政权改编为第二军，军长刘培绪。其七、1941-1942年间，日军收降湖北等地国军及游击队，改编为三个师。李宝琰任十一师师长，驻随县；张启黄任十二师师长，驻信阳；邹平凡任二十九师师长，驻武汉。其八、1940-1941年广东番禺、汕头等地国军游杂部队，为汪政府收编为三个单位，闽粤边绥靖军，黄大伟为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李讴一；第三十师，师长郑光熏。（2）1942-1943年为第二期：主要的部队来自六方面：其一、1942年初驻鲁西定陶、曹县一带的国军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被俘降日，被汪政权任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嗣改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其二、1943年1月国军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在莱芜、新泰地区降日，被汪政权任为山东方面军总司令，嗣改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其三、1943年2月国军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鄂中咸宁降日，被任为和平建国军第四十三师师长。其四、1943年4月国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降日，并诱捕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庞仍被任命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其五、1943年6月国军鲁苏战区旅长荣子恒降日，被任为第十军军长。其六、第一时期降日之国军西北军将领张岚峰，于1943年10月被任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仍驻河南。（3）1944-1945年为第三期：此期汪政权的军队编为七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驻苏南、皖南；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驻苏中、苏北；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驻蚌埠；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驻豫东、淮北；第五方面军庞炳勋部，驻开封等地；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驻安阳等地；第七方面军郝鹏举部，驻苏北、淮北。七个方面军几乎都来自投降的国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的长官，或在降日之时，或在降日以后，都或多或少与重庆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一胜利，重庆国民政府即利用他们维持接收地区的治安，委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郝鹏举等为新编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路军总司令¹⁶。

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层面：其一、就汪政权的领导阶层来说，汪自重庆出走前，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负责军务；汪为副总裁，是文人。汪认为：「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非铭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因此，汪系以还都的名义，在南京重建国民党、重组国民政府，并奉行三民主义。汪希望蒋能继他回南京，与日本和平周旋，虽遭拒绝，但在心理上，仍与重庆一体。例如 1943 年日军将俘虏的国军数万人交汪政权处理，办事人拟成立「俘虏营」，汪即不悦，认日本人把投降的中国军人当俘虏，中国不应该也这样看¹⁷。陈公博是以私谊追随汪精卫，但早在 1940 年汪政权成立之初，即答应重庆特务系统负责人戴笠，掩护重庆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到陈代汪为南京政权主席后，当时国共冲突日烈，陈公博强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推动宁渝合作，联合反共。在 1945 年春夏间，陈公博主动与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络，希望「军事合作，共同剿共」。周佛海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至迟在 1943 年 5 月，即与戴笠建立联系。1945 年 8 月 12 日，蒋介石通过戴笠，委任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命其阻止中共新四军进入宁、沪、杭地区¹⁸。其二、就重庆方面对汪政权的政策来说，蒋介石尽量利用汪政权做抗日反共的工作。譬如戴笠曾向蒋介石推荐前长沙警备司令唐生明，使投降汪政权；汪任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长，极力支持汪政权与日本合作反共。又如一些不敌日军攻击的国军，为了保存实力，重庆方面有意无意间，任其投降，为汪政权收编，用作在敌后剿共，而有「曲线救国」之号。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并不利用投降的国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战后，这些投降的国军，又被委以维持治安、对付共军的重任¹⁹。

尽管如此，中日战争总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战时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一概被目为汉奸。到 1945 年 11、12 月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及〈惩治汉奸条例〉，对汉奸作不同程度

¹⁶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136-180。

¹⁷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293, 304。

¹⁸ 同上，页 452, 457-460。

¹⁹ 前引罗正楷，〈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页 45-46。

的惩处。1944年11月至1947年10月，各省市法院处理汉奸案件，检察者4万5679件，起诉者3万185人；审判结束者2万5155件，科刑者1万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万3570人，罚金14人。上述汉奸案件，包括汪政权、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抗战期间其他投效日本者。汪政权重要负责人处死者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缪斌等，处无期徒刑者有周佛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不一月，即病死狱中）、陈璧君（1959年病死）、温宗尧（1946年7月8日定刑，次年11月病死狱中）、王荫泰（旋病死）、罗君强、江亢虎等，日本投降后自杀者有陈群（考试院院长）等²⁰。

²⁰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465-481。

第七章
从共同抗日到分别抗日
(1937-1945)

第一节 中日战争中的政略和战略

日本对中国的政略与战略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的政略和战略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大概说来，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在战略上是蚕食，第一个目标是东三省；第二个目标是内蒙，由热河进扰察、绥；第三个目标是华北，由锦州、榆关进扰平津；均是以局部的军事侵略和军事威胁，迫使国民政府的势力退出。在政略上则是以就地建立傀儡政权，诱使亲日派合作；以防共诱使国民政府合作。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中日冲突扩大，日本初欲局部解决平津问题，国民政府不让步。在战略上乃采取速战速决方针，除发兵沿津浦、平汉路南下外，并于 8 月 13 日发动上海战役，希望能于徐州附近或京沪地区消灭中国主力，进一步威胁南京、占领武汉。在政略上则是在北平、南京成立傀儡政权，并以共同防共等名义，诱使国民政府议和。在政略上的最大成就是诱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与日本合作；日本乃得将兵力转移至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国。到 1944 年太平洋战场转居劣势，日本除在战略上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俾便南北战场互相支持外，复在政略上利用汪政权向重庆诱和。但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的结果，却使汪政权的重要人物暗地恢复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效忠。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政略的失败。

日本自十九世纪末叶向外发展，在战略上有所谓「北进」和「南进」政策。「北进」是通过中国东北指向俄国；「南进」是通过中国长城以南以至华南地区，指向西太平洋和中南半岛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力范围。从甲午战争迄于满洲国建立，都是以北进为主、南进为辅。到 1936 年，日本一方面在中国东北、内蒙和华北建立了日俄之间的缓冲区，一方面与德国订立共同防共协议以利用德国牵制苏俄，在战

略上即采北守南进政策。七七事变由「不扩大」发展成全面侵华战争，一方面是陆军中的扩大派（以年轻将校为主）压倒了不扩大派（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南进政策的体现¹。日本的大陆政策由北进转为南进，涉及日本军部内共产国际间谍的运作。共产国际德籍间谍索尔格，运用近卫首相的机要秘书尾崎秀实及军务局长武藤章，使对俄作战派石原莞尔失势。此事至1941年10月尾崎被捕，始行发觉。但当时日本已向南深入，不能再北进²。

日本对华政策，从七七事变爆发，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所谓以政治诱降为辅，主要是对国民政府的诱和工作，而国民政府亦曾考虑是否「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早在1937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即表示，希望德国劝说中国与日本和谈，而中国方面的特使蒋方震于9月即去义大利和德国，促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调停中日战争。当蒋方震抵德时，日本驻德武官亦奉命向德国试探调停意愿。11月3日，德国决定出面调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式将日本议和条件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承认满洲国，（2）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4）停止反日。蒋对德国的调停表示感谢，但认条件无法答应，否则国民政府将为舆论冲倒。11月底，日军进抵南京，陶德曼再向蒋介石提议和建议，蒋曾召集国防最高会议讨论，确定以「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条件」，与日本谈判。但12月中旬南京为日占领，日方又提新条件，包括承认内蒙自治、承认华北政权、战争赔偿等，国民政府到1938年1月13日正式加以回绝。日首相近卫乃于1月16日声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³。此后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一派，私下继续与日本作和平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加强军事压力，将国军逐出徐州地区，并进而包围武汉。武汉占领以后，迄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是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9月德国进兵波兰，不久席卷欧陆，此事大大鼓舞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1940年5、6月间发动襄阳、宜昌战役，占领宜昌，控制入川门户；

¹ 蒋立峰，〈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页48-60；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3-5。

² 邵毓麟，〈抗战前后敌我若干重要策略之检讨〉，《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4辑，页356。

³ 朱美琴，〈抗战初期陶德曼「调停」始末〉，《南通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页97-101。

接着又封锁滇越国际交通线⁴；目的在迫使中国早日屈服。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间，日本的政治诱降有所谓「桐工作」，目的在促使重庆政府与新建立的汪政权合流。桐工作由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推动，实际由日本驻香港机关长铃木卓尔与宋子良会谈，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在香港会谈十一次，在澳门会谈四次。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希望谈判前先停战，谈判应有美国等第三国参与。但据日本方面观察，重庆方面的意图是破坏日本的对汪工作。在实际谈判方面，日本反对第三国参与谈判，重庆反对与汪精卫合流；对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问题，双方较有共识，但日本要求重庆承认满洲国则有困难。其间一度拟将湖北蒲圻和监利、湖南湘乡、江西萍乡一线作为局部停战区，但以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驻军等问题重庆不能答应，此事遂告结束⁵。另一方面，日本即转而支持汪精卫，对国共两党在敌后所建的抗日武力进行扫荡，以巩固占领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急欲派兵南进，但迄于1941年底，日本陆军210万人，留在本土的约40万人，南进的约40万人，其余130万人均被吸于中国战场，无法南调⁶。到1943年5月，太平洋战争逐渐恶化，日本又欲以军事速迫国民政府屈服，以集中力量对付美、英。日本曾准备于1942年秋进迫西安、1943年春进迫四川，但缺乏继续进攻的力量。到1943年5月以后，乃加强运用汪政权向重庆诱和。在此前后，汪政权领导阶层见日本败象已露，纷纷暗地向重庆输诚，包括陈公博、周佛海、任援道、丁默村等。陈公博主张汪蒋合作，进行反共；日本放宽议和条件，除满洲国现状不改变外，只要美、英撤出在华军队，日本即可撤出在华军队，让蒋介石回南京组织统一政府；蒋均不接受。到1944年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人员乘机插手，身兼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的缪斌认为汪政权的存在，对与重庆谋和的工作有妨碍，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赴日本和谈，谓如日军撤离中国，抛弃汪政权，蒋介石可拒绝美军在中国登陆，并与日本合作反共。缪斌的谋和行动，引起日本军政领导阶层意见分歧，此事不了了之⁷。

⁴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72。

⁵ 史会来，〈抗战时期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页84-88。

⁶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83。

⁷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438-445；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页15-16。

日本在北守南进的过程中，不能无后顾之忧。1938年7月11日，日俄两军在中俄边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日本避免扩大事端，于8月11日订约停战。1939年5月，日俄两军又在外蒙之诺门坎（或译诺孟罕）发生冲突，到9月16日，由于日本自制，双方亦休战。另一方面，1939年9月旧德军进兵西欧，英、法于9月3日对德开战，无暇东顾。9月27日，日本与德、义两国订同盟条约，1941年4月13日，与苏俄签中立协定，后方大体稳固。其间由于1941年6月德军大举攻俄，苏俄求助于英、美；为了加入反侵略阵营，苏俄且于1943年5月解散第三国际（改为共产国际情报局），以释英、美之疑。苏俄投入反侵略阵营，使日本后方又增加了潜在的危机。在此前后，日本发展的方向是西太平洋和南洋；于1941年3月，与泰国、越南订约，将泰、越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满洲国、汪政权已纳入）。是年7、8月以后，由于美、英、荷等国对日本采经济制裁措施，日本于12月1日决定对美（势力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英（势力在香港、新加坡、缅甸、澳洲等地）、荷（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等地）作战。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攻击香港，并向中南半岛进军（前已于1938年2月占海南岛）。1941年12月15日占领新加坡，12月25日占领香港、九龙，1942年1月2日占领马尼刺。3月1日登陆爪哇，3月5日占领巴达维亚，荷军投降。5月7日，日军侵入缅甸。由于日本需调遣兵力投入西太平洋和南洋，中国战场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即陷于胶着，中日主力相持于平汉、粤汉一线。到1944年，日军为配合南洋作战，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了平汉、粤汉线，日军由湖南入广西、贵州，一度对四川基地造成威胁。但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胜利，威胁日本本土，日军亦不敢向内陆深入。到1945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由贵州反攻克复桂林，并计划反攻广州⁸。中日战争已近尾声。

中国对日本的政略与战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迄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基本政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在中共问题未解决前，避

⁸ 陶希圣，〈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论〉，《近代中国》48期，页38-50。

免与日本全面冲突。1935年11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发表对外关系报告，宣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虽然如此，蒋委员长对中日战争的战场布局，已有设想：「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防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到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表示愿共赴国难，共军为军事委员会改编，国民政府遂可全力应付日本。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此一战略应为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定。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是年11月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持久消耗战略」，对付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所谓持久消耗战略，是以防御战、阵地战为主，以运动战、游击战为辅，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此战略虽然主要用在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前，但此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态度仍然「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即是为自卫而战。1937年7月下旬平津陷落后，蒋委员长宣布「抗战到底」，结束了对日「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的时代。「抗战到底」最初的意义不过是「不惜牺牲和倭寇死拚」，随着世界性的战局发展，中国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世界反侵略的国家并肩作战，直到胜利⁹。

严格说来，七七事变爆发之初，无论中央或河北地方当局，都不愿事态扩大。7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以吊祭甫于16日病逝的前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为名，拜访新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对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发生冲突，表示了遗憾之意。20日，日军炮击长辛店及宛平城，宋哲元仍迁就日本要求，下令拆除北平城内的防御设施，并将三十七师调出防区。但日本在北平的茂川特务机关，积极与军中的扩大派配合，制造事端，日军乃再向卢沟桥进攻¹⁰。

⁹ 宋长志，〈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近代中国》60期，页20-24；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页138-139；孙学筠，〈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协同作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页80-81。

¹⁰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页188-194；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8。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政略上采取两个措施：一为尽量使美、英、苏等国卷入中日战争，俾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二为以和谈的方式迟滞日本的军事行动，并藉以减少日本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关于使美、英、苏等国卷入中日战争，1930年代初期，日本原以自满蒙进攻苏俄为主要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北进转为南进，部分乃系受中国战略的诱使。盖日本对中国采速战速决战略，中国初集兵力于徐州地区，诱使日军自平、津南下；同时集兵力于京、沪、杭地区，诱使日军开辟上海战场。上海为英、美国家最为关注的地点，因上海为中国进出口的大门户，不仅影响英、美等国的对华贸易，且妨害英、美等国在上海一带的投资。此后中国集中兵力保卫武汉，广东地区未布重兵；日军有机可乘，广州在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前即告失守。广州的沦陷，威胁了英国在香港的势力。此一政略，虽未能使美、英两国立即参战，但美、英两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心已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在武汉撤守不久，蒋委员长亦曾建议苏俄在海参崴方面一次派机数百架，由义勇队驾驶奇袭日本重要城市及军事要地；苏俄虽未答应，但在武汉撤守前后，苏俄已开始对中国军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俄后，苏俄利用间谍渗透，在日本进行反英、美宣传，俾日本向英、美开战，终导致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进攻香港，引动了英、美与日本之间的战争¹¹。

关于以和谈方式迟滞日本军事行动，并藉以减少日本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前在论述日本对华政略时已有说明。大概说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的半个月，采「就地讲和」的办法。1937年7月9日，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谈停战，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退到丰台，国军撤至卢沟桥以西，宛平县城由保安队石友三接防。但7月12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到达中国，决定大举进攻华北。7月14日日军提出新要求，到7月18日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答应日军的条件，包括二十九军不驻北平近郊、查禁抗日文字、取缔抗日组织、实行共同防共，但日军仍不满意。7月20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召见英、美、德等国驻华大使，

¹¹ 参考邵毓麟，〈抗战前后敌我若干重要策略之检讨〉，《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4辑，页354-356；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页140。

希望出面调停，但到7月29日、30日日军即攻下北平、天津。此后日军于8月13日在上海开辟战场，威胁南京。10月21日日本表示愿与中国谈判，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作调人，于11月5日向中国提出七个条件，包括建立内蒙自治政府、划上海和平津铁路至满洲国间为非军事区、停止反日、共同反共，蒋介石则坚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此期间，中国要求英、美等国给予中国援助，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但无结果。到11月12日、12月22日上海、南京先后沦陷，日本的议和条件更为苛刻，包括偿付日本的赔款要求、中国和日满共同反共、经济提携。到1938年1月18日，中国正式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承认一切伪（傀儡）政权¹²。

前述尽量使中日战争与英、美、苏等国发生关系为一种政略；放弃沿海大部地区，将正面战场移至内陆山区则为一种战略。中国对日本战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为第一期，此期重在防御，尽量避免大型决战，以保持战力，故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希望将换取到的时间，用来加强战备、争取外援。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一文，预期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¹³。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中共方面的意见对蒋委员长的战略决策应有影响。从武汉撤退到抗战胜利为第二个时期，在正面战场除防御外，徐图以小规模的攻击，积小胜为大胜，收复部分失土，以鼓舞士气，同时开辟敌后战场，除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外，以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扩大敌后收复区。在第一个时期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国军用在第一线的部队由170万人增至225万人，造成110万人的伤亡；日军用在第一线的部队由数万人增至近百万人，造成44万人的伤亡。1938年11月以后，蒋委员长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将部队三分之一用在第一线，三分之一用在敌后游击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

¹² 王树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评述〉，《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增刊。

¹³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51-154。

此后正面战场在华北大体沿包头、大同、太原、开封、淮阴、合肥、信阳一线；在华中武汉以下的长江两岸大体为日本所占，长江以南国军的防守线为杭州、芜湖，岳阳。在华南，为福州、广州、南宁一线。国军配置重兵于浙赣边境、湘赣边境、湘西、平汉路郑州至信阳段、粤汉路长沙至韶关段、陇海路河南段、豫西和鄂西。在河南、陕西守黄河，在湖南守长沙，在长江守三峡，在华南守南宁。但 1944 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平汉路郑州至信阳段、粤汉路长沙至韶关段以及湘桂路全线，为日军占有。虽然国军于 1943 年 11 月即订有总反攻的计划，并计划在反攻的过程中即将共军的根据地消灭，但并无机会实行。到日军一号作战后，防御线缩至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以保卫四川、云南为目标。直到 1945 年 5 月以后，由于日军在湘桂铁路方面采战略收缩，国军始在这方面进行反攻¹⁴，收复了湘桂路在广西境的一段。

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在战略上值得叙述的，尚有工厂及大学内迁，以及维系国际交通线之畅通。关于工厂内迁，七七事变后，行政院于 8 月 10 日即决定拆迁上海的工厂，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据统计，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安抵武汉者 146 家，其中机器五金业 66 家、造船业 4 家、炼钢业 1 家、电气及无线电业 18 家、陶瓷玻璃业 5 家、化学工业 19 家、文化印刷业 14 家、纺织业 7 家、饮食业 6 家、其他 6 家。其他南京、太原等地工厂内迁不备举。关于大学内迁，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联合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设昆明。其他如中央大学迁重庆沙坪坝等，不备举¹⁵。大后方的人才培养和工业建设，对厚植抗战的物力和人力，贡献甚大。关于维系国际交通之畅通，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即兴建湘桂铁路和滇越铁路。日本攻占广州，在雷州半岛西侧的北海登陆，将中国沿海各港口全部占领或封锁，中国仍能透过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获得国际援助。及至法国自越南败退，海防为日占领，中国又修筑滇缅公路，从缅甸方面获得国际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又开辟中印公路，并利

¹⁴ 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转变〉，《历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页 138-152。

¹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 602-603，645-653，678-683。

用空运，越过喜马拉雅山至印度，以增加国际运输¹⁶。对外交通保持畅通，为增加抗战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战略

1930年代，德、日、义结盟对外扩张，日本首先在亚洲开辟战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进窥内蒙、华北，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全面对中国侵略。1939年德国开辟了欧洲战场，初则西侵波兰、法国，继则东侵苏俄。英、美两国初只重视欧洲战场，漠视中国战场，但到1940年9月日本参加德、义同盟后，英美集团的国家即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是年10月，埃及禁止棉花输日，墨西哥取消日本开采石油合同；1941年7月，英美联合封存日金¹⁷。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后，美国更关切亚洲战场，自是欧亚两战场才联系起来。但美国则一直重视欧洲和太平洋，轻视中国战场。不过，中国既被纳入世界大战略中的一环，日、德和美、英的军事动向，自然也直接影响中国战场。

英、美两国不重视中国战场的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已陷入胶着；事实上，日本是想摆脱对华战争的胶着状态，始能集中兵力开辟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一面协助新建立的汪政权，使能维系日本占领区的治安；一面谋与重庆国民政府讲和，以缓和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同时即对太平洋地区展开猛攻。日本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除将越南、泰国纳入东亚共荣圈以外，占有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香港、关岛、威克岛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岛屿，此后进攻的矛头指向澳大利亚和印度。菲律宾、关岛、威克岛是美国的属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香港、澳大利亚、印度是英国的属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属地；在这种情形下，英、美等国自然重视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战争发展。另一方面，德国、义大利于1939—1942年间席卷欧洲及北非洲大陆，向西威胁英国，向东威胁苏俄；在这种情形下，英、俄、美等国自然重视欧洲和非洲战场。1942年1月1日，

¹⁶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页107。

¹⁷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页168。

美、英、苏、中等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反侵略宣言。此后，英、美联合开辟非洲战场。1942 年 10 月，英国在埃及和阿拉曼战役中获胜；11 月初，美、英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到 1943 年 5 月完全控制了北非海岸。7 月间，义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捕；9 月初，英、美军队在义大利西西里岛南部登陆，义大利投降。另一方面，苏俄于 1941 年 6 月卷入德、苏战争后，在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2 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最后将来犯的德军三十余万人击溃，于 1944 年秋季将德军逐出苏俄国境，并开始向德国本土进兵。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于 1942 年 5 月以后采取攻势。此后迄于 1943 年 5 月间，日本在珊瑚岛、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新几内亚、所罗门岛、阿图岛等战役中皆败。1943 年 8 月以后，美国在太平洋上夺得制海权、制空权，由逐岛作战改为越岛作战。日本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年 9 月 30 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西起缅甸，经马来亚、新几内亚西部、加罗林群岛、小笠原群岛、至千岛群岛一线为「绝对国防圈」。日本大本营认为，日本本土、满洲、中国本部、缅甸、新加坡是五个战略要地。日本为打通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乃于 1944 年夏季发动一号作战。1944 年 2 月，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7 月攻占塞班岛，10 月占领菲律宾¹⁸。此后，美军攻势，直指日本本土，于 1945 年 6 月攻占冲绳。

世界性的战略，与中国战场有关者，最早形成于 1941 年 2 月间。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日本尚未攻击东南亚各国，日本于 2 月 8 日至 3 月 31 日，与泰国、越南在东京谈判，将泰、越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此期间，英、荷、澳于 2 月 22 日在新加坡举行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英、荷拟联合中、美两国，对日本围堵，即所谓「ABCD 包围圈」(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Dutch)¹⁹。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和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Panyushkin)，表示中国将尽全力与美、英、苏等国共同作战。9 日，中国政府对德、义宣战，并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是月 22、23 日，

¹⁸ Louis M. Hacke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65* (New York, 1949), pp.602-611; W. G. Beasley,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New York, 1963), pp.274-275;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 393-396, 446-447; 前引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页 14;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 1005, 1013-1016, 1021-1027, 1115-1117。

¹⁹ 陶希圣,《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论》,《近代中国》48 期,页 44。

美、英两国在华盛顿的军事会议和中、美、英三国在重庆的军事会议先后召开。华盛顿的会议确定以德国为主要敌人、欧洲是主要战场。但为将中国战场与盟国战场结合，美、英赞成设立包括泰国、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统帅，并成立盟军联合参谋部；同时决定派史迪威（Stilwell）为参谋长，来华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并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军队和蒋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在此一构想下，罗斯福于12月31日致电蒋委员长，提议成立中国战区，蒋于1942年1月2日复电表示接受。重庆的会议无多结果，当时滇缅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美国的援华物资通过仰光、经由滇缅路运到中国；中国非常担心缅甸的防卫，但英国不赞同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因为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缅甸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励缅甸脱离英国。

1942年1月20日开始，日军从泰国向缅甸进军，史迪威经印度、缅甸于3月4日抵重庆，11日入缅指挥作战。5月上旬，日军进至缅甸和印度北部与中国交界处，并进入云南省境内怒江西岸，切断了滇缅公路。其后中国的供给线依靠从印度英帕尔（Imphal，在印度东北Assam省）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云南。7月，史迪威提出收复缅甸计划：由英国海军和两栖部队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英印军和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向瑞保、曼德勒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向腊戍、曼德勒进攻。英国对此计划不同意。1943年1月，英、美等国在卡萨布兰卡开会，讨论缅甸作战，决定在11月15日发动。此期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拟定〈战胜日本战略计划〉，提出两路会合夹攻日本的设想：美军从太平洋经苏拉威夺取菲律宾，进攻香港地区；中、英部队在中缅印战场发起反击夺取缅甸，与美军在香港地区会合，然后共同进军华北，由华北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击。英国对此计划亦不同意，同时提出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作战，以代替缅甸作战。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之魁北克（Quebec）开会，决定中国战场仍维持现状。同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会于开罗，蒋介石偕夫人出席，要求美国装备中国90个师，要求及早执行三路进兵缅甸的计划，并提出收复广州、香港、上海的计划。罗斯福答应装备中国90个师，并保证于1944年3月以

前发动缅甸作战。但同月英、美两国领袖在德黑兰与史达林会议，斯大林要求美、英两国于 1944 年 5 月自英国渡海攻击，解放法国，结束对德战争；苏俄保证于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英、美两国为了争取苏俄参战，积极部署反攻欧陆的战争，将缅甸作战推迟到 1944 年秋季执行。虽然如此，英、美两国既决定收复缅甸，早在 1943 年 8 月 26 日即成立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由英国蒙巴顿（Mmmmtbatten）海军上将任总司令，史迪威副之；中国战区之军事，仍由蒋介石指挥，由史迪威任参谋长。是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邀集蒙巴顿、史迪威等拟定缅甸作战计划。26 日，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修筑雷多公路，打通印、缅、中交通，配合美军，对缅北日军发动攻势，于 11 月 15 日进攻于邦（在云南西部，孟关西北，近中、缅、印交界），缅北会战开始。1944 年 1 月 12 日，蒙巴顿率中英部队自印度攻入缅甸西部，向阿恰布推进。是年 1、2、3 月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由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进入孟拱河谷（Mogaung Valley）。4 月间，应罗斯福要求，中国自昆明先后空运两师至印度蓝伽（蓝姆伽，Ramgarh），于装备后加入缅甸作战。8 月 3 日收复密支那（Myitkyina）。另一方面，中国在滇西的部队，应罗斯福要求，配合美军，由卫立煌率领（按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因病赴渝休养，其职务由卫立煌代理），于 5 月 11 日强渡怒江，向腾冲方向攻击。自印度进入缅甸的中美联军于 10 月中旬自密支那南进，12 月 15 日克八莫（Bhamo），1945 年 1 月 15 日克南伦（Namlan）。自滇西攻入缅甸的中美联军于 1944 年 11 月 3 日克龙陵，1945 年 1 月 19 日克畹町（皆在中国境内），1 月 28 日与印缅军会师于缅北姆色（Muse），打通中印公路。其间史迪威因与蒋介石不和，于 1944 年 10 月被召回美，中美两军则继续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合作²⁰，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攻的势力逐渐接近日本和中国本土，驻华日军乃于 1945 年 1 月开始部署中国沿海防务：二十三军负责东南沿海，十三军负责上海地区，华北方面军负责青岛地区，湘桂线仅有第六方面军。为了减少中美空军对日本占领区的轰炸，日军

²⁰ 陶文钊，〈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2 期，页 212-224；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近代中国》42 期，页 41-43；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 2 册，页 680-704 有关记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 788。

曾于 1945 年 3 月攻击鄂北老河口、4 月攻击湘西芷江；老河口机场虽一度被占，芷江机场则得以保全²¹。而由于湘桂线日军缩短战线，自广西向湖南撤退，国军于 1945 年 5 月以后，乘机收复南宁、梧州、桂林。

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反侵略的大战略来看，中国战场的作用约有三点：（1）吸引日军百万，使日军无法应付日益扩大的战场。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当日本侦知苏俄即将进兵中国东北时，即不得不自中国西南撤兵，准备与苏俄作战。但以美国使用毁灭性的武器迫使日本投降，日本与苏俄作战的计划并没有实现。（2）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的统帅，在中国兵力不足的情形下，仍派兵赴缅甸协助英军抵抗日本侵略。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末期，四川基地岌岌可危，中国军队仍进入缅甸，协助英、美盟军驱逐在缅日军。而盟军在南亚的作战，亦对太平洋战场发生牵制作用。（3）无论在中缅印战场，还是在太平洋战场，美军都借用中国的空军基地，予日本本土或其他占领区施行大轰炸。

²¹ 前引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页 16-17。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退守与进攻

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14日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对日作战的战场基本上可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部分。国军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主力进攻，中共和国民党指挥下的游击队在敌后分别与日伪军作战；抗日战争初期，共军亦曾与国军在正面战场并肩作战。本节仅讨论正面战场。

战区及战场演变大势

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陆海军总司令，20日蒋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日后陆续将全国划分战区，对日作战：（1）第一战区：设于8月20日，作战地区平汉铁路北段，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九月中旬改由程潜继任。（2）第二战区：设于8月20日，作战地区山西、察哈尔、绥远，阎锡山任司令长官。（3）第三战区：设于8月20日，作战地区在沪杭宁地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冯于9月11日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顾祝同以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权。（4）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广东、福建，何应钦任司令长官。（5）第五战区：设于8月28日，作战地区山东及苏北，李宗仁任司令长官。（6）第六战区：设于9月11日，作战地区津浦铁路北段，冯玉祥任司令长官，至1938年1月撤销。（7）第七战区：作战地区南京及其附近，刘湘任司令长官，1938年1月刘湘病故，撤销。此期间国共合作抗日，由共军改编的八路军（后改十八集团军）于8月22日纳入第二战区；新四军于10月12日纳入第三战区。

此后迄于1938年1月17日重划战区：（1）第一战区：重设于1月17日，作战地区平汉路方面，程潜任司令长官，辖商震的第二十

集团军、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等。(2) 第二战区：重设于1月17日，作战地区山西方面，阎锡山任司令长官，下有南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北路前敌总司令傅作义（朱德的十八集团军归其指挥）。(3) 第三战区：重设于1月17日，作战地区江苏、皖南及浙江方面，顾祝同任司令长官，辖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罗卓英的十九集团军、唐式遵的二十三集团军、潘文华的二十八集团军、叶挺的新四军等。(4) 第四战区：重设于1月17日，作战地区两广，何应钦任司令长官，辖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5) 第五战区：重设于1月17日，由津浦线移皖西、豫南、鄂北，李宗仁任司令长官，辖于学忠的第三集团军、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等。(6) 第八战区：设于1月17日，作战地区甘肃、宁夏、青海，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以副长官代行职权，辖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等。到6月14日，因武汉保卫战的需要，又设第九战区，陈诚（原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任司令长官，辖李延年的第二军、卢汉的第六十军等。另置西安行营，以蒋鼎文为主任，辖毛炳文的十一军团、胡宗南的十七军团等；闽绥靖公署，以陈仪为主任。此外，汤恩伯的二十军团、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徐源泉的二十六集团军、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由军委会直辖。

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后，战区又陆续加以调整：(1) 第一战区：重设于1939年1月，作战地区河南及安徽北部，迄于1941年12月，卫立煌、蒋鼎文、陈诚、胡宗南先后任司令长官，初辖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等；至1944年时辖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等。(2) 第二战区：作战地区山西及陕西一部，迄于1945年9月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初辖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曾万钟的第五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等，迄1944年时已多变化。(3) 第三战区：作战地区苏南、皖南及浙、闽方面，迄于1945年9月司令长官为顾祝同，初辖陈仪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叶挺的新四军等，迄1944年时已多变化。(4) 第四战区：作战地区两广方面，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

撤入广西，张发奎任司令长官，初辖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等，迄 1944 年时已多变化。(5) 第五战区：作战地区皖西、豫南、鄂北，迄于 1945 年 9 月，李宗仁、刘峙先后任司令长官，辖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王缙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等，迄 1944 年时已多变化。(6) 第六战区：重设于 1940 年 6 月，作战地区鄂西，陈诚、孙连仲先后任司令长官，1944 年时辖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等。(7) 第七战区：1940 年 7 月从第四战区分出，作战地区广东，迄于 1945 年 9 月，余汉谋任司令长官，1944 年时辖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8) 第八战区：作战地区甘肃、绥远、宁夏、青海，朱绍良任司令长官，辖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等。1944 年时增加马步芳的第四十集团军等。(9) 第九战区：作战地区鄂南(长江以南)、湖南，迄于 1945 年 9 月，陈诚、薛岳先后任司令长官，初辖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龙云的第一集团军、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等，至 1944 年时只余第一、第三十集团军。(10) 第十战区：1939 年 1 月设，作战地区陕西，蒋鼎文任司令长官，辖蒋鼎文的第三十四的集团军等，1940 年 6 月并入第一战区。(11) 鲁苏战区：设于 1939 年 1 月，作战地区苏北、鲁南，于学忠任总司令，1944 年 1 月撤销。(12) 冀察战区：设于 1939 年 1 月，作战地区河北、察哈尔，鹿钟麟、卫立煌、蒋鼎文、陈诚先后任或兼总司令，1945 年 4 月撤销

22。

除战区以外，至 1944 年冬，为统一指挥及整训西南各战区之部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陆军总司令部，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总司令，辖四个方面军及其他部队：计第一方面军，在滇越边区，司令官卢汉，约辖三个军。第二方面军在广西，司令官张发奎，辖三个军。第三方面军，在黔桂湘边区，司令官汤恩伯，约辖五个军，其中李玉堂的二十七集团军辖二个军。第四方面军在湘西，司令官王耀武，辖四个军。另有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约辖二个军）、总部直

²² 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 1 册，页 462-524；汪维苞、韩希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区简介〉，《历史教学问题》（华东师院），1986 年第 2 期，页 28-30；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中日战争史略》（二），页 201-211；（三），页 270-279；（四），页 390-411。

辖部队（约有五个军）、和缅甸远征军（卫立煌部）等。当时的中国陆军不止上述单位，重要的除前述十二个战区所辖者外，尚有军委会直辖的三个军和川康地区的绥靖部队约四个军²³。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演变，约可分为四期。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武汉撤守以后，为第一期；此期华北、华中、华南沿海各省土地大部沦陷，日军深入至绥远中部、山西中部、平汉路西侧、以至鄂南、湘北、赣北、皖南、苏南、浙西、闽西、粤中一线。从1939年1月成立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扩大敌后战场，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期；此期正面战场大体在上述一线胶着，惟日军在广东占有海南岛、在鄂西占有宜昌，另一方面国共两党开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敌后战场。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日军一号作战结束，为第三期；此期前两年正面战场大体仍在上述一线胶着，1944年日军打通了平汉路、粤汉路和湘桂黔路，威胁四川的安全，同时，国军敌后战场因受日伪军的紧密扫荡和共军的兼并而萎缩。1945年1-8月为第四期；此期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溃退，正面战场国军伺机反攻，而共军在敌后战场亦乘机扩张。兹依时间先后，论述于下。

战场的演变，第一期（1937.7-1938.12）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争爆发，到是年12月之间，国民政府采取防御战，以一部兵力在华北迟滞日军攻势，主力集于沪杭宁地带，保护政经中心。在华北，河北、察哈尔、绥远、以及山东大部和山西一部沦陷；在华中，苏南和浙北的沪、杭、宁地区亦沦陷。兹简论其经过。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北平城西南，是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的交会点）日军在卢沟桥（丰台西七公里）附近演习，入夜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在北平城西，为县城）搜索，为守军二十九军所拒，日军遂向守军攻击。此后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欲以和平办法处理，蒋委员长已决心全力抗日，7月13日蒋委员长电宋哲元云：「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7月17日，蒋委员长对

²³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中日战争史略》（四），页411-419。

卢沟桥事件公开表示态度：「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占领，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²⁴ 另一方面，日本于7月16日已决定自东北和国内派兵40万人至华北大举进攻。28日，日军对北平驻军展开总攻击，驻军奋勇抵抗，牺牲惨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阵亡。二十九军于29、30日先后撤出北平、天津。此后日军以寺内寿一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沿平绥铁路向西北进攻，沿津浦、平汉铁路向南进攻。平绥路方面，蒋委员长于8月1日任命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为副总司令，并命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率部由绥远、山西向察哈尔增援。日军于8月10日自北平向西北进攻南口，同时自察北派兵进攻张家口。24、26日，南口、张家口先后失陷，汤恩伯的十三军自南口南下沿平汉路抵达河南北境的安阳整补，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则自张家口沿平绥路撤往晋北大同。刘、汤皆属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日军于陷南口、张家口后，一面循平绥路西进，一面自南口、张家口一线向西南进兵，于9月中旬进至山西东北部的大同（13日陷）、灵丘（14日陷）一线。灵丘逼近平型关，由国军高桂滋的十七军和共军一一五师负责防守，曾于9月25日予日军重创，终被迫撤退。日军自此南下，直逼太原。而自大同西上的日军，则于10月13日陷归绥，16日陷包头，平绥路全线沦陷。国军退守绥远西部五原、临河一带，与日军对峙。平汉路方面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所辖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孙连仲）负责正面防御。日军于9月18日陷涿州，24日陷保定，10月10日陷石家庄。此后分兵两路，一沿正太路西上，一沿平汉路南下。南下的日军于10月18日陷磁县，隔漳河与守安阳的汤恩伯部对峙。嗣以汤部调防太原，日军于11月5日陷安阳。沿正太路西上的日军于10月26日陷娘子关（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不能敌），太原危急。另一方面，自平型关南下的日军，于10月13日大举进攻忻口，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赶来增援，战斗激烈。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

²⁴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360-369。

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骥阵亡。国军于歼敌二万人后，于 11 月 2 日向太原转移。11 月 9 日，太原沦陷，国军退守晋南山地。津浦线方面，河北段有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属第六战区；山东段有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属第五战区。日军于 9 月 24 日陷沧县，10 月 5 日陷德县，第六战区取消；宋军南撤，转往河南东北部的濮阳，归第一战区节制；10 月下旬，蒋委员长令韩复榘率部反攻德县，韩迟疑不进。11 月 11 日日军陷惠民，13 日陷济阳。韩军不战而退，于 11 月中旬退至黄河南岸。12 月 23 日，日军于青城、济阳间渡黄河，27 日占济南，此后沿胶济路东下、沿津浦路南下。沿胶济路东下之日军第五师团于 1938 年 1 月 1 日过潍县，中旬抵青岛，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已于 12 月 31 日撤出青岛，转往徐州；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于 12 月 31 日占领泰安。迄 1938 年 1 月 7 日，连陷大汶口、济宁、邹县，韩复榘率部退避至鲁西之单县、城武、曹县，国民政府为肃军纪，将韩逮捕处死。时其部已改为第三集团军，以于学忠为总司令，未就职，以孙桐萱为副司令代总司令职²⁵。

在华北冀、察、晋、绥、鲁等省抗日战争进行期间，江苏、浙江、安徽地区也在进行抗日战争。缘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挑衅后的一个月，复在上海的虹桥机场挑衅。1937 年 8 月 9 日，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强入虹桥机场被阻杀，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要求中国撤退上海保安队（上海自 1932 年 5 月 5 日为「一二八之役」订立停战协议后，中、日双方均撤兵，由中国派保安队维持秩序）被拒，遂于 8 月 13 日向上海进攻。上海外围地区国军早自 1935 年冬即开始布防，如在龙华、徐家汇、虹桥、江湾、大场构筑工事，在吴县、常熟、福山间构筑阵地带，在无锡和江阴间构筑预备阵地带以及修筑苏嘉铁路等。虹桥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京沪警备司令、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率三师部队（八十八师孙元良、八十七师王敬久、三十六师宋希濂）进驻上海，此后陆续增兵，沪、杭、宁地区的兵力达 70 万人。8 月 20 日，划沪、杭、宁地区为第三战区。由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负责围攻淞沪，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负责长江右岸守备，缪澂流的第五十七军负责长江左岸守备，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负责杭州湾左岸

²⁵ 《中日战争史略》（二），页 173-186, 212；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页 91-96；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 1 册，页 560-578 有关记载。

守备，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负责浙东地区守备，海空军协同作战。9月21日，蒋委员长将第三战区的部队调整部署：以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辖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第十集团军（刘建绪）；以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辖第九集团军（朱兼总司令）；以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辖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十九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上海战役发生后，日本组上海派遣军（后改为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日后增兵至22万人。9月1日，日军陷吴淞。10月25日，日军突破大场阵地，国军撤往苏州河南岸，由谢晋元团长驻守闸北四行仓库，进行掩护，至10月31日始撤出。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上海后路受威胁。上海国军一部分转往沪杭线迎敌，一部分撤往南京。11月12日日军占上海，沿沪宁路西进、沿沪杭路南下。西进日军于19日陷苏州，南下日军于19日陷嘉兴。24日，国民政府任命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率宋希濂（七十八军）、孙元良（七十二军）等军约11万人守南京。军委会另设第七战区，会同第三战区，策应南京保卫战。日军于12月1日陷江阴，即于12月3日分兵三路攻南京：右路沿沪宁路西进，转至长江北岸，切断大运河及津浦路；中路直趋南京；左路由广德、宣城趋芜湖，图截断守军退路。10日，中路日军攻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等处，12日晚各城门均告失守，唐生智及宋希濂等部撤往浦口。13日日军占南京，屠杀中国军民近30万人（主其事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战后被处死刑）。日军嗣渡江抵浦口，沿津浦路北进。此期间，右路军已在镇江渡江，取道扬州进窥淮阴；左路军已在安徽和县渡江，向合肥进发。24日，嘉兴方面日军陷杭州，国军退守钱塘江南岸²⁶。在京沪杭地区的抗日战争中，海军与空军均投入。8月11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率舰队到江阴，指挥三艘测量舰和两艘炮艇，将江阴下游的航行标志如灯标、灯桩、灯船、灯塔等一律拆毁，以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驶；同时抽调海军舰龄较大的6艘舰艇，并征调商轮20艘，开到江阴炸沉，以堵塞长江航道。但江阴要塞并

²⁶ 贾维，〈试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高潮〉，《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页95-96；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页96-100；《中日战争史略》（二），页186-198；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565-577有关记载。南京撤退前后的情形，参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页1-5，321-328及其它各页；另参考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史》一书。

未能守住，于 12 月 1 日被日军攻下。空军在沪杭地区有出色的表现。8 月 14 日在上海上空轰炸日本海军司令部，并炸伤了日本旗舰「出云号」。同日，日本空军袭杭州，中国空军升空迎战，击落日机三架²⁷。

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于 11 月 5 日沿平汉路抵达河南北部的安阳、于 11 月 9 日自晋北南下占有太原、于 12 月 13 日沿沪宁路西下占领南京、于 12 月 31 日沿津浦路南下占领泰安，并于 1938 年 1 月续沿津浦路南下，占领大汶口、济宁、邹县。其后，首要的目标是沿津浦路南北夹击徐州；国民政府则集中力量部署武汉防务，而集中兵力于徐州南北的津浦线，以诱使日军攻击，而迟滞日军沿长江西上攻击武汉；同时力保黄河北岸豫北、晋南诸要地，以防阻日军南渡黄河、沿平汉路直冲武汉。1938 年 3 月 3 日，国民政府对徐州战场及武汉前线战场的防卫加以部署：津浦线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徐州、蚌埠间（皖中）津浦线由李品仙的十一集团军防守，平汉线由汤恩伯的二十军团防守，豫陕边区由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防守，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协助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在山西作战。徐州的北面及东北面，川军王铭章师守津浦线上的滕县，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守津浦、陇海二路中间的第一线突出点临沂，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津浦、陇海二路中间的第二线突出点台儿庄。徐州的南面，李品仙的部队防守淮河一线，以抵御自浦口北上的日军。大体说来，在 1938 年 3、4 月间，国军在淮河一线坚拒北上日军的攻击，互有胜负；徐州北方及东北前线则一度在台儿庄予日军重创。徐州北方的日军第十师团，于 3 月 15 日自邹县南下，17 日陷滕县（守军牺牲殆尽，师长王铭章战死），19 日陷峄县，24 日围攻台儿庄；但自潍县沿台潍公路向西南进攻的第五师团，在连陷蒙阴、沂水、莒县、日照之后，于 3 月 12 日、18 日两度在临沂受创，无法至台儿庄与第十师团会师。到 4 月 7 日，台儿庄守军（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池峰城部等）配合着在台儿庄北侧作运动战的汤恩伯部，将日军第十师团击溃，日军伤亡万余人。同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5 月初日军自南北两线同时进攻徐州，5 月中旬自东、西、南、北四方面对徐州

²⁷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 384，387，391。

进行合围，东方自郟城进攻邳县，西方自菏泽南下在兰封以东切断陇海路，南方自宿县进至萧县，北方先后占领临沂（4月17日）、台儿庄、金乡（5月14日）、鱼台（5月14日）等地。国军于5月19日自徐州突围，向西南撤退，转移到豫东、皖北一带。此后，国民政府扩大第五战区，地区包括苏北、皖南、皖中、皖北、豫北、豫东，仍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以孙连仲、李品仙的第三、四兵团为主力，担任长江北岸作战；另设第九战区，陈诚兼任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以薛岳、张发奎的第一、二兵团为主力，担任长江南岸作战；共同防守武汉地区²⁸。

日军占领徐州后，初决定分兵两路会攻武汉：一路自徐州沿陇海路西上，拟攻略郑州后，再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沿长江西上。沿陇海路西上的日军于5月24日陷碭山、28日陷归德，国军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军团在兰封阻击日军，予敌重创。6月5日国军自开封西撤，为阻止日军追击、并防止其自郑州南下，将郑州北侧花园口黄河南堤炸决，黄水向东南流，经中牟、朱仙镇、尉氏、太康，流入安徽、江苏，淹没豫东数十县，使日军不得前进。另一方面，国军在太行山地区屯有重兵，又在平汉铁路以西布防，使日军不敢再沿平汉路南下。日军乃改变战略，除决定继续向郑州施压、牵制当地国军外，主力沿长江和淮河西进。负责进攻武汉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辖第二、十一两个军，共约13个师团，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所辖之五个半师团为主力。日军沿长江西进，为国军第九战区防地；沿淮河西进，绕道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北麓，为第五战区防地。蒋委员长于此二战区置兵百万，节节迟滞日军的进攻。沿长江西进的日军，于6月15日占安庆，6月26日占马当要塞，7月5日占湖口，7月26日占九江。国军在长江南岸的瑞昌一带阻击日军约一个月，至8月24日自瑞昌撤退，日军进入湖北境，逼近武昌。长江北岸的日军，于8月4日占湖北黄梅，9月29日占田家镇，10月24日占黄陂，直逼汉口。自合肥向大别山区北麓进攻的日军，于8月30日占安徽西部的六安，9月7日占河南东南部的固始，10月12日占平汉线上的信阳，南下

²⁸ 《中日战争史略》（二），页211-217；前引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页100-103；吴汉城，〈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浅析〉，《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页37；前引贾维，〈试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高潮〉，页96-97；吴相湘，〈八年抗战的重要会战〉，《明报月刊》139期；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580-588有关记载。

直逼汉口。10月25日，国军自武汉撤退。江北及鄂北国军除留一部分于大别山从事游击战外，转移到平汉线以西的随县、枣阳地区；江南守军除留一部在赣鄂交界的九宫山从事游击战外，转移到湖南北部新墙河（自东西流入洞庭湖）至江西北部修水（自西东流入鄱阳湖）一线。日军在江西停留在九江、南昌间的德安，在湖南停留在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在河南则停留在河南南境的信阳。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结束。武汉保卫战，蒋委员长在战略上的主要成就是诱使日军的主攻方向，由「自北南下」改变成「自东西上」。在武汉保卫战进行期间，华南日军于5月12日占厦门，并于10月12日自广东惠阳外海的大亚湾登陆，15日陷惠阳，21日陷广州；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西撤²⁹。

附带一提的，当时实行「焦土抗战」，在军事撤退前，尽量破坏城市中和军事上的重要建筑物，不让敌人利用。在武汉撤退之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于11月12日得知日军攻占岳阳，进向长沙，即下令于长沙放火，烧毁长沙全城三分之二的建筑。事后军委会追究责任，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革职留任³⁰。

前述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撤守以后的一年多间，为抗日战争的第一期。此期的主要战略是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选择重要据点，给予日军阻击，以迟滞日军长驱直入，并唤起国际的注意、争取国际的援助：避免以主力军作孤注一掷的决战，以免战败投降。日军的战略则是速战速决，寻找中国的主力军决战，并以强烈的攻势、残酷的屠杀，企图迫使中国投降。日军在此一阶段，占有中国沿海各省广大的土地。国军退守的防线，北自绥远西部的后套平原，向东沿山西、陕西间的黄河而南，沿山西、河南间的黄河而东，至平汉铁路的郑州；再沿平汉铁路西侧的山地而南，经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经湖南和江西二省的中部和南部至广东北部、广西北部，至贵州、云南东部边境。此线以东，在山

²⁹ 前引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页103-105；前引贾维，〈试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高潮〉，页97-98；彭敦文，〈试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页23-24；《中日战争史略》（二），页221-229；宋长志，〈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近代中国》60期，页26；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588-593有关记载。

³⁰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65-466。

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均有敌后战场，或为国军开辟，或为共军开辟，或国共军混合开辟。日本并没有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

战场的演变，第二期（1939. 1-1941. 12）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武汉撤退后，国民政府建立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加强敌后作战，迄于1941年12月的三年间，为抗日战争的第二期。此期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只有半个山西、半个山东、以及河南、安徽、江苏的一角。此期日本的战略是持久战，日军在正面战场进出于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岳阳、大通、杭州、广州之线，并占领广州，控制珠江口及长江沿岸与华北、华东各铁路沿线十公里内外之狭长地带。在国际局势方面，美、英对日本敌视日深。美国于1938年7月1日公布对日本战略物资禁运令；11月6日根据九国公约，抗议日本建立大东亚秩序；1939年7月26日废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1941年3月将武器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英国于1939年9月德国进兵西欧以后的一年间，为应付欧洲战场，尽量安抚日本，曾封锁中国的滇缅公路，但至1940年10月即重行开放滇缅公路，于1941年4月提供中国法币安定基金五千万美元。另一方面，苏俄则极力诱使日本南侵。1938年7月日军在张鼓峰挑衅，苏军尚竭力抵抗，造成日军一个师团的损失；到1939年9月15日，时德国已开始侵略西欧，苏军与日军在诺门坎自5月以来的冲突，即以停战协议结束。到1941年4月13日，更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此期日本开始进兵东南亚及南亚，并准备攻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³¹。在中国，除继续对正面战场施压外，在占领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强化占领区的治安，消灭中国的敌后势力，并伺机扩展新的占领区。国民政府的战略，经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决定，本持久战之原则，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化敌人后方为前方，策应游击部队，迫使日伪势力局促于点线。此期间，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十个战区，主力置于第二（山西）、第三（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第

³¹ 《中日战争史略》（三），页261-264。

五（皖西、鄂北、豫南）与第九（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四个战区³²。另开辟鲁苏战区及冀察战区，加强敌后作战。

此期各战场的情形，在1939年一年，自北而南，绥远西部方面，固阳、包头、萨拉齐一带有战争。山西方面，晋西北的五寨、岚县，晋西的大宁、吉县、宁乡，晋东南中条山地的风陵渡、芮城、垣曲、夏县，晋南的浮山、晋城，晋东南太行山地的长治、潞城、黎城等地，都有战争。河北方面，冀中的定县，冀南的威县，有战争。山东方面，鲁南的莒县、沂水、费县，有战争。江苏方面，苏北的邳县、淮阴，苏南南京、太湖间的溧水、溧阳、宜兴，皆有战争。安徽方面，皖北的蒙城，皖南的宣城、繁昌、青阳、铜陵、贵池、安庆，均有战争。河南方面，豫北的武陟、沁阳、济源，豫东北的开封、杞县、鹿邑，豫南的南阳、新野、唐河，信阳，均有战争。湖北方面，鄂北的枣阳、随县，鄂中的钟祥、京山、天门，鄂东北的浠水，鄂东南的咸宁、通山、崇阳、通城，都有战争。湖南方面，湘北的岳阳、长沙等地有战争。江西方面，赣西北的修水、武宁、德安、庐山、永修、安义、靖安、南昌、奉新、高安等地，皆有战争。浙江方面，杭州、定海、温岭等地有战争。福建方面，闽、粤交界的诏安有战争。广东方面，广州以北的花县，广州东北的增城、从化，广州以东的东莞，广州以南的中山、新会、江门，粤东的汕头、潮安，粤西南的北海、钦县，皆有战争。海南岛方面，榆林、文昌、安定等地皆有战争。广西方面，桂南的邕宁、南宁、昆仑关（在南宁东北）等地有战争。上述战争约150次，由日军发动或获胜者约占三分之一，由国军发动或获胜者约占三分之二。在诸多战争中，以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第一次）、桂南会战最重要。兹分述如下：（1）南昌会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军在江西战场停军于南昌北部之德安一带。1939年3月，德安一带日军以五个师团的兵力向南昌等地进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等守南昌，接战失利，南昌于3月27日弃守。此后月余，国军谋自南昌以西之高安、奉新等地规复南昌，无所成。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战死，该军师长刘雨卿负伤。（2）随枣会战：发生在5月初，豫南鄂北日军向汉水以东随县、枣阳一带

³² 宋长志，〈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页27-28；秦英军，〈试析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页79。

的国军进攻。鄂北地区的日军分兵两路，一路经钟祥、京山间，一路经应山、信阳间，向随县、枣阳进攻。5月7日，随县、枣阳失守，5月12、13日，豫南日军陷南阳、唐河。5月13日国军反攻，于18日收复枣阳，23日收复随县，会战结束。先后参与或策应此一会战的国军有第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集团军。是役伤毙日军万余人。（3）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是年9月中旬，时日本已撤消其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改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统辖华北地区的第一军、第十二军，和华中、华南地区的第十一军、第十三军和第二十一军。在长江中游作战的主要为第十一军。9月中旬，赣北、鄂南、湘北日军约18万人，分路自湖南东北进攻长沙。9月19日，自南昌西进的日军一度陷高安，但为国军所阻。9月29日，由鄂南通城、和由湘北越新墙河南下的日军，越过汨罗江，进抵长沙东北福临、金井、永安一带，受到国军的反击。长沙为第九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该战区有兵力47个师，分属第一、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集团军。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司令长官为陈诚）采布袋战术，坚强两侧守卫，使日军在中间突入，最后予以围歼。至10月5日，日军败走，伤亡四万余人。（4）桂南会战：发生在11月初，日军第二十一军于1939年2月以后陆续攻占海南岛各地。为切断中国的桂越国际交通线，日军二十一军于是月15日在海南岛西北、广东沿岸的北海登陆，进向南宁，24日南宁国军退走。日军占南宁后继续北犯，12月4日陷昆仑关。18日，国军反攻，在昆仑关展开拉锯战，至31日国军收复昆仑关。国军在该地区作战的有第十六、二十六、三十八集团军。1940年6月，法国为德国所败，9月入桂的日军抽调部分兵力进取法属越南，国军乘机反攻，于7月30日收复南宁³³。

1940年一年的战场情形，自北而南，绥远西部方面，五原、临河有战争。山西方面，晋西南的中条山地区的夏县，晋东南的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晋东的娘子关，都有战争。河北方面，北平附近的

³³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597-612有关记载，战争次数据此约略估计；《中日战争史略》（三），页279-298，惟页292将三十八集团军误为二十八集团军；李巽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评述〉，《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页72，但有误；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页19，但有误；容鉴光，〈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国》77期，页90-96。

门头沟有战争。山东方面，鲁中的鲁村有战争。安徽方面，皖北的涡阳、蒙城、亳县，皖中的合肥、无为，皖南的青阳，皖西南的潜山，都有战争。河南方面，豫东的开封、商邱、鹿邑，豫南的沁阳，信阳、平昌关（信阳西北）、武胜关（信阳南）、长台关（信阳北），都有战争。湖北方面，鄂北的枣阳、高城（随县北），鄂中的潜江、荆门、江陵，沙市，鄂东的麻城、黄陂、田家镇、武穴，鄂南的通山，鄂西的宜昌、远安，都有战争。江西方面，赣北的马当、九江、德安、永修、奉新，靖安、安义，有战争。浙江方面，浙西的临安，浙东的萧山、镇海、绍兴、诸暨，都有战争。福建方面，东山岛有战争。广东方面，粤北的翁源、英德，粤中的花县（广州北）、增城、从化（皆在广州东北），粤南的上川岛、下川岛、灵山、钦州、防城，皆有战争。广西方面，南宁东北的昆仑关、九塘、甘棠、宾阳、思陇，南宁西南的明江、龙州、镇南关，皆有战争。上述战争约 75 次，由日军主攻或胜利者约占三分之一，由国军主攻或胜利者约占三分之二³⁴。其中较重要的会战为枣宜会战，发生于 1940 年 5、6 月间。5 月 1 日，豫南鄂北日军由信阳、随县，鄂中日军由钟祥，向枣阳进攻，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首当其冲。5 月 8 日日军陷枣阳。国军自豫南（沁阳、唐河）及鄂西来援，16 日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宜城南瓜店山区被围，负伤自尽。是日，三十一集团军克复枣阳。6 月初，襄阳日军南下，钟祥日军西上，6 日陷荆门，7 日陷江陵，9 日陷沙市，10 日陷安远，12 日陷宜昌。嗣国军第二集团军联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易为冯治安）等反攻，进至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一线以西和以北，与武汉地区外围的日军对峙。至是年 11 月 25 日，当阳、荆门、钟祥、随县等地日军，又向外围国军之阵地进攻，战斗五天，受到国军伏击、截击、追击，至 30 日恢复原来态势³⁵。此役在国军战史上称为「鄂中战斗」，为枣宜会战的余绪。

1941 年一年的战场状况，由北而南，绥西方面，五原等地有战争。山西方面，晋西孝义，晋西南中条山地区的永济、芮城、虞乡、解县，

³⁴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 1 册，页 613-626 有关记载，统计数字据此估计。

³⁵ 同上，页 617-620；前引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页 19；《中日战争史略》（三），页 313-318。

晋东南太行山地区的陵川，都有战争。安徽方面，皖北的太和、界首、涡阳，皖中的无为，都有战争。江苏方面，苏南的高淳、溧阳有战争。河南方面，豫北的孟县、济源、沁阳、郑州，豫南的信阳、确山、沁阳、汝南，遂平、舞阳、上蔡、唐河，正阳、项城、方城、西平，都有战争。湖北方面，鄂北的枣阳、随县，鄂东的广济，鄂西的当阳、宜昌，鄂南的通山、通城，都有战争。江西方面，赣北的奉新、高安、上高有战争。湖南方面，湘北的湘阴、长沙有战争。浙江方面，浙西的余杭，浙东的绍兴、上虞、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临海、永嘉、温州、瑞安、平阳，都有战争。福建方面，闽东的福清、长乐、福州、马尾、连江，都有战争。广东方面，粤中的花县、清远，粤东的陆丰、海丰、博罗、惠阳、香港、澳门，都有战争。上述国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约 126 次，由日军主攻或获胜者约占三分之一，由国军主攻或获胜者约占三分之二³⁶。

1941 年的战争当中，较为重要的有 1、2 月的豫南战役，3 月的鄂西战役，3、4 月的赣北上高战役，5、6 月的中条山战役，9、10 月的第二次长沙战役，12 月至次年 1 月的第三次长沙战役。豫南战役始于 1 月 24 日，信阳日军八、九万人分三路北犯。中路沿平汉路，25 日破明港，26 日陷确山，28 日陷遂平；右路 26 日陷正阳，28 日陷汝南，29 日陷上蔡，2 月 1 日陷项城；左路 26 日陷泌阳，30 日陷舞阳，2 月 1 日陷方城，2 月 4 日陷南阳，2 月 5 日陷唐河。约在同时，皖西北日军自亳州西犯涡阳，豫东北日军由开封、通许南下，以为策应。国军第二、第十一、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集团军分路迎敌，豫南国军 1 月 3 日克正阳，2 月 2 日克项城，2 月 3 日克舞阳、方城、平西，2 月 6 日克南阳，2 月 7 日克汝南，2 月 9 日克确山，2 月 18 日克明港。皖西北、豫东北日军一度陷安徽太和、界首，旋为国军收复。战役结束。鄂西战役发生于 3 月上旬至中旬，先后八日。宜昌日军发兵西攻，受到国军强力阻击，退回原阵地。上高战役始于 3 月 14 日，赣北日军两个半师团自南昌西犯奉新、高安，22 日进攻上高，为国军十九集团军所阻。25 日国军在上高东北棠浦大败日军，并克高安，4 月 4 日克奉新。战役结束。中条山战役容于敌后战场论述。第

³⁶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 1 册，页 627-645 有关记载，统计数字据此估计。

二次长沙战役始于9月17日（前哨战始于9月7日），赣北、湘北日军第十一军约十万人分路自粤汉铁路东侧越新墙河向长沙进攻。19日进至汨罗江，25日进至捞刀河，在长沙北侧与国军展开激战。此次战役，参战的国军有十九、二十七、三十等集团军。28日日军突入长沙市区，国军援军至，将长沙包围。30日日军突围北溃，国军追击，10月5日渡过汨罗江，8日越过新墙河。至11日，各线恢复原来状态。是役日军伤亡四万余人，主战场虽在第九战区，右面的第三战区，左面的第六战区，日军均有配合性的攻势行动。第三次长沙战役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时日军在亚洲大陆进攻香港，并派兵进入缅甸，为虑中国派兵支持香港及缅甸，发兵攻长沙。12月24日，湘北日军第十一军七万人渡新墙河，28日渡汨罗江，31日进至长沙北侧捞刀河，1942年1月1日猛攻长沙。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罗卓英等曾亲自在平江、浏阳指挥作战。1月4日，日军一度失利退却，1月5日得援军后再攻长沙，1月8日再度失利退却。前述各副司令长官分路率兵追击或截击。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16日恢复原来态势。是役日军死伤约六千人，一说五万余人³⁷。

在第二期作战中，日军像其他各期作战一样，均配合海空军。除在前敌战场配合海空军之外，亦派飞机轰炸战线后方。本期对大后方的空袭，对重庆造成极大的损失。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轰炸，房屋毁坏一千二百栋，市民死亡四千四百余人、伤三千一百余人。1940年6月5日的轰炸，校场口防空洞发生窒息惨案，死亡992人、重伤151人³⁸。

战场的演变，第三期（1942.1-1944.1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迄于日本一号作战结束，为抗日战争的第三期。1942年的一年，正面战场的对峙线改变无多，规模较大的战役，除第三次长沙战役外，只有发生在是年5月中旬到9月上旬的浙赣战役。1942年4月，美国航空母舰飞机于空袭日本东京等地后，在浙

³⁷ 《中日战争史略》（三），页319-326，329-332，335-344；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页628-629，630-631，638-639，644；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153-157，160-163，178-180，190-193；容鉴光，《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页96-106。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伤亡人数，吴相湘，《八年抗战的重要会战》，页308，谓六千余人，《中日战争史略》谓五万余人。

³⁸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586-588。

江地区机场降落，日本为防止美机穿梭轰炸，命中国派遣军尽速占领浙江地区之机场，并打通浙赣铁路，遂发动浙赣战役。由十三军自浙江金华一带沿浙赣路西进，由十一军自南昌沿浙赣路东进。浙江方面，日军于5月28日陷兰溪，6月7日陷衢州，6月12日陷江西玉山，6月15日陷上饶；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退福建。江西方面，日军于6月7日陷东乡，6月16日陷贵溪；国军第九战区派兵节节抵抗。此后国军反攻，江西方面，国军于8月19日占上饶、贵溪，8月21日克玉山、东乡；浙江方面，国军于8月24日克兰溪，8月28日克衢州，到9月2日，浙西赣东沿浙赣路两侧的日军后撤，恢复五月中旬以前的态势³⁹。此役日军动员7万人，国军投入30万人（包括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等集团军），共历时三个半月。另在1942年3月中旬至6月上旬，国军三个军曾进入缅甸配合英军抵抗日军入侵，容于下述。

1943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逐渐获胜；南洋战场，盟军亦部署反攻作战。日军在中国所发动的主要战役有二：一为鄂西战役，一为湘北的常德战役。两个战役的日军皆来自鄂中，一部向西南进攻，国军在鄂西宜昌以南抗御，称鄂西战役；一部向南进攻，国军在湘北华容、南县、常德抗御，称常德战役。兹分述如下：（1）常德战役：3月8日，鄂中日军自江陵渡江南犯，3月10日陷湘北华容，5月8日陷南县。5月10日越洞庭湖，进攻洞庭湖南岸之公安，一度攻陷。其后南县、公安先后于6月3日、6月14日又为国军克复。到11月3日，日军复陷南县、公安，11月18日，日军攻常德，12月3日陷之。其后国军反攻，12月6日克常德，12月20日克南县，24日克公安，战争结束。此役中日双方均派出大批空军支持作战，空战至为激烈，日机被击落或击毁数十架。（2）鄂西战役：日军自1940年占领宜昌后，北受汉水上游国军之侧击，南受沔阳、监利地区国军之牵制，态势不利。3月22日，鄂中钟祥日军向西南进犯，5月13日进至宜昌东南的枝江，5月24日陷宜昌以南的长阳。其后国军反攻，6月1日克长阳，2日克枝江，战争结束。是役日军参战者为第十一军，投入兵力约六万人；国军参战者为第六战区属下之第十、第二十

³⁹ 《中日战争史略》（三），页347-355；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204-213。

九集团军⁴⁰。另外，在1943年10月下旬以后至1945年3月下旬，尚有缅北滇西作战，容于下述。

1944年一年的战场情形，主要为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目的在打通平汉路、粤汉路、湘桂路，俾与南亚的战场联为一气；南亚战场与中国关系密切者为缅甸战场。此处先论述日军的「一号作战」，再论述缅甸战场。1944年4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动员河南北部、南部及皖西日军向河南中部进犯。17日，河南北部日军第十二军六万人自中牟渡黄河南犯，第一战区汤恩伯部、胡宗南部十万人迎战，国军战史上的「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开始。日军于4月20日陷郑州，5月1日陷许昌。5月2日河南南部信阳方面军日军北犯，5月9日与南下日军会于确山以北的驻马店，平汉线打通。另一支十二军于5月4日陷宝丰，5月13日陷宜阳，5月25日陷洛阳。5月19日，国军一度克复平汉线上的西平、遂平、确山等地，旋又为日军攻占。此役之后，河南大部陷于日军之手，惟叶县、鲁山以西的伏牛山地仍在国军之手；而皖西日军西犯亦无所进展。约在「中原会战」的同时，湘北、鄂南一带日军约十万人，在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下，自崇阳（鄂南）、湘阴、岳阳（湘北，洞庭湖东）、华容（湘北，洞庭湖西北）南犯，谋打通粤汉铁路，第九战区陈诚部、薛岳部迎敌，国军战史上的「湘桂战役」开始。湘阴、岳阳日军于5月27日渡新墙河，5月30日渡汨罗江，6月5日逼近长沙，是为中路；崇阳日军于5月29日陷通城、趋平江，是为左翼；华容日军于5月30日陷南县，6月5日陷沅江（县名，洞庭湖南岸），是为右翼。过汨罗江之中路日军于6月10日进至长沙北捞刀河，与国军激战；沅江方面之右翼日军于6月13日自益阳进犯宁乡，逼近长沙西北；平江方面左翼日军于6月11日以后进向浏阳。其后，捞刀河方面中路日军自长沙以东渡浏阳河进攻长沙东南的株州，6月16日陷之。6月17日陷长沙以南的湘潭，18日陷长沙。是后，中路日军南下，6月24日陷衡山，25日攻衡阳。第十军方先觉部一万七千余人在衡阳拒敌。左翼日军曾在醴陵、茶陵一带与国军进行拉锯战，最后亦逼近衡阳；右翼日军循永丰、金兰寺之线前进，国军节节抵抗，终退保衡阳。

⁴⁰ 《中日战争史略》（三），页356-360；（四），页373-375；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231-266有关记载。

此后，日军一面围攻衡阳，一面南下，7月2日一度陷耒阳。8月8日，日军陷衡阳，8月14日再陷耒阳。湖南段粤汉路失守。是为湘桂战役的一个战场，在国军战史上亦称「长衡战役」。当日军围攻衡阳之际，广州日军二十三军沿粤汉路北犯，并沿西江西进；雷州半岛日军亦西犯，指向广西南部。日军占衡阳后，冈村宁次复率新设之第六方面军（包括第十一军、二十三军、三十四军）的第十一军约七、八万人沿湘桂路向西南进犯，指向广西北部。当时广东属国军第七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沿湘桂路日军于9月8日陷湘边东安，9月14日陷桂边全州。9月16日，自广州沿西江西进之日军陷肇庆，北路由怀集陷桂边信都，自雷州半岛西进之日军陷广西陆川。9月20日，自信都南进之日军陷梧州，9月29日陷南平，11月3日陷贵县。11月11日沿湘桂路南下之日军陷桂林，12日陷柳州，15日陷宜山。11月22日，自贵县西上之日军陷南宁，25日打通自柳州经南宁至镇南关路线。12月2日，自宜山北进之日军陷贵州独山，四川震动。此后贵州国军反攻，12月6日克独山，12月10日黔境日军肃清⁴¹。是为湘桂战役的另一个战场，在国军战史上亦称「桂柳战役」。桂柳战役结束后，湘桂战争结束，日军的一号作战亦结束。附带一提的，在日军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军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共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四千余人于1944年10月31日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由延安出发，向被日军侵占的豫、鄂、湘、粤的敌后地区推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⁴²。

缅甸战场，为国军抗日战场的一部分。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通缅甸腊戍，自日本占领越南、阻绝昆明至河内的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后，滇缅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夏威夷偷袭珍珠港、于泰国进入曼谷（泰国结日）。蒋委员长虑中国国际交通断绝，于12月11日建议中、英联合保卫缅甸、马来亚，由中、美陆空军协同作战，英、美未予同意。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中国拟派两军八万人援缅，英军仅希望派一师。

⁴¹ 《中日战争史略》（四），页379-38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280-325有关记载；秦英军，〈试析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页80；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近代中国》42期，页40，45-48；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页14-15。

⁴²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93。

1942年1月16日日军自泰国进入缅甸南部未打（Winka），1月31日，英军退出毛淡棉（Mawlamyine），撤至萨尔温江下游西岸。2月16日日军渡萨尔温江，于23日败英军于锡坦兹（Sittanyz）。此时英军允国军第六、第五及第六十六军入缅作战，蒋委员长派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率上述三个军入缅，第六军由昆明经保山开往缅泰边区，于3月中旬到达孟畔（Mong Pan）、孟东（Mongton）地区，是为左翼：第五军任曼德勒（Mandala）至仰光一路的正面作战，前锋进至同古（东瓜，Taungoo）及以南地区；第六十六军由滇西进入腊戍（Lashio）、曼德勒地区，为预备队；英军第一军团负责伊洛瓦底江沿岸，在同古以西的普罗美（Prome）布防，是为右翼。3月7日日军第十五军占仰光，然后以十余万兵力北犯，国军第五军戴安澜师在同古布防，首当其冲。时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联合参谋长史迪威抵重庆，蒋委员长即以史迪威指挥中国缅甸远征军。3月28日，日军占同古，戴安澜师北退。4月1日，日军占普罗美，英军退守仁安羌（Yenangyaung）。4月16日日军在仁安羌围攻英军，4月19日为国军孙立人师解围。另一方面，日军在东路于4月20日占罗衣考（Loikaw），25日陷猛脑（Mong Naung），4月29日占腊戍，其后中，英军为日军所败，戴安澜战死。国军分两路转进，一路退入云南畹町（近滇缅界）、龙陵（近滇缅界），旋退至怒江以东，仍称为远征军（5月11日日军陷腾冲）。另一路由于日军于5月5日陷八莫（Bhamo）、8日陷密支那（Myitkyina），孙立人师辗转经太洛（Taro）、新平洋（Shinpwian），于5月30日自印缅边境退入印度雷多（Ledo），嗣转往蓝伽（Ramgarh，在加尔各答西北 Bihar 省）受训，称为驻印军。

1943年春，盟军计划反攻缅甸，中国为打通中印公路，亦积极推动缅甸反攻作战。是年10月驻印军孙立人师、廖耀湘师等自雷多进入缅北胡康地区，11月5日孙立人师克宁便（在滇西，孟关西北），1944年3月5日廖耀湘师克孟关（在滇西，近缅、印边界）。3月7日，入缅驻印军与美军会师于瓦拉本（Wakbum）。此期间，中国于4月1日及15日又运两师军队至蓝伽受训，补充缅甸战场的兵力。5月17日入缅驻印军与美军联合攻抵密支那，接近云南西境。云南西境国

军远征军在代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下，于5月中旬西进，兵分两路：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以腾冲为目标；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以龙陵为目标。右翼军于5月16日克泸水，19日克滇缅边境的片马，9月14日克腾冲。8月4日入缅驻印军会同美军克密支那，9月9日在腾冲附近与远征军会师。另一方面，卫立煌指挥下的左翼军于11月13日克龙陵，12月12日进抵滇缅国境线畹町。其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一号作战军进抵广西，蒋委员长欲调在缅作战的国军保卫桂林，为史迪威所拒。蒋以史仅注意缅甸战场，置中国战场安危于不顾，于9月19日电请美国撤换史氏。10月13日美国同意，并以魏德迈继史氏之任，缅甸战场则由美军将领索尔登（Sultan）指挥。虽然如此，当11月11日桂林失陷、12月2日独山失陷、四川岌岌可危之际，国军仍在缅甸战场为收复缅甸而战。12月15日入缅驻印军收复八莫，1945年1月15日败日军于南坎（Nanhkam，在八莫东南）。滇西远征军于1月19日克畹町，1月27日与入缅驻印军会师于芒友（Mongyu，在畹町西南），打通中印公路⁴³。缅甸作战告一段落。

战场的演变，第四期（1945.1-1945.8）

1945年为抗战最后一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至强弩之末，国军已开始进行反攻，有四个地区的战役值得论述：（1）粤北战役：日军谋打通粤汉铁路南段，自广州以北向北进攻，1月20日陷清远，22日陷英德，26日陷韶关；自湖南茶陵、耒阳等地南下之日军于23日据乐昌。粤汉铁路至是完全被日军打通。附带一叙的，此时粤东尚有国军据守，日军于1月15日陷博罗，16日陷惠阳，国军退守揭阳。

（2）豫（西）南鄂北战役：3月21日，豫西南日军第十二军分由舞阳、叶县、鲁山南犯，鄂北日军第三十四军由荆门北犯，国军第一、第五、第六战区分别应战或作牵制性之攻击。豫西南日军于3月24日陷方城，26日陷南阳，4月2日陷淅川；鄂北日军于3月22日陷宜城，29日陷襄阳，4月1日陷樊城，8日陷老河口。此后国军反攻得胜，鄂北国军于4月13日克老河口，16日克襄阳，18日克樊城；

⁴³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页1-6，15，20-25，35-37，133-134；《中日战争史略》（三），页344，347，360-372；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187-326，333有关记载；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页42-45；前引宋长志〈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页30。

豫西南国军于4月14日克南召，5月8日大败日军于内乡。迄5月底，战场恢复原来态势。(3)湘西战役：日军为剪除湘西国军对长沙、衡阳和湘桂路的威胁，进而摧毁国军在芷江的空军基地，于4月初旬及中旬分由湖南邵阳、安东等地向新宁、武冈以及高沙市、洞口等地进兵，4月29日犯芷江。5月2日，湘西国军王耀武部反攻，5月6日克新宁，攻芷江日军受挫，至5月9日败退。日军伤亡约一、二万人。(4)豫西战役：5月16日，豫西陕县日军四路西犯，谋策应前述豫西南战场，但屡为国军所败。至5月29日，豫西日军退回陕县原阵地。(5)广西反攻战役：中国自1944年12月25日于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统率第一(卢汉)、第二(张发奎)、第三(汤恩伯)、第四(王耀武)方面军，即在云南、广西、贵州、湖南部署反攻，而以广西最有进展。4月18日日军奉到日政府电令：为应付美苏两国未来行动，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和第二十七师团应在8月前集结在徐州以北待命。嗣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知日本政府准备放弃湖南，甚至武汉，乃决定在调第三、第十三和第三十四师团北上的同时，撤回湘桂铁路全线的兵力，但仍保守广州至武汉的粤汉铁路沿线要城。5月28日，中国派遣军再度接到日本政府命令，命迅速撤离湖南、广西、江西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占领区，将兵力移到华中和华北，准备对苏俄作战。是年4月，广西日军沿湘桂路向湖南撤退，5月以后，国军二、三方面军进行追击。张发奎部于5月27日克南宁(在左江、右江交会处；二江皆西江上源，会合后名邕江)。此后二、三方面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张发奎部沿西江上源左江向西南进攻，于6月9日克宁明，7月5日克镇南关，进至中越边境。一路由张发奎部沿邕江、郁江、浔江(三江皆为自左江至西江不同之河段)向东北进攻，6月22日克桂平，6月29日与汤恩伯部合克柳州。一路由汤恩伯部沿湘桂路向东北进攻，6月4日克来宾，7月24日克阳朔，7月27日克桂林，8月10日克全县。国军正欲进入湖南，而日本于8月14日宣布投降。此期间，其他正面战场亦有反攻之举，如8月11日绥西国军克复包头、归绥⁴⁴。兹不备举。

⁴⁴ 《中日战争史略》(四)，页387-389，419-42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327，332-333，341-379有关记载；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2册，页703-713有关记载；前引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页2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1128。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转化

正面战场较为单纯，基本上为国军与日军的对抗。敌后战场，较为复杂，对敌后国军和国军游击队来说，抗击日、伪军是基本任务，但亦防止共军势力的扩张。抗战后期，汪伪政权眼见日本将败，而共军游击势力扰乱其治安，有与国军游击队合作抗共的趋势。对共军来说，主要战场在敌后，以扩张地盘、扩建武力为基本目标；在此目标下，对日伪军、对国军游击队，均抱敌视态度。当时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日伪军不妥协，对国军及国军游击队则既联合又斗争；最初的一、二年联合较多，此后斗争较多。对日、伪军来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敌后势力，对其治安都有妨害，故经常进行清剿；但汪伪政权系自重庆国民政府分裂而出，其分裂不是主义与权力之争，而是对日和战方略之争。到日军败象显露之后，部分汪伪政权人员为了避免战后惩奸，暗中有与重庆合流共同对抗共军之势。

马占山首揭敌后抗日之旗

敌后战场应溯源至 1931-1932 年间马占山在东北组义勇军抗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躲在北平不出，国民政府受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在北平）的推荐，委黑龙江省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于齐齐哈尔就职，决心守土。11 月 3 日日军进攻，马于 18 日自齐齐哈尔撤往海伦。1932 年 2 月接受日本招降，任伪黑龙江省长。一度赴长春参加满洲国成立大典，嗣因张学良遣人劝说，复于 4 月 7 日前往黑河起兵抗日。马在黑河，联络李杜、丁超、苏炳文等抗日军，组东北抗日救国联合军，转战于黑、吉两省北部铁路沿线。嗣东北抗日救国联合军失败，马占山率部数百人于 12 月自海拉尔退入苏俄境内，经西伯利亚西走，部队后经

新疆返国，已则游历苏俄、波兰、德国、法国、义大利等国，于 1933 年 6 月经香港回国。时国民政府对日方采妥协政策，马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寓居天津租界。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委员长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令其收编零星部队，策反伪蒙军队。马于是年 8 月在山西大同组总司令部，展开工作，有部队万余人。嗣将部队移归绥，受推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长。10 月 14 日归绥陷落，马退至包头；包头沦陷后，复将部队移至伊克昭盟准噶尔旗。1938 年春，曾击败伪蒙军的攻击；为牵制日军进攻徐州，马并曾反攻归绥，但未成功。此后，续在归绥、五原、托克托一带袭击日军。1940 年 5 月，国民政府再任命马为黑龙江省主席。1941 年 8 月马正式在陕西榆林成立黑龙江省政府。日本投降后，马奉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命，率军自准噶尔旗前往张家口接收，途中为共军所袭。后马将部队交傅改编，已则寓居北平，1949 年 1 月与傅作义一起投共¹。

国民政府开辟的敌后战场

马占山的抗日事迹，可视为敌后战场的一个个案。在 1937 年以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开辟了许多敌后战场，无法一一论述，仅能作整体的观察。兹先讨论国民政府所开辟的敌后战场。国民政府开辟的敌后战场有两类，一类是留在或转入敌后的国军所进行的正规战和游击战，一类是在敌后策动、组织而建立的游击队（称为纵队或保安队）所进行的游击战。国民政府的敌后游击队，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即由有关党、政、军、特人员在敌后发动，但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是 1937 年冬天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由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议，作成决议，通令各战区施行。到 1938 年 11 月 25 日，蒋委员长在南岳军事会议中提出作战方针：「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蒋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此后除一、二、三、九各战区经常派十余个师进行游击战以外，1939 年春

¹ 刘邦厚、斐林，〈评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学习与探索》，1981 年第 5 期，页 132-138；奇天祥，〈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挺进军〉，杜海荣，〈马占山将军在绥远抗战的前前后后〉，均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2 辑。

并增设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专任敌后作战。主要原因，除配合战略上的需要外，日军随着占领区的扩大，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少数城市及铁路沿线，大片沦陷区无法控制，予开辟敌后战场可乘之隙²。

国民政府建立敌后战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大体说来，1937至1942年为发展期，1942-1945年为衰落期。兹先言发展期。发展期的敌后武力，在1941年春天，国军游击队约54万人，共军游击队约25万人；共军游击队武器较国军游击队为差。第一战区在1939年1月至1941年11月间，有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孙桐萱）（辖豫东游击司令）、豫南游击总指挥、豫北游击司令、河北游击司令、豫鲁边区游击指挥官等建制，1941年12月至1942年12月有豫北游击司令、豫晋边区游击司令、豫鲁边区游击指挥官、河北游击司令、太行游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辖豫晋边区指挥官、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中条游击区总司令（高桂滋）等建制。第二战区在1939年1月至1943年间，有第七游击纵队司令、第三游击司令、陕东河防游击纵队司令、河北民军总指挥等建制。第三战区在1939年1月至1943年间，有福建保安司令（陈仪）、温台宁守备总指挥（俞济时兼）、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陶广）、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兼）、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军事特派员等建制。第四战区在1939年1月至1940年12月间，有西江挺进司令、琼崖游击区守备司令、游击纵队总指挥、广东南路第七区游击指挥官、粤桂边区游击司令等建制。第五战区在1939年1月至1940年12月间，有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部豫边区游击总指挥、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李品仙先后任之，在大别山区）、鄂东游击总指挥等建制；1940-1943年间有豫南游击总指挥、鄂北游击总指挥、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鄂东游击总指挥等建制。第六战区在1941-1942年间，有游击总指挥、挺进军总指挥等建制。第七战区在1940-1943年间，有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主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海陆丰守备区司令等建制。第八战区在1939年1月-1942年间，有绥远游击司令、察哈尔游击司令、晋察绥边区挺进军、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辖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等建制。第九战区在1939年1月-1943年间有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1942年改

² 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页71。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等建制。第十战区在1939-1940年间,有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等建制。鲁苏战区在1939年1月-1940年间,有山东游击总司令(沈鸿烈),下辖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韩德勤兼)、鲁东游击总指挥(牟中珩兼);到1942年4月,山东游击队改由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冀察战区在1939年1月-1940年间,有河北民军总指挥、战区游击指挥官(孙良诚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兼)等建制;1941-1943年间有第一游击区总指挥(孙良诚兼)、太行山游击区总司令(庞炳勋兼,与第一战区重叠)。前述十二战区,除第十战区无纪录外,国军正规战不计,仅就游击战而论,在1939年1月-1941年6月间,第一战区933次,第二战区842次,第三战区1,095次,第四战区276次,第五战区1,008次,第六战区219次,第七战区100次,第八战区134次,第九战区1,038次,鲁苏战区1,028次,冀察战区1,099次³。

各战区游击战的详情,无法细述,仅举例说明大概⁴:

(1) 第一战区:国军在河北败退后,民众发起抗日武装。国民政府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在冀南一带活动。豫东游击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参与发动,1937年11、12月间,冯命其部属宋克宾、魏凤楼等赴豫东建立抗日武力,声势遍及商邱、夏邑等县。1939年4月谋切断陇海路,第三集团军曾派兵攻入开封。

(2) 第二战区:第二战区的游击区主要有三:一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开辟者。宋部于1937年10月在河北涿县战败退守山西,一部留在冀南游击,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和孙殿英部则留冀西太行山南部游击。一为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开辟者,傅部于1938年2月间在晋西吕梁山南麓隰县一带抵抗日军,嗣转入吕梁山展开游击战争。三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开辟者。卫部于太原失守后,驻守晋西南中条山,自1939年春天起,至1941年5月间,共打退日军八次进攻。太行山地区大部为共军的游击区,国军活动力较弱,兹不多论。吕梁山地区的游击战争,其较为重要者,如1939年10、11月间,日军一

³ 刘凤翰,〈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90期,页40-60。

⁴ 《中日战争史略》(三),页298-311,327-329;(四),页433-454;前引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页72-76;潘荣、萧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页121-127;李冬春,〈抗战初期鲁西北抗日局面的开辟〉,《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页95-10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页202。

度攻陷宁乡、蒲县，旋为国军克复。中条山西北与吕梁山相连系，东北与太行山相犄角，控制豫北晋南，为第一、第二战区协力坚守。中条山地区的游击战争，其较为重要者，如 1939 年 12 月日军攻闻喜、夏县被击退，国军乘胜占领绛县、翼城等地。1940 年 4、5 月间，日军占平陆、芮城等地，旋为国军收复。1941 年 3、4、5 月间，日军集六个多师团，分别从豫北之沁阳、博爱，晋南之晋城、沁水、绛县、闻喜等地，向中条山区进攻，国军不支，部分转至沁水以北，部分转至吕梁山和太行山区。实际上，自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即将第二战区的三十多个师全部转移山区，并按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1938 年春，为牵制日军进攻徐州地区，阎锡山曾发动各游击部队反攻太原，但无所成。1939 年 12 月以后国军游击队在太行，中条、吕梁山区与日军角逐时，国共游击队在此一地区发生冲突。嗣国军游击队退守晋西南和晋西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则为共军所有。如前所述，晋西南的卫立煌部于 1941 年 5 月为日军所逐，中条山游击区丧失；惟晋西北以至绥远南部地区，为陈长捷的六十一军驻守。

(3) 第三战区：1937 年 10 月淞沪会战期间，上海闻人杜月笙组淞沪别动总队，1938 年春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活跃于苏皖浙交界地区。又杭州失陷后，国民政府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将部队深入敌后活动。浙江各县发起的游击武力有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太湖别动队、抗日义勇军等名目：活跃于浙西杭嘉湖地区者，尤对日伪政权的治安构成困扰。第三战区重要的游击战争，如 1939 年 12 月，三十二集团军曾派兵袭扰南昌，第十集团军曾派兵袭扰杭州。日军为解除杭州威胁，于 1940 年 1 月南犯，占领萧山。1940 年 10 月，二十三集团军曾派兵袭占马当，旋撤退。1941 年 3 月，江苏日军陷溧阳，旋为国军收复。是年 5 月日军攻陷福州，至 9 月为国军收复。

(4) 第四战区和第七战区：第四战区原辖广东、广西，1940 年 7 月以后，广东独立为第七战区。为方便起见，两广地区一并叙述。1939 年 2、3、4 月日军攻占海口、榆林后，琼崖保安司令王毅退守五指山，从事游击战争。粤北方面，日军于 1939 年 12 月自粤中北上，攻陷从化，英德等地，至 1940 年 1 月为国军收复。1940 年 5 月，日

军陷从化、花县，旋为国军收复。粤东方面，1939年6月日军进攻汕头，国军退守揭阳。1940年5月日军陷惠阳，旋由国军收复。

(5) 第五战区：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军委会令第五战区确保大别山为武汉保卫战的前哨。第五战区即呈请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游击总司令，并兼安徽省主席及省党部主委。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自鄂东向鄂西撤退，仍将廖部留驻大别山。廖以立煌（后改金寨）为基地，配合地方游击队，迭向平汉、津浦两线南段日军袭击。1939年5月曾派兵袭取安庆，虏获军品甚多。是年10月廖病逝，遗缺由李品仙继任。是年11月，日军分路进攻天门、钟祥、随县等地，国军节节抵抗，并进行强烈反击，互有胜负。1940年5月初，日军进攻宜枣地区，李品仙自大别山区派军由麻城向黄陂进攻，以为牵制。至5月中旬，第五战区襄樊方面的主力部队获胜，李部始撤回原防。1941年3月，日军自合肥等地对皖东（合肥以东）游击区（以梁园为中心）进行扫荡。李品仙派部向合肥方向进击，以为牵制，终解皖东游击区之危。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李品仙配合随枣方面国军，袭击湖北孝感以北的平汉线，以为牵制。

(6) 第六战区：1939年12月，国军五十三军曾袭击岳阳，被日军击退。

(7) 第八战区：1939年12月，绥西国军袭包头，予日军重创。1940年1月，日军攻绥西五原、临河，一度形成拉锯战，至4月恢复原来态势。

(8) 第九战区：1939年12月曾派兵袭扰奉新、靖安等地，伤毙日军颇多。

(9) 第十战区：陕北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南为国军驻守区，因受山西、河南之翼护，日军尚未侵入。1940年6月第十战区并入第一战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完全处于敌后的两个战区，即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苏、鲁、冀、察地区的游击战争，较正式成立战区为早，到战区成立后组织更为完备。就山东而论，1937年10月日军进犯山东后，省主席韩复榘退走，各地抗日军蠢起。有为地方官员就地组军抗日者，

如范筑先；有为军委会派人组织者，如秦启荣。范筑先为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有保安队五万余人。1938年8月为牵制日军攻武汉，曾发兵攻济南，到是年11月遭日军围歼。秦启荣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1937年11月在鲁北惠民组织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次年移至鲁南沂水、莱芜一带活动。1938年1月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鲁西曹县就职，加强山东各地游击战争，并恢复各级党政运作，最后于1939-1943年间在沂蒙山区建立基地。1939年初，鲁苏战区成立，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军约二万人先后进入鲁南，分驻沂水、蒙阴、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地。1939年6月，日军自陇海、津浦、胶济三路分别派兵进攻鲁南，国军节节抵抗，最后退守沂山及费县、日照山区。1939至1940年间共军一一五师及一二九师各一部自河北省渗入山东省，与国军争夺地盘，1940年8月省府（在沂山山区之鲁村）被陷，国民党改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衍为山东省主席。此后迄于1944年间，山东地区国军在共军及日伪军夹击下，势力日衰。就江苏省而论，1937年12月淞沪会战失利后，江苏省政府迁至苏北淮阴。省主席韩德勤将长江以北各县保安团编成八十九军；苏北另有被日军截留的缪澂流的五十七军。鲁苏战区成立后，韩德勤任战区副总司令，有正规部队十余万，保安团队十五万以上。韩以兴化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39年10月，华中、华北地区日军进攻苏北国军根据地，国军节节抵抗，与日军互有胜负。1939-1940年间，共军新四军在苏北、皖北发展，建立洪泽湖根据地，屡与国军发生冲突。1941年3月，日军自高邮、宝应地区进攻兴化，国军向北转移，在盐城附近受到共军粟裕部的截击，损失颇多。

冀、察方面，如前所述，河北撤守后，国民政府在冀南建立游击势力，以张荫梧为总指挥，国军石友三部及孙殿英部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中共亦在冀南、冀中建立游击势力。1939年1月冀察战区建立，以鹿钟麟为总司令，节制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新八军高树勋部和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是年5月，张荫梧部为共军贺龙、刘伯承部击破，石友三等部亦深受抗日与抗共两面的压力。是年12月，石友三等部曾在冀南破坏平汉、津浦铁路。1940年3月九十七军及鹿钟麟为共军逐出河北境。嗣石友三谋降日被正法，国民党以孙良诚为三十九集

团军副总司令，节制六十九军及新八军。旋孙良诚被日军俘虏，鹿钟麟免职，国民党以高树勋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以鲁西濮县为根据地，继续游击。1942年4月，日军向濮县附近进攻，国军节节抵抗，至6月突围至安徽涡阳。

1942-1945年为国民政府敌后游击势力的衰落期。此期国军游击势力所以衰落，原因有三：（1）日、伪军强力扫荡游击势力，（2）国共军冲突，（3）内部不和。关于内部不和，如河北石友三与张荫梧之间、山东沈鸿烈与于学忠之间、江苏韩德勤与李明扬之间，都有矛盾。关于国共军冲突，如1943-1945年间，庞炳勋、孙殿英部在豫北，吴化文、张里元、刘桂堂部在山东，都先后与共军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关于日、伪军扫荡游击势力，如1941年5月日军以七个师团大举进攻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区卫立煌部，卫部全部自中条山区撤退。是年9月，日军乘胜攻击太岳山区（太原、临汾间）国军，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阵亡，部队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形下，在抗战后期，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逐渐萎缩撤销，只剩下点状的小游击区。冀察战区，1942年1月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决，由高树勋续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4月，日军大举扫荡高树勋部，经两个月激战，高部被迫退往皖北涡阳；5月，在鲁西南定陶、曹县的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投敌；冀察战区在冀南的部队归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统一指挥。1942年6月庞炳勋部在冀鲁交界的林县、陵川击退了日军的进击。1943年4-8月间，在太行山地的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受日军扫荡，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在豫北临洪镇被俘，庞本人在5月在晋东南陵川被俘，剩下刘进的二十七军于7月南渡黄河，退出太行山。鲁苏战区，1941年2月战区游击副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1942年5月日军对鲁中、鲁南于学忠部发动扫荡；1943年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与日军共同夹击于学忠部。自安徽前来增援的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在鲁西南为共军所阻。1943年夏天，于学忠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自鲁南迁往安徽。至是年8月鲁南行署主任秦启荣部为共军所灭，国军在山东只剩下寿光、昌乐等地的保安队。另一方面，在苏北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于1943年2、3月间受到日军的扫荡，经津浦

路以西，辗转至安徽阜阳。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吕梁山（晋西）根据地于 1942 年夏天挫败了日军的进攻。晋西南稷山一带国军于 1944 年 4、5 月间击退日军的进攻。第三战区，日军于 1944 年 9、10 月间进攻福州，10 月 4 日被攻克。至 1945 年 5 月 18 日，国军收复福州。第五战区，日军于 1942 年 12 月分道进攻豫鄂皖边境的大别山区，一度占有立煌，1943 年 1 月 12 日国军又克复立煌。1944 年 12 月，军委会将豫鄂皖边区，加上山东大部、苏北及豫东，划为第十战区，由李品仙任司令长官。第六战区的游击区在以沔阳为中心的江汉三角地带，至 1943 年 1、2 月间被日军攻破，国军化整为零，伺机再举。第八战区，国军于 1944 年 7 月攻占包头、黄河以南地区⁵。其他各游击区的情形不备举。在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事的衰落期，鲁苏战区已不存：与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有关的太行山游击区被清除；第二战区的游击势力仅保有晋西及晋西南一隅；第三战区在福州地区有拉锯战；第四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活动无多；第五战区土地大削，仅立煌失而复得；第六战区江汉游击区被清除；第八战区略有开展。

共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

与国军敌后战场处于竞争状态的是共军的敌后战场。1937 年 9 月共军接受国军番号自陕西出师抗日以后，中共内部对抗日的方式有两种意见，一是陈绍禹所主张的配合国军打大仗，一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发展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 1937 年 9、10 月间，共军曾在第二战区配合国军打过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到 11 月太原失守后，共军即转入敌后，建立独立自主的游击区。共军游击区与国军游击区类似，有两种武力，一为正规军，一为民间武力。共军的正规军初有两个军，一为八路军，被纳入第二战区，总司令朱德，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为新四军，被纳入第三战区，军长为叶挺。至于民间武力，大都是潜伏在敌后的党员或党部发动的，名称不一。八路军于太原失守后转

⁵ 前引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页 73-74，76-77；前引潘荣、萧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页 127-130。

入敌后或山区，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新四军则在苏、浙、皖一带活动。抗战期间，共军开辟的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1941年辖26县）以外，属于敌后战场的边区共18个，有的又分为若干小区。此18个敌后边区战场，在华北地区的有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河南、晋绥、冀热辽，共七个；在华中地区的有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湘鄂，共九个；在华南地区的有东江、琼崖。此18个敌后边区战场，有的两个以上合建一个政权，有的又分为若干小区，其间演变颇多。大体说来，1937年9月至1940年为敌后根据地的开辟阶段，1941-1943年秋为敌后根据地的保卫和巩固阶段，1944-1945年为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阶段。此一发展与正面战场息息相关，1937-1940年间，日军采速战速决方式，较注重正面战场，未重视占领区的巩固，国共军较易发展敌后根据地。共军曾于1940年8月至12月间，在华北地区动员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发动所谓「百团大战」。主要系对正太、同蒲、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等铁路交通线加以破坏，攻击沿线日伪军据点则成效不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陷于胶着，汪伪政权已成立，日、伪重视对占领区的巩固，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势力大肆扫荡。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扫荡，1941-1942两年共174次，1943年则达131次。在这种情形下，国军的敌后根据地几已无法维持，共军的敌后根据地亦大为缩小。但到1944年以后，日军败象已露，正面战场国军已开始反攻，日本对占领区的控制力亦弱，由于敌后的国军主力早已撤退或投伪，共军乃得在敌后迅速扩张，到抗战结束时，已有127万军队，控制一亿多人口⁶。

抗战爆发后，如前所述，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于1937年8、9月间相继进入山西五台山、晋西北和太行山，分别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东南根据地；1937年底，又在泰山和沂蒙山区建立鲁中根据地；此为共军在华北最初建立的四块根据地。1938年11月，八路军由山西

⁶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71-173；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页106；金达凯，〈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53期，页40-41；张宏志、陈英，〈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转变〉，《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页120。

分兵东进，一一五师进至冀鲁豫平原，一二九师和一二〇师分别进至冀鲁平原和冀中平原；山西地区的一二〇师和一一五师又分别向北进至绥远的大青山区和河北北部和东北部。上述东进和北进的八路军，先后又建立了冀鲁豫、冀鲁边、冀中、平北、冀东和大青山等根据地。当时八路军已发展到 15 万 6000 人。1941-1942 年，中共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扫荡，瓦解近半。至 1942 年冬天以后重新整顿，划分为四个边区，并建立边区政府⁷。兹将共军华北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演变情形分述如下：

（1）晋察冀边区（包括前述 18 个敌后边区战场中的冀热辽）：为共军在敌后所建的第一个根据地。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由陕西进入山西，10 月下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部进入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北岳区），着手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 月 7 日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 年 1 月 15 日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中心在河北阜平。是年 3 月，又开辟平西根据地，6 月再开辟冀东根据地（在蓟县、迁安一带，领导人李运昌）。另一方面，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于 1937 年 10 月未随部队南撤，团长（地下共党）吕正操在河北蒿城县将所部改为人民自卫军，到 1938 年春夏之交正式改为冀中军区（滹沱河一带）。1940 年底，联合平西、冀东向平北发展，建立冀热察区。1944 年 5 月，晋察冀军区正式组建四个二级军区，除冀中外，有冀晋、冀察、冀热辽。冀晋区在平汉、石太、同蒲三条铁路和恒山之间；冀中区在北平、天津、德县、石家庄之间；冀察区在保定到恒山线以北的平西、平北、察哈尔中南部和热河西南部；冀热辽区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锦州、赤峰、围场、古北口之间。这些根据地，时常受到日、伪军的扫荡，如 1941 年 8 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十余万军队，在晋冀察区进行扫荡；又如 1942 年 5 月，冈村指挥日军六、七万人，向共军冀中区进行扫荡。晋察冀边区的演变，大概说来，1937 年 7 月-1940 年 12 月为开拓期，1941-1942 年为萎缩期，1943-1945 年为再发展期。到抗战胜利前夕，控制土地约三十万平方公里，人民约三千万；八年之间，与

⁷ 此下论述共军敌后战场，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参考蔡国裕，〈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83 期，页 94-101；金达凯，〈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53 期，页 37-50；项迺光，〈中共对抗日战争之利用及其势力之发展〉，《近代中国》78 期，页 44-64。

日、伪军作战，共军伤亡约 11 万人，中共干部及所属群众被害致死者约 70 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共军的晋察冀根据地，大部分与国军的冀察战区重叠，双方互争地盘，国军失败，最后将冀察战区取消⁸。

(2) 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前述 18 个敌后边区战场中的晋冀豫、冀鲁豫、河南）：一二九师刘伯承部以晋、冀间的太行山为依托，与太原以南晋中地区的太岳山区打成一片。初成立太岳军区（晋冀豫军区，包括涉县、黎城、沁阳等县），其后东进越过平汉路，进入冀鲁豫平原，又建立冀鲁豫军区（包括太行山地及范县、观城、濮阳等县）。晋冀鲁豫的范围，西起同蒲路、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路、德石路，包括晋东南、冀西南、鲁西、豫北及江苏陇海路以北一小部。该区在 1940 年 7 月以前，实包括太行、太岳、冀南（1937 年 10 月下旬，刘伯承部在娘子关东南七亘村袭击日军，1938 年 8 月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鲁豫四区。是年 7 月成立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委员会⁹。

(3) 晋绥边区：1938 年 2 月，一二〇师贺龙部进入晋西北管涔山地区，收复五寨、保德等县，建立晋西北根据地。此根据地西界陕甘宁边区，东以同蒲路、平绥路与晋察冀边区毗连，西至黄河，北抵绥远大青山北麓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一线，南迄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分为晋西北区和大青山区两区，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前卫阵地。中共于 1940 年 1 月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1942 年 10 月成立晋西北临时参议会¹⁰。

(4) 山东根据地：山东根据地的拓展，主要来自两个力量：一为原在山东的中共山东省委，一为自山西进入鲁西的共军一一五师；省委发展者为游击队，一一五师发展者为正规军。先说省委所发动的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黎玉于 1935 年 9 月计划在

⁸ 谢忠厚，〈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2 期，页 173-188；萧平，〈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2 期，页 121-133；姜平，〈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战场是特殊战略进攻〉，《南开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5 期，页 67；朱德新，〈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2 期，页 185-195；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页 3-32；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5 年第 9 期，页 8-9。

⁹ 萧学信，〈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 年第 4 期，页 42-43；靳德行、翁有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1 期，页 169；魏宏运，〈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1 期，页 157；魏宏运，〈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5 年第 3 期，页 114。

¹⁰ 前引张宏志、陈英，〈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转变〉，页 117。

山东各地发动组织武装力量，预备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泰西、泰安徂徕山、沂蒙山区、临朐、淄博矿区、长山、昌潍、寿光和广饶以及胶东地区，分别建立武力。其后，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军；以聊城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二军；以临淄等地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或第三支队；以徂徕山为中心的泰安、莱芜一带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军或第四支队（成立于1938年1月1日）；以长山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以淄川、博山矿区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以昌乐、潍县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八军或第八支队；以济宁、荷泽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以沂水、莒县为中心的武力名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十军¹¹。1938年12月，中共将上述游击武力组织成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为总指挥，黎玉为政委。此后到1941年间，改编成六个支队和苏鲁支队、苏鲁边纵队等，共约五万人，主要的根据地在沂蒙山区和胶东¹²。共军一一五师一部由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于1939年3月8日自山西渗入鲁西东平县梁山泊附近，创建泰西根据地，后又进入新泰、宁阳、费县、泗水，向抱犊崮山区发展，1939年6月徐向前至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任司令员，辖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1940年9月时有兵力约七万人¹³。共军在山东敌后势力发展的过程中，即陆续建立各级政权，1940年时有79个县政权、10个专员公署、2个主任公署，当年8月并选举产生省临时参议会。到1945年7月时，有鲁南、鲁中、胶东、滨海、渤海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权。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次日山东共军即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有27万兵力，分路向日伪占领区和国军游击队占领区进攻¹⁴。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地区日伪军对国共军的扫荡和国共军的冲突。关于日伪军对国共军的扫荡，如1939年6月，日军二万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1941年11月，日军五万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

¹¹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页214-216，236-239。

¹² 同上，页201，211，218-219。

¹³ 同上，页203，211，218-219，290。

¹⁴ 同上，页204，229-231。

¹⁵。余不备举。需要说明的是，沂蒙山区亦为国军敌后武力所在地，日军的扫荡是不分国共的。由于国共军均在敌后建立抗日基地，而彼此之间又不能和平共处，冲突之事经常发生；又由于共军全部精力集中在敌后，国军只分部分精力集中在敌后，而国军在争取民众支持的技术上又弱于共军，国军的敌后势力遂日渐减少，共军则日渐壮大。表现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防止国共冲突，曾于1939年2、3月间指定共军防地为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泗水、宁阳。其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到山东，又规定共军的防区为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共军并不遵守约束，因此冲突时起。国军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3月下旬在博山和益都边区的太河镇、于8月上旬在莱芜的雪野村、于8月下旬在淄河流域，均与共军发生冲突。此后1940年6月在沂蒙山区省府所在地、1941年11月在鲁北14专员区所在地，国共双方均曾互相攻击¹⁶。由于共军攻势日烈，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山东省政府于1943年6月退往安徽阜阳。

华中方面，1937年10月，江南共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约一万人。新四军于1937年12月在汉口组建，1938年1月迁南昌，后移至皖南休宁县的岩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四个支队。是年6、7月间，陈毅率领第一支队、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建立了以大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在是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是年夏，谭震林率第三支队进入皖南芜湖、大通一带，第四支队进入皖中和皖东。是年10月，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11月成立江南指挥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的战略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迄于是年夏，新四军增建第五、第六支队。到是年底，新四军已发展到五万人，并创建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豫皖、及鄂中根据地。1940年5月，中共中央派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改）一部一万二千人南下，与新四军共同发展华中根据地。是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军渡江北上，在泰兴、泰州一带与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发生冲突。9月自鲁西南下之十八集团军支持新四军，韩部遂为所败。为避免苏浙皖地区国共

¹⁵ 同上，页220-221。

¹⁶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页202，206-208，227。

冲突，1940年10月19日、12月8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迭令新四军及黄河以南十八集团军开赴黄河以北作战，但共军并不听命。另一方面，共军为统一华中地区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于是年11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由于华中地区共军不遵约束，国军于1941年1月4日在皖南泾县南与新四军发生冲突，逮捕其军长叶挺，军委会并取消新四军番号，但中共于1月20日任命陈毅代军长，于1月28日复在江苏盐城建立新四军军部。当时该军兵力已达九万人，编成七个师，另有游击纵队。此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所建的根据地有九：（1）苏南根据地：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活动地区。（2）苏中根据地：在江苏中部，为新四军第一师（原第一、二支队，师长粟裕）活动地区。（3）苏北根据地：在江苏北部，为新四军第三师（由十八集团军南下纵队改编，师长黄克诚）活动地区。（4）淮南（皖东）根据地：在安徽东部、江苏西部，为新四军第二师（原第四、五支队，师长由副军长张逸云兼）活动地区。（5）淮北（皖北）根据地：在安徽东北部、江苏西北部，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活动地区。（6）皖中根据地：在安徽中部，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活动地区。（7）浙东根据地：在浙江东部，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活动地区。（8）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区）：在湖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以鄂东礼山、黄安为中心，又名「中原区」，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活动地区。（9）湘鄂赣根据地：在湘鄂赣边区（九宫山、幕阜山地区）：为十八集团军南下支队（司令王震）活动地区，归新四军指挥。这些根据地，时常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如1941年2、3月间，日军第十三军即向苏北根据地扫荡，目的是「歼灭江北兵匪，特别是新四军，铲除其地盘」¹⁷。余不备举。

华南方面，共军的根据地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为东江区，一为琼崖区。东江区在珠江三角洲，西抵三水、新会，东到惠阳，北至从化。东江区有两个抗日游击纵队，一为东江纵队，是由起于1938年11月

¹⁷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158，168-169；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页309；张宏志、陈英，〈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转变〉，《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页117；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页9。

的两股游击武力合组而成，曾生的武力在惠阳，王作尧的武力在东莞，1940年11月合编为广东人民游击队，1943年12月改为东江纵队。珠江纵队是由广东人民游击队发展而来，其中一部于1942年春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根据地，至1945年1月改为珠江纵队。琼崖区的活动中心在海南岛的五指山地区，冯白驹初于1938年12月组自卫团，其后势力发展，到1944年春改为广东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

敌后战场的作用与转化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是互动的。如前所述，几次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敌后战场都有牵制性的攻击，有时甚至藉此扩大了敌后收复区。例如在1944年日军进行「一号作战」期间，共军的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都乘机扩张。经过一年的发展，将华北地区的根据地与华中地区的根据地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满洲国以内的游击势力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敌后游击势力的发展，影响到日伪占领区的治安，据统计，日伪在华北地区所占领的四百个县中，1941年年底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40%，未治安地区占50%；到1944年秋，未治安地区占31.5%，准治安地区占66.9%，治安地区只占1.4%¹⁸。

敌后战场的武力，有三种不同的来源。第一种来源是敌后的人民，不愿受日本统治，自动起兵抗日；或利用抗日的名号，自树武力。第二种来源是无力或不愿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共军，渗入敌后发展；或由中共党人策动人民组织游击武力。第三种来源是渗入或被截阻于敌后的国军；或国军撤退后，未能撤走或并不撤走的党、政、军、特人士，策动人民组织游击武力。以上三种敌后武力来源，第一种在起兵不久，为了生存发展，多依附国军游击队或共军游击队，或流为土匪，可以不论。国、共军和国、共军游击队为敌后战场的主力，但双方作战的目标并不单纯。就共军和共军游击队来说，在敌后动员人民、抗击日伪军、扩充地盘是首要目标；为了扩充地盘，藉抨击国民党不抗日以鼓动民族主义的情绪、号召更多的支持者，并使攻击国军或国军游击队的行动富有正当性。就国军和国军游击队来说，敌后战场可以与正面战场相犄角，并可干扰日伪的统治与动员。另一方面，日伪

¹⁸ 前引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页15。

既无法有效控制占领区，在日伪占领区发展势力，不仅可以弥补正面战场丧失的土地，而且可以在敌后约束共党和共军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初时的国共敌后战场虽均以抗击日伪军为主要目标，及正面战场陷于胶着、日本败象显露以后，国共双方在敌后的主要力量即用在互相防备或互相兼并上。大概说来，1937-1942年间，国军及国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优势，1943年以后，共军及共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优势。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无法有效接收与复员的最大原因。

敌后战场的开辟，初时的目标是抗击日伪，中后期以国共斗争为主。国共双方为了制胜，甚且假日伪之手，消灭对方，使敌后战场变质。就国共长期斗争的策略而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看法都比较远，但毛较能抓住一般政客和一般人民的「近程目标」，而蒋在追求长远目标的道途中是比较寂寞的。

第八章
国家走向大分裂
(1945-1949)

第一节 中国卷入世界两大阵营

中国成为美苏对抗的中间地带

二次大战爆发前，德、义、日三国订有共同防共协议，以防备或进攻苏俄为目标。二次大战爆发后，由于中国战场陷于胶着，日本开辟了西太平洋战场，直接与美、英、法三国冲突。其后，随着苏军对德军的反攻胜利，美国极望苏俄投入远东战场，以配合美军自太平洋向日本本土进攻。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苏俄参加对日作战议定书」，私下允许苏俄于战后租借旅顺、大连，经办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并允许外蒙古独立。目的在使苏俄与美国联合向日本施压，俾早日结束对日战争。

在二次大战期间，苏俄和美国在远东战场的主要目标是抗日。初时苏俄在欧洲全力防德，在远东不仅支持国民政府抗日，且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目的在维护苏俄后方的安全。为了维护后方的安全，苏俄且于1941年4月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到德国对苏俄的威胁消除后，苏俄始伺机投入中国战场，俾获战利。美国投入中国战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初时希望中国战场能牵制日军，俾减轻日军对西太平洋的压力，嗣觉察国共间的地盘之争愈来愈烈，至于互相消灭的程度，加上中国战区同盟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与参谋长史迪威之间的统帅权之争，使美国对中国的抗日能力感到悲观，乃不惜在雅尔塔密约中牺牲中国利权，引诱苏军投入中国战场。在日本投降前，美、苏的基本目标是打败日本，都站在反侵略的阵营，但对获取中国利权而言，仍有彼此之分。苏俄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并派兵进入中国东北，中共亦派兵进入东北，与苏军合作，并得到苏军的帮助。但初时苏俄仍支持国民政府，并不希望中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续与国民政府进行夺权战争，而希望中共重要领导人能

与国民党人组联合政府。同时苏俄也希望在东北扶植中共的势力，俾牵制华北的国民党势力，必要时让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使东北、华北作为美、苏之间的缓冲地带¹。苏俄所以有此布局，因为苏俄在8月14日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在条约中获得在东北及外蒙古的特权，并已声明支持国民政府。上述的布局，在不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下，可以使苏俄在中国拥有半壁江山；尚没有考虑完全以中共取代国民政府。

在中日战争期间，美国只扶植国民党、不扶植共产党，而且因为扶植国民党的关系，在中国获得许多特权，这自然引起苏俄的不满。职是之故，1945年7、8月间，国民政府派宋子文、蒋经国为代表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即表示：如果能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获得权益，苏俄可以让步；将来美国是苏俄的主要对手，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坚持外蒙独立²。苏俄在东北保持优势，并扶植中共占有东北，引起美国的警觉。1946年底，美国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大肆抨击；到1947年底，更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国民党守住东北。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基本目标，在于推动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来领导一个独立、统一、与美国保持亲善、并能在远东阻止可能出现的苏俄侵略中国。从中国的混乱情形看来，短期内切实可行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³

当时苏俄的主要目标是与英、美、法等国争夺东欧的控制权，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中国所获得的利权为满足，如前所述，尚未计划全力支持中共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把中国视为美、苏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1947年底，毛泽东著文指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集团已经在冷战中形成，中共的革命力量是「以苏俄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亦曾指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的便是国、共之争；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打共反苏，反苏时必须连上中共，所以苏俄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不能不与中共隔离⁴。所谓中间地带，便是美、

¹ 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页123。

² 同上，页119。

³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页41，50。

⁴ 吴小松，〈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页63；何

苏皆争取的地带。对国民党来说，反苏反共是自由国家的共同义务，在中国亦不能专靠国民党，故要求美援；对中共来说，中共既为反美帝阵营的重要组成分子，不管苏俄的实际支持如何，自己都必须努力开拓与苏俄的关系。比较说来，在战后的头二、三年，国民党对美国的依赖较中共对苏俄的依赖为大。当马歇尔调解国共冲突失败、美国减少对华事务的干预时，国民党顿失所依；而苏俄眼见中共势力发展迅速，由限制中共扩张转而支持中共扩张，使国共斗争的后援力量此消彼长。此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与美、苏的关系

作为美、苏中间地带势力之一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与苏俄的关系较好；当时国民党唯一的军事外援来自苏俄。1940年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俄由于在欧洲应付德国不暇，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减弱；1943年国民党将新疆置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之后，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且趋于紧张。另一方面，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国民党的外援几乎完全仰赖美国。虽然1944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了维护中国战场的统帅权与史迪威冲突，使美国无法统一调度此一战区的军队，从而对国军的战斗力表示不信任；国民政府仍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同时国民政府也希望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苏俄虽然支持中共，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共的势力尚不足与国民党抗衡，苏俄为自国民党手中获取在中国的权益，也不欲国民党倒向美国一方，一面表示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一面尚约束中共的过度发展，以免刺激国民党与美国的结合。国民党鉴于中共的势力发展迅速，对苏俄势力介入中国非常警觉，这可从1945年7、8月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中看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起因于1945年2月的雅尔塔密约。当时美、英两国为促使苏俄对日参战，在中国没有代表的状况下，将中国东北及外蒙古的利权让给苏俄；此一让与，必须由中、苏直接谈判始能落实。国民政府不希望苏俄单独享有东北及外蒙古的利权，当

迪，〈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页18-19。

是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报告雅尔塔协议内容时，蒋介石表示愿意由中、苏、美、英四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并愿邀请美、英共同参加中、苏谈判，但美国对蒋介石的意愿不表支持。中国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在1945年6月30日至7月13日由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负责，7月30日至8月14日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共同负责。关于允许外蒙古独立，中国代表最不坚持，因为外蒙古自1924年已受苏俄鼓动而独立，一切体制早已学苏俄；中国希望先划疆界再承认外蒙独立，但未达到愿望。关于旅大问题，大连市政权归中国，港口租与苏俄三十年；旅顺则委托中苏军事委员会（苏方任委员长，华方副之）共同管理。关于中长铁路，承认由中苏共管，但理事长由中方出任，苏俄且不得在铁路沿线驻兵、运兵。附带条件有苏俄于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自东北撤兵，三个月内撤兵完毕。值得一提的是，苏俄保证绝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不支持新疆的匪乱。蒋介石明白指出，苏俄的这两项保证，是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的必要条件⁵。

战后国民政府对苏俄让步，主要在换取苏俄的支持，并希望苏俄约束中共，使与国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则以苏俄支持中共为由，要求美国支持国民党。蒋看出美、苏的矛盾，为了表示一意与美国合作，曾于1946年2月和5月，两次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访。但到1947年1月美国调解国共纠纷失败、对中国改采「静观其变」的策略以后，国民党内部出现「对外联苏、对内和共」的声音。1947年9月，蒋介石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表示要加强与苏俄的关系。1948年1月，苏俄驻华武官罗申表示苏俄愿意出面调停国共争端，引起美国官员不安。美国怕国民党抗共失败，杜鲁门总统（民主党）在共和党的督促下，于1948年2月恢复援助国民党。美国的援助，并未能使国民党扭转局势；国民党内有人发出对中共求和的呼声。1949年1月，蒋介石总统引退，李宗仁副总统代总统职。李宗仁负责军国大政后，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争取美援，又一面央求苏俄出面调停。苏俄以国民党不肯疏远与美国的关系，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到1949年8月，美国

⁵ 陈立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背景、经过及其检讨〉，《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2册。

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亦置国民党于不顾⁶。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的外援断绝，而中共得自苏俄的援助却不断增加。国民党谋和不成，作战失败，乃不得不自大陆撤守台湾。

国民党于 1928 年完成北伐后，正式统治中华民国，在国防上一直走集体安全的路。中外冲突发生时，或希望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主持正义，或恃强国为靠山。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国民党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靠山，对美国的支持深信不疑，故美国常能左右国民党的内政和外交动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把「租借法案」扩大到中国，宋子文成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作为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机构⁷。另一方面，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最高统帅，以美国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为参谋长。1944 年 10 月，因史迪威与蒋介石有统帅权之争，美国另派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为参谋长。当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8 月 18 日派私人代表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将军至华调解；史迪威回国后，赫尔利续留华调解国共纠纷。是年 10 月底，赫尔利草就五点方案作为国共双方谈判的基础，大意为：（1）双方承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统一领导。（2）国民政府给予中共及其他政党以平等、合法地位。（3）共军接受国民政府编制。11 月 7 日，赫尔利携此方案赴延安试探，毛泽东则要求「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蒋介石不同意「联合政府」的要求，但谓如共军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中共将领可以参加军事委员会。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条件，到 12 月 28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又提出四项新要求：（1）取消边区封锁，（2）释放政治犯，（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4）取消特务警察。赫尔利致函毛泽东，拟偕同国民党代表赴延安谈判，为毛拒绝；毛于 1945 年 1 月 11 日致函赫尔利，于上述四项之外，又加「由政府邀集国共双方及民主同盟等代表在平等地位上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期间，赫尔利于 1 月 8 日继高思（Clarence Gauss）为驻华大使。1 月 20 日，赫尔利再度致函中共，催促重开谈判。1 月 24 日，毛任命周恩来为代

⁶ 饶戈平，〈1945-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 年第 2 期，页 109，112，114；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 年）〉，《世界历史》，1986 年第 5 期，页 42。

⁷ 前引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 年）〉，页 37。

表，飞重庆谈判，周重申「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要求先开各党各派的预备会议，再开各党各派会议，以讨论联合政府的组织与实施步骤。1月26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与周恩来谈判，提出于行政院内设置一决策机构，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周恩来则坚持召开党派会议，不谈其他。在赫尔利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于2月3日另提对案，提议成立「政治咨询会议」，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对此对案未置可否。2月19日，赫尔利返美述职。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讲演，强调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3月9日，周恩来宣布，由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已告破裂。4月22日赫尔利自美返回中国后，对国共谈判深感棘手。7月1日，国民政府派国民参政员七人赴延安商谈，带回中共两点要求：（1）取消定于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2）召开党派会议。国民政府不答应。日本投降后，国共为受降及争夺地盘等问题冲突益烈。8月27日，赫尔利亲往延安，次日偕毛泽东飞抵重庆。此后在毛与蒋介石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展开四十一天的会谈，赫尔利则于9月22日返国述职。10月10日，「会谈纪要」发表，对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保障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惩治汉奸、解散伪军等问题获致协议；但对召开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及受降等问题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续在东北、华北采取军事行动；赫尔利因不满国务院内亲共分子对其调解国共纠纷多方掣肘，于11月27日辞去驻华大使职务⁸。赫尔利调解国共纠纷的任务告一段落。

赫尔利辞职之日，杜鲁门任命甫自参谋总长卸任的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为大使衔特别代表，至中国继续调停国共纠纷。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对马歇尔的中国任务发出函示，要点有二：（1）促使中国政府召开全国政治份子会议，使中国得到统一。（2）国共停战；一个分裂而经过内争摧残之中国，将不能成为美国考虑援助的对象。马歇尔于12月20日飞抵上海，12月21日飞南京会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2月22日飞重庆会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1946年1月5日，在马歇尔的要求下，成立三人小组：国民党

⁸ 蔡国裕，〈美国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与检讨〉（上），《近代中国》33期，页90-98；魏良才，〈马歇尔与所谓国共和谈〉，《近代中国》46期，页93-94。

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三人小组于 1 月 10 日达成发布停战命令的协议，由国民政府与中共当局双方下达。停战命令规定 1 月 13 日午夜 12 时生效，并规定在北平设军事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执行部亦成立三人小组：国军代表郑介民，共军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 美大使馆代办)。

另一方面，包括国民党、中共、青年党、民盟及无党无派代表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于 1 月 10 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到 1 月 31 日达成五项协议：(1) 国民政府委员四十人，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2) 1946 年 5 月 5 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3) 奉行三民主义及遵从蒋主席领导。(4) 军队国家化。(5) 起草五权宪法。其间，国民政府于 1 月 16 日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研拟整编军队办法。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国民党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三人小组至 2 月 25 日达成初步协议，预定在一年以后国军编为 90 师，其中共军占 18 师；一年半以后国军编为 50 师，其中共军占 10 师。

此期间，中共对马歇尔的调停极为欢迎，3 月 4 日马歇尔抵达延安视察时，毛泽东作歌，对马歇尔的调停之功大加颂扬。3 月 11 日，马歇尔返国述职。马歇尔为示中立，于返国述职后，将原已答应的对国民政府五亿元贷款取消。不意，马歇尔返美后，国共冲突转剧：其一、苏俄于 4 月初开始自东北撤兵，不仅先后劫掠东北重工业设备达 20 亿美元，且阻挠美国舰队运送国军前往东北接收。另一方面俄军将在东北挟获的日军及满洲国军的武器装备转交给共军，共军大量从山西（四万余）、河北（一万）、山东（十二万）进入东北，苏军并协助共军占领俄军撤退的地区，致使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营口等地，在短短一个半月内，相继为共军占有。其二、共军在热河攻占赤峰，在绥远攻占集宁，在河北攻占玉田、丰润，在河南攻占孟县、考城，在山西攻占侯马、浮山，在山东攻占栖霞，并于各地破坏铁路、桥梁。其三、原议之国民政府委员 40 名，中共坚持中共和民盟代表占三分之一（14 名），以享有否决权，国民党不让步，使政府改组无法进行；而依照政协决议，国民政府改组须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先。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又将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延至 11 月 12

日。其四、林彪集 30 万共军于四平街阻止国军从沈阳北上接收，引起国军杜聿明部反击，共军伤亡过半，退守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 5 月 21 日赴沈阳视察。国军接收东北的主权为军事三人小组所议定，马歇尔于 4 月 17 日返华后，为压制国共军事冲突，一面拒绝协助运输国军到东北、华北，一面请求民盟代表张君勱等居中调解。5 月 29 日，张君勱等电请蒋主席返京。6 月 6 日蒋主席接受马歇尔的提议，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停战令原只两周，后延至 6 月 30 日。停战期间，军事三人小组就终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及华中交通线等达成协议，但因国共双方对东北地方政府改组问题有意见，协议并未签字。事实上，战争亦未停止：共军在热河占据承德，在山东占据枣庄、德县、泰安、高密、胶县，在山西占据闻喜、朔县、新绛、榆次、介休。到 7 月初，中共开始强烈攻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国立即撤退其在华驻军。7 月中旬，共军在冀东逮捕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旋释放。7 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五十余人在安平受到共军袭击，队员三人丧生。另一方面，共军即在内蒙、华北、华中展开攻势，苏北的泰兴即于此时被共军所占。此期间，昆明有六家自由派的报纸被禁，而民盟活跃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于 7 月 11、15 日先后被暗杀，益增加中共和中间党派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性。在情势恶化的过程中，马歇尔一面建议美国政府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驻华大使，并于 7 月 11 日获参院通过；一面即于 7 月下旬开始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8 月 18 日杜鲁门总统且有明令发布。再一方面，马歇尔仍然把协助调解的事务寄托在第三党派身上；而马歇尔本人，于 7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期间，曾八上庐山，与蒋介石磋商和平问题⁹。

1946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文告，宣布 11 月 12 日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以政府未改组前不得召开国大为由，严加拒绝；一面于大同、张家口等地发动军事攻势，一面对美国政府和马歇尔本人大肆谩骂。9 月 3 日，蒋介石在马歇尔建议下，成立五人小组，商讨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召开问题。五人小组，司徒雷登大使为主席，

⁹ 邵玉铭，〈马歇尔使华再评估〉，《近代中国》46 期，页 86-91；前引蔡国裕，〈美国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与检讨〉（上）页 89-98，（下），《近代中国》34 期，页 143-152；前引魏良才，〈马歇尔与所谓国共和谈〉，页 9 小）98；王成勉，〈马歇尔与中国第三党派〉，《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 2 册；蔡国裕，〈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近代中国》79 期，页 167-176。

国民党代表为吴铁城（党秘书长）、张厉生（内政部长），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9月20日，共军攻占张家口。10月5日，蒋介石接受马歇尔的意见，决定停战十日。在此十日内，由三人小组商军事问题、五人小组商政治问题。国民党依据政协决定，期望五人小组促使中共提国府委员和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并迅速规定中共十个师的驻地。中共方面，则要求关内双方部队恢复1月13日停战前之位置，关外双方部队恢复6月7日停战前之位置，共军于10月11日先退出张家口；在政治上，中共要求中共及民盟人士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占十四席，国府委员会组成后，即改组行政院。双方意见仍相左，马歇尔调解无效。时以召开国民大会在即，第三党派积极出面调解。11月8日，蒋主席发布第三次全面停战令，并要求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名单，中共仍要求停开一党包办的国大，第三党派对是否提国大名单则意见分歧。11月11日，蒋主席决定国民大会延期三天开幕，以待各方提出国大名单。最后，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于15日提出名单，民社党迟至23日提出名单；第三党派或支持召开国大，或抵制召开国大，中共代表周恩来则于11月16日宣布：国大召开，和谈之门关闭，并于11月19日，乘坐美国提供的飞机回延安。

另一方面，中共除攻击国民党外，并在全国各地掀起反美运动。11月4日，中美商约发表，约中规定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等方面所享有的待遇，不低于中国商品。消息传出，中共及民盟人士于平、津、京、沪各大城市发起反中美商约运动。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军人企图强奸女学生沈崇案，中共藉此发起全国性的反美运动。此期间，美国政府陆续撤退或裁减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驻军，并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但马歇尔调解失败之后，并未立即回美，一方面促使参加国民大会的第三党派，尽量使宪法内容符合政协决议；一方面劝说第三党派合组中间大党，调和国共关系。12月25日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实质内容上符合政协决议，其中颇有马歇尔影响力的痕迹；但马歇尔希望结合第三党派成为中间大党，则无成就。1947年1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马歇尔的调处任务结束。1月8日，马歇尔返美就任美国国务卿。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退出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0日，此二组织正式宣布解

散¹⁰。

美国协助中国战后复兴，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只是一方面，另外尚有几方面值得称述：其一、下面即将论述，美国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留驻华北，为国民政府控制区的重要部门作警备。其二、迄 1946 年 6 月止，美国协助国军自大西南运送五十四万军队至东北、华北、华东的内战前线。其三、延长抗日战争时期的租借援助，自日本投降到 1946 年 6 月底止，援助总额达八亿美元，超过抗战时期的租借总和；另将西太平洋地区战时的剩余物资，以一亿七千余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国民政府。其四、建立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 John P. Lucas，有团员四百名），协助国民政府建军。其五、军事调处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全面内战的爆发，延迟了六个月¹¹。

不过，马歇尔的调解失败，确使美国对介入中国事务感到失望。马歇尔在调解受挫的过程中，不仅美援物资逐渐断绝，美国为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派驻华北各地的海军陆战队人员也逐渐减少。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战场与国军并肩作战；在抗日战争胜利时，美国在华军队约有六万人，归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节制。到 1945 年 9 月，美国为了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受降、遣俘，另派海军陆战队五万五千人在青岛、塘沽、秦皇岛等地登陆，并迅速驻入各战略要地。其任务是：（1）帮助接收华北地区投降之日军，并解除其武装；（2）维护大沽到秦皇岛交通线的安全；（3）维护天津、秦皇岛、塘沽、青岛的港口安全及青岛、北平、天津机场的安全；（4）协助遣返日本俘虏。1946 年 1 月 10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后，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对美军陆战队司令洛基（Keller E. Rocky）提出指示：（1）继续协助并提供军调部后勤支持，直至驻华美军接替为止。（2）协调中国政府军接替美军陆战队在华北的保安任务。美国海军陆战队原预计于 12 月 15 日撤退回国，嗣以中国东北问题及遣送日俘问题未及时解决而滞留未归。但美国陆战队留驻中国，中共抨击为干涉中国内政，苏俄更指此事引起世界性的不安。1945 年 12 月马歇尔使华后，立即通知在华美军指挥官，裁减华北美军陆战队 20%，到

¹⁰ 前引蔡国裕文，〈美国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与检讨〉（下），《近代中国》34 期，页 152-159；前引蔡国裕，〈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页 176-180；前引王成勉，〈马歇尔与中国第三党派〉。

¹¹ 前引饶戈平，〈1945-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页 110；何志功，〈关于 1945-1949 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及若干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3 期，页 5。

1946年2月初，在华北的美军陆战队只有四万五千名，马歇尔再计划减至二万八千名。是年4月，在华美军司令部撤销，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由第七舰队司令柯克（Cooke）指挥。是年6月，中共要求美国陆战队撤出中国，7月并对陆战队的行动进行干扰。美国深知中共欲排除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而以苏俄代之，但亦无可如何，乃要求国军对陆战队驻守之地接防。9月30日，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煤矿和铁路桥梁交防完成，在华美国陆战队集中在北平、天津、秦皇岛和青岛；至12月中旬，美国陆战队的人数已减至不足一万二千人。到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国后，各地陆战队陆续撤回回国¹²，只在青岛保有四千余人，直到1949年6月国军撤守青岛前夕，始行撤退。

自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美国对中国事务即采消极态度。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不必说，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C. Vincent）认为对中国采取观望政策可避免与苏俄关系恶化。马歇尔接任国务卿后，执行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欲以大量美援，协助希腊、土耳其等国，以遏阻苏俄在欧洲和中东的扩张，但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都主张不能放弃对中国的援助，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更认为苏俄在远东坐大，会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和国务院为缓和反对势力，1947年5月26日解除已实施十个月之久的对华军火禁运，并于7月派魏德迈到中国对中国情势作一调查。魏德迈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马歇尔希望魏德迈能促使国民政府真正改革，然后始能以美援协助其对抗中共扩张。魏德迈此行引起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妒意、中俄共的不满、国民政府的幻想。魏德迈于7月22日抵中国后，即旅行中国各地，与各方人士接触，所获讯息，对中国局势极感失望，先后于7月29日、8月8日、8月17日致函马歇尔作简报，认为国民党面对中共军事威胁，仍不肯作大幅度改革，即使有大量援助，仍难消灭中共势力；预期国民政府即将崩溃，并指出许多高级官员正乘机搜括。时适逢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魏德迈认为二二八事件系政府官员贪污、接收军人以征服之姿态出现所致，主张台湾由美国接管，或由联合国托管。魏德迈并利用不同机会，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建议：（1）革除贪官污吏，被其指出的人员

¹² 叶伟濬，〈马歇尔使华时期美军陆战队在华行止之研究〉，《近代中国》64期，页109-120。

包括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北平市市长何思源。(2) 避免自南京指挥前方作战。(3) 建立公平兵役制度，避免有钱人享有特权。(4) 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维护正义、平等及自由，以争取民心。(5) 不应一味求取外援。国民政府在军事挫败、孤立无援下受此指责，甚为气馁，认为美国落井下石。中共则利用美国的指摘，对国民政府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肆行抨击。是年9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表示，今后绝不再依赖美国。尽管如此，魏德迈于9月19日向白宫提出一份完整的报告书，从稳固美国远东的战略地位考虑，仍建议美国支持反共的国民政府，并建议联合国促成中国东北停战，将东北交由联合国托管，以免中国东北成为苏俄的附庸。但马歇尔将魏德迈的报告列为机密，束之高阁，并没有接受魏德迈的意见。到1947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报告，预测一年后中共将获得胜利，即使美国援助中国亦无法改变此一局势。主持美国政策计划的凯南（George Kerman）认为美国已没有什么可做，唯一的办法是给予中国政府少量援助，以拖延其崩溃的时间，使国会的抨击减缓，以争取国会对援欧计划的支持。1947年年末，国会中支持蒋介石的范登堡、周以德、布立吉（Styles Bridge）等人以未来对蒋介石的援助作为同意援欧计划的条件。在国会压力下，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2月18日向国会提出给予中国五亿七千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嗣修订为其中之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军事物资，于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美国政府对美援的给予，姗姗来迟。其间，国民政府于3月召开国民大会，并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到11月，国军在决定性的辽沈会战失败、徐蚌会战开始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¹³。

1949年元旦前后，由于国军在徐蚌会战中失利，长江以北绝大部分地区为共军所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参与和平运动，希望以副总统李宗仁和第三党派取代蒋介石，同中共讲和，划江而治。于是「非蒋下野美援不来」、「非蒋下野不能言和」的舆论传布开来。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谈和，但无成就。共军于4月渡江，战火很快蔓延到华中、华南。蒋介石除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协调各地将领与共军作战外，并开始经营台湾，作为

¹³ 林秀美，〈魏德迈调查团与中国〉，《近代中国》69期，页199-212。

反共最后基地。美国忧虑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台湾，将导致中共攻取台湾，乃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提议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或美国托管。蒋介石意志坚决，在日记中表明：「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交归盟国。」美国在李宗仁的请求下，虽然直到 1949 年 9 月仍拨款七千五百万美元援助中华民国，目的不过在敷衍本国舆论。事实上，早在 1949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即训令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条件，包括履行国际义务、稳定国内秩序等；更于 8 月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指出中国大陆的失败系因中国政府本身的无能和领导错误。国民党中央为此发表声明，对于白皮书的指摘「持严重异议」，但仍望维持中美传统友谊¹⁴。中华民国政府自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无论外交、外援皆以美国为靠山，虽以自身表现不佳，受尽屈辱，但此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中华民国迁都台北以后，直到现在。

中共和苏、美的关系

不同于国民党以维护国权相号召，中共在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争取中间地带的过程中，自始即采取「一边倒」向苏俄的政策，虽然此政策到 1949 年 6 月才正式宣布。中共所以「一边倒」，除了因为苏俄是社会主义祖国以外，主要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中共为了击败国民党，自然在美、苏对峙中投在苏俄的一边。早在 1945 年 5 月下旬开始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即明确告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苏俄的帮助¹⁵。是年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至重庆谈判，毛不接受。经斯大林电劝，谓中国不能再内战，毛始于 8 月 28 日偕周恩来等至重庆。但对毛泽东来说，谈判不过是另一个战场，革命工作不会停止¹⁶。是年 9、10、11 月间，由于美国协助国军进入华北和东北，共军在天津、烟台等地即与美军发生冲突。到是年 12 月马歇尔来华调停以后，为了争取马歇尔的支持，初对马歇尔态度友善。及不能在谈判中获取政治优势，而美国又不断援助国

¹⁴ 前引饶戈平，〈1945-1949 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页 113-115；前引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 年）〉，页 43-44。

¹⁵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 519。

¹⁶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苏联与中国革命〉，页 510。

民政府，中共即决定进行反美斗争，目的在借助舆论，迫使美国的势力退出中国。当时中共反帝情绪高昂，当 1949 年 2、3 月间美国希望中共遵守国际条约时，中共决定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所有的外交机关和宣传机关、取消中华民国政府所订的一切条约、并对外贸进行统制。是年 4 月共军渡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设法与中共接触，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希望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邀司徒雷登访北平。美国政府于 7 月 1 日禁止司徒雷登访北平，因毛泽东于 6 月 30 日即正式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美国所以不急于承认中共，是因为中共已成为苏俄的附庸，故压制它在东亚的地位；而中共之所以公然宣布「一边倒」，因为苏俄早在是年年初即答应一旦中共成立政权即予承认，毛泽东怕被苏俄怀疑为第二个狄托（南斯拉夫的狄托，对苏俄保持独立），对中共政权的建立产生阻力，乃公开表态¹⁷。事实上，自中共建党以后，中共的唯一外援来自苏俄；中共在战后能够在中国东北壮大，亦得力于苏军的协助。

战后苏俄对中国的政策，初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依归。当时史达林对中国和美国表白的立场，主要的约有四点：（1）承认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但东北除外。（2）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解散其军队，参加国民政府。（3）努力促进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

（4）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政府接管。尽管苏俄表面上不便支持中共，见于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苏俄自亦欲在中国扶植亲苏势力；而在中国，中共是最大的亲苏势力。早在 1945 年 8 月 9 日苏俄对日宣战之时，毛泽东即声明欢迎苏俄对日宣战。8 月 10、11 日，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所属各部配合苏军向内蒙和东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当时中共尚不知苏俄对其主动派兵投靠的态度。苏俄军队自中、俄、蒙边境分三路南下：左翼兵团沿中长铁路攻击前进，以长春、沈阳为目标，然后分兵两路，一趋大连、旅顺，一趋山海关。中路兵团突入热河承德；右翼兵团直入察哈尔、张家口。8 月 23 日，苏军占领东北全境，并在张家口、承德地区与共军北上的部队会合。苏军对前来会合的中共军队初不知采何种态度，部分共军且因服装不整、身分难辨被缴械。嗣经向斯大林请示，史准许苏军与

¹⁷ 前引何迪，〈1945-1949 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页 16-23。

共军联络，且要求共军配合苏军行动，中共乃大量派兵进入东北。8月30日，中共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曾克林所部在山海关与苏军会师，其后并沿北宁路东下，接管沿线的兴城、锦州、黑山等十五个县市。9月5日，曾克林部抵沈阳，经与苏军协商，曾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接管沈阳。9月14日，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率直属机关和部队进入沈阳，经苏军同意，任命辽宁行署主任和沈阳市长。在曾、李部队进入沈阳前后，自山东渡海的共军也在大连与苏军接洽。苏军表示，对共军在乡区活动不加干涉。与此同时，中共东北抗日联军，更在东北各地协助苏军肃清乡区日伪残余，并参与苏军在东北各地所组织的军事行政机关。苏军在东北，除将大的工业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回苏俄（包括小丰满电厂的发电机、抚顺的炼钢炉、长春的广播机等）外，其他的战利品都尽量给中共，并予以发展势力的便利：（1）暗中允许共军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2）苏军将得自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交给共军，计有步枪七十万枝、轻机枪一万一千挺、重机枪三千挺、大炮一千八百门、迫击炮二千五百门、战车七百辆、飞机九百架。在这种情形下，林彪率二万名干部、十一万军队挺进东北后，不到三年即发展成号称百万的第四野战军。在1945年9月中旬以后，由于苏军的协助，共军在东北建立了稳固的基地。由于美国协助国军运输大量军队进至华北，并准备接收东北，共军在9月19日即正式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策略¹⁸。

苏军在中国东北支持共军的做法显然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和精神相违。当时苏俄允许共军进入东北，不过作为向国民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增加对抗美国的声势。早在苏俄允许共军进入东北之初，苏俄一方面不准用共军的名义，同时也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一度为此大发雷霆，强烈批评斯大林不许他革命¹⁹。在1945年9月，美国正准备协助国军接收东北之际，驻东北苏军最高长官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派人至延安与中共协调彼此关系：（1）共军进入东北，不能用八路军的名义；（2）共军需撤出大城市，仅在乡区活动；（3）共军可控制山海关至锦州沿铁路线地区，作为冀热辽进

¹⁸ 刘德喜，〈战后初期苏俄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1年第1期，页81-82；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页119-121；前引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520-523。

¹⁹ 上引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524。

入东北的通道；(4) 共军可控制葫芦岛和营口，作为海上进入东北的通道。此后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稍加调整：(1) 应合战后国内外要求和平的需要，在国民党的政治架构中作政治斗争。(2) 应合苏俄须将所占领的城市和铁路交给国民党，中共尽量在东北乡区发展。苏军对东北共军稍作限制，原在争取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好感，俾在中国获取更大利益；但9月11日至10月3日美、苏、英、中、法五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缔结和约与管制日本等问题，中国立场积极跟随美国，而中共在东北，则事事依着苏俄。这使苏俄扶持中共的态度转趋积极，加上中共要求苏俄暂缓撤兵，俾掩护中共在东北从容布置，苏俄乃不惜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利用各种机会，扶植中共，并假争取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为名，推迟自东北撤兵。中共既于9月19日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策略，当日即在军事上加以部署：(1) 晋察冀（冀东除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的力量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2) 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先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再调三万兵力向东北发展。(3) 华中调三万五千人到山东，华东新四军调八万人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新四军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退至江北。

(4) 晋冀鲁豫军区调三万人至冀东和东北。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共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之际，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主动提出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个省区的根据地，并将这些地区的共军北调。此时这些地区的共军北调，看来是对国民党的让步，实际上则为中共「以苏俄为依托」的战略布局。

在中共大量派兵进入东北时，苏俄大使于9月即通知中国，谓俄军决于10月上旬开始自东北撤兵，要求中国派员于10月10日前至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协商。中国外交部于10月1日通知苏俄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 A. Petrov），并派熊式辉至长春告知马林诺夫斯基，国军将于10月10日前自九龙运兵往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非军港为由，于10月6日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此期间，美国已协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至华中、华北，如9月5日空运第六军到南京，9月6日

空运第三方面军一部到上海,9月15日空运第九十二军一部到北平,9月16日空运第九十四军一部到天津,9月30日美军在塘沽登陆,10月9日美军在青岛登陆,登陆美军共达十余万人。另一方面,10月4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准备把所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在苏俄协助中共的同时,美军于10月7日登陆秦皇岛,协助国军受降。10月13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国军在葫芦岛及营口登陆计划。10月27日,国军拟在葫芦岛登陆,遭岸上共军李运昌部的射击,国军改在秦皇岛登陆。11月5日,熊式辉接到马林诺夫斯基的通知,谓葫芦岛、营口已为共军占有,并谓俄军将自11月10日起北撤。另一方面,共军于11月11、12日即进入长春,东北行营向山海关方面撤退。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谓苏俄政府蔑视中苏协议条文,初则拒绝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继则使共军占领营口、葫芦岛等港口,最后又使共军占领长春。国军无法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登陆,10月26日方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不得已于11月16日自山海关出关向锦州迫进,于22日进驻葫芦岛,26日进驻锦州。在此前后,苏俄立场一度软化,一方面尽速自东北撤军,以要求美军势力不要进入东北,另一方面要求共军退出城市地区及铁路线,以防国民政府和美国有所借口。可能的原因,是苏俄怕美国协助国军收复东北,影响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获得的权利。11月19日,东北苏军当局通知中共,共军必须退至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中共有鉴于此,乃「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11月下旬,东北共军均自铁路沿线转往乡区;在苏军允许下,将党的组织和宣传机构仍留在城区。12月13日,国军进入沈阳;14日,国军空运抵长春。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接收哈尔滨市政,1月9日,国军收复营口²⁰。

²⁰ 前引刘德喜,〈战后初期苏俄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页83-84;吴小松,〈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页63;前引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页123-12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215-216;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2册,页719-729;上引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535-538,541-546,549-553;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页528,但谓美军登陆秦皇岛在10月1日、登陆青岛在10月10日,本书日期据刘绍唐书。

在日本投降前，共军在东北并无根据地。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间的协议，接收东北，不仅不允许中共在东北地区讨价还价，为了使接收东北的交通顺畅，热察地区都不列在国共谈判中的停战之区。但共军在苏军协助下进入东北之后，认为与国民党有在东北地区讨价还价的余地。1946年1月10日国共开始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停战，一周之后国共军在营口发生冲突，中共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使国民党承认东北有共党势力存在的事实。蒋介石坚决拒绝，声言东北只有主权接收问题，没有中共问题。1月2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发出电示：（1）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俄必须将东北主权交蒋，对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不能不承认。（2）蒋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如蒋不谈判即向我进攻，我即给予彻底打击。不管中共的计划如何，国民党当时坚持东北只是主权接收问题，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²¹。

1946年春，华南地区的国军由海道大量开到东北。是年3月8日，苏军宣布撤出沈阳，接着撤出长春和哈尔滨。5月3日，宣布自东北撤兵完毕。苏军在国军未接收前，突然撤退，结果使全东北五分之二的土地沦为共军所有。这是苏俄为对抗国民党「一面倒」向美国故意造成的。可以确知的是：3月9日苏军代表曾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地区，苏军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行动。4月上旬苏军接连要求共军派主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郊，准备于苏军撤退时夺取这些城市。4月26日俄军自哈尔滨撤退之后，共军即占据哈尔滨及齐齐哈尔。俄军在撤退过程中，共军屡次进入长春，但到5月23日，长春又为国军收复。此期间（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美国马歇尔特使正在中国调停国共纠纷，国民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到1946年6月7日亦将东北列入停战范围，苏俄希望中共对国民党停止进攻，为中共所拒绝。到1948年春末，国军在东北的战局恶化，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和若干交通线。1948年8、9月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开始进攻长春、沈阳，并另派兵攻锦州，国军不能敌。10月16日锦州失守，20日长春失守。蒋介石命令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自沈阳收复锦州，以巩固山海关后防，

²¹ 上引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554-558。

但卫立煌派出的部队中途被消灭。到 11 月 2 日沈阳失守，国军撤至营口，又撤至葫芦岛。11 月 9 日，又自葫芦岛撤出，东北全失。此时苏俄怕共军的扩张引起美国的干预，并不鼓励共军继续进攻。事实上，美国不仅未在军事上干预，反而逐渐自中国撤退。到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宣布中共实行「一边倒」政策，完全投向苏俄一边，苏俄始放心让中共发展。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政权建立两个小时之后，苏俄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²²。

在战后国共斗争之中，美国初支持国民党，俾完成受降与接收。及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接收受到中共的阻扰、东北地区的接收受到苏俄和中共的共同阻扰，美国企图迫使国民党用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共进入政府，以完成国家统一，美国并在外交上给苏俄压力，使苏俄自东北撤兵，将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但事与愿违。苏俄虽自东北撤兵，但中共在东北坐大，国共间的军事冲突亦愈演愈烈。美国惧卷入中国内战，乃逐步自中国撤兵，并对中国局势采取袖手态度。苏俄初欲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获东北利权，并引中共势力进入东北，俾张声势。及见国民党借助美国力量，对华北、东北等地进行强力接收，不予苏俄独霸东北机会，乃逐步协助中共夺取东北的控制权。苏俄初拟利用中共势力以保持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为了维系远东和平，以确保其在满蒙所获得的权益，苏俄初不欲中共发动全国性的革命战争，将国民党推倒。及中共发动全国性的革命战争，苏俄对中共的支持度一度降低。尽管如此，在战后国共斗争中，美国在基本上是援国民政府的，苏俄在基本上是援助中共的。

美国援助国民政府主要是军事的。为协助中国加强军备，将二次大战剩余物资加以转移和售卖。1946 年 6 月 12 日，驻华美国陆海军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将四艘驱逐舰和四十艘其他舰艇交给中国海军。6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6 月 29 日国务院即决定协助中国建立飞机总数达九百三十六架的一支空军，其全部装备和训练费用约需三亿美元。7 月 16 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海军法案〉，授权总统将二百七十一艘船舰，无偿移交给中国。

²² 前引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页 124-125；前引吴小松，〈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页 64-65；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 2 册，页 734-740，806-813；杜聿明等著，《国共内战秘录》，页 20-178；上引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页 560-566。

8月30日，中美在上海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依据此合约，美国将在印度、中国及西太平洋十七个岛屿上的剩余物资，总价值约六亿美元，让给中国²³。美国对于中共，没有军备和物资的援助。

苏俄对中共的援助，除将掳获的关东军的武器和装备转送之外，并通过在东北地区进行贸易的方式。苏俄与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以前，原想从国民政府手中获取东北地区工矿业者优先经营权，但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并不顺利。苏俄派军进入中国东北后，在中苏条约谈判时，即提出与国民政府合办东北工矿业的要求。蒋介石电告谈判代表宋子文说：东北原有的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归中国所有，作为日本对中国偿还战债的一部分。宋子文向苏方表明此一立场后，斯大林回答说：满洲各项企业，属于特权公司组织者，应归苏俄所有，充作战利品；属于日本私人者，可交还中国，赔偿中国人民战争的损失。在谈判中，苏俄要求中苏经济合作，国民政府坚持先完成东北经济接收再谈合作，史达林则坚持合办企业的具体办法要在苏军撤兵以前谈妥。1946年1月，蒋介石将苏俄要求合办企业等事告知来华调处国共纠纷的特使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在任何情形下中国都不应就合办企业问题与苏俄达成协议，即使这样做会推迟苏军自满洲撤军。1946年2月9、11日，美国政府就处理东北工矿问题分别向苏俄和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中苏两国就满洲工业合办问题达成任何协议，都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²⁴。在这种情形下，中苏经济谈判无所成，而苏俄支持中共之意也愈来愈浓。1946年12月21日，苏俄与中共签订贸易合同。透过贸易，东北地区的共区，于1946年12月以后的一年间，自苏俄进口布匹三千万匹、米和棉纱五百六十吨、汽油三千三百吨、卡车五百辆、炸药七百万吨等。1948年2月27日，苏俄与中共再订贸易合同，1949年7月31日又订第三次贸易合同。据统计，东北共区与苏俄的贸易往来总额，1947年为0.93亿卢布，1948年为1.51亿卢布，1949年为2.05亿卢布²⁵。

美、俄双方除分别支持国、共以外，在中国地区也作直接的对抗。这主要表现在互相要求自中国撤兵上。苏俄自东北撤兵，固然是基于

²³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页539。

²⁴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页522-526。

²⁵ 同上，页542-544。

中苏之间所订定的协议，但当苏俄眼看美国派兵协助国民政府之后，即不欲单独自中国撤退。1945年12月21日，苏俄向美国提出备忘录，要求美国与苏俄商定，双方能在1946年1月中旬以前同时自中国撤兵。嗣见美国无动于衷，苏俄乃于1946年5月初自东北撤兵完毕，一方面放手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一方面假此要求美国迅速自中国撤兵。苏俄将此事诉于联合国，联合国裁军小组于1946年12月初旬通过〈建议各国政府将驻在外国领土上的军队逐渐撤退〉的议案。另一方面，在1946年底，由于美国军人在北京企图强奸女学生，中共也扩大反美宣传。各地美军即陆续撤退回国²⁶。

²⁶ 同上，页 532-537。

第二节 国共纷争的大结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自身势力，国民党以中央的立场尽量加以限制。战后受降，由国民党统筹，中共不服，以武力在投降后的日治地区扩张，影响国民政府的接收，因此国共军事冲突不断发生。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曾进行和谈。在和谈过程中，国民党以民主号召，希望将中共及第三党派纳入由国民党主政的政府。中共的策略：如果和谈条件有利其发展，则转非法斗争为合法斗争；如果国民党的底线仍是使国民党一党独大，则采武装斗争。惟无论合法斗争，还是武装斗争，中共均采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第三党派及国民党中同情中共的人士。在和谈中，中共欲国民党建立新体制，使中共联合同情它的民盟，可以左右政府；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的优势，最后乃走向决战一途。决战结果，国民党失败，最后于 1949 年 12 月退守台湾及部分沿海岛屿。

战后国共争夺地盘（1945 年 8 月至 1948 年 6 月）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日伪政权，其统治权以城市为中心，乡区则有国军和共军的敌后势力活跃。到抗战后期，敌后的国军势力，或撤出，或为日伪军和共军消灭，或投降（包括佯降）改编为伪军，仅有少数据点（如山东昌乐、寿光）残存。敌后的共军则以擅长农民运动，并擅长利用民族主义，势力愈来愈大。但因日伪政权和国民政府均极力反共，共军的发展亦极为艰苦；到抗战胜利后，国军加上新收降的日伪军，对共军在华北、华中所建立的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1945 年 8 月 9 日苏俄对日本宣战，并派兵占领东三省，使中共找到并肩作战的盟友，也找到发展的依托。此后迄于 1946 年 6 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国军迅速由大西南利用陆、海、空运抵达华北和东北，部署沦

陷区的接收，免为中共抢先；中共将华中的兵力北调，并将华北的兵力迅速调往东北，在苏军掩护和帮助下发展。到 9 月 19 日，中共正式定名此种战略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其战略布局是：以华中边区和中原边区为左右前哨，以山东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为基本战场，以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为依托，以东北四省为后盾。如前所述，1945 年 8 月 9 日苏俄向日本宣战并派兵进占东北之时，中共立刻派十万干部和部队从热河、河北、山东等地进入东北，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成立东北局，由彭真负责推行党务。约在同时，共军在华北和内蒙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河北、山西、绥远的大部分；在华东占领了山东、安徽和苏北的广大地区。另并控制北宁路、胶济路以及平汉路和津浦路的北段，以阻碍国军向华北和东北运兵。另一方面，国军对华北和东北采取行动。1945 年 9 月中旬，国军一部占领了绥远的归绥、集宁等城，并向察哈尔的张家口进兵；一部占领太原和上党地区的五个城市；一部进占河南的洛阳、郑州、开封和江苏的徐州，并企图通过平、津，进向东北。中共在华北和华中的边区，几乎都被包围、孤立，只有在东北能迅速扩展地盘，主要因为苏军允许共军在山海关以东沿海登陆，不允许国军在山海关以东沿海登陆；而共军不用八路军名义在东北乡区发展，苏军不加闻问¹。中共的根据地原在乡区，迄于 1946 年 6 月，中共占领的重要城市只有东北的哈尔滨，占领的时间是 1946 年 4 月 28 日。

战后的十个月（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6 月），国共之间虽有冲突，内战没有全面爆发，主要的原因有三：（1）美国限制国民党，苏俄限制共产党，希望国共组联合政府，不要以武力争胜负。美国派马歇尔于 1945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 月间在中国调解国共纠纷，苏俄仅支持中共在东北地区发展，以巩固苏俄在东北所获得的特殊权益。（2）美国调解之初，国共双方均颇自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对增加政治和谐、减少军事冲突，均有帮助。（3）中共有鉴于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的声势，又有美军协助接收，方在东北托庇于苏军，在华北、华中均采退守方针。但随着战后的经济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共产革命的时机愈来愈紧迫；而国民党则希望在局

¹ 毕健忠，〈全国解放战争战略指导新探〉，《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页 25-27；曲家源，〈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历史的选择过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 年第 2 期，页 65。

势稍趋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迅速解决中共问题；终于在1946年6月，在马歇尔调解的中途，爆发全面的内战。

在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经济的恶化，民心的丧失，对国民党是逐渐不利的。在经济方面，抗战胜利之初，情况尚好，国民政府约有10亿美元外汇存款，接收约10亿美元日伪物资，接受约10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物资和救济物资。接收的日伪工矿企业（迄1946年6月共二千四百零七个）和战时内迁的工厂，都有相当程度的复员和复业。1945年接收时，全国电厂发电容量5万4,162千瓦，1946年底增至44万5,934千瓦；全国注册工厂数，1945年底4,382个，1947年6月增至1万1,877个。经济恶化从农业开始，自1946年起预征、超征田赋，廉价收购丝、茶等农产品，于是荒地日增，粮食及农产品生产日减。到1947年以后，由于军费支出日多，发行钞票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美金与法币的比率，1946年3月为1:2,020，1946年9月为1:3,050，1947年1月为1:12,000。货币的贬值，使工厂进口机器、原料，价值陡增，工厂纷纷倒闭²。国民党在战后丧失民心，除经济恶化外，尚有几点原因：（1）日本投降时，伪币二十五元等于法币一元，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规定伪币二百元换法币一元，造成沦陷区人民严重损失。加以来自大后方的人民及官员大肆搜购物资，造成少数人因胜利致富，多数人因胜利变穷。（2）日本投降后，敌后的国军游击队均以杂牌军被遣散，而伪军则被收编为中央军，这种主客易位的情形，使昔日效忠国民党的游击队离心，不少投降共军³。（3）接收人员贪污腐化，使人民失望。（4）惩治汉奸，打击面太广，且不公平，使许多人含冤莫白。在上述的背景下，中共与国民党于1946年6月以后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政权的攻防战，对执政的国民党自是不利的。上述的问题，国民党的决策者并未深入考虑。从1946年6月国共双方的兵力和地盘来说，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国民党有军队四百三十万人，占有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人民，并控制城区：中共有军队约一百三十万人，只占有全国24%的土地、30%的人民和23%

² 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评述〉《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页115-127；林金德，〈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页117-120，111。

³ 上引林金德，〈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页119；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页336-337。

的城市⁴。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其后迄于1947年6月的一年间，国军采取攻势，共军采取守势；1947年7月，毛泽东将此种守势战略定名为「内线」作战，主要的目的在防守共军已控制之解放区。此期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为第一阶段，国共间的战争在马歇尔的调解下断续进行。国军的攻击目标是中共的六个解放区：（1）中原解放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中心地区在湖北豫鄂交界大别山区的宣化店。国军于1946年6月26日开始围攻，后共军突围，又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根据地。（2）华东解放区：1946年2月由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并而成。华中军区以苏北为中心，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山东军区辖鲁中、鲁南及胶东沿海，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国军于1946年7月中旬起分别进攻苏北泰州（华中军区）及鲁南莱芜（山东军区）等地。华中军区撤至淮阴，与山东军区并为华东军区，由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进攻莱芜的李仙洲部五万余人，于1947年2月为共军所歼。（3）晋冀鲁豫解放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掩有晋西南的吕梁、汾阳、孝义，晋南的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山东的鄆城、金乡、巨野、定陶，河南的商邱、开封、滑县，以及冀南一带，包括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1945年8月底，阎锡山曾派兵攻击晋东南上党地区的共军，无结果；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间，国军对该解放区的攻击亦无结果。（4）晋绥、晋察冀解放区：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曾在绥远的集宁、晋北的大同抗击国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在张家口等地抗击国军。（5）东北解放区：以北满为中心，组有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政委，曾于新开岭、临江等地抗击国军。此期间为美国调解时期，国共冲突的规模尚不大。共军在东北主要在北满及乡区发展，在内蒙热、察、绥地区控制少数据点，在晋冀地区主要谋求控制平汉路、正太路、同蒲路北段，以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市，共军并控制鲁中、鲁南、苏北及鄂豫皖边区⁵。1947年3-6月为第二阶段，国军对两个地区的共军

⁴ 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4期，页1。

⁵ 上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1-4；毕健忠，〈全国解放战争战略指导新探〉，《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页27-28；丁永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页66。

进行重点攻击：（1）以四十余万的兵力进攻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东段以北、分布在山东中南部山区一带的共军，无结果；是年5月的孟良崮一役，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被歼。（2）以二十余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于3月19日占领延安。这一阶段，共军在东北采取攻势，使国军的势力收缩在长春至大连的中长铁路线和沈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线。中共内线作战的一年，共军势力消长的情形，略如下表：

时间	控制地区面积	控制地区人口	控制城市数	官兵数目
1946.6	228.6 万平方公里	13,607 万	464	128.3 万
1947.6	220 万平方公里	13,106 万	417	195.4 万

1947年6月前后，国军人数与共军的比是1.9:1⁶。

自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的一年间，共军采取攻势，国军则或攻或守；到1947年9月，毛泽东称此攻势战略为「外线」作战，即把战场引向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此期国共间的主要战场有五，除东北战场为1945年8、9月以后开辟者外，外线战场只有中原战场，其它西北、华东、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战线，仍属内线作战。兹将五个战场分述于下：（1）中原战场：前述中原解放区经营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区）和鄂西根据地，本期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向鄂豫皖边区（大别山区）发展；一部由陈赓、谢富治指挥，向豫西发展；并占有洛阳（1948年3月13日）。华东解放区，由陈毅、粟裕指挥，向苏鲁豫皖边区发展。1948年5月9日成立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政委邓小平。6月22日占开封，7月17日占襄樊。（2）西北战场：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改名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8月撤榆林之围南下，与国军战于岔口、清涧（皆在延安东北）等地，1948年4月22日中共收复延安。（3）华东战场：除主力向鄂、豫、皖发展外，苏北兵团管文蔚在盐城等地作战，山东兵团许世友迫使国军退守济南、青岛等少数据点。（4）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晋察冀军区于1947年11月12日占有石家庄；晋冀鲁豫军区于此期占有了太原以外全部晋中地

⁶ 上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3。

区。1948年5月9日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徐向前，政委薄一波。(5)东北战场：1947年秋季、冬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国军退守长春、沈阳、锦州及抚顺、本溪、葫芦岛等城市。其间，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设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林彪。国军方面，1月任命范汉杰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秦皇岛，谋加强锦州守卫，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于1月请假赴上海养病，蒋介石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5月19日，东北行辕撤销。其间，蒋介石与国防部研拟战略，决定撤守长春，把东北主力集中辽西，必要时放弃沈阳，以巩固华北。但驻在沈阳的卫立煌不接受，主坚守沈阳。中共外线作战的第一年，共军势力消长的情形可如下表：

时间	控制地区面积	控制地区人口	控制城市数	官兵数目
1945.8	100万平方公里	10,000万	——	120.0万
1947.6	220万平方公里	13,106万	417	195.4万
1948.6	235.5万平方公里	16,811万	579	279.4万

1948年6月前后，国军人数与共军的比是1.3:1⁷。

国共和战与第三势力的动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大势力分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自战前即陆续出现的民主小党派，初走中间路线，俯仰于国共两党之间；一般社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与学生、工人、农民、商人，除效忠日伪或沦为日伪统治者外，或站在国民党一边，或站在共产党一边，多以抗日为主要关怀。此处所谓第三势力，除国共两党以外的民主小党派以外，也包括社会大众。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施政方向有三：

(1) 迅速完成受降、接收、复员，谋在美国军经援助下，重建统一国家，而以制止中共的军事扩张为入手之方。(2) 依照孙中山的建国程式，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确保党的执政优势，而以召开制宪国大

⁷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210，236，238-239，253；上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4-5；前引毕健忠，《全国解放战争战略指导新探》，页28-29；杜聿明等着，《国共内战秘录》（该书由下列各书中资料选编而成：(1)《辽沈战役亲历记》。(2)《淮海战役亲历记》。(3)《平津战役亲历记》。三书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所载皆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页20-23，68-69。

为入手之方。(3) 透过选举，或直接网罗，将中共人士、民主小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纳入各级民意机构和各级政府，而以组织国民党所能控制的「联合政府」，使中共交出军队，为入手之方。国民党希望能透过上述三方面的施政，完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中共于战后的初期目标，是透过「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的政权。鉴于当时国内外和平的呼声甚高，苏俄初亦不支持中共以武力夺权，中共的做法是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建国。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对党内发出通知：谓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共于1945年8月中旬，即调派十万干部和部队，自热河、河北、山东等地进入东北，在苏军协助下，接受日伪军投降，并收缴其武器、资财；同时在华北和内蒙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的广大地区，在华中占据苏北和皖北的广大地区，并控制北宁、平汉、津浦等铁路的重要路段，阻止国民党受降、接收、复员。自1920年代以后，由于国共对峙，一批不满国共体制的人走不同的第三条道路，虽然没有军队和地盘，亦动关国内外视听。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大众或积极或消极，都有不同的依附。由于国共两党都积极争取第三势力⁸，使政治势力有国共两极化的趋势，最后国消共长，国民党失去大陆。

中共与国民党斗争，到1946年以后将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社会大众作为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以辅助军事斗争。事实上，中共的和谈、统战、策反，都是第二条战线；支持或策动第三者反对其敌人，都是第二条战线的工作。国民党并非没有第二条战线，但只有一些广泛的政策、没有具体化和强有力的作为。因此，国民党对中共的策略，在表面看来非战即和。所谓战，是用军事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以被称为CC派的陈立夫等为代表；所谓和，是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以被称为政学系的王世杰等为代表。

⁸ 曲家源，〈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历史的选择过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页61-66。

战后国共在第二战场的交绥约可分为两个阶段⁹，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即由抗战胜利到国民大会的召开。此期间同情共产党的民主小党派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而以民主同盟影响最大。同情国民党的民主小党派，有先后自民盟退出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至于一般社会大众，从各种社会运动来看，是以反国民党独裁、反国民党扩大内战、反美国扶持国民党等运动声势最为浩大。此期间国共进行的谈判有重庆会谈、政治协商、停战、国共军的裁编与驻地分配等。重庆会谈可以说是抗战末期美国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冲突、谋组联合政府的延续。一方面由于赫尔利的敦促，一方面也由于政学系的建议，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先后三次电邀中共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此时苏俄正忙于本国的复兴，对中国事务无暇多顾。苏俄认为，中国复兴大部靠美国援助，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负起统一中国责任的领袖。斯大林在1945年8月15日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撰文时，更明确表示：「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次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并率直劝告中共：「应与蒋介石缔结暂时协议，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军队。」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原令共军就地停战待命，朱德总司令却连发七道命令，令共军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并要求日伪军向中共投降。据日军方面的报告，日军于日本投降后，在徐州、蚌埠、芜湖等地都受到共军的攻击。毛于8月16日尚拒绝蒋的邀请赴渝，但知道斯大林的态度之后，即于8月24日表示接受邀请。8月28日，毛由赫尔利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率周恩来、王若飞等自延安飞重庆。9月4日至10月5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12次；10月8日、10日，又有两次会谈。参加会谈者，国民党方面主要为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共产党方面主要为周恩来、王若飞。会谈纪要于10月11日发表，毛泽东亦于当日返回延安。会谈纪要内容可分三大类：第一类双方完全同意者：和平、民主、统一，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共同建国，保障人民自由，各党派合法平等；实行地方自治与普选；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及审罚之权；释

⁹ 艾多，〈试论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变化发展及其历史经验〉，《东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6期，页6-13，将之分为四阶段，实应以1946年11月为界，分为两阶段。

放政治犯。第二类双方部分同意、尚需进一步会谈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名额有待分配；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奸伪处理问题。第三类双方未同意者：共方愿将共军缩编为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政府愿考虑允许 12 个师。但对共军驻地之分配，中共要求进驻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城市，无法协议；共方要求以「解放区」作为地方政府，可自 19 个减少为 11 个，国民政府未同意，仅答应留任部分人员。另外，国共于收复区竞争受降，双方无法协议。共方最不能让步者为将共军缩编，归中央统一指挥；将「解放区」取消，作为一般地方政府。抗战期间共军已由三个师发展为 48 个师，「解放区」由一个发展为 19 个¹⁰。军事力量为中共与国民党竞争政权的最大依靠。

重庆会谈虽然是国共的第二条战线中的一个战场，但在局外人看来未尝不是国共合作的开端。此事在国际上由美国主导、苏俄促成；在国内由国民党主导，共产党响应。重庆会谈达到初步协议，对美国调解国共纠纷的政策是一大鼓舞。对中共及同情中共的人士来说，面对国民党拥有的广大土地、众多人口和庞大武力，自应以两条战线相呼应，较能扭转劣势。第二条战线中的第一场群众大斗争发生在 1945 年 11、12 月间。1945 年 11 月 19 日，民盟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组织「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策动学生运动。11 月下旬，昆明地区各大学民盟人士暨亲共师生在西南联大集会抨击国民政府并煽动罢课。12 月 1 日，突有名陈奇达者向学生群众投掷手榴弹，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五人重伤、三十多人轻伤，引发重庆、上海、广州、青岛、天津、南京、西安等地援助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凶手陈奇达供认系被中共收买，此事于 12 月 5 日即见于报端，但学潮汹涌如故¹¹。

中共第二条战线的目标是召开党派会议，从事政治协商；透过政治协商，组织中共及同情中共人士能够控制的联合政府。重庆会谈既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方面即敦促国民党与中共及民主小党派进

¹⁰ 陈庆，〈重庆会谈〉，《近代中国》57 期，页 128-133；丁永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议的签订〉，《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1 期，页 64-67；上引艾多，〈试论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变化发展及其历史经验〉，页 6；武文斯、李继民，〈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谈判与中国民主同盟〉，《蒲峪学刊》1988 年第 1 期，页 17。

¹¹ 吴筠，〈中国共产党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运动〉，《龙江党史》，1990 年第 3 期，页 32；郝秋阳、田春发，〈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与学生运动〉，《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3、4 期，页 18；汪学文，〈中共窃据大陆以前策动学潮之始末〉，《近代中国》32 期，页 184。

行政治协商。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要求国共两党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治分子代表会议。12月27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中提议改组国民政府，「必须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另一方面，中共及同情中共人士发动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周恩来则于12月16日即率代表团自延安至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是日来华调停国共纠纷的马歇尔抵北平，22日抵重庆。是月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决定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原定36人，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由于青年党坚持要在民盟中占5名，民盟其他盟员仅占4名，中共力谋使其他盟员保有9名，自愿让出两名，要求国民党让出一名，并要求增加代表二名，于是代表增至38名，其中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中共照顾民盟，是在中共七全大会中决定的，目的之一在争取民盟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支持中共。民盟自1941年成立以后，有四大基本政纲：（1）苏俄的经济民主，（2）英美的政治民主，（3）军队国家化，（4）与美、英、苏加强合作。中共可以全部接受第一个，部分接受第四个。另外民盟有两大政略，都与中共政策相符：（1）政治协商，（2）联合政府。这是中共拉拢民盟的重要原因，亦是民盟能与中共合作的重要原因。支持中共的民主小党派，除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民盟外，尚有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¹²。

政治协商会议，从1946年1月10-31日，共举行三星期。其间，上海学生于1946年1月13日开会追悼昆明「一二一」事件死难学生，要求立即成立联合政府；重庆学生于1月25日游行，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另有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等的活动。至于会场内部的实际谈判，是以军队国家化为争论焦点。国民党坚持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要求中共交出军队，青年党附和之。中共则坚持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行，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

¹² 丁金平等，〈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纪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页59-60；曲青山，田常春，〈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间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页70-73；沙健孙，〈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页72-73；前引武文斯、李继民，〈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谈判与中国民主同盟〉，页17-19；苻虹，〈试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页72。

使中国变为民主国家，并把国民党的军队变成人民的军队。民盟认为两党的军队都要整编，不能只要求一党交出军队。地方自治问题为争论的另一焦点。中共主张省长民选，各省自制省宪；国民党原则承认，但坚持取消中共的「解放区」；民盟则主张从法律上承认解放区。关于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主张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占半数、国府委员会无任免部会首长之权（权在国民政府主席）、国府委员会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主席可否决国府委员会的决定。中共及民盟则主张国府委员会有任免部会首长之权，承认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中占半数，但涉及施政纲领变更，需有三分之二国府委员通过；并坚持国民政府主席否决议案，需得五分之三国府委员的同意。初步获得协议之后，中共及民盟要求在 20 名国府委员中占 14 席，俾有否决权，国民党则仅给予 13 席，未获协议。在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问题上，中共及民盟承认国民党原选之 1200 名代表，但主张增加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代表共 700 名、台湾和东北代表共 150 名，并坚持宪法的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到 1 月 31 日，政协于完成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决议案后闭幕。五项决议案，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共及民盟的意见；中共及民盟大事庆祝，引起国民党内强硬派的不满。2 月 10 日在重庆校场口的庆祝会上，引发冲突，造成六十余人受伤，引起各地对国民党的抗议。另一方面，依据政协决议成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于 2 月 14 日开始举行会议，委员 35 人，其中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民盟代表、青年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代表各 5 人，会外专家 10 人。此期间，马歇尔介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但由于苏俄欲垄断东北利权，并在东北翼护中共发展，国民党中的强硬派于 2 月 22 日在重庆发动反苏游行，并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的《民主报》，引起各地对国民党的抗议。另一方面，依据政协决议，由国、共、美三方代表讨论的整军方案，于 2 月 25 日达成协议。3 月 8 日，马歇尔返国述职。国民党于 3 月 8 日-17 日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中对政协决议多所批评与修改，国共间的军事冲突亦转剧，国共间有关改组政府的细节问题无法达成协议，遂使政协决议不能完全贯彻。1946 年 5 月 5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及各民主小党派亦随政府迁

南京¹³，协商继续进行。

1946年5月至11月国共之间的协商，透过马歇尔和新任（7月）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中介，以停止军事冲突为主；透过民主小党派和社会贤达为中介，以促成国民大会的召开为主。在军事方面，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东北重建势力，希望在华北方面减缓对共军的攻击。国军于5月19日占领四平街、5月22日占领长春，中共及同情中共的小党派于6月23日在上海发动反内战大会，并派人到南京请愿，但至下关即引发群众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6月25日以后，湖北北部（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在湖北宣化店，司令为李先念）、江苏北部、山东各地和察哈尔各地（怀来、张家口）国共军事冲突转剧。7月11日、15日同情中共的教育文化界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中共于各地作反政府的宣传。在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均在剑拔弩张的情形下，国共之间的协商继续进行。7月2日蒋介石要求共军，依照整军方案和补充办法，从五个地区撤退（包括苏北），7月3日国民党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要求中共及各民主小党派依照政协决议，交出出席国大名单；中共则要求先改组政府，缓开国民大会。10月2日，蒋介石表示，中共及民盟方面可在20名国府委员中占13名，但需迅速依照军事协商，规定共军十八个师的驻地。此时中共尽量假改组政府、共军驻地、停战等问题，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于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并于当天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10月25日，国军于东北攻占安东。国共关系极度紧张，周恩来声称即回延安，不再谈判，民主小党派要求就地停战，中共认为国民党已攻占大片解放区，不能答应；民主小党派要求先改组政府，国民党认为系为中共帮腔，不能答应。11月1日，蒋介石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要求中共、民盟、青年党提国大名单。14日，社会贤达及青年党表示参加国大。15日国大开幕，16日民盟中的民社党表示参加国大。中共抵制国大的策略至是失败。17日周恩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11月19日，中共代表团返延安；到1947年3月7日，

¹³ 上引丁金平等，〈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纪略〉，页60-66；上引武文斯、李继民，〈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谈判与中国民主同盟〉，页19-20。

中共在南京、上海两地的办事处关闭¹⁴；国共之间进入军事大决斗时期。

在1946年11月中旬国共协商破裂之后，第二条战线进入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在军事战线（中共称第一条战线）和政治战线（中共称第二条战线）上全面对决，国民党在军事战线上由优势转为劣势，在政治战线上则一直处于劣势。关于军事战线，容后再述，此处先将政治战线中中共的声势及其孤立国民党、争取第三势力的情况作一叙述。

美国是国民党在外交上的最大支柱。在美国调停国共纠纷期间，国共双方皆欲从中获利，故对美国的干政均尽量忍让。及调解失败，国民党希望美国继续在军事上给予支持，俾击败中共；中共的对策，则是煽动反美风潮，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使国民党在外交上陷于孤立。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京大学先修班就读的中共女党员沈崇据说在东单被美国军人强奸，次日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各地学界「反美帝」的呼声，并要求「美军必须滚出中国」，运动持续三个多月¹⁵。此后美军陆续自中国撤退，美国减少、甚至断绝了对国民党的军经援助，使一向以外援为最大力量来源的国民党，在心理上产生不安全感，信心顿然丧失。

中共的反美运动是与反蒋运动并行的，在1947年3、4月间反美运动减缓之后，群众运动仍转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2日，国民党公布〈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据分析，「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系循中共意志而行」。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学生不得越级请愿，陈述意见代表不得超过十人，学生罢课游行应予解散。此事使群众运动更为激化，同情中共的民主小党派立场更为鲜明。5月20日，在中共及民盟策动下，以南京中央大学为首，各地学生五千余人在南京结队游行，高举的横幅为「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口号为「反饥饿、反内战」（5月10日中大学生以物

¹⁴ 钱之光，〈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页25-59。

¹⁵ 前引汪学文，〈中共窃据大陆以前策动学潮之始末〉，页184-185；前引郝秋阳、田春发，〈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与学生运动〉，页19。

价猛涨，要求调整副食费，5月16日行政院宣布调整大学生副食费，但未能抑止此全国性的反饥饿运动），警宪出动镇压，造成十九人重伤、九十多人轻伤、二十八人被捕。同一天，北平有七千余名学生游行，高举的横幅为「华北学生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学生，也以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运动。约在同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各地兴起。中共的第二条战线组织很多，在地下党的组织方面，有各种工作委员会，如学委、工委、文委、职委、铁委等；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工协、学联、大教联、中教联、小教联、妇联、职协、文协等；因此各种运动很容易透过组织发动起来。加上一些民主小党派公开助阵，常能造成声势。此期间，国民政府对各地反政府的运动严厉取缔。是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戡乱总动员」。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中共之附庸」、「参加叛乱」，明令解散。11月6日，民盟总部通告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原来号称中立、实际同情中共的民主小党派，不得不放弃中立的旗帜，一边倒向中共。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香港成立，公开宣布要推翻蒋介石政权。1月5-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宣言与中共携手合作。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行宪选举，政学界一度出现新的第三势力，如1948年3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张「规定私人占地的最高限额」、「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的结果而定」。但随着中共的军事胜利，新的第三势力也逐渐倒向中共一边。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表宣言，号召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于1946年12月完成制宪后，宣布于1947年12月行宪。在行宪前后的选举中，都有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并于5月20日就职。宪政政府成立后，由于国共军事对抗的关系，无法进入宪政正轨。1948年8月以后，国府（行宪以后，国民政府改为中华民国政府，因仍由国民党执政，简称「国府」）对中共地下党员及同情中共人士大加逮捕，于是许多身分暴露的党员撤退到「解放区」，同时倒向中共的民主小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亦纷纷进入解放区，开始筹备新政协。1949年1月22日，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

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等五十五人，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的身分，发表书面意见，公开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在 1949 年 9 月在北平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¹⁶，将第三势力的人士纳入。

国共大决战与国民党失去大陆

第三势力的转向，自然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有关。自 1946 年 6 月美国调停国共冲突失败以后，国共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前面论述 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6 月间，国军对解放区进行攻击，共军以防守为主；部分解放区为国军收复。1947 年 6 月至 1948 年 6 月的战争，共军改采攻击战略，部分国军驻守的区域为共军所占。两年之间，双方驻守的区域，均有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情形。从军事大局看来，这两年的战争，双方旗鼓相当，但共军的数量已逐渐与国军接近，而国府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难题使民心大失，共党乘机扩大了社会方面的所谓第二战线。在这种情形下，共军已有准备与国军进行决战。在 1948 年 6 月至 1949 年 1 月间，共军进攻济南、进攻辽沈、进攻徐蚌、进攻平津，皆获全胜，使国军精锐尽失，只能凭长江之险，守上海、南京、武汉一线。在前述四大战役中，共军的战略是先发动辽沈战役（1948 年 9 月 12 日），在辽沈战役中先下锦州，以割断平津地区国军与辽沈地区国军的联系；继发动济南战役（1948 年 9 月 16 日），并迅速攻下济南，以割断平津地区国军与徐蚌地区国军的联系。然后再各个击破辽沈地区、徐蚌地区和平津地区的国军。

济南为山东省会。山东在抗战末期，日伪的势力仅能控制铁路交通线及沿线城市，大部地区为中共游击武力所控制，小部地区为国民党游击武力所控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所派的省主席何思源自游击区首先由保安队护送进入济南。其后，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李延年率十二军、九十六军由皖北进入济南。到 1946 年

¹⁶ 前引艾多，〈试论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变化发展及其历史经验〉，页 9-10；上引郝秋阳、田春发，〈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与学生运动〉，页 19-20；前引筱虹，〈试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页 74-75；前引沙健孙，〈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页 76-80；上引汪学文，〈中共窃据大陆以前策动学潮之始末〉，页 179，185-187；叶志麟，〈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经验〉，《杭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 年第 2 期，页 7-12；王宗荣，〈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与总统副总统选举〉，《民国档案》，1991 年第 4 期，页 100-10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 235。

1月，国民政府又先后将五十四军、四十六军、七十三军调至胶济铁路沿线，山东的铁路线及沿线城市乃得由国军控制。为了对抗共军的扩张，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于济南设第二绥靖区，由王耀武为司令官，绥靖范围东至青岛（1947年7月因青岛另设十一绥靖区，第二绥靖区的范围改为东至潍河），西至东平，南至大汶口，北至德县。1948年3、4月间，胶济铁路上重要城市周村、张店、淄川、博山、潍县等先后为共军所占；7月间，位在济南、徐州间的第十绥靖区（驻滋阳，司令官李玉堂）被共军消灭，滋阳、济宁失守；济南与青岛间、济南与徐州间均无法直接联络，地位陷于孤立。在潍县失守（4月27日）、第十绥靖区被消灭前，王耀武曾向蒋介石建议，将第二绥靖区迁至滋阳及滋阳以南，俾与徐州打成一片。蒋考虑到十一绥靖区及在青岛美国海军及陆战队的安全，仍主坚守济南，并命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河南东部的商邱（近豫、鲁边界，北为山东曹县）、第七兵团黄百韬部集结于江苏北部的新安镇（近苏、鲁边界，北为山东郯城）、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在皖北，徐州、蚌埠间津浦线上），准备支持济南作战。时第二绥靖区归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指挥，辖正规军及保安团队约11万人。1948年8月，共军华东野战军（后改三野）由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向山东调动，准备进攻济南。王耀武将济南地区划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以城北濠口至城南八里洼为界，以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为西区指挥官，以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东区指挥官。9月16日战争开始。济南工事虽固，但共军攻势猛烈，国军援军迟迟不进，到19日吴化文率部投降，将西区大部军队带走，王耀武重新部署，将防地缩小，仍无法稳定战局。23日上午，徐州剿总刘峙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到济南上空以无线电鼓励王耀武坚守待援，但次日城即沦陷。党政军要员乘混乱之际逃亡出城，王耀武（兼省主席）在寿光被查获，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在高密被查获，省党部主委庞镜塘在临城被查获¹⁷。此次战役，共军以十四万人攻济南城，以十八万人在济宁、滕县、金乡一带阻止徐州援军¹⁸，战略运用良好。

在济南战役期间，辽沈战役已经开始；辽沈战役的全部历程是

¹⁷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山东文史集粹》军事卷，页247-272。

¹⁸ 前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5。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爆发前夕的两年多间，东北大部地区陆续受到共军的控制，1946年4月28日占哈尔滨，1947年6月10日占安东；不在交通线的大部地区，也先后为共军所有。到1948年夏季，国军主要困守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的的城市，由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负责，共有兵力四、五十万人。与辽沈战场连接的是平津战场，主要控制平绥铁路上的张家口，和北宁铁路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由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负责，共有兵力五、六十万人。共军原来部署在辽北和辽西，监视长春和沈阳的国军，准备就地歼灭。于1948年5月就任总统的蒋介石，眼看沈阳国军孤悬，准备以长春十万国军为后卫，将沈阳的国军撤至锦州，俾与平津战场相依托。是年7月，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1月，范汉杰任司令，驻秦皇岛，由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共同指挥）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坐镇锦州，一面调兵增援锦州，一面设法调动沈阳的部队打通沈锦线，俾将沈阳军队撤至锦州。中共主席毛泽东看到这一点，于9月初将长春外围及四平街地区的东北野战军调往锦州至山海关间，将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占有，并在林彪指挥下，围攻锦州。10月，蒋介石将平津战场驻守唐山的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调往葫芦岛，使由葫芦岛增援锦州；同时发表杜聿明为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将司令部设于葫芦岛，指挥援锦事宜。另一方面，则由廖耀湘成立攻击兵团，自沈阳向西进兵。10月15日，共军占锦州，范汉杰突围遁走被查获。锦州失陷之日，自沈阳西来的廖耀湘部方进抵新立屯，其后数日，廖部为共军冲散，撤回沈阳的后路已被截断，拟逃往葫芦岛时，廖耀湘在黑山附近被共军查获。至于由葫芦岛援锦的十七兵团，自10月10日开始进攻锦州外围的共军阵地塔山，至锦州失陷，仍无所成。锦州失陷后，国军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两个大城。长春由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率十万部队防守，由于久受围困，城中饿死的人颇多。到10月18、19日，由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投降，病重中的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亦在部下裹胁下投降，长春无力再守，郑洞国旋亦在部下裹胁下投降。沈阳自廖耀湘于10月初率攻击兵团往援锦州后，城内兵力益弱，长春失陷以后，城内守兵更无斗志。到11月旧，共军攻城，

并派人招降。卫立煌已于 10 月 30 日奉命飞葫芦岛指挥，此时沈阳的最高指挥官为第八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青年军第二〇七师对攻城的共军抵抗失败，其余部队纷纷放下武器，周福成被俘¹⁹。辽沈战役结束。辽沈战役前，共军在东北地区有 103 万人，为国军的 1.8 倍；辽沈战役结束后，共军总人数上升为三百余万人，国军总人数下降为 290 万人²⁰。此后国共间的战争，国军益趋于劣势。

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结束后，国共之间面临在平津和徐蚌地区大决战。徐蚌战役的开始和结束，均较平津战役早三个星期，兹先言徐蚌战役。徐蚌战场是由横亘于陇海铁路两侧的苏鲁战场和河南战场萎缩而来。1946 年，国民政府于河南战场设郑州绥靖公署，顾祝同、刘峙先后任主任；苏鲁战场设徐州绥靖公署，薛岳任主任。1947 年春，薛岳调任参军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将徐州、郑州绥靖公署撤销，另在徐州设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为司令，并在郑州设徐州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孙震（第五绥靖区司令官）任主任。时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1948 年 5 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何应钦任国防部长），徐州司令部改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由刘峙任司令；郑州前进指挥所改隶徐州剿总。是年秋，孙震调川鄂绥靖主任，郑州地区的部队合编成十六兵团，由孙元良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副主任。是年 10 月，蒋介石决定放弃郑州，将十六兵团及前进指挥所调往徐州，另调东北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当时徐蚌地区只有四个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徐州、连云间的新安镇一带，距徐州甚远；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在徐州西的黄口、砀山间；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在徐州东部大许家及徐州北柳泉一带；孙元良的十六兵团正自郑州、开封东撤徐州地区。另有属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黄维的十二兵团（由陈诚的十八军演变而来）奉命自河南南部平汉线上的驻马店东调安徽，进驻到徐州西南的涡阳、蒙城地区。徐蚌地区国军总兵力约七十万人。共军方面，有山东方面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攻济南者），和河南方面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后改二野），共约六十万人。当辽沈战役结束、徐蚌战役尚未开始时，蒋介石一度主张退守淮河，

¹⁹ 杜聿明等著，《国共内战秘录》，页 26-27, 47, 79-85, 88-89, 105-112, 121-133, 136-151, 154-163, 166-178；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页 510-5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沈战役亲历记》，页 416, 468, 630-631。

²⁰ 前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 5-6。

旋决定将附近兵力集中于徐州、蚌埠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但陇海铁路沿线的兵力未能及时调动。共军华东野战军于攻下济南后，将主力集结于山东南部滋阳及其东南地区，由费县、临沂、郯城间向徐州移动。一部经汶上越微山湖西移，对徐州形成夹击态势。中原野战军原在豫西，国军于10月下旬撤守郑州、开封后，中原野战军即自豫西向郑州、开封及商邱以东地区移动。11月6日，共军华东野战军对徐州以东的郯城展开攻击，蒋介石令在海州（连云，在郯城东南）的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后改第六兵团）向蚌埠撤退，并命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陇海路以北、运河以东加以掩护。11月7日，共军策动徐州东北枣庄、贾汪一带第三绥靖区（部队原为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官何基澧、张克侠部叛变（司令官为冯治安，何、张为中共地下党员），然后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楔入徐州以东，消灭第十三兵团之一部。黄百韬兵团紧急自运河以东过运河向徐州集中，于11月9日抵达运河以西、徐州以东的碾庄，但至11日即为共军包围。11月16日，中共中央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此期间，共军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亦开始向徐州以西黄口附近的邱清泉兵团进攻，邱且战且走，退至徐州。时自郑州、开封东撤的孙元良部已到徐州以南的宿县，第四绥靖区的刘汝明部（后改第八兵团）亦自豫东的商邱撤至宿县东南的固镇。11月11日，刘峙决定将邱清泉兵团东调，协同李弥兵团解黄百韬之围，但因邱、李攻击不力，共军的阻击又强，始终无法应援碾庄战场。黄百韬弹尽援绝，至11月22日举枪自杀。其时，徐州地区改由杜聿明指挥，刘峙则转往蚌埠坐镇（11月28日），仍无法扭转战局。杜聿明决定于11月30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撤出徐州，向西转向豫东永城，12月4日行至青龙集、陈官庄一带，被共军华东野战军包围。此时于11月18日抵达蒙城的黄维的十二兵团亦已于11月25日在蒙城以东的双堆集被共军中原野战军包围。杜聿明奉命将部队南移，解黄维兵团之围，但邱、李、孙三兵团的兵力陷入重围，无法移动。12月7日，孙元良兵团突围失败，孙元良只身化装逃出；邱、李两兵团攻击共军无效。12月15日，黄维兵团突围失败，副司令官胡璉逃出。其时蒋介石方

布置长江防务，而国共和谈之议起。美国希望蒋介石将总统之位让给副总统李宗仁，12月24日华中剿总白崇禧等电请蒋介石下野，徐蚌战场益不可为。杜聿明暨邱、李两兵团在陈官庄一带被围四十余天，粮弹两缺，到1949年1月10日突围失败，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李弥仅以身免。其后，徐州剿总撤销，另成立京沪杭警备总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布置江防²¹。长江中游防务，则由在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负责。

武汉原设行营，以程潜为主任。1947年6月刘伯承部进入大别山后，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的安全，蒋介石命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在九江设指挥所。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将指挥所移武汉，蒋介石裁武汉行营，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并将国防部设在汉口的指挥所改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白崇禧任总司令，统率23万人；宋希濂为副司令，初驻沙市，后移荆门。是年10月下旬，蒋介石拟在蚌埠设国防部指挥所，由白崇禧任主任，调度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所辖的两个战场，以统一应付共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徐蚌地区的联合攻击，但白崇禧不肯就任。11月，徐蚌会战进行之际，蒋介石调在华中剿总指挥下的黄维兵团自河南驻马店往援，并调宋希濂率两个军自荆门集结汉口，准备候船东下。但是后中央再调华中剿总的军队，白崇禧即加拒绝。如前所述，不久白即以与共军讲和为由，电促蒋介石下野²²。军人卷入政争，自难将心力用在战场；国民党在徐蚌战场的失败，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之间不能配合，关系颇大。

在徐蚌战役结束前，平津战役已在进行。平津地区为控制华北和东北的重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为协助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地区，于9月30日派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秦皇岛，接着自上海空运国军九十四军到天津和唐山，到1946年9月又海运六十二军到秦皇岛，接替九十四军在天津和唐山的驻区。1947年春美军撤走后，又于8月自武汉空运九十二军驻防北平，并接替六十二军在天津的驻区。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

²¹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256-258；《国共内战秘录》，页182-309，330-344；刘翊伯，《徐蚌大会战》，页10，11，24-25，27，48，96-97。

²² 《国共内战秘录》，页262，312-327；前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6。

石于北平设行营，以李宗仁为主任；到 1946 年底，又将抗战时期的战区改为绥靖公署，傅作义的十二战区改为张垣（张家口，1946 年 10 月间由傅自共军手中占领）绥靖公署，孙连仲的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皆归北平行营节度。前述平津地区的布防，皆系在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的指挥下进行。1947 年 11 月，撤销北平行营及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于北平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华北剿总的作战区域为冀、察、热、绥及晋北。1948 年 9 月，济南战役失败，11 月辽沈战役失败，国军在平津战场仅能守住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及承德几个大城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已为共军隔断。当时华北剿总的兵力约六十万人，共军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十多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约八十八万人。华北剿总的阵地只有两条退路，一自张家口循平绥路撤往绥远，一自津沽循海路南下。共军的战略则是先在张家口及津沽开辟战场，以孤立北平。1948 年 11 月 29 日，张家口地区的共军开始采取攻势；到 12 月中旬，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先后被围。12 月 24 日张家口被占，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被占。1 月 17 日国军自塘沽撤退，自海上撤往上海。21 日傅作义在北平宣布投降，部队被共军改编。共军于 31 日进入北平。傅作义的洽降系由其女傅冬梅（中共地下党员）怂恿，与共军当局联络始于 1948 年 11 月 17 日，其后于 12 月 7 日、1949 年 1 月 6 日、1 月 14 日三次派员出城，先后与共军代表林彪、聂荣臻等谈判（1 月 10 日，中共中央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终于在 1 月 19 日达成协议。傅作义洽降期间，蒋介石先后派徐永昌（原军令部部长）、郑介民（国防部次长）、蒋纬国等前往劝阻，不得要领；傅仅允第四兵团司令兼北平防守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十三军军长石觉等，乘飞机离开北平²³。李、石等旋飞青岛。

在徐蚌战役结束以后、平津战役结束以前，国共之间又从战争走向和平谈判。如前所述，1948 年 12 月 24 日，华中剿总白崇禧电请政府与中共谈和。1949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总统发表文告，表示愿

²³ 《国共内战秘录》，页 368-420；详参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平津战役亲历记》及董世桂、张彦之，《北平和平纪实》等书，王宗荣，〈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晋阳学刊》，1991 年第 2 期）、赵玉珍，〈浅谈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及意义〉（《锦州师范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 1 期）等文。三次出城洽降日期彼此颇有出入，暂据王文。

与中共商讨恢复和平办法。1月14日，中共宣布和平谈判八条件：（1）惩治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21日，主战的蒋介石总统引退，由主和的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与中共讲和。李宗仁先于2月14日派出由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的上海人民代表团，赴北平探求中共对和谈的反应；继于4月1日正式派遣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希望与中共划江而治。4月13日，周恩来依据1月14日的宣布，提出「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八条二十四款，经张治中等交涉，将草案中具有刺激性的字眼加以修饰，如将「反动分子」、「元凶」、「首恶」等删掉。4月15日，共方代表要求李宗仁于4月20日以前签字，并且表示：无论南京政府签字与否，共军都得渡江。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接受中共条件。4月21日凌晨，中共不待南京方面正式答复，即派兵自荻港、江阴等处渡江。22日，李宗仁飞抵杭州与蒋介石等晤商，拟请蒋复职，蒋仅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协助政府贯彻反共政策」。23日，李宗仁即由广州飞往桂林。到是年10月15日广州被共军占领，11月22日桂林被共军占领，11月30日重庆被共军占领，李宗仁即以医病为由，自香港飞美²⁴。

国民党的和谈，目的在保有长江以南；中共的和谈，目的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共军与国军之间的攻与防，并不因和谈而停止。蒋介石总统引退前，于1949年1月18日对东南各省和长江中上游防务作了一番布置。东南各省，以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长江中上游，除武汉地区的华中剿总以外，以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²⁵。共军方面，在1949年2、3月间将各野战军加以整编：（1）西北野战军于2月1日改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2）华东野战军于2月9日改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²⁴ 刘遐龄，〈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的中共策略〉，《近代中国》57期；孙礼明，〈李宗仁与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有关各日记载。

²⁵ 上引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862。

陈毅。(3) 中原野战军于 2 月 13 日改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4) 东北野战军于 3 月 28 日改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在共军改组完成以后，除第一野战军继续经营西北战场以外，第二、三、四野战军均投入渡江战役。当时国军总兵力约有二百万人，布置在宜昌至上海长江南岸的约七十万人；共军总兵力约四百万人，用于渡江攻击的约一百万人。第三野一部为东路，准备由江苏浦口东至张黄港（在江阴东北江边）段渡江，一部为中路，准备由安徽裕溪口（在芜湖东北江边）西至枞阳镇（在安庆东北江边）渡江，二野另一部亦在中路，准备由安徽枞阳镇西至望江（在安庆西南江边）段渡江；四野为西路，准备在湖北团风（在武汉东北江边）东至武穴（在蕪州东南江边）段渡江。4 月 21 日，共军分两路自江阴（在张黄港西南）和大通（在裕溪口至枞阳间）渡江。在江阴渡江系因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叛变，在大通渡江系强渡成功。在江阴渡江的共军切断京沪线，向东包围了上海，部分共军南下，于 5 月 4 日占领杭州。镇江、南京、芜湖一带的国军拟撤往浙西，循浙赣路转进，但自大通渡江的共军急行南下，于 5 月初即占领江西东部的贵溪、弋阳，截断了浙赣铁路。5 月 10 日，共军即沿浙赣路东进至浙江中部的金华、义乌，撤往浙西的国军纷纷投降²⁶。另一方面，自大通渡江的共军西进威胁九江，自平汉路南下的共军第四野战军直接威胁武汉，使武汉华中长官公署（1949 年 4 月 5 日由华中剿总改组而成）长官白崇禧不得不重新部署。5 月 17 日，白将华中长官公署迁往长沙，以张淦、陈明仁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胡璉兵团在赣西沿赣江守右翼，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原驻鄂西沙市）率两个兵团在湘西常德、芷江一带守左翼。时已退位的蒋介石总统以华中战场不可恃，积极经营东南沿海及西南的四川。一面嘱原在上饶一带的胡璉兵团勿往赣江上游，取道抚州、汀州，直退潮州、汕头，一面嘱宋希濂将部队撤往鄂川边境的恩施。另一方面，5 月下旬自上海撤出的汤恩伯部队转往舟山、大陈，6 月初自青岛撤退的刘安祺部则转往海南岛。当时陕西绥靖主任胡宗南尚在西安，并经营汉中，与四川连为一气。嗣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有投共意图，白崇禧将张淦兵

²⁶ 前引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页 6-8。

团调防长沙、衡阳之线，并于7月22日将华中长官公署迁衡阳。8月初程潜（时任长沙绥靖主任）、陈明仁（时任湖南省主席）先后投共，到10月7日白崇禧率部自衡阳退至桂林²⁷。

此时东南战场以及西北和华北战场也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东南战场方面，蒋介石在1949年1月退位前夕，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调重庆绥靖公署（1948年6月1日由重庆行营改设）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是年5月前半月，浙赣线前半段为共军占领后，浙东及赣东国军退入闽境，共军追踪而至，于5月14日占南平，福州震动。5月27日上海保卫战结束，汤恩伯率部退驻舟山。8月16日，汤恩伯继朱绍良为福州绥靖主任。次日，福州撤守，部分军队留驻闽江口之马祖，李良荣部（第二十二兵团）则入驻厦门附近之金门岛，汤恩伯暂时移驻厦门²⁸。江西方面，共军四野（林彪）于8月16日占赣县，9月中旬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突破大庾防线，国军沈发藻的第四兵团不战而退，共军沿北江而下，直趋曲江；一路自大庾以东突入粤东的东江，国军胡璉的十二兵团在潮、汕布防。广州岌岌可危。广州时为政治中枢，行政院早于2月4日即自南京迁广州办公，4月21日共军渡江后，总统府亦迁广州办公。嗣因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布置防务、调动军队，引起李宗仁的不满，李常驻桂林。蒋以行政中枢空虚，决心以党领政，于7月中旬在广州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设置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张群、阎锡山、何应钦、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到9月中旬共军越大庾岭进窥广州，蒋介石于9月23日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自海南调刘安祺的二十一兵团在广州以北的花县、从化布防，沈发藻的第四兵团在其西，胡璉的十二兵团在其东。白崇禧的部队则在沈发藻部以北、连江县以西。到共军进攻从化后，白崇禧、沈发藻向西南的方向撤走，目标为广西；胡璉的部队被调去防守金门；刘安祺部初退回广州，继向雷州半岛转移，中途遇土共袭击，最后在阳江地方，被自海南来的船舰救走。在战争进行中，行政院已于10月12日迁往重庆，广州于10月14日为共军所占。广东省主席薛岳迁往海口，部分军政人员则转往台

²⁷ 《李宗仁回忆录》第4册，页977，981-987。

²⁸ 周开庆编，《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页43-48。

湾²⁹。

西北和华北战场，在徐蚌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主要在绥远、山西、陕西及其以西地区。华北剿总傅作义投降后，察哈尔的孙兰峰部大多被歼，但孙兰峰的残部，和绥远的董其武（任绥远省主席）部，尚约有三、四万人，未随傅投降。1949年5月，傅作义前往拉拢，到9月19日正式投降。山西方面，共军于平津战役结束后，积极进攻太原、大同。4月24日，共军占太原，守军多战死；5月1日，大同国军投降。山东方面，国军仅有的青岛十一绥靖区，至6月3日由海道南撤，经台湾转往海南。陕西方面，1947年6月由第一战区改组而成的西安绥靖公署，由胡宗南任主任。胡初在陕北及陇东采取攻势，曾于是年3月19日将延安收复。但到1948年2月以后，共军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即自陕北向南反击，3月3日占宜川，4月21日占延安。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总统辞职，于辞职前夕嘱胡宗南将主力移汉中，以巩固四川防务，时重庆绥靖主任为张群。是年5月16日彭德怀部（时已名第一野战军）渡泾河南下，西安绥靖公署于5月18日自西安迁往汉中。嗣以共军刘伯承部（二野）自鄂西进兵汉中，而彭德怀部亦西越天水进向兰州，迫使胡宗南部不得不向川北撤退。9月8日，胡受命为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先后在川北广元、绵阳设绥靖公署。时在鄂西的刘伯承部与陈毅部（三野）已越宜昌西进至接近四川边界的秭归、兴山。川康战场容下文再述，此处先述宁夏、甘肃、青海战场。宁、甘、青三省以甘肃为中心，1948-1949年间，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驻西宁；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驻银川；甘肃省主席郭寄峤，驻兰州；兰州另设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西北行辕改设），由张治中任长官。1949年4月，张治中为议和代表，留北京未返，西北长官初由郭寄峤代，继由马步芳任。1948-1949年间，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在宁夏和甘肃东部与共军西北野战军作战。1949年7月，马转任甘肃省主席，所部屡为共军所败，到是年9月23日共军进驻宁夏银川。其后马以支援甘肃作战不力的罪名被撤职查办。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亦无法抵挡共军的攻击，于1949年8月28日携眷至台湾。马步芳走后，甘、青局势益不可为。共军于9月23日占西宁，24日占酒

²⁹ 《李宗仁回忆录》第4册，页101，108-109，987-988，996；《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页134-142；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页147，157-158。

泉。到10月8日国府正式撤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并惩治马步芳。新疆方面，省主席鲍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于9月26日宣布投降共军，共军于10月12日占领哈密，10月20日占领迪化³⁰。西北战场，国军完全失败。

西北战场结束前后，国军在广西战场和川康战场亦应付乏力。在广西战场方面，共军于1949年10月14日占广州后，分兵两路西进，一路循西江进向梧州，攻击白崇禧部的右臂；一路经阳春、阳江直趋雷州半岛，以阻止白崇禧部自广西经雷州半岛撤往海南。先后任华中剿总和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其主要防守区原在南阳以南的平汉线及武汉一带。共军渡江后，武汉受威胁，白部于5月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转移。白部多广西子弟兵，撤退的最后根据地为广西。早在4月下旬，李宗仁即任命李品仙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经营广西；此后广西成为李宗仁的常驻之地。桂林绥靖公署于5月5日正式成立，当时广西省主席为黄绍竑（8月13日投共）。如前所述，由于湖南程潜、陈明仁不稳，华中长官公署于7月20日迁衡阳。到10月7日，广州保卫战前夕，白部自衡阳迁桂林。11月中旬，自广州南下的共军进入雷州半岛，自广州西上的共军抵达梧州，白崇禧、李品仙部自桂林撤往南宁，准备利用龙门港，自海上退守海南。当时广东省主席薛岳已退驻海南的海口，李品仙赴海口要求支持船只不得要领，又折往龙州。共军于11月22日占桂林，12月4日占南宁。白崇禧部的广西子弟兵大部溃散返乡，最后到达龙州之部队，于12月13日由黄杰（第一兵团）率领撤往越南。李宗仁于桂林失守前夕（11月20日）自南宁飞香港，12月5日以医病为由飞美；白崇禧、李品仙等则于南宁失守前夕飞海口转到台湾³¹。广西战场结束。

川康战场方面，川康原为国民党抗战基地，其地有中央势力，亦有地方势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地方势力，四川省主席张群则代表中央势力。战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23日设重庆行营，节度川、康二省，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兼代行营主任。行营以下，除川、康二省外，有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为主任，刘文辉为副主任；邓、刘皆属

³⁰ 《李宗仁回忆录》第4册，页982，989-991；《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页196-24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868-909有关记载；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页308，311，321，326，328。

³¹ 《李宗仁回忆录》第4册，页1014-1015，1022；《李品仙回忆录》，页247-25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905-921有关记载。

地方势力。邓锡侯的部队为由九十五军改编的三十九师，刘文辉的部队为由二十四军改编的二十四师。地方势力另有潘文华，统辖由五十六军改编的五十六师。潘文华于1945年10月20日受任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驻防四川东南隅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一带（在重庆东方），1947年4月移驻湖北宜昌，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改称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是年5月，邓锡侯继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自1946年9月已代理），川康绥靖公署则于是年8月被裁撤。邓因中央在四川征兵、征粮等问题与中央关系不睦，1948年4月辞主席职，四川省主席由王陵基继任。1948年6月1日重庆行营改为重庆绥靖公署，以朱绍良为主任。1949年1月朱绍良调福州，以张群为主任。4月5日，改重庆绥靖公署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辖川、康、滇、黔、渝五省市，直隶行政院，任命张群为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孙震、贺国光等为副长官。5月下旬，共军一野及二野向西南川、黔、滇、康等省进军，国府的防守以川康为中心，于6月中旬加以部署：（1）将原驻鄂西、隶属华中军政长官的宋希濂的十四兵团改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宋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负责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一带的防务。（2）将设于万县的川东绥靖司令部改为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震兼主任，负责鄂川间长江的设防与封锁。（3）增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原欲以卸任四川省长邓锡侯为主任，邓不赴任。如前所述，到8月国府改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于是年9月至四川北部的绵阳设绥靖公署，仍辖第七兵团，防区自四川西北近陕西边境的通江到甘肃东南近四川边境的武都。（4）在重庆西南、成都东南的宜宾和泸州地区设叙泸警备区，以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为司令。（5）重庆地区由重庆市长杨森率其二十军、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率其一〇八军等防守；重庆警备司令为刘雨卿。（6）成都警备令为严啸虎。（7）西昌警备司令为贺国光³²。

1949年10月中旬广州失守后，国府迁重庆。10月14日代总统李宗仁自桂林到重庆，15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自台北到重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于8月24日即自广州到重庆。10月下旬，共军二野

³² 韩静兰，〈抗战前后中央政府与四川的军政关系（1935-1949）〉（1993年6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页118，121-122，125-127，145，148-149。

开始自鄂西的咸丰、来凤和湘西北的永顺进兵四川东南部和贵州东部。进向贵州东部的共军，于11月1日占领贵州东边境的铜仁、玉屏、天柱，11月14日占贵阳。11月19日占遵义，24日占桐梓，逼近四川南境的綦江、南川。进向四川东南部的共军，于11月7日占秀山，11月12日占酉阳，26日占南川，27日占綦江、涪陵，28日，国军罗广文部及宋希濂部在南川以北山中战败，重庆危急。李宗仁于11月中旬徘徊于桂林、昆明、南宁间，11月20日飞香港。11月28日，阎锡山率行政院移成都。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自重庆移成都。在重庆不能立足的杨森部，沿嘉陵江北撤。在重庆东南秀山、酉阳、南川等地作战失败的宋希濂部则自江津西去，于12月3日撤至重庆西南、成都东南的宜宾。共军于11月30日占领重庆后，沿涪江、沱江向西北进兵，直指成都。在绵阳的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曾于11月初奉蒋介石的指示派兵援重庆，并空运一个师至西昌。自川北广元开往重庆附近的援军后为共军所败，自汉中经成都新津机场转运西昌的部队约只七百余人。另一方面，国防部于11月18日命胡宗南将汉中、绵阳等地的部队向成都平原转进。胡部于12月初抵达成都，即负责成都的防卫。12月7日，国府以顾祝同代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副长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撤销西安绥靖公署。自重庆攻击成都的共军，沿涪江的一支，于12月7日占潼南，12月10日占遂宁；沿沱江的一支，于12月5日占内江，12月8日占资阳；成都震动。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以及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通电投共。12月10日，蒋介石自成都飞台北。国府于12月15日将刘文辉的西康省主席职撤免，而易以贺国光。时共军以南北两路进军成都，北路共军一野（彭德怀）于12月17日占广元，18日占剑阁；南路共军二野（刘伯承）除沿涪江、沱江向成都进兵外，并沿岷江追击自宜宾向乐山、峨眉撤退的宋希濂部，设于宜宾的叙泸警备区司令郭汝瑰于12月8日投共，而宋希濂于12月19日在峨眉被俘虏。此期间，四川将领杨森、孙震于12月9日飞台北。蒋介石嘱胡宗南自成都向西南撤退，经大凉山（在西昌东）转入西康南部的西昌。12月23日，部队开始向西昌转移，是日罗广文部（此时为第十五兵团）在成都西北的

郫县通电投共，26日共军占成都。胡宗南拟将指挥部移海口，自己且于23日飞榆林，29日飞海口，因蒋介石28日指示：「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单刀前往，坐镇其间。」胡遂于30日再飞西昌坐镇。胡抵西昌时，其主力部队尚未到达，仅前此自汉中空运而至者七百余人。到1950年1月中旬，胡残部集西昌者万余人。1月下旬，蒋介石派其长子蒋经国飞西昌视察。其后自2月8日起至3月23日止，由台北空运武器弹药七次，共约四十架次。至3月下旬，共军猛向西昌攻击，情况危急。3月26日，时蒋介石已复总统职，派机赴西昌将胡宗南、贺国光等接至台北。留置西昌各军，至4月1日弹尽力竭，突围失败³³。国府在大陆的据点尽失。1949年下半年在贵州、云南等地转战的李弥部，曾于卢汉投共时攻（12月11日）打昆明，战败后退往缅甸。

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约可从四方面略作说明：（1）国共斗争，美国支持国民党，但有附带条件，即国民党需容纳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嗣以国民党的政治布局不符合各党派的愿望，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派与国民党愈走愈远，而中共势力日张，美国乃采取退缩政策。国民党在战后依恃美国太重，美援不来，顿失信心。另一方面，苏俄支持中共，初因欲自国民党手中获取东北地区的控制权，一度限制中共明目张胆地扩张，及国民党与美国联合拒斥苏俄独享东北利权，苏俄乃放手、并支持中共扩张。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援，美国不理。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要求他们调解中国内战，各国亦予婉拒³⁴。在四顾无援的情形下，国民党束手无策，终无法回天。（2）抗日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政府恢复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经济崩溃，主因生产未恢复，赋税难增加，而军费日增，库存减少，通货发行多，乃迅速贬值。据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上海电讯，法币一百元可购买的物品，1940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口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

³³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页313-354；上引韩静兰，〈抗战前后中央政府与四川的军政关系（1935-1949）〉，页150-152；《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页243-27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页386，388；《蒋李斗争内幕》，页18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页907-925有关记载。

³⁴ 除特别说明者外，参考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723-725。

三分之一盒火柴。另有资料显示，1948年1月上海的米价每石法币一百万元，是年6月涨至八百万元³⁵。上海的生活指数，以1948年8月19日为基，到1949年1月下半月增至88倍，2月下半月增至643倍，4月下半月增至37万倍³⁶。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社会不满难平息，此正为中共革命的时机。（3）国民党革命采取收编旧势力的方式，收编之后未加整合；国民党长年训政，独享政权，对民国建立以后的多元势力无法包容、亦未能疏解；加上抗战时期，军队人数大增，游击部队甚庞杂，战后裁编，诸多尽心抗日之官兵无出路，伪军亦多无出路；而长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农民离村，市民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凡此种种，皆为造成国民党政权鱼烂河决之因。（4）中共方面有较持续的俄援，又被西方部分人士视为土地改革者，国际环境对其有利。中共对农工大众以争取权益之方式与之相结，对知识青年和反对党以争自由民主之方式与之相结，结合了各方对国民党不满的群众，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广大下层斗争少数上层，使国民党愈来愈孤立，终走上失败之途。

³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260-261。

³⁶ 同上，页234，249。

第九章

中华民国守住最后一片土

第一节 生死存亡的契机

1949年4月共军渡江后，各地国军无法有效抵抗。5月3日杭州撤守，一部国军撤往杭州东南、台州湾外海的台州列岛，包括一江山、上大陈山、下大陈山等。5月27日上海撤守，一部国军撤往上海东南、杭州湾外海的舟山群岛；舟山群岛设定海县治，属岛有登步岛等。8月17日福州撤守，一部国军撤往福州外海的马祖列岛、平潭岛。10月17日厦门撤守，一部国军撤往金门岛。12月28日广东雷州半岛失陷，一部国军留守海南岛。国军在大陆抗共失败的过程中，内陆国军最后撤至川、康，到1950年3月26日西昌撤守，大陆地区全部沦陷。东南沿海方面，国府已选定台湾省作为基地，于1949年12月8日迁都台北。为屏蔽台湾防务，并伺机进兵大陆，国军设法守卫大陆外海岛屿；当时共军以解放台湾为目标，对台湾前哨的大陆外海岛屿，亦随时攻击。在国军设法保卫、共军设法攻取的大陆外海诸岛中，由北而南，浙江外海有舟山群岛、台州列岛（大陈岛），福建外海有马祖列岛、平潭岛、金门列岛，广东外海有万山群岛、海南岛。这些岛屿可以增加台湾防务的纵深，并可监视共军在东南沿海的集结，对台湾的防务很重要。但因受兵力、制海权、制空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国府最后只保有金门和马祖两地，而平潭、海南、舟山、大陈等岛，均于1950-1955年间陆续撤退，使中华民国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台、澎、金、马。

从平潭岛撤退到金门古宁头和舟山登步岛大捷（1949年9-11月）

1949年秋冬以后，国共两军角逐大陆东南沿海岛屿，共军方面为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为粟裕（司令员陈毅主持上海市党政工作）；

国军方面由东南军政长官统辖。东南军政长官设于 1949 年 8 月 15 日，由陈诚出任，统一指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的军队。当时代总统李宗仁倦勤，自 10 月 20 日以后滞留香港，12 月 5 日托病赴美，中枢军政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主持，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指挥一切。共军第三野战军有陆军约 80 万人，但共军缺乏空军，海军除投降的国军舰艇外，以机帆船为主。国军陆军有数十万人，另有二百多艘战舰、三百多架作战飞机¹。制空权和制海权均在国军手中。

共军对外海岛屿的攻击，较早而重要的一次是进攻福州东南外海的平潭岛。1949 年 8 月 17 日共军三野第十兵团（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个军，共十余万人，多出身山东根据地）占领福州，8 月 22 日兵团司令叶飞即嘱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准备进攻平潭岛。平潭岛守军为李延年兵团的七十三军和自福州撤至的七十四军一部，共约一万余人。9 月 15 日，共军第十兵团派三师兵力进攻，到 17 日完全占领²。国军大部被俘，一部由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裹胁李延年带领撤至台湾。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以彼等擅自撤退，交军法审判，李延年被判刑十年、李天霞八年³。

共军于 1949 年 9 月中旬进攻平潭岛成功，10 月下旬谋攻金门则失败。共军攻取金门战役，发生于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结束，共三天。参战的中共部队仍为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真正用于渡海攻击的，是三个加强团，总兵力约一万人。由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坐镇金门对岸的莲河指挥。守金门的国军，最早进驻的主力是李良荣（福建人）的二十二兵团，辖第二十五军和第五军，于 8 月 2 日自厦门移驻金门和烈屿（小金门），配属部队有八十军的二〇一师（孙立人在台湾组建的青年军，9 月 6 日自台湾抵金门）、战车第三团第一营的两个连（22 辆，8 月 27 日到达）、炮兵第三团第七连和重炮第一连（炮兵系 6、7 月间自厦门移来）。10 月 12 日及 25 日，胡璉（陕西人）的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山东人）和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江西人）亦先后自汕头撤至金门（此期间十二兵团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率部往舟山防守，胡璉则转至台湾述职）；十二兵团的士兵多为在

¹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9-13。

² 丛乐天等编，《回顾金门登陆战》，页 16-17。

³ 丁力之，《敬悼李延年将军》，《山东文献》1 卷 1 期，页 65-67。

江西征训而来。估计金门的守军共约五万人。金厦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初为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金门地区最高指挥官初为李良荣，10月26日易为胡璉。

25日凌晨，第一波共军近万人乘民船约三百艘突破二〇一师阵地，在金门岛西北岸二〇一师防地登陆成功。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浙江人）甫于10月17日自厦门撤至金门，感于金门守军以高魁元的第十八军战斗力最强，乃令李良荣将金门所有机动部队交高魁元统一指挥，全力迫使登陆共军至古宁头附近地区就歼。反击时，战车部队协同作战，海军（中荣、太平等舰在古宁头以西海域助战）、空军（协同作战的飞机239架次）亦助战，使共军滩头阵地缩小。26日凌晨，共军第二波增援部队只有四连到达，主因第一波部队使用之船多因退潮在金门搁浅，并为国军炮击及飞机轰炸焚毁，无足够船只运送后援部队。26日上午十一时，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璉以福建省主席兼金门防卫司令官的名义由台湾受命抵达金门，于会晤汤恩伯后，即赴前线指挥各军，共军大挫。至27日上午，登陆共军或被歼或被俘；共军最后据点古宁头被克复，战事结束。下午四时，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巡视战场。此役双方损失人数，据国军方面的记载，国军伤亡合计三千二百余人，共军被俘约七千人、死亡约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不足信）；据共军方面的记载，国军伤亡九千人，共军被俘、死亡各约五千人⁴。

在金门古宁头战争以后的一星期，共军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亦失败。舟山群岛共三百四十余岛屿，面积一千二百平方公里，首府设在舟山岛的定海镇。自1949年5月27日上海撤守后，从浙江、上海撤出的国军有四个军13个师约6万人进驻舟山群岛，7月12日设舟山防卫司令部，由浙省主席周岳任司令官。舟山群岛另有海军、空军基地，海军封锁上海及其以北的港口，空军不断轰炸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

另一方面，早在7月下旬，共军第三野战军王建安的第七兵团即奉令进攻舟山群岛。第七兵团共三个军，负责攻击舟山群岛的二十一

⁴ 赖馨，〈台海战争述略〉，国史馆编印，《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页851-855；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41-75；国史馆编印，《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页84-85，88，132-133，190，195，215，216，226-227，247，249，253-254，282，284-285，291，296-297，299；《续辑》，页56，93，142，172-173，222-224，313-314；丛乐天等编，《回顾金门登陆战》，页7-10，27-29，40，316-329。

军、二十二军，其前身为新四军，系在江苏、安徽等华东地区招训而成，缺乏海上作战的装备与经验，主要靠木帆船渡航。7月19日，攻克舟山岛西北侧的大榭岛。为了加强防务，东南长官公署于8月1日设舟山指挥部，以郭忏为主任、石觉为副主任兼舟山防卫司令官。共军的攻势甚为凌厉，10月5日又攻克舟山群岛西北侧的金塘岛；10月8日再克舟山群岛南侧的桃花岛。10月11日，蒋介石赴定海视察，决定加强舟山防务，自汕头调胡璉的第十二兵团的六十七军增援舟山，守舟山的总兵力达九万人。11月3日夜，共军五、六千人自桃花岛出发在登步岛登陆。登步岛面积18平方公里，为定海的屏障。9月21日起由八十七军二二一师驻守，约有兵力八千人。战争发生后，由军长朱致一直接指挥。由于阵地被突破，总预备队的六十七军当夜即奉令增援，于4、5两日投入三团兵力，军长刘廉一且至登步前线协同指挥。共军虽然于11月5日夜又登陆千余人，但由于缺乏海、空军支持，战局甚不利。国军海军太和、永泰等舰除于海上巡弋阻绝共军增援外，并炮击共军阵地；空军先后出动114架次，轰炸共军阵地，并击毁共军渡海船只。至6日晨，共军自登步岛撤退。此役，据共军方面的资料，共军伤亡失踪约一千五百人，国军几倍之；据国军方面的资料，共军伤亡三千七百余人，国军伤亡二千八百余人。无论如何，对国军来说为一大胜利，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曾亲赴前线劳军⁵。

海南岛、舟山群岛、东山岛、万山群岛陆续失守（1950年4-8月）

尽管共军攻取沿海岛屿并不顺利，他们也在失败中获得一些海岛作战的经验。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5月间，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舟山群岛和海南岛。共军攻击海南岛，有其有利的条件：（1）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有众二万人，可以作内应；而中共的游击区和控制的农村，已占全岛面积的70%。（2）海南岛面积大、海岸线

⁵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89-95；张昭然，〈大陆逆转前后国军在浙江沿海岛屿的经营〉，《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页563-569；前引赖馨文，页855-858；前引《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页343，347，361，362-363，382，385，《续辑》，页358，396，420-421，422-425，430-431。

长，防不胜防；国军海军有各类舰艇约五十艘、空军有各类飞机四十余架，保卫琼州海峡和全岛海防线，捉襟见肘，而台湾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对海南岛支持。（3）共军准备充足，拥有大型木船二千二百只、熟练驾驶一万二千名，采取「千帆渡海」、「木船围斗军舰」的战术。攻击海南岛的任务由第四野战军（前身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为林彪）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负责，由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统一指挥。征集到的二千二百只木船，一次可运十万人以上的兵力。1950年3月5-31日，即有共军数千人自雷州半岛徐闻等地分四批偷渡，自儋县外海、文昌外海等地上岸，虽受国军截击，仍得与冯白驹部合流。大规模的渡海攻击在4月中下旬，出发地点仍在徐闻等地，登陆地点在海口以西至临高一带沿海。第一梯队使用五万兵力，于4月16日强渡；第二梯队的五万兵力则于4月23日渡完。当时国军海南防卫总司令为薛岳，守岛部队约十万人，敌不过共军的攻击，在美亭（海口西南、澄迈东北）决战失败后，即决定自海口撤退。部分部队由海口退到榆林等港，撤至台湾。到5月1日，海南岛全为共军占领。据共军方面的资料，国军死亡六千多人，被俘二万六千人；共军伤亡、失踪四千五百人⁶。

攻击舟山群岛的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全军辖七、九、十兵团，约80万人）的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约20万的兵力担任，并配以海军、空军。共军空军于1949年夏天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三十架，到1950年5月，苏俄援助五十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于6月中旬在南京组建空军第四混成旅。南京、上海、徐州三地的飞机约170架。海军舰艇多为接收国军者，1950年4月华东军区共有战斗舰艇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0艘，共四万三千吨。长江下游可供使用的舰艇约四十余艘。为攻击舟山而征集的木帆船达二千余只，一次可运十万以上的部队。共军所以动员陆、海、空军进攻舟山，一方面是基于登步岛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军对舟山的防务已经加强。1949年12月7日，舟山防卫司令石觉奉命兼任浙江省主席及绥靖主任。此后半年内，完成军用码头21个、巨型机场一处。国军以舟山为基地，除陆军有12万5,000人外，海军有各式舰艇27艘，空

⁶ 丛乐天等编，《回顾金门登陆战》，页50-51；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97-102；《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6册戡乱后期（上），页452-456；许士杰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南》（上），页78-80。

军有飞机 44 架。海军封锁长江口，并运送部队袭击江浙沿海地区；空军则对上海等城市和港口实行轰炸。嗣国军以共军空军增强，且有俄制米格机，舟山制空权受威胁，而舟山距基隆 310 哩，补给非常困难，遂决定自舟山撤退。1950 年 5 月 11 日副参谋总长郭寄嶠至舟山，策定撤退计划。大小运输舰船近 80 艘，于 12、13 日先后到达舟山附近。装甲兵部队、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等于 13 日上船，后勤辎重部队等于 14 日上船，舟山防卫司令部、浙江省政府、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八十七军（军长朱致一）于 15 日上船。17 日中午各船团启航，到 20 日各部队已分别在基隆、高雄两港登陆。舟山全部人口约 54 万，其中渔民约占三分之一强。随军来台的多为加入国军的青壮，约五万人。计撤出军民 12 万 5,000 人，战车 121 辆，各型车辆 180 辆，另有海军、空军⁷。

在海南岛失守、舟山撤退之后，台湾在大陆外海的前哨岛屿只有大陈、马祖、金门、东山、万山等岛。共军除计划攻取这些岛屿外，早在 1949 年 5 月底占领上海后即对攻取台湾预作准备。进攻台湾的计划，预计投入的部队主要为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和第十兵团，分两个梯队运送，作渡海攻击；但以缺乏渡海的船只，亦无足够的海军掩护（如前所述，1950 年 4 月，华东军区的海军舰艇约四万三千吨，而国军尚有十余万吨），攻台的作战计划一直无法付诸实施。对外海小岛的攻击则不断进行。1950 年 5 月 12 日，攻取了福建南部外海的东山岛（守军约五千人）；是年 5 月 25 日至 8 月初，攻取了广东省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守军约三千人）⁸。但是年 7 月 26-27 日对金门西南大担岛（守军约三百人）的攻击则归失败⁹。

韩战爆发与美国在台海牵制中共（1950. 6-1953. 7）

在共军不断袭击外岛、并准备进攻台湾之际，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韩军队入侵南韩。美国为稳定东亚局势，一面协助南韩抵御北韩，一面于 6 月 27 日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并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

⁷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104-108，115；张昭然，〈大陆逆转前后国军在浙江沿海岛屿的经营〉，页 566-567；《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页 353-354，447-448，《续辑》，页 443，466，516-517，552。

⁸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109-112，115，118-120，122-123。

⁹ 赖贤，〈台海战争述略〉，页 858-860。

遯。7月31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台，决定协防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抵台，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约在同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也转趋积极。另一方面，韩战爆发后，中共的注意点，很快转移到东北的边防上。随后，共军停止了对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的进攻，决定将兵力投向韩国战场，以保卫东北。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北韩告急，大陆东北地区受到威胁；10月19日起，中共的主力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陆续开入韩国作战¹⁰。此后迄1953年7月27日韩战结束前，共军在东南沿海基本上采取守势。另一方面，美国为了牵制韩国战场的共军，虽然表面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却暗地支持国军以金门、马祖、大陈等岛为主要基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美国中央情报局且成立「西方企业公司」，在金门、马祖、大陈等地训练国军游击队，从事突袭和搜集情报的任务。突袭任务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功较大的一次是1952年10月11日以九千部队自金门分乘军舰及机帆船突袭福建莆田外海的南日岛，该岛有共军不足一千人，俘获七百余入后，于14日安全撤退。1953年7月16日以一万人的兵力自金门突袭闽、粤交界外海的东山岛，是失败较大的一次。该岛有共军一千六百人，在作战中共军损失一千二百余人，国军的损失，共军方面的资料谓三千三百多人，国军方面的资料谓一千多人¹¹。

1953年7月27日韩战结束后，美国对支持越南抗共转趋积极，中共转注意力于对越南的支持上。此期间，台海情势又趋紧张。造成台海情势紧张的原因约有五点：（1）韩战结束后，中共军队大量南调，台海对岸的共军兵力大增，对台海构成压力。（2）韩战期间，国军以浙江外海大陈等岛为基地对大陆沿海突击甚多，使中共视国军据守的外海岛屿为眼中钉。（3）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54年2月2日宣布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使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大门洞开。（4）蒋介石总统不断号召「反攻大陆」，共军受国军反攻的威胁，极思攻取国军反攻的前哨。（5）韩战结束后仍维持南北韩分裂的状态，拟议中的越南停火，亦是南北越分裂（到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

¹⁰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132-137。

¹¹ 同上，页139，147-158；赖馨，〈台海战争述略〉，页860-863；《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8册光复大陆整备时期，页19-35，41-62。

会议中定案)；中共为了避免使台海两岸的分裂固定化，力谋进攻台湾前线外岛及台湾。1954年1月，中共华东军区提出了陆海空三军攻取大陈岛的计划。7月23日，《人民日报》以〈一定要解放台湾〉为题发表社论，以突出台湾问题。8月27日，共军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9月3日，福建厦门炮兵阵地炮击金门数千发（此时金门防卫司令为刘玉章）。论者谓：炮击金门是中国领土不容割裂的宣示，当时中共虽统治偌大的中国大陆，但尚未能进入联合国，只与二十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十个属于共产集团）；中华民国则以台湾地区代表着中国。此时美国对西太平洋的防卫转趋积极，9月8日，与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等七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0月间与中华民国开始缔结共同防卫条约的谈判。在这种情形下，共军于1954年11月1日开始对大陈地区展开攻击，包括空军的轰炸及对海军的袭击。大陈为台州列岛的主岛，该列岛于1950年5月舟山撤退时，有江浙反共游击部队二万三千人。是年6月韩战爆发后，国府派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为江浙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官，将游击队改为江浙反共救国军，与美国配合，曾先后突击江浙沿海十余次，以策应韩国盟军作战。韩战结束后，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于1953年7月改为大陈防卫司令部，改任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为司令官。此后由于共军海、空军南移，大陈对面共军路桥机场完成，国军在大陈地区渐失制空、制海权。11月14日，国军一千四百三十吨的太平号军舰在大陈地区被击沉，表示国军对该地区的制海、制空权已丧失（共军在1953年底已拥有飞机三千多架）。1955年1月10日共军空、海军来攻，击沉国军中权、灵江等舰。18日，共军进攻大陈北侧的一江山岛（面积1.2平方公里），投入各种舰艇188艘，飞机184架，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五千人以上；该岛守军不足一千一百人。至20日，共军完全占领一江山岛，共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守军约有七百人战死、三百人受伤被俘。一江山岛战役期间，蒋介石总统于2月5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自大陈地区撤退。一江山岛失陷前后，国军即主动放弃大陈，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于2月8-25日自大陈地区撤退完毕。计撤出国军二万五千人、居民一万

八千人¹²。

国军对大陈的防守失败及撤守，主要因为制空权不能掌握。据当时国防部长俞大维分析，国军桃园空军基地距大陈 220 海浬，共军路桥机场（在大陈对岸）距大陈仅 55 海浬；国军的飞机是次音速的 P-47，只能在大陈上空停留 15-20 分钟，就必须返航，否则油量不够，而共军的飞机是超音速的米格十五，一起飞就到大陈。国军制空权不保，海陆军皆暴露于共军飞机的轰炸下，经过一江山战役的失败，美军遂掩护国军撤退大陈¹³。撤离大陈的居民，在临行前写信给蒋介石总统说：「我们都是些穷苦的百姓，房屋是破烂的，但已住了好几代了；街道是古老的，但这都是祖宗们辛苦传下来的。我们多是靠着这片海捕鱼为生，靠着这座山安身立命。……我们愿意把渔船烧掉，把渔网毁掉，把渔具丢到海里，拜了天地，哭别了祖宗庐墓，背了神位，抬了我们走不动的父母，抱了刚生下来的孩子，抛弃自己的家乡，以及我们的山和海，为了活命，为了祖宗的香火，下了最大决心，到您这里来。我们都深信不会离家太久。」¹⁴ 大陈撤退时，公家的房屋，烧的烧、炸的炸，工事也都自动破坏¹⁵。使撤退后的大陈成为无人岛、一片废墟。从一江山失守到大陈撤退期间，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于 1954 年 12 月 3 日在华盛顿签订，并于 1955 年 3 月 3 日在台北换文生效。大陈撤退后，保卫台湾的前哨岛屿只剩下金门和马祖。而共军逐渐南移，伺机攻击金马。

据国防部的了解，自大陈撤退后，共军兵力即不断南移：（1）自韩战结束，韩境中共陆军即陆续调驻东南沿海。（2）海军及空军陆续南调。（3）陆续完成福州、龙溪、澄海三处机场，并修汕头等处机场。（4）于 1954 年 10 月完成厦门经福州至江西鹰潭的铁路。据估计，中共在东南沿海所部署的军力，陆军占总兵力 34%，海军占 95%，空

¹² 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北京），1988 年第 3 期，页 43；王孝《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 144-147；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158-178；张昭然，〈大陆逆转前后国军在浙江沿海岛屿的经营〉，页 568-574；赖警，〈台海战争述略〉，页 864-865；《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戡乱第 8 册光复大陆整备时期，页 73-92；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俞大维先生年谱资料初编》（一），页 406，410-413，423，437-441，446-448，-但各书所列共军攻一江山岛的兵力及国军伤亡被俘人数彼此不同。

¹³ 李元平，《俞大维传》，页 143，151-155。

¹⁴ 刘毅夫，《风雨十年——一个战地记者的见证》，页 102。

¹⁵ 同上，页 121，123。

军占 60%¹⁶。这对台湾的防务构成很大威胁。

为了应付共军对台海的威胁，在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的不断要求下，美国除派海空军进驻台湾外，不断以援助的方式加强国军的战力，对空军的更新尤为注意。美援的飞机，迄 1958 年八二三炮战前夕尚以 F86 为主，并配以响尾蛇飞弹，到八二三炮战爆发后即开始援助 F100。八二三炮战爆发前后，中华民国的陆军共有 21 个师，7 个师驻金马，14 个师驻台澎。海军军舰 104 艘，驱逐舰队战力 85%，后勤舰队战力 50%。空军战斗大队共有飞机 406 架，机种以 F84、F86 为主；另有两个空运大队，以 C47 型为主¹⁷。

美国、台湾、中共的三角纠葛（1949-1958）

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成立后，台海局势至少有三方面的变化：（1）国军未获美军同意，不能对共军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攻击，因此台湾对大陆基本上是采取守势。（2）共军对国军攻击，需注意不要伤及美军，以免将美军卷入国共战争。（3）美国仅希望保卫台湾；中华民国以金门、马祖为大陆主权的象征，又为侦察沿海共军动态的基地，坚持防卫金马。在美国与中华民国利益冲突之中，中共在外交上争取美国承认，在军事上避免使美国与中华民国联合作战；在对中华民国的关系上，或以军事恫吓，或以和谈号召，使中华民国维持与大陆的和战关系，以避免在美国的笼络和压力下，走向独立之路。

1955 年 8 月 1 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开始在日内瓦会谈，此后断断续续，会谈了 15 年之久，主要的争执点是台湾问题。美国站在防卫台湾的立场，要求中共不对台湾动武；为表示与美国立场一致，但要避免台湾独立，中共领导阶层至迟在 1955 年 7 月 30 日，就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¹⁸。

国共两党皆欲以自身的力量统一中国。美国于二次大战结束后，曾积极协助国民党统一中国，关于此点，前章已有论述。仅就台湾地区而论，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投降，9 月初旬，美国战略服务处两度自昆明派遣情报人员至台湾调查情势。10 月 15 日更派陆军顾

¹⁶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俞大维先年谱资料初编》（一），页 633。

¹⁷ 同上（二），页 824，1015-1017，1095，1104-1105。

¹⁸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181-183。

问团百余人到台北，以协助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调派军队。10月15-17日间，美军登陆舰运送国军第六十二军及七十军合计一万二千名官兵在高雄和基隆两港分别登岸。中华民国能顺利地自日本手中接收台湾统治权，受到美国的协助不小。其后四年，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抗共失败，初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大陆抗共失败归罪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继于1950年1月5日正式宣告不再支持中华民国，美军驻台人员随之离台。中华民国政府为争取美国的支持与信任，于1950年3月18日任命亲美的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但真正使美国再度重视台湾，则为是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韩战期间，美国不仅协防台湾，且有限度支持国军游击队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1951年5月1日，驻台美军顾问团成立。顾问团成员，1951年只有360人，到1955年增加到2,347人。不过，美国的目的仅在保卫台湾，为减少与中共间的冲突，美国曾一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大陈、马祖、金门；此一要求与中华民国的国防政策和反攻复国的目标相抵触，中华民国政府很难接受。几经协商，到1955年1、2月间决定放弃大陈、固守金马。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于大陆撤守后自沿海岛屿对沿海各地的突击活动，在韩战期间一度受到美国的支持。韩战结束后，美国为稳定台海局势，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停止或减少对大陆的突袭。1955年3月3日换文生效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于1954年12月签订），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前需征得美国同意。到1956年以后，国军的海军已很少拦截、攻击和搜查进出大陆港口的中外轮船，对大陆城市的轰炸，基本上也已停止¹⁹。再者，美国在与中华民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前后，曾要求中华民国将三军拨交美军统一指挥，并由美国拨发官兵薪饷，以有效应付远东局势；此事因涉及国家主权，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拒绝。美国为获得国军指挥权，又建议成立中美联合作战中心，美方的指挥官由顾问团长蔡斯（W. C. Chase）兼任，国军方面的指挥官由孙立人担任；亦为中华民国政府拒绝。1955年5月，孙立人及其部属数百人以「匪谍案」等罪名被逮捕（按中华民国政府已于1953年4月11日任命俞鸿钧为台湾省主席取代吴国桢，并于1954

¹⁹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186。

年6月24日任命黄杰为陆军总司令取代孙立人，孙被任命为参军长)。孙案发生后，美军顾问团企图控制中华民国军队的行动中止，美国并将蔡斯调回，以减少与中华民国政府间的摩擦²⁰。

自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希望在国共之间有所选择。1949年中共占领大陆之际，美国企图与中共建立关系，但因中共反美情绪高涨，其后并直接投入韩战与美军作战，使美国退而再支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面对中共军事威胁，不以暂时获得自保为得计，总思在中共获得制空、制海权之前，能伺机反攻大陆；此一政策不获美国支持。美国为了缓和台海局势，在压制了中华民国的西进政策之后，又不愿中共在台海动武，只好出于谈判一途。而中共为了争取美国承认，尽管先后在韩、越战场与美军对抗，在台海地区则尽量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如前所述，1955年8月，美国与中共开始外交接触。在谈判当中，中共为争取美国的外交承认，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颇能投美国所好，因为美国的目的，即在维系台海和平。

1958年金门八二三炮战带来台海和平

中共和美国的建交谈判并不顺利，美国基于战略考虑，不愿自台湾地区撤兵，此为中共所不能忍。自1955年以后，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支持土耳其、伊拉克、黎巴嫩，苏俄和中共支持埃及、叙利亚，并支持黎巴嫩、伊拉克的人民推翻其政府。到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美国马上出兵中东。8月初苏俄总理赫鲁晓夫访北平，与毛泽东商讨中东战略问题，声明美、英两国为「和平与民主之敌」，苏俄要求美国自中东撤兵，中共则攻击美帝霸占台湾²¹。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于1958年8月11日发表长篇备忘录，重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空军、海军和游击队，复继续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扰²²。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在金门地区策动了一次空前激烈的军事攻击。攻击来自空中、海上以及陆上的炮击，而以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炮击最具震撼性。

金门位在厦门港和围头湾之间，东北、正北、西北三面均隔海为

²⁰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亚洲人》1卷1期，页81-85。

²¹ 前引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194-496；前引赖馨，〈台海战争述略〉，页866。

²² 前引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页49。

大陆陆地包围，西北受厦门炮兵群的威胁，正北受莲河炮兵群的威胁，东北受围头炮兵群的威胁。此次共军为攻击金门，已掌握空军优势，苏俄援助的米格十七已编入空军，到八月中旬，驻进福建连城、福州、龙田与广东澄海等处的飞机已达三百多架。海军方面，在福建海面调来各种水面舰艇九十二艘；陆军方面，厦门地区有各种火炮六百三十九门。在火炮当中，以苏制的 152 厘米和 122 厘米榴弹炮为主要火力。当时金门地区九个岛屿有国军驻军八万八千人，有各式火炮五百六十门，其中 105 厘米口径以上火炮三百零八门，以美制 155 厘米榴弹炮为主要火力。时国军空军已换装了米格十五的克星 F86，但共军空军已换装成米格十七。海军方面，国军担任沿海地区防务的为六十二特遣舰队，包括巡逻支队二，攻击、水雷、运输、后勤支队各一²³。

金厦地区剑拔弩张，国军于 1958 年 7 月 17 日起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在台海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国防部确认：美国海空军继续协防台湾，并确保台湾海峡之制空与制海权；各外岛发生战争时，美国对台澎继续予以支持，并继续予外岛部队后勤支持；外围岛屿之防卫作战，由国军及游击部队自力担任。7 月 29 日晨，国军空军 F84 四架在金门以南上空与共军米格十七多架发生空战，国军飞机被击落两架，或谓三架。8 月 7 日上午，国军 F86 机 8 架在金门附近上空与共军米格十七飞机 18 架发生空战，双方无损失。8 月 14 日上午，国军 F86 军刀机 20 架与共军米格机 30 余架在马祖附近上空发生空战，米格机 3 架被击落，军刀机 1 架被击落。但国军方面的纪录则谓，自 8 月 14 日至 9 月 25 日的六次空战中，击落共军飞机 29 架。六次战绩分别是 3 比 0、2 比 0、7 比 0、5 比 0、10 比 0、2 比 0。海军方面，8 月 10 日凌晨一时国军巡逻舰二艘在马祖附近海面与共军炮艇四艘发生战斗，共军炮艇一艘沉没。8 月 14 日下午，国军巡逻舰二艘在马祖海面与共军炮艇六艘发生战斗，共军炮艇三艘沉没。这些冲突，可以说都是金门八二三炮战的前哨战。共军对金门密集炮击始于 1958 年 8 月 23 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其后的 120 分钟内，共军共发炮五万七千余发，国军还炮二千余发。国军伤亡四百余人，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都在第一波炮弹中阵亡。其后多日共军炮击发数：

²³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06-219；前引赖警，〈台海战争述略〉，页 866；《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页 548；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八二三炮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页 19-21。

24日三万七千余发，25日三千八百余发，26日八千二百余发，27日七千一百余发，28日一万六千余发，29日三千一百余发，30日一万三千余发，31日至9月6日平均每日二千发以下，9月7日五万三千余发，8日八千三百余发，9日一千七百余发，11日五万八千余发，其后迄于18日五千至一万发之间。上述炮击数，尚不包括对海上补给船的攻击。国军还击较少，每日平均不到二千发。炮战发生后，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美国给予支持。8月27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第七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中有四艘航空母舰。至于美国对中华民国的直接军援，主要有两方面：（1）武器及装备之援助：迄于1958年10月中下旬，有胜利女神飞弹营一个、八吋榴炮12门、155厘米榴炮72门、155厘米加农炮若干门、106厘米无座力炮150门、105厘米榴炮92门、40厘米战防炮若干门、M1步枪五万五千枝、华克猛犬式战车若干辆、水陆两栖运输车若干辆、M42SP防空战斗装甲车17辆、中型登陆舰若干艘、战术收发报机二千架、空投物品降落伞二万顶。特别值得注意的，由于中共空军原以米格十五为主，1958年秋开始使用米格十七，到1959年秋又开始使用米格十九，国防部长俞大维向美国要求援助F104，到1960年5月美援F104始运到。（2）八二三炮战期间对国军运补金门之护航：护航的原则是：美方军舰护送至金门外海15哩处，15哩以内由中方负责；美方驱逐舰驶近离岸三至五哩处，于运补船团之两侧作反潜搜索，及对空雷达警戒；如船团夜晚遭受共军鱼雷快艇攻击时，美舰发射照明弹协助。金门运补所以需要美军护航，是因为共军自发动炮战之后，即全力以陆、海、空三军对金门地区进行全面封锁。在此次炮战爆发前，国军对金门的补给主要靠海运，一般从高雄启航，在大金门背向大陆的料罗湾停靠。8月24日，驶出料罗湾的两艘运输舰受到共军的鱼雷袭击，一沉一伤；8月24、25日，共军鱼雷艇8艘及机帆船30艘在金门南方海面攻击国军军舰和运输船，商船「台生」号被击沉（共军鱼雷艇则有三艘被击沉；复有快艇来援，五艘被击沉）。8月27日以后，补给金门的运输舰改在澎湖的马公启航，夜间进入料罗湾外海，然后伺机入港，或由小艇驳运。另外并于傍晚后出动运输机，到金门机场降落。但自8月25日起，共军一方面以炮火或鱼雷艇对进入料罗湾的舰艇进行

袭击，另一方面，炮兵对机场设备和起降的飞机以炮火攻击。此后迄于 9 月 2 日间，有四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击伤（此期间，美援 C119 运输机抵台）。从 9 月 3 日起，国军改以空投的方式作为补给金门守军的主要手段，但空投量不及正常补给量的 10%²⁴。

9 月 4 日，美国宣布协防金马。9 月 7 日，中华民国与美国组织联合护航舰队，护送两艘运输舰进入料罗湾，共军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未予攻击。嗣毛泽东决定只打国军舰艇，不打美军舰艇。9 月 8 日，两国联合舰队再度护航时，金门岛和登陆舰受到共军两万一千七百发炮弹的射击，国军登陆舰一艘沉没，美舰立即后撤。9 月 11 日再一次的联合护航，美舰遇炮击后亦再度后撤。此事使中共摸清底蕴：美国不愿为保卫金门与共军冲突。9 月 18 日起，国军将运输舰停在金门外海，改以履带式水陆输送车（俗称「水鸭子」）抢滩，同样受到共军炮击。9 月 21 日，国军增大空投补给量；9 月 24 日，另以机动渔船补给运输²⁵。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美国于 9 月 4 日宣布协防金马，中共则于 9 月 4 日宣布 12 海里为领海区域，警告美军机舰勿侵犯领空与领海。9 月 6 日，中共抨击美国协防金马，并要求恢复大使级谈判。在这种情形下，自 9 月 15 日起，美国与中共代表又开始在华沙谈判台湾问题，美国要求共军停火，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共则要求美军退出台海地区。中共方面最初态度强硬，但到 10 月 6 日，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突然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声明自即日起停火一周，并建议国共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²⁶。

金门炮战停火的原因，据大陆学者的说法，是怕中华民国政府在美国压力下，自金马地区撤兵，使国共之间面对宽广的台湾海峡，接触困难，有利台独的发展。这一说法的论点是：美国在 1950 年代初期，即倡「台湾地位未定论」，意指台湾未必为中国的一部分。到 1954-1955 年间，金门发生炮战、共军逼取大陈，美国一直希望中华民国撤退金马，专保台澎。此事引起中华民国政府不满。当时中华民国极力

²⁴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俞大维先年谱资料初编》（三），页 1123-1124，1147，1153，1172，1267，1328-1329；王丰，《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 158-159；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20-230；李元平，《俞大维传》，页 238-241；赖馨，《台海战争述略》，页 866-868；《八二三炮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页 24，31；《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戡乱第 8 册光复大陆整备时期，页 111-114，116-118。

²⁵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42-254；《八二三炮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页 29；《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8 册，页 120-121。

²⁶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61-262；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 2 册，页 1028-1029。

防止台湾独立，如果自金马撤退，国共之间的地理距离将从不足十公里扩大到百余公里，不仅使反攻复国更加困难，亦更有利于台湾独立的发展。美国与中华民国于 1955 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中华民国对大陆的重大军事行动须事先征得美国同意，减少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纠葛。中共方面认为：国共在金马地区的纠葛，是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的。在 1958 年 9 月后半，当美国与中共谈判台湾问题时，美国劝告中华民国减少金马驻军，以作逐步撤退之计，中华民国政府断然拒绝。另一方面，中共为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政策，亦决定暂不攻取金门，使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一方，作为台海两岸的连系媒介²⁷。

中华民国方面的资料显示：金门炮战所以转趋缓和，是因为炮战期间，国府在美国援助下，运输能力增强，使中共无法对金门全面封锁，而国府在空军、陆军、海军方面的加强，使共军的攻击受重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以武力谋求统一的策略。依照国军军方所提供的资料，八二三炮战前夕，适逢第四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史慕德（Roland N. Smoot）于 1958 年 7 月 26 日抵台履新。8 月 2 日，俞大维要求美军以 F100 飞机进驻台湾，并提供中华民国空军响尾蛇飞弹。8 月 18 日，史慕德证实美国即将拨交中华民国 F86 飞机 85 架，并附响尾蛇飞弹。8 月 21 日，号称远东第一的台中公馆机场正式启用，可供 B52 重型轰炸机起降。8 月 23 日金门炮战发生，次日，美国第七舰队即抵金门海域。8 月 25 日，史慕德证实，美国应允以 6 架 F100 飞机援助中华民国。而是日国军飞机在金门上空击落米格机两架（9 月 4 日，美国十三航空队及陆战队航空队进驻台湾）。9 月 18 日、20 日、22 日，美援的八吋（203 厘米）榴弹炮，自马公分三梯次运往金门，并于 9 月 25 日进入炮兵阵地。美援战机、飞弹、巨炮，使中华民国挽回了在金门炮战中的颓势。9 月 8 日国军军刀机在澄海外海上空击落米格机 7 架；9 月 18 日国军军刀机又在金门上空击落米格机 5 架；9 月 24 日第一次用响尾蛇飞弹，在澄海外海击落米格机 10 架；10 月 10 日国军军刀机复在马祖东南海面上空击落米格机五架。而 9 月 26 日以后，由于八吋榴弹炮的使用（9 月 26 日、29 日），使共军的炮兵

²⁷ 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页 51-54；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55-260。

阵地大受损伤。海军方面，9月2日于金门料罗湾外海击沉共军鱼雷快艇8艘、大型炮舰2艘，国军无损失²⁸。不过，国军方面宣布的战果，共军并不完全承认；共军承认在7-10月间被击落的飞机仅6架，而国军被击落的飞机则多达14架²⁹。

总计自8月23日至10月6日为止，共军向金门发射的炮弹将近47万5,000发，平均每平方公尺落弹十余发；国军官兵阵亡及失踪439人，负伤1,870人；国军还炮近7万5,000发。在金门支持危局的防卫司令官是胡璉。共军于10月6日宣布停火一周，到13日又宣布停火二周。其间，金门守军乘机换装武器，原有的105厘米榴炮，大部换装为155厘米榴炮。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访问台北，共军食言，于先一日向金门发炮八千八百发，国军以八吋榴炮反击，再度给厦门地区以震撼。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单日打、双日不打，但由于返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传金门炮战已经「停火」，中华民国亦宣传共军已到「强弩之末」，到11月3日，共军又向金门射击三万发。新近于11月1日接任金门司令官的刘安祺，再以八吋榴炮反击。到1959年1月9日以后，共军在中央军委指示下，单日也只有零星射击³⁰。台海局势终告稳定。

台海局势的稳定，如前所述，中共方面的解释是欲以金马作为两岸的联系；国军方面的解释是在美援之下，国军兵力不断增强；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与中共在外交条件下的一种默契。就中华民国的军力而论，在八二三炮战结束之后，较强的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武器和装备都较差。空军方面，有完善的机场六个，有合乎要求的雷达及电子装备，防空以高射炮为主，作战飞机有五个大队，运输机有二个大队，并已拥有C119型运输机。在海军方面，作战军舰不足，运输舰一次尚无运送一个师之能力（金门炮战期间，美国有驱逐舰12艘在台湾海峡巡逻）。陆军方面，大部装备仍是一次世界大战时之型式，当时正从事转换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型式，在「前瞻计划」下，有

²⁸ 李元平，《俞大维传》，页215-217，226，229，245，257，282；《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页704-705；《八二三炮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页29。

²⁹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264；《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8册，页122。

³⁰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265-274；李元平，《俞大维传》，页289，292-298；赖馨，〈台海战争述略〉，页868；《八二三炮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页30。

七、八个师的装备到台³¹。在这种情形下，台湾的防卫力量是不足的。台湾的安全条件，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

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将与中华民国所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废除。但美国仍关怀台海安全，使中共不便轻易再动武。是年元旦，中共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1981年9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九条和平统一方针，包括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1983年6月，中共实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作为和平统一的原则。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初时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到1989年允许台湾居民去大陆探亲³²。此后，两岸交流日多。中华民国政府希望以和平竞争代替武力对抗，中共则希望以交流完成国家统一。

³¹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俞大维先年谱资料初编》（三），页1193-1196。

³² 赖警，〈台海战争述略〉，页870。

第二节 立身台湾与建设台湾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抗共失败，曾经考虑三条退路，一是将军队撤到西康，以西昌为中心，川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二是将军队撤到海南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三是将军队撤到台湾，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¹。最后，西昌、海南岛虽然暂未撤退，主要部队都撤到台澎、金马地区。在国军撤到台澎、金马地区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有庞大的中央政府各级组织和人员、各种企业组织和人员、学校及学生以及难民。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不仅以台、澎、金、马地区为托庇之所，且作为恢复中华民国失土的基地。作为中华民国的基地，台湾的基础为何？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又如何设法巩固和建设此基地？

地理与人民

台湾在广东北部、福建南部外海，中有台湾海峡，距福建最近处有 150 海浬。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为邻，菲律宾有美国军事基地（于 1992 年 11 月撤离）；东北有琉球群岛，琉球原属中国，后隶日本，战后暂为美军占领（于 1972 年交日本）。东邻太平洋，太平洋对岸为美国。台湾岛及其属岛共 14 个，澎湖群岛共有 64 岛，合共 78 岛，陆地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本岛面积占 99.13%。本岛地形狭长，南北达 394 公里，东西宽 144 公里。西部为平原、丘陵、台地、盆地，山脉在中部、东部南北纵走，自中部至东部有阿里山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台东纵谷、海岸山脉。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前后，台湾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口多集中在平原和盆地，丘陵、台地次之，

¹ 李晓明，〈蒋介石退保台湾的方针与政策措施简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1月，页36-37。

山区人口稀少²。

台湾的人口，多为清朝及其以后自福建、广东移入的汉人。在日据时期（1895-1945）及其以前移入者，被视为或自认为台湾人，在台湾光复以后自大陆各省移入者，被视为或自认为外省人。在台湾光复的第二年，即1946年，全省人口近610万人，台湾人占99.48%，外省人占0.52%；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次年，即1950年，全省人口750多万人，台湾人占93.05%，外省人占6.95%；1956年，全省人口近940万人，台湾人占89.93%，外省人占10.07%；到1962年，全省人口1,150余万人，本省人占87.42%，外省人占12.58%³。到1985年，台湾的总人口约1,900万人，台湾籍的闽南语系1,416万人，占74.51%；客家语系251万人，占13.19%；山胞45万人，占2.37%；外省籍187万人，占9.85%；其它占0.08%⁴。

台湾山胞，民族学家将之分为九个族，1952年的统计为15万余人，其中阿美族（Ami）约5万人，阿达雅尔族（即泰雅族，Atayal）约3万5,000人，排湾族（Paiwan）约3万2,000人，布农族（Bunun）约1万8,000人。其余赛夏、曹、鲁凯、雅美、卑南五族，少则千余人，多则六千余人，合共1万5,000人。他们多居于山区，以农业为生，兼事渔猎⁵。他们是现存最早移居台湾的民族，语言属于马来·波里尼西亚系，没有文字。明郑以后汉人大量移居台湾时，称他们为「番」，分生番、熟番二种；日治时期改称生番为高砂族、熟番为平埔族；日本投降、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后，高砂族改称高山族，平埔族名称仍旧，简称「山胞」⁶。近年受本土化的影响，又改称「原住民」。

与中国的历史分合

台湾是纳入中国版图较晚的地区。在1661年（清顺治18年）郑成功据台以前，虽然宋时曾派兵戍守澎湖、元明时曾在澎湖设巡检司，并未实际领有台湾。从有历史记载开始，台湾地区的居民皆自外地移来，何族先移入并不清楚。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间，

² 杨锡福，〈台湾的地理〉，《自由中国》6卷8期，页16-19。

³ 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编印，《台湾省统计要览》23期，页16-17。

⁴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26。

⁵ 卫惠林，〈台湾的土著族〉，《自由中国》6卷9期，页16-18。

⁶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18，20。

南洋一带的土著分批移进台湾，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语言不同，风俗亦异。高山族大部居住于中央山脉、台东纵谷和台东海岸地区，平埔族大部居住于台湾东北部和西部平原地区。高山族和平埔族，在十七世纪以后的人口共约十多万人。汉人何时开始移入台湾，不详。

《史记》中记载的瀛州（约当公元前一世纪）、《汉书》中记载的东鯤（约当公元二世纪），三国时（公元三世纪）的夷州，隋、唐、宋时的流求，元时的瑠求，就所指的方位而言，似即台湾到琉球群岛一带。至少宋代的流求、元代的瑠求，可确定为台湾无疑。三国中的吴国曾征夷州（公元 230 年），俘数千人而去；隋时曾征流求（公元 610 年），俘数千人而去。唐、宋以后，由于避乱或其他原因，台湾地区渐有汉人移入。南宋时（十二世纪）毘舍耶人侵澎湖，泉州知府汪大猷派兵（公元 1171 年）戍守（澎湖时称平湖）。元时（十三世纪）在澎湖置巡检司（公元 1290 年代），并曾派兵至台湾岛，但并未收台湾为版图。明时（十四至十七世纪）澎湖和台湾成为日本和中国海盗的根据地，藉以抢掠中国东南沿海。明太祖将澎湖的居民迁福建，并废巡检司（公元 1387 年）；来自澎湖、台湾地区的海盗益猖獗。明嘉靖年间重新设立澎湖巡检司（公元 1563 年），以防倭寇。海盗以日本人为多，故名倭寇，但中国人参与者亦多。当时来台湾的日本人，活动于南台湾沿海，当地番语名「打高社」，汉语讹为「打鼓山社」，日语接近「高砂」二字。

十六世纪后期，广东人林道干、林凤都先后以澎湖为基地，到中国东南沿海劫掠，后均为明军逐往台湾。明万历以后的文献中已出现「台湾」或「台员」等称呼。十七世纪前期，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由日本至台湾发展，横行于闽海。到澎湖、台湾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无论做海盗与否，为了争生存空间，与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关系并不和谐。由于海盗猖獗、日本又有意南进，到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明朝又派兵戍守澎湖、监视台湾。其时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正向海外发展，台湾岛到 1624 年（明天启 4 年）为荷人所据，荷人在安平港修筑热兰遮城，于对岸的赤嵌（台南市）筑普洛文西亚堡，并以此为中心，经营台湾；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海盗难以立足。1625 年颜思齐死，1628 年（崇祯元年）郑芝龙为明朝招抚，郑于福建招募数万

人到台湾从事开垦：1633年（崇祯6年），日本行锁国令；倭患自是结束。其间西班牙人虽于1626年据台湾北部，到1642年（崇祯15年）即为荷人赶走。

荷兰人据台时，台湾的汉人已有十多人，与土著人数相当。荷人统治台湾共37年，到1661年（清顺治18年，明永历15年）台湾为郑成功所据。郑成功为郑芝龙子，明隆武帝于1646年（顺治3年）在福建遇难时，芝龙为平国公，成功为忠孝伯；隆武帝遇难后，芝龙降清，成功则组义军抗清。1650年（顺治7年）郑成功取得厦门、金门为根据地。1653年受明永历帝之封，为延平郡王。1661年，郑成功进据澎湖、台湾，台湾的荷军于次年战败投降。郑成功以延平郡王的头衔统治台湾，于赤嵌设承天府，建一府二县一司。郑成功于1662年6月病逝，王位由其留守厦门、金门的儿子郑经继承。郑经治台18年亦病逝，到1681年（康熙20年，永历35年）由子克塽继位。1683年（康熙22年），克塽降清，明亡。郑氏据台23年中，与清朝的关系时战时和；与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关系，不如荷据时期平静。

荷郑时期台湾的开发主要在南台湾，中北部只有点的控制，东部仍处于未知状态。当时全台湾不过25万人，汉人约占12万人。但由于郑氏所建的是以恢复明朝为号召的小王国，又招徕五万汉人，为台湾的政治和文化中国化奠下了基础。郑氏对台湾的开拓，南抵今日的恒春，北到今彰化、新竹及于淡水河沿岸⁷。

1683年清朝领有台湾以后，将台湾划为一府（设台湾府于今台南市）三县（台湾县设于今台南，凤山县设于今高雄，诸罗县设于今嘉义），隶属福建省台厦兵备道，派一万水师防守。初限制大陆地区人民移入，到1760年（乾隆25年）以后才不再干涉。其间，汉族男子与平埔族女子结婚者不少。其后移民渐增，以来自闽南、粤北者为多。1723年增设彰化县、澎湖厅、淡水厅。其间，番社陆续被收服，到1776年（乾隆31年）设理番厅，统辖番社九十四。1811年（嘉庆16年）时，台湾人口已接近二百万。由于中北部渐开发，到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增设台北府，亦隶福建省。1870-1880年代，台湾东部地区渐开发。由于移民增加，族群复杂，冲突时起。大型的冲突有福

⁷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36-52；张玉法，〈吴凤的历史地位〉，《国立编译馆馆刊》18卷1期，页26-27；邱胜安，《台湾史话》，页2-101。

建人对广东人，中型的冲突有福建漳州人对泉州人，小型的冲突有泉州三邑人对同安人。另一方面，基于海盗时期和荷据时期自成天地的传统、郑氏统治时期与中国大陆对抗的传统，抗官运动和反清复明运动此落彼起，使清朝的统治阶层有「台民难治」的感觉。台湾所受到的外来威胁也很大，鸦片战争时英国曾攻台湾（1840年10月27日犯鸡笼，即基隆，不克）。同治年间日本曾攻台湾（1874），中法战争时法国曾攻台湾（1884）。清廷为巩固东南海防，于1885年（光绪11年）将台湾改为行省，并将台湾划为三府、一州、六厅、十一县。在巡抚刘铭传的治理下，一方面改善与土著诸族的关系，一方面修铁路（台北至新竹）、开矿产（基隆煤矿）、建兵工厂（机器局）、发展农商，以厚植实力。到1895年（光绪21年）台湾割日前夕，台湾人口250余万，其中汉人约230万，土著诸族共约20余万⁸。由于清朝领有台湾212年，90%的人民来自中国，制度、文化亦来自中国。此期在台湾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认同中国的。

台湾因中日甲午战败于1895年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1905年台湾人口总数为312万3000多人，除1.9%为日本人外，其余98.1%皆中国人。但当时一概不称中国人，被划为三类：一类为在台湾设籍的大陆各省人，名为台湾人或本岛人，占94%；一类为台湾土著，被称为「番」或高砂族，占3%；一类为在大陆设籍、居于台湾的大陆各省人，名为外省人（华侨）。同时，日本殖民政府在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逐渐将台民转化为日本皇民，但台湾的皇民与日本的皇民并不平等。因为有民族主义和受迫害的心情，许多台民自始对日本的统治抱反抗态度。反抗的方式，前期以武装反抗为主，后期则在政治、文化上对抗。

武装反抗以1895年割台之初所建的「台湾民主国」声势最大；非武装反抗以1921年在台北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影响最深。部分反抗含有中国情结，另一部分反抗则含有台湾情结。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民成为中国的敌人，不少台民被日本征调到中国大陆作战；台民在中国大陆及太平洋各地为日本侵略战争而死者约

⁸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53-62；邱胜安，《台湾史话》，页105-261；王幼华，〈台湾史异途〉，《自由时报》副刊，1992年1月3日、4日。

有三万人⁹。台民在日本统治五十年中，除一部分仍心向中国者外，在日本的政治高压和教育熏染下，许多人的国家认同甚为模糊。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再回归中国时，台湾人恢复中国人的身分，但有的台湾人对前此原居台湾的人和自大陆地区新来台湾的人，仍然以台湾人与中国人相区分¹⁰。

台湾割日后，台民的思想和行动是相当分歧的：第一类是为保护个人生命财产，愿意做顺民，对日本虽不满意，但也只好接受。第二类是急于做皇民，以争得与日本人平等的地位。第三类是想为台湾争取独立地位，挣脱日本统治，独立建国。第四类则谋使台湾回归中国，不受日本统治。第四类的人，有些早在1897年就开始投入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运动，在台湾发动的抗日事件，先后达40次以上。1913年罗福星抗日事件，被捕处死者二百多人。另有一些认同中国的台湾人，在大陆各地从事反日活动，到抗战爆发前，台湾人在大陆各地所组的反日团体达40个以上，以上海、厦门为中心；中日战争期间，以浙江金华、福建漳州、香港和四川重庆为中心。在大陆各地的抗日团体，以「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为共同目标。

1941年2月，台湾人各反日团体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李万居、连震东等皆为重要成员。1943年4月台籍的国民党员正式在福建漳州成立「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翁俊明任主任委员。当时各地有台籍党员689人，在台湾岛内建立了25个据点小组。在国民党主导、台湾人的奋斗下，使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决定将台澎于战后归还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的中央设计局于1944年4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负责草拟战后台湾接管计划。此计划的主要精神是使民国的法律和制度在台湾重建，并加强民族意识、肃清反叛。除草拟接管台湾计划外，陈仪及相关单位并培植接管人才；可知者，训练有行政干部120人、银行干部40人、警察干部932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10月1日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以陈仪为总司令，

⁹ 邱胜安，《台湾史话》，页262-303；前引王幼华，〈台湾史异论〉一文。

¹⁰ 《彭明敏回忆录》对1945年10月自大陆前来台接收的人泛称中国人、中国军、中国兵，见原书页64-67。

柯远芬为参谋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 9 月 28 日在重庆成立前进指挥所。10 月 5 日，指挥所人员 71 人由重庆飞台北；10 月 17 日，国军第七十军（军长陈孔达）在基隆登陆。10 月 25 日，陈仪在台北市接受日本投降。受降前后，进行接收，省属机关于 11 月 1 日接收完毕，地方机关于 12 月 30 日接收完毕¹¹。

台湾光复、二二八事变、中央政府迁台

台湾经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但日本也在台湾改良农业、建立工业、发展电力¹²、普及教育，使光复后的台湾，在建设基础上，较大陆许多省份为佳。台湾回归中国，对心向祖国的台湾人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对接受皇民化的台湾人民或思图独立的台湾人民来说，心情复杂而怅惘。尽管陈仪出身留日学生，对接收台湾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台湾社会的复杂性出于他的掌握之外，对接收者的主观性也未能自觉。在接收后不到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即因查缉私烟伤及无辜事件，于 1947 年 2 月 28 日引发全台大动乱。大动乱的原因极为复杂，分析起来约有八方面：（1）自大陆来台接收的军警风纪不良，官吏贪渎，引起民众的愤恨，甚至引发台湾人与外省人的仇视与对立。（2）查缉私售专卖品甚严，影响部分民众生计，故肇事群众有大呼「停止查禁外国私烟」、「废止专卖局」者。（3）当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与国民党对抗，台共乘机号召「打倒一党专政」、「打倒国民政府」。（4）在日本军中服役的台籍军人十余万解甲归里，多成无业游民，对政治、社会极度不满。（5）大战之后，百业未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造成社会危机。（6）陈仪及手下官员统治技术拙劣，比日据治不如，地方绅民油然而生日治时期未能达成的自治之念，故抗议者提出「实施台湾高度自治」之口号。（7）部分由于对陈仪统治台湾的不满，战后台湾一般的士民心理并不对中国完全认同，有陈逸松领导的「美国托管派」，由美国驻台领事柯尔（George E. Kerr）鼓吹；有杨肇嘉领导的「台湾独立派」，由在台日军参谋中宫悟郎等鼓吹。凡此

¹¹ 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3 辑，页 257-288；陈三井，〈台湾光复的序曲：复台准备与接收〉，《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 4 册，页 228-247；吕芳上，〈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光复〉，《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 5 册，页 42-66。

¹²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3-7。

都增加了台湾的离心运动。(8)事变发生后,长官公署主导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原望和平解决。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员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观地提出部队解除武装、撤消警备总司令部等要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过分要求,加上激进分子进攻长官公署、警备总司令部、宪兵队、各机关和银行,致使陈仪认为台民叛变,乃请求中央政府派兵镇压,造成大量无辜民众死伤,许多绅民被捕遇害。此事虽于3月16日以后逐渐平息,但对执政的国民党和台湾人民都造成极大的伤害¹³。其后国民政府取消职权较为独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台湾省政府,于4月24日任命魏道明为省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亦酌选台湾人出任,台湾局势始渐趋稳定。

1948-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抗共失败。在1949年4月共军渡江南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即部署以台湾为最后基地。到是年12月乃将中央及部分地方机构迁至台湾。

中央政府迁台以前,蒋介石在台湾做了一些奠基的工作。1948年12月24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为统一事权,到1949年1月18日,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3月,陈诚又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蒋介石的总统职务尚未恢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指挥一切。在蒋的指示下,陈诚于4月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以缓和农村矛盾。5月下令台湾地区戒严,以严整社会秩序。6月更实行币制改革,以缓和通货膨胀;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以统辖台湾地区所有国营、国省合营、省营及私营企业。在此前后,由大陆撤退来台的非嫡系部队,必须先解除武装,接受整编,才能纳入建制;目的在严整军纪¹⁴。陈诚的军事统制,使台湾开始出现肃杀之气。但确为中央政府的移入开拓了一个安定的局面。

中华民国于大陆地区抗共失败,最后能在台湾地区立足,除前述地理和历史因素外,尚可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金融、土地改革、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因素,进一步分析。

¹³ 赖泽涵,〈陈仪与闽、台、浙三省省政〉,《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4册,页250-312;邱胜安,《台湾史话》,页324-350;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65-67,74-77,82-88,114-116,121-124。

¹⁴ 前引李晓明,〈蒋介石退保台湾的方针与政策措施简析〉,页38-40;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151-155。

中国国民党的党务改造

党务改造的目的，在于纠正因大陆抗共失败而造成的党务混乱和党政军关系混乱，及纠正党德败坏和党员士气低落的情形，重建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最后一次重整，在 1945 年 5 月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抗日胜利后复员接收的混乱、行宪前后的政争、以及抗共的失败，造成国几不国、党几不党的局面。早在 1948 年 7 月，甫于两月前就任总统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即指示改造党务；其后中央常务委员会曾研讨党务改造方案，但因政局动荡不安，并未定案。1949 年 1 月蒋介石因一般輿情主张与中共议和，将总统职位让给副总统李宗仁，自己返回奉化故里，并以总裁的身分，研究党务改革方案。是年 7 月 1 日，蒋在台北设总裁办公室，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设九组一会，以推展党务；实际上是以党辅政。九组分掌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业务、情报、警卫、总务；一会为设计委员会，分组研究党务、政治、财经、外交、文宣。10 月 16 日，中央党部在阳明山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以训练干部。12 月 5 日，代总统李宗仁托病由香港飞往美国。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复行总统职权，裁撤总裁办公室，党务改革则继续进行。是年 7 月 22 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务改造案，8 月 5 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推行党务改造，并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时以大陆失守，不少执、监委员星散），另置中央评议委员若干人，督导并监察党务改造。中央改造委员总裁以下之 15 人及中央评议委员 29 人，皆由蒋介石遴选。一般党务除秘书处外，设七组五委员会掌理。此次改造，除确定国民党的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以小组为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知识青年党部以吸收专科以上学生、加强文化宣传以齐一人民心志外，并完成党员登记归队，选择吸收大量青年。在党务组织上，除在大陆地区和海外侨社广为设立外，在台澎金马地区的农林、工商、文教等机关团体，都建立了党的组织¹⁵。1952 年 10 月，改造工作完成，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为总裁，

¹⁵ 陈三井，〈中国国民党民国三十九年之改造与台湾新政〉，《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 5 册，页 86-101；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近代中国》87 期，页 19-37。

选举 32 名中央委员、10 名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在台湾建立基础，除透过党的改造外，自台光复后即不断在财务和宣传方面有所规划。在宣传方面，如接收日本的台湾放送协会，成立中国广播公司。在财务方面，由成立于 1945 年的中央财务委员会拓展投资事业¹⁶。

蒋介石总统复职与继续实行宪政

蒋介石总统于 1950 年 3 月 1 日复职。鉴于在大陆时期的众叛亲离，将自己的家族都纳入军政及社会系统。以长子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控军队政工、情报单位及指挥对大陆的游击战；次子蒋纬国接掌装甲兵；夫人宋美龄领导「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经国夫人蒋方良及纬国夫人石静宜都参加工作¹⁷。蒋复职后，在政策和人事上有许多布局，最重要的是继续实行宪政。虽然这一阶段的宪政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的限制下颇多萎缩，但至少在形式上，仍遵依宪政制度。中央政治的运作方式暨国民大会、以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的职权，均不改变。复职后，蒋介石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获立法院通过，此后行政院长产生的方式未变。立法院于蒋复职时刘健群任院长，其后立法院长不断改选；立法委员因大陆沦陷，长期不能改选，但仍继续行使立法职权。立法院自 1948 年 5 月至 1984 年 9 月，共通过法律案 2,383 件。司法院于蒋复职时由王宠惠任院长，其后的院长更换，均由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自 1948 年 10 月至 1982 年共解释宪法、法律与命令 175 件。考试院于蒋复职时由副院长钮永建代理院长，其后的院长更换，均由总统提名、监察院通过；考试院办理各种公务员资格考试及检核，1950-1985 年，及格者达数十万人。监察院于蒋复职时由于右任任院长，其后的院长更换，均由委员选举产生。监察院于 1950-1984 年间共提出弹劾案 365 件。国民大会于 1954 年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选蒋连任第二届总统，陈诚为副总统；其后的总统无论连任或新任，迄李登辉第一次任总统时止，均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¹⁸。宪政在地方政治方面主要为实行地方自治。台湾于 1950 年实行地方

¹⁶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200-203，231-234，249-252。

¹⁷ 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页 144。

¹⁸ 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过程〉，《近代中国》49 期，页 3440-44。

自治之初，将行政区调整为 16 县、5 省辖市、6 县辖市。省长由官派产生，省的民意机构，于 1946 年 5 月成立省参议会，议员部分由县参议会选举、部分由遴选产生。省参议会到 1951 年 12 月改为第一届临时省议会，1954 年 6 月成立的第二届临时省议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市）长初由官派，1950 年后由选举产生。县（市）原设参议会，议员由各乡、镇（区）民代表会选举产生，1950 年改县（市）参议会为县（市）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乡（镇）长及县辖市长原由官派，1950-1952 年陆续由选举产生。乡（镇）民代表会及县辖市民代表会的选举自 1946 年 2 月以后陆续实施。村里长选举，亦自 1946 年 2 月以后陆续实施¹⁹。

外交的巩固与美国的外交支持

中共于 1949 年 10 月建立政权后反帝情绪高涨，初时所获得的外交承认不多。1949 年有北韩、苏俄、捷克、波兰、外蒙、缅甸、印度，1950 年有英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1951-1955 年间可能受中共投入韩战的影响，无国家承认中共），1956 年有埃及、叙利亚、锡兰、叶门、约旦，1958 年有伊拉克、柬埔寨、摩洛哥、苏丹。十年之间，只有 20 个国家承认中共，包括 7 个共产国家。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仍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虽然美国曾于 1949 年 8 月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有舍弃中华民国之意，但到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于次日获苏俄承认之后，美国国务院即于 10 月 3 日声明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50 年 6 月韩战爆发后，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的军经援助。其后 20 年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保卫战中，都受到美国和其他新旧友邦的支持（联合国大会 1950 年的表决为 33: 16，1960 年为 42: 34，1970 年为 66: 52）。另一方面，中华民国与日本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在台北签订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并互派大使；与美国于 1954 年 12 月 2 日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于次年 3 月 3 日换文生效²⁰。

此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上的最大困扰，除 1949 年 8 月至

¹⁹ 高育仁，〈台湾地区地方自治的发展〉，《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 5 册，页 130-132；薄庆玖，〈三十年来台湾省地方自治组织〉，《近代中国》17 期，页 74-88。

²⁰ 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印，《中共祸国史实年表》，页 218-381。

1950年6月间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摈弃态度外，为来自美国政学界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地位未定问题原发生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以前，当时对台湾的态度，有主张「台湾独立」者，有主张「国际共管」者，有主张「归宗祖国」者；经国府力争，开罗会议终决定台湾于战后由中国收回²¹。战后数年，国府对台湾统治不良，在大陆抗共失败撤至台湾又危及台湾安全，尽管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于1950年1月5日声言盟国对中国统治台湾四年的事实已予接受²²，不少美国官员则从事支持台湾独立或使台湾与大陆隔绝的运动。他们认为台湾地位未定的理由有四：（1）中国于1895年将台湾割日。（2）虽然二次大战中中国加入盟国对日作战，但日本系被盟国打败，不是被中国打败。（3）战后中国只是代表盟国接收台湾，并代为统治。（4）台湾为盟国得自日本的战利品，其地位需由对日和约决定²³。1948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李海签署了军方起草的「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其中强调「不使共产党统治台湾，确保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政府」。此后一年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似乎把对台政策定为「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有的主张直接用军事占领，有的主张以外交和经济手段使「台湾自治」或由「联合国托管」。1949年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人到台湾考察，研究将台湾与大陆隔离的可能性，目的在拒绝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台湾，另扶植亲美的地方势力控制台湾。当时蒋的嫡系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大批军政人员陆续撤退到台湾，蒋本人于同年5月26日迁居台湾。美国政府认为阻止蒋入台已不可能，乃从干涉蒋的用人着手。蒋为争取美国支持，暂在用人问题方面尊重美国的意见。是年12月15日蒋以亲美的吴国楨取代陈诚省主席的位置，到次年3月17日又以亲美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1950年5月16日，美国国务院草拟「台湾中立化」备忘录，6月25日韩战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即宣布实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²⁴。这年9月，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开幕，美国将台湾地位未定的议案提交联合国讨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中立台湾的行为反应尴尬：台湾中立可使国府找到借口，使中共不得进攻台湾；但却

²¹ 吕芳上，〈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光复〉，《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5册，页49。

²² Danny Shiu-Lam Paau, *The Issue of Taiwa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14.

²³ *Ibid.*, p.2.

²⁴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127-132。

严重违反国府的反攻复国政策。《自由中国》半月刊曾发表社论，对此问题表示关切²⁵；中共则为此攻击美国侵略台湾。外交问题的后续发展，容于下一章再述。

军事的巩固与美国的军事援助

国府在大陆抗共失败后，部分军队及装备撤至台澎金马。当时美国对中华民国袖手，蒋介石为重整军备，向日本聘请顾问人才。自1949年至1969年共聘请83位，总其事者为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实际负责者则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二十三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故他所统率的顾问团称为白团。白团曾在圆山办训练团，在石牌办训练班，训练国军的高级军官²⁶。白团在协助国军训练上有其贡献，国军军备的更新和更多的训练则来自韩战爆发后的美国。中华民国的三军军力，依据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联军统帅部所作的评估，大体是：（1）陆军：兵力50万，士气正迅速恢复中，坦克和装甲车约500辆，油料仅够每辆军车行20公里，地面部队严重缺少弹药、粮食、衣物和机动性。（2）海军：战舰27艘及其他船舰计15万吨，士气高昂，然以炮弹缺乏、维修不继，战力不足以掌握台湾海峡制海权。（3）空军：尚余螺旋桨战斗机两百多架，油料、零件、弹药尚称充足，维修适当，士气高昂；然若无持续外援，空军只能支持半年。若中共全面渡海攻击，空军只能维持一周的战力²⁷。

一度放弃中华民国政府的美国，基于围堵共党扩张的考虑，在韩战爆发前夕，即倾向提供军援给中华民国，以阻挠中共攻占台湾。在韩战爆发、美国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刚满一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即批准参谋首长们的建议，拨1,434万美元作为军援台湾的经费。美援的第一批军火于1950年11月23日运抵台北（弹药4,700吨）。1951年5月1日，驻台美军顾问团成立，蔡斯（W. C. Chase）少将任团长。顾问团成员，初时只有官兵33人，如前所述，到1955年即增至2,347

²⁵ 《自由中国》3卷6期，社论〈异哉！所谓「台湾问题」〉。

²⁶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154-155；1995年7月12日《自由时报》四版，白团披露日将来台协助训练国军内幕；王孝，《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54-55；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309-316。

²⁷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亚洲人》1卷1期，页83。

人。至于军援物资，1951年价值2,47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到次年2月运抵台湾。1952年10月以后的二、三月间，美援台湾飞机24架，尚非喷射机。1953年6月15日，第一批美援喷射战斗机运交台湾。在韩战的三年中，国军战力在美国的训练和援助下，获得不少改善：

(1) 陆军：1950年3月间开始初步整编，成立各防卫部，并由20个军61个师，并编为8个军31个师，于1951年4月间整编完成。是年5月美军顾问团来台后，部队以师为单位，重新整编为10个军21个师及10个干部师，至1953年7月整编完成。接受美援的陆军官兵约30万人，但由于各师缺额甚多、后勤不足，顾问团认为对外来的强力攻击只能支持五天。(2) 海军：依舰艇性能加以改编，到韩战结束前共编成六个舰队、四个艇队，拥有各式舰艇154艘，官兵一万两千人。但由于装备不足、缺乏海战训练，顾问团认为无法应付中共的持久攻击。(3) 空军：韩战结束时，中华民国空军编为八个作战大队、一个侦察中队、五个作战联队，可供作战的飞机325架，官兵六万七千人。但由于防空系统老旧、维修零件不足，顾问团认为无法抵挡中共的喷射战机²⁸。

韩战结束后，由于台海情势危机，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继续军援台湾，并派驻军队。1955年1月成立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司令为海军中将普莱德（A. M. Pride）。1950年7月至1971年6月间，有海军四十六侦察中队（9架侦察机、1艘补给舰）驻马公、基隆，有海军九十二驱逐支队（有36艘驱逐舰）驻马公、基隆、高雄；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有空军五十一战斗中队（有25架F86D战机）驻台南；1957年5月至1959年1月有陆军第十七飞弹中队（屠牛式地对地飞弹发射组四个）驻冈山（台南县）；1957年5月至1958年10月有空军五十一战斗中队（10架F100D战机）驻台南；1958年10月至1959年10月有陆军第七十一炮兵团二营（胜利女神地对空飞弹发射组四个）驻泰山（台北县）；临时巡逻及日后进驻的海空军不计。1958年八二三炮战高潮期间，驻台美军作战单位的成员超过一万五千人；由于44天炮战的损耗，该年度的军援数目高达3亿3,300

²⁸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84-85；张淑雅，〈韩战期间美国对台军援政策初探〉，《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2册，页470-510。

万美元²⁹。

自韩战爆发以后，美国逐渐将台湾的防务列为远东防务的一部分，并将中华民国的军力，计算在美国远东防卫系统之内。到 1958 年八二三炮战前后，美国已将中华民国陆军装备了七个前瞻师（即把原有一次大战时的老旧装备更新为二次大战时的装备），由于主要用于防卫，不配备攻击性武器。对中华民国海军的整建，以作为第七舰队的辅助部队为原则，将接收的日舰全部淘汰，更换为美制的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空军的整建，以作为美国太平洋空军之一部分为原则。整建以前，国军空军机种多属于由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次音速飞机，如 P51、P47、B52，在性能上无法和中共的超音速米格十五、米格十七相比。经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争取，初则获得自韩战换装下来的 F84、F86，并配有响尾蛇飞弹；继又获得新型的 F104，性能超过米格十七。当时国军飞机六百余架，其中作战飞机四百余架，全为美国装备和训练³⁰。国军获得台海的制空权，海上又有美国第七舰队协防；而自韩战结束后，中共谋求美国的外交承认，不欲与美国直接冲突；因而使台海局势获得稳定。

前述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起于 1948 年 4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t Act)，此法案通过后，美国即对中国局势采取袖手政策，中国在此法案下所获得的援助不多，农业复兴委员会得到一些援助。第二个时期起于 1951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依据此法案，台湾在 1951-1954 年的四个财政年度，获得美援 4 亿美元。第三个时期起于 1961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开发法案」(Ac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³¹，以经援为主，兹不多论。惟无论军援、经援，对台湾的防务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币制改革、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

国府迁至台湾之初，台湾经济以农业为主。据 1949 年的资料，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 52.44%；自耕农地占私有耕地 55.47%，佃农地

²⁹ 前引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 85-87。

³⁰ 李元平，《俞大维传》，页 184-186；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204-205。

³¹ 周琇环编，《台湾光复后美援史料》第一册，绪论，页 1-4。

占 44.53%；主要农产品为米、茶、水果、糖、樟脑³²。直到 1961 年，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仍占出口值的 62.4%³³。国府对台湾的经济改革，第一步为抑制通货膨胀。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5 月，国府将储藏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运到台湾；其中黄金达 277 万两，连同外汇，总价值相当于 10 亿美元³⁴。以此为基础，国府于 1949 年 6 月发行新台币 2 亿元，规定新台币一元等于美金 2 角、旧台币 4 万元。由于政府开支多、外汇少，到 1955 年新台币发行额达 13 亿余元，造成货币贬值；美元实际汇率新台币一元只等于 0.4 角美金³⁵。但新台币的发行，对抑制通货膨胀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0 年代平均每年物价上涨率高达 10.5%，到 1960 年代平均每年上涨率即跌至 2.8%³⁶。

通货膨胀趋缓的因素，除币制改革以外，尚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台湾农工业的稳定发展。1951-1965 年的 15 年间，美国对台经援约 15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一亿美元。美援金额，在 1951-1960 年的十年，占台湾进口金额的 40%，投资毛额的 38%、国民生产毛额的 6%³⁷。美援亦有助于农工业发展，而农工业发展更建基于土地改革的成功。

台湾的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实施「三七五减租」，目的在改善租佃关系，减轻佃农负担，并使承租关系较有保障。台湾地区的租率，以生产物收获总量的 50%为最常见，亦有高达 70%者；且租期短，承租关系不确定。1949 年 1 月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4 月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主要内涵是将租率降低为 37.5%，确定租期不得短于六年。中共的威胁和地租的下降，使地价下降三分之一。此期间，有 2 万 4,270 余佃农户得以购买土地，购买总额达 1 万 2,400 余甲。到 1952 年，完成三七五减租的耕地占佃农地 65%（占耕地总面积的 29%），受益农户达 43%。第二阶段实施「公地放领」，系将接收自日本政府及日人产业的公地约 18 万甲（约当全台耕地的 20-25%）

³² 陈世瑑，〈台湾之农业〉，《自由中国》5 卷 1 期，页 12。

³³ 行政院农业开发委员会，《中华民国农业统计要览》，页 59。

³⁴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页 125。

³⁵ 杨承厚，〈六年来新台币制度之检讨〉，《自由中国》13 卷 12 期，页 10-11。

³⁶ 郭婉容，〈光复后的台湾经济发展〉，《近代中国》49 期，页 50。

³⁷ 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四十年》，页 40。

出售给农民，此政策正式推行于 1951 年 6 月，迄于 1961 年 6 月间，分六期完成。放领地价系按照土地等则全年正产物收获量两倍半折算实物计算，分十年偿付；共放领公地 9 万 6,793 甲，扶植自耕农 20 万 3,531 户。第三阶段实施「耕者有其田」，基本原则是每户地主得保留其出租耕地中水田三甲或中等旱田六甲，其超出部分由政府向地主征购，然后转由承租户承购。承购之办法比照公地放领。此政策于 1953 年 3 月开始实施，决定全省征放耕地面积 17 万 9,000 甲，扶植自耕农 30 万户³⁸。1957 年，土地改革计划完成，与 1949 年相比，情形如下³⁹：

年 代	1949	1957
农民中佃农比例	39%	17%
农民中自耕农比例	36%	60%
自耕农及半自耕农比例	—	83%

另一方面，国府为了配合「耕者有其田」的实施，将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家大型的公营事业转为民营，作为支付向地主收购耕地的价款。此事引起了地主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兴趣，增加了工商业发展的力量。

台湾的工业发展，奠基于日治时期。1945 年 11 月 1 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开始接收日本在台湾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并成立糖业、电业、电冶业、石油业、肥料业、水泥业、制碱业、煤业、金铜矿业、电工业、机械业、纸业、纺织业、化学制品、油脂业、玻璃业、窑业、印刷业、工矿器材等 19 个委员会。1946 年 5 月 1 日，将所接收之实业单位，改组为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台湾金铜矿、台湾铝厂、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台湾水泥公司、台湾机械造船公司、台湾制碱公司等 10 家国营企业，工矿公司、农林公司、产物保险公司等省营企业。1950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恢复对华经援。为了有效利用美援，行政院于 1953 年 7 月 1 日设经济安定委员会，统筹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经安会主委

³⁸ 张慧安，〈陈诚与台湾土地改革〉（1983 年 6 月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页 115-161；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四十年〉，页 42-44；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134-137。

³⁹ 郭婉容，〈光复后的台湾经济发展〉，页 52-53。

由台湾省主席俞鸿钧兼任，经安会 D 组主管农业计划。另外，成立于 1949 年、取代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到 1953 年改为工业委员会，由尹仲容任召集人，负责工业计划。尹仲容主张工业民营化，将筹办中的塑料工业转让给嘉义米商王永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将原有的台湾水泥公司转让给来自地主阶层的辜振甫，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此皆为 1950 年代的事情。1950 年代先后成立的私营企业，在水泥业方面尚有翁明昌的「嘉新水泥公司」（1957）、徐有庠的「亚洲水泥公司」（1957）等，在纺织业方面有徐有庠的「台湾远东纺织公司」（1953）、吴火狮的「新光纺织公司」（1955）等。尹仲容在 1953 年以后担任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的五年间，着意扶植民营工业，使民营工业增加了六千家。在此前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奖励工商业。如 1955 年修订所得税法，对新创立的公司，三年免征所得税。其后，1959 年制订「华侨归国投资条例」，1960 年制定「奖励投资条例」，1962 年制订「技术合作条例」。此期间的工业，多制造进口替代品，到 1965 年设加工出口区，奖励工业品出口。1963 年起台湾工业产值比例超过农业产值，1966 年起重工业产值比例超过轻工业。1960 年台湾贸易入超额为 1 亿 3,200 万美元，1971 年出超额为 2 亿 1,600 万美元。1960 年代，由于纺织品和塑料品大量出口，石化原料的需求量大增。为供应石化原料，1968 年中国石油公司建立完成第一座轻油炼解厂，1975 年完成第二座，1978 完成第三座。在 1970 年代，台湾工业发展的新突破，基本上达到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与出口⁴⁰。经过三十年的工业发展，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1-1983 年间，第一类产业（农林渔牧）占国内生产净额比重，由 36% 降至 9%，第二类产业（工业）由 19% 增至 44%，第三类产业（服务业）由 45% 增至 47%⁴¹。1953-1981 年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 8.9%（一般工业国家平均每年只 3.9%）；国民所得由不足 100 美元增至 2,563 美元⁴²。产业结构的改变带动了职业结构的改变，在 1952-1966 年间，第一类产业就业人口由 55% 降至 43.4%，第二类由 17% 增至 23.4%，第三类由 28% 增至 33.2%。无论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

⁴⁰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95-99，328-335，349-356，364-365，371-375。

⁴¹ 前引郭婉容，〈光复后的台湾经济发展〉，页 50。

⁴² 叶万安、石齐平，〈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近代中国》33 期，页 44。

构的改变，都可看出工业化的趋势至为明显。相伴而生的，有都市化的发展。1955-1964年间，乡村人口增加28%，而都市人口则增加54%⁴³。

教育的普及和提升

国府巩固台湾基地，从多方面着手，除前述者外，较为重要的尚有普及教育和提升教育质量，以训练国民、造就人才。台湾地区的现代教育制度，建基于日据时期。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后，国府继续在台湾地区推行教育建设，除造就人才外，着意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地区人民，教育成中华民国国民。1949年政府迁台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训练国民、培植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各地师资大量来台，台湾地区的教育获得迅速的发展。

在学制方面：幼儿园教育二年，4-6岁；国民教育原只六年，为小学，6-12岁。1968年将国民教育改为九年，6-12岁为小学，12-15岁为中学。中等教育六年，12-15岁为初级，15-18岁为高级。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师范、职业三种。高等教育专科学校三至四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四至七年，硕士学位研究所至少二年，博士学位研究所至少二年⁴⁴。

至于教育发展的情形，在国民教育方面，1950年有小学1,231所，学生90万6,950人，就学率为79.98%；1960年有小学1,843所，学生188万8,783人，就学率95.59%；1968年有小学2,244所，学生238万3,204人，就学率97.67%⁴⁵。国民中学，1968年有学校474所，学生61万7,225人，国小的升学率为74.66%；1977年有学校624所，学生107万5,455人，国小升学率为94.21%⁴⁶。

在中等教育方面，中学教育，1968年以前初高中并计，1950年有学校128所，学生7万9,948人；1960年有学校244所，学生26万3,365人。1968年及以后只有高中，1968年有高中177所，学生

⁴³ 许主冠，〈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895-1984）〉（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6月），页161。

⁴⁴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367。

⁴⁵ 同上，页372；郭为藩，〈九年国民教育十年有成〉，《近代中国》第8期，页94。

⁴⁶ 郭为藩，〈九年国民教育十年有成〉，页93。

15万2,877人；1978年有高中187所，学生17万7,647人⁴⁷。师范教育（中等），1950年有学校8所，学生5,651人；1960年有学校10所，学生7,572人。1971年以后，中等师范学校皆改为专科。职业教育（中等），1950年有学校77所，学生3万4,437人；1960年有学校109所，学生2万612人；1970年有学校146所，学生17万5,905人。

在高等教育方面，可分为大学及独立学院、师范、职业三类。大学及独立学院，1950年4所，学生5,379人；1960年15所，学生2万8,780人；1970年22所，学生9万7,286人。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及师范专科学校，1950年有学校1所，学生983人；1960年有学校2所，学生4,733人；1979年有学校11所，学生2万2,952人。技术学院及职业专科学校，1950年有学校3所，学生1,286人，1960年有学校12所，学生6,280人；1970年有学校70所，学生10万6,187人⁴⁸。在留学教育方面，1950年出国者216人，1960年出国者653人，1970年出国者2,056人；留学归国者，1950年6人，1960年47人，1970年407人⁴⁹。

教育方面的发展，使国民的素质大为提高。据1984年统计，台北市、高雄市、台湾省的人口结构，在教育程度方面的比率，可如下表⁵⁰：

教育程度	台北市	高雄市	台湾省
大专以上	17.03%	9.11%	6.42%
高中、高职	23.63%	20.72%	16.92%
国中	15.08%	16.91%	17.09%
国小	28.32%	32.87%	25.76%
其他	15.94%	20.39%	23.00%

每千人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的人数，可如下表⁵¹：

就学人数（每千人）	台北市	高雄市	台湾省

⁴⁷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页387。

⁴⁸ 同上，页391-392，399-400，414-417。

⁴⁹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页558，581；同上，页433-434。

⁵⁰ 张建邦，〈蒋中正先生与台北市政〉，《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五），页154-155。

⁵¹ 张建邦，〈蒋中正先生与台北市政〉，页155。

大学生	50	15	18
中学生	109	117	84
小学生	114	132	119
总计	273	264	221

由上二表可知，人口素质，城区优于乡区，但差别尚非悬殊。重要的是，此种教育程度的人口结构，正显示台湾建设，至少在一般人才方面，尚不缺乏。

从前述各方面分析，台湾由孤悬福建外海的边陲省区，成为近五十余年间中华民国的栖身之处，地理的条件和历史的条件并不好，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大战略的布局 and 国府的苦心坚守；因此而带来的内部安定，使台澎金马地区的朝野上下和各行各业的人民得以发挥并凝聚力量，在此地区安身立命。

第三节 「国家安全至上」下的人民

当 1949 年 12 月中华民国政府自大陆撤退到台湾时，除中共企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外，有三种力量威胁国府在台湾生存：一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时泛称为「匪谍」），他们伺机发展势力，准备为台湾的「解放」尽力。二是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特别自 1947 年二二八事变以后，发展中的台独势力。他们不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将台湾卷入与中共的全面斗争，企图在台湾自建政权，以求自保。三为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者」，认为台湾为盟国对日作战的共同战利品，虽由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接收，并不一定属于中华民国；因此设法阻止在大陆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退至台湾，并拟在台湾另外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纠葛分开。当然最直接的威胁是共军于 1949 年 4 月渡过长江，在华中、华南陆地作战取得胜利后，对沿海岛屿以及台湾地区的军事觊觎。

为了维护台湾地区的安全，台湾省政府暨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起，全省戒严。其要点为：（1）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一时起至五时止为宵禁时间。（2）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3）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需随身携带身分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4）造谣惑众、聚众暴动、抢劫财物、罢工罢市、鼓动学潮、破坏交通者处死刑。接下来，政府各机构相继制定许多辅助戒严的法规，譬如 194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通过〈惩治叛乱罪犯条例〉，对扰乱治安、金融及煽动罢工、罢课、罢市者，均处以重刑。5 月 27 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订定〈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及〈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此类戒严法令，此后随局势的稳定，时有修订或废止，即实行中的法规，

在执行上亦时宽时严、有宽有严，但许多戒严法令，一直实行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湾地区开始解严后，才陆续废止或修订¹。

在戒严法颁布之后，政府加强特务工作。1950 年 3 月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后，设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此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奉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1954 年 7 月，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和台湾省情报工作委员会取消，于新设立的国防会议（后改国家安全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1955 年，又成立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调查局于各机关团体设安全室，负责思想与行动的考核²。

戒严法的颁布，特务工作的加强，其首要目的为对付中共的颠覆，治安机关亦集全力防止中共的颠覆活动；因此，在戒严法颁布最初的几年，不仅中共的地下党或间谍时被破获，并处以重刑，有些机关或有些人，且常以「匪谍」案对付反对者；使一般人陷入「匪谍」的恐怖中，泛称之为「白色恐怖」。

台湾于 1920 年代即有共产主义分子活跃，部分系受日共影响，部分系受中共影响。1928 年 4 月受中共影响的一批人正式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11 月谢雪红在岛内组成台共党中央。当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中共支持台共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台共曾大量渗入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但到 1931-1932 年间完全为殖民政府镇压，许多共党分子被捕入狱。1945 年日本投降后，入狱共党分子被释放。是年 8 月，中共自延安派彰化人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回台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进行共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1946 年 7 月，组织正式成立；到 1948 年 6 月，党员发展至四百人左右。其间，谢雪红等曾参与 1947 年的二二八武装暴动。谢雪红于事败后逃香港，1949 年至北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70 年病逝）³。谢雪红走后，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并未停止。当时台湾地区知识青年想为台湾找出路，有些人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又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投入中共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共亟谋解放台湾，于 1948-1949 年间

¹ 张玉法，〈从戒严到解严的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天〉，《自立晚报》，1987 年 7 月 20 日。

²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217-219。

³ 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总督部警察沿革志第二编），页 10-14，76-92，425-543；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页 213-220；参考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及蓝博州，《白色恐怖》，页 65-66。

再度派干部至台湾发展组织，并策划武装起事。在治安机关的严密追缉下，许多组织被破获，涉嫌人被捕，甚至被处决。治安机关逮捕「匪谍」，经常在夜间秘密进行；许多人以「匪谍」罪嫌被捕之后，家属不知被带往何处；有些被处决者，并无判决书通知家属。有些家属知道家人被处决，因怕遭到株连，不敢前往认尸、安葬；因此，被处决的人常由处决单位雇人掩埋。在通常的情形下，家人只要一人涉案，全家即受监视⁴。

自 1949 年 8 月以后，被治安机关认定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陆续被破获，包括基隆中学散发地下刊物《光明报》案（1949 年 8 月至 1951 年 2 月）、高雄工作委员会案（1949 年 10-11 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等案（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2 月）、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1950 年 1 月）、台湾邮电总支部案（1950 年 2 月）、台中地区工作委员会案（1950 年 3 月）、山地工作委员会汤守仁等案（1950 年 4 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铁路部分组织案（1950 年 5 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案（1950 年 5 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南县麻豆支部案（1950 年 5 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部武装组织王再裘等案（1950 年 7 月）、重整后台湾省委李妈兜组织案（1950 年 7 月至 1952 年 11 月）、台南市委会朴子小组案（1950 年 9 月）、竹北区委赤柯山支部案（1951 年 4 月）、重整后台湾省委老洪组织案（1951 年 4 月至 1952 年 4 月）、竹东水泥厂支部案（1951 年 5 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地区组织廖学锐等案（1951 年 5 月）、鹿窟（山地，在台北县石碇乡与坪林乡交界）武装基地许希宽等案（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3 月）、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案（1954 年 2 月）等⁵。其中最重要者，为 1949-1950 年间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及另外 14 名干部就逮。蔡等被捕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务工作由蔡的副手台南人李妈兜负责。1950-1952 年间，李妈兜的组织亦陆续被破获。1952 年 2 月，李妈兜等拟偷渡大陆时被捕，至 1953 年 7 月 20 日被处决⁶。其间又有台南人陈星福（老洪）重整台湾省委，亦被破获。兹将此期间被有关机关认定的重要「匪谍」案及处理情形

⁴ 见《自由时报》，1993 年 6 月 13 日 3 版、14 日 3 版、16 日 3 版；《中国时报》，1993 年 6 月 15 日 3 版。

⁵ 蓝博州，《白色恐怖》，页 55-115。

⁶ 《自由时报》，1993 年 6 月 17 日 3 版；蓝博州，《白色恐怖》，页 64-67, 96-100, 104-108。

列表于下（+号表超过）⁷：

破获年代	名称	被捕人数	处决人数
1949-1951	基隆中学散发地下刊物《光明报》案	44	14
1949	高雄工作委员会案	45	7
1949-1950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干等案	15	2
1950-1952	重整后台湾省委李妈兜组织案	74+	19
1950	台湾人民解放军案	18	9
1950	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案	105	25
1950	台湾省工委会铁路部分组织案	32+	10
1950	兰阳卢盛泉案	14	2
1950	台湾省工委会台南麻豆支部案	35	3
1950	陆效之案	11	6
1950	台南大内杨清淇案	23	5
195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部武装组织王再袭案	20	6
1950	台南市委会朴子小组案	5+	5
1950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案	10	6
1950	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	51	15
1950	台湾邮电总支部案	35	2
1950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案	11+	11
1950	山地工作委员会汤守仁等案	16+	16
1950	台中地区工委会案	63	7
1950	李朋案（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案）	16	4
1950	张伯哲案	63	6
1950	简吉案	21	14
1950	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县下营支部案	14	1
1951-1952	重整后台湾省委老洪组织案	400	不详

⁷ 《自由时报》，1993年6月13日1版、14日1版和3版；《中国时报》，1993年6月13日1版；蓝博州，《白色恐怖》，页55-115。表中所列部分案情，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中有所叙述。

1951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卢庆秀案	23	3
1951	竹东水泥厂郑香廷案	13	8
1951	竹北区委赤柯山支部案	7	1
1951	左瑞明案	16	1
1951	治安维持会李建章案	15	2
1951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地区组织廖学锐等案	47	18
1951	李义成碗公会案	25	6
1951	苗栗油厂彭新贵案	20	0
1952-1953	鹿窟武装基地许希宽等案	142	31
1952	铜罗支部案	70	14
1952	福建省府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案	不详	不详
1953	台北司机公会案	21	1
1954	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案	15	5
1953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许宜卿案	24	6
1953	树林三角埔隐蔽基地案	22	4
1954	段沅案	6	4

就上述 40 案有数字可查者统计，被捕者 1641 人，处死者 299 人。据当年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指证，在 1949-1954 年间，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司令部）至少枪决五、六百人；1993 年 6 月在台北市六张犁公墓发现遗骸者有 206 人⁸；民进党有关部门所掌握的资料，在 1950 年代有一万人被捕，至少三千人被处死，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⁹。据戴国辉研究，1950 年以后，与台独有关而被处死者二人，而以共党嫌疑被枪决的据说在二千人以上¹⁰。据王晓波研究，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枪决的有三千人到四千人之多，被捕入狱的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之多。真正的共产党员，据蔡孝干的供词，不过九百人¹¹。

⁸ 《自由时报》，1993 年 6 月 23 日 4 版。

⁹ 《自由时报》，1993 年 6 月 16 日 3 版。

¹⁰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 223。

¹¹ 〈听！听！那肃杀的白色恐怖：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事件善后事宜处理公听会记录〉，《海峡评论》第 32

发展叛乱组织或牵连匪谍的案子，以发生于 1950 年代者为多，到 1960 年代、甚至 1970 年代，仍时有所闻。譬如 1967 年 4 月，有七人涉嫌组织「山地青年团」被捕，分别判刑五至十二年。又如 1967 年 12 月，有 20 人涉嫌组织「台湾大众幸福党」被捕，分别判刑六至十二年不等。又如 1969 年 3 月，有台湾大学与政治大学学生 37 人因涉嫌组织「统中会」被捕，分别判刑十至十五年。又如 1972 年 2 月，有成功大学、淡江大学等校学生 19 人因涉嫌共党被捕，分别判处感训、十五年徒刑、无期徒刑。再如 1977 年 11 月，有大学生六人因涉嫌组织「人民解放阵线」被捕，分别判处感训、十五年徒刑和无期徒刑¹²。

在「匪谍」案中，有不少是冤案，如嘉义人张钦，1952 年间因与服务于铁路局的同事不合，遭人诬陷，被检举为匪谍，于同年底被枪决¹³。造成冤案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机构或个人制造「匪谍」案整肃异己，另外一方面则是治安机构任意认定匪谍案以邀功。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冤死或含冤终生。1952 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指责保安司令部办匪谍案「抓到假的、跑了真的、制造新的」；此后，保安司令部对随便抓人的事才稍有收敛¹⁴。

关于制造或认定匪谍案以整肃异己或邀功，此处举出三个重要的案子，作一说明。第一个重要的冤案于 1949 年秋冬发生在澎湖军中。山东省八个联合中学师生七千余人于 1949 年夏为澎湖防守司令官李振清（山东人）自广州接运至澎湖。李振清为四十军军长，徐蚌会战失败后，率残部辗转撤退至澎湖，所属三十九师不足千人，此时得到七千山东师生，恰好充实编制。一面起用部分教师为司令部高级幕僚，一面即将男生编入三十九师，女生和幼小男生千余人则成立澎湖防守司令部子弟学校以容纳之。当此七千师生自广州迁澎湖时，原议女生及初中男生设校就读，高中男生则一面受军训，一面授以高中课程，俾将来升大学。孰知到澎湖后，高初中男生尽编入三十九师当兵，且不授任何中学课程，引起师生不满。烟台联中校本部校长张敏之、二分校校长邹鉴等起而交涉，并请国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派人至澎湖视

期，页 39。

¹² 蓝博州，《白色恐怖》，页 120-122。

¹³ 《自由时报》，1993 年 6 月 20 日 4 版。

¹⁴ 《中国时报》，1993 年 6 月 13 日 3 版。

察，乃得将较矮的初中男生自部队中挑出，送往澎湖防守司令部子弟学校就读。三十九师师长韩凤仪为河南人，四十军及澎防部重要干部原以河南人为多，李司令官起用部分山东人，韩原已不满，至张、邹等校长对编兵之事多方设阻，韩等乃会同政工人员，以整肃匪谍为名，打击异己。除逮捕张、邹二校长及司令部中部分山东籍的幕僚外，并逮捕学生二百余人，以刑求逼供方式，罗织张、邹二校长并数位同学为共党高干，指彼等阴谋妨碍建军。原口供送国防部军法处复审，国防部不察，处张、邹二校长并学生五人死刑，另二学生死狱中，其他被捕学生有三十余位送新生营受感化教育九个月，含冤莫白¹⁵。

第二个重要的冤案于 1955 年夏天发生在参军长孙立人及其早年部属身上。孙立人是 1949 年以后在台湾地区最受美国器重的军人，美国一度欲以他取代蒋介石总统在台湾的地位。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复总统职，为了争取美国支持，3 月 17 日发表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但在此前后，与孙立人有关的匪谍案即连续发生。是年 3 月 1 日台湾省政府秘书李朋以匪谍案被捕，牵连到孙的英文女秘书黄正及其姊黄珏，她们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是年 7 月，陆军总部军法处长周芝雨以匪谍案被捕，至 11 月被处决。是年 8 月，孙立人旧部李鸿因前在大陆任军长时失守长春，且曾被俘，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二十五年。1954 年 7 月，孙立人调总统府参军长，部属不平，认应调参谋总长，因而时相联络。1955 年 5、6 月间，孙旧部郭廷亮等三百多人被捕。是年 8 月 20 日蒋总统发布命令：「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¹⁶

孙立人引咎辞职后，在日后三十三年多的岁月中被限制自由，主要因为牵连三个案子：一为郭廷亮匪谍案，二为屏东阅兵演习意图兵变案，三为侦察阳明山地形企图率部包围蒋总统官邸实行兵谏案。郭廷亮为孙立人任新一军军长时的旧部，1955 年 5 月 25 日被捕时任步兵学校少校教官，他的罪名是「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用外没收」。郭案涉案人判刑者共 35 人，有三位中校、五位少校，其他都是尉官，最

¹⁵ 《山东文献》15 卷 3 期，页 6-65，〈澎湖冤案重要文件〉；刘廷功，《历史的烙痕》，1989 年作者自印。

¹⁶ 揭钧，《小兵之父》，页 212-235。

大的主管是少校连长。所以牵连孙立人，是因为郭被认定「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而孙被认定「坠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事后二、三十年，孙的部属及有心人士不断设法为孙翻案。据各种翻案资料，郭之匪谍案为有关单位制造，初欲屈打成招（郭曾「在老虎凳上十天十夜」），继则劝郭扮演匪谍，使孙立人牵入匪谍案，并谓如不将孙牵入匪谍案，孙将有更重之罪名。郭被迫认罪，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屏东阅兵及演习意图兵变案，系因传言孙立人将于 1955 年 6 月 6 日陪蒋总统去屏东阅兵和参观演习时，发动兵变，惟届时并未发生其事¹⁷。至于兵谏案，陆军总部第五署中校副组长王善从、参军长室少校参谋陈良堦等被指控受孙立人指使进行，谓彼等于 1954 年 6 月衔孙立人之命至蒋总统阳明山官邸侦察地形，同年 12 月复衔孙命至蒋总统高雄官邸侦察地形，俾便孙立人伺机遂行兵谏。调查报告书谓王善从等已承认，但王事后坚称不曾有任何人就此事向他询问¹⁸。

第三个冤案是与孙立人案齐名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牵连匪谍案。雷震于 1960 年 9 月 4 日被捕，被判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因而停办，筹议中的「中国民主党」亦中止进行。匪谍案主角刘子英原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任会计，与雷震同日被捕时已经转到国史馆工作，被处徒刑十二年。雷震被指控的罪名除「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外，便是「明知（刘子英）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刘子英在被捕后供称，他于 1950 年到台湾时，曾经告诉过雷震他是匪谍，而雷震予以隐匿。雷震否认被指控之事，但军法官不予相信，亦不允雷与刘对质。同案被捕的马之骥、傅正，为《自由中国》社务人员，被交付感化三年¹⁹。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于 1949 年 11 月 16 日，胡适任发行人（在美），编委会有胡适、雷震、殷海光、毛子水、杭立武等 14 人，由雷震实际主持。出版之后，因倡导自由民主、维护宪政正常体制（如反对蒋连任第三届总统）、主张司法独立、要求政党退出军队和学校、鼓吹并筹组反对党，引起执政党当局的注意。初时，治安机关尽量阻

¹⁷ 揭钧，《小兵之父》，页 235-289。

¹⁸ 1991 年 7 月 15 日王善从写给李登辉的报告副本，作者收藏。

¹⁹ 《雷震回忆录》，页 3-4, 9-10, 38, 49, 196, 317。

绕《自由中国》的出版和发行，到1956年10月《自由中国》藉出版蒋总统祝寿专号之机会向党政机关提出改革性的建言后，国防部总政治部即开始广泛地〈向毒素思想总攻击〉（1957年1月发布之文件）。总攻击的文字举出十大思想敌人指针：（1）违反三民主义；（2）违反反共抗俄国策；（3）违反国家民族利益；（4）违反领袖言论；（5）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中俄共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6）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7）鄙弃民族传统文化；（8）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9）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忾情绪；（10）妨碍国内外团结。〈总攻击〉依照此指标，举出了攻击的对象：「当然散播毒素思想的并不全是匪谍，但其中可能有一、二人是匪谍，或者是受匪谍利用，或者是共匪的同路人，其余大多数表面上可以说都与匪谍无关，有的是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有的是在野政党分子，有的是所谓自由主义者，有的是失意的官僚政客，有的是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有的是不满现实人士，有的是盲从附和分子。」结论中，矛头指向《自由中国》及另一与《自由中国》同调的《公论报》：「最近某两个刊物，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到处散播毒素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阴谋，直接间接受了匪谍的嗾使。」²⁰

一般相信：有关方面以匪谍案牵连雷震，除了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影响政府威信外，与《自由中国》社同仁结合台湾地方势力筹组反对党有关。1957至1960年间，《自由中国》从理论上讨论反对党问题三年多，最后决定实施组党，引起国府的关切。1960年6月3日行政院院长陈诚表示：「如果都是落伍政客与地痞流氓为了私利组织反对党，当然不行。」又表示：「如果违背国策，违背反共抗俄，政府一定加以取缔。」²¹是年7月2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谓新党若成立，国民党将不承认。7月31日《新生报》、《中央日报》等都有消息披露，谓「匪透过港统战分子，支持台湾『新党』活动，企图其颠覆政府阴谋。」《自由中国》于7月1日发表社论，指「政府已经准备拿『匪谍』和『流氓』这两顶帽子乱扣到今天正在筹组新党的在野人士头上」。雷震于8月16日发表专论，强调组织反对党的目的在

²⁰ 《雷震回忆录》，页66-145。

²¹ 《自由中国》23卷1期，社论〈与陈兼院长论反对党〉。

「有效制衡」与「和平交替」²²。《自由中国》于9月1日再发表社论，题名〈大江东流挡不住〉，对「国民党权势核心策动之下的言论、报刊，不惜违拂常识和民意、拗逆世界民主潮流、对于筹组新党的民主爱国人士横加侮辱威胁」表示极大的不满，声言「凡属大多数人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总有实现的一天」²³。同期《自由中国》并发表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的「紧急声明」，谓新党将于9月底以前宣告成立²⁴。但9月4日雷震即因涉嫌叛乱案被起诉，组党的计划自然就胎死腹中。到1961年3月，李万居的《公论报》也被迫停刊²⁵。

前述的真匪谍案和假匪谍案，主要在打击三种势力：一为中共的颠覆势力，各种真匪谍案皆属之。二为美国特别扶持的势力，前述孙立人案属之，发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吴国桢叛国案亦属之。吴于1950年12月至1953年4月任台湾省主席，在辞卸主席后旅美期间，攻击国府实行一党专政、在军中设立党部及政治部、不给人民言论自由、实行思想控制、不保障人权。在国防部总政治部1957年1月所发布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文件中，指明「吴国桢公然叛国」，要「以雷霆万钧之势，领导我三军同志从四面八方予吴逆思想以打击」²⁶。三为任何反对当权派的势力，或为当权派所不喜的势力，前述澎湖军中冤案和雷震案属之。

有关反对当权派的势力或为当权派所不喜的势力，受到制裁或限制者，所在多有，仅举三方面，作为示例。其一是拂逆当权派者遭到莫名的逮捕或监禁，例如1950年3月名报人龚德柏在新竹陆军大学讲演时，批评孔祥熙、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时贪污舞弊，牵涉到蒋总统夫人宋美龄，情报单位闻讯即将龚逮捕监禁，并且不通知家属或任何人。到1955年3月，立委成舍我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谓龚失踪五年，「他究竟犯的什么罪？关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但似乎谁都知道。这五年中，他没有受审，没有判罪，没有枪毙，却也总没有回家」。龚德柏于立法院质询后一年多被保释，但究竟所犯何罪？为何坐牢将近

²² 雷震，〈驳斥党报官报的谬论和诬蔑〉，《自由中国》23卷4期，页7-9。

²³ 见《自由中国》23卷5期，页4-6。

²⁴ 同上，页16。

²⁵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173-174。

²⁶ 《雷震回忆录》，页117-118。

七年之久？没有交代²⁷。另如《自治研究》半月刊编辑孙秋源于1958年10月27日被治安人员抓走，到11月28日报纸登载一项警备总部发布的消息，说孙是恶性重大的甲级流氓²⁸。这种随意捕人的恐怖，不仅1950年代如此，到1960年代仍是一样，例如1967年1月3日，名作家柏杨（郭衣洞）在《中华日报》译载的连环漫画「大力水手」中，描绘老白和小娃父子二人共购一岛建立王国、竞选总统、互不相让的故事，父亲老白说：「我是国王，我是总统，我想是啥就是啥。」父亲叫儿子小娃做皇太子，小娃也想做总统，于是父子二人竞选，父亲要写〈告全国同胞书〉，儿子说「全国同胞只有我们两个人」。到1968年3月7日，柏杨被捕，被判刑十二年，判决的理由是「包藏祸心，独出心裁，存心侮辱国家元首」。后经减刑，到1977年4月1日始获释²⁹。

其二、思想言论被视为有问题的教师辄被解聘：例如1950年代初期在台湾大学任教的郑学稼，因在《财政经济》月刊著文反对经济上的保护政策，为有关方面所不喜。行政院即密令教育部，不许郑在公私立学校教书。另一方面，郑当时为雅加达《天声报》撰写反共文章，编者将当地中共报纸《生活报》寄给郑作参考，被治安机关查获，即被认为有匪谍嫌疑；到1952年6月29日，郑为台大停聘³⁰。又例如1950年代在《自由中国》杂志撰稿的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因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停止党化教育，为有关方面所不喜，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又批评其「不学无术」，1967年，殷海光为台大停聘³¹。再例如1972年12月4日台湾大学「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被怀疑「为匪宣传」，并牵连其他教师，引发有关方面对台大哲学系大加整肃，先后被解聘的专任教师达13位之多，包括陈鼓应、赵天仪、王晓波等人³²。

其三是查禁书刊：分为三大类，一为中共分子及附共分子的书，1955年有关机构曾下令各机关学校图书室彻底查禁，开列的作者名

²⁷ 《雷震回忆录》，页149-150；王建邦，〈请政府切实保障人权〉，《自由中国》19卷11期，页24。

²⁸ 《自由中国》19卷12期，社论〈从宪法保障人民身体之自由说到取缔流氓办法〉。

²⁹ 孙观汉编，《柏杨的冤狱》，页6-7，19-27。

³⁰ 郑学稼，《我的学徒生活》，页101-106。

³¹ 《中国自由主义的领港人——殷海光先生纪念集》，页247-258。

³² 1993年5月17日《自由时报》第3页有关新闻；详参考赵天仪编《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页15-70。

单达千余人³³。二为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地的出版品，被有关方面认为有毒者：自海外寄到台湾的书，许多被海关查扣焚烧³⁴。1959年6月10日和6月20日在香港出版的《自由人》，因有文反对修宪使蒋连任第三届总统，皆被查扣；《自由人》因受多方打击，到9月13日停刊³⁵。三为在台湾出版的书刊，被有关方面认为有问题者：例如1957年8月25日出版的《自治》半月刊，因刊载台湾省议会对省政的严厉质询而遭查禁³⁶。又例如1959年启明书局负责人沈志明因翻印旧书《中国文学史》中有「无产阶级文学兴起」一节，治安机关认涉嫌「为匪宣传」，沈氏夫妇被逮捕，经旅美科学家吴大猷等电请从宽处理，始获释³⁷。再例如1966年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和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等书都被查禁³⁸。

1950年前后到1970年前后的台湾，实质上是多元社会，从大陆来台的各行各业的人，不少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新从日本统治下回归中国的台湾各行各业的人，不少也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但在大陆抗共失败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确保国家安全，采取了或严或宽的统一思想与统一行动的措施，自然造成政府与社会间的紧张。在政治高压下，一般只谋生活的人，不管是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还是公务员，只好安分守己，在自己的行业或岗位上工作，谋求生活、积聚财富、或攀升官位；对一些不愿在政治高压下被埋没的人来说，他们是战战兢兢、甚至是铤而走险的。在前述各种战战兢兢、铤而走险的事件之外，还有一些因地方主义兴起而产生的思想和行动，对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发生对立和破坏作用，自亦不为治安机关所容忍。

思想的地方主义可以文学创作为代表。战后的台湾作家有浓厚的汉族意识，也有根深蒂固的台湾意识。他们之间有人认同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有人认为台湾文学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文学。1946年6月，游弥坚、林献堂、林茂生、李万居等组织「台湾文化协进会」，

³³ 《自由中国》12卷11期，读者投书。

³⁴ 《自由中国》17卷3期，〈对盲目检扣书报的抗议〉。

³⁵ 《自由中国》21卷1期，社论〈凭什么查扣《自由人》〉；21卷8期，社论〈从《自由人》被扣谈到《自由人》停刊〉。

³⁶ 《自由中国》18卷1期，社论〈为《自治》半月刊横遭查扣而抗议〉。

³⁷ 《自由中国》20卷8期，读者投书。

³⁸ 《中国自由主义的领港人——殷海光先生纪念集》，页257；王健民，《七七草》，页187。

并创刊《台湾文化》，致力于沟通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差距，执笔的作家台籍者有洪炎秋、黄得时等，来自中国大陆者有许寿裳、台静农等。至 1947 年二二八事变发生，台湾文化协进会的人不少人受害，或死或逃或失踪。在二二八前夕，杨逵创刊《文化交流》，目的在消弭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纠葛，但只出一期即停刊。1948 年 8 月，杨逵又创刊《台湾文学》，共出三期，对台湾新文学多所开拓。但到 1949 年 4 月，杨逵因著文呼吁国共停战、还政于民、释放政治犯，以叛乱罪被捕，监禁十二年。1948 年 8 月 1 日《新生报》创刊「桥」副刊，到 1949 年 3 月 29 日停刊。「桥」副刊曾登载乡土文学论战的文字，激化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立。1949 年大陆各省的作家来台者不少，一、两年内创办的刊物有《半月文艺》、《畅流》、《自由谈》、《野风》、《火炬》等，所载多为反共文学、怀乡文学和歌功颂德的文学，使台湾作家无插足的余地。当时的台湾作家，著名者有廖清秀、钟理和、钟肇政等十人左右，在钟肇政的联络下，办《文友通讯》月刊，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发行报纸两张。参加《文友通讯》的一些人都战战兢兢，一位文友接到钟肇政的联络信函时回信说：「此事恐干禁忌，则因一个人的事将使众人受累。」当时情治人员罗织手法残酷，如果一个人受嫌，他所保存的名片、合照以及各种名册中的人都可能受累；约谈、逮捕的事经常发生。钟肇政标举「台湾文学」，但为了自保，也加上了「做为中国文学一支」的说法。《文友通讯》办到 1958 年 9 月结束，在 1950 年代的刊物中，《文友通讯》可谓为台湾文学意识的温床³⁹。

行动的地方主义可以 1961 年 5 月以施明德为首的「台湾独立联盟」案、1961 年 9 月的苏东启事件、1964 年 9 月的彭明敏事件为代表。其中苏东启事件为 1961 年 9 月发生在云林的武装革命事件。革命事件的领导人是云林县青年党籍县议员苏东启，计划劫取虎尾糖厂驻厂保警的枪械及树子脚（今荖桐乡饶平村）炮兵前进基地的大炮，以里应外合的方式，率众起事，以 1895 年台湾民主国的虎旗为帜。事败之后，苏东启及其妻苏洪月娇被捕，随后半年间，被捕者高达三百余人，其中五十人被判刑。苏东启原判死刑，嗣改无期徒刑，到 1976

³⁹ 叶石涛，〈一九四五台湾文学「忌」要〉，《自由时报》副刊，1992 年 10 月 23 日；钟肇政，〈反共？还是反扑？四十年来的白色文艺政策〉，《自由时报》副刊，10 月 24、25 日。

年获释，1992年病逝，罪名是「计划抢劫军营，企图武装叛变」⁴⁰。

1950年前后到1970年前后的台湾危机重重，中共企图解放台湾、美国企图控制台湾、台独人士企图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以摆脱与中国的纠葛。国府力图保住台湾作基地，徐图收复大陆。由于内外潜在敌人甚多，执行国家政策的人疑神疑鬼，更有不肖之徒借机整肃异己或邀功，造成不少冤案，也因此使生活在台湾的人民心怀危惧。此种情形，到1970年代以后，逐渐改善，但免于恐惧的自由，要到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才算获得。

⁴⁰ 〈云林武装革命事件三十周年〉（记者张信吉访问苏洪月娇），《自由时报》，1991年9月20日3版；1993年6月18日《自由时报》4版载苏洪月娇次女苏治芬的谈话，谓被捕四、五千人，判刑者将近一百人。

第十章

走上与中国大陆竞立之路

第一节 台海军事对峙下的国防态势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军事与国防，可从四方面加以说明：（1）早期的美国军事援助，（2）台海战争，（3）三军装备、战力及其与共军比较，（4）中共威胁与国防态势。

早期的美国军事援助

日本投降后，美军曾协助国军接收台湾，但随着在大陆对抗中共扩张的战争失败，美国一度放弃对国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曾筹组亚洲反共同盟，于1949年7月10日飞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会谈；8月6日飞镇海，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会谈；但无结果¹。1949年10月12日，美国政府宣称：「台湾与韩国不在美军西太平洋的围堵防线之内。」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密令，告知驻远东外交领事人员，对台湾采取放手不管的政策。1950年1月5日，美国正式宣告放弃台湾与国府，谓中国对台湾享有宗主权，美国不再提供军援与顾问予台湾的国府部队。6月中旬，据美国远东情报处评估：「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但当时共军火炮不足三万门，作战飞机仅仅60多架，各种船舰127艘，武器装备十分陈旧²，并无力攻打台湾。到6月25日韩战爆发后，美国于6月27日派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宣布「台海中立化」，并表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将促使联合国处理台湾问题。10月25日中共志愿军投入韩战后，加强了美国援助国府对抗中共扩张的决心。军援金额在1950-1955年间约7亿美元，1956-1960年间约10亿美元，1961-1967年间约6亿美元，1950-1967年间共约24亿美元

¹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299-301。

² 唐继革，〈论国共隔海对峙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3年第3期，页181。

此期间，美国不仅援助国府武器和金钱，且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国军训练和作战。如前所述，驻台美军顾问团成立于1951年5月1日，蔡斯任团长，顾问团的人数从1951年年底的360人增加到1955年的2,347人。在顾问团成立前后，美国的海空军即进驻台湾⁴。如成立于1951年6月1日、到1972年7月1日才结束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空军组，成立之初即设作战训练课和补给维护课，下辖四个战斗大队、两个轰炸大队、两个空运大队、一个侦察中队，另有防空部门、战术空军协同部门、飞行训练小组等。1951-1972年间代国府训练的空军人员达3,573人⁵。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级将领不断访台，商讨军事合作事宜；而美军亦与国军联合演习以增强战力。在美国高级将领访台方面，如1953年7月30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访台，8月28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科拉克访台，10月18日美国战术空军司令堪农访台，11月6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再度访台，11月13日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卡尼访台，12月4日美国海军部部长安德森访台，12月26日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访台，1954年8月14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林恩访台，9月22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蒲赖德访台，10月25日蒲赖德再度访台。联合演习方面，如1953年8月20日国军与第七舰队联合演习，美航空母舰担任假想攻击者，国军空军与美国海军飞机合作反击⁶。

1954年9月3日，中共对金门展开密集炮击，有两名美军顾问组的中校被炸死。9月6日八架中共轰炸机飞临台湾北部，国府空军当日即开始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展开全面反击；美国怕战争扩大，带有约束意味的共同防卫条约乃加紧谈判。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抵台，向蒋总统表示美国的基本立场：美国不愿共同防御条约赋予国府对大陆战争的权利；要国府同意未获美政府同意前不反攻大陆，才能签订此约。蒋表示同意；条约于12月2日

³ 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页88-92；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亚洲人》1卷1期，页82-83。

⁴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84-85。

⁵ 空军总司令部编，《美军在华空军纪实：空军顾问组》，页1，9-10，53-54。

⁶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42年7至12月份，页103，185，231，521，647，720，848，980；民国43年7至12月份，页322，610，659，838。

在华盛顿签字。1955年1月1日，美军在台成立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1月18日，共军攻陷大陈外围岛屿一江山。共同防御条约未包括金马等外岛，美国欲以在台设立海空军基地为条件，劝使国府撤退金马等外岛，蒋总统以此举伤害国府尊严与影响士气，加以拒绝。经双方折冲，最后决定放弃大陈、固守金马。2月6日国军自大陈撤退，3月2日共同防御条约换文生效。国军撤退大陈、中美共同防卫条约生效前后，共军的兵力已占优势。统计数字显示，当时共军已拥有火炮四万多门，各种飞机约五千架，舰艇860艘，而国军只有火炮一千二百多门，飞机五百多架，舰艇一百多艘。1958年8月23日共军密集炮击金门，美国立即派海空军支持，宣称金马防卫与台澎息息相关。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严重天灾，中共与苏共互相批判进入高潮，中共与印度也发生边界冲突；此为国府进击大陆的良机。1962年元旦蒋总统书告全国同胞，宣称要进行「反共抗暴的革命行动」。同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斯曼（Hilsmaier）于访问台北时发表谈话：「无论共产党政权是否摇摇欲坠，美国不支持国府反攻大陆。」1963年美国开始大量削减美援的数量，以免超出防卫需要⁷。

如前所述，自1968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即谋与中共建交，美国政策导致国府于1971年丧失联合国席位。另一方面，由于尼克松主义系将防卫任务交给各国政府，美国不再直接派军，此政策导致美军顾问团人员大量削减。驻台美军在1957年1月约五千人，1958年秋冬约一万五千人，1959-1964年约三千人，1964-1975年约一万人，到1978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时仅有七百余人。1979年4月30日，美军顾问团及协防司令部关闭⁸。此后，美国只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给台湾；台湾的防务由国府独力承担。

台海战争

台海战争，主要发生在1949-1959年间，但直到1979年，两方面仍从事攻击战和防卫战。战争通常是在海上或空中，但也有些陆战事项，包括登陆战、反登陆战，以及炮战。

⁷ 前引唐继革，〈论国共隔海对峙格局的形成〉，页181；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页158-161；前引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85-87。

⁸ 前引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页87-88。

如前所述，1949年10月25日，共军约万人在金门西北角古宁头登陆，至27日为国军击败，被俘三千余人。是年11月4日，共军约五千人在舟山外围登步岛登陆，继又增援二千兵力，至6日为国军所败，被俘近千人。古宁头之役和登步岛之役开启了台海战争的序幕⁹。国府于1950年5月2日自海南岛撤退，5月16日自舟山撤退，专守大陈、马祖、金门一线。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阻止国共军在台海发生冲突。但据当时美国驻台代办蓝钦（Rankin）的回忆，一支由两三艘巡洋舰、几艘驱逐舰和十三航空队所组成的特遣队，对他们在何时当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采取怎样的军事行动，并不清楚；杜鲁门甚至在这年8月31日公开宣称：如果韩战结束，第七舰队即无必要保护台湾¹⁰。此期间，国共军之间在台湾海峡时有冲突，国军对驻守的外岛或撤退或坚守，视情况而定。如1950年7月13日共军拟攻浙海的南山卫群岛，国军下令撤退；7月27日共军登陆金门附近的大担岛，则为国军逐退。到是年11月中共投入韩战后，美国鼓励或协助国军对大陆沿海展开突击，1951年3月30日大陈游击队袭击浙江三门，失败而归。1952年1月30日马祖游击队在福建莆田县湄州岛登陆，逐退共军，插国旗而归。6月10日，大陈游击队六千多人谋在浙江温岭县沿岸岛屿黄焦岛登陆失败，死伤数百人。8月24日，大陈游击队在浙江平阳县金镇卫登陆成功，旋即撤回。10月5日金门游击队攻占广东外海的南澎岛，次日撤退。10月8日大陈游击队袭占浙江玉环县属鸡冠山、羊屿、塞头三岛，旋即撤退。10月15日大陈游击队袭占浙江外海南日岛，俘获共军约千人而归。1953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第七舰队放弃对台湾海峡的中立巡逻，表示将不阻止中华民国军队反攻大陆。据蓝钦回忆，当时在台湾的美国人不同意国军反攻大陆，认为国府反攻大陆，会使美国卷入中国战争，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美国亦不会协助国府反攻大陆。虽然当时台湾的60万军队几乎都来自大陆，国府也希望重返大陆，但实无力反攻大陆。艾森豪威尔解除台海中立的命令，不过是藉台海国共军的互动，牵制韩国战场和越南战场而已。但对国府而言，未尝不可藉

⁹ 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台湾观点，页79；赵伏云，《国共海上战力》，页77-80。

¹⁰ 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364-365，368。

此开创反攻机运。国府牵制中共的军力，亦的确略有作用。1953年2月11日大陈游击队突袭浙江飞云江口，俘共军四十余名而返。6月19日，大陈游击队千余人突袭浙江温州湾口的羊屿等岛，激战36小时后撤退，死伤数百人。6月25日，大陈游击队再突袭浙江玉环县外海三岛，俘共军九十余人而返。7月16日，国军部队万余人自金门出发攻击福建南端外海东山岛，国军死伤三千余人，共军死伤千余人，国军战至18日撤退¹¹。

1953年7月，韩战停火。在此前后，共军对台海的压力加强。1954年5月16日中共海军对国军运补大陈的护航舰队进行干扰，为国军逐退。次日复对回程舰队干扰，受到国军舰队的反击，共军快艇一艘沉没。是日及5月28日国府空军飞临大陈地区攻击共军快艇，先后炸沉两艘。7月6日，国共军双方又在浙江白沙山附近发生海战，共军巡洋舰两艘被击沉。8月1日浙海又有海战，共军炮艇一艘被击沉。8月9日国军舰队扫荡在福建铜山港集结的共军船舰，击沉炮艇及机帆船12艘。9月3日厦门地区共军开始炮击金门，以为佯攻，实仍以在浙江进窥大陈为主要目标。10月29日国军在白沙山海面击沉共军炮艇9艘。11月14日国军太平舰在大陈外海被中共鱼雷艇击沉。12月13日国府海军在闽海乌坵附近击沉共军机帆船两艘。1955年1月9日共军飞机百余架轰炸上大陈，造成严重伤亡。1月10日国军两艘巡逻舰在大陈海域被中共鱼雷击中，一艘沉没。1月20日共军攻占大陈岛的前卫一江山。时中美共同防卫条约即将于2月10日在参议院讨论通过，美国不欲为防守大陈卷入战争，在美国劝说下，国军于2月6日开始自大陈撤退，至13日撤退完毕。大陈为突袭大陆沿海和控制长江口和杭州湾的重要基地，自大陈撤退后，又受制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国府在台海渐采取守势¹²。此后，海战、空战、炮战较多，国府对大陆沿海地区登陆突击战则较少。

大陈在浙江中部外海，马祖在福建北部外海，金门在福建南部外海。自国府放弃大陈后，国共间的海空战场南移，炮战则集中在金厦地区。1955年2月18日国府海军在浙闽交界外海主动攻击中共海军，

¹¹ 王孝，《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60-61，67-68；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84-92，372-374。

¹² 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93-102，120-124，288-291。

击沉炮艇五艘、登陆艇八艘。2月21日国军空军攻击闽浙交界外海台山岛的共军阵地，击沉机帆船5艘。6月7日国军空军在福建泉州、厦门之间的深沪湾击沉共军机帆船十多艘，11月2日又在马祖北侧海面炸沉共军机帆船9艘。1956年4月19日，国共海军在马祖附近遭遇，共军舰艇一艘被击沉。8月18日国共海军又在马祖西北海域冲突，共军巡逻舰一艘被击沉。8月23日及9月12日国共海军又先后在马祖海域相战，共军舰艇一沉二伤。是年4月和7月，国共飞机在金马上空发生四次空战，共军飞机被击落六架，被击伤二架，国军无损失。此后两年，共军飞机很少露面，海战共方大部分失败。1957年4月27日、11月5日、12月26日在福建外海发生三次海战，国军共击沉共军炮艇11艘。1958年3月19日、23日及6月22日又在福建外海发生三次海战，共军炮艇两艘被击沉。1958年7、8月间，国共空军在台海发生空战三次，共军被击落四架，国军被击落一架、伤一架。1958年八二三炮战发生后迄于10月10日，国共空军共发生空战九次，共军被击落三十架、伤五架，国军损失两架。主要因为国军自9月24日开始使用响尾蛇飞弹，命中率颇高¹³。八二三炮战期间，国共海军曾遭遇四次，8月24日19时至25日5时，国军舰艇被共军鱼雷快艇围攻五次，共军快艇被击沉八艘、伤五艘，国军军舰受伤一艘，运输货轮一艘沉没。8月27日海战，双方无损失。9月2日凌晨海战，共军快艇被击沉八艘，炮艇被击沉两艘、伤两艘，国军舰艇伤两艘。9月19日23时至20日2时海战，共军鱼雷快艇被击沉一艘、伤一艘，国军舰艇伤一艘¹⁴。据统计，八二三炮战期间，大小海战共18场，国军舰艇二沉三伤，共军舰艇及机帆船沉五十余艘。共军以奇袭方式发动八二三炮战，使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三人中弹死亡，使运补的舰艇和飞机受损，使在阵地中几无还击之力的战士气沮。但是到了9月18日、26日、27日美援203厘米巨炮分批运抵金门后，局势好转。在203厘米榴弹炮未运抵金门前，国军只有155厘米美制榴弹炮，而共军已用202厘米俄制加农炮。在海空战受挫、炮战由优势转为劣势之后，共军于10月6日宣

¹³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空中武力》，页34-46；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124-127。

¹⁴ 赵伏云，《国共海上战力》，页83-100。

布停火，10月25日宣布单日打双日不打，到1959年1月停火¹⁵。除炮战、空战、海战以外，从1954年初至1958年6月间，国军曾出动五千多架次飞机，对东南沿海的要地和军事设施进行轰炸、扫射四百多次，到沿海和深入大陆侦察的各型飞机多达三千一百多架次。空投传单及救济米包则遍及河南、河北、江苏、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2省¹⁶。

1959年以后，国共双方在台湾海峡仍有零星军事冲突。大体说来，迄于1964年间，国军仍占上风。此数年间，由于蒋总统拟掌握中共大跃进失败及政治斗争的形势，开展反攻机运，国军不断派突击队及反共救国军渗透或攻击广东、福建、甚至江苏沿海。如1962年10月国军军舰自东沙岛载特遣人员26人谋在靠近香港的赤溪半岛渗入大陆，失败。又如是年12月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第二十三纵队乘船二艘自高雄出发，谋在广东沿海登陆，失败。又如1964年7月国军特遣人员51人自淡水启航，谋突袭江苏省吕泗港附近，失败¹⁷。又如1965年5月1日国军驱逐舰东江号在马祖以北东引海面击沉共军舰艇四艘，东江号亦受重创。8月6日，国军巡逻舰漳江号和剑门号载特种部队由一少将率领拟进入福建南部，在闽粤交界的诏安湾与共军舰队遭遇，二舰均被击沉，共军损失舰艇五艘。11月13日国军永泰、永昌两舰在福建泉州外海与中共舰队遭遇，永昌被击沉，永泰受重创，共军损失舰艇四艘。1965年的三次海战，国军渐居劣势。此后美国开始大量赠予国军大型护航驱逐舰，以取代过时的巡逻舰艇¹⁸。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国共之间在台湾海峡大陆边缘地区的军事冲突，部分起于中共解放台湾的企图，部分起于国军反攻作战的企图，此二企图均为企图维护台海现状的美国所不欲见。在中美共同防卫条约的限制下，美国所以纵容国军或国军游击队不断突袭大陆边缘地区或派人向大陆地区渗透，目的在牵制韩战和越战战场，而蒋介石因利乘便，谋开拓反攻机运亦为一重要动因。在此动因下的军事行动，除发生于台湾海峡大陆边缘者外，尚发生于滇缅边境。1950年

¹⁵ 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109-114，129，291-294，页340-341载郝柏村日记谓士气已低落；赵伏云，《国共海上战力》，页101-103记载运送203厘米巨炮事。

¹⁶ 王孝，《反攻大陆Vs.解放台湾》，页155。

¹⁷ 同上，页80-86。

¹⁸ 李元平等，《台海大战》下编，页129-131，295-298，400。

9月，在圆山训练团受过训练的前国军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回到滇缅地区（大陆撤退时其残部留此），集合旧部和缅北的反共游击队，组织人民反共救国军，迄1951年5月，李弥的部队已有一万多人，嗣中共怂恿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投诉，国府于1953年10月到1954年5月自缅北撤回部分部队。1954年6月，蒋介石再派柳元麟将军赴滇缅边区组织「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到1960、1961年间受到共军和缅军的联合围剿，国军部队乃自缅、泰、寮三国边境的「金三角」地带撤回台湾¹⁹。

1965年以后，国共在海上的冲突渐少。金厦地区的零星炮战，到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后也宣布结束。此后进入两岸和平竞争时代。

三军装备、战力及其与共军的比较

国府的军事建制，国家最高军事统帅为总统。军事有军政与军令两个系统，军政由国防部管辖；军令由国防部所设之参谋本部管辖，下有陆军、海军、空军、联合勤务等各总司令部。参谋本部置参谋总长，承总统之命直接指挥军队。陆军方面，1991年有员额约31万人。自1980年代以后即向装甲化、自动化、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主要武器有M60战车（优于中共的五九式），M48H战车，M108（105厘米）、M109（155厘米），M110（203厘米）自走炮，M113、V-150、CM-21装甲运兵车，UH-1H直升飞机，工蜂六型117厘米多管火箭，榭树、鹰式、天弓、胜利女神等防空飞弹，蛙型、青蜂型地对地飞弹，以及昆吾型反战车飞弹等。海军方面，1991年有员额6万8,000人，包括陆战队3万1,000人。自1980年代以后，循外购与自制途径，备置飞弹快艇、二代舰、潜舰、新型反潜直升机、雄风舰对舰飞弹、海欉防空飞弹、自动炮、反潜鱼雷等。海军舰艇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其成长的情形如下表：

舰艇种类	1973-1974	1984-1985
潜水舰	2	2（另购造中者2艘）
驱逐舰	19	25

¹⁹ 国防部史政局编译局编印，《俞大维先生年谱资料初编》（二），页1404；王孝，《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72-78。

巡防舰	12	10
驱逐炮艇	4	4
飞弹快艇	0	52
海岸巡逻舰	6	28

空军方面，1991 年有员额 6 万 8,000 人。1955 年自美国获得 F84 雷霆型及 F86 军刀型战斗机，而淘汰原有的 F47 型与 F51 型螺旋桨式战斗机。其后又换装 F100 超级军刀型战斗机、F104 星式战斗机以及 F5 虎型战斗机。F5 虎型后来发展成 F5A、F5B、F5E 型战斗机及 F5F 型教练机。F104 星式战斗机后来发展成 F104A 型战斗机、F104B 型教练机以及 F104G 型空中拦截机。F100 型后来发展成 F100A 型拦截机、RF100A 型侦察机、F100C 型拦截机、以及 F100D 型及 F100F 型战轰机。F86 型战斗机后来发展成 F86A、F86D、F86E、F86F、F86H、F86K 等型战斗机。F86F 型是国府空军迈向喷气式战斗机之始，该型飞机并开始使用飞弹，为 1954 年九三炮战时的胜利者。F84 型后来衍生为 F84E、F84F、F84G 等型战斗机。其他方面的机种尚有 C130、C119 空运机，以及 S70C 直升机等²⁰。自 1980 年代以后，除购置 F104 等型战机外，自力研发之经国号 IDF 战机亦进入生产阶段；另并完成 S-2E 机反潜性能之改造。此外，并购置或改良胜利女神防空飞弹、鹰式防空飞弹、矮樾型防空飞弹、标准型防空飞弹；自制天弓型防空飞弹、天剑型空对空飞弹、响尾蛇型空对空飞弹、空对地小牛型飞弹、空对地犊牛型飞弹，并换装三五快炮。前述主要机种与中共飞机比较，F100 战斗机在速度、爬升率及转弯速度方面，比中共的 F5（米格十七）及 F6（米格十九 PF）为优；F100 在高空性能方面与 F6 相伯仲，在低空缠斗方面则较占优势。F104G 型战斗机为高性能拦截机，其最大航速及爬升率均超过中共的 F6 和 F7（仿米格二十一），但在低空缠斗上性能不及 F7。F5E 的最高速度不及 F7，但低空缠斗力甚强。中共新研发的有 F8，国军的 F5E 亦在不断改良²¹。

至于兵力编制及装备数量，据 1986 年的资料，陆军方面，有六

²⁰ 国防部编，《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国防报告书》，页 47-50，138-150；赵伏云，《台湾军事备忘录》，页 48-55，84，88-89，96，98-100，103-105，110-119，122-123，133-136，138-142，146-147；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空中武力》，页 5-21；风云军事编辑委员会编，《国共海上战力》，页 7。

²¹ 赵伏云，《台湾军事备忘录》，页 13-14。

个军（三个军团），辖十二个重装师、六个轻装师、六个步兵旅、三个空降旅、六个陆军航空中队、四个装甲旅、二十个野战炮兵营、五个地对空飞弹营。

装备如下²²：

装甲车	野战炮
M48 中型坦克：309 辆	M59-155 厘米榴弹炮：390 门
90 厘米炮坦克：325 辆	M116-75 厘米炮：350 门
M41 轻坦克：795 辆	M101 (T-64) -105 厘米炮：550 门
M8 武装车辆：不详	M114-155 厘米炮：90 门
M3 半履带车：不详	M115-203 厘米炮：10 门
M113 装甲运兵车：1,100 辆	M108-105 厘米炮：225 门
V150 装甲运兵车：150 辆	M109A1-115 厘米炮：125 门
飞弹	M110-203 厘米自走炮：75 门
工蜂飞弹火箭：不详	81 厘米迫击炮：不详
127 厘米多管火箭：不详	M18-76 厘米反坦克炮：150 门
雄风地对海飞弹：不详	106 厘米无后座力炮：500 门
力士型飞弹：400 枚	40 厘米高射炮：300 门
鹰式型飞弹：800 枚	直升机
M1M-72F 矮欉树飞弹：870 枚	UH-1H, 2KH-47, CH34 直升机： 118 架

海军方面，主要装备有：（1）美制潜艇 2 艘、荷制潜艇 2 艘。（2）美制驱逐舰 23 艘：配有直升机、海对海飞弹、地对地飞弹、海对空飞弹、以及反潜艇装置。（3）美制巡防战舰 9 艘。（4）美制中型巡洋舰 3 艘。（5）快速攻击艇 28 艘：配有海对海飞弹。（6）海岸巡逻艇 30 艘。（7）美制海岸除雷装置 14 艘。（8）各式登陆舰艇 451 艘。（9）修护舰 1 艘。（10）运输舰 2 艘。（11）运油船 7 艘。（12）LVT4/5 武装人员运输艇²³，数目不详。

空军方面，主要编制及装备为：（1）战斗大队 5 个、战斗中队 13 个：有 F5E 及 F5F316 架，F100A 及 F100D42 架（已除役），F104G126

²²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透视国共攻防》，页 139-141。

²³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透视国共攻防》，页 142-144。

架。(2) 拦截机中队 1 个：有 F104A19 架。(3) 侦察机中队 1 个：有 RF104G8 架。(4) 海上侦察（反潜）机中队 1 个：有 S2A9 架、S2E20 架。(5) 反潜直升飞机中队 1 个：有 500MD 机 12 架。(6) 搜索后援中队 1 个：有 UH16B 机 8 架、UH1H 直升机 10 架。(7) 运输中队 6 个：有 C47 机 20 架、C54 机 5 架、C118B 机 1 架、C119 机 40 架、C123 机 10 架，波音 720B 机 1 架、波音 727-100 机 4 架、C130 机 12 架。(8) 直升机中队 2 个：有 UH19 机 7 架、贝尔 47G 机 10 架。(9) 教练机：有 PL-B55 架、TCH50 架、T33 及 T38 机 32 架、T28 及 AT3 机 10 架、XAT3 机 50 架。(10) 后备飞机：F5A 及 F5B82 架、F104F 及 TF104F30 架、F104D6 架、M100F15 架。(11) 空对空飞弹：有响尾蛇、Shafrir、麻雀式。(12) 空对地飞弹：有小牛式及 AGM65A 小牛式²⁴。

1979 年以后，中华民国的防卫已完全由自己担负，因此在装备和人员上，曾迅速予以加强。兹将 1979 年及 1984 年两年的整体战力，列表比较如下²⁵：

1979 年整体战力	1984 年整体战力
人口：17,630,000	人口：18,600,000
总兵力：474,000	总兵力：484,000
国民生产总值： 201 亿美元（1977）	国民生产总值： 498 亿美元（1983）
国防预算：16.7 亿美元	国防预算：35.7 亿美元（1984）
陆军：兵力 330,000	陆军：兵力 330,000
装甲师：2	装甲步兵旅：6
重步兵师：12	重步兵师：12
轻步兵师：6	轻步兵师：6
装甲骑兵团：2	坦克大队：4
空降伞兵旅：2	空降伞兵旅：3
特种作战大队：4	陆军航空中队：6

²⁴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透视国共攻防》，页 144-146；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空中武力》，页 185-186。

²⁵ 《透视封锁台湾》，页 9-19。

地对地飞弹营： 1	野战炮兵营： 20
地对空飞弹营： 3	地对空飞弹营： 5
M47 及 M48 中型坦克： 150	M48 中型坦克： 309, M24 坦克： 325
M41 轻型坦克： 625	M41 轻型坦克： 795
M113 装甲运兵车： 300	M113 装甲运兵车： 1100
105 厘米加榴炮： 550	105 厘米加榴炮： 550
155 厘米加榴炮： 300	155 厘米加榴炮： 390
75 厘米 M116 野战炮： 350	75 厘米 M116 野战炮： 350
203 厘米重榴炮： 90	203 厘米 M110 自走榴弹炮： 75
240 厘米重榴炮： 10	203 厘米 M155 牵引炮： 10
105 厘米自走榴弹炮： 225	105 厘米自走榴弹炮： 225
76 厘米 M18 自走反坦克炮： 150	76 厘米 M18 自走反坦克炮： 150
106 厘米无后座力炮： 500	106 厘米无后座力炮： 500
40 厘米高射炮： 300	40 厘米高射炮： 300
81 厘米迫击炮： 不详	81 厘米迫击炮： 不详
诚实约翰地对地飞弹： 不详	鹰式地对空飞弹： 800
胜利女神地对空飞弹： 不详	胜利女神地对空飞弹： 400
小欉树地对空飞弹： 不详	小欉树地对空飞弹： 20
UH-1H 直升机： 80	UH-1H 直升机： 118
KH4 直升机： 2	KH4 直升机： 2
CH34 直升机： 7	CH34 直升机： 7
海军：兵力 35,000	海军：兵力 38,000
潜艇： 2	潜艇： 2
驱逐舰： 22	驱逐舰： 23
护卫舰： 13	护卫舰： 12
鱼雷快艇： 6	飞弹快艇： 28
近岸扫雷舰： 14	近岸扫雷舰： 14
登陆舰艇： 51	登陆舰艇： 51
登陆坞舰 2	近岸巡逻艇： 30
雄蜂舰对舰飞弹： 不详	雄风舰对舰飞弹： 不详

阿斯罗克反潜火箭：不详	阿斯罗克反潜火箭：不详
小欖树舰对空飞弹：不详	小欖树舰对空飞弹：不详
LUT4 装甲运兵车：不详	
空军：兵力 70,000	空军：兵力 77,000
战机：316	战机：547
战斗机中队：12	战斗机中队：13
F100A 和 F100F：90	F100A 和 F100D：42, F104G：60
F5A 和 F5E：165	F5E：226, F5F：30
截击机中队：3	截击机中队：1
F104G：44	F104A：19
侦察机中队：1	侦察机中队：1
RF104G：8	RF104G：8
海上侦察中队：1	海上侦察中队：1
S2A：9	S2A：9, S2E：20
海上救援中队：1	海上救援中队：1
HU16A：8	HU16B：8, HU-IH：10
运输机队	运输机中队：6
C46：25	C47：20, C54：5
C47：40	C118B：1, C119：40
C119：30	C123：10, 720B：1
C123：10	727-100：4
720B：1	教练机：147, 后备机：133
	反潜直升机中队
教练机：160	500MD：12
直升机：95	直升机中队：2
	47G：10, UH19：7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不详	响尾蛇及青蜓空对空飞弹：不详
牡牛空对地飞弹：不详	牡牛及 AGM65A 小牛空对地飞弹： 不详

1997 年开始，台湾面对中共收回香港的威胁，在军备上多所加

强。在空军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150 架 F16MLU 型战机，向法国采购的 60 架幻象两千 O 型战机陆续抵台。在海军方面，向法国采购的 6 艘拉法叶级飞弹巡防舰，1996 年交舰 2 艘，1997 年交舰 2 艘，1998 年再交舰 2 艘。陆军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42 架 AH1W 型攻击直升飞机和 OH58D 型战搜直升机，以及 M60A3TTS 型战车都陆续抵台。另外，美国并已售予台湾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复仇者式车载型刺针防空飞弹²⁶。

中华民国的军事与国防是以中共为假想敌，前述国军的人员与装备，是否能够维护台澎金马地区的安全，仍视与中共的军力比较而定。陆军方面，1969 年时中共的正规兵力已达 250 多万人。其后陆续发展，据 1985 年的资料，中共陆军约 360 万人，战斗单位有 118 个步兵师、17 个野战炮兵师、16 个防空炮兵师、13 个武装师；主要装备：各式坦克 1 万 1,450 辆、武装人员运输车 2,800 辆，各式火炮 2 万 6,800 门，各式多管火箭 4,500 门。

据 1990 年的资料，中共陆军约 220 万人，战斗单位有八十多步兵师、二十多坦克师、三十多炮兵师。主要装备：各型坦克、装甲车 1 万 2,000 多辆，以 T59、T69 坦克为主力；各式牵引火炮 1 万 5,000 多门，并有地对地飞弹。

海军方面，1956-1964 年间，中共和苏俄合作装配了第一批潜水艇，属俄制的 W 级，1950 年代末期以前，苏俄将四艘葛第级驱逐舰交给中共使用。1956 年以后，中共向苏俄购置了几艘导弹驱逐舰。1950 年代末期，中共开始大量制造摩托炮艇和鱼雷艇，至 1960 年代初期，中共拥有摩托快艇 70 艘、鱼雷艇 150 艘。其后中共海军继续发展，据 1985 年的资料，中共海军约 35 万人；有各式潜舰 178 艘，驱逐舰、巡防舰、巡逻舰 44 艘，飞弹快艇 216 艘，快速攻击艇 631 艘，巡逻艇 168 艘，扫雷艇 23 艘，登陆舰 53 艘，登陆艇 476 艘；有海对海飞弹、海对空飞弹、地对海飞弹。据 1990 年的资料，海军约 36 万人，有潜舰一百余艘、水面主要作战舰艇五十余艘、飞弹快艇二百余艘、两栖舰五十余艘。

空军方面，中共于 1959 年开始自制米格机。据 1985 年的资料，

²⁶ 《自由时报》，1997 年 1 月 2 日四版。

中共空军 49 万人；战斗机有歼击机 4,500 架、轰炸机 620 架、侦察机 130 架、运输机 550 架、直升机 400 架；另有空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据 1990 年的资料，空军约有 38 万人；主要作战飞机有歼击机约 4,000 架、轰炸机 500 架、运输机 500 架、直升机 300 架；另有飞弹部队约 10 万人，有东风五号、四号、三号等各型飞弹约一百枚。此外，中共于 1964-1967 年曾举行六次核子试爆，成为拥有氢弹的国家²⁷。中共的假想敌除台澎金马外，尚有美国、俄国、日本及越南。

台海的战争主要是制空权与制海权之争。就制海权而论，据 1984 年的资料，国共舰艇数量的比如下表²⁸：

	共军	国军
潜水艇	103	2
驱逐舰	11	20
护航舰	34	11
巡逻舰艇 (包括飞弹快艇)	904	44
扫雷舰艇	23	22
登陆舰艇	61 (另有小型者 450)	33 (另有小型者 270)
辅助舰艇	447	28

中共海军主力主要由潜艇及飞弹快艇所组成，数量众多，但兵力较为分散；所用 SSN2 冥河海对海飞弹，设计亦较为陈旧。国军海军主要由驱逐舰、护航舰、潜舰及飞弹快艇构成，数量较少，但兵力较为集中；且所使用的雄蜂飞弹、加百列飞弹、响尾蛇飞弹、海欉树飞弹，性能均甚优越²⁹。

制空权方面，国军约有战机五百多架；中共全国各地约有战机四千多架，布置在台海对岸者约 650 架。中共空军主要机种为歼六型（仿米格十九）、歼七型（仿米格二十一）、歼八型（仿米格二十三）。国军空军主要机种为 F5E 型及 F100G 型。最大转弯率，歼六为每秒 12 度，歼七为 13.61 度，F5E 型为 17.5 度；F5E 在低空缠斗方面优于

²⁷ 《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国防报告书》，页 26-31；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透视国共攻防》，页 147-157；王孝，《反攻大陆 VS. 解放台湾》，页 121-123。

²⁸ 风云论坛社，《透视台湾防御》，页 52-56。

²⁹ 风云论坛社，《透视国共军力》，页 39-41。

歼六和歼七。在速率方面，歼七为 2.1 马赫，歼六为 1.8 马赫，F5E 为 1.6 马赫，在升限（每分钟爬升率）方面，歼七为 1 万 8,000 公尺，歼六为 1 万 7,900 公尺，F5E 为 1 万 6,460 公尺；歼六和歼七在高空和高速方面优于 F5E。但 F100G 的速率为 2.2 马赫，升限为 1 万 8,380 公尺，在高空拦截方面优于歼六和歼七。歼八性能约与 F104 相似。另外，国军飞机配置的雷达、干扰器和飞弹，性能亦较优³⁰。

至于海空军及防空所用的飞弹，在地对空方面，中共所用者以红旗飞弹为主，此种飞弹，射程 50 公里，升限 1 万 8,000 公尺，以对付中空飞机为主。国军所用者有胜利女神、鹰式、樾树和麻雀，胜利女神射程 140 公里，升限 4 万 5,000 公尺，以对付高空和远程飞机为主。鹰式飞弹射程 40 公里，升限 1 万 6,000 公尺，以对付中低空飞机为主。麻雀飞弹射程 8,000 公尺，樾树飞弹射程 5,000 公尺，是对付低空目标的武器。在反舰飞弹方面，中共所用者主要有海鹰飞弹，射程 45 公里；C801 飞弹，射程 40 公里；C101 飞弹，射程 70-80 公里。国军所用者有天使飞弹，射程 20 公里；雄风飞弹，射程 40 公里。在船舰防空方面，中共尚少成就。国军所用者为海樾飞弹，射程 5 公里；标准飞弹，射程 18 公里。在空对空方面，中共所用者为霹雳飞弹，国军所用者为响尾蛇飞弹，同属追热飞弹。在反坦克飞弹方面，中共所用者为红箭飞弹，国军所用者为昆吾飞弹，均仿自苏俄的火泥箱飞弹；国军另有美制的拖式飞弹³¹。

共军威胁与国防态势

中共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何时收回，并没有时间表。自 1979 年以后，据称收回的方式有三：其一、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卖防卫性武器给台湾，如是台湾因武器落后，无法应付中共的军事威胁，最后被中共统一。其二、用军事封锁的方式，使台湾的经济崩溃，人心涣散，最后被中共统一。其三、以优胜的海空陆军进攻台湾，强行统一。从军事方面看来，近年中共所行的是第一策。实行第二、三策的时机有五：（1）台湾与俄国结盟，夹击中共；（2）台湾宣布独立，

³⁰ 风云论坛社，《透视台湾防御》，页 113-120；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空中武力》，页 30-31。

³¹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飞弹竞赛》，页 7-17。

或自主权愈来愈高；(3) 台湾发展核子武器；(4) 在一定时间内未能阻止美国或其他国家售予台湾高性能防卫武器；(5) 在一定时间内，台湾拒绝谈判统一问题。中共如实行第二、三策需要准备，但 1996 年 3 月对台湾外海发射飞弹，已引起国内外的震撼。中共对实行第二、三策提早或推迟的因素尚有：(1) 台湾政局是否稳定；(2) 台湾经济是否持续繁荣；(3) 中共对统一政策的缓急；(4) 中共军事现代化的程度；(5) 中共与美、苏、日、越的关系。国府为避免台海紧张，除在内外政策上避免过分刺激中共外，最可恃的是放宽两岸交流，使和平统一可待，或保有优越的防卫武器，以阻赫中共用武。国府有鉴于此，除维持两岸和平交流外，一直设法购置高性能军事装备。1985 年以后的努力目标是：以 F5G 和 F16A 战机取代 F5E (F5E 不足对抗歼八型)；以 A1M9P4 型空对空飞弹 (红外线追踪，可迎头拦截) 取代响尾蛇飞弹 (仅能在敌机后发射)；以鱼叉型反舰飞弹取代天使型飞弹 (天使型不足对抗冥河型)；对原有的反潜火箭、轻型反潜直升机、S2A 及 S2E 反潜机，亦谋求增强³²。

近年台湾的防务是以金门、马祖为第一线，驻防金门(厦门外海)的有四个重装师及配属部队共约五万人，驻守马祖(福州外海)的有一个重装师及配属部队共约二万人。另外，驻守东引(马祖岛东北)者以反共救国军为主，约五千人；驻守乌坵(泉州外海，为马祖、金门间的中继站)者有近千名海军陆战队。对大陆沿海的军事监控方面，北自东引列岛起，经浪岛、马祖、白犬(在马祖岛南)、乌坵、金门以迄东椗(在金门南)一线，配有雄蜂海对海飞弹，封锁着福建台山列岛(福建北端外海)与虎头山(福建南端外海，东椗以南、东山岛以北)之间由北向南二百海浬的福建沿海，仅泉州港不在雄蜂飞弹射程之内。在防空系统方面，在台湾和外岛有 20 余处对空搜索雷达站、84 座地对空飞弹发射台、500 门重型高射炮。另陆海空军都有电侦台、空军有巡逻机、陆海军有巡逻直升机、海空军有雷达站、海军有巡逻舰艇、陆军有海防班哨，全天候监控台军事动态。台海防务最大的问题是战场没有纵深，中共战机 5-10 分钟可以飞临领空，快速舰艇 2 至 4 小时可以抵达领土海岸。雷达只可侦测到距离目标约 5-7 分钟

³²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台湾安全的剖析与展望》，页 54-81。

高空来袭的飞机，对低空飞行的飞机约只有 3 分钟的预警时间。国军战机如果停于跑道上发动引擎，可在一分钟内升空；如果置于特建的待命设施中，需 3 至 5 分钟才能升空。因此，即使改良雷达，在海峡上空拦截的时间也很短；在这种情形下，战机的速度愈快愈好³³。共军虽然尚无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能力，但已向俄国洽购米格二十九型和米格三十一型，性能可比美国第一流战机³⁴；如果台湾无法在购买新型战机上获得突破，国军飞机在量和质上都无法与共军匹敌。

中华民国的国防系以中共为假想敌。衡量中共的战力，国军已在反潜、制空和突破封锁等方面提升战力。目前国防建设的方向，陆军以装甲化、自动化、电子化、立体化为目标，海军以增进防空、反潜、水面、水雷战力为目标，空军除更新高性能战机外，以强化制空飞弹和防空预警能力为目标³⁵。

³³ 李元平等著，《台海大战》下编，页 301，312，317；《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国防报告书》，页 133-135；《台湾安全的剖析与展望》，页 68。

³⁴ 张旭成、拉沙特，〈如果中国跨过台湾海峡国际间将作何反应〉，《自由时报》，1993 年 4 月 26 日，页 6。

³⁵ 《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国防报告书》，页 61。

第二节 两个中国竞争中的外交空间

所谓两个中国，一为建于 1912 年的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实际管辖的领土屡变，到 1949 年以后，主要只管辖台、澎、金、马地区；一为建于 194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实际管辖着中华民国管辖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两个国家，自 1949 年以后，即不断在外交、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竞争国际空间。中华民国的立场最初是「敌来我挡、敌入我走」，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近十余年，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立于国际社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地方政府，不承认其中央政府的地位。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建基于国防的巩固和外交的加强。国防巩固的条件是自身实力的强弱、敌我总战力的消长、以及集体安全制度的存废；外交的加强不限于政治和军事关系，尚包括经贸和文化关系。

1949 年以后国府的外交关系，可以从三方面叙述：一为中美关系，二为与联合国关系，三为与一般国家关系。中美关系是外交关系的重要关键，联合国席位能否保持、许多国家愿否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常视美国的态度为转移。当然，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巩固，除依恃美国的协助以外，仍有赖自身的开拓。大概说来，从 1949-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以前，国府的外交政策约有五个要点：（1）争取美国军经援助；（2）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3）与在二次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和德国复交，并敦促自由民主国家派使节来台设立使馆；（4）与民主自由国家加强经贸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技术合作；（5）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承认中共，立即与之断交。到 1971 年退出联合国以后，特别是 1978 年美国与国府断交以后，中华民国在外交上渐采弹性政策：（1）结合反共非共国家，对抗中共的国际统战；（2）对无敌意的国家建立经贸、文化等关系；（3）加强世界各地的双边及

多边关系¹。(4) 谋求双重承认，并重新进入联合国。

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自 1940 年代开始，国府在外交上一直依恃美国。美国支持国府，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初在远东与国府共同抵抗日本，战后则希望国府能稳定中国局势，俾共同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美国政府初受亲中共人士的影响，将中共与俄共分开，认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不是国际共产党的一支，因此希望国共组织联合政府。国府当时深知中共的目的在攫获政权，拒绝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国府以武力对抗中共得不到美国的充分支持。在军队厌战、官僚贪污的情况下，与中共在大陆的斗争归于失败。1949 年 8 月，美国发表外交白皮书，将大陆抗共失败的责任尽委国府。有一段时间，美国亟谋与中共建交，甚至预期中共很快占领台湾；为防止国府将国共战争带到台湾，美国一度计划在台湾另外扶植亲美势力，不希望蒋介石撤退至台湾。

美国在台湾所欲扶植的亲美势力，包括 1947 年 11 月出任陆军训练司令的孙立人和 1949 年 4 月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而至台湾的吴国桢。蒋介石为了争取美援，于 1949 年 12 月 15 日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1950 年 3 月 17 日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²。此期间，国府迁台，美国代办师枢至台设立使馆，1950 年 1 月美国无任所大使杰塞普至台访问；但当时美国尚无积极支持国府并表示。1950 年 6 月 25 日韩战爆发，美国基于东亚战略的考虑，杜鲁门总统派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防止中共占领台湾，亦要求国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军袭扰，将台湾中立化；同时美国即开始对台湾给予大量的军经援助。是年 11 月中共军队介入韩战后，美国对中共不存幻想，对中华民国的援助转趋积极。1951 年 2 月，在美国要求下，联合国宣布中共为侵略者；2 月-10 月，先后拨款约一亿美元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中华民国；5 月，在台北成立军事顾问团。1953 年 2 月，正式任命公使代办蓝钦（1950 年 6 月抵台）为大使；1954 年 12 月，与国府订立共同防卫条约³。1949-1979 年间，美国对中华民国提供了 59 亿 8,000 万美元的

¹ 史振鼎，《六十年来中国外交》，页 152-155。

²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288-293。

³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页 677-679；余坚，《中美外交关系之研究》，页 112-113。

援助（1950–1957年的援助为20亿美元），其中42亿2,000万美元为军援、17亿6,000万美元为经援。经援至1965年停止，军援到1978年断交、1979年废止防御条约时结束⁴。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蒋介石在接受美援的同时，也防止在台湾的亲美势力危及其统治权。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的职务赴美，并在美对国府多所批评，1954年3月17日，蒋介石即发布命令，指斥其「背叛国家」。1954年6月24日，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调参军长，1955年8月20日，因其部属涉嫌「匪谍」案而被免职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共势力在中国快速成长并进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到1991年10月苏俄解体以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核心主要放在如何防止苏俄与中共两大共产国家相交结、从而危害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安全与利益⁶。1949年1月美国杜鲁门总统以艾奇逊（Dean Acheson）继马歇尔为国务卿，实行放弃国府、图谋承认中共的政策。到1950年6月韩战爆发，在美国对共产集团围堵政策下，视台湾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一环，始再积极支持国府防卫台湾，但并不支持国府反攻大陆。杜鲁门总统将台湾中立化的政策，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继任总统（1957–1961）后在字面上解除；而且为了牵制韩国和越南战场，美国曾一度默认或纵容国府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干扰，但除此以外，从未支持国府的反攻大陆政策。1954年9月中共炮击金门，是年12月美国与中华民国签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必要时出兵协防台澎。是年3月，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对华政策声明：（1）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地位，（2）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3）拒绝中共进入联合国。但到8月，美国与中共的大使级会议即开始在日内瓦举行，谈到1957年底暂告停顿。会谈的主要内容，在中共一方系要求解除对中共的禁运、建立文化交流等，在美国一方则要求中共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释放被拘美籍人士（包括空军人员）等。1958年8月中共再度炮击金门，是年9月美国与中共间的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美国坚持中共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为谈判的前提条件。

⁴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294-295。

⁵ Stephen P. Gi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eds., *American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美国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5月10日。

⁶ 吴新兴，〈美国因素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与评估〉，《近代中国》87期，页85。

尽管谈判一时没有进展，美国已开始采取「两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共统治大陆的现状，谋求同时与两个中国相处。1961年甘乃迪（1961-1963）继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后，将「两个中国」政策具体化，其方案有四种：（1）中华民国自金、马撤退，宣告台湾独立，并以新会员国地位加入联合国；中共在保证不以武力解决台湾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全理事会的席位。（2）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保护，数年之后，由台湾人民公民投票决定其地位。（3）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地区，有独立的外交权，可申请加入联合国。（4）中共加入联合国，分享中华民国创始会员国的地位，但不进入安理会。此四种方案因违反台海两岸政府「一个中国」的原则，未被接受，但美国继续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62年国府拟利用大陆的政治危机反攻大陆时，美国不仅加以限制，且通过华沙会议告知北京，谓台湾将不致攻击大陆。但是同年中共再度炮击金门时，美国则声明将协助中华民国防卫外岛。1963年甘乃迪遇刺，副总统詹森继任，并连任一次（1963-1969），其对华政策不变，一面维持中华民国的法权地位，一面与中共谈判⁷。

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1969-1974）。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有二大端：（1）协助有关国家抵抗苏俄扩张，但不再派军队参战；（2）建立美国、苏俄、中共三角平衡关系，以代替美、苏两强对抗之局面。美国与中共能进一步结合，系因双方皆有此需要。对美国来说：（1）中共已于1964年及1966年成功地试爆原子弹及氢弹，大大增加了对西方的威胁。（2）中共支持越战；美国在1960年代陷入越战的泥淖，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已产生不利的影晌。（3）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对美国具有吸引力。对中共来说：（1）中共在1960年代与苏俄交恶，1968年苏俄进兵捷克，1969年又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与中共发生武装冲突，使中共备感威胁。

（2）中共欲进入联合国，并打击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需要与美国接近。在这种情形下，尼克松于1970年2月宣布「两个中国」方案，一面强调美国继续尊重对中华民国的条约义务，维护中华民国

⁷ 前引吴新兴，〈美国因素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与评估〉，页88-90；Nancy Bernkopt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1-1991"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5.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1年11月27日；余坚，《中美外交关系之研究》，页141-153，159-163。

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拟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并欢迎中共进入联合国。尼克松希望台海两岸的争端，能循和平的途径解决。为了迅速与中共改善关系，尼克松越过国务卿罗吉斯，直接派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与中共联络，于 1971 年 7 月决定于 1972 年初访问中国大陆。联合国受其影响，于 1971 年 10 月 25 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中华民国宣布退出联合国。1972 年 2 月 27 日，访问中国大陆的尼克松与中共签署〈上海公报〉，公报中表明：「美国认知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会质疑此一立场。」公报中并表明：美国同意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坚持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同意在台湾海峡情势缓和时减低美国驻军及军售。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主要目的在与中共建立战略关系以共同对抗苏俄在亚洲的扩张；直接的影响，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提早进入联合国以外，并促使日本于 1972 年 9 月与中共建交。尽管终尼克松之任，以及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的三年（1974-1977），美国继续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继续遵守防御条约⁸，日后美国与中共的建交谈判则逐渐落实。

中共与美国谈判，最初只要求美国自台湾撤军。尼克松为了与中共结盟共同对抗苏俄，对中共作了很大让步；但〈上海公报〉只模糊地「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对美国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亦未特别挑剔。直到 1975 年中期，在福特任总统期间，中共副主席邓小平（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始向美国提出建交的三个条件：美国须与国府断交、废约、撤军，美国不答应。1977 年卡特就任总统（1977-1981）后，初亦未急于承认中共，嗣以与苏俄在限制军售和限制核子发展等方面谈判失败，为了与中共联合遏阻苏俄的扩张，卡特才在国家安全顾问布里斯辛基的建议下，速谋与中共建交，藉以与中共拓展其他关系。美国向中共提出的相应条件是：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北京发布对台湾前途和平解决声明、美台协防条约依规定于一年前通知始能终止。中共对美国的相应条件未加强力反对，美国乃于 1978 年 12 月 16 日宣布与国府断交、废约，并自台湾撤军。1979 年 1 月 1 日，

⁸ 余坚，《中美外交关系之研究》，页 169-192；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2 年 9 月 29 日；前引吴新兴，〈美国因素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与评估〉，页 90-91；史振鼎，《六十年来中国外交》，页 170-172。

美国在与中共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认知中国人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保障台湾安全，并使商务（包括军售）、文化等关系不致中断，美国国会于 1979 年 4 月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与台湾维持了半官方的关系，设立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国与中共建交后，虽然在经贸及文化交流上有所进展，但在战略利益上颇难有所突破。1981 年里根继任美国总统（1981-1989），欲改善与国府的关系，一度主张恢复官方关系，但因中共反对而不果。而 1982 年 8 月 17 日，美国针对军售台湾问题与北京所签的〈八一七公报〉，进一步表明「台湾问题乃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并无意侵犯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完整，或介入中国的内政，或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至于公报中美国同意逐年减少对台湾军售，系基于了解中共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87 年，台海两岸始展开和平交流，台湾有些人士惧为中共所统一，台湾独立的声浪渐大。原即怀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观念的美国人士，鉴于苏俄解体，美国与中共已无结盟的必要，同情台湾独立者渐多，认为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观念和时代脱节。奠基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一台」政策，似乎愈来愈明显⁹。

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两方面，在形式的官方关系结束以后，实质的关系有的继续维持，有的则不断加强。维持中的关系是美国在军事上维护台湾的安全。美国与中共建交后，继续出售防卫性的武器给台湾；或透过生产装备的出售，将一些制造武器的技术转移给台湾。军售和技术转移的总金额，在 1980 年为 5 亿 2,000 万美元，其中直接军售占 89%；1990 年约为 6 亿 6,000 万美元，其中直接军售占 72%。技术转移的交易始于 1986 年，目的在使台湾能够自力生产武器，包括战斗机、导向飞弹和其他不同射程的飞弹、战车和其他装甲车等¹⁰。实际上，这种军事技术的转移工作，在美国与国府断交前就开始，如 1960 年代末期转移 M14 全自动步枪的

⁹ 吴新兴，〈美国因素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与评估〉，页 91-96；Han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2 年 11 月 12 日；John F. Copper,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同上，1992 年 5 月 27 日。

¹⁰ Steven W. Mos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mocratic Friends, Strategic Allies, and Economic Partners*.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2 年 7 月 14 日。

制造技术，国府命名为「五七式国造步枪」；1970年代末期转移猛虎型战斗机、响尾蛇空对空飞弹、鹰式地对地飞弹、M48中型坦克，155厘米加农炮、M16自动步枪等¹¹。

至于加强中的实质关系，主要为外贸。1952年，台湾对美出口仅40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5%；1986年，台湾对美出口达190亿美元，几占出口总额之半数。在进口方面，1952年台湾自美国进口8,600万美元，到1986年，增至54亿美元。在断交后的十年，台湾与美国的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74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310亿美元。台湾对美出口由50亿美元增至230亿6,000万美元。台湾自美进口由24亿美元增至76亿美元。在1978-1986年间，美国对台湾的私人投资达13亿美元，占国府批准外人投资总额的40%¹²。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为与美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亦为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9月，国府在大陆抗共失败，以苏俄于日本投降后进兵中国东北、抢掠战利品，并支持中共抗拒国军接收东北等理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告苏俄侵略案，但并未获得讨论；次年9月再提，亦未获得讨论；至1951年9月再提，时以苏俄已支持中共投入韩战，乃于1952年2月1日获通过。通过时，赞成者24国，反对者9国，弃权者25国。赞成者除美国外，多为中南美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海地、宏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亚洲国家除中华民国外，有泰国、菲律宾、土耳其、伊拉克；欧洲只有希腊；非洲只有利比亚。

控苏案通过后，国府于1953年2月25日明令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获独立的外蒙古以此失去独立的凭藉。1955年当苏俄为外蒙古提请加入联合国时，国府断然予以否决。但至1961年苏俄再为外蒙古提请加入联合国时，扬言如国府

¹¹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亚洲人》1卷1期，页87-88。

¹² Stephen P. Gi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eds., *American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美国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5月10日。

再否决外蒙古，苏俄将否决非洲之毛利塔尼亚；而若茅国以此遭否决，非洲 12 个法语系国家将对国府采取不利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国府乃于讨论外蒙古入联合国案时，放弃投票¹³，使外蒙古得以进入联合国。

1949 年以后中华民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争议最久的是代表权问题。

1949 年 11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甫月余，中共外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及秘书长，否认国府代表团的法律地位。1950 年 1 月 8 日中共通知安理会，请驱逐国府代表团；苏俄代表以此提请安理会议决，但为安理会所否决。此后苏俄代表马立克退席，声称有中华民国代表出席，苏俄代表即不出席。后来北韩南侵，安理会能通过以实力制裁，即因马立克有二百天不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故。其后迄于 1971 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联合国召开大会，苏俄集团的国家和亲共的国家都提议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而欲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1950 年 9 月开幕的第五届联大，以 33 票对 16 票予以否决。此后直到 1961 年，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提议，均由中华民国友邦提出缓议案、本年度不列入议程的方式获通过，而予以搁置。缓议案的表决：1951 年为 37 票对 11 票，4 票弃权，8 票缺席；1952 年为 42 票对 9 票；1953 年为 44 票对 10 票，2 票弃权，4 票缺席；1954 年为 43 票对 11 票，6 票弃权；1955 年为 42 票对 12 票，6 票弃权；1956 年为 47 票对 24 票，8 票弃权；1957 年为 47 票对 27 票，7 票弃权；1958 年为 44 票对 28 票，9 票弃权；1959 年为 44 票对 29 票，9 票弃权；1960 年为 42 票对 34 票，22 票弃权。1961 年起，国府在联合国的形势逐渐改变，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者渐多。是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义大利、哥伦比亚五国提案，将中国代表权列为重要问题，变动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此案以 48 票对 36 票通过。其后到 1970 年的十年中，除 1964 年未表决、1965 年正负相等外，1961-1963、1966-1969，均赞同票多于反对票，到 1970 年则反对票超过赞同票两票¹⁴。

¹³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页 696-709，713-714；史振鼎，《六十年来的中国外交》，页 160-162。

¹⁴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页 709-710；史振鼎，《六十年来的中国外交》，页 156-157；余坚，《中美外交关系之研究》，页 153-155；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中共祸国史实年表》，页 232，236，243，251，260，269，284，293，300。1957 年的表决票数，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6 年 7-9 月份，页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案」，美国等提「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案」。美国的提案包括两案：一为「变相重要问题案」，即容纳中共，只须过半数的多数，而排除中华民国，须三分之二的多数，以达成接纳中共而不排除国府的目的。一为「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继续有效，同时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代中华民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是年10月25日表决「变相问题案」时，以55票对59票，15票弃权，未获通过。国府代表向大会提出严重抗议后，宣布退出联合国。接着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以76票对35票，17国弃权，获得通过¹⁵。

与一般国家的关系

中华民国与一般国家的外交关系，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说明：一按时间先后分，二按地区分，三论述务实外交政策下的对外关系。

就时间先后来说，1949年12月国府迁台时，台北只有一个韩国大使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八个月期间，共产集团的苏俄、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北韩、外蒙古，亚洲的缅甸、印度，以及欧洲的英国，皆承认中共，国府皆与之断交，共11国。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接着中共投入韩战，承认中共的国家减少。此后迄于1960年间，除续有挪威、瑞典、荷兰、丹麦、阿富汗、瑞士、奥地利、埃及、古巴、马利承认中共外（连前共21国），韩国、菲律宾、泰国、伊朗、土耳其、法国、希腊、义大利、比利时、教廷、卢森堡、葡萄牙、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多明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宏都拉斯、巴西、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拿马等29个国家继续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而日本（1952）、西班牙（1952）、黎巴嫩、危地马拉、越南、尼加拉瓜、海地（1957）、沙特阿拉伯、巴拉圭（1957）、赖比瑞亚（1957）、乌拉圭、约旦（1957）、利比亚（1959）等13国则先后与国府恢复或新建外交关系。其中日本为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

832。

¹⁵ 史振鼎，《六十年来来的中国外交》，页157-159。

原应对中国赔偿，国府为早日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宣布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1952年4月28日国府与之签订和约，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从1960年到1970年，为向非洲争取外交关系时期。在此期间，非洲殖民地纷纷建立独立国家，国府派农耕队、手工业队等前往协助其发展农工业，先后有二十余国家与国府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有喀麦隆、多哥兰、马达加斯加、赛普路斯、刚果、加彭，1961年有上伏塔，1962年有查德、达荷美（1965年承认中共）、中非（1964年承认中共），1963年有象牙海岸、尼日、狮子山国，1966年有达荷美（复交）、马尔地夫、马拉威、赖索托、波札那，1967年有马尔他、巴贝多，1968年有中非（复交）、史瓦济兰、甘比亚，1969年有塞内加尔（原于1964年承认中共）。并另于1962年与寮国、1963年与科威特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亚非从事「中间地带的斗争」，并在其他地区从事外交努力，约有十个国家与中共建立关系，如1962年有寮国，1964年有法国、中非、塞内加尔，1965年有达荷美、茅利塔尼亚，1970年有加拿大、义大利。1971年国府退出联合国后，与中共建交者渐多，1971年有智利、科威特、喀麦隆、土耳其、伊朗、狮子山国、比利时、秘鲁、黎巴嫩、墨西哥，1972年有阿根廷、牙买加、塞浦勒斯、希腊、日本、多哥、马拉加西、澳大利亚、新西兰、查德、马达加斯加、卢森堡，1973年有西班牙、上伏塔，加彭，1974年有波札那、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尼日、巴西、甘比亚，1975年有菲律宾、泰国、高棉、越南，1976年有中非，1977年有赖比瑞亚、约旦，1978年有利比亚，1979年有美国，1980年有哥伦比亚，1983年有象牙海岸，1985年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1988年有乌拉圭，1990年有沙乌地阿拉伯，1992年有韩国。其中1972年日本与国府断交、与中共建交，中共亦放弃对日本索赔。国府在退出联合国后，亦有不少建交或复交的国家。1972年有东加王国、西萨摩亚，1976年有南非，1979年有吐瓦鲁，1980年有诺鲁，1981年有圣文森，1983年有索罗门群岛、多明尼加、圣克里斯多福，1984年有圣露西亚，1988年有巴哈马，1989年有格瑞那达、赖比瑞亚、贝里斯，1990年有赖索托、几内亚比索、尼加拉瓜，1991年有中非（再复交），1992年有尼日（复交）。上述建交或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有陆续断

交者，有断交后又复交者。1971年1月，在全世界139个国家中，与国府有外交关系者66国，与中共有外交关系者48国。国府退出联合国后，与国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逐渐减少，有时又回增。据初步统计：1971年52国，1973年37国，1976年26国，1978年23国，1980年27国，1992年29国。自1976年以后，与国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多在中南美，以1978年的23个国家为例，13国在中南美，6国在亚洲，3国在非洲，1国在欧洲¹⁶。

就地区来说，先说亚洲。韩国为国府迁台后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且长期与国府保持一贯的反共立场，故为国府所重视。1980年代开始，韩国亟谋与中共发展关系，颇影响双方的外贸关系，如1977-1981年双方贸易成长率为每年30%，但自1982年以后即下降。基于政治考虑，台湾与韩国的贸易维持在入超的状态，但韩国仍于1992年与中共建交。日本于二次大战期间原与国府敌对，于1945年战败后，到1952年才与国府签订和约，恢复邦交。此后到1971年间，双方政经关系密切。日本到1972年与中共建交。在东南亚方面，从1949-1975年越共占领越南为止，国府与泰国、菲律宾、越南都维持官方的关系；在1970年前后，国府派有稻作团、农业技术团到菲律宾，派有军援团、农技团、医疗队、港口疏浚队到越南。越共占领越南后，这些国家均与国府断绝外交关系。在中东方面，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最久的国家是沙乌地阿拉伯，国府曾派有稻作技术团到沙国，但到1990年沙国则与中共建交。

非洲在1960年代新独立的国家颇多，国府着意争取，1960年有7国与国府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增为14国，1970年增为18国。这些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是：马拉加西、象牙海岸、上伏塔、奈及尔、达荷美、多哥、萨伊、加彭、查德、中非、利比亚、赖比瑞亚、冈比亚、马拉威、波札那、赖索托、史瓦济兰、南非。这些国家不仅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且在联合国席位投票中愈来愈支持国府。1960年在有邦交的8个国家中有2国支持国府，1961年在有邦交的12个国家中有9国支持国府，1962年有邦交的只15国，但支持国府的达17国；1966-1970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支持国府者，都超过有邦

¹⁶ 史振鼎，《六十年来中国外交》，页182-184；薛化元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I，II，III；《中华民国年鉴》，1988-1992年；李道合，《自由中国的进步实况》，页33-42。

交者。其中原因虽多，与 1961 年以后，国府大量派农技团赴各国协助农业改良，使其实际受惠有关。1961-1971 年间，国府先后派农技队之类的援助团 23 个至非洲国家，1970 年时即派有农技队 19 个。到 1971 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许多非洲国家才与国府断交，并疏远。

欧洲在 1950 年承认中共者有瑞士、英国、荷兰，法国原亦想承认中共，因中共承认北越，直到 1964 年才与国府断绝关系。到 1971 年，欧洲与国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和梵蒂冈（教廷）。1971 年国府退出联合国后，西班牙、卢森堡与国府断绝外交关系；1974 年葡国军事政变后亦与国府断绝外交关系。国府对欧洲外交关系的经营，原不太注意。在 1950-1971 年有条约关系的 65 个国家中，欧洲只占 5 国；而所签的 197 个双边条约中，欧洲只占 10 个。在 1950-1970 年至台湾访问的 1 万 6,074 个外国官员中，来自欧洲国家的只有 905 个，占总数的 5.7%。另一方面，台湾与欧洲外贸的比重，到 1972 年以后才超过总额的 10%。

美洲与国府的关系最密切。在北美洲方面，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前已论述，兹不多论；加拿大则于 1970 年与国府断绝外交关系，并降低经贸来往。中南美洲的国家早年追随美国，多采反共立场，到 1970 年时，只有古巴和智利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次年国府退出联合国后，与中共建交者渐多，但直到 1992 年，在中南美的 33 个国家中，尚有 16 个与国府维持外交关系。其中原因，除各国的反共立场外，与国府派往中南美的农技队表现优异有关。1960 年国府派往中南美的农技队 11 个，1970 年增至 21 个¹⁷。

务实外交是 1971 年退出联合国后，特别是 1979 年与美国断交后，国府摸索出来的一条外交道路，其要点有四：（1）加强现存的外交关系。（2）鼓励外贸，并鼓励外人在台投资。（3）推展全方位的外交，不管有没有外交关系，都与之建立经济、技术、文化和教育的交

¹⁷ 前述与各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见史振鼎、《六十年来中国外交》，页 184-187；Wang Yu-S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Unorthodox Approach*.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 年 10 月 28 日；Cheng-Wen Tsa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st Europe: Past and Future," *The Fifth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September 1-5, 1988, Taipei*; 李崇道，〈中华民国农业技术援外的发展与成就〉，《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 5 册，页 34-36。

流关系¹⁸。(4)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谋使台湾与大陆为两个对等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交方针，原以蒋介石总统所提出的「光复大陆国土」、「坚守民主阵营」为最高指导原则；任何国家欲与中华民国建交或维持外交关系，必须与中共没有或断绝外交关系。此一最高原则，在严家淦总统和蒋经国总统时期均未改变。1990年5月李登辉任总统后，提出「以更主动务实的精神，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策进国际合作」；接着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施政报告中就提出「推行务实外交，以拓展外交空间」以为呼应¹⁹。

中华民国由「有我无敌」的外交改为「和平共存」的外交，是希望能与中共竞立于国际社会，但中共则不给中华民国任何以政府为名的外交空间。中共自始采取「一个中国」政策，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不容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任何国家与中共建交，都必须与国府断交。中共与美国建交后，于1980年初要求美国海关禁止中华民国输美产品之产地使用国名。1982年中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北京大使馆，要求各国关闭在台北设立之办事处。1988年6月工业国家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七国高峰会议时，多年来为国际间公认、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家」(NICs)一词，在中共压力下，被迫改称「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²⁰。在这种情形下，从1989年起，国府即逐渐走务实外交之路，以贸易、援助及投资等方式，尽可能与世界各国维持或建立关系，必要时且不惜放弃国名²¹。下面分几方面作一说明：

(1) 争取新兴独立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81年8月、1984年5月及10月，分别与加勒比海地区之圣文森、多明尼加及圣克里斯多福三国建交；1984年3月与索罗门群岛建交，5月与圣露西亚建交；1989年1月与巴哈马建交，7月与格兰那达建交，10月与赖比瑞亚建交，11月与贝尔斯建交²²。

(2) 不计国名，但求建立关系：1984年洛杉矶奥运以「中华台

¹⁸ Cheng-Wen Tsa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st Europe: Past and Future." The Fifth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September 1-5, 1988, Taipei.

¹⁹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页 82-83；《中华民国七十八、七十九年外交年鉴》，页 135-137；《中华民国八十年外交年鉴》，页 72。

²⁰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页 88-89。

²¹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Kau, eds.,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3年2月26日。

²²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页 84-85；June Teufel Dreyer, *Taiwan in 1989: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美国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3月26日。

北」名义参加；1988年4月亚银年会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1989年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当地报纸称为「来自台湾的总统」。1989年，法国驻台北的非官方机构，易名为「法国在台协会」(French Institute in Taiwan)²³。

(3) 推展技术援助，建立经贸、文化等实质关系：中华民国的技术援助于1960年对非洲提供，后推展至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及亚洲，援助的范围包括农业、手工艺、渔牧、电力、水利工程、医术、及中小型企业经营方法等方面。1988年有35个技术团分别在25个国家工作。至于建立经贸、文化等实质关系，据1988年的资料，中华民国与世界一百四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维持经贸等实质关系，在无邦交的国家设置65个代表处，同时有26个无邦交的国家在台湾设立代表机构。据1991年的资料，在无邦交的国家设置的代表处增至79个，另有29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²⁴。

(4) 成立各种基金，对外国进行经济、学术及人道援助：1988年成立「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十亿美元，贷款予开发中的国家成立工业区，或作开路、造桥等基本建设。是年又成立「国际灾难人道救济基金」，以救济外国重大灾害²⁵。1989年成立约一亿美元的「蒋经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以支持外国或中外合作的中国研究。

(5) 降低关税，以鼓励外货输入：台湾由于连年外贸出超，外汇存底雄厚。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降低进口关税，以鼓励外货输入。平均关税率在1984年为31%，到1988年已降至13%²⁶。

务实外交在世界各国的情形，可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四方面作一说明。在亚洲方面，日本自1980年代即采政经分离原则，对台湾的贸易一直大量出超。东南亚地区因经济落后，对台湾雄厚的资金及经济发展的经验有兴趣，自1984年以后，虽外交关系中断，在经贸、文化方面的关系不断加强。中东地区的国家多持反共立场，与国府断交之后，仍互设不同名称的非官方的办事处，并进行工业、矿

²³ 上引 June Teufel Dreyer, *Taiwan in 1989: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ederick F. Chien, "A View From Taipei",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5.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 《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 1991年11月27日。

²⁴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 页84; 上引 Frederick F. Chien, "A View From Taipei".

²⁵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 页86。

²⁶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eds.,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 《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 1993年2月26日。

业、高科技、建筑和商业等方面的合作²⁷。非洲国家在1960年代与国府关系最好，1970年代转向中共；但到1980年代又与国府发展实质关系，国府则以经贸来往和高科技援助在该地区开拓外交空间²⁸。欧洲在1980年代与国府的经贸关系较前加强。1979-1986年台湾与欧洲的贸易额约占总额的10.7-12.6%。1979年前，欧洲国家未在台湾设金融机构，到1987年已有欧洲的10家银行在台湾设分支机构（4家为法国银行，3家为英国银行，2家为荷兰银行，1家为西德银行）。1979年前，欧洲至台湾投资者每年不超过5家，每年投资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1984年以后逐渐增加，到1987年，有35家投资案，总投资额为2亿2400万美元。另外到1988年时，欧洲已有11个国家在台湾设立了14个机构，办理商务、文化交流及技术合作等事宜。同时，国府在欧洲的14个国家设有代表机构。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与欧洲17个国家中的56个政党间亦建立了联系。1980年荷兰售给国府潜艇两艘，于1987年和1988年分别交货²⁹。

在美洲方面，北美洲的美国，在1979年与国府断交后一直与台湾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除出售高性能武器为中共所阻止之外，其他经贸及文化交流均相当畅通。至1988年止，双方共签订了97项协议，台湾并与美国的31个州建立了贸易关系。1978-1987年间，台湾与美国的双向贸易由90亿美元增至330亿美元；美国对台湾的直接投资自5亿美元增至20亿美元。加拿大自1970年与国府断交后，十年之间双方贸易额甚低，到1980年代，逐渐增加，1985年为17亿余美元，台湾出超8亿余美元。国府对中南美洲的外交在1980年代亦有所拓展，1986年台湾与中南美洲的贸易总额为15亿美元，1988年增至20亿美元³⁰。

务实外交，使中华民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拓展了国际空间。政治空间则受到中共的封杀。近年台湾希望以进入联合国的方式，获得

²⁷ Wang Yu-S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Unorthodox Approach*.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10月28日。

²⁸ 同上。

²⁹ 前引 Cheng-Wen Tsa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st Europe: Past and Future," pp.22-24, 29-30, 32, 33-34.

³⁰ Wang Yu-S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Unorthodox Approach*. 见纽约中华新闻文化中心，《美国出版之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10月28日；Robert G. Sutter, *Taiwa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美国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89年6月12日。

更多国家的承认；在中共的反对下，路是遥远的。

第三节 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政治格局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初的三十多年，政权由执政的国民党垄断。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力，建基于 1947 年的宪法、1948 年的临时条款和 1949 年的戒严法。国民党在 1948 年的选举中获胜，控有立、监两院及国民大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因此，不仅国大选举总统获胜，施政亦受立、监两院的支持。国府迁台后的数十年，由于立、监两院及国民大会不改造，由立、监两院和国民大会所衍生的各种权力安排、法律条款，几乎悉受国民党左右。民、青两党及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反对的声音很微弱。直到 1970 年代以后，由于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增额选举，政权才逐渐开放。到 1987 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特别是到 1991-1992 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才进入政权完全开放的政党政治时代。

国民党政权的巩固

国民党在大陆抗共失败，能够在台湾重建政权，并获得长期的安定，就外在因素来说，得力于台湾海峡的屏障，和美国的军经援助和支持；就内在因素来说，则归因于台湾的发展潜力和国民党的强势领导。前述诸因素，已在〈立足台湾与建设台湾〉一节有所论述，此处仅就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国民党的党、政措施及权力递嬗加以说明。

大陆抗共失败之际，蒋介石总统于 1949 年 1 月 1 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以巩固台湾基地。7 月 18 日，行政院并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节制苏、浙、闽、台、粤五省区。其间，国库所存黄金、银元、美钞全部运台；大陆军公教人员及一般人民至台者百余万人。中央政府于 1949 年 12 月 9 日迁台办公，陈诚于 12 月 15 日卸台湾省

主席任。如前所述，陈诚对台湾做了几种奠基工作：（1）1949年5月宣布戒严令，以稳定台湾秩序。（2）1949年6月成立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对公营企业加以整顿。（3）1949年6月开始币制改革，以新台币代替旧台币，以稳定金融。（4）1949年8月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统辖台湾、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军务，有计划地对大陆撤退至台的军队加以整编。（5）透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年10月1日成立于南京，1949年底迁台），协助农作，促进粮食生产，使1949年的粮食产量超过120万公吨，为1945年产量的2倍。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总统职，宣言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反共。蒋并透过党务改造，重新建立国民党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组织。在重要人事安排上，1949年12月15日吴国楨接替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950年3月7日陈诚接替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3月17日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3月25日蒋经国接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¹。

在1950-196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不少稳定政权的工作。在党务方面，1950年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以陈诚、张其昀、蒋经国、沈昌焕等16人为委员，并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以于右任、居正等25人为委员，以替代因大陆抗共失败而星散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迄于1952年10月七全大会结束后，完成的党务改造工作主要有：（1）确定国民党的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2）党内派系由陈诚系和蒋经国系取代了大陆时期的CC系和政学系。（3）七全大会重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评议委员会为决策机构，取消改造委员会。党的组织，在中央党部以下建立海外、产业、交通、知青及省县各级党部，党员重新登记，并编入小组组织。党员1953年为28万人。（4）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1952年10月31日），以结合青年：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1954年），以训练干部。除党务改造以外，在军事方面，加强整训及装备，恢复政工制度。在特务方面，蒋介石于1949年7月在高雄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统一情报工作，1950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政府各机构的情报机构，大陆时期的中统延续为内政部调查局，负责社会调查，以防制经济犯

¹ 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页668-670；宋春、于文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页12-14；茅家琦编，《台湾三十年》，页2-5。

罪、贪污、漏税为主；军统在大陆撤退前夕改为保密局，1954年10月衍为国家安全局，以调查敌人渗透和人民反抗活动为主。另国防部情报局，以搜集大陆情报、建立特务网为主。在政治方面，主要有：

- (1) 以戒严法及有关法令限制人民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罢市、罢课及言论出版自由。
- (2) 反对党除大陆时期原有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外，不准成立新党，对民、青两党亦加以笼络与限制。1960年主编《自由中国》的雷震因拟与反对派人士合组中国民主党，即以掩护匪谍的名义被捕监禁。
- (3) 延续法统，巩固领导中心：1947-1948年在大陆选出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任期原为六年，因大陆撤守无法全面改选，到1953年9月由蒋总统依据临时条款，批准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1954年3月选蒋介石连任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到1960年3月，国大修改临时条款，使总统任期不受限制，蒋介石、陈诚再度当选为正、副总统。立法委员任期三年，到1951年任满，蒋总统准予延长至1953年1月，大法官会议作成解释，第二届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选出前，第一届立、监委继续行使职权。
- (4) 1952年七大以后设立党政联系会议，1954年改为中央政策委员会，统合以党领政事务。
- (5) 中央政府设于台北市，原只辖台湾省及福建省属的金门、马祖，1967年将台北市改为直辖市，1979年将高雄市改为直辖市。
- (6) 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和由陆军总司令转任参军长的孙立人受美国支持，富自由思想，对政治安定有妨。吴于1953年4月辞职赴美，对国府有所批评，国府指其诬蔑政府、背叛国家；孙则于1955年8月牵连匪谍案去职，并受长期软禁。
- (7) 蒋总统一一直以大中国的构想以及政权安定的考虑部署政权架构，除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以及大部分部长由大陆各省来台人士担任外，台湾省主席一直到1972年都由大陆来台人士担任，周至柔（1957-1962）、黄杰（1962-1969）、陈大庆（1969-1972）且皆为军人出身。
- (8) 为集中最高事权，1952年蒋总统成立国防会议，1967年改为国家安全会议。在文化思想方面，以三民主义和反共抗俄的国策为依归，不许有妨害政治安定和攻击传统文化的言论著作流布。1956年《自由中国》因出版专号批评时政，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主张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即受到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全面批判，到1960年被迫停刊；《文星》杂志，因连续有文批评

政治及中国文化，于 1965 年 12 月被迫停刊²。

蒋介石共任五届总统（1948-1975），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于 1949 年赴美后未再设副总统。第二、三届（1954-1966）副总统为陈诚；陈出身军人，显示当时军事重要。在第二届结束以前，舆论对蒋介石是否违宪连任有所讨论，一度引起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与陈诚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有人怀疑 1957 年 5 月 24 日群众捣毁美国大使馆事件，亦与美国欲阻止蒋介石连任有关，但事情很快平息³。蒋介石仍顺利连任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总统。第四、五届（1966-1975）副总统为严家淦；严出身财经界，显示当时经济建设重要。蒋介石第五届总统未终任病逝，由严家淦继为总统，至 1978 年。第六、七届总统由蒋经国出任（1978-1988）。副总统先后为谢东闵、李登辉；谢、李皆台湾省籍，显示本土化的趋势。1988 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为总统；李于 1990 年被选为第八届总统。大概说来，自蒋总统复职（1950）至逝世，施政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台湾、光复大陆，偏重于政局的稳定和人力物力的集中，政权开放的程度有限。到蒋经国时代，由于经济繁荣，社会新生力量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升高，乃应合潮流，逐步开放政权。

蒋经国时代始于 1972 年 6 月出任行政院长之时，止于 1988 年病逝，前后 16 年。他的主要施政方向有二：（1）扩大政治参与，大量起用台湾省区人士，一方面选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一方面以起用「青年才俊」为号召。在他任行政院长期间，所任用的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政务委员李连春、连震东、李登辉，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都是台籍人士；在他做总统时，先后以台籍人士谢东闵、李登辉为副总统。中央委员中的台籍人士，由 1950 年代的十分之一，升到 1980 年代末的三分之一⁴。（2）大力推展经济、政治建设，使台湾跻入现代化国家之林：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适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国家甚多。国府在立国态势上，从光复大陆转为革新保台。蒋经国于 1974、1977 年先后推出十项建设和十二项建设。任总统之初，美国与中华民

² 刘健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页 672-675，687-693，708-712，719-724；宋春、于文藻，《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页 64-68，102-107；茅家琦，《台湾三十年》，页 18，20，90-109。

³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340-345。

⁴ 茅家琦，《台湾三十年》，页 208-211，297-298。

国断交，外交益形孤立，为缓和内部紧张情势，乃于 1987 年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国人赴大陆探亲⁵。在此前后，民主进步党于 1986 年 9 月 28 日成立，工党于 1987 年 11 月 1 日成立。在 1987 年一年间，发生游行示威的次数，大小都算，达 1600 次以上，内容包括政治运动、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反对公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农民运动等⁶。另一方面，开放赴大陆探亲，促进了两岸交流。1988 年 8 月，时在蒋经国病逝之后的半年多，行政院组有「大陆工作会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有「大陆工作指导小组」，而在是年 9 月，中共国务院也成立了「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作风平实，常到民间访问，而不鼓励个人崇拜，不让人呼他为「领袖」，不让人呼「总统万岁」，使人民感受到平民时代的来临。

蒋经国的改革是在内外环境的压力下进行的。1971 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8 年底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使他不得不面对无法代表全中国的现实，在胸怀大陆的心境下，落实台湾建设，并设法在台湾落地生根。1980 年 2 月的林义雄母女命案、1981 年 7 月的陈文成命案、1984 年 2 月的江南命案，使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声望跌到谷底；1984 年 9 月中共与英国达成协议，中共决定于 1997 年以「一国两制」的办法收回香港的主权，对台湾的生存造成冲击。1985 年 2 月爆发的十信弊案，60 多家企业和十万多人受害，充分暴露金权政治的糜烂。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不得不放弃独占政权、国家责任一肩挑的老路，改以开放的心胸，与国人共治。1986 年 3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研拟办法，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为开放政权奠定基础⁸。

蒋经国的改革方向为李登辉总统所继承，而李走得更远。李登辉于 1988 年 1 月 13 日以副总统继蒋经国为总统，并于 1 月 27 日受推为国民党代理主席、于 7 月 8 日在十三全大会中被中委以起立的方式选为主席。李登辉主持的十三全，在程式上较前略为民主，在人事上较前更为年轻化和本土化。在民主化方面，李登辉允许代表联署推荐 180 人，与他提名的 180 人共同竞选 180 名中委，结果联署者有 33 人

⁵ 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页 299-301。

⁶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 198-199。

⁷ 同上，页 220-221。

⁸ 茅家琦主编，《八十年代的台湾》，页 165-181，194-202。

当选。新当选的 180 名中委，有 107 名为新当选，更换率近 60%；中常委 31 名虽皆由主席提名，但更换 12 人，更换率近 40%。在年轻化方面，中委的平均年龄由上届的约 68 岁，降至约 57 岁；中常委则由约 71 岁降至约 64 岁。在本土化方面，中委台籍占 40%，中常委超过半数（16 席）。在政府人事安排上，李登辉继任总统一年后，于 1989 年 6 月任李焕为行政院院长代替俞国华（1984-1989），李焕的国民党秘书长职务则由宋楚瑜接任。李登辉继任总统，时逢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政治和社会抗争不断发生，要求权力和资源重新分配的呼声日高。李登辉以淡化方式处理；对发生于 1988 年 5 月 20 日的农民流血抗争（要求办理农保、降低肥料售价等）的处理，即为一例。李登辉的施政，大体说来，在内政上以革新保台为政策，逐步推行政党政治；在外交上力求重返国际社会，使被承认为政治实体；在对大陆政策上，开拓生存空间，要求被承认为政治实体⁹。

政治参与的扩大

国府迁台之初的三、四十年，由于国大、立院、监院不改选，总统先后由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长期担任，国家的决策阶层相当稳定。当时地方政治除省（市）长为官派以外，县市长、乡镇长及各级民意机构，多由普选产生。到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由于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新生代改选中央民代的呼声日高，先有中央民代的增补选，继有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选和省市长的民选，使政治参与日益扩大。

在台湾，政治参与是由基层到高层逐渐扩大的。先从基层推行民主，再推展到中层，再推展至高层。1949 年 7 月，台湾省政府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拟地方自治方案。由于立法院未能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台湾省乃以本省单行法规，推动地方自治，分村里、乡镇、县市等级办理。各种选举，除特殊规定者外，都由公民直接投票之方式为之。地方自治最基层为村里民大会，由村里全体公民组织之；自 1946 年 2、3 月开始实施，依规定每年召开六次，除倡导政令外，并讨论地方兴革事项。1952 年 7 月至 1970 年 6 月，村里民大会对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农林、卫生、警卫等方面的决议案达

⁹ 茅家琦主编，《八十年代的台湾》，页 307-322，329-345。

六十多万件。村里长的选举，自 1946 年 3、4 月开始实行。村里长由村里民大会应有公民过半数出席，用无记名投票法，以得票较多者当选，任期初为二年，到 1955 年第五届时任期改为三年。1961-1964 年各县市陆续选出之第七届村里长，任期改为四年。迄 1982 年时，已选举十二届。1946 年第一届选举时台湾地区有 2,934 村、3,367 里；1948 年第二届选举时有 2,888 村、3,401 里。自 1950 年第三届到 1969 年第九届，各县市村里长选举的投票率约为 51-63%¹⁰。1969 年以后的情形不备述。

村里民大会的上一级民意机构为省辖市区民代表会、县辖市市民代表会、乡（镇）民代表会，均由村里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第一届于 1946 年 2、3 月间选举产生，台湾地区共选出乡、镇、县辖市、（省辖市）区民代表 7,767 人；第二届于 1948 年 3、4 月间选举产生，台湾地区共选出 8,113 人。1950 年第三届选举，改由公民普选产生。省辖市设市议会，不再选举区民代表会；是年共选出代表 9,778 人。其后，1952-1953 年选出第四届，共 5,695 人；1955-1956 年选出第五届，共 6,397 人；任期改为三年。1958-1959 年选出第六届，共 6,834 人；1961 年选出第七届，共 5,260 人；1964 年选出第八届，共 4,776 人；1968-1969 年选出第九届，共 4,709 人；1973 年选出第十届，共 3,751 人；1978 年选出第十一届，共 3,793 人；1982 年选出第十二届，共 3,699 人。历届投票率约 57-75%。至于乡、镇、县辖市、（省辖市）区长选举，第一届于 1950-1952 年办理，共选出 360 人，任期二年；第二届于 1954 年办理，共选出 360 人，任期三年；第三届于 1955-1957 年办理，共选出 360 人；第四届于 1959-1960 年办理，共选出 319 人；第五届于 1964 年办理，共选出 319 人；第六届于 1968 年办理，共选出 313 人；第七届于 1973 年办理，共选出 313 人；第八届于 1977 年办理，共选出 313 人；第九届于 1982 年办理，共选出 312 人。历届投票率约为 58-81%¹¹。1982 年以后的情形不备述。

乡、镇、县辖市、（省辖市）区民代表会的上一级民意机构为县、

¹⁰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地方自治》，页 75-85，209-231；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历程〉（下），《近代中国》50 期，页 134。

¹¹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地方自治》，页 147-177，178-209；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历程〉（下），页 131-132，134-135。

(省辖)市议会。县及省辖市于 1946 年成立参议会, 议员由乡、镇、县辖市, (省辖市) 区民代表会选举产生, 非由公民直选, 共选出 523 人。1950 年开始正式由公民直选县及省辖市议员, 成立县市议会。1950-1951 年完成第一届选举, 台湾地区共选出 814 人, 任期二年; 1953 年第二届选出 860 人; 1955 年第三届选出 928 人, 任期改为三年; 1958 年第四届选出 1,025 人; 1961 年第五届选出 929 人; 1964 年第六届选出 907 人, 任期改为四年; 1968 年第七届选出 847 人; 1973 年第八届选出 850 人; 1977 年第九届选出 857 人; 1982 年第十届选出 799 人。历届投票率约为 73-81%。1982 年以后的情形不备述。县市长原由官派, 自 1950 年实行县市自治后即改为由公民直选产生, 台湾全省共有 21 县市, 第一届于 1950-1951 年选举产生, 任期三年。第二届于 1954 年选举第三届于 1957 年选举。第四届于 1960 年选举, 任期改为四年。第五届于 1964 年选举, 1967 年台北市升为院辖市, 1968 年第六届选举只有 20 县市。1972 年第七届选举, 1977 年第八届选举, 1979 年高雄市升院辖市, 1981 年第九届选举, 1985 年第十届选举。此期间, 新竹县和嘉义县的市区独立成省辖市。1989 年第十一届选举, 在 21 席县市长中, 国民党 14 席, 民进党 6 席, 无党派 1 席。历届县市长选举投票率为 70-83%¹²。1989 年以后的情形不备述。

县市议会的上一级民意机构为省、市(院辖市)议会。台湾地区原无院辖市, 于 1946 年由各县市参议员投票选出省参议员 30 人, 成立省参议会, 任期原为二年, 延长至 1951 年。1951 年成立临时省议会, 仍由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产生, 议员 55 人。1954 年第二届临时省议会改由公民直选, 任期改为三年, 议员 57 人。1957 年选举第三届临时省议会, 议员 66 人。1959 年第三届临时省议会改为第一届省议会。1960 年选举第二届省议会, 议员 73 人。1963 年选举第三届省议会, 议员 74 人。1968 年选举第四届省议会, 议员 71 人, 任期改为四年。1972 年选举第五届省议会, 议员 73 人; 1977 年选举第六届省议会, 议员 77 人; 1981 年选举第七届省议会, 议员 77 人; 1985 年选举第八届省议会, 议员 77 人。历届省议员选举投票率为 69-81%

¹²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地方自治》, 页 93-146; 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历程》(下), 页 132-133, 135-136。

¹³。1985 年以后的情形不备述。

省主席及院辖市长的产生，初皆为官派，近年始走向民主化。省主席原由行政院长指派，1990 年 6 月连战任省主席时，改为由行政院长提名、省议会通过后任命。到 1994 年，省主席改为省长，由民选产生。院辖市方面，台北市原为台湾省省辖市，于 1967 年 7 月升为院辖市；原市议会改为院辖市之议会，初为临时议会，议员由原省辖市之市议员和划入台北市原属台北县六乡镇之县议员组成，1969 年 11 月选举第一届市议员 48 人，1973 年选举第二届市议员 49 人，1977 年选举第三届市议员 51 人，1981 年选举第四届市议员 51 人。高雄市亦原为台湾省省辖市，1979 年 7 月升为院辖市。1981 年 11 月选举第一届院辖市市议员 42 人，成立市议会¹⁴。院辖市市长至 1994 年改为民选。

上述省市议员、县市长及县市议员的选举，虽大多由公民直选产生，当选者多属男性、多属国民党籍、多属本县市籍。学历、职业、年龄则无显著差别。以男女比例而论，以第一至第四届省议员和第一至第七届县市议员为例，列表比较如下：

	省议员		县市议员	
	男	女	男	女
第一届	57	9	745	69
第二届	63	10	768	74
第三届	64	10	834	94
第四届	60	11	924	101
第五届			834	95
第六届			784	123
第七届			724	123

注：妇女保障名额为十分之一

就党籍而论，第一、二两届临时省议会和第一至八届省议会议员的情形，列表比较如下：

¹³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地方自治》，页 86-93；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历程〉（下），页 133-134。

¹⁴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内政志》，页 126-127。

	国民党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临时省议会	43	0	0	12
第二届临时省议会	48	0	0	9
第一届省议会	53	0	0	13
第二届省议会	53	1	0	2
第三届省议会	58	0	0	15
第四届省议会	61	1	0	12
第五届省议会	60	0	0	11
第六届省议会	58	0	0	15
第七届省议会	56	0	0	21
第八届省议会	59	0	0	18

第一届至第十届县市长的情形，列表比较如下：

	国民党	党外
第一届	18	3
第二届	19	2
第三届	20	1
第四届	19	2
第五届	17	4
第六届	17	3
第七届	20	0
第八届	16	4
第九届	15	4
第十届	17	4

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县市议员的情形，列表比较如下

	国民党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	513	4	0	297
第二届	516	0	2	242
第三届	657	0	0	271
第四届	657	1	0	367

第五届	579	2	1	347
第六届	670	5	2	230
第七届	626	5	1	215
第八届	625	3	0	222
第九届	717	1	0	139
第十届	640	2	0	157
第十一届	659	0	0	178

第一届，第五至十届乡镇长、县辖市长的情形，列表比较如下：

	国民党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	254	1	0	105
第五届	294	0	0	25
第六届	268	0	0	45
第七届	288	0	0	25
第八届	292	0	0	21
第九届	288	0	0	24
第十届	289	0	0	20

就籍贯而论，第一至四届省议员和第一至七届县市议员，本县市籍选出者与外县市和外省籍选出者，其情形可如下表：

	省议员		县市议员	
	本县市籍	外县和外省籍	本县市籍	外县和外省籍
第一届	57	7	777	13
第二届	66	7	797	63
第三届	66	8	837	91
第四届	67	4	899	126
第五届			819	110
第六届			781	126
第七届			736	109

就学历而论，第一至四届省议员，大专毕业者最多，中学毕业者次之，小学毕业者又次之；第一至七届县市议员，中学毕业者最多，大专毕业者次之，小学毕业者又次之。就职业背景而论，第一至四届省议员，工商业者最多，自由职业者次之，农业者又次之；第一至七届县市议员，工商业者最多，农业者次之，自由职业者又次之¹⁵。就年龄而论，第一至五届县市长 105 人，无一人在 30 岁以下，30-39 岁者 6 人，40-49 岁者 47 人，50-59 岁者 37 人，60 岁以上者 15 人。第一至六届县市议员 5,463 人，统计的 5,454 人中，30 岁以下者 253 人，30-39 岁者 1,565 人，40-49 岁者 2,313 人，50-59 岁者 1,115 人，60 岁以上者 208 人¹⁶。

上述的选举，竞争甚为激烈。在省议员第一届至第八届选举中，候选人 1,006 人，当选 546 人；在县市长第一届至第八届选举中，候选人 368 人，当选 165 人；在县市议员第一届至九届选举中，候选人 1 万 4,076 人，当选 8,017 人；在乡、镇长暨县辖市长第一届至第八届选举中，候选人 5,049 人，当选 2,657 人；在乡民、镇民暨县辖市民代表第三届至第十一届选举中（前二届在实施地方自治以前，不计），候选人 8 万 5,954 人，当选 5 万 1,011 人¹⁷。

省市议员以上的民意机构是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第一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于 1947-1948 年行宪时选出，1949 年国府迁台后，因无法全面改选，任期延长。但由于台、澎、金、马地区人口增加，或国代立监委老成凋谢需要增补，或台、澎、金、马地区新兴的力量需要网罗，在没有全面改选前，国府先后采取措施予以补救。1969 年 3 月国府公布〈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补选办法〉，依此办法，国府于是年 12 月办理选举，以填补中央民意代表死亡的空缺，并应合因人口增加而应有之增额，共计增补选国大代表 15 人、立法委员 10 人、监察委员 2 人，任期同第一届民代。1972 年 6 月，时在国府退出联合国以后，国府为增加台、澎、金、马地区之中央民意代表，制定〈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办法〉。依照此

¹⁵ 项昌权，《台湾地方选举之分析》，页 76-77 间附表五种；Fei-lung Lui,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pp.12-15.

¹⁶ 邹文海，《台湾省地方选举的研究》，页 5，16。

¹⁷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政治建设》，页 75-76。

办法，国府于是年12月办理选举。国代53人，国民党籍者当选43人，无党籍者当选10人；立委36人，国民党籍者当选30人，无党籍者4人，青年党2人。增额中央民代，立委任期三年，国代及监委任期六年，陆续于1975、1980、1983、1986、1989年改选。1975年12月，增额立委改选，当选37人，国民党籍者30人，无党籍者5人，青年党2人。1980年12月增额国代及增额立委改选，国代76人，国民党籍者当选63人，无党籍者12人，民社党1人；立委70人，国民党籍者当选56人，无党籍者14人¹⁸。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选举，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得票率，于1977年达到37%。此后迄于1980年代末，比例大体均未超过此数，如1986年增额国代，立委选举，党外得票率分别为31.69%和30.13%；1989年的增额立委、县市长、省议员、台北市议员、高雄市议员的选举，党外的得票率分别为25.79%、37.56%、21.14%、22.7%和19.7%。另一方面，在民进党没有成立以前，党外的席次也没有显著的增加，如1983年的增额立委改选，国民党62席，党外9席；1985年的县市长和省市议员的选举，县市长20人，国民党17人，党外3人；省议员77人，国民党60人，党外17人；台北市议员51人，国民党38人，党外13人；高雄市议员42人，国民党32人，党外10人；1986年的增额国代、立委选举，国代73人，国民党58人，党外15人；立委73人，国民党59人，党外14人¹⁹。民进党成立后，情况大有不同，1989年的选举，民进党各种席次大为增加：县市长由1人增至6人，立委由13人增至21人（是年国民党当选者72人），省议员由12人增至16人，台北市议员由10人增至14人，高雄市议员由4人增至8人²⁰。

中央行政首长，只有总统、副总统是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产生。由于国民大会代表在1947年选举时即以国民党籍者占绝对多数；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增补选举和增额选举，党外所获席次无多；

¹⁸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内政志》，页114-124；1975年12月25日《联合报》3版；1975年12月21日《联合报》1版、3版；1980年12月8日《中央日报》。

¹⁹ 〈民主的成长〉，《亚洲人》2卷1期，页8；1983年12月4日《自立晚报》1版和《自由时报》8版；1985年11月17日《中国时报》有关新闻；1986年12月7日《联合报》1、2版和《中国时报》有关新闻；1989年12月3日《中国时报》1、2版。

²⁰ 陈富华，〈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1990年6月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页112。

因此，历届总统选举，皆由国民党获胜，而且几乎都是一人参选，得票率甚高。1948、1954、1960、1966、1971年，蒋介石五届选举总统得票率分别为88.8%、95.6%、98.1%、98.6%、99.3%；1978、1984年蒋经国两届选举总统得票率分别为98.3%、90.0%；1990年李登辉选举总统得票率为96.0%²¹。总统选举至1996年改为由台澎金马地区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李登辉当选第一届民选总统。

前述选举，除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属间接选举外，所有各级民意代表及各级地方首长的选举，都与台湾地区的选民息息相关。大概说来，从1946年，各种地方选举，包括县、市、省参议会，皆属间接选举。当时台湾主要为农业社会，农村中的自然领袖为地主、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为医生）、日据时代的政治斗士和由大陆返台的政治斗士，他们容易被选入县、市参议会。省参议会除由县、市参议会推出者外，尚有一些透过党派协商的官派人士。从1950-1968年，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早期工业社会，选举由间接选举进入直接选举。此期间，由于实施土地改革，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农村中萎缩，工商业者及大陆来台人士在城市地区形成新兴的市民阶级。在城市地区，成功的企业家、政治运动者和活跃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菁英，容易在选举中获胜。在农村中，由于地主没落，高级知识分子移入城市，选民无所依附；在这种情形下，帮派、掮客型的人物出现，一方面交结权贵俾获取提名，一方面以金钱诱惑选民、以暴力对付竞争者，选风逐渐败坏。1968年以后，由于工人日多、农民日少，中产阶级逐渐形成，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企业家或其子弟、政治批评家或社会运动家以及具有高学历和富行政经验的人，成为选民支持的对象²²。但无可否认的，许多候选人为了张罗选票，与黑道相结，并有金钱作用其间，使众所诟病的黑金政治愈来愈严重。

选民支持的对象，除因社会变迁而出现新型人物之外，派系为重要因素。台湾地区的派系，大概说来，有几种分法：（1）以语系分：如桃园县，闽南人和客家人人数接近，选举时有闽、客之争。（2）以地区分：如宜兰县，因兰阳溪东西横贯，选民有溪南、溪北之分；又

²¹ 1990年2月16日《首都早报》；国民大会编，《国民大会统计汇报》，页14；1990年3月23日《中国时报》有关新闻；1990年3月22日《中央日报》有关新闻。

²² 张俊宏，〈二十五年来台湾选举史的检讨〉，《今日府会杂志》第554号，页38-43。

如台中县，铁路有山线、海线，选民亦以此分界。(3) 以家族分：如台北县有李（建兴）、戴（德发）二家之争；台中县，有陈（水潭）、林（鹤年）二家之争；高雄县，有红派（洪家）、白派（陈家）、黑派（余家）之争。(4) 都市选民以移入民之原籍分：如高雄市，有在地派、澎湖派、台南派²³。上述四种皆为旧式派系，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不同族群、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居民，有不同的利益和观念；新的利益集团，加上旧有的派系和政党的分野，使政治参与的性质愈来愈复杂。

解除戒严与取消党禁

1986年3月国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配合政治发展的趋势，推行政治革新，并成立小组担任规划。是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规划案，决定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取消党禁²⁴。政坛人士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28日成立民主进步党。国府虑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后社会失控，一面与民进党进行沟通，要求其遵守宪法、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台独；一面即制定国安法，俾便在解除戒严后藉以维护秩序。1987年6月23日，国安法在立法院通过；7月15日，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台澎地区的戒严令，同时宣布实施国安法。国安法与戒严法、戒严令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缩小了军法管辖的范围（如非现役军人不受军法审判），缩小了警备总司令部的职权（如将出入境和山防、海防移归警察机关管辖），适度放宽出入境限制，适度放宽对集会、结社、游行和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缩小山防、海防管制范围。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需要，国府于1988年1月1日解除了报禁；为了适应组党及结社的需要，立法院于1989年1月20日修订人民团体法，由原来的许可制改为报备制，使立案手续较前简易。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选制度，立法院于1989年1月26日修订选举罢免法（原于1980年制定），使各政党可以成立助选团，在野党代表可加入中央选举委员会。继民进党之后新成立的政党，有1987年7月11日郑光明等组织的中国自由党、1987年9月洪照男等成立的民主

²³ 陈阳德，《台湾地方民选领导人物的变动》，页149-153；赵永茂，《台湾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之关系》，页70-71；台湾时报社，《政海浮沉录》，页139-141。

²⁴ 刘健清等，《中国国民党史》，页773-774。

自由党、1987年11月21日以国民党高级退职军官为主体所组成的中国民众党、1987年12月1日由民进党分裂出来的工党、1987年12月25日由青年党分裂出来的中国民主正义党、1989年3月29日由工党分裂出来的劳动党等²⁵。

在诸多新兴的政党中，以民进党声势最大。民进党可以说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反对运动者的总汇。1950-19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选举中，除囊括绝大多数票的国民党和得票甚少的青年党、民社党以外，不少参选而无党籍人士属于反对派人士，于1970年代中期以后泛称之为党外。在早期的选举中，非国民党人士当选率不高。以县市长选举而论，1950-1951年当选4人，1954年2人，1957年1人，1960年2人，1964年3人，1968年3人，1972年无，1977年4人，1981年4人，1985年4人。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当选人数陡增，1987年为8人²⁶。党外势力真正能有持续性的发展，应始于1969年中央民代增补选举时，党外立委候选人郭国基、黄信介等人对执政党激烈批判²⁷。当年国民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面革新。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建言，一批有志改革的年轻人，假《大学杂志》为机关，提出国是建言，影响最大的是倡言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但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谋求与中共解冻，使国民党改革的脚步放缓。1973年以《大学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逐渐星散，1974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发生多位教授被解聘事件，1975年创刊的《台湾政论》不数期亦停刊。一度开放而又收缩的政治，引起人民不满，1977年五项公职人员选举，非国民党人士获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²⁸。1977年的地方选举，一批反对派的候选人提出民主、自决的口号，传播媒体称他们为「党外」。其后这些人即自称「党外」。1978年有党外人士助选团、1981年有党外推荐团、1983年有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1984年有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其间，

²⁵ 宋春、于文藻，《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页296-303；茅家琦，《八十年代的台湾》，页284-297；前引陈富华，〈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页74-78，85-89。

²⁶ 见1993年7月26日《自由时报》，页2。

²⁷ 笑看天，〈回顾近年中央民代选举〉，《新中华》，创刊号，页9。

²⁸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420-425，429，461-462。

党外曾于 1979 年创刊《八十年代》和《美丽岛》杂志，鼓吹改革和本土化，一度引起《疾风》杂志的对抗。是年 12 月 10 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人权大会，并作示威游行，治安机关藉此对从事反对运动者大加逮捕，并判重刑，但并未能遏止反对运动。1984 年成立的公共政策研究会具政党形式，并于 1986 年初在台湾各地筹设分会，被视为违反戒严法，引起朝野紧张，执政党数度与之沟通。是年 8 月 1 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敦促国民党开放党禁。党外人士乃秘密筹备组党，于是年 9 月 28 日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国府为避免政治冲突，对违反戒严法所成立的民进党，未加取缔。民进党于 1986 年 11 月开一全大会，选江鹏坚为主席。民进党的政治要求为立即废止国家总动员法、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长直接民选、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重返联合国，并声明台湾的地位和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1987 年 11 月开二全大会，选姚嘉文为主席；1988 年 10 月开三全大会，选黄信介为主席；1989 年 12 月开四全大会，仍选黄信介为主席；1991 年 10 月开六全大会，选许信良为主席，并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²⁹。

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结果。早在 1983 年党外后援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成立时，两个团体即展开路线之争，前者主张从事体制内改革，后者主张改革体制。1986 年民进党成立后，内部分为两大派系，一为泛美丽岛系，由黄信介领导；一为新潮流系（按《新潮流》为党外杂志之一），两系的人员分别属于或接近该二杂志社者。泛美丽岛系主张走议会政治路线，新潮流系则主张台湾独立³⁰。初时因为中央委员中泛美丽岛系占多数，未将台独列入党纲；到新潮流系跃居中委多数之后，其台独路线在党内始获肯定。

台独运动有悠久的历史，有的学者将廖文毅视为台独运动的祖师。廖为云林县人，于二二八事变后迁居香港，与原台共领袖谢雪红等合作，于 1948 年 8 月创立「台湾再解放同盟」，从事反对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台湾高度自治。1950 年廖东渡日本，在京都创「台湾民主独立

²⁹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近代史：政治篇》第四章第二节，〈民主政治的发展〉；宋春、于文藻，《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页 304-306；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页 306-307；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页 464-469，525。

³⁰ Ya-li Lu,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pp.3, 13.

党」，并于 1956 年 1 月建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嗣以台独无望，于 1965 年 5 月归顺国府。1960 年代末，台独运动的中心转移到美国和加拿大，1970 年 1 月有「台湾独立联盟」的成立，而「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亦从事台独运动。台湾岛内的台独运动，初集中于台湾长老教会，主张台湾人民自觉³¹。在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做总统的时期，对台独活动防制甚严，并进行化解，到李登辉接掌政权后，应合政治开放的新趋势，乃修订法律，允许台独人士和台独党派公开活动。

李登辉允许台独公开活动，并大量实行民进党的政策，引起党内部分人士的怀疑。1989 年 12 月增额立委选举结束以后，一批国民党籍立委赵少康、郁慕明、陈癸淼、李胜峰等组「新国民党连线」，欲维护国民党党统。这批立委在 1992 年 12 月办理第二届立委选举时未获党中央提名，但他们以个人资格候选均获胜利，到 1993 年 8 月 22 日正式从国民党分出，成立「新党」³²。成为国会内外的第三大党。

中止动员戡乱与废除宪法临时条款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 1948 年 4 月 18 日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作为宪法的附件。其主要内容是：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之决议，为紧急处分。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³³。其后由于事实需要，临时条款曾四次修订。第一次在 1960 年 3 月 11 日，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任期不受连任一次之限制。第二次在 1966 年 2 月 7 日，使国民大会得制定办法，于戡乱时期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究宪政有关问题。第三次在同年 2 月 19 日，授权总统设置研究机构，决定大政方针；得应需要，调整中央行政及人事机构；并可对中央公职人员订颁办法，实施增选或补选。第四次在 1972 年 3 月 17 日，扩大授权总统调整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组织，订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³⁴。

临时条款的制定和四次修订，是总统不依宪法而行使治权的唯一

³¹ 戴国辉著、魏廷朝译，《台湾总体相》，页 177-180。

³² 赵贤明，《台湾三国志》，页 143-162。

³³ 贾宗复，《中国制宪简史》，页 145。

³⁴ 薛化元主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 I，页 330，II，页 2，6，168。

根据，由此衍生了许多动员戡乱时期的法律与条规，使宪法的精神受到损伤。因此在解除戒严之后，为恢复宪政常轨，乃从废除临时条款和中止动员戡乱开始。1990年5月李登辉继任总统后，表示要在一年之内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临时条款。但增额中央民代系依据临时条款的规定而产生，国家安全会议、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系依据临时条款的授权而成立³⁵；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不得不采取修宪途径，将部分临时条款纳入宪法。1991年4月22日，国民大会完成第一阶段修宪，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4月30日，李登辉正式宣告，自5月1日起，动员戡乱时期终止、临时条款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生效³⁶。

在研议废止动员戡乱之始及废止动员戡乱以后，许多为动员戡乱所制定的法规亦加修正或废止。修正的如修正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开放曾犯内乱外患罪者参选；修正贪污治罪条例，废除对贪污罪的死刑及不得假释；修正人民团体法，政党解散改由宪法法庭处理；修正国家安全法，放宽异议人士返台限制；修正集会游行法，删除不得违背宪法的规定。废止的如检肃匪谍条例、国家总动员法、惩治叛乱条例³⁷。在此修法、废法的过程中，刑法第一百条由于语意模糊、易入人罪，亦在多方运动下废除之。刑法第一百条的原条文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后的条文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³⁸。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与政党政治的形成

在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以前，在野的势力虽能获得部分席次，对执政党在中央民意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影响不大。初时青年党和民社

³⁵ 1990年11月2日《联合报》社论，〈做好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的准备工作〉。

³⁶ 1991年4月23日《中国时报》，〈国大临时会完成第一阶段修宪〉。

³⁷ 1992年7月16日、18日《中国时报》有关新闻。

³⁸ 1992年5月16日《联合报》1版。

党常闹分裂，且靠国府发给「反共抗俄宣传费」来维持党务，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很低。在 1963-1981 年间，青年党在县市长和省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前者不超过 3.4%，后者不超过 4.4%；民社党的得票率，前者不超过 4.1%，后者不超过 0.7%。在 1969-1983 年间，青年党在立委和国代选举中的得票率，前者不超过 6%，后者未提候选人。民社党两者都不超过千分之一。但若加上无党籍者，得票率颇有可观。在 1954-1981 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以外的得票率为 21.4-40.6%；省议员选举中，国民党以外的得票率为 24.5-35.9%；立委选举中，国民党以外的得票率为 21.3%-29.3%；国代选举中，国民党以外的得票率为 20.3%-33.6%³⁹。但由于在野人士势力分散，大部分反对派的席位没有政党背景，无法实行政党政治。到新的反对势力结合为进步党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以后，乃有政党政治。

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选，包括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原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则改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后任命。延长任期将近 44 年的三类中央民意代表，于 1991 年 12 月到 1993 年 1 月间改选完成。依照 1991 年 5 月 1 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二届国代于当年年底选举产生，代表总额 327 位，其中自由地区每直辖市、县、省辖市各 2 人，但人口逾十万人者，每增加十万人增一人；自由地区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 3 人；皆由选举产生。侨选 20 人与全国不分区 80 人，采政党比例方式选出。12 月 21 日投票，选举人一千三百余万，投票率 68.32%。投票的选举，共 225 席，国民党获 179 席，得票率 71.17%；民进党获 41 席，得票率 23.94%；由民进党分出的中华社会民主党无人当选，得票率 2.18%；非政党联盟 3 席，得票率 2.27%；其他 2 席，得票率 0.44%。此外，国民党获全国不分区代表 60 席，侨选代表 15 席；民进党获全国不分区代表 20 席，侨选代表 5 席；二届国代共选出代表 325 席，加上 80 席原有的增额国代，再扣除两位当选二届国代的增额国代，代表名额共 403 人。国民党在选举中区域代表获得 179 席，全国不分区代表 60 席，侨选代表 15 席，加上 64 位增额代表，共 318 席，超过主导修宪所需的四分之三席次。民进党区域代表得 41 席，全国不分区代表 20 席，侨选代表

³⁹ 陈慧中，〈政府迁台后我国政党政治运作之研究〉（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页 131-137。

5席，加上9位增额代表，共75席⁴⁰（尚有5席增额国代未计入，属两党以外人士）。

国民大会代表全面改选并开始运作后，国府即从事立法委员的全面改选工作。据前述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二届立法委员于1993年1月底以前选出，其选举方法，自由地区每省、直辖市各2人，但其人口逾二十万人者，每增加十万人增一人；逾一百万人者，每增加二十万人增一人；自由地区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3人；侨居外国国民6人，全国不分区30人。其产生方式，除侨居外国国民及全国不分区名额采政党比例方式产生外，余由选举产生。第二届立委选举于1992年12月进行，选举结果，国民党当选73人，得票率71.17%；民进党当选37人，得票率23.94%；社民党当选1人，得票率2.18%。加上侨选代表和全国不分区代表，国民党共赢得96席，民进党50席，社民党1席，无党籍14席，共161席⁴¹。

依照前述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二届监察委员应于1993年1月底以前选出，选出之办法原规定自由地区台湾省25人，每直辖市各10人，侨居外国国民2人，全国不分区5人。但到1992年5月第二阶段修宪时，方法变更，规定监察委员29人，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李登辉于1992年12月29日向国民大会提出二届监察委员提名建议名单29人，经过审查，到1993年1月16日投票，通过25人，否决4人⁴²。

国府迁台之初的政治，原由执政党一党垄断。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国民党籍的代表和委员占绝大多数，且不改选。在野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虽在中央民意机构有少数代表，或偶在县市长和省县市议员选举中获得席次，由于人数很少，在戒严法的规范下，反对性的言论及政治活动又受限制，很难以党的政见或个人的理念影响决策。渊源于日治时期、于二二八事变后转烈的台独运动，也只能在地下活动。自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院长、继于1978年任总统期间，执政党开

⁴⁰ 1991年4月23日《中国时报》有关新闻；1991年12月22日《中国时报》1版、16版有关新闻。

⁴¹ 1991年4月23日《中国时报》，宪法增修条文全文；1992年12月20日《中国时报》2版有关新闻；1992年12月20日《中央日报》1版有关新闻。

⁴² 1991年4月23日《中国时报》，宪法增修条文全文；修改条文内容见1992年5月28日《中央日报》；1992年12月31日《中国时报》，二届监委提名建议名单分析；1993年1月17日《联合报》有关消息。

始实行本土化政策，在台、澎、金、马地区增选中央民意代表，使不少党外异议人士进入中央民意机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人士也受到鼓舞。1977年11月的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人士全岛串联，赢得4个县市长、21个省议员、8个台北市议员，使党外真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此次选举因执政党舞弊所造成的「中坜事件」，更损坏执政党的权威统治。进入国会、地方议会或出任地方首长的党外异议人士，为了突显政治号召、增加竞争能力，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即汇集了许多共同政见，利用会期中的质询、法案审查、或群众运动，谋求政见的实现，使政党政治初露曙光。在野党或在野势力的政见，在1950-1960年代是以民、青两党为主导的时期，主要是反对修宪、争取言论自由、建立选举的政党提名制度、建立超然选监机关、批判选举不公等方面，但除建立政党提名制度外，很少受到接纳。1970-1980年代民进党成立以前，民、青两党的势力已甚微弱，新兴的反对势力，如前所述，泛称为党外，其共同政见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禁止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开放党禁报禁、开放国外观光旅行、解除戒严、取消临时条款等。这些政见到民进党成立后继续推动，先后均为执政党实行，可以说是政党政治的具体表现。党外的选举号召，在1981年12月的地方选举中，提出「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在1982年12月的中央民代增补选中，激进派提出「台湾前途由台湾居民自决」的主张，台独运动逐渐浮出台面。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容纳了体制内改革（议会路线）和体制外改革（独立建国）两派，到1991年10月民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体制外改革派获胜，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1989年12月的中央及地方选举，民进党第一次在台独问题上与国民党辩论。民进党认为一个独立的台湾不致威胁到中共，中共不会也不至于冒险打台湾；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可以证实台湾人民是台湾命运的真正主宰者；一个独立的台湾可以进入联合国，重新制宪可以反映政治现实。国民党则认为1947年的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并为多数人民所拥戴，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将来可取代大陆的共产制度；独立的台湾可能引起中共的用武，且中共不会允许一省改变名称而独立，并会阻止台湾进入联合国。1991年12月国民大会全面改选，由

于国民大会的职权是制宪或修宪，民进党在政见上即以制宪对抗执政党的修宪、以人民直选总统对抗执政党的委任直选、以总统制对抗执政党的混合制、以三权对抗执政党的五权、以台湾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1992年12月的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执政党和民进党的文宣亦以统独之争为重点：_民进党主张一中一台、反对一个中国；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另外为便于台独人士返台，或在台湾公开活动，民进党于1990-1992年利用立法院及群众运动的力量，废除了惩治叛乱条例、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使宣扬台独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⁴³。

政治开放中的冲突事件

自1969年实行中央民代增补选、1972年实行中央民代增额选，反对势力在各个层面日渐活跃，常造成朝野的冲突。在诸多冲突中，以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高雄事件影响最大。1977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许信良脱离国民党竞选桃园县长，在11月19日正式投票之日，设在桃园中坜镇的一个投票所内的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许信良的监选员当场抓获，把他押送到中坜警察局。警局将之收押静候法律解决，群众不满，袭击警察局，警察开枪示警，造成一名学生死亡；于是群众占领并焚烧警局，另有八辆警车和六十辆警用摩托车被焚。此次选举，党外人士在20席县市长中获得4席，包括许信良在内；另在77席省议员中获得21席；总得票率在25%左右，是党外人士一次空前的胜利。1978年12月又有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竞选期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蒋经国总统宣布选举延期举行。1979年8月党外人士黄信介、许信良等创办《美丽岛》杂志，传扬政治理念。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在高雄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游行，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183名宪警受伤，民众受伤人数未见统计数字。事后首事诸人以叛乱罪起诉，涉案者53人，判刑者51人。施明德判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判十二年，其他数月或数年

⁴³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近代史：政治篇》第四章第二节，〈民主政治的发展〉；Ts'ai Ling and Ramon H. Myers, "Winds of Democracy: The 1989 Taiwan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 No. 4. 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新闻组，《美国中国研究论著选摘》，1990年6月25日。

不等。透过公开审判，《美丽岛》诸人充分传达他们的政治理念⁴⁴。日后的选举，不少受刑人的家属、为被告辩护的律师、和受刑人，先后登上政治舞台，部分原因基于同情，部分原因则为接受他们政治主张的人渐多。

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立国，本土化和民主化是不得不走的路。在中央政府辖区与地方政府辖区大部重叠的情形下，民主化更加强了本土化。回顾前尘，1949-1958年间，蒋介石总统一直倡言「反攻复国」；1958年以后受美国的影响，为维持台海和平，将「反攻复国」的手段改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反攻复国」为中华民国立足台湾的法理依据，一旦放弃此国策，中华民国继续维持原来体制的合法性即受到怀疑，而台独运动的威胁亦不可避免⁴⁵。1968年以后，中央民意代表开始在台湾地区增补选；李登辉任总统以后，中央民意代表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说明政府已逐渐放弃中华民国的法统。在这种情形下，李登辉不断修改宪法，使中华民国落地生根，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学者将李登辉的改革定位为「台湾化」(Taiwanisation)⁴⁶。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主张台独的政党得票继续增加，会为台湾的社会安定带来危险⁴⁷。也有的学者认为，台湾的选举使统独之争两极化，有害民主改革，而反对党以「新国家、新宪法」号召，乃革命而非改革；早年国民党以「革命民主政党」为名垄断台湾政权，今日以民主为名使台独革命合法化⁴⁸。从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三条路是比较安全的：(1) 不走独立的路，不走急统的路，但坚持最后的目标是国家统一。(2) 依据国统纲领，或其他管道，推动两岸和平交流关系。(3) 以实质外交拓展国际关系，以充足的防卫力量应付中共的威胁⁴⁹。蒋介石总统在台湾地区重建中华民国，原望早日重返中国大陆；最后中华民国却在台湾地区落地生根，并滋生与中国大陆判然不同的

⁴⁴ 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页 22-57。

⁴⁵ Steve Ts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p. 71.

⁴⁶ Hermann Halbeisem,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 Political Reform in Taiwa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p. 99.

⁴⁷ Jurgen Domes, "The Kuomintang and the Oppositio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p. 133.

⁴⁸ Fu Hu, "The Electoral Mecha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pp.167-168.

⁴⁹ Ying-jeou Ma,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Mainland: Taipei's View,"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p. 120.

花果。此种花果，前此的中国人或前此的台湾人均不曾享有；但在享有花果之余，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人民仍然忧心：如何面对统独之争、族群冲突以及两岸关系。在以选票决定是非的时代，学者的声音是微弱的。

征引书目

一 专书

-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原大战内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 ,《辽沈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 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中共祸国史实年表》(台北:中国大陆研究出版社,1982)。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内蒙古大学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重印)。
- 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
- 方正、俞兴茂、纪红民,《张学良与东北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王丰,《反攻大陆 Vs.解放台湾》(台北:希代书版公司,1995)。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王健民,《七七草》(台北,无出版年代)。

——,《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作者自印,1965)。

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总督部警察沿革志,第二编)(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王玮琦,《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

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台北:东吴大学,1982)。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无出版时地)。

史振鼎,《六十年来来的中国外交》(台北:幼狮书局,1972)。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近代史:政治篇》(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地方自治》(台中:台湾省各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71)。

——,《政治建设》(台中: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81)。

台湾时报社,《政海浮沉录:台湾省历届民选县市长沧桑史》(台北:台湾时报社,1977)。

四季出版事业编辑部编,《中国自由主义的领港人——殷海光先生纪念集》(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81)。

皮明庥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伊藤武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东京:同人社,1927)。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米暂沉,《杨虎城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行政院农业开发委员会,《中华民国农业统计要览》(1961)。

余坚,《中美外交关系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3)。

-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重印）。
-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到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宋希濂，《魔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 宋春、于文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李元平等，《台海大战》下编（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2）。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 李道合，《自由中国的进步实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0）。
- 李庆西，《段祺瑞与临时执政府时期的政局》（台中：台湾日报社，1987）。
-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重印）。
-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版，无年代）。
- 李兴华，《中国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杜聿明等，《国共内战秘录》（该书由下列各书中资料选编而成：①《辽沈战役亲历记》，北京，1985；②《淮海战役亲历记》，北京，1983；③《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1988。三书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所载皆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台北：巴比伦出版社，1991）。
- 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
-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1995）。
- 周琇环编，《台湾光复后美援史料》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95）。
- 周开庆编，《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 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于凭远等编纂、叶霞翟校订，《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

- 务印书馆，1980)。
-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华冈出版部，1976)。
- 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 林载爵译、Feuerwerker 著，《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
- 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1991 四版)。
- 空军总司令部编，《美军在华空军纪实：空军顾问组》(台北：空军总司令部，1981)。
- 邱胜安，《台湾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
-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三版)。
-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 台五版)。
-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1)。
- 施家顺，《两广事变之研究》(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
- 胡光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茅家琦主编，《八十年代的台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台湾三十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国共空中武力》(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6)。
- ，《国共飞弹竞赛》(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5)。
- ，《透视台湾防御》(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4)。
- ，《透视封锁台湾》(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5)。
- ，《透视国共攻防》(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6)。
- ，《透视国共军力》(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6)。
-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7)。
- 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台北：作者自印，1981)。

- 孙观汉编，《柏杨的冤狱》（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
- 徐焰，《台海大战》上编（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2）。
-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 ，《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社，1984）。
- 高殿均，《中国外交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52）。
-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内政志》（台北：国史馆，1992）。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 1-6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1）。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 7-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1）。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2 年 1-6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1）。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2 年 7-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1）。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3 年 1-6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2）。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3 年 7-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2）。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 年 1-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1）。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15 年 1-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78）。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2 年 7-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9）。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3 年 7-12 月份（台北：国史馆，1989）。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 46 年 7-9 月份（台北：国史馆，1992）。

- ，《先总统蒋公年谱初稿》（油印本）（台北：国史馆，无年代）。
- ，《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台北：国史馆，1979）。
- ，《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台北：国史馆，1982）。
- 国民大会编，《国民大会统计汇报》（台北：国民大会秘书处，1978）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中日战争史略》（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2）。
- ，《俞大维先生年谱资料初编》（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6）。
- ，《台湾安全的剖析与展望》（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
- 国防部编，《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国防报告书》（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
-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1977）。
- ，《现代中国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
- ，《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
-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 《——，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张玉法、沈松侨访问，沈松侨记录，《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记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台北：正中书局，1961 台三版）。
-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1989）。
- 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 梁敬鎔，《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8 四版）。
- ，《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 许士杰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6）。
- 许师慎，《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
- 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

1985)。

- 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香港：龙门书店，1973）。
- 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73二版）。
-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重印）。
- 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
- 陈阳德，《台湾地方民选领导人物的变动》（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8）。
- 陈楚君、俞兴茂，《特工秘闻——军统活动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 陈鹏仁译，《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
- ，《日本侵华内幕》（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6）。
- 傅正主编，《雷震回忆录》（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
- 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9）。
-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作者自印，1957）。
- 彭明，《「五四」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
-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 揭钧，《小兵之父》（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91）。
- 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项昌权，《台湾地方选举之分析与检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重印）。
- 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 ，《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 董世桂、张彦之，《北平和谈纪实》（北京：新华书店，1991）。
- 贾宗复，《中国制宪简史》（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
- 邹文海，《台湾省地方选举的研究》（台北：环宇出版社，1973）。
- 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
- 闻少华，《汪精卫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 赵天仪编，《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台北：花孩儿出版社，1979）。
- 赵永茂，《台湾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之关系》（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8）。
- 赵伏云，《台湾军事备忘录》（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6）。
- ，《国共海上战力》（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86）。
- 赵贤明，《台湾三国志》（台北，1995）。
- 刘心皇辑注，《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
- 刘廷功，《历史的烙痕》（台北：作者自印，1989）。
- 刘健清、刘庆楚、邓丽兰，《蒋介石与胡适》（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55）。
- 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 刘翊伯，《徐蚌大会战》（台北：护幼社，1990）。
-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重印）。
- 刘毅夫，《风雨十年——一个战地记者的见证》（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2）。
-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 蔡国裕，《中共党史》第1册（台北：国史馆，1988）。
- 蔡静仪译，P. M. Coble, Jr. 著，《金权与政权——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1）。
-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1981）。
-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 郑学稼，《我的学徒生活》（台北：帕米尔书店，1984）。
-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
- 萧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 薛化元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台北：国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
- 丛乐天等编，《回顾金门登陆战》（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蓝博州，《白色恐怖》（台北，1993）。
-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二 论文

- 丁力之，〈敬悼李延年将军〉，《山东文献》1卷1期。
- 丁永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 丁金平等，〈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纪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 于子桥、施乐伯，〈外力与中华民国之创建〉，《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 〈大江东流挡不住〉（社论），《自由中国》23卷5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计划研究报告：总论——经济的现代化〉，未刊稿。
- 尹世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江西人大工作》（南昌，1991年10月）。
- 卞直甫，〈论张作霖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丛刊》（沈阳），1991年第2期。

- 方敏,〈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
- 方庆秋,〈福建事变述论〉,《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 王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各中间党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0年3月。
- 王少南,〈禁书要禁得合理〉,《自由中国》12卷11期。
- 王幼华,〈台湾史异论〉,《自由时报》副刊,1992年1月3日、4日。
- 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1997年6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
- 王成勉,〈马歇尔与中国第三党派〉,《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 王自成、胡新民,〈陕边区历史简述〉,《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 王志民,〈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1938-1949)〉(1996年6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王宗荣,〈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与总统副总统选举〉,《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 王宗荣,〈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
- 王建邦,〈请政府切实保障人权〉,《自由中国》19卷11期。
- 王健英,〈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
- 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影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
- 王荣,〈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2期。
- 王维礼,〈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王树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评述〉,《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增刊。
- 王树槐,〈国会问题与南北和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台

- 湾商务印书馆，1986)。
-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山东文史集粹》军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史会来，〈抗战时期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 〈民主的成长〉，《亚洲人》2卷1期，1981年12月。
- 白蕉，〈宣统复辟〉，《人文月刊》6卷6期、7期。
- 白蕉，〈学运与学潮的历史观〉，《人文月刊》4卷3期。
- 石仲泉，〈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
- 石融，〈中国的国歌考〉，《自立早报》，1988年11月3日。
- 任学岭，〈浅谈区的三三制〉，《延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 向阳，〈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 曲青山、田常春，〈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间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 曲家源，〈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历史的选择过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
- 朱仁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 朱美琴，〈抗战初期陶德曼「调停」始末〉，《南通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 朱高影，〈三民主义青年团之研究（1938-1947）〉（1992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朱汉国，〈宋庆龄为捍卫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学术月刊》，1986年第9期。
- 朱德新，〈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
- 江峡、曾成贵，〈论抗战时期我党对中间派的态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 臼井胜美作、陈鹏仁译，〈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没落〉，《近代中国》

77-86 期。

艾多，〈试论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变化发展及其历史经验〉，《东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 年第 6 期。

何志功，〈关于 1945-1949 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及若干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3 期。

何步兰，〈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人文杂志》，1986 年第 6 期。

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北京），1988 年第 3 期。

——，〈1945-1949 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何烈，〈民初中英西藏交涉〉，《史原》1 期。

何纯武，〈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展开及其前途〉，《光华大学半月刊》5 卷 1 期。

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

余伯流，〈中央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述略〉，《江西社会科学》（南昌），1985 年第 4 期。

吴小松，〈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吴相湘，〈八年抗战的重要会战〉，《明报月刊》139 期。

吴景平，〈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吴新兴，〈美国因素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与评估〉，《近代中国》87 期。

吴筠，〈中国共产党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运动〉，《龙江党史》，1990 年第 3 期。

吴汉城，〈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浅析〉，《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 1 期。

吕士朋，〈民国二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经纬〉，《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

- 第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
- ，〈娜拉出走以后——五四到北伐青年妇女的活动〉，《近代中国》93期。
- ，〈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光复〉，《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 吕玲玲，〈国民政府工业政策之探讨（1928-1937）〉（1994年6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宋长志，〈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近代中国》60期。
- 宋玮明，〈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 〈抗战时期「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之经过〉，《近代中国》72期。
- 李天民，〈抗战时期中共诡谲的统一战线策略〉，《近代中国》53期。
- 李冬春，〈抗战初期鲁西北抗日局面的开辟〉，《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 李仲英，〈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哲社版》，1981年第5期。
- 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中华学报》2卷1期。
- ，〈民六政潮与南北分裂〉，《史学汇刊》7期。
- ，〈民初之国会与党争〉，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5集（台北：文星书店，1964）。
- ，〈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近代中国》42期。
- ，〈国父护法与广州军政府之成立〉，《中华学报》4卷2期。
- 李良志，〈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 李良志、高向远，〈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关于白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 李长贵，〈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近代中国》35期。
- 李茂盛、宋捷燕，〈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转变〉，《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东方杂志》44卷2号。

- 李崇道，〈中华民国农业技术援外的发展与成就〉，《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 李国祁，〈清末民初闽浙地区人口流动与都市化的演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李巽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评述〉，《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 李云峰，〈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及其特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近代中国》87期。
- ，〈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过程及其组织精神〉，《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学报》4卷1期。
- ，〈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李晓明，〈蒋介石退保台湾的方针与政策措施简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1月。
- 李樾、于吉楠，〈回顾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 杜海荣，〈马占山将军在绥远抗战的前前后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2辑。
- 沙健孙，〈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
- 沈云龙，〈黄郛摄阁的前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60）。
- 沈德海，〈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罪恶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
- 汪朝光，〈略论民国初年的中俄外蒙交涉〉，《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
- 汪新民，〈请政府在出版界放条生路〉，《自由中国》20卷8期。
- 汪维苞、韩希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区简介〉，《历史教学问题》（华东师院），1986年第2期。

- 汪学文，〈中共窃据大陆以前策动学潮之始末〉，《近代中国》32期。
- 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亚洲人》1卷1期。
- 周子信，〈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
- 周弘然，〈北伐训政时期的民主运动〉，《幼狮学志》2卷4期。
- 周桐，〈续谈国歌一百年〉，《中国时报》，1988年10月5日。
- 奇天祥，〈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挺进军〉，《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2辑。
- 易豪精，〈试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 林秀美，〈魏德迈调查团与中国〉，《近代中国》69期。
- 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
- ，〈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期。
- 林金德，〈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
- 武文斯、李继民，〈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谈判与中国民主同盟〉，《蒲峪学刊》，1988年第1期。
- 武锦莲，〈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 初晓，〈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辽宁师范学报》，1983年第3期。
- 邵玉铭，〈马歇尔使华再评估〉，《近代中国》46期。
- 邵重生，〈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 邵毓麟，〈抗战前后敌我若干重要策略之检讨〉，《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4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
- 邵鹏文、郝英达，〈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
- 金再及，〈试论八七会议到「六大」的工作转变〉，《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民国档案》，1988年第1

期。

金达凯，〈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53期。

侯坤宏，〈中华民国国歌史料选辑〉，《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期。

姜平、高华，〈救国会派在八年抗战中的抗日民主运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姜爱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洪万辰、胡华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

〈为《自治》半月刊横遭查扣而抗议〉（社论），《自由中国》18卷1期。

胡元利，〈五四爱国运动中农界的表现〉，《党史研究》（北京），1986年第1期。

胡平生，〈梁启超之讨袁护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2期。

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

胡德坤，〈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胡兴梅〈建国大纲与我国政治发展〉（1985年6月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56年第4期。

郅玉汝，〈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7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

唐继革，〈论国共隔海对峙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3年第3期。

夏盛元，〈论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绍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评述〉，《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孙彩霞，〈反蒋扩大会议述评〉，《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孙学筠，〈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协同作战〉，《上海师范大学

- 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
- 孙礼明，〈李宗仁与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
- 容鉴光，〈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国》77期。
- ，〈抗战时期的兵役制度〉，《近代中国》60期。
- 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5期。
-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 桂崇基，〈清党运动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2期。
- 栗国成，〈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民主建设〉，《近代中国》19期。
- 秦英军，〈试析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 笑看天，〈回顾近年中央民代选举〉，《新中华》，创刊号（1980年6月）。
- 索世晖、郭德宏、冯都，〈中央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 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 郝秋阳、田春发，〈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与学生运动〉，《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4期。
- 马起华，〈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近代中国》35期。
- 马寅初，〈如何提倡中国之工商业〉，《上海商会月报》5卷7期（1925年7月）。
- 高育仁，〈台湾地区地方自治的发展〉，《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 高峻，〈试论抗战前夕国共关系中的三大关键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 蕙逢知先、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17期。
- 〈做好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的准备工作〉（社论），《联合报》，1990年11月2日。
- 〈国民政府筹备宪政经过报告〉，《近代中国》4期。
- 娄平，〈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战场是特殊战略进攻〉，《南开学报：

- 哲社版》，1991年第5期。
- 张水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对德外交政策〉，《近代中国》39、40期。
- 张玉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改良〉，《史学评论》第1期。
- ，〈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对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期。
- ，〈二次革命的根源〉，《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 ，〈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期。
- ，〈民国初年的内阁〉，《复兴岗学报》14期。
- ，〈民国初年的国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期。
- ，〈吴凤的历史地位〉，《国立编译馆馆刊》18卷1期。
- ，〈从戒严到解严的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天〉，《自立晚报》，1987年7月20日。
- ，〈清末民初的外资工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期。
- 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
- 张兆本，〈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
- 张旭成、拉沙特，〈如果中国跨过台湾海峡国际间将作何反应〉，《自由时报》，1993年4月26日。
- 张圻福，〈国民党改组派探析〉，《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5年第6期。
- 张宏志、陈英，〈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转变〉，《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 张廷贵，〈解放战争概述〉，《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4期。
- 张朋园，〈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期。
- 张信吉，〈云林武装革命事件三十周年〉，《自由时报》，1991年9月

20日。

张俊宏，〈二十五年来台湾选举史的检讨〉，《今日府会杂志》第554号（1978年2月1日）。

张建邦，《蒋中正先生与台北市政》，《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张昭然，〈大陆逆转前后国军在浙江沿海岛屿的经营〉，《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东方杂志》25卷15号、16号。

张梅玲，〈简论一九三六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学术界》，1987年第6期。

张淑雅，〈韩战期间美国对台军援政策初探〉，《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张雅丽，〈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张慧安，〈陈诚与台湾土地改革〉（1983年6月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从《自由人》被扣谈到《自由人》停刊〉（社论），《自由中国》21卷8期。

〈从宪法保障人民身体之自由说到取缔流氓办法〉（社论），《自由中国》19卷12期。

曹力铁，〈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曹伯一，〈抗战中期中共策略路线之剖析〉，《近代中国》2期。

梁敬鎔，〈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

毕健忠，〈全国解放战争战略指导新探〉，《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

4 期。

〈异哉！所谓「台湾问题」〉（社论），《自由中国》3 卷 6 期。

盛雪芬、车树实，〈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民众救亡会〉，《沈阳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庄明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学历史》，1985 年第 4 期。

许主冠，〈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895-1984）〉（1985 年 6 月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

郭文亮，〈国民党改组派性质新探〉，《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 年第 1 期。

郭恒钰，〈评介「李德回忆录」〉，《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5 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

郭为藩，〈九年国民教育十年有成〉，《近代中国》8 期。

郭婉容，〈光复后的台湾经济发展〉，《近代中国》49 期。

郭德宏、梁尚贤，〈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陈三井，〈中国国民党民国三十九年之改造与台湾新政〉，《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台湾光复的序曲：复台准备与接收〉，《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陈文等，〈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 年第 4 期。

陈世璨，〈台湾之农业〉，《自由中国》5 卷 1 期。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2 期。

陈立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背景、经过及其检讨〉，《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

陈春生，〈苏俄对外蒙古独立之关系〉，《东方杂志》复刊 10 卷 11 期。

陈哲夫，〈蔡元培先生的政治思想评析〉，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北京，1989）。

陈绍武，〈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关系〉，《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 陈富华，〈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1990年6月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云腾，〈民国以来之西藏交涉〉（1977年6月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瑞云，〈抗日战争中国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3期。
- 陈庆，〈重庆会谈〉，《近代中国》57期。
- 陈慧中，〈政府迁台后我国政党政治运作之研究〉（1988年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麟辉，〈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 陶文钊，〈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 陶希圣，〈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论〉，《近代中国》48期。
- 章克昌，〈试论汪精卫通敌卖国之原因〉，《江西农业大学学报：哲社专辑》，1986年。
- 傅乐成，〈近代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7集。
- 彭秀珍，〈试述抗战时期我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与贡献〉，《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
- 彭承福，〈周恩来在重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 彭敦文，〈试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
- 曾景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研究〉，《江西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曾庆榴，〈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理论与教学》，1986年第6期。
- 程中原，〈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瞭望》，1990年第35期。
- 华飙等，〈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6期。
- 贺凌虚，〈民初的监察制度〉，《近代中国》91期。
〈民初政府体制的变革〉，《近代中国》82期。

- 项迺光，〈中共对抗日战争之利用及其势力之发展〉，《近代中国》78期。
- 冯明珠，〈中英西姆拉会议〉，《思与言》16卷3期。
- ，〈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近代中国》58期。
- 冯都，〈第一次反围剿十个问题考辨〉，《争鸣》（南昌），1985年第1期。
- 黄少群，〈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述略〉，《历史教学》，1986年第6期。
- 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4期。
- 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
- 杨承厚，〈六年来新台币制度之检讨〉，《自由中国》13卷12期。
- 杨森，〈吴玉帅与我〉，《中外杂志》7卷4期。
- 杨勤为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 杨荣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 杨锡福，〈台湾的地理〉，《自由中国》6卷8期。
- 叶石涛，〈一九四五台湾文学「忌」要〉，《自由时报》副刊，1992年10月23日。
- 叶志麟，〈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经验〉，《杭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
- 叶伟濬，〈马歇尔使华时期美军陆战队在华行止之研究〉，《近代中国》64期。
- 叶万安、石齐平，〈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近代中国》33期。
- 叶赓勋，〈台湾光复后民主宪政的成长过程〉，《近代中国》49期、50期。
- 葛定华，〈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 贾维，〈试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高潮〉，《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 雷正良,〈中华苏埃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
- 雷震,〈驳斥党报官报的谬论和诬蔑〉,《自由中国》23卷4期。
- 雷兴长,〈1905至1927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活动试析〉,《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
- 筱虹,〈试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 靳德行、翁有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 〈对盲目检扣书报的抗议〉,《自由中国》17卷3期。
- 廖盖隆,〈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1期。
- 漆琪生,〈中国赤区的土地政策〉,《新中华杂志》2卷10期。
- 熊伯履,〈五五宪草之认识及展望〉,《河南大学学术丛刊》1期。
- 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年)〉,《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 〈与陈兼院长论反对党〉(社论),《自由中国》23卷1期。
- 赵三军、邓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红军长征〉,《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 赵尺子,〈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国边政》36期。
- 赵玉珍,〈浅谈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及意义〉,《锦州师范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
- 刘世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学报》4卷1期。
- 刘沛汉,〈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
- 刘邦厚、斐林,〈评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
- 刘庭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设置殖民统治伪政权机构简况〉,《历史教学》,1983年第10期。
-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
- 刘健清,〈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泛起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建立〉,《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
- 刘遐龄,〈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的中共策略〉,《近代中国》57期。

- 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 ，〈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90期。
- ，〈整编陆军抗日御侮〉，《近代中国》47期。
- 刘德喜，〈战后初期苏俄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1年第1期。
- 刘显才，〈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
-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 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 〈澎湖冤案重要文件〉，《山东文献》15卷3期。
- 潘荣、萧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 蒋永敬，〈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抗战建国〉，《近代中国》92期。
- ，〈抗战时期中共问题〉，《近代中国》4期。
- ，〈孙中山〉，见王寿南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5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 ，〈准备北伐中掀起的黄埔，2潮〉，《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卷10期。
- 蒋立峰，〈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 蔡国裕，〈抗战时期的中共〉，《近代中国》83期。
- ，〈抗战期间中共的阴谋与活动〉，《近代中国》72期。
- 〈美国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与检讨〉，《近代中国》33期。
- ，〈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之经过〉，《近代中国》79期。
- 卫惠林，〈台湾的土著族〉，《自由中国》6卷9期。
- 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失败〉，《历史教学》，1983年第2期。
- 郑会欣，〈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

- 郑德荣,〈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吉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 郑学稼,〈瞿秋白的一生〉,周阳山、杨肃献编,《社会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
- 邓春阳、金竹安、刘敬坤,〈北京政府时期全国行政区沿革概况〉,《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第2期。
- 鲁振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种土地主张评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6期。
- 〈凭什么查扣《自由人》〉(社论),《自由中国》21卷1期。
- 萧平,〈冀中抗日根据地6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溯。
- 萧牲,〈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和策略〉,《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 萧牲、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 萧学信,〈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 赖啓,〈台海战争述略〉,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2)。
- 赖泽涵,〈陈仪与闽、台、浙三省省政〉,《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 钱之光,〈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 阎景堂,〈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 薄庆玖,〈三十年来台湾省地方自治组织〉,《近代中国》17期。
- 谢忠厚,〈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 谢刚,〈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理论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6期。
- 钟山、云新,〈第三次反围剿始末〉,《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82年增刊。
- 钟肇政,〈反共?还是反扑?四十年来的白色文艺政策〉,《自由时报》

副刊，1992年10月24、25日。

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韩荣璋、萧裕声、杜魏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始末〉，《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韩荣璋、张日新，〈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韩静兰，〈抗战前后中央政府与四川的军政关系（1935-1949）〉（1993年6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魏宏运，〈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魏良才，〈马歇尔与所谓国共和谈〉，《近代中国》46期。

罗正楷，〈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

罗志渊，〈论施政五十天的唐内阁〉，《政治学报》1期。

罗若湘，〈中华革命党与讨袁之役〉，《近代中国》22期。

罗应荣，〈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1905年至1917年）〉，《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报》2期。

关中，〈战时国共商谈〉，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

严昌洪，〈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听！听！那肃杀的白色恐怖：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事件善后事宜处理公听会记录〉，《海峡评论》第32期。

三 报刊、年鉴

《中央日报》，1990年3月22日；1992年5月28日，12月20日。
《中国时报》，1985年11月17日；1986年12月7日；1989年12月3日；1990年3月23日；1991年4月23日，12月22日；1992年7月16日，7月18日，12月20日，12月31日；1993年6月13日，6月15日。

中华民国年鉴社编辑，《中华民国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88-1992）。
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编印，《台湾省统计要览》23期（1964）。

外交部外交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外交年鉴》（台北：外交部，1989）。

外交部外交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八、七十九年外交年鉴》（台北：外交部，1990）。

外交部外交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年外交年鉴》（台北：外交部，1991）。

《自由时报》，1983年12月4日；1993年5月17日，6月13日，6月14日，6月16日，6月17日，6月18日，6月20日，6月23日，7月12日，7月26日；1997年1月2日。

《自立晚报》，1983年12月4日。

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宣统三年中国年鉴》（原名《支那年鉴》）（台北：天一出版社，1973年重印）。

《首都早报》，1990年2月16日。

陈正茂编，《醒狮周报》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93重印）。

《联合报》，1986年12月7日，1992年5月16日，1993年1月17日。

四 英文资料

Adshead, S. A. M., *The End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94-1924* (London, 1973).

- Beasley, W. G.,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New York, 1963).
- Chang, Yu-Fa, "Societ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90s-1980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Vol. XIX.
-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ur Forc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 D. Cowan,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964).
- Chien, Frederick F., "A View From Taipei",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5 (Winter 1991-1992).
-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opper, John F.,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Westview Press, 1992).
- Domes, Jurg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Opposition ",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reyer, June Teufel, *Taiwan in 1989: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erkeley, 1990).
- Ebenstein, William, *Today's Is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Gibert, Stephen P.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eds., *American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89).
- Hacker, Louis M.,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65* (New York, 1949).
- Halbeisem, Hermann,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 Political Reform in Taiwa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1992).
- Hsu, Immanuel C. 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u, Fu, "The Electoral Mecha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 Since 19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Isaacson, Walter, *Kissinger* (New York, 1992).
- Lu, Ya-li,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Lui, Fei-lung,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Ma, Ying-jeou,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Mainland: Taipei's View,"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osher, Steven 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mocratic Friends, Strategic Allies, and Economic Partners* (New Brunswick, 1992).
- Murphey, Rhoad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3).
- Paau, Danny Shiu-Lam, *The Issue of Taiwa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Roots of Bitterness and Controversies* (Hong Kong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0).
- Simon, Denis Fred and Michael Y. M. Kau, eds.,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1992).
- Sutter, Robert G., *Taiwa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88).
- The China Year Book*, 1912
- Ts'ai, Cheng-W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st Europe: Past and Future; , The Fifth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September 1-5, 1988, Taipei).
- Ts'ai, Ling and Ramon H. Myers, "Winds of Democracy : The 1989 Taiwan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XXX, No.4.
- Tsang, Steve, "Chiang Kai -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K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Tucker, Nancy Bemkopt, "China and America, 1941-1991,"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 (Winter1991-1992).

Tung, William L.,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Modern China* (The Hague, 1968).

Wang, Yu-S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Unorthodox Approach* (New York, 1990).

Wong, J. Y.,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人名及重要名词索引

一划

一二九运动 287
一二八事变（一二八战役）
210,214,233,256,257,282,288,2
90,304,305,354,382
一江山战役 501
一号作战 403,428
一党训政 216
一党专政 215,216,348,467,547

二划

二二八事件（武装暴动）
440,521,537,538,550,611,615
二五减租 167,340
二次世界大战
380,428,450,537,574,577,584,5
86
二次革命 12,49,67-74,87,93
十三省区联合会 105
丁超 411
丁士源 116
丁世峰 102,103
丁默村 357,358,362,367,373

七七事变（七七抗战）
205,272,276,304,329,351,370,3
71,374-377,379,412
七省攻守同盟 105
九一八事变（沈阳事变）
3,10,14,190,208,212,213,215,22
4,233,237,250,251,253,255,256,
258,260,272,282-
285,288,294,304,305,351,353,3
54,370,374,379,411

九三炮战 563
九三学社 321,341,467
九国公约 266,396
八一宣言 306
八一三战役（上海战役）
310,354,370,391
八二三炮战（金门炮战）
498,502,507,509,510,511,529,5
60
八国联军 9,22,23,33,34

三划

三七五减租 521,531

三 民 主 义

3,4,16,17,29,147,149,150,157,1
61,164,166,167,172,195,202,20
6,209,213,216,309,310,313,314,
321,322,329,332,333,335,342,3
43,346,357,363,365,439,546,59
5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

341,467,471

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326-
328

三多 84

于方舟 158

于右任 297,479,524,593

于树德 158,159

于 学 忠

230,232,244,259,263,264,277,2

94,307,322,330,386,387,390,41

7,419,426

土井市之进 97

土 肥 原 256,263-
266,269,274,352,353

工党 597,609

大月桂 262

大东亚共荣圈 381

大仓喜巴郎 97

大陆政策（日）250,371

大隈重信 96

上官云相 236,237,386

上海协定 272

川口清健 262

川島浪速 92,97

川樾茂 272,275,276

小池 95

小幡酉吉 98

久原房之助 97

己未俱乐部 116

四划

方毅 313

方志敏 217

方振武 180,181,210,226,288-290

文重孚 395

文学社 25,26

王英 281

王毅 416

王震 406,427

王一亭 144

王士珍 105,106,128

王天纵 112

王世杰 322,326,346,349,435,464

王以哲 253,259,295,307

王永泉 121

王永庆 532

王正廷 61,66,283

王占元 113,117,118

王汝贤 111

王仲廉 386

王再袭 539

王克敏 263,268,351,356-358

王法勤 206

王芝祥 64,68

王承斌 119-121,123,129
王叔铭 474
王金钰 236
王炳南 296
王若飞 350,465
王建安 491,495
王家烈 241
王家襄 120
王陵基 387,402,486
王造时 343,348
王健民 550
王荷波 159
王揖唐 116,129,130,357,365
王登云 157
王敬久 387,391
王铭章 393
王荫泰 362,367
王乐平 206,208
王晓波 542,545
王晓籁 284
王树常 232
王礼锡 211
王 宠 惠
 56,80,199,203,264,308,355,524
王怀庆 120,121,123
王耀武 388,409,473,474
王缙绪 387
天羽英二 266
五三惨案 10,182,251,252
五 卅 运 动
 10,13,139,140,143,144,146,159,

161
五卅惨案 127,130,170,212
五四（五四运动）
 5,10,16,38,114,116,118,136,138
 ,139-145,149-152,154,186,213
五族共和 9
五权宪法 3,4,43,73,157
不 平 等 条 约
 6,9,11,32,126,161,197,211,250,
 271,292,321,360
太平军 12,20,21,33
太平天国 33,34
太 平 洋 战 争
 6,372,373,375,376,380,381,385,
 402,403,421,432,434,436,446
尹仲容 532,533
尹昌衡 89
巴布札布 97,107
巴黎和会 10,135,142
孔祥熙 193,298,299,328,548
日俄密约 80,94,250
日俄战争 88,94,250
日置益 95
中山洋一 260
中山舰事件 163-165,172,176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0,79,92,251
中央研究院 7,8,199
中央俱乐部（CC派）
 205,327,464,594
中共（中国共产党,共产党）
 3,6,8,10,11,12,15-

17,127,128,138,146-149,151-
162,164-168,170,172,174-
176,178,179,182-
184,194,198,200,201,207-
214,217-222,233,234,238-
242,246,247,252,253,256,267,2
72,273,282-287,290,292,295-
300,304,323,325,327,333-
339,341,342,344-
352,374,378,385,420,423-
427,432-
450,452,458,460,462,472,475,47
7,479-481,489,490,498,503-
505,508-
510,512,520,522,525,527-
529,531,537-
539,549,554,556,458,259,561,56
2,568-573,575-584,586-
588,591,596,597,616,617,619
八七会议 220
国际派 315
中村震太郎 252
中美所 333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502,504,509,512,528,556,559,5
62,576,577
中美关系白皮书 436,446,503,525
中英西藏交涉 79,88
中俄蒙古交涉 79,83
中宫悟郎 521
中原大战
3,14,208,212,230,232,234,287,2
90,294
中原会战 405
中国人民救国会 346
中国文化建设学会 206
中国文化学会 206
中国少年共产党 153
中国民主正义党 609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349-35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320,340,345-
348
中国民主党 595
中国民众党 609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223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222,223
中国社会党 47
中国自由党 609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17,594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
340,343,464,467,471
中国国民党革命促进会（民革）
471
中国国民党宣言 157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208-
211
中国门户开放政策 33
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 214
中国国难救济会 215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216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 340,343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

211,212,340,341,345
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 45,71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204,233
中华民国宪法 41,442
 临时条款 6,8,524,594,611,612
 增修条文 612,614,615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
 204
中 华 革 命 党
 40,73,74,77,97,149,152,186
中华革命党（第三党，1927） 209
中华教育改进社 216
中华农工党 210
中华农民劳动党 210
中华职业教育社 215,320,345
中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
 17,33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308,310
中 苏 友 好 同 盟 条 约
 323,435,447,449-
 451,453,464,580
内田良平 95
内河航行权 32
毛子水 545
毛炳文 237,384
毛 泽 东 147-
 149,158,159,167,183,217,218,2
 3435,238,240-
 247,282,295,298,306-312,314-
 316,321,323,333-
 335,337,339,349,350,375,378,4

20,429,433,434,437-439,446-
450,453,459,461,463,464,475,5
05,508
反帝制运动 12,74,75
今井武夫 355,372
公民团 121
公民党 70
公地放领 531
公秉藩 236

五划

立宪派 63
平民教育派 216
平津战役 479,480,483,484
平型关之役 312,420
甘乃光 208
甘乃迪 577
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72,75
古应芬 233
本庄繁 258,352
永津佐比重 260
左权 338
左舜生 312,341,344-346,348-350
石觉 480,495,497
石 友 三 227-
 233,275,313,317,377,414,418,4
 19
石本权太郎 258
石星川 112
石原莞尔 253,371
石敬亭 227

石静宜 523
 布立吉 (Style Bridge) 445
 布里辛斯基 579
 布勃诺夫 (Alexandre Bubnov) 165
 戊戌变法 22,52,105
 民友社 109
 民主主义 20,37,148,205,214
 民主同盟 (民盟) 348,437,439-442,463,466-471
 民主建国会 320,464,467,471
 民主宪政促进会 347
 民主党 63,65,66,70
 民生主义 22,73,150,166,362
 民社 63
 民 社 党
 441,464,470,472,594,605,613,615
 民 族 主 义
 150,166,214,362,382,429,456,518
 民进党 (民主进步党)
 596,606,608-610,614-617
 民权主义 22,73,150,166,362
 尼克松 556,578,579,609
 尼克森主义 556
 司徒美堂 343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440,441,444,445,447,469
 加伦 (Galen) 165
 卡特 579
 北四行 139
 北平研究院 7
 北 伐 2,10,13,14,16,4
 (M2,62,102,119,122,124,134,135,141,144,146,147,152,155,159,160,163-165,167,172,173,175,177-182,184,186,194,197,201,202,205,206,224-226,229,251,275,290,294,434
 北 京 政 府
 2,4,6,7,10,13,16,40,49,86,109,110,113,114,117,134,160,169,194,195,197,198,268
 北洋军 34,111,275
 甲午战争 (中日战争) 9,21-23,28,33,34,94,250,372,518
 田中内阁 (日) 251
 田代皖一郎 275
 田桐 72
 史良 312,342,344
 史汀生声明 255
 史迪威 (J. W. Stilwell)
 323,382,383,407,408,432,434,437
 史坚如 22
 史 大 林 (Stalin)
 164,221,381,383,433,436,447-449,454,464
 史慕德 (Roland N. Smoot) 510
 矢田七太郎 97
 白色恐怖 534,538,542

白蕉 143
白里安 (Bryan) 82
白 崇 禧
171,174,175,177,178,181,182,2
08,225,226,228,238,241,293,29
4,297,307,312,313,329,412,427,
476,478,480,482,483,485
白坚武 154,155,268
白话文运动 151
白逾桓 263
台儿庄战役 312
台海战争 506,557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611
台湾文化协进会 538,550
台湾文化协会 518
台湾民主国 518,551
台湾民主独立党 611
台湾再解放同盟 611
台湾革命同盟会 519
生产人民党 211

六划

东征军 171
江亢虎 47,357,367
江朝宗 105,106
江鹏坚 606
安福系 115-117
安福国会 116,118,120
安福俱乐部 116
交通系 107,115,116,118
寺内正毅 107

寺内寿一 389
吉田茂 251
吉星文 507,560
吉鸿昌 288,290
地方主义 550,551
好人政府 199
托洛斯基 221,222
托派 (托洛斯基派) 22-
223,334,341
西山会议 (派)
162,163,166,167,170,176,179,22
5,229,231
西方企业公司 499
西北军 11,14,1301,307,308,363
西 安 事 变
1247,272,2273,276,277,282,283
,287,297-299,301,308,309,355
西南政务委员会 14,192,293
西原龟三 107
西义显 355
西园寺内阁 79
共和建设讨论会 62,63
共和党 63-66,70
共 产 主 义
151,153,155,163,166,205,212,2
13,316,333,538,546
共产主义青年团 138
共 产 国 际 11,153-
157,252,296,298,299,304,308,3
09,334,371,373
共进会 25,26

- 世界主义 151
列宁 153-155
列 宁 主 义
147,148,152,211,222,539
百团大战 421
有吉明 264,265,271
有贺长雄 96
艾奇逊 (Dean Acheson) 526,576
艾森豪 499,507,558,576,577
光复会 24,25
光绪皇帝 22,28,330
同 盟 会 24-26,39,40,56,62-
65,68,168,186,188,203
曲同丰 117
朱深 358
朱瑞 69
朱 德
183,217,218,234,235,238,240,2
41,243-
246,298,310,312,320,330,334,3
35,337,350,377,386,420,448,46
4
朱和中 26,153
朱家骅 316,326,483
朱致一 495,497
朱理治 307
朱 培 德
169,171,173,174,180,226,294
朱启钤 114-116
朱 绍 良 235-
238,244,330,386,387,391,481-
483,486
朱葆三 144
朱尔典 (Jordan) 28,83,89,98
朱庆澜 108-110
朱怀冰 317,418
朱霁青 206
多田骏 269,274-276
自由主义 37,38,147,151,198-
200,205,546
自强运动 21
休根森 299
伍廷芳 89,104,105,109,110
伍朝枢 119
伊集院彦吉 79,82
伊藤博文 22
任卓宣 153
任援道 363,373
任弼时 335,338
向忠发 333,334
向警予 153,159
全国抗日救国会 283
全国学生联合会 142,143
牟中珩 414,474
- ## 七划
- 汪大猷 515
汪日密约 357
汪政权 (汪精卫政权) 3,359-
366,370,372,373,380,411,421
汪 精 卫 (兆 铭)
14,28,62,121,157,161-

164,168,170,176,178,179,182,1
86,188,190,203,206-
208,225,226,230,231,233,237,2
55,257-
259,264,289,292,299,325,351,3
54-363
沈崇 442,470
沈定一 157,158
沈昌焕 593
沈恩孚 41
沈发藻 483
沈 钧 儒
312,342,344,346,348,466,472
沈泽民 159
沈鸿烈 123
沙千里 342
沙王 279,280
沙克都尔札布 281
沙基惨案 170
冷遹 350
成舍我 544
辛 亥 革 命
9,12,39,67,74,75,81,111,140,26
5
宋恕 52
宋 子 文
195,258,259,265,300,301,309,3
23,433,435-
437,439,454,458,548
宋子良 372
宋子扬 124
宋克宾 415
宋希濂 391,392,478,482,486-488
宋美龄(蒋夫人) 299-301,523,548
宋 哲 元 288-
290,297,307,330,375,377,385,38
9390,415
宋教仁 24-26,56,62,63,66-68,82
宋楚瑜 597
宋 庆 龄
166,208,209,298,307,309,341
邢士廉 131
坂西利八郎 9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1,212,244,250,267,296,298,30
4,306,309,311,314,323,335,336,
411
抗日风潮 12,250,283
抗日救国宣言 306
抗日运动 250,256,257
抗日战争(抗战,中日战争)
3,6,7,11,14,190,192,205,210,21
5,223,256,262,281,300,304,314,
316,324,326-333,335,340-
343,345,348,363-366,370-
429,432-
436,442,443,456,458,462,465,4
79,485,489,518,527
抗 战 建 国 纲 领
314,321,322,325,327,328
村治派 340,341
杜月笙 416

杜	聿	明	李仙洲 386,419,459
	388,440,445,451,475,476,478		李守信 262,273,278,280,281
杜斌丞	348		李先念 427,459,461,469
杜勒斯 (John F. Dulles)			李良荣 483,493,494
	511,556,577		李延年 386,473,477,493
杜运宇	351		李克农 295,307
杜	鲁	门	李宗仁 13,14,171-175,177-181,225-231,233,237,31,293-295,297,307,330,385-387,393,394,436,445,472,478-481,483,485,487,492,522,595
	436,438,440,442,445,451,466,489,526,556,575,576		李长江 363,419
李文	480		李长泰 106 李亚东 54
李杜	254,411		李承晚 554
李朋	544		李秉中 315
李海	526		李柱中 24
李纯	111-113		李厚基 119,121
李达	153,159		李建兴 607
李顿 (Lord Lytton)	255		李
李顿调查团	257,258		品
李焕	597		仙
李铭	140		181,386,387,393,394,413,416,417,420,485
李德 (Chey, 原名 Otto Braun)			李俊襄 263
	239,240,242		李振清 543
李璜	212,341,344,348		李烈钧 69,75,76,93,103,109,289
李鸿	475,544		李根源 77
李弥	474,476-478,492,562		李章达 348
李大钊	147,148,153-159,165		李滋罗斯 (Leith Loss) 269
李之龙	164		李富春 153
李井泉	460		李云龙 133
李天霞	493		李妈兜 539,540
李公朴	312,342,348,440,469		
李立三	153,159,234,333,334		
李玉堂	392,473		

李 登 辉 524,588,589,595-
597,606,611,612,615,618
李景林 117,123,129,131-133
李胜峰 611
李廉方 26
李煜瀛 125,233
李圣五 357
李万居 519,547,550
李敬扬 238
李葆华 283
李鼎新 108
李经羲 104,105
李运昌 422,448,451
李汉俊 153
李汉魂 293
李福林 169,171
李梦庚 119
李鸣钟 131,133,235
李维汉 153,159
李德纯 313
李 济 琛 171-
174,183,208,211,225,226,290,2
91,297,307,343,347,472
李诤一 363
李鸿章 21,33
李宝璉 363
李耀汉 110
改组同志会 225
改造社 211,289
那彦图 85
岑春 77,97,110,114
吴晗 347
吴大猷 550
吴火狮 533
吴化文 363,419,474
吴玉章 311
吴光新 111,118,121
吴仲直 497
吴奇伟 238,387
吴 佩 孚 13,113,114,117-
121,123,124,129,130-
134,154,155,172-
175,177,178,268
吴炳湘 106,130
吴俊升 123,181
吴 国 楨
503,504,526,548,575,576,593,5
94
吴禄贞 26,27
吴景超 219
吴景濂 62,63,108,120
吴新田 131
吴敬恒 149,176,233
吴鼎昌 140,193,195
吴铁城 169,257,441
吕大森 26
吕公望 77
吕正操 338,422
吕志伊 75
吕秀莲 618
吕振羽 309
希特勒 299,371

希斯曼 (Hilsman) 556
何键 225,226,239,241,243,293
何立中 244
何成濬 230,235,330
何克希 427
何叔衡 159
何柱国 259
何思源 445,473
何香凝 225,341
何梅协定 (何梅默契) 263-
265,268,354
何基丰 477
何 应 钦 171,173-
175,177,180,188,228,230,235,2
36,238,239,259,261,264,268,27
0,286,289,299,300,319,320,322,
329,330,385,386,388,409,476,4
83
何丰林 119,122
佟麟阁 288,389
狄托 447
谷正文 541
谷正伦 330
谷正鼎 355
谷寿夫 392
谷钟秀 62
余诚 26
余心清 291
余家菊 341
余 汉 谋
238,293,330,386,387,395,481

邢士廉 131

八划

定国军 117
宗社党 95,97
法西斯主义 200,205,206
治外法权 361
社会主义 20,37,135,145,147-
149,152,154,157,158,209,222,3
21,446
社会民主党 211,289
奉 系 13,115-120,124,126,129-
134,160,165,169,173,175,177,2
52,278
青年军 493
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 11,150,212-
214,216,220,273,291,320,341,3
45,346,439,441,464,467,468,47
0,472,551,594,605,608,613,615
长沙暴动 217
长城战役 10,355
武 昌 革 命 12,27-
29,36,40,41,47,50-
55,60,79,81,84,89,92,186
武汉国民政府 168,178,203,207
武汉分共 168,179,182,208
非常国会 (会议) 40,108,109,128
两广事变 293
取消派 222,305
直系 13,103,111,113-125,127,129-
132,134,154,160,165,169,173

直奉战争 13,119,120,130,132
 直皖战争 13,117,118
 东 北 军
 11,14,231,232,244,253,259,283,
 287,294,296,300,301,307,338,4
 22
 岳维峻 131-133
 林 彪
 217,235,238,240,241,243,244,2
 46,321,322,338,420,422,440,44
 9,453,460,461,475,479,481,483,
 496
 林 森
 61,108,109,121,162,170,187,23
 3,255,292,327
 林弘宣 618
 林 伯 渠 (祖 涵)
 158,159,311,312,322,335,336,3
 45,348
 林长民 128
 林直勉 158,162
 林金生 596
 林柏生 358,362,367
 林茂生 550
 林修梅 111
 林葆恂 108-110
 林道干 515
 林凤都 515
 林铎十郎 264,273
 林献堂 550
 林鹤年 607
 板垣征四郎 253,256,260,270,351
 松井太久郎 376
 松井石根 391
 松井源太郎 273
 松室孝良 274,275,280
 芮恩施 (Reinsch) 97,98
 居 正
 25,26,60,73,74,109,293,294,593
 邵 力 子
 149,159,297,312,346,349,465
 邵元冲 297
 肯南 (George Kennan) 445
 冈田内阁 C 日) 261,268
 冈 村 宁 次
 260,261,394,404,405,409,423,5
 27
 周浩 68
 周岳 495
 周小舟 309
 周以德 445
 周至柔 594
 周自齐 99,115
 周芝雨 544
 周 佛 海
 356,357,360,362,365,366,373
 周作民 140,276
 周 恩 来
 242,295,29638,300,301,307-
 310,312-314,319-323,333-
 335,339,341,345-
 347,349,350,377,437,239,441,4

47,465,466,470,480,582
周逸群 217
周荫人 174
周学熙 67,82,83,
丘吉尔 381,382
邱清泉 474,476-478
季山嘉 (Kissanka) 163,164
季米特洛夫 298
季辛吉 578
季里诺 (Elpidio Quirino) 554
儿玉源太郎 22
近卫文磨 273,371
近卫内阁 (日) 356
彼得罗夫 (A. A. Petrov) 450
庚子赔款 127
岳维峻 131
金珏 236

九划

洪炎秋 550
洛基 (Keller E. Rocky) 443
宣侠父 288
帝制运动 49,71,72,79,96-98,116
帝 国 主 义
2,9,10,12,18,29,128,129,133,13
5,142,147,150,152-
154,160,161,173,177,179,207,2
11,213,224,292,329,333,447
帝国宪政会 23
奕劻 28
施存统 153,159

施明德 551,618
施肇基 255
军政府 (湖北) 2,39,50-55,60
军政府 (广州) 56,108-
111,113,114,120,164,165,168
军务院 77,78
军统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7,331
姜登选 121-123,126,130,131
首都革命 124,125,169
畑俊六 394
政友会 66,70
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
323,350,439,442,458,465-
470,480,538
政治会议 71,350
政闻社 23
政学会 (系) 109,464,593
革命实践研究院 522,593
南三行 140
南京保卫战 392
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
178,179,197,198,203,206,210,2
11,224,231,297-300,377,480
南昌暴动 179,183,234
胡璜 26
胡适 151,198,199,271,297
胡璉 478,482,483,494,495,511
胡石青 341
胡 宗 南
244,386,393,394,404,482,484,4

- 86-488,500
- 胡秉柯 26
- 胡秋原 211,549
- 胡祖玉 236
- 胡恩溥 263
- 胡景翼 123-125,129-131
- 胡嗣瑗 76
- 胡汉民 14,62,69,73,108,109,161-163,169,170,188,190,203,233,237
- 杭立武 545
- 相友会 66
- 柯克 (Cooke) 443
- 柯尔 (George E. Kerr) 521
- 柯远芬 519
- 柏杨 (郭衣洞) 548
- 柏文蔚 69,93
- 柳元麟 562
- 郁慕明 611
- 威尔逊 80,82,136
- 范宣德 (John C. Vincent) 444
- 范国璋 111
- 范登堡 445
- 范汉杰 461,475
- 茅祖权 158
- 建国大纲 279
- 恰克图条约 87
- 重光葵 255
- 重庆国民政府 (重庆政府) 364,365,370,372,374,380
- 重庆会谈 466
- 秋收暴动 183,234
- 秋瑾 24,25
- 科学补习所 26
- 香月清司 375,377
- 段芝贵 97,107,112
- 段祺瑞 16,27,64,78,95,100,102-109,111-119,121,123-134,154,160,165,170
- 保皇会 23
- 侯镜如 475
- 俄国十月革命 152-154,205
- 俞大维 501,502,507,510,529
- 俞作柏 226-229
- 俞秀松 153
- 俞国华 597
- 俞鸿钧 504,532
- 俞济时 413
- 姚嘉文 610
- 约法会议 45,71
- 癸丑同志会 66
- ## 十划
- 酒井隆 263,264
- 浩然庐 72
- 宫崎寅藏 24
- 训政 6,14,188,190,198,201-203,204,205,208,214,215,217,233,323,327,328,462
- 训政时期约法 14,203
- 讨逆军 106,117
- 高思 (C.Gauss) 437

高岗 244,336
高一涵 219
高玉树 547,596
高宗武 261,355-357
高凌霸 121,268,276
高桂滋 300,307,392,413
高魁元 493,494
高树勋 288,418,419
高桥坦 262,263
库朋斯齐 (Krupensky) 98
唐才常 22
唐式遵 386
唐生明 366
唐生智 172-174,177-179,183,227-
229,392
唐有壬 261,263,269,308
唐 绍 仪 29,62-
64,67,68,81,84,88,109,110,114,
188,231,233,354
唐继尧 75-78,1.09,110,171
神州国光社 211
益友社 109
秦土协定 263-265,268,273
秦邦宪 241,242,311,315,334,335
秦东昌 500
秦启荣 417,419,426
秦毓鎏 23
秦德纯 263,376
班禅喇嘛 90
马克思主义 147,148,151-
153,198,211,214,341,539
马良 189
马林 (Maring, 原名 Sneevliet)
154-157
马素 153,158,162
马之骕 545
马 占 山
254,258,305,307,411,412,414
马步芳 387,484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viski) 449-
451
马寅初 219
马叙伦 472
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434,438-445,452,454,457-
459,466,470,469,576
马鸿逵 386,387,484
马关条约 22
马继曾 76
索王 278-280
贡桑诺尔布 85
袁 世 凯 5,10,12,13,16,27-
29,31,33,40-43,45-47,49,51-
53,60-79,81,82,85,87,89,95-
99,102,105,114,115,135,147,14
9,152,186
袁克定 75
袁金铠 352
郝梦龄 237,390
郝鹏举 364
夏威 387
夏恭 351

徐永昌 181,230,277,319,479
徐有庠 533
徐向前 183,217,234,238,242-
246,338,425,461
徐州会议 105,106
徐海东 244,246
徐庭瑶 259
徐 蚌 会 战
445,476,479,480,483,543
徐启明 482
徐源泉 330,386
徐庆钟 596
徐 树 铮 102,103,112,115-
119,121,132,133
徐锡麟 24,25,
翁文灏 193
翁明昌 533
翁俊明 519
翁照垣 211,292

十一划

清 共 (清 党)
138,141,163,168,176,194,208,2
13,221,234
淞沪停战协议 356
淞沪会战 415,418
淞沪战役 10,14,237
梁 士 诒
72,98,99,115,116,118,119,128
梁如浩 87
梁启超 22,23,31,53,63,66,70,74-
78,97,107,116,151,152
梁鼎芬 106
梁干乔 222
梁漱溟 215,216,339,342-346
梁实秋 342
梁鸿志 352,356,358,359,362,367
梁鸿楷 169
淮军 28,33,34
寇英杰 133,177
章杰 507,560
章士钊 480
章乃器 343
章 伯 钧
210,211,292,295,342,345,346,3
49-352,472
章宗祥 116,142
章炳麟 23,24,56,62,63,68,109
商 震
181,229,259,263,268,271,291,38
5,387
许世英 128
许克祥 178
许信良 611,618,619
许崇智 69,73,93,121,169,171
许寿裳 550
许兰洲 123
许权中 289
郭坚 112
郭忬 495
郭汝瑰 488
郭廷亮 544

郭沫若 312,470,472
郭松龄 122,132,133
郭寄峤 484,497
郭索维慈 (Korostovets) 86
郭国基 610
鹿 钟 麟
125,131,133,134,173,181,229,2
30,318,331,387,418
连战 602
连震东 519,597
曹瑛 117,123
曹锟 16,76,106,107,112-114,116-
125,128,134
曹汝霖 99,116,118,142
曹亚伯 26
曹振铎 474
救国会 321,341,343
梅思平 357-359,367
梅津美治郎 263-265,275
梅贻琦 271
梅乐斯 333
麦克阿瑟 498
麦克马洪 (A. H. McMahon) 90,92
盛世才 323
莫荣新 110
康生 340
康有为 22,23,31,51,52,64,105-107
张淦 482
张钦 542
张 群
272,284,347,438,465,481,483,4
84,486,487
张勋 5,103,105-107,111,114
张謇 23,31,62,63,140
张澜 345,347-349,466
张继 62,66,155-157,162,233
张人杰 73,164,176
张子华 309
张之江 131,133
张之洞 26,31
张文生 119
张太雷 155-157,183
张友渔 313
张允荣 273
张北事件 262,263
张申府 343,345-347,349
张自忠 273,387,393,400
张克侠 289,477
张 君 励
214,313,342,346,347,349,440
张廷谔 263
张作相 122,123,181,259
张作霖 13,16,97,112,115,117-
122,125,132,134,160,165,173,1
75,178,181,182,251,295
张伯祥 26
张 治 中
257,293,313,323,327,391,395,4
39,465,480,484
张 宗 昌 126,129-
133,175,177,181,182,226
张东荪 149,214,342,349

张其昀	594	13,14,120,122,123,133,181,182,
张松协定	274	212,213,227,230-
张浩然 (林育英)	306	233,244,250,251,253-
张振武	68	255,258,259,270,277,278,283,2
张秋白	155	87,295-302,308-311,354,411
张俊宏	619	张丰绪 597
张海鹏	354	张怀芝 112,113
张敏之	543	通货膨胀 520,530,531
张国淦	102,103	陆志韦 271
张	国	焘
	153,155,156,158,217,237,242-	陆宗輿 99,116,118,142,145
	246,315,334-336	陆承武 133
张启黄	364	陆建章 116,133
张绍曾	120	陆皓东 22,40
张云山	296	陆裕勋 76
张逸云	217,427	陆鼎揆 342
张开儒	109,110	陆荣廷 76,77,109-111,171
张景惠	254,256,354,355	陆征祥 64,68,87,98
张岚峰	364,365	陈宦 78
张发奎	177-179,183,227-229,386-	陈云 335
	388,391,394,409	陈菊 619
张敬尧	112,113,117,260	陈
张鼎丞	426,427,459	诚
张魁元	261	236,238,241,245,293,313,314,3
张福来	124	20,327,331,383,386,387,391,39
张嘉璈	193,195	4,461,476,481,492-
张闻天	242,308,335	494,521,522,524,
张荫梧	274,318,415,418,419	526,531,546,593-596
张厉生	441	陈群 359,367
张辉瓒	235	陈
张	学	良
		毅
		217,240,319,426,427,459,461,4
		76,477,481,484,492
		陈賡 461

陈仪 293,331,386,413,519-521	陈鼓应 549
陈大庆 595	陈贻范 90,91
陈文成 598	陈逸松 520
陈文运 117	陈嘉庚 344
陈文麟 266	陈 铭 枢 174,209-211,226,233,236,237,284,290,292,344
陈友仁 208,292	陈调元 174,180,226,277
陈孔达 519	陈德征 199
陈水潭 608	陈树藩 77
陈 公 博 193,206,208,225,230,359,362,363,366,367,373	陈 独 秀 147,148,151,153-158,165,167,168,176,178,183,222,223,335
陈立夫 300,309-311,317,464,483	陈 济 棠 183,226,228,233,238,239,241,282,292-294
陈布雷 357	陈璧君 367
陈光甫 140,195	陶铸 314
陈光远 106,113	陶成章 24,25
陈安宝 398	陶百川 284
陈希曾 285	陶行知 216,343,347
陈其美 60,69,72-74,97	陶希圣 334,358,359
陈果夫 188,310	陶峙岳 485
陈明仁 482,485	陶凤集 60
陈奇达 466	陶德曼 356,371,377
陈炳焜 108,110	常乃惠 342
陈 炯 明 69,109-111,113,119,120,122,152,154-156,165,169,171	崔文藻 110
陈癸淼 612	敖景文 123
陈国祥 66	区芳 222
陈启天 212,342	毕庶澄 175
陈绍禹（王明）307,309,312,314-316,335,420	国 民 大 会
陈绍宽 392	

6,8,72,97,145,201,202,204,205, 324,326,348,350,351,439- 442,445,462,464,465,469,470,4 72,524,605,612,613,615,616,61 8	134,165,172-175,224,227,296
国民政府（国府）	国民革命军
2,7,41,42,129,133,158,165,168- 173,175,176,178- 180,182,184,186- 199,202,203,205,216,226- 228,231- 234,237,239,242,244,245,247,2 50-260,262-265,267,268,270- 273,276-280,282-284,286- 295,299,311- 313,315,318,320,322- 324,326,328,329,334- 336,338,341.343.344.346.348- 350,352,355-357,366,370- 375,385,388,390,392- 394,396,397,411- 413,415,416,418,420,429,432,4 33,435-445,447-452,454- 456,458,465,466,468,469,471- 473,492,509,510,519,525- 527,530,532,534,536,537,546,5 47,552,554,559,562,574- 577,579-592,590- 592,595,599,605,609,611,612,6 15,616	41,102,115,134,135,141,144,17 1,172,174- 183,224,228,291,310,311,315,3 38
国民政府（国府）	国民参政会
2,7,41,42,129,133,158,165,168- 173,175,176,178- 180,182,184,186- 199,202,203,205,216,226- 228,231- 234,237,239,242,244,245,247,2 50-260,262-265,267,268,270- 273,276-280,282-284,286- 295,299,311- 313,315,318,320,322- 324,326,328,329,334- 336,338,341.343.344.346.348- 350,352,355-357,366,370- 375,385,388,390,392- 394,396,397,411- 413,415,416,418,420,429,432,4 33,435-445,447-452,454- 456,458,465,466,468,469,471- 473,492,509,510,519,525- 527,530,532,534,536,537,546,5 47,552,554,559,562,574- 577,579-592,590- 592,595,599,605,609,611,612,6 15,616	6,312,313,315,326,328- 330,342.343.345.346.349-351
国民政府（国府）	国民会议
2,7,41,42,129,133,158,165,168- 173,175,176,178- 180,182,184,186- 199,202,203,205,216,226- 228,231- 234,237,239,242,244,245,247,2 50-260,262-265,267,268,270- 273,276-280,282-284,286- 295,299,311- 313,315,318,320,322- 324,326,328,329,334- 336,338,341.343.344.346.348- 350,352,355-357,366,370- 375,385,388,390,392- 394,396,397,411- 413,415,416,418,420,429,432,4 33,435-445,447-452,454- 456,458,465,466,468,469,471- 473,492,509,510,519,525- 527,530,532,534,536,537,546,5 47,552,554,559,562,574- 577,579-592,590- 592,595,599,605,609,611,612,6 15,616	46,126,161,203,205,219,222,23 1-233
国民政府（国府）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2,7,41,42,129,133,158,165,168- 173,175,176,178- 180,182,184,186- 199,202,203,205,216,226- 228,231- 234,237,239,242,244,245,247,2 50-260,262-265,267,268,270- 273,276-280,282-284,286- 295,299,311- 313,315,318,320,322- 324,326,328,329,334- 336,338,341.343.344.346.348- 350,352,355-357,366,370- 375,385,388,390,392- 394,396,397,411- 413,415,416,418,420,429,432,4 33,435-445,447-452,454- 456,458,465,466,468,469,471- 473,492,509,510,519,525- 527,530,532,534,536,537,546,5 47,552,554,559,562,574- 577,579-592,590- 592,595,599,605,609,611,612,6 15,616	333
国民政府（国府）	国民党（中国国民党）
2,7,41,42,129,133,158,165,168- 173,175,176,178- 180,182,184,186- 199,202,203,205,216,226- 228,231- 234,237,239,242,244,245,247,2 50-260,262-265,267,268,270- 273,276-280,282-284,286- 295,299,311- 313,315,318,320,322- 324,326,328,329,334- 336,338,341.343.344.346.348- 350,352,355-357,366,370- 375,385,388,390,392- 394,396,397,411- 413,415,416,418,420,429,432,4 33,435-445,447-452,454- 456,458,465,466,468,469,471- 473,492,509,510,519,525- 527,530,532,534,536,537,546,5 47,552,554,559,562,574- 577,579-592,590- 592,595,599,605,609,611,612,6 15,616	3,4,6,8,10,11-13,15- 17,42,49,56,63-67,69- 72,74,75,82,87,92,93,102,103,1 09,121,123,126- 128,138,146,147,149,150,152,1 54-167,169- 172,174,176,179,182,184,186,1 87,189-192,194,195,199- 209,212-219,221-225,232- 234,251- 253,255,257,258,260,263,264,2 68,269,277,279,282- 285,293,297,299,300,305- 311,313-330,332-334,336,341- 343,345-351,356- 358,360,370,374,385,417,418,4 29,432-437,439-442,444-
国民军	
13,14,115,124,125,127,12-	

446,448,250,452,453,456,458,4
 59,461-
 473,478,481,483,485,487-
 490,493,503,519,521-
 523,546,547,592,594,597,598,6
 06,607,609,610,612,614-
 618,619
 左 派
 158,162,167,170,171,176,178,2
 06,208,224,225
 改 组 派 203,206-
 209,214,216,220,225-
 231,292,306
 国防最高委员会 325,326,330
 国防最高会议 325,371
 国防会议 311,385,595
 国社党（中国国家社会党）
 11,212,214-
 216,220,321,341,347
 国军编遣会议 225
 国家主义 11,147,150,151,212-
 214,363
 国家主义青年团 212
 国家主义派 209,211,213,283,306
 国家社会主义 214
 国家社会党 11,212,214-
 216,220,342,346
 国家资本主义 209,214
 国会非常会议 109,110
 国际联盟（国联） 237,254-
 259,265,266,284
 第一次世界大战 93,135,138,141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135,158,183,207,299,307,308,3
 15,316,323,373
 第 三 党
 208,209,212,214,216,219,220,2
 92,295,306,321,341,346,347
 参政院 45,46,71,97,
 参战军 103,114,115
 参战案 103,104
 十二划
 森恪 92
 湘军 33,34
 汤馥 76,77
 汤化龙 62,63,66,107
 汤玉麟 182,258,259
 汤 恩 伯 386-
 390,393,404,409,410,478,481,4
 83,494
 汤寿潜 61
 汤乡铭 78
 游弥坚 550
 冯玉祥 13,14,106,112,115,119-
 121,123-125,129,131-
 133,165,169,173,174,177,178,1
 80,182,188,203,209,210,226-
 231,239,257,261,278,282,287-
 289,296,300,306,308,313,331,3
 85,415
 冯自由 158,162

冯系 115,229,278,291
冯白驹 426,496
冯治安 259,387,477
冯特氏 26
冯雪峰 308
冯国璋 16,27,75-78,95,103,105-
107,109,111-114,116,117
冯菊坡 158
富田直亮（白鸿亮） 527
善后大借款 67,79,81
善耆 97,107
普莱德（A. M. Pride） 528
曾琦 150,212,342,349
曾醒 158
曾兆麟 108
曾仲鸣 358
曾克林 448
曾国藩 33,239
曾万钟 386
曾养甫 310
曾泽生 475
曾扩情 263
曾毓隽 116
劳动党 609
云王 277,279-281,352
项英 234,240,334-336,426
越飞（Adolf A. Joffe） 157
超然社 66,70
彭真 283,460
彭湃 154,158,217
彭明敏 551
彭述之 222,223
彭雪枫 427
彭寿莘 120,123
彭 德 怀 234,235,238,240-
244,293,311,320,338,461,481,4
84,488,509,511
彭泽民 342,472
朝克巴图尔 278
粟裕 418,427,461,477,492
黄正 544
黄杰 259,264,482,485,504,595
黄 郛 123-125,129,260,261,264-
266,270,289,295
黄华 447
黄维 476-478
黄 兴 24,25,27,28,60-66,68-
70,73,89,93,97
黄大伟 364
黄旭初 295
黄百韬 474,476,477
黄克诚 427
黄炎培 215,343,345-351
黄信介 610,611,619
黄埔同学会 209
黄 埔 军 校
13,42,158,163,166,169,171,186,
209
黄埔革命同学会 209
黄得时 550
黄 绍 竑
171,183,225,228,262,279,390,4

16.485
黄琪翔 210,211,292
黄复生 188
辜振甫 532
雅尔塔密约 432,425
华北自治运动
10,250,267,269,271,275,277,28
7,295,305
华盛顿公约 267
华兴会 24
贺龙 183,217,234,242-
246,339,418,420,422,424,460
贺国光 486-488
贺耀组 180,331
开罗会议 519,525
恽代英 159,161,166
无政府主义 37,47,147,149
无产阶级专政 148,222
程克 268
程潜 122,171,173-
176,178,290,295,314,330.331.3
85.390.478.482.485
程奎光 21
程德全 60,69
程璧光 108-111
焦达峰 26
进 步 党
66,67,70,71,74,102,103,186
集益社 66
傅正 545
傅冬梅 479

傅良佐 111
傅作义 180,259,277,279-
281,308,386,389,412,415,474,4
79,480,484
傅斯年 271,298,351
傅嵩林 90
皖系 13,103,112-
121,123,124,129,130,134,154,1
60,165,169
复辟 102,105-
108,111,114,135,147
复兴社 206,328
须磨弥吉郎 264,265,269
纽永建 524
统一共和党 62,63
统一建国同志会 345,346
统一党 62,63,65,66,70
乡村建设派(乡建派)212,215,217
乡村建设协会 321,346

十三划

溥仪 28,125,256,269,280,352-354
溥润 84
温生才 25
温宗尧 359,367
温树德 123
新月人权派 306
新 四 军 事 件
319,321,342,343,346,347
新生活运动 333
新军 22,23,25-28,33,34,102,186

新建陆军 34
新约法 45,78
新国民党连线 612
新新俱乐部 109
新党 612
资 本 主 义
2,135,151,152,209,222,253
义和团 22
慈禧太后 22
雷根 580
雷震 545,547,595
瑞澂 26
达林 (A. S. Dalin) 155,156
达赖喇嘛 88,89,91
塘 沽 协 议
239,260,261,264,272,292,356
载澧 28,125
贾拓夫 308
贾德耀 123
路博 154
靳云鹗 174,177
靳云鹏 116-118
杨杰 259
杨度 23,71,72,75,76
杨逵 550,551
杨 森
177,386,387,402,486,487,488
杨銓 198
杨宇霆 122,130,131,181,251,
杨守仁 23
杨希闵 169,171
杨 虎 城
175,209,212,230,244,277,283,2
87,295-298,301,302,308-310
杨匏安 158
杨爱源 181,386
杨树庄 175,188
杨肇嘉 521
杨衢云 21,22
熙洽 254,354
叶飞 493
叶挺 172,183,319,386,426,427
叶鏞 183
叶恭绰 98,115
叶开鑫 172,173
叶楚伦 149,188
叶 剑 英
158,183,240,241,244,311,314,3
20,339,377,439,512
万福麟 259,268,411,415
万宝山事件 252
董必武 159,312,313,345-348,441
董振堂 241,244
董健吾 (周继武) 310
董道宁 357
虞洽卿 140,144
萱野长知 97
督军团 104-107
农学会 21
圆山训练团 562
詹森 577
詹大悲 26

邹鲁 66,161-163,170,179,231,233

邹韬奋 313,343,346

剿 共

7,11,14,209,210,214,224,234,23

7,239,247,250,253,264,282,283,

287,291,296,297,301,305,309,3

10

十四划

宁汉分裂 177

满洲国 125,254,256-258,260-

262,267,269,275,278,280,305,3

09,352-357,360,367,370-

374,377,411,439

实验主义 151

端纳 300-302

齐 變 元

118,122,125,129,130,275,359,3

67

褚玉璞 175,176,181,182

褚民谊 359,362,367

褚松云 159

褚辅成 351

廖磊 314,386,413,416

廖文毅 612

廖 仲 恺

93,109,153,155,157,158,162,17

0

廖清秀 551

廖耀湘 407,475

蔭昌 27

福田彦之助 181

福特 579

荣禄 33

荣臻 253,254

荣宗敬 140

荣赫鹏 (Younghusband)

荣德生 140

赵倜 119

赵少康 612

赵正平 359

赵丕廉 262,279,280

赵秉钧 64-68

赵家骧 507,560

赵恒惕 172

赵登禹 259,389

赵尔丰 88

赵观涛 236,238

台静农 550

嘉乐恒 (Calhoun) 80,82

赫尔利 (P. J. Hurley)

324,435,437,438,464,465

赫鲁晓夫 505

辅仁文社 21

臧士毅 354

蒙巴顿 (Mountbatten) 383

蒙政会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

会) 279,280

闻一多 348,349,440,469

闽变 211,220,240,293

领事裁判权 128,161,198

熊斌 260,271

熊式辉 331,450,451
熊成基 25
熊克武 69,171,188
熊希龄 68,82
维经斯基 (G. N. Voitinsky)
154,157

十五划

潘文华 386,486,488
潘友新 381
潘光旦 349
潘汉年 308-311
广田三原则 261,267,272,356
广 田 弘 毅 261,264-
267,270,273,371
广州革命政府 (军政府)
13,120,149
广州商团 122,165,169,194
广州国民政府 (1925) 13
广州国民政府 (1931, 胡汉民)
14,208,237
广州暴动 183,234
广州护法政府 109,120,152
郑谦 130,131
郑士良 21,22
郑士琦 124,129,130
郑介民 439,479
郑汝成 74
郑位三 459
郑孝胥 354
郑洞国 475

郑俊彦 174
郑学稼 548,549
欧战 93,98,103,115,145
蒋方良 523
蒋方震 371
蒋 介 石
4,7,11,14,15,119,122,141,157,1
62-165,168,169,171-
182,186,187,188,190,193,203,2
05-
212,224,226,227,229,230,232-
239,241-
245,250,255,257,258,264,270,2
71,273,276,277,283-
287,290,291,294,296-302,309-
311,313-315,320-
332,334,336,342,347,350,351,3
56,357,359,2365,366,371,373-
378,381-386,389-
391,394,406,208,412,413,429,4
32,434-
438,440,441,445,2148,45M54,4
61,464-466,469-
473,475,284,487-
489,493,495,499-501,521-
524,526,527,538,544,545,549,5
54,556,562,575,576,588,592-
595,599,607,611,619
蒋 光 鼐
210,230,235,236,290,293,308,3
44

蒋孝先 263
 蒋廷黻 199,271,299
 蒋作宾 298
 蒋翊武 26
 蒋 鼎 文
 236,239,240,293,298,301,331,3
 86,387
 蒋 经 国
 15,273,433,488,495,521,523,53
 8,542,588,594,596,597,599,607,
 609,610,612,616-617,619
 蒋纬国 480,523
 蒋梦麟 199,271
 蔡锷 75-77,97
 蔡斯 (W. C. Chase) 504,528,555
 蔡 元 培
 24,62,151,198,199,203,233,284,
 308
 蔡孝干 538,540,542
 蔡 廷 锴
 210,211,238,239,257,290,291,3
 06,308,345
 蔡和森 153,156,217,334
 邓培 155
 邓华 496
 邓子恢 459
 邓 小 平
 153,217,339,460,461,477,481,5
 12,579
 邓文仪 309
 邓中夏 153,159
 邓本殷 165,171
 邓如琢 174
 邓演达 208-210,292
 邓汉祥 121
 邓泽如 158,162,225,233
 邓颖超 312,346,347
 邓锡侯 386,486,488
 墨索里尼 205,371,380
 影佐祯昭 357,358
 黎玉 424,425
 黎元洪 12,16,26-28,46,51,60-
 63,67-69,71,77,78,100,102-
 108,114,120,121
 黎天才 112
 鲁克斯 (John P. Lucas) 442
 鲁涤平 225,226,235,236
 刘英 25
 刘 峙
 180,226,228,230,239,331,387,3
 90:474,476,477
 刘湘 188,298,308,331,385
 刘鼎 298
 刘文辉 347,348,486,488
 刘少奇 283,335,336,427
 刘仁静 153,222
 刘玉章 497,500
 刘玉春 174
 刘汝明 259,389,477
 刘安祺 482,483,511
 刘存厚 111,112
 刘志丹 244,245,336

刘伯承 241,339,418,420,422,423,460,461,477,478,481,484,488
刘伯垂 159
刘坤一 31
刘昌群 159
刘雨卿 398,486
刘尚清 231
刘珍年 226
刘郁芬 131,133,226
刘建绪 241,386,391
刘建藩 111
刘家骥 390
刘桂堂 261,419
刘恩格 116
刘师复 149
刘培绪 364
刘健群 524
刘云瀚 494
刘廉一 494,495,497,500
刘震寰 169,171
刘静庵 26
刘镇华 130,175,181,296
刘镜人 86
刘显世 76,77
德王（德穆楚克栋普） 262,278-281,352
德寿 22
卫立煌 293,321,383,386-388,390,393,408,415,419,453,461,462,474,475

谈荔孙 140

十六划

谌小岑 310
宪法研究会（研究系） 70,102-104,107,116,214
宪政公会 23
宪政商榷会（商榷系） 102-105,107,109
宪政实施协进会 350
宪政筹备会 23
龙云 188,243,311,331,347,357,387
龙建章 75
龙觐光 76
龙济光 77,97,103
憨玉琨 131
霍揆彰 391
辽沈会战 445,473-476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269,352
冀察政务委员会 269-275,277,286,298,375,377
卢汉 314,386,388,409,488
卢永祥 119,121,122,125,129,130
卢作孚 343
卢香亭 174
卢沟桥事变 311,356,377,388,389,396
阎锡山 13,14,115,124,173,178,180-182,188,203,219,227,229-

- 232,245,271,277,278,280,290,298,308,313,314,318,319,321,331,385,386,393,415,460,483,487,493,594
- 阎系 115
- 噶布夏札 (Lonchen Shatra) 90
- 穆湘玥 140
- 鲍文樾 359
- 鲍格莫洛夫 309
- 鲍尔汉 484
- 鲍罗廷 (Michael M. Borodin) 131,157,162,165,168,170,176
- 兴中会 21,24,26,39,40,186
- 钱永铭 194,343
- 钱昌照 193
- 钱能训 116
- ## 十七划
- 济南战役 476
- 斋藤内阁 (日) 260
- 萧克 217,242-246,339
- 萧佛成 233
- 萧锋 493
- 萧劲光 241
- 萧振瀛 274,275
- 萧楚女 159
- 萧耀南 125,132
- 谢金 86
- 谢持 158,162,231,232
- 谢东闵 595,596
- 谢晋元 391
- 谢雪红 538,539,612
- 谢富治 461
- 整风运动 316,340
- 联合国 3,4,444-446,455,525,526,554,562,574,576,577-579,581-583,585-587,592,597,612,617
- 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 581-583
- 联省自治运动 140
- 联俄容共 13,126,146,157,158,160,161,165,166,169,170,186,194,214,224
- 韩战 12,498-500,502-504,526-529,554,557,558,562,575,576,581
- 韩国钧 129
- 韩复榘 181,188,216,226-230,233,270,277,289,308,331,390,417
- 韩德勤 319,323,414,418,419,426
- 韩麟春 122
- 韩麟符 158
- 临时政府 (南京, 1912) 2,29,40-43,47,51-53,55,60-62,68,80,81,85,86,140,168
- 临时约法 2,16,29,43-46,62,64,70-72,85,102,104,108,109,128,152
- 临时参议院 28,46,63,111,116
- 薄一波 308,314,461
- 薛岳 241,242,387,391,394,398,399,4

76,483,485,496
钟理和 551
钟肇政 551
缪斌 367,373
缪澂流 318,391,418

十八划

戴笠 332,363-364,366
戴戡 75,76,111
戴安澜 407
戴戎光 481,482
戴季陶 (传贤)
68,119,157,158,162,163,166,167,203,299
戴国辉 542
戴德发 608
颜惠庆 120,480
职业教育派 (职教派)
212,215,217,306,341,343,347,348
聂荣臻
159,244,339,422,460,461,479
扩大会议 208,231
扩大会议派 231-233
蓝钦 (Rankin) 557,558,576
蓝天蔚 26
蓝衣社 263
瞿秋白
147,148,158,165,240,241,334
魏益三 133
魏道明 521

魏凤楼 415
魏德迈 (Albert C. Wedemeyer)
408,437,443-445

十九划

谭平山 158,165,208,209,472
谭延闿
69,111,121,122,164,169,171,173,174,176,179,187,188,203
谭浩明 110,111
谭道源 235,238
谭震林 426,427,477
谭学衡 77
庞炳勋
290,318,365,393,413,414,419
庞镜塘 47
4 关士源 93
关东军 252,256,258,260-262,264,265,267,269,271,274,290,353-354,450,454
关税协议 32
关余 32
关麟征 259,264
罗申 436
罗易 (Roy) 168
罗亦农 183
罗吉斯 578
罗卓英
238,386,387,391,398,402,407
罗炳辉 241,244
罗家衡 110

罗振玉 256
罗章龙 159
罗斯福 381-383,437
罗隆基 199,342,345,346,348,349
罗福星 519
罗荣桓 479,481
罗广文 486,487
边防军 117,118

二十划

苏炳文 254,258,411
苏东启 551,552
苏洪月娇 551,552
苏报案 24
严复 41,151
严家淦 504,592,595,612
严啸虎 486
筹安会 71,75
饶漱石 459

二十一划

护法 108,111,152

护法军 108,111,112
护法运动 108
护法战争 13,92
护国军 76,77,97,102,103
护国战争 13,76,77,103
酆悌 395
顾正红 127
顾忠琛 362
顾孟余 206,208,225

顾 祝 同

240,293,311,313,319,331,366,3

85,386,413,476,487

顾维钧 255,265

顾馨一 144

二十二划

龚心湛 116

龚德柏 548

龚宝铨 24

二十二划

艳电 357

本书涵盖史事从 1912 年民国建立，到 1990 年代的台湾情势。全书以政治、外交、军事史为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史为副，除导论外，共分十章，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中华民国的开国、由分裂走向统一、体制认同与政治权力之争、日军侵华与八年抗战、抗日阵营的整合与分裂、从共同抗日到分别抗日、国家走向大分裂、中华民国守住最后一块土、走上与中国大陆竞立之路等问题。